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延河儿女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序

贾芝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列宁

在改革的大潮中，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里，在现代化的家庭生活中，您还记得过去吗？您可曾忘记在新中国诞生前所经历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回忆录，都是过去的故事，是在解放战争中血与火凝结的教育诗篇。然而在今天，您还会从其中找到新的感觉和启迪。诚然，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受、理想和追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青年们都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所成就，获得成功。当年延安时代的中学生们，他们是在战争烽火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又是第一批投入到尖端科学攻关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今天时代又把他们推向改革的前沿。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了几十年，在不同的工作中获得了成功。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写下了不朽的辉煌的篇章。

烈日炎炎，孩子们坐在窑洞门前，木板在膝头，这就是课桌；寒冬腊月，北风夹着雪花吹打着窗户，他们哈着气，手握着用废弹壳做成的钢笔在记笔记；在饭场上，男同学脖子上吊个瓦罐盛饭菜，女同学束腰打扮，有的成了“假小子”；革命遗孤们到首长家里，他们成了“座上宾”；总理送给他们几个橘子，大家分而食之，分不到的为争一块橘皮发生了一场欢乐的“战争”；有人摘酸枣跌下了山崖，险些丧命，身上带着伤又去参加挖土豆；他们进山烧木炭，有人又用蛇皮、青蛙皮作成了二胡，还砍松木硬抠成一把小提琴；夜行军竟有人没顾上穿鞋，光着脚去行军，回来还没敢做声；“娃娃老师”教冬学，备受尊敬；刚识A、B、C的小护士，夜晚行军中每人手里拿一块死人骨头学解剖，手还在打哆嗦；女同学刚到医院作护士，伤员叫她们“小小老革命”，她们却站在门外不敢进病房；夜雨中，七八个孩子抬一副担架，在泥水中爬过山坡……艰苦而又充满情趣，有时真令人忍俊不禁，笑出声来；然而，就是这些孩子们，用自己稚嫩的双肩担起了时代的重责。

那是一个极不平常的时代，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也是每个人都受到考验的时代。

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紧急关头。翻开这本书，您会看到新中国是怎样在灾难和痛苦中从容诞生的。在各地人民抗日救亡的硝烟弥漫中，有志于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八方云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这中间就有一大批应当上中学，甚至小学青少年，有烈士遗孤，有随父母或革命前辈从大后方来的，有的来自前线的，也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有高干子女，也有边区的群众子弟；总之，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从小毅然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关怀、照顾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少有大志，“时刻准备着”，听从革命的召唤。

战争烽火中的延安中学是革命熔炉；残酷的斗争，奋发的生产运动，寒窗苦读，使他们百炼成钢。

在那里，他们学习各种文化科学知识，同时受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

生观的教育。

在革命教育方针的指引下，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还注意向社会学习，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作社会调查，教冬学，在纪念“四八”殉难烈士会上唱悼歌，帮助群众秋收，延中的秧歌队自编自演节目，在延安也是出了名的。

尽管在地瘠民贫的陕北黄土高原上条件异常艰苦，他们的生活却绚丽多彩，情趣盎然，充满了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山沟里把自己和世界联系起来，和祖国的命运和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联系起来。男女同学们，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生产运动，做到了生产自给，丰衣足食。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学校奉命撤离延安。他们刚刚手持火炬欢庆“八·一五”日寇投降的胜利，激动兴奋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又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学校变成医院，一部分师生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后方医院，直接参加战争同敌人周旋了。他们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以至解放全中国的斗争。

建国初期，他们还跨越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这些年轻青少年的回忆中，有种种趣闻轶事，有欢乐，也有眼泪。我在阅读和编纂中，也不禁多次落泪；有悲伤的泪，也有欢乐的泪。我们不能不为他们那种全神贯注，生命在所不惜的奉献精神所感动，我多次置身其中，分担他们的悲伤或忧愁；有时又与他们同享欢乐。年轻人的机智、欢乐也真让人笑出泪来。同学们，我同辈的战友们，他们那种在天真无邪的稚气中所表现的严肃勇敢的斗争精神，那种勇往直前，冲锋陷阵的姿态和信念，往往令人拍案叫绝。他们的事迹，尘世少有，震撼人心。生活虽艰苦，却并不平淡，有些事确实只有在英雄时代才会出现的奇闻。

切勿见怪或轻视年幼的孩子们。他们有时难免也有些调皮甚至小小的捣蛋行为，但他们对待革命的需要和召唤却是异常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为了抵抗侵略者，为了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为了未来的理想，他们历尽艰险。最可贵的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格来要求自己。他们是与新中国一起诞生成长的年轻一代；是生逢与全世界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和在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的一代；他们是有理想、有纪律、有抱负而又脚踏实地的一代；他们也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孜孜苦读，开拓探索与攻克各种尖端学科的一代，他们具有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又掌握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是最难能可贵的；他们都是不幸，然而也是最幸福的一代。他们的信念和大半生经历，使我们更加相信危难可以兴邦的古老真理。战争锻炼了他们的前半生，今天在改革开放中，他们也正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前哨和生力军，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施展才能，闪现出新的异彩。

请看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烈士遗孤彭士禄，从模范学生、模范护士到成为我国第一代核动力专家、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他的全部力量来源于对人民的忠诚；高耶夫在战地抢救伤员，背上的伤员已经死去了，一经发现，潸然泪下，他在烈士的身旁守了很久很久。他现在已成为外科主任医师，两年前还在云南老山前线抢救伤员。16岁就当上了护士长的李骏，奉命去埋伤员截肢下来的大腿，吓得战战兢兢，现在她已成为一名药学专家，在国际讲坛发表论文；在延中秧歌队争当老黄牛的金德崇，与肖贵臣合作表演，令人笑破肚皮，今天他已是一名军工专家了；温明芳及其他同学一再回忆的王涛英，牺牲在敌人狂轰滥炸的朝鲜战场上，临终在她的桌子

上还放着一本外科学和笔记本。她才 23 岁，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和尚未出世的孩子，长眠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还有一些知名的人物和许多的无名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恕不一一列举。从学校到医院，请看他们在各种活动中由党、团员带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事迹和那种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精神吧！

这一切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今天我们在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中已经踏入另一个科学发达的新世纪。时代不同了，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生活世界和一些新问题。

前几年，延安精神曾一度被淡忘了，甚至受到攻击，这是一种愚昧。今天又发生了人生价值观的问题。是为人民的崇高事业献身服务，还是一切为了个人？这并不是茫然难解的问题，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徐特立的光辉教育思想，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延安一代青少年的成长，证明了徐特立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正确和成功。

当年延安的中学生们，身在山沟，胸怀世界，坚决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今天生活在风云激荡的世界，繁华耀眼的都市，怎么反倒可以变成一个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漠不关心的唯我主义者呢？今天出现的“以权谋私”、“捞、捞、捞主义”正是一种可怕的倒退和背叛，是建国大业的腐蚀剂。这种脱离人民的倾向，只能导致人的堕落，对青少年造成极坏的影响，这是党纪国法和舆论所难容的。毫无疑问，今天的青少年，未来世纪的主人，学习无私的奉献精神，仍然是人生第一位的需要。今天的物质文明和现代化的生活，远非战争年代的忍饥受饿所能相比，然而一穷二白的时代并未悄然而逝，理想的实现，幸福的生活，还有待于人们的加倍努力。因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世界风云的变幻之中，对今天，对未来，依然是赢得胜利的法宝。它是一盏永恒的指路灯。新的时代仍然在考验着每一个人。

这部回忆录虽然有不少趣闻轶事，但它不是一部童话，而是一幅幅现实斗争和青少年学习、前进的如实描绘，是展示历史的画卷。从教育学来看，这些师生的回忆，对今人与后人，也都不失为一面可资借鉴的宝镜。读者可以从看到一个时代人们奋斗的目标，团结一致、互爱互助的人际关系；看到以徐特立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培育人才的一些宝贵经验；

不仅如此，还可以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在指挥战争的同时，是怎样关心和爱护年轻一代，毛主席为任远志写了“光明在前”的题词；

蔡畅妈妈无微不至地关怀刘伯坚的遗孤刘虎生，陈云同志把他随身多年的一块怀表也送给了虎生；邓颖超妈妈对无数孩子和烈士遗孤倾注了厚爱，临终前她点头同意为本书题词，表达了她对年轻一代的挚爱之心。

这部回忆录的读者，首先是青少年。希望他们能喜欢读，也希望他们从中获得启迪，成为革命火炬的传递者。同时，对于教育家、历史学家、广大读者，也该是开卷有益的。

我们发动许多当年延安的战友们执笔回忆往事，如果这些延河儿女的学习和战斗事迹能对跨世纪的青少年们起一点传播“星星之火”火种的作用，我们也就感到欣慰了。

是为序。

1992年8月27日

在艰难岁月中成长

——李鹏的中学时代

余钧

国务院总理李鹏，现在已经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中学时代是怎样度过的？这是为广大中学生和家长，教育界与各方面读者，乃至许多国际人士所关注的问题。

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笔者特撰文对此进行介绍。

早在半个世纪前，在党的关怀下，12岁的李鹏就由重庆来到了延安。从1941至1945年，他在延安学习和生活了5年。其中前3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也是他一生中的中学时代！

在延安，李鹏先后上过三所名称不同的中学：

——1941年3月，他进入了在杜甫川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三班，补习初中课程。

——1942年夏天，延安大学成立，由吴玉章出任校长，李鹏原来所在的补习三班，被合并在这里。因此，在这年秋天开学的时候，他就到了延安大学的中学部二年级上学。

——1943年夏天，中央决定将延安的几所学校合并，组成由周扬担任校长的综合性的延安大学，还在桥儿沟重新组建了延安大学中学部。所以，李鹏在这年秋天开学以后，又就读于这所延大的中学部，即延安大学的附中三年级，直到1944年春天毕业。

这三所学校，虽然名称和地址不尽相同，但实际上都是属于一所学校：即延安中学。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当年李鹏在艰难的岁月中，怎样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

在艰苦困难考验面前……

1941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以及自然条件的影响，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都遭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延安的生活本来就艰苦，到1942年就更加艰苦了：在吃的、穿的和日常用品等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极端奇缺的情况。

但是，延安人民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决心渡过难关。

命运，毫不客气地把正在延安中学读书的李鹏和他的同学们，也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李鹏经受了艰苦环境的严峻考验，以奋进的精神，回答了时代和困难向他提出的种种挑战！

延安的主食本来是小米，但有一个时期连小米也没有了。

李鹏和他的同学们只好吃通常喂牲口的黑豆。这黑豆吃了不好消化，腹胀、胃疼，令人十分难受。有时连黑豆也没有了，就用发了芽的小麦磨的面粉来充饥。这种面粉粘牙、倒胃，非常难吃。没有蔬菜，就以野菜代替……

要是偶尔吃一次馒头，那就是极大的改善了。每当这时，李鹏、黄毅诚、戚元靖和李伦等同学，总是狼吞虎咽般地把馒头吃得精光。他们吃小米

饭，连锅巴也变成了上品。

他们向学校食堂的师傅要来锅巴，把两块锅巴拿在手上互相磨擦，等烤黑的部分磨掉，再将锅巴吃了，而且吃起来觉得很香，很香。李鹏还风趣地给他们的这种吃法，起了一个名称。他说：“我们也吃磨擦饭。”

本来，“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意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毛主席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曾多次谈到磨擦问题，揭露并指责国民党顽固派不打日本，专门和抗日根据地闹磨擦，吃磨擦饭的行径。李鹏他们在这里也有趣地借用了“吃磨擦饭”。

有时，李鹏去看望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姨母赵世兰、舅妈夏之栩。这两位亲人舍不得吃掉食堂发给她们的馒头，而是把它们烤成馒头干，留给李鹏。李鹏舍不得一个人吃，就将这馒头干拿回学校，同班里的一些同学分着吃。那时候，能吃到几片馒头干，就是很大的享受，好像过年，很不简单！

李鹏和他的同学们在中学时代，过着一种半军事性质的供给制生活。学校两年发给他们一套棉衣，每年发给一套单衣，一双布鞋。由于卫生条件差，衣服少，不能经常换洗，他和同学们在身上、头上都长了虱子与虻子。这些可恶的东西，总是频繁地向他们发起“进攻”。当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就进行“反击”：夜里，他们把衣服脱下来，光着膀子，坐在豆油灯下，对这些寄生虫进行围歼。

为了渡过难关，李鹏也积极参加了火热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带头开荒种地。周恩来也带头纺线。李鹏年纪小，个子不高，长着一副清瘦身材，开荒、种地、割谷子、纺线、补衣服、缝被子、编草鞋、做木板鞋等等，他样样都学着干……

在困难面前，李鹏和他的同学们不叫苦，总是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一年只发一双鞋，鞋不够穿。李鹏和同学们就自制木板鞋、编草鞋，在夏天穿，解决鞋不够穿的问题。木板鞋穿起来虽然咔嚓咔嚓地响，但却能节省布鞋。当时，在延安流行的草鞋有两种：一种是用草编的，一种是用旧布条编的。为此，李鹏他们在课余时间，经常去捡破布，捡来以后洗干净，撕成布条，再编草鞋。他说，这种用旧布条编成的草鞋，穿起来很舒服。

延安那时没有肥皂。李鹏他们就想出一种洗衣服和洗被子的办法：每当春夏之际，李鹏总是把要洗的衣被，先泡在水里，当泡透后，再反复用手揉搓，用木棒捶打；然后把衣服装在一个大篮子里，接着将一根绳子的一头捆在延河边的大石头上，用绳子的另一头把篮子拴好，放在延河里，任凭清清的河水去冲洗，一天一夜之后，就算干净了。

打扫环境卫生没有扫帚。李鹏和同学们就上山砍荆条，砍野扫帚苗，甚至砍一些树枝绑起来，做成清洁工具。

李鹏在中学时代的生活环境更为艰难。从12至14岁，他一直住在学校的窑洞里过集体生活。每孔窑洞有一个土炕，住8个人，每个人只能睡一小块地方。陕北的冬天本来就冷。

由于窑洞里没有取暖设备，李鹏和他的同学们就更觉得夜长难熬。晚上，大家围坐在一个小小的炭盆旁边烤火取暖，但当时木炭很少，同学们都舍不得用。那小小的炭盆，那微弱的火苗，哪能抵挡得住西北黄土高原的风寒？！延安的冬夜冷彻骨髓，被子里简直有如冰霜，实在钻不进去。李鹏他

们就在睡前烤火时，把一块砖头放在炭盆旁边，临睡时，再把烤热的砖头用布包起来，放到被窝里抱着睡觉，以驱赶寒气。

由于通风情况不好，夏天的窑洞闷热难挨，无法入睡。晚上，李鹏和同学们就从窑洞里搬出来，把褥子往地上一铺，望着高原美丽的夜空，听着延河潺潺的水声，露天睡觉。这样做倒是凉快了。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他们又受到狼的威胁！

有一天早晨起床后，同学们纷纷惊叫起来。有的说：“你们快来看，我的褥子旁边有狼屎！”有的说：“大家快来看，我的枕头前面有狼的脚印！”也有的说：“我在晚上听见了狼嚎。那凄凉的声音，真让人害怕。”还有的同学幽默地说：“这是狼大哥想吃咱们的肉，先来闻闻香不香？”……

一点不错！是狼先生登门“拜访”他们来了。

相传，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在陕北起义时，人民饥寒交迫，官逼民反，几乎到处都有死尸，引来了许多野狼吃尸。后来，它们就留在这里繁衍生存；加之此地是山城，所以那时延安周围的狼很多。大家在夜间行路都怕碰上狼。当时关于狼的说法也很多。比如，有一种说法讲，狼在田野里如果遇见孤独的行人，它会从人的后面悄悄走近，用两只前腿搭上人的肩膀。当人以为是别的人而回过头来时，它就会一口咬住你的喉咙。还有的说，孤独的夜行人，一定要带着火和光。因为狼怕火和光，如果遇着狼，只要擦一根火柴，或提着马灯，都可以把狼吓跑……

所庆幸的是，由于李鹏他们人多势众，这次野狼只是来这里走走而已，并未敢轻举妄动，伤害他们。

……

亲爱的中学生朋友，亲爱的独生子女同学们，当你们在现在的电视上，看到我们的李鹏总理，正在气宇轩昂、神采奕奕地进行繁忙的国务和外交活动时；当你们吃过父母为你们准备的可口的食品，身着漂亮的衣服，坐在国家为你们修建的宽敞教室读书时，你们可曾想到李鹏总理和他的同学当年在延安上中学时的艰辛？！可曾想到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如今，距那时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但中学时代的生活仍清晰、深刻地印在李鹏的心上。1990年夏天，有一次他在回忆这一段情况时说：“……延安人民不怕困难，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进行生产自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3年秋收以后，整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有了充足的小米，菜也越来越多，有南瓜、萝卜、西红柿吃，每个礼拜还可以打一次牙祭：少不了肉熬粉条子，菠菜汤。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由于自己纺了线，衣服也增加了一点，袜子也有了。在这一过程中，我学会了不少劳动技能，在劳动中得到了锻炼，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也懂得了什么是延安精神！这些对我后来的成长，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1990年11月中旬，李鹏总理视察延安，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延安的山水、草木和窑洞，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近半个世纪前在这里度过的中学时代的生活，又一幕一幕展现在他的面前……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在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挥笔题词：

“发扬延安精神！”

关心政治，组织时事学习小组

世界上享有盛誉的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描述陕北的红军大学时，曾这样写道：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那时的大学如此。中学怎么样呢？

李鹏所在的延安中学，一样以窑洞为教室，不过他们的桌椅不是石头砖块。他们每天上课时，除文具书籍外，每人还必须带两件东西：一件是自制的木头小板凳，一件是一块小木板或硬纸片，用以代替桌椅记笔记。他们用的文具是铅笔和用马兰草做的一种质量粗糙、呈黄色的土纸，也有蘸水钢笔和墨水，但蘸水钢笔一写到这种纸上，就洇成一片，所以无法使用。可天无绝人之路。在他们这些聪明的孩子中，有人竟想出了一种办法：把豆浆刷在马兰纸上，晒干后用蘸水钢笔写字，就不再洇了。这是因为大生产运动以后，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学校每天早上给每个学生供应一碗豆浆，李鹏和许多同学都舍不得把豆浆喝掉，而是将它用在学业上……

即使在如此长期艰苦的生活和困难的学习环境之中，李鹏他们的情绪也丝毫不受影响。他们不怕苦，能吃苦，甚至从来没有觉得苦过；他们心中充满愉快，朝气蓬勃，始终精神振奋，刻苦学习，一心盼着自己能够快点长大，报效党和国家。他们是人小志气大，精神境界高，身住山间窑洞，想着天下大事……

李鹏在中学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十分关心政治，非常重视时事学习。

他在延安中学的时候，正好遇上开展整风运动。从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毛泽东主席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报告。

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

从此，在全党就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那时的延安中学，实际上是一所干部学校，上学的有像李鹏这样的孩子，也有干部，年龄参差不齐。因此，学校师生同机关一样，都参加整风运动。学校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结合整风，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教育和政治教育。

李鹏在这一运动中，始终努力认真学习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整风运动的23个文件，如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他们还边学边联系思想实际，注意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整风运动中，李鹏除了参加学校规定的学习和活动外，有时还得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教诲。

1943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延河水轻快地奔流着，和煦的春风抚摸着环抱延安的群山、纵横的沟壑和成群的窑洞。14岁的李鹏接到通知，要他去见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他满怀喜悦，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一样，一口气从学校跑到延河左岸的杨家岭。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亲切地叫李鹏坐在他们的身边，详细询问了延安中学整风运动的情况和他的学习、思想情况。李鹏向他们汇报后，周恩来感到非常满意。接着周恩来同志就给李鹏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道路问题。在讲解过程中，周恩来怀着无限的深情，语重心长地对李鹏说：“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许多同志英勇地牺牲了，许多同志走了弯路、犯了错误，只有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引的革命道路才是唯一正

确的。你要在整风中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文章、讲话。你们从小能在毛主席的教育下学习、生活，真幸福。”

在此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党中央举行欢迎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大会。李富春同志主持会议，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致辞。周恩来在大会上作关于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唯一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讲话。他号召全党全军都要向毛主席学习，都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经邓颖超同志同意，李鹏当时也荣幸地到会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

尽管李鹏那时年纪还小，但通过整风学习，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通过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教导，耳濡目染，逐渐熏陶，在他的心灵深处，已经深深爱上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永远努力学习的真理和指路明灯。同时，在此期间，李鹏从一批老一辈的革命家那里，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比如，李鹏在同他们的接触、交谈中，以及在向他们请教的时候，对党的历史，对党内的斗争，对党的方针、政策，对国家大事，对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了解。这对他今后在政治上的健康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李鹏在整风时的表现，李富春和蔡畅同志有一次在写给他的信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经过整风以后，我们感到你在逐渐成长，有了很大的进步。”

李鹏在中学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和世界处于多事之秋的年代。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张牙舞爪：它一面加紧对中国的进攻，另一方面在1941年德国发起向苏联的进攻，爆发了苏德战争，与此同时，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而且德国法西斯的军队攻到了斯大林格勒，展开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一时之间，国内外形势非常严重，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李鹏本来就关心政治，关心时事。在国内国际风云急剧变幻之际的1942年，他在延安大学的中学部二年级学习。这时，他就与李伦、艾政等同班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时事学习小组。

李鹏和同学们发起组织的这个时事学习小组，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在班上办时事专栏；二是组织并吸收班上同学进行漫谈，研究讨论形势发展趋势和重大时事问题。

为了办好时事学习专栏，李鹏每天都抽时间认真阅读当时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和有关报刊，并把对抗日战争、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报道及重要言论，分类整理剪贴在专栏上；有时还专门搜集编写资料，对某一问题进行介绍。对苏德战争的进展情况，李鹏下的功夫最大。他一直跟踪着苏德战场的战况与动态，他总是及时把报刊上刊登的这方面的地图剪贴在专栏上，并用针把代表德军的白色小纸旗和代表苏联红军的红色小纸旗插在地图上，明显地标出：德军打到了什么地方，苏联红军又反攻到了什么地方……使人一目了然。他们办的这种时事学习专栏，吸引了许多同学，及时帮助大家了解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

每当时事学习小组组织讨论时，总是呈现出一种令人欣喜的情景：事先同学们都努力学习，主动思考，认真准备；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激烈争论，气氛活跃而热烈，大家争先恐后纵论国内形势和世界风云。有的同

学对抗日战争的形势进行全面论述，有的作重点发言，有的突出分析苏德战争，有的以事例说明太平洋战争情况，还有的同学则是对讨论双方不同意见作概括总结，以把争论的焦点引向深入……

李鹏思维敏捷，头脑机灵，反应快，在讨论中努力用整风运动中和从毛泽东著作中学习到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说明问题。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既讲道理，又摆事实。在辩论中，他有理绝不让人，直到辩赢对方；他很爱发言，他的发言一般都比较正确、深刻，受到同学们的赞同。

通过讨论，李鹏和同学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当时的形势虽然严峻，但前途光明。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必胜，德、日、意法西斯必败。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因此，在那些最艰苦的年代里，李鹏和同学们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保持着旺盛的精力，豪情满怀地投入紧张的学习，并盼望能够早日参加到实际的战斗中去。

q 活跃少年

1943年夏末的一个下午。

延安的天空，湛蓝湛蓝，镶着缕缕白云，显得无比高远。有如柔软的绸缎般的延河，在静静的河水中映着蓝天、白云，浪花似银，映着日光闪动明灭……

此刻，李鹏正在一孔窑洞前，做一件使母亲免于挂念的事情。

“不要紧张，自然一点！”童小鹏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照相机，一边对李鹏说：“好！”

就这样！”咔嚓一声，他为李鹏拍下了在延安中学时的唯一一张单人照片，为人们了解少年李鹏的形象，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李鹏自1941年1月，在重庆同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母亲赵君陶分别后来到延安，至今已快三年。在大后方的母亲想念儿子，来信要照片。但当时延安条件困难，李鹏好不容易才照了这张照片寄给母亲。

你看，14岁的李鹏，他背靠延安窑洞，身穿粗质土布，头上留着乌黑短发，两眼炯炯有神，那高高的鼻梁儿，那棱角分明的嘴唇，那文静的神情，还有那眉宇之间显示出来的灵气，是一个多么英俊的少年！

在中学时代，他的爱好很多，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文体活动。

那时延安的电影很少，每月偶尔只有一两次；但京戏和话剧演出不少。李鹏喜欢听京戏，看话剧。一有机会，他就去看，有时没有票，他也千方百计想法进入剧场。他看了不少京戏和话剧，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秧歌剧与歌剧，对当时延安的一些著名演员，至今还记忆犹新。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前线》、《抓壮丁》等，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剧中的主人公的名字，甚至成为他生活中的口头禅。比如，同学中有谁说了假话、空话，他们就借用话剧《前线》中的一个新闻记者的名字说：“你‘客里空’！”；又如，有些年纪大的同学，在他们这些小同学面前摆老资格，他就用话剧《前线》中那个代表思想保守的人物的名字来评论对方：“你‘戈尔洛夫’！”

李鹏在课余时间，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读书。每当捧上一本好书，就爱不释手，恨不得一口气读完。他读书的范围比较广，有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名人传记，中外小说名著，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他不仅自己借书读，还把借来的书，同李伦、艾政等班上的一些同学互相传阅。

李鹏在中学期间读了好多书，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高尔基的《母亲》，以及鲁迅和茅盾的许多小说，还有《革命烈士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天演论》等等。

书中的英雄人物深深地感动了他，书中的许多哲理名言，恢宏论述，闪光警句都成为鼓舞他前进的力量！

李鹏在中学时代养成的这种良好的读书习惯，为他后来获得渊博的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直将这一读书习惯坚持至今。

在体育活动方面，李鹏也是积极分子，他总是通过爬山、跑步、打排球、打篮球等多种运动形式，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李鹏中学时，住的窑洞在山上，食堂在山下。每天三顿饭，要爬三次山。山陡路窄，有的地方近乎羊肠小道，碰上雨天，道路泥泞，一不小心，就可能从山上滚下来。环境为他提供了天然的爬山条件，使他经受了爬山的锻炼，练就了爬山的本领。

新中国建立以后，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当年在延安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 师师长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等职。他喜欢打篮球，喜欢看赛球，更支持在部队组建篮球队，开展体育运动。

李鹏在延安中学时，贺龙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组建了一个由 5 人为核心组成的篮球队。这个篮球队不仅在部队打，而且经常到机关、学校同地方的同志开展友谊比赛或表演赛。由于这个球队队员的篮球打得非常精彩，延安的人们把他们 5 名队员誉为“五虎将”。其中 10 号、15 号、12 号打得最好。

每当举行篮球比赛时，凡有机会，李鹏都在旁边认真地看着。特别是对场上表现突出的队员，他更是留心观察着。他为“五虎将”打出的好球鼓掌，叫好；为要输的一方高喊“加油”。

他被 10 号、15 号高超的打球技术所完全吸引和折服。他非常羡慕和崇拜他们。他决心向他们学习。有时在中场休息时，李鹏就急忙跑到球场上模仿着看到的动作练起来，一直练到下半场开始的哨音响，他才匆忙退下来。

渐渐地，李鹏觉得光看球不过瘾，也想比赛一下，经他提议，和同学们商量，他们在班上也成立了一个由 5 人组成的中学生篮球队。戚元靖、黄毅诚、李伦打后卫，李鹏打前锋。

除了球队集体活动之外，李鹏还经常一个人练习投篮和跑步。他认为打球要靠技术，还要靠体力，要想打得好，就必须付出辛劳和汗水。为了做到在篮球场上能够跑得快，传球快，李鹏这位队员，经常利用早晨和课余时间，以极大的努力坚持长跑，练习弹跳，以增强速度和耐力；为了提高投篮的技术，人们可以看到李鹏身穿短裤、背心，在夏秋之际，经常在学校的篮球场上，运用各种姿势和方法投篮，一次，两次，十次，几十次……直到汗流浹背，疲惫不堪，他才罢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锻炼，李鹏的打球技术终于有了很大提高。

在一次比赛中，他竟然大显身手，令人刮目相看。李鹏个子不高，同别的同学比较起来，略显瘦小，但他身体结实，轻快灵巧，跑得快，投球准，虎虎有生气。在双方争夺激烈的时候，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只要球到了他的手里，他准能千方百计投篮得分。哨子一响，四周的同学都要喊：

“李鹏，进了！李鹏，好球！”

由于李鹏的篮球打得非常出色，一上场，就猛打猛冲，一会儿过人上篮，一会儿定点投篮，异常活跃。特别是投篮，常常赢得全场欢呼喝彩。因此，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活跃”。赞扬他在文体活动中的突出表现和成绩。

李鹏他们这个篮球队，经常是跟班上的同学打球，有时也跟比他们低一年级的贺毅、贺光辉、杨廷藩等同学进行比赛。

这个篮球队，在开展学校体育运动，增强同学体质，活跃同学生活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q 骑马风波

李鹏活泼、聪慧，文质彬彬；但又调皮淘气，大胆勇敢。

他喜欢马，尤其喜欢骑马。

可在当时的延安，马却十分稀少和珍贵。由于那时条件困难，缺少汽车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事实上马被作为“小轿车”来使用，成为首长代步的工具。因此，只有中央领导同志和警卫员才有马。

每当李鹏在延安的街道上，遇到有的同志“雄姿英发”地骑着马，听到马的四蹄在大地上敲出的鼓声，他就感到无比的振奋！

有时，他在电影上看见红军的骑兵骑着萧萧狂嘶的战马，挥着闪闪发光的马刀，像一阵风一样向敌人旋卷过去的时候，他就对这些驰骋疆场的英雄，产生无比的敬重。他甚至想让自己快点长大，有一天也能单枪匹马驰骋疆场，成为一名战士！

李鹏在延安中学的时候，在星期天或节假日，有时到李富春和蔡畅同志家里去玩儿。

李富春是湖南长沙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他和他的警卫员，每人各有一匹马。

有一次，李鹏到他们家后，向李富春伯伯提出请求：希望警卫员能够教他骑马，并且带着他骑骑马。经批准后，李鹏就逐渐学会了骑马，而且也让警卫员带着骑了几次。

但他总觉得不够痛快。

1943年初秋的一天下午，李鹏又一次来到枣园李富春和蔡畅同志的住处，当时他们正在休息。他看见首长平时骑的那匹高大的黑色骏马，鞍辔齐备，拴在院里的一棵树上，警卫员却不在。看样子，好像刚刚从外边回来。他早就想一个人骑着马出去跑跑，兜兜风，玩个痛快。见此机会，他没有认真考虑，便即刻擅自做主，把马拉出去，骑着跑了。

这匹马毛色光泽，马鬃很长，臀部滚圆，四条腿纤长有力，性情柔和、老实，就是小说里常描写的那种“乌龙驹”。开始，它缓步地平稳地跑着，当跑到大道上以后，李鹏轻轻地把镫子一磕，大黑马立刻箭一般向前奔去。他只觉得耳旁的风声呼呼，树木一闪一闪地向后倒退，他还将一只手臂高高举起，像骑兵挥动马刀一样，自由自在地驰骋在西北高原的大道上……正当李鹏玩的痛快，骑的尽兴的时候，突然迎面奔来了一辆三套马车，这匹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战马受惊了。顿时，它暴怒得连尥带跳，乱嘶狂鸣，一下子就把李鹏从它的背上摔了下来，继续向前猛烈狂奔……

幸亏李鹏在篮球场上还有点功夫，他的弹跳能力帮了大忙，从马上掉

下来以后才没有受伤，只是被重重地摔了一下。

他摸摸摔疼的部位，从地上站起来，望望消失在尘土飞扬中的远处的大黑马，他只能望尘兴叹，别无他法。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闯了祸：要是马跑丢了怎么办？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地回到李富春和蔡畅同志家里。

回来以后，这位调皮淘气、大胆勇敢的少年，就受到了批评。蔡畅同志既严肃认真，又态度和蔼地对李鹏说：

“你知道吗？这匹马不是给你骑的，是中央配给你李伯伯工作用的。首先，你就不应该骑。如果你要骑，也得经过我们同意。但今天又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你自作主张将马骑走，这违犯了纪律。”说到这里，蔡畅用责备和慈爱的目光，看着李鹏接着道：

“结果，你被马摔下来了。要把你摔坏了怎么办？你想过没有？！这不好吧！现在马也跑了……你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

李鹏低着头，红着脸，认真听着蔡畅同志的中肯批评和深刻教育。他为自己做的错事后悔，为因自己做错事造成的后果，感到难过。他觉得非常惭愧，过了好一阵，他才诚恳地说：

“蔡妈妈，你批评的对！我完全接受。今天是我不好，是我错了。因为我的过错才造成这种后果。”

由于马跑了，找又无处去找，警卫员既心疼又着急。李鹏更是惦记着那匹从他手中跑掉的大黑马的下落。从下午到晚上，他如坐针毡，十分难熬，连晚饭都只是胡乱吃了几口。正当他深感内疚，闷闷不乐地准备告别蔡畅同志返回学校时，突然从院里传来警卫员的声音：

“大黑马回来了！大黑马回来了！”

李鹏出来一看，果真不错。

原来，老马识途。大黑马自己找回家来了，而且安然无恙。

这时，李鹏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从此以后，李鹏再没有做过违反纪律的事情。

3年以后，李鹏曾经向往的单枪匹马驰骋疆场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那是李鹏 1945 年 11 月离开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前线后，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的 1946 年秋天。

这时，李鹏已经是一位入党近一年的年轻的共产党员，经常单独勇敢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有一次，李鹏身穿军服，单枪匹马穿越冀西的大沙河，来往于灵丘和阜平之间。白天，他骑着红得像火炭一样的枣红马，驰骋在华北大平原上，行军、执行任务；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吃派饭，解放区的人民用枣酒、咸菜、稀饭和薄饼，热情款待他这个小八路；睡到半夜，他还得起来喂马……

前线的硝烟、烽火，使李鹏逐渐成熟起来，他已经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了。

q 中学毕业，考上大学

李鹏天资聪颖，灵活机敏，善于独立思考，记忆力很强，又勤奋好学，刻苦努力。

在整个中学时代，他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为他今后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当时延安进行整风，他在 1941 年、1942 年，甚至在 1943 年的上

半年，一直都在读中学二年级。在此期间，学校主要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因此，他在政治上收获很大，对文化课的学习时间却相对较少，但他并不放松对文化课的努力学习。一直到了中学三年级，从 1943 年秋天开学以后，李鹏才开始比较正规地学习文化课。

1944 年春天，李鹏在延安中学毕业，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

在 3 年的中学时代，李鹏有幸赶上并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和大生产两大运动。对此，他将永远难以忘怀。

那时在延安无初中、高中之分，延安中学毕业生的程度，比现在的初中要高，而比高中又低。因为需要，当时延安中学的毕业生，有许多人都被分配参加了工作。比如，蔡诚被分配去搞保卫，李世魁、李世斌被分配去搞电台，汪道洋被分配去搞机要，林汉南等同学被分配到学校当教员。而李鹏、黄毅诚、戚元靖、彭士禄、杜军和何建文等同学，还想继续深造学习。他们找中央组织部提出这一要求。很快，组织部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把他们介绍到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去上学。但当时学院的党委书记刘平一定坚持要对他们进行考试，然后根据成绩，再决定能否上学。

考试结果，李鹏等因成绩优异，被学院正式录取。这样，他在中学毕业后，就考上了我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

延安自然科学学院。

李鹏入学后，先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预备班补习，到 1944 年秋天开学，就被学院分配在化学系学习，成为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

1991 年 4 月 17 日 李鹏：

男，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1948 年入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专业，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1955 年毕业回国，先后任吉林丰满发电厂副厂长、总工程师；东北电管局副总工程师、调度局长；阜新发电厂厂长；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

电力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等职。1982 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83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 年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同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 年 11 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月任国务院代总理。

1988 年 4 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附录：我是延安人

邹爱国 王世焕

李鹏总理回到了延安。宝塔山、延河水、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近、那么令人难忘。

半个世纪前，12 岁的李鹏在党的关怀下和一批烈士后代来到延安，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整整生活了 5 年。他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

1990 年 11 月 20 日上午，李鹏抵达延安的第一项活动是：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走进展览大厅，李鹏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

的塑像前伫立许久。他深情地说：

“我是延安人。”

一幅幅照片、一件件文物，反映了党中央在延安 13 年的革命实践，展示了光辉的延安精神。李鹏指着一幅红军开进延安城的照片告诉大家：“当时延安就是那样，都是平房，不像现在有了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建设得这么美。”一幅 7 岁小女孩纺线的照片，引起了李鹏对当年战斗生活的回忆：“当时延安生活艰苦，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我们都开过荒、纺过线。那时我一天只能纺一两多线，质量也才达到二级，在同学中我的技术算比较差的。”离开纪念馆前，李鹏挥笔写下“发扬延安精神”六个字。

下午，李鹏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宝塔山，来到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

在杨家岭毛泽东同志旧居前，李鹏向大家介绍，这里是毛主席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的地方，那里是毛主席种过的地。来到周恩来同志旧居，有人指着三孔窑洞边的侧房问：“当年你是否在这里住过？”李鹏点了点头，说：“这是恩来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房子，在节假日，我也偶尔来住过。”

走出杨家岭，闻讯而来的群众挤满了坡上坡下，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鹏总理的到来，李鹏笑着向大家招手。延安大学的一对年轻夫妇挤过人群向李鹏问好，李鹏抱过他们 3 岁的孩子和他们攀谈起来。“李总理，你是我们延大的老校友，欢迎你到延大去！”李鹏说：“当时我是在延大初中部学习，还不是大学生。你们回去后，请转达我对延大师生的问候。”

为革命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延安人民今天生活过得怎样？

这是常常萦绕在李鹏心中的问题。在北京，李鹏不断听到从延安传来的消息：粮食今年又获丰收，人均生产粮食由 1978 年的 300 多公斤增长到 396 公斤，农村烟、果、羊、薯四大主导产业开始形成规模；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有了改变，石油、煤炭、卷烟、毛纺四大骨干产业，已经成为延安经济的主要支柱；贫困面逐渐缩小，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12 万户、58 万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全区农村人均收入达到 330 多元，比 1978 年增长 3.9 倍。

……

延安确实变了，延安发生了深深的历史变革。李鹏来到延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去看看乡亲们，实地考察一下延安的变化。

21 日上午，迎着冬日的阳光，李鹏来到柳林乡三十里铺村。村党支部书记冯志清告诉李鹏总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们村大兴林果，今年林果收入达 20 多万元，为全村脱贫致富打下了基础。

沿着山间土路，李鹏来到果园参观。放眼望去，只见两旁山岭长满了果树。冯志清告诉李鹏，这里的果树有苹果、梨子，还有水蜜桃。李鹏问：“山上水从哪儿来？”“我们在树下挖了鱼鳞坑，下雨就能把水留下。”李鹏赞扬说：“好啊，你们果树栽到了山岗上，不简单。现在，这里像个花果山，春天开花，秋天果香，了不起！”

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李鹏和延安的同志谈起了种草种树问题。他说：“我们过去在延安，山是光秃秃的，现在森林覆盖率达到 30% 左右，这是了不起的成绩。我们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治山治水，把土山变成青山，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

李鹏又问冯志清：“你们生产发展了，还有多少贫困户？”

“原来有 46 户，经过党员包户，32 户已经基本脱贫，但是还有 14 户没有脱贫，生活还比较困难。”李鹏说：“在扶贫中，要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共产党员的作用，要增强凝聚力。”

在三十里铺村，李鹏走家串户，问长问短，乡亲们像当年迎接八路军那样，拿出红枣、苹果、瓜籽，招待总理一行。李鹏在窑洞里、土坑上、小路边，和乡亲们拉家常。

走进农民刘厚望的窑洞，李鹏连声说：“你住的窑洞真漂亮，条石结构，白色的墙，比我们那时住的土窑洞强多了，也比毛主席住的窑洞好。”刘厚望咧着嘴笑道：“现在生活过得好着哩。我们还有电视看，党中央、北京有什么大事，我们全能知道。”李鹏问他今年的收入，刘厚望伸出 4 个指头说：“4000 多元。”“你家 7 口人，平均每人有 600 元。”李鹏又问冯志清：“这一家在村里属于什么水平？”冯志清说：“中上等。”李鹏叮嘱说：“要进一步发展生产，让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好。”

木匠贺增浩把李鹏让进窑洞，见李鹏端详着墙上的照片，便指着照片上两位老人说：“这两位是我的父母。”李鹏说：“他们穿得可没有你们好啊！”贺增浩的妻子说：“那时我们还穷，生活比不上现在。现在多好，吃白面，穿新衣，老百姓可高兴呢。这全是共产党领导得好！”女主人说着，朝李鹏手里塞过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你尝尝，这是我们自己果树上长的。”李鹏说：“这苹果真香，我们那时在延安，见到的只是一些小沙果。”

在村里，李鹏这家走走，那家看看，和乡亲们这个聊聊，那个谈谈。走过长长的土坡，李鹏来到李海泉家门前，对冯志清说：“这家只有两口窑洞，我们去看看。”冯志清忙上前敲门，谁知门锁着。正在村头的李海泉夫妇赶来开门，笑着把总理引进家。李鹏询问李海泉产多少粮，收入多少。李海泉答道：他家有 5 口人，平均每人有粮 800 斤，收入 1000 元。李鹏问他有几个孩子，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冯志清说：“他有 3 个孩子，一男两女。”李鹏说：“你们村计划生育工作做得不好，刚才看的几家，不是 3 个孩子，就是 4 个孩子。生产发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一定要抓紧。当干部的要重视计划生育工作，要改变群众的生育观。不是孩子生得越多越富，而是优生优育才能致富。”

离开三十里铺村，李鹏特别叮嘱：“粮食生产不能放松，要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要建设一批稳产高产田；计划生育是件大事，一定要抓好，要通过各级干部的工作，把计划生育变成农民自己的需要，把培养有知识的下一代变成农民自己的需要。”

通过实地考察、访问，李鹏和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就开发延安，建设延安进行座谈。

李鹏说：“和 45 年前我离开这里相比，延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正在兴旺起来，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扶贫工作正在由救济型向开发型转变。这些历史性变化说明，延安人民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大有希望。”

讲到这里，李鹏深情地回忆起 1973 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时的情景。他说：“那一年，周总理回到延安，看到延安人民生活很苦，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他老人家伤心地流了泪。现在，延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暮色苍茫时分，李鹏总理乘坐旅行车离开延

安城，闻讯赶来的群众站立街头向总理招手。此刻，宝塔山笼罩着一片金色的余辉……

怎能将她忘记

刘虎生口述 李晓丽执笔

每个人都有自己视若生命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永志不忘的记忆。当两鬓染霜、步履沉重之际，当功成名就、待遇优厚之时，我会不时将珍存了几十年的沉甸甸的遗书、发黄的相片、古老的怀表，看了又看，不断将我少年时所经历的一切想了又想。千头万绪凝结成一个焦点——延安，那儿有一个延中少年酸甜苦辣的梦，有我割不断的万缕亲情。

卡车停在延河边的一口窑洞前，一个叔叔像父亲一样拉住我的手说：“这儿就是你的家啦！”

卡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整整颠簸了三天，终于在山坡下停住。我正在车上好奇地东张西望，羡慕地看着一个个身穿军装，精神威武的人们，嘴里默念着城门上张贴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合作”等标语，一直陪着我的小排长喊起来：

“小家伙，到家啦，还不快下车？”

啥，到家了？！我兴奋极了，急急忙忙跟着排长向“家”——

中央组织部奔去。一进屋，见一位伯伯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我想起排长路上交代的话，忙解开上衣，从里面用线缝得严严实实的口袋里掏出捂得热热的“介绍信”，递了上去。

“阿哈，你就是刘伯坚的儿子虎生啊！唔，很像你父亲。我跟你父亲在法国一起留学，红军长征也在一起，熟得很呐。你父亲很勇敢，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是该引以为骄傲的。对了，你还不认识我吧？我叫李富春，我这儿就是你的家啦！”

不知怎么，见到这位和蔼可亲的李叔叔，我就像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样，一点不拘束，真想扑到他怀里痛痛快快地说说自己这几年的艰难生活，享受享受从未体味过的温厚的父爱，然后再踏踏实实睡上一觉。要知道，我当时还未满 10 岁，这点儿要求并不过分呀！

可是，我没这么做。生活太多的磨难，已将沉重的负荷过早地压在我稚嫩的肩上，我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感情。听着叔叔的话，我只是默默地点点头，心里却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尽管这样，我渴望父爱母爱的心愿并没有泯灭，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放到现在，还是个在父母的羽翼下备受护爱的小鸟，尚未起飞呢！可我从两岁起，就再也没见过父母的面，一直跟着西安的舅妈生活。每次我问起舅妈“怎么别的孩子都有父亲，我却没有”时，舅妈都要背过身去揉眼睛，说是眼被砂迷了。直到 1935 年我 8 岁那年，一天，舅妈眼睛红红地拿回来一份报纸，悲痛地对我说：“虎子，你也不小了，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你爸爸妈妈一直为了革命工作奔忙，他们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你。为了不让你受委屈，才决定将你交给我抚养。现在你爸爸牺牲了，你长大后一定要为他报仇，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啊！”这时，我才明白了自

己的身世，第一次放声痛哭起来。慢慢地我才知道，我父亲刘伯坚和母亲王叔振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们为了全力以赴地从事革命工作，不得不忍心扔下了亲骨肉，把我和两个弟弟寄养他处，任凭自己内心忍受失去儿子的痛苦。1935年3月，父亲被捕。就义前，他惦念着我们，思念着亲人。他满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对党的耿耿忠心走了，没给我们留下一文钱，却留下了一封充满深情和期望的“最完整的遗书”（周恩来语）。不久，母亲也被害身亡，这封遗书，便成了父母留给我们三兄弟的唯一的、最宝贵的遗产。

父母牺牲后，为了斩草除根，国民党警察、特务经常以查户口为名，搜查舅妈家，以便确认我是刘伯坚的儿子，好下毒手。为了保护我，舅妈给我改名叫王富生，把我当成她的亲儿子一样抚养，在生活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含辛茹苦，抚育我长大，并经常将革命道理和做人的准则讲给我听，使我这个失去了父母的孤儿身心健康地成长着。舅妈唯一的愿望是让我快点长大，等待党来寻找我，并把我带到红色圣地延安去接受最好的教育。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1936年底，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西安地下党费尽周折，终于将处于危难中的我找到，并决定将我送到延安学习。

这天天刚蒙蒙亮，接我的人就来了。舅妈早早将装着新衬衣和新鞋的包袱准备好，并把父亲留下的遗书仔细缝在我的衣袋里。新衣和鞋是她这几天点灯熬油一针一线为我做的，为了这套很“奢侈”的行装，她自己已经有好几年没添过衣服了。

走出生活了近10年的家门，回眸而望，门板依旧，石阶依旧，而依门而立的舅妈却瘦多了、老多了。她那永远充满慈爱的眼里淌着泪，不住叮嘱着：虎子，你就要去你父亲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了，到那儿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你的父母报仇。我两眼模糊地在心中告慰舅妈：放心吧，我不会辜负您的一片苦心，将来我一定做个有出息的人，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1937年6月，我携带着周副主席的一封亲笔信和我父亲的遗书，踏上了去延安的征程。

路上，护送我的小排长不住地跟我开玩笑：“周副主席的信和你爸爸的遗书，就是你的介绍信，你要是把它们丢了，就没人要你了。”我一听可真当回事了，一路上手总不住摸那个装信的衣袋，唯恐丢了没人要了。

等到了延安，将信交给李富春叔叔之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又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啊，我终于到家啦，从此，我就要在这块又美丽又安全的地方，在父母般慈爱的首长身边学习和生活了，我将多么幸福！

我闯过了死亡线，都说我命大，可我明白：没有首长和众多亲人的关怀照料，我是打不赢死神的。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幸福的孩子。

我像一只被妈妈丢了，又被找到的小鸟，终于在延安这块山青水秀的土地上落了巢。

我家的人可多啦，有慈父般威严、宽厚的陈云伯伯、李富春叔叔，还有慈母般温柔、体贴的蔡畅妈妈。从保小、延中，直到我被组织保送去苏联学习深造，后回国工作，风风雨雨几十年，一直都是在他们的护爱之下，思想上接受教育，生活上得到照顾，从未感到过自己是个孤儿。

我到延安时，正值抗战开始。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在延安上空飞来飞去，投下一枚枚炸弹，而后国民党也对延安实行了经济封锁，生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这些学生每天都吃大锅饭，主食是小米饭，菜主要是大锅

熬的白菜、南瓜、土豆等，油水很少。

时间一长，我们的小嘴巴都馋起肉来。当时考虑到中央首长们日夜辛苦，为照顾他们的身体，他们的饭菜自然要好些。但首长们总舍不得自己吃，每星期都要将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小鬼招了去。记得陈云伯伯、李富春叔叔的桌前总是围满了孩子，不多的肉很快被我们分得一干二净。我当时还不懂事，只知每星期天到陈云伯伯或李富春叔叔家吃饭是理所当然，到时不用招呼，自己早早就去了。

有一天，司务长叫住我：“虎子，你也不小了，该懂事了，以后就不要到首长那儿去吃饭了。”我抬着剃得秃秃的小脑袋不解地问：“为什么？”“现在供应困难，首长吃的东西也不多了，很快就连馍也吃不上了。他们整天那么辛苦，你忍心让他们每天也吃小米饭、熬白菜吗？”我听了司务长的话，懂事地点点头。

星期天又到了，我没有去首长家，首长来叫我：“虎子，吃饭去。”我故意将小瘪肚子鼓了鼓，拍拍说：“伯伯，我已经吃饱了，这次就免了吧。”以后的每个星期天，我都是早早就“吃饱”了。

我到延安时，正是顽皮好动，身体成长之时，整天不知疲倦地跑来跑去，鞋子穿得可费了，发给我的鞋根本接不上茬。

等到我的脚和大人差不多时，蔡畅妈妈只要看见我的鞋破了，就把李富春叔叔的鞋拿给我穿上，而他们自己的鞋却是补了又补。当时首长们的津贴也很少，可陈云伯伯总是省吃俭用，给我买手帕、牙刷、牙粉等用品，并且经常告诉我对人要有礼貌，要讲卫生，要做个文明的好孩子。他工作忙极了，但只要有空，他就把我拉到身边，给我讲革命斗争史，讲我父亲的不平凡的经历，讲革命的道理，使我幼小的心灵不断得到充实和净化。记得有一次，陈云伯伯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想了想回答：“不是，但我的思想是布尔什维克的。”陈云伯伯听了满意地大笑起来，不住地夸我思想变得成熟了。

尽管延安生活艰苦，可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娱乐活动也很多。延安被炸后，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经常有戏团在那里演戏，《屈原》啦，《三打祝家庄》啦，内容可丰富了。我们学校离杨家岭不远，晚上一演戏，我们这些小戏迷便跑去观看。每次看戏，周恩来副主席和李富春等首长就把我和几个小鬼抱到腿上，边看边问问学校的情况；思想进步了多少，都学了什么功课，生活怎么样，同学间团不团结……使我们尽情体味父亲般博大宽厚的疼爱和关怀。那时我恨不得天天有戏看，这样便可以天天成为父亲怀里受宠的孩子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在上延安中学时一段起死回生的经历。

1945年，我在延中四班学习，精力充沛，好学要强。有一天，我正上着课，忽然感到身子发虚，眼前发黑，汗珠不住滴落下来。我平时很少生病，不知自己这是怎么了。

放学时，我像走在棉花套子上一样稀里糊涂回到窑洞，一躺下就感到天旋地转起来。当地一位农民告诉我，你这是被鬼缠身了，赶紧起来往山上跑，出身透汗鬼就被赶跑了。

我信以为真，强撑着往山上跑，越跑越觉得心慌腿软，最后竟昏了过去。醒后病更重了，浑身滚烫的，吃不下饭。为了不落下课，我一声不吭，每天仍坚持去上课。很快，我发现自己腿上起了许多小红点，校医看后也说

不出个所以然，只给我搽了点红药水。不久，红点越长越多，最后全身都是，还由红点变成了一个大大血泡。春节到了，我多想和同学们一起去扭秧歌，尽情欢乐一番，可我弱得连走路都困难。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窑洞里，真想家，想父母般慈爱的首长们。

学校一放假，我便拄着拐杖，一步三歇地往陈云伯伯家赶，十几里路整整走了半天。

我一进陈伯伯家的门，就瘫在地上。陈伯伯见我这样，吓坏了，当即打电话让医生来，自己忙翻箱倒柜给我找药。医生来了，看了半天也说不清我得的是什么病，只给了点治关节病的药让我吃了。第二天我就动不了了。

陈伯伯急得在屋里团团转，平时沉静的脸涨得通红。他叫人找来担架，火速将我抬到几十里外的和平医院。到了医院，我已如死人一般，心脏跳动微弱，浑身器官只剩下眼睛没出血了。

医院打电话告诉蔡畅妈妈，说我不行了，准备后事吧。蔡妈妈一听，哭着在电话里喊：“一定要再想想办法，我马上就到。”很快，陈云伯伯骑马赶到了，随后蔡妈妈也来了。看见已瘦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我，他们难过地流下了眼泪。我虽人如死样，可脑子还算明白，朦朦胧胧中，我听到蔡妈妈平时那柔美好听的语音已变了调：“刘伯坚唯一的一个有下落的儿子快保不住了，这怎么对得起烈士。虎子，你可要挺住啊！”后来，蔡畅妈妈建议请经验丰富的苏联医生阿洛夫来会诊，才断定我得的是急性坏血病，唯一的治疗办法是输血。当时在场的护士多是我延安中学的同学，他们二话没说，当即将 1400cc 溶着热诚和友爱的鲜血输到我的血管中，保住了我的性命。

为了使我虚弱的身体早日康复，陈云伯伯、李富春叔叔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把组织上照顾他们的一点营养品全部给了我，还买了一只大公鸡送到医院，给我补养身体。陈云伯伯还派来了他的小公务员照顾我的生活。

我终于活下来了，而且很快又成了活蹦乱跳的小鬼。医生们都说：“虎子的命真大，抵抗力这么强，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去见马克思了。”可我心里明白，我的命完全是疼我爱我的首长和医生护士们给的。我虽失去了亲生父母，可我得到了胜似父母的关怀和照料，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幸福的孩子。

特殊的环境锻造了我们善良、乐观、刻苦、坚毅的品格。我的中学时代是艰苦而充满乐趣的。

1941 年，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到来。世界法西斯势力的猖狂，使中国抗日战争处于低潮，接踵而来的是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正是在这种时刻，16 岁的我从保育小学升到了延大中学部（延安中学前身），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学生。

中学的生活是紧张、艰苦而有趣的。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有烈士遗孤，有父亲在前线或大后方工作的干部子女，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还有参加了革命工作的红小鬼。

乡音不同，年龄各异，但大家幼小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好好学本领，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此，我们没有顾及环境的艰苦，到处都是刻苦学习的身影和欢快的笑声。

我在班上算年纪较小的，平时不爱多说话，比起那些顽皮、活跃的同学们来，我显得过于沉静了。可我有股不服输的倔劲，绝不肯在学习上、工作上落在别人后面。当时的学习环境艰苦极了，别说明亮的教室、崭新的桌

椅，我们连最起码的固定教室都没有。

无论冬夏，晴天，院子是我们的课堂，雨天，不住掉土的破窑洞是我们的教室。一只小板凳，几张马兰纸，一支高粱秆做的笔，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上课条件差点倒没什么，最让人头疼的是马兰纸一写上字就洇得不行，根本看不出写的是什么。同学中有几个小脑瓜灵的，想出了个用黑豆浆浸一下马兰纸再晒干使用的方法，果然立见奇效，大家纷纷仿效。从此，每星期只能喝到一次的豆浆再也没人舍得喝了，全都“喂”了马兰纸了。光这还不算，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从中央领导到年幼的学生，每个人都得亲自参加生产，纺线、种菜，以维持生活。我们每天半天学习，半天生产，学习的时间相对来说太少了，因而就显得特别宝贵。

我在众多的课程中，对数学和生物最感兴趣。夏天我们上课的周围长满了绿油油的草，一下课，我便迷上了这些不起眼的小生物，一个人观察它的根、茎、叶，往地上一趴就是半天，那时我一心要当植物学家呢。回想起后来被国家保送到苏联留学时的情景，我还真庆幸有这么一段艰苦生活的磨练。

1948年，列车载着我和几个同学驶入苏联境内，开始了为期6年的留学生活。我们这些在动荡年代，在露天课堂、窑洞教室摸爬滚打出来的只接近高中水平的大学生，与苏联上过正规中学出来的大学生相比，知识的拥有程度可想而知，学习上怎会不吃力呢。

刚到苏联时，我们连笔记都记不下来。国家需要人才，李富春叔叔在欢送会上那些难忘的话语；陈云伯伯将跟随了他几十年的一块宝贵的瑞士怀表送给我时眼中所含的期望；蔡畅妈妈在火车启动前对我的慈爱的叮咛……就像被烙铁烙在我的脑海中一样，时时在鞭策着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拚命了。六个春夏秋冬，不记得我们哪天是凌晨一点钟以前睡的觉，哪天是休息日。为了听课清楚，我们每天都早早赶到教室，占最前面的位置；为了省时间，几个人的饭采取轮流服务制。1955年，我们都以优异的成绩从苏联回到了祖国。这种肯吃苦、惜时间、怕落后的劲头，就是在延安中学学习时养成的。

学习上艰苦，生活上就更苦了。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后，我们连吃小米饭、熬白菜都困难了，自己经常挖野菜，用小米煮成稀稀的饭吃。我们这些十几岁、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子哪里吃得饱？尽管这样，大家没有一个人把这当回事，照样乐观、愉快地生活。学校就像个大家庭，同学就像兄弟姊妹，大家团结和睦，互相关心、爱护，歌声不断，笑声不断。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过春节吃饺子。年三十，学校发给我们每人1斤面，1斤羊肉，让自己动手包饺子吃。很久未见白面和肉了，我们早就饿坏了，可拿到面和肉，我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大丈夫”却犯难了，不知该怎么把它们变成香喷喷的饺子。后来有个男生提议，与女同学联合。我们男同学劲大，负责剁馅，我年纪小，受到照顾，揽下了烧火、洗碗的活儿，而女同学则干擀皮、包饺子的细活儿。有个男同学不服气，非说自己能行，用不着谁帮忙。结果待他的饺子包成，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原来，他将1斤面和好，擀成了一个大皮，把1斤馅全包在里面，包成了一个堪称“世界之最”的大饺子。

我们把它煮了，结果一个小时后，饺子中间还是生的呢。这个男生好后悔，可他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他会有香喷喷的饺子吃的，同学们会将

他们的一份分给他，而且绝对能吃得饱饱的，这是我们班历来的传统嘛。

别看我平时不声不响，像个小大人，可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常常也有些“惊人”之举。

1941年后，小鬼子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延安。只要一有飞机来，就有人敲钟报警，我们就立刻钻进窑洞躲一躲。有一天，我无意中跑到了陈云伯伯的窑洞里，听着外面响得吓人的轰炸声，我又惊奇又害怕。陈伯伯叫我别怕，说炸不到这儿，听这声现在炸到××地方了。等到警报解除出来一看，果然炸到了陈伯伯说的地方。真绝了！我很想学到这一手。为着长些见识，也为着壮壮胆量，我决定亲眼看看飞机轰炸的场面。机会来了。

这天，我们正在地里摘西红柿，警报响了。同学们都向窑洞跑去，我趁混乱之际躺在西红柿秧下躲起来。飞机的“嗡嗡”声近了，我抬头一看，妈呀，足足有20多架，正朝我这边飞来，接着，从飞机上掉下了一个个黑色的东西。我意识到是开始扔炸弹了，赶紧趴到地上。很快，恐怖的尖叫声越来越近，不久就在我不远处炸响了，炸起的土渣直往我脖子里钻。我吓坏了，早没了当初看飞机时的好奇和冷静了，把头深埋在地上，再也不敢抬起来。事后，我虽然挨了批评，但我心中却暗自自喜，同学中看过飞机轰炸过的毕竟只有我虎子一个人啊。

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像往常一样，吃完午饭便到河里去游泳。我正仰面朝天地游着，一个头上兜着白毛巾，二十多岁的农民走过来。他看了我一眼，眼里分明充满了轻视。

只见他脱掉衣服，“扑通”一声跳到水里，然后像在平地上行走一样，在水里走来走去，他会踩水。只会仰泳的我爬上岸，羡慕地看着他。突然，他的头渐渐向下沉去，嘴巴一张一张，像是快不行了。我一看这情景，急了，想下河救他，但水性不好。这时，路边走过来一支运盐驴车队。我急中生智，向车夫借来了长鞭子，把鞭杆甩给正在水中挣扎的农民，鞭杆在水中一漂一漂，他很快抓住了。我和赶车人齐心协力，终于把他拉上了岸。估计该到下午活动时间了，我起身向学校方向跑去，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做了一次救人性命的“壮举”。12岁孩子的心充满幻想和好奇，不管多大的事，在我的眼里都是很平常的小事而已。

倒是像父母一样疼爱、关心我的陈云伯伯、李富春叔叔、蔡畅妈妈等长辈对我思想上的言传身教和生活上的悉心照料，以及延安中学这段不平凡生活所给予我的磨练，让我永记不忘，一刻也不曾忘记，并当做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珍藏起来。

斗转星移，转眼50多个春秋过去了。回首过去，依然是那巍巍的宝塔、清清的延河、红红的山丹丹，排排的窑洞最难忘；

依然是瓦亮的、吊在脖子上的瓦饭罐、用自己纺的线做成的粗布衣、粗糙的马兰纸和同学间亲密无间的真诚友情最亲切。在延安中学，我学到的不仅是文化知识，也学到了集体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充满革命热情与无所畏惧的作风。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从我的这些经历中悟出一些最宝贵的东西吧！

1991年5月 刘虎生

男，延中四班学生。1948年赴苏学习，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科技局局长，现任中国华联汽车公司董事长。1956年曾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悠悠慈母心——怀念蔡畅妈妈

刘虎生

正当我们盼望着病中的蔡畅妈妈早日康复的时候，传来了她老人家病情恶化的消息。

那是 1990 年 9 月 11 日凌晨，天黑沉沉的，我和妻子尤利亚匆忙赶到北京医院病榻前。望着她那清瘦的面庞，心里非常难过！我默默地祝愿她老人家能够再一次战胜病魔，我能再一次聆听她的教诲。可是，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心电图显示出的波纹，仍然由曲线变成了直线，蔡妈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泪水在我和尤利亚的脸上如泉水般流淌下来，我的心在强烈地震颤。我真想大声呼唤：“蔡妈妈，您不能走！”

我是革命烈士的遗孤，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蔡妈妈用母亲般的慈爱，温暖了我那失去身父母爱抚的弱小的心灵。

是她在我患病乃至濒临死亡的边缘时，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是她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思考应当怎样前进时，教育我抓紧学习，准备好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的知识本领，是她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永远忘不了蔡妈妈对我的恩情。

记得那是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党把我从白区接到延安，我和另外两个烈士的遗孤住在一起，从小学到中学，都受到蔡妈妈的百般照顾。由于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不久我就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全身多处出血，住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病情危重时，心脏出现严重阻碍，医生接连给我打强心针以维持生命。蔡妈妈得知我病情垂危，急得直哭。她说：“刘伯坚三个孩子我们只找到了一个，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治好他的病。”她多次找医院大夫，要求全力进行抢救。可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不能准确判断我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因此就不好对症下药。在这最危急的时刻，蔡妈妈请来了斯大林派来担任毛主席保健大夫的苏联专家阿洛夫参加会诊。经阿洛夫的仔细诊断，确认我患的是坏血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 C 引起的。他建议，在当时条件下最好的办法是大量输血。这时，一些过去和我在延安中学、自然科学学院学习的同学，正好分在医院工作。

他们争先恐后为我输血，一共是 7 位同学，每人输血 200cc，终于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抢救回来，并逐渐康复。医生们直说，我命真大。其实，哪里是我的命大。是中央首长、医务工作者、我的同学们，特别是蔡妈妈的关心和厚爱，我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尤其使我不能忘怀的是，1947 年我到了东北，当时东北局的驻地在哈尔滨，我就住在南岗蔡妈妈家。我是从晋察冀边区经过长途跋涉过来的，长了满身虱子，鞋子也破了。

蔡妈妈帮我用热水烫掉衣服上的虱子，并让我穿上李富春叔叔的鞋子。李叔叔下班回来要换鞋，到处找也没找到。蔡妈妈笑着说：

“你的鞋子给虎子穿了。”李叔叔点点头说：“好。”我的心里充满着一种

家庭的温暖，长途行军的疲劳也一扫而光。到了 1948 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全国就要解放。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党中央选派一批人陆续出国到苏联去学习，我也是其中一个。出发的那一天，蔡妈妈一直把我送到车站。

她握着我的手深情地对我说：“我是在法国入党的，介绍人是你父亲刘伯坚同志。

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把学习任务完成好。现在全国就要解放，建设高潮很快就要到来，急需大量人才。你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掌握知识和技术，将来回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舍不得离开蔡妈妈，她的临别叮嘱，更使我深受感动。我从车窗朝外望去，正好看到站旁一个工厂高耸的烟囱，缕缕白烟正向天空升起。我暗自下定决心，当我回到祖国再看到这烟囱时，我一定要用优异的学习成绩来向祖国汇报，决不辜负党和蔡妈妈的期望。在留苏的几年中，尽管我原来的基础差，学习外语遇到很多困难，但当我想起蔡妈妈的话，就焕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使我有勇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学习任务，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亲爱的蔡妈妈，我至今仍在轻声地呼唤着您。世上只有母亲的爱是最伟大的，我从您那里不仅受到了慈母般的爱抚，而且从您那里得到了孜孜不倦的教诲，是您教导我怎样做人，要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您离开了我们，但您那金子般的慈母心，像一盏不灭的长明灯，将永远闪耀在我的心里。

1991 年春节

宽阔的胸怀

蔡诚

1940 年，在被称为“抗日大后方陪都”的重庆，面临着又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夕。这里到处军警林立，特务横行，大街小巷布满了穿着黑色衣服的警察、黄呢子军服的宪兵和贼头贼脑的便衣特务，充满着令人窒息的沉闷政治气氛。像浓浓大雾一般，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就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中，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居住的红岩村，像灯塔一般照耀着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给人们指示着光明的道路，鼓舞人们为抗日、民主、进步而斗争！

这一年，刚满 13 岁的我，跟随母亲蔡楚吟从上海经过香港、韶关、衡阳、桂林、贵阳，到达重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母亲 16 岁就参加了共青团，从事革命斗争。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撤退到广东潮汕地区我母亲的家乡时，她光荣地在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以后又长时间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1940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周恩来同志指示上海党组织，通知我们母子和其他几个地下党同志全家从上海撤到重庆再转到延安去。从上海到重庆，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要通过国民党统治区重重哨卡，很不安全，幸亏沿途各地有党组织的密切关照，特别是桂林、贵阳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加上我们借用归国华侨的名义，总算闯过了一个又一个国民党的军警检查站，经过几个月的奔波，顺利到达重庆。

当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坐落在办事处对面，中间隔着一条小山沟，两座房子遥遥相对，四周都是绿葱葱的树木。在房子外围通向市区的大小路旁，设立了不少国民党特务的据点。就在这种敌人四面包围的形势下，招待所里住满了从各地来重庆准备转往延安的地下党同志和他们的亲属，也有一些是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要求去延安的进步青年，还有一大批十几岁的革命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为了保护这些家属、小孩的安全，为了培养革命的后代，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过问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那时我们住在招待所，就像住在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一样，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每天起床、学习、工作、吃饭、睡觉都有一定的时间，还安排一些老同志给我们讲政治文化课和生理卫生；还教我们唱歌。我就是在这里学会了《国际歌》和抗日根据地的许多革命歌曲的。

那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南方局的工作，既要同国民党反动派做面对面斗争，又要做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统战和教育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热爱革命同志，热爱革命的下一代，一有机会见到我们，总是那么亲切地询问我们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当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每逢高山顶的木杆上挂三个球（紧急警报）时，八路军办事处和招待所的人员就集中到山沟底的防空洞暂避。有一次，周恩来同志也来到防空洞躲避飞机。他同往常一样，穿一件皮革做的短大衣，腋下夹一个黑色皮包。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蔼可亲。当他知道我是蔡楚吟的儿子时，高兴地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和学习的情况，使我感到非常温暖、幸福。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活动越来越猖狂，形势日益险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周恩来同志派了10多辆大卡车，由一些年轻力壮的男同志武装护送，把这批八路军家属、子女送往延安。

当时我母亲受周恩来同志派遣，再次到香港去做地下工作，因而让我一人去了延安。

临走时，十几辆汽车浩浩荡荡地从重庆出发，周恩来同志亲自出来送行，挥手和我们告别。

我们的车队沿途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和威胁，特别是到达陕西褒城时，国民党军队竟将我们全部包围起来，让我们100多妇女和儿童坐在地上，用机关枪对准我们，妄图全部逮捕杀害。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据理力争，使国民党反动派理屈词穷，不得不放我们北上去延安。

到延安后，我先分配到自然科学学院学习，1943年末，转到桥儿沟延大中学部。1944年，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入党前，组织上为了证明我的身分，写信向周恩来同志了解我们一家的情况。周恩来同志不但亲笔复信，而且要单位领导转告我春节时去他家玩。那天，我高高兴兴地从机关驻地跑到杨家岭党中央机关去。周恩来同志和邓妈妈住在半山坡的一排三孔窑洞里。我来到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的那孔窑洞门前，他正和另一位干部交谈，见到我，他很高兴地用力握着我的手，说：“几年不见，你长得这么高了！”接着，拿出花生糖来给我吃，询问我在延安中学的学习情况。谈了一会儿，周恩来同志说：“走，去隔壁窑洞看邓妈妈去，她正生着病呢！”

我来到邓妈妈床前，她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长得真像蔡楚吟啊！”说了会儿话，周恩来同志说：“邓妈妈有病，让她休息吧！”又引我回到隔壁窑洞。当我告辞时，周恩来同志又亲自送出院门，用力握着我的手，叮嘱我

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不断进步！

由于母亲长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1969年，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采用种种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我母亲，逼她承认早已为周副主席和南方局做过正确结论的被捕问题是“自首变节”，极力要把她打成“叛徒”。母亲含着热泪，给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写了一封申诉书，愤怒控诉林彪、“四人帮”的诬陷，深切希望总理能帮她澄清问题。可惜，这封血泪斑斑的申诉信，周恩来同志哪有可能会看到啊！我母亲就这样含冤死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关怀下，我母亲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如今，每当我想起周恩来同志，想起他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时，总禁不住热泪盈眶，感慨万端。我想，连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周恩来同志都备加爱护，对待每一个革命同志，他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了。他具有一颗无比伟大的心，具有无比宽阔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同志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才团结了全党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为了完成党的革命事业而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同志这样伟大的革命家，才能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猖獗之时，为党、为人民保护下那么多的老干部，使他们免遭残害。怀念周恩来同志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对下一代青年成长的关怀，今天，我们决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完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未竟的事业而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璀璨的岁月

蔡诚 李冬 任湘 任岳

我们这些参加革命已经数十年的老同志，在革命圣地延安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是青少年，最大的15岁，最小的13岁。在抗日的大后方——广东、湖南、湖北，我们都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有父母，有亲人。但我们却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他们，毅然决然、千里迢迢地跟随当八路军的伯伯、叔叔、大哥、大姐们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的征途。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这样做呢？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定信念，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最终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

我们坚信这一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并愿意为之奋斗终身。

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

我们这些青少年之所以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爱国爱民的思想，并不是天生赋予的，而是来自家庭的教育和客观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父母和长辈，都是在大革命时期或内战时期参加共产党，经历过艰苦奋斗考验的前辈，都是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党忠心耿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不移，投身革命事业不怕流血牺牲，蹲过监狱，打过仗，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他们经常对我们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给我们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剥削和压迫；讲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讲一个人活着就必须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教我们唱

国际歌，指导我们阅读一些革命书籍。这些深刻的思想教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奠定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这是我们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的根本原因。

客观环境的影响，对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也起着重大作用。我们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广大的工人、农民饥寒交迫，做牛做马、终日劳动也不得温饱，饿死的穷人成千上万。我们亲眼看到上海租界里外国巡捕毒打黄包车夫；看到国民党统治区里的工人、农民，甚至士兵面黄肌瘦、衣不遮体；而资本家、地主，官僚们却纸醉金迷，挥金如土。

我们的亲人有的因欠租被地主用毒虫活活咬死了；也有的因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而被活活打死的。特别是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们大片国土，烧杀掠夺，使广大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对我们这些小年纪的孩子都是非常深刻的教育。我们认识到，只有推翻万恶的旧社会，打倒压迫人、残害人的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者，改变社会制度，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才有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出路。这种革命的理想促使我们走上了去延安的光明大道。

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们的革命意志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异常艰苦。50万国民党匪军封锁边区，日寇在黄河对岸也随时准备进攻，使得当时的延安物资匮乏，基本的生活条件很差。延安中学的前身之一是自然科学学院初中部，住在杜甫川的山沟里，一排排窑洞既是我们宿舍，又是我们的教室。土窑洞墙壁上抹上白灰，窗户是用白纸糊的，睡的是土炕，七八个人挤在一铺炕上。炕上铺的是一层薄毡，盖的被子有的已破成了一条条的破棉絮，无法保暖。冬天有一盆木炭火取暖，但西北风呼呼刮起来时，仍然冻得叫人发抖，不少同学手上生了冻疮。后来学校合并到桥儿沟延大中学部，不久改名为延安中学，生活条件还是一样的艰苦。

我们吃的饭菜很差。不但吃不上大米，就连很粗的黑面馒头一个月也只能吃上一顿，每天都是小米干饭。初到延安的人吃小米是很不习惯的。蔬菜也吃不上，有时天天吃水煮土豆块，实际上土豆块很少，水里漂着几滴麻子油。就是这样的菜，一个小组也只剩一小桶。每月只能吃到一次肉。有的同学因为缺乏油水，嘴又馋，赶上吃肉和馒头时就贪食，有人甚至一次吃了10个馒头。因为吃不上新鲜蔬菜，我们就到野地里去摘“回回菜”、“笤帚苗”，用开水煮了吃，算是补充一点营养。同学们都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很大，每人端着一个大黑瓦盆，有的人拿绳子拴着一个大瓦罐吊在脖子上，用长勺子挖着吃饭。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

穿的是什么呢？是公室发的粗布灰军装，没有内衣，每年每人供给一套单衣，两年一套棉衣，穿破了就让女同学们帮着补；有的同学很怪，不愿让女同学给他补，衣服破得像济公一样，两只袖子开口到腋下，走起路来两只破袖子一甩一甩的，显得很滑稽。

冬天戴着护耳毡帽，没有绳结，两个护耳一扇一扇地摆动，也真像个“活济公”。由于没有替换的衣服，我们的衣服和头发里都生了虱子，最初发现虱子时，害怕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后来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了，脱下衣服一个一个捉，或者隔一段时间煮一次衣服。至于洗衣服，根本没有肥皂，连“猪胰子”、碱也没有，只有用野地里长的含碱的“回回菜”代替肥皂。因为没有替换的衣服，我们常中午到小河边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脱下来

洗，然后晾在石头上，等晒干了再穿上。

初到延安时，因为我们远离了父母，年纪又小，对于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确实很不适应，开头时也很想家。但是，当我们想到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我们实现理想的革命根据地，再艰苦我们也能忍受。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逐渐习惯了，特别是到1943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生活大为改善。从自然科学学院到延安中学，全体师生员工也都投身于大生产运动。纺线、纺羊毛，每个同学都有一部木制的纺车，学会了纺线。每人每天平均能纺三两线，有的能纺半斤。每人还有一个木头做的“拨来了”，用手拨着捻毛线织毛衣。没有鞋子穿，我们用自己用破衣服撕成布条打草鞋，或用破布浆糊做成布壳，用自制的麻绳纳鞋底。没有粮食和肉、菜吃，我们就上山开荒种土豆，种小米，种菜喂猪。没有肥皂用，我们便到河滩上扫来碱土烧水熬碱。没有取暖设备，我们就到山里去砍柴开窑，自己烧木炭。没有牙刷。我们就自己动手用猪骨头做把，用猪鬃当牙刷毛，熬盐粉作牙膏。我们还自己挖井、修路、盖房子。那时，我们真是什么都能作。这样，不但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而且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我们掌握了自力更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从小培养起来的作风和品质，对于我们坚持一生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上做贡献，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瞻远瞩，为了建设未来的新中国

当时的抗日根据地，一切任务都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的解放。但是，就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然高瞻远瞩，一边指挥战争，一边着手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人才。创办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就是为将来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科学技术人员。

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创建于1940年，李富春、徐特立、李强等领导同志先后担任院长。

这是一所正规的学院，设有大学部、预科和补习班。补习班也就是延安中学的前身，一、二班相当于高中，三、四班相当于初中。教授的课程有政治、历史、地理、语文、数学、动物、植物、英语等。这些课程的教材、全部是由大后方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编写的。他们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学者、专家和各种专业人才，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如陈康白、乐天宇、恽自强、武衡等，都是我国科技界的老前辈。他们担任我们学院的教员，讲起课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英文老师庄湘、焦成的发音非常准确，教给我们的许多单词和语法，至今仍未忘掉。数学老师江天成，是从重庆来的大学生，当时仅有20来岁，但人非常聪明，他还教我们学代数、三角、几何和微积分。文学家贾芝给我们上语文课，他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著名音乐家马可、徐徐、谌亚选等同志经常给我们上音乐课，指挥合唱团唱歌，使我们能唱整部的《黄河大合唱》和许多苏联歌曲。一些具有艺术天赋的小同学，如于龙江、刘厚生、刘朝兰等，还参加了秧歌剧的编写和演出。生活真是丰富多采，为我们一生的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学校为了让我们具有坚实的文化知识，十分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学校千方百计地从大后方运来一批科技实验教具、图书，还建立了实验室、图书馆和校办工厂。老师还经常组

织我们上山去采集标本，到校办工厂做工。如去工厂吹玻璃瓶、翻砂铸铁，制造各种机器零部件。学校还结合大生产运动，在种粮食、种蔬菜、纺线、熬盐、烧炭时，对我们进行有关工农业生产知识的教育。这种理论——实践——理论的教学，为我们后来参加革命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同学有的成为科技部门、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有的在科学技术上有了重大的创造发明，有的在科技理论研究上有较深的造诣，这都是党中央深谋远虑，很早就注重培养科技人才的结果。

艰苦朴素、乐观向上、服从纪律的优良作风

延安的艰苦生活，使我们在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使我们懂得，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来之不易，都是工农大众用汗水创造的，也是我们自己动手、艰苦劳动的成果。粮食、蔬菜靠自己种，衣服靠自己纺线、染色、织补，住的窑洞靠自己凿打，行军走路靠两条腿。养尊处优、铺张浪费、不劳而获是可耻的，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只有艰苦创业，才能享受劳动的成果，也才会有生活的乐趣。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并不沮丧、悲观和害怕。我们的生活很充实，大家都很团结、乐观。我们上课时严肃认真，下课后活泼快乐。每个同学生活在集体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尽管没有父母在身边，同样感到温暖，同样生活得快活。年龄大些的哥哥、姐姐、帮助年幼的同学缝补衣服，一个人有了病大家帮助照看，为他拿药、送饭。

学校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爱唱歌的同学加入合唱队，爱好文艺的编写墙报，爱好运动的打球、翻单双杠、游泳，甚至任凭同学们自己的爱好、兴趣自由发展。陈祖泽同学喜爱雕刻，一个人利用课余时间，居然制作出两把非常像样的提琴，拉起来很像那么回事；蔡诚同学喜欢种花、养兔，在窑洞前的小土台上养出了一窝窝的小兔子；喜欢赶马车的同学还经常帮助学校运输队的老大爷赶车运粮食、草料等，那样子完全像个“脚夫”。

在星期天、假日里，我们几个人还经常结队去党中央所在地枣园、杨家岭、八路军总部王家坪等地游玩；当我们偶尔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等中央首长时，有的同学就同他们讨论起国家大事来。我们有时步行到郊外几十里路的莲花山去观赏野牡丹，有时又跑到桥儿沟天主教堂去跳舞，还时常可以看到鲁艺等学校演出的《日出》、《雷雨》等节目。生活真是千姿百态，愉快幸福。这时，一点也感觉不到艰苦了。

集体生活是乐观向上的，组织纪律也是严格的。在学校里，我们按时上课，按时吃饭，按时出操，按时睡觉，没有一个人违反规定。劳动生产时，大家也都自觉参加，没有一个人因为害怕艰苦而逃避的。我们每个班都有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娱委员，大多是由一些年纪较大的同学担任，如二班班长肖田是早年在山西参加革命的同志，比我们要大七八岁，我们非常尊敬他，称呼他为“老班长”。他关心我们、爱护我们，时时处处照顾和帮助我们。我们也听他的话，服从他的指挥。

1943年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先后调走几批同学离校去参加工作，有些去医科大学学医，有些去边区保安处做保卫工作，有些去中央机关当报务员、译电员。接到通知的同学，都毫无例外地服从了组织调动，没有一个人讲价钱，背起行李就走。当时同学年龄大都不过十六七岁，其中不少人还是党的高级干部子女，但他们同样不讲特殊，都能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需要中途牺牲自己的学业。

回忆四十多年前这一段年轻时代的璀璨岁月，我们感慨万千，我们把这段生活写出来，既是对自己后半生的勉励，也是对当今青年人的殷切期望。希望他们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得到启发。如果他们想成为一名真正对国家、对人民的有用之材，就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严格要求自己。

像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

蔡诚

男，原名伍毅鸿，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公安大学校长、司法部副部长。现任司法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

著有《公安学概论》，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社会主义法制讲话》等书。

主要论文有《增强法制意识，促进依法建国》、《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等。

李冬

男，自然科学院预科学生。1956年到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医学院学习。曾任解放军西北第二医院307医院院长，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任燕京函授医学院教学部主任、研究员。

任湘

男，边中三队学生。1952年毕业于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

曾任北京地质学院系主任，地矿部105队总工程师，北京市地矿局局长、党组书记，北京市科委副主任，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现任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地质学会、中国能源学会常务理事，地热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编有《找矿勘探地质学》等教材。撰写与翻译了论文多篇。

教授、高级工程师。

任岳

女，延中一班学生，原兵器工业部工程技术人员。

毛主席给我题字：“光明在前”

任远志

1947年春，蒋介石集中了34个旅，23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

我们一家5口，分成四路：我爸爸任弼时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我妈妈带着弟弟随中央工作委员会过了黄河；

我妹妹远征，随保育小学转移；我随延安中学撤退。

当时妹妹只有11岁，还不太会照顾自己，撤退时把随身带的衣服和干粮全丢光了。

有一次行军路上她肚子饿得慌，就把身上的小大衣脱下来和老乡换了

几个窝头，和同学们分着吃了。

在伯伯和阿姨们的一再劝说下，爸爸才同意派张振奎叔叔把妹妹接回去。张叔叔找到妹妹时，看到她穿的很单薄，陕北的二月天还很冷，就到集市上去给妹妹买衣服。说也真巧，在镇子上，张叔叔又碰上了我们中学的队伍。他看见我拄着拐棍在艰难地走着，便过来问：“远志，你的腿怎么啦？”我把夜行军时在路上摔伤的情况告诉了张叔叔。

张叔叔当即提出把我和妹妹一起接走。我和刘少奇伯伯的儿子刘允若、彭德怀伯伯的侄子彭起超都在一个学校，因此他便把我们几个一起接到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

那是一天下午，天气晴朗，我的心情像从大后方初来延安见到爸爸时一样高兴。爸爸在窑洞门口看到我们时，惊喜地说：“你们都来啦！你们都好吗？”我们几个人蜂拥而上，扑到爸爸身边。爸爸抚摸着我们的头，并在每人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这时爸爸才注意到我，关切地问：“你的脚是怎么受的伤？”我对爸爸说了一遍受伤的经过。爸爸查看了我受伤的脚，心疼而又开玩笑说：“轻伤不下火线嘛，你怎么也回来了？”说完就先请张叔叔给毛毛（刘允若的爱称）和彭起超安排住处，然后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妹妹走进一个窑洞。爸爸走到右边炕旁，指着炕头上一个很深的洞说：“这就是你们俩的床。”我和妹妹都有点吃惊，这么深的洞，里面黑乎乎的，怎么睡呀。

我说：“洞很深，下去好说，可上不来呀！”爸爸笑着解释说：“我们来的人多，这村子小，你们就凑合睡在这里吧，爸爸每天从洞里把你们拉上来就是喽！”当时爸爸他们住的窑洞是这样的：

从中间门进去，对面有一炕，这是周恩来伯伯和陆定一叔叔睡的；左边进门是毛伯伯住的窑洞；右边墙上有个洞口像窗户那么大，上去就是个炕，我爸爸就住在这里。爸爸和伯伯们就在卧室里办公和开会。爸爸的炕头上有个深洞原是老乡存粮食的仓库，这里就成了我和妹妹的住处。这个洞只能躺下我们俩，而且腿还不能完全伸直。

爸爸给我们安排好床位后，便领着我们跨出窑洞门槛。这时毛伯伯、周伯伯和陆定一叔叔三人一起走来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粥时，孩子们都到？！”我爸爸说：“到了，到一会儿了。”接着转身对我和妹妹说：“你们快叫毛伯伯、周伯伯、陆叔叔呀！”这时，毛伯伯走过来，拉着我们的手，抚摸着我们的头，亲切地说：“你们都来啦，想爸爸了没有？”我和妹妹大声回答：

“想了，也想伯伯们了。”毛伯伯又指着我的胃部，用湖南话说：

“大女儿，你这里还疼不疼，好些了吗？”“好些了，谢谢您。”我回答说。刚来延安时我有胃病，疼起来在床上打滚，要人使劲压住胃部。毛伯伯又转向我妹妹说：“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你还好吗？”我妹妹出生在长征路上，所以毛主席见了她时，就风趣地唤她“老朋友”。周伯伯和陆叔叔也都亲热地拉着我们的手，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半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正当我们都沉浸在这幸福和欢乐的时刻，一位叔叔送来一份电报，爸爸和伯伯们不约而同地走进窑洞，商量他们的国家大事去了。

我和妹妹由一位叔叔领着，又找到毛毛和彭起超到食堂去吃饭。

当天晚饭后，爸爸把我和妹妹叫到身边，再三嘱咐我们说：“你们在这里住，千万不要大声讲话，更不允许打闹，走路时脚步要轻些，不然会影响

毛伯伯、周伯伯他们的工作和休息。”爸爸不但这样教育我们，而且以身作则。有时他早上起得很早，不从周伯伯和陆叔叔睡的窑洞走过，而是从他睡觉的炕头窗口爬出去。当他要咳嗽时，他就走到远一点地方去咳，来不及就用毛巾捂着嘴咳，生怕吵醒了周伯伯他们。

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毛伯伯化名李德胜；周伯伯化名胡必成；陆定一叔叔是当时直属队的政委，就化名为郑位；我爸爸是直属队司令，就称他叫史林。

我看到爸爸比在延安时更忙了。他协助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又要负责中央机关的行政工作，还要照顾我和妹妹。爸爸和伯伯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分析各个战场上的形势，研究战略方针。一般他们都在友好气氛中研究问题，但我有时也看到或听到他们在争论什么，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但散会以后，他们仍然谈笑风生，非常融洽。有时我看到爸爸点着一支烟，久久地拿在手里。他只顾思考问题，整根烟都燃完了，他都没想起来抽一口；夜里，他和伯伯们点起小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批阅或起草文件、电报，经常是通宵达旦。爸爸患高血压病，累了，满面通红，头疼痛难忍，有时疼得没法，就让我 and 妹妹拿来冷毛巾盖在头上，再继续工作。

然而，尽管爸爸工作很忙，他也没有忘记对我们这群孩子进行教育。有时在晚饭后有点空闲时间，他就把我和妹妹，还有毛毛他们领到村外的小河边，询问我们平时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有时候给我们讲他和先烈们在敌人的监狱中的斗争故事。他讲到毛毛的妈妈是怎样在南京被蒋介石杀害时，毛毛哭了，我也流着眼泪。爸爸抚摸着毛毛的头，安慰我们说：“不要哭，不要哭，要懂得憎恨，要化悲痛为力量！”为了提高我们对革命的认识，爸爸还一字一句地给我们讲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可是，那时我们还觉得枯燥无味。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悔恨，惭愧！辜负了爸爸的教诲。那时当我不想听爸爸给我们上课时，我就调皮地说：“爸爸，你该休息一会了，现在该我们给你讲故事啦！”爸爸不批评我，认真地听我讲我们学校撤离延安的故事。

“在撤离延安时，我们学校决定让老、弱、病、小的同志先撤到安全的地方去。因我年龄小，身体有病，学校希望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走。但当时您和妈妈都要我和同学们一起撤退，希望我得到更多的锻炼。”

“我们学校也和延安的其他机关一样，撤退前先‘坚壁清野’。我们男女同学一起把窑洞的门窗全部拆下来，抬到山洞里埋好，再把洞口掩蔽起来，在通往洞口的小路上，埋下我们自己制造的地雷。我们还把水井用沙石填起来，敌人来了让他们既没地方住，也没有水喝。

出发那天，大家心情很沉重，对延安的一草一木都恋恋不舍，许多同学含着热泪和革命圣地依依惜别。

白天是不能行军的，敌人的飞机不时在天空盘旋、轰炸，我们只能在夜晚行军，不管天多么黑，也不能点火把照明。我因从小营养不良，有夜盲症，当时真是苦极了，走了第一步，不知第二步迈向哪里。一次，我被一块大石头绊倒了，老乡们送我的煮鸡蛋都滚到山坡下去了。后来我让走在我前面的同学在背包上挂一条白毛巾，隐隐约约我能看见一个白点。我就紧跟着这个白点前进。

3月的延河，还未完全解冻，脚踩在冰水里寒冷刺骨，我们的鞋、袜、

裤脚经常是湿的。有一天夜行军，过一条小河沟时，我眼睛看不清，把右脚趾骨摔裂，伤势较重，整个一条腿肿了起来，还发着高烧。我实在走不动了，领导上派同学去老乡家借了一头毛驴。有些悬崖小道，连牲口都上不去，同学们就背我爬上去。同学们对我像亲兄妹一样。

渐渐地，我的腿好些了，我就拄着拐棍跟队伍走。拐棍磨破了我的手套，棉衣的腋下处也被戳烂了。一天，我实在跟不上队伍，掉队了。我一个人走，方向弄不准，还走错了路。一会儿听到了机关枪声，一会儿又仿佛听到几声狼叫，心里特别紧张，特别害怕。

忽然，发现对面山坡上隐隐约约走来一个人，分不清是男、是女，是自家家人？还是敌人？我想躲起来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壮着胆子大声喊：‘你是谁？’我那时穿着一件美国黄粗呢大衣，身上没有一件武器：心想，如遇上的是敌人，我就跟他拼个死活，决不当俘虏。这时，陌生人已经走到我的面前，见我是个受伤的女娃，便和蔼地说：‘不要怕，是自己人。部队机关撤退时我病了没走成，现在我也去追赶队伍。’我一听高兴了，便和这位叔叔一起找队伍。我们到了一个野战医院的小分队，和他们同走了一段路，天亮时，找到了我们学校的宿营地。同行的叔叔见我到了‘家’，就笑着向我告别走了。这时，我实在走不动了，看见面前有个磨盘，便倒在上面，不知不觉睡着了。

等我睡够了，醒来时，听同学们说，老师点名时发现丢了我，很着急，已经派4名同学找我去。我听了便大哭起来，找到老师，说不该让他们去，因为路上很危险，再走丢了怎么办？！

过了很长时间，同学们回来了。他们看见我惊喜地说：‘远志，你回来啦？刚才可吓坏我们啦！听一位老乡说，天刚亮时你被一个汉子带着跟上一个队伍走了，我们还以为你被敌人抓走了呢！’说得大家都笑了。我腼腆地说：‘谢谢你们啦！’“爸爸，我先讲到这里吧，该毛毛他们讲了。”爸爸听了我的故事很欣慰地说：“我的大女儿还不错呵，一路上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嘛，这就是收获和进步啊！”我对爸爸开玩笑说：“爸爸，你忘了，我也是1931年就参加革命啦！也算得上是一名对敌斗争的‘老’战士啦！”爸爸笑眯眯地说：“你真调皮，那时你刚出世不久，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怎么去参加革命，参加斗争呀？真是瞎说。”我撒娇地对爸爸说：“爸，你真的忘啦？妈妈曾经对我讲过：1931年3月，组织上调你去根据地工作，您离开上海一个星期，我就出世了。我出世不到100天，由于叛徒告密，妈妈被关进了上海龙华监狱。妈妈舍不得丢下我，只好把我整天抱在怀里，忍受着监狱的苦难生活。一天，敌人提审妈妈，她抱着我去。在敌人问得她实在无言答对时，妈妈就在我的腿上、屁股上乱拧，疼得我大哭大叫，又拉又尿，大闹起公堂来啦。敌人看到这种情况，加上妈妈一直装成农村妇女，问什么都说不晓得，挨打受刑也没有承认是共产党员。敌人无奈，只好说：‘乡下女人，什么也不懂，退堂！’妈妈出狱后，把这件事告诉了舅妈赵一曼时，舅妈心疼地抚摸着我那青一块，紫一块的腿和小屁股，说：‘我的外甥女真了不起，这么小就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对敌斗争啦！’我这不是参加革命是什么呀？”

我爸爸捧腹大笑起来，“呵，是有这么回事，这怎么能算参加革命呢？”我又强词夺理地说：“这是我舅妈革命先烈赵一曼说的嘛！”爸爸对我的无理狡辩奈何不得，只好说：“算！算！算你参加了革命和对敌斗争。”这我才得意地住了口。

为了消灭敌人，为了收复延安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党中央始终留在陕北，和群众一起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陕北地区山多地少，缺粮缺水，住的是土窑洞；穿的是粗布衣；照明用小油灯。夏天苍蝇、蚊子、臭虫成群结伙袭来。爸爸和伯伯、叔叔在窑洞里也躲不过蚊子叮、臭虫咬。晚上爸爸他们开会，我就用蜡烛顺着墙缝烧，烧得臭虫叭叭地响，像是炒芝麻的声音。一到晚上爸爸就提醒我：“大女儿，‘炒芝麻’的时候到了。”周伯伯有时也风趣地说：“大女儿，该你来消灭‘飞机’和‘坦克’了吧！”当时这种“飞机”和“坦克”实在太多了，防不胜防。我当时想，我能多消灭些，就能让爸爸他们休息得好一些，好集中精力工作。

那时，爸爸和毛伯伯、周伯伯、陆叔叔他们真是情同手足，亲如一家。吃一个好点的菜，你推我让；天气冷了，一件厚衣服，你给我披上，我给他披上；一个人出去办事回来迟了，几个人到门口一次次地张望；一家的孩子有病，几位伯伯都帮忙。

有一次，我在河里拆洗被子，初春天气，河水冷得刺骨，回来后就发起高烧。这一下爸爸和伯伯们就更忙啦。夜里爸爸端来一盆冷水，拧一条毛巾盖在我的额头上，就又去看文件和电报了。过一会，爸爸再来给我换冷毛巾。周伯伯看爸爸忙碌的样子，也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并把头上的毛巾放在冷水里摆摆，拧干再给我放在额头上。一连几夜都是这样过去的。白天，毛伯伯走到我的床边关切地问：“大女儿，你好些了吗？这天气水还太冷，以后不要去洗被子了。现在脏就脏点吧，是过渡时期嘛，等条件好些再讲卫生，你说好不好？”我说：“好，好，我一定听您的话。”毛伯伯笑着点点头，并转身对他的警卫战士说：

“小李，你去问问我们的医生有没有退烧的药，拿给远志吃。”

陆定一叔叔走进窑洞快步来到我面前俯身对我说：“大女儿，我给你找来几块薄荷糖，放在嘴里要好过些。”几位伯伯为了鼓励我战胜疾病，有时还风趣地对我说，你病了这“飞机”和“坦克”可没人去消灭了，这损失可就大啰！

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几位伯伯忙碌的身影，看到他们一张张和蔼可亲的笑脸，我是多么的幸福啊！然而，我又很后悔，不该给他们添麻烦。如今，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儿孙，我才理解了他们那颗既热爱革命，又热爱孩子们的心了。

这次病愈后，我想多为爸爸做些事情，便自告奋勇地当了临时义务通讯员。爸爸他们拟好的电报或文件要交给其他同志去复写或转抄时，我就帮助送去。有时爸爸文件上的个别字体写得潦草了一些，叔叔们就让我来帮助认。我是爸爸的女儿，经常看爸爸写字，我写的字还有几分像爸爸的哩！

爸爸和伯伯们每天日理万机，除了领导前方的战斗，还时时不忘后方的生产建设。

为了向老乡们宣传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央机关干部组织了各种文艺演出。为了演好秧歌剧《兄妹开荒》，周伯伯和爸爸利用饭后小憩的时间帮我排练。我不会扭秧歌，周伯伯拉着我的手在院子里扭给我看，爸爸在一旁数着节拍给我听。“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呀么红又红……”高亢清脆的歌声，飞出院子，飘向田野。

爸爸和伯伯、叔叔们是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与民同乐的同志和朋友。我以有这样的爸爸和伯伯感到骄傲！我们以有这样的领袖和导师更是

感到无比自豪！

我爸爸他们的生活流动性很大，带着我们这群孩子四处转移，实有困难，爸爸便决定把几个孩子和机关里年龄小的工作人员、有病的同志和外国专家全部送过黄河去。

听了爸爸的决定，我感到有些忧伤。几个月来，我和爸爸、伯伯们朝夕相处，长辈们的关怀和抚爱使我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此时我就要离开他们了，到遥远的黄河那边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再和他们欢聚一堂呢？我和妹妹走了，爸爸头疼起来谁给他按摩呢？谁又给毛伯伯他们送电报和文件呢？我又想，爸爸作出这个决定，一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也能意识到革命战争已经开始进入了极关键时刻。爸爸他们需要以全部精力去投入到指挥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所以这一次我不会在爸爸面前撒娇或狡辩什么了。艰苦的环境，使我长大了许多，我也似乎更加理解爸爸和伯伯们了。可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他们啊！

晚饭后，我找到了最喜爱的小电话本，这是三五八旅一位团政委缴获来的胜利品，是我从延安撤出时他送给我留作纪念的。现在，我请爸爸和伯伯们在上面题词。我记得当时毛伯伯坐在一把帆布椅上，我趴在他的膝盖上，伯伯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要过黄河啦，给你写些什么呢？”他想了想，欣然写下了“光明在前”四个大字。我接过毛伯伯的题词，望着这四个雄浑的大字，心里充满了对光明的渴望，对胜利的信心；对领袖的高瞻远瞩、开辟新天地的伟大理想和抱负，感到无限的敬仰。现在，爸爸、伯伯他们，不正是高举革命火炬，驱逐黑暗，在创造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吗？记得在延安中学读书时，我们经常唱这样两首歌：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嘿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这歌声，也是劳苦大众的心声。人民深深懂得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有光明的前程！

毛伯伯题了词以后，爸爸接着写了“努力学习”四个字，这是爸爸对我的一贯要求，我将永远铭刻在心上。

夜幕降临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繁星在深蓝的天空闪烁，机关驻地的院子里人们忙碌着，有的在背行李，有的在打裹腿，有的在和战士告别。我和妹妹依偎在爸爸身边，没有说话。那晚，爸爸不同往常爱说笑，他只是轻轻地抚摸着我和妹妹的头，嘱咐我们路上要听叔叔们的话，过了黄河可以去找妈妈和弟弟。说完，爸爸又拉拉我们的手，就和战友们告别去了。

夜，静悄悄的，一支整齐的队伍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前进！
任远志

女，延中十二班学生。军事博物馆师职干部。1985年以来，勤奋学习绘画与书法。

其国画和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性老干部书画展中展出，在《中国老年报》等报刊刊登，有的作品获得了优秀作品奖。

永不忘记

刘幼雪 贺毅 贺光辉

我们是延安中学三班的学生，我们班最小的同学，今年也已届花甲了。四十多年来，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不管工作性质如何，岗位如何，职务如何，个人境遇如何，总有说不完的话。永恒的话题，就是那令人魂牵梦萦的延中生活。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为我们的成长呕心沥血，日夜辛劳的老师们。

几十年没有谈完的话题，怎么能在短短一篇文章里概括得了呢？烦恼、眼泪，都早已随岁月流逝，只留下无穷的回味，无尽的思念。回忆往事，总是那么温馨，那么充满乐趣。那是永生难忘的少年时代，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至今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何况我们这一班，从 1943 年到 1946 年，朝夕相处了整整 3 年。那是怎样多姿多彩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

我们三班是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唯一的毕业班。它的前身——自然科学学院补习班五班，以调皮捣蛋著称。要说我们班“难缠”，其实是冤枉了大多数同学，但为数不多的几个调皮鬼，就足以使我们班闻名全校了。

延中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不少人因为革命工作需要或者家庭贫困，耽误了上学时间，到成年之后，才和刚从小学升到初中的孩子一起坐在课堂上。这些同学很用功，只是基础太差。而适龄就读的小同学，在初一的时候，还不懂得为什么要学习，也不珍惜时间，只惦记着玩。我们班就有几个好奇、贪玩的调皮鬼。一有空便几个人凑在一起弹珠子、挖蚰蚰，或者上山摘酸枣、捋“茹茹”（一种红色草生野果），一个蚂蚁窝，也可以挖半天。有的同学上课，不是打瞌睡，就是找个头痛肚子痛的借口“溜号”。考试能及格就心满意足。一个同学英语考了个“大鸡蛋”还满不在乎，有的甚至互相攀比：“看谁考的分数少！”

我们班的一些调皮鬼也常以捉弄女同学为乐。有时邻居鲁艺开舞会，一些年龄稍大的女同学也溜去参加，调皮鬼们便想方设法和她们作对。诸如编个顺口溜：“O 形腿，飞机脑，走起路来水上漂”呀（用陕北腔念起来十分押韵）；女同学们摸黑往舞会赶时，他们猛地从半路上跳出来怪声大叫，吓得人心惊胆颤呀；有对象的女同学回家，他们跟在人家背后挤眉弄眼呀；往人家兜里装石头呀……。说也奇怪，大男生从不欺负小女孩，倒是小男孩对女生，不论大小“一视同仁”。什么劳动的时候故意往女生的脸上扬土呀；值日分菜，就是不往某个女生碗里倒呀……。女同学们见了这些男生，就像耗子见了猫，连大气也不敢出。可有的小女孩不服气，挨骂要还口，挨打要还手，即便被人拧住胳膊也不求饶，还要当面揭人尿炕的短。有时“骑马打仗”，男女生各自派出年龄最小，身轻如燕的战将。经常是：围观的男生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拥而上，把奋力厮打的女方主将拉下马来，于是一场混战。最后，当然是女方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败下阵来。

男孩子之间吵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然而对付起老师来，却又会结成“统一战线”。

在课堂上，常常提些莫名其妙，叫人无法回答的问题。有的老师不是被气哭，就是发誓再不教小五班了。

就是这么个一提起来就叫人头痛的小五班，从 1944 年下半年起，却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学校举办的各种学习展览会上，我们班参展的作业，不论数量、质量都名列前茅；思想上更是突飞猛进：有理想、有追求、懂得严格要求自己（回家往返步行几十里，不再要警卫员牵马来接；吃饭不再跟大人去小灶……），许多同学先后入了党；生活上，相互体贴，男同学帮助女同学干重活，挑粪种菜，从山下往山上宿舍提水；女同学帮助男同学拆洗被褥，缝补衣服……就这样，小五班（1946年毕业时经过班级合并，人员调整，成了三班）以品学兼优，团结友爱，政治、思想进步而得到全校师生的赞扬，获得优秀班集体的光荣称号。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班由贪玩、无知、令人头痛的老大难而变为优秀班集体的呢？除了革命环境、家庭的熏陶、延安精神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事之外，我们的李绵、李纳、郭绳武、曹达、贾芝、张仲纯、王刚老师付出了很多精力和心血。

那时的延中，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班几十个人，就像兄弟姐妹，学习、劳动、生活，日夜都在一起，学校就是家。

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不但要管教学质量，课堂纪律，还要管思想作风、劳动生产、衣食起居。学生睡了，他们要批改作业，备课；节假日，他们要为留校的学生补课；防旱备荒，要组织学生上山打柴，下地挖野菜，从延河汲水种瓜；劳动生产，要分配人种西红柿，纺棉花，给被服厂纳鞋底，纺棉衣；天冷了，要张罗给无冬衣的同学领棉袄；有人病了，要去找医生，送医院；谁闹得太出格了，要晓以大义；谁告状了（“老师，他又打了我两拳”，“他又骂我了”），要去调解、劝导。他们没有假日、休息日，没有份内份外，不管酷暑严寒，大事小事他们都要操心，真是又当老师，又当爹妈。其实从年龄上讲，许多老师并不比有的同学大多少。

李纳老师，我们初一的班主任，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她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延中当了娃娃头。就是她，在课堂上被气哭之后，立即拭干眼泪，又讲起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是她，正在备课，忽听门外一片喧嚣，赶紧跑出去，撕开扭作一团的“斗士”；是她，渡过延河去和爱人朱丹举行婚礼，被突发的山洪卷走。脱险后，不顾溺水引起的疾病和剧烈咳嗽，坚持回校给同学们上课。就这样，李纳赢得了起初存心要和这位“小老师”作对的孩子们的尊重，同学们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教我们生物的曹达老师，不到30岁，一位瘦弱的年轻人。

他经常领着我们上山采野花，扑蝴蝶，解剖青蛙。大概是从初二开始，又给我们讲生理卫生。课堂上忽然变得异常安静，大家目光不敢旁视，屏息听教师讲男女生理构造，心怦怦作跳。

唯独这门课没有人提问。可是从此，半大男孩子不再对没去上体育课的女孩子不依不饶，也不再逼她们干重活，蹚凉水。

1945年，一位同学临产，全班女生忙着做小衣服，找尿布。过去嘲讽人家“就记着回去过星期六”的男同学，争着绑好担架，七八个人轮流抬着往十几里路外的医院跑。

有人担心，生在路上怎么办？一个男同学拍着胸脯说；怕什么，我会接生，不就是在肚脐下三指的地方剪下脐带吗？这大概是曹达老师始料未及的课外收获吧？！

我们的语文老师郭绳武，平时不苟言笑，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大

有学者风度。

他要求我们写作文，不仅要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且要用词简练，避免华而不实的浮夸词藻；

更要求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要求主题明确，要对身边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有感而发”。正是这种严格的有的放矢、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趣，锻炼了我们的思维和表达能力，为我们奠定了一定的文字基础。最近才知道，郭老师为此写了不少教案，想了若干办法，针对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要求，一步步地把我们领向学无止境的文字自由王国。历次学习展览会上参展的一篇篇作文，一页页学习心得，都是郭老师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的教学方法取得成果的证明。

李绵老师担任我们班班主任的时间最长，从 1944 年到 1946 年，整整两年，经历了我们班“质变”的全过程。他是我们班转变的催化剂，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程度不同地得益于他的循循善诱。

李绵老师是教历史的。别看他平时少言寡语，还有些口吃，可是讲起课来，却能使你入神。面对汹涌澎湃的历史长河，你能听得到陈胜吴广，“黄巾”，杨么、李自成、洪秀全，以及孙中山、黄兴、秋瑾、李大钊、瞿秋白、闻一多、李公朴的呼唤、呐喊，能使你为革命者的牺牲、失败而叹息，为革命的成功而欢欣；能使你懂得农民起义为什么不能成功，懂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是革命事业的领路人，懂得毛泽东怎样成为党的领袖，懂得为什么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李绵老师生动的讲授，使许多同学对历史、对党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更加坚定了为革命献身的信念。

李绵老师到延安之前成过家，有一儿一女。现在他把全部父爱都倾注在我们这群孩子身上。他当时不过 30 来岁，却像一位慈祥的长者。不论班上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从来不发火，总是慢声细气给你讲道理，直到你心悦诚服。他了解每一个学生，熟悉他们的优缺点，懂得用怎样不同的方式来启发他们的觉悟和自尊。他选择忠厚老成的王鹤仁当班长，肯吃苦的杨廷藩当生产干事，学习好的同学当课代表。他让每一个人的长处都能在关心集体中得到充分发挥，从而认识和找到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他鼓励我们关心时事，看课外书籍、写读书心得、练大字，使我们懂得了学习的目的，提高了兴趣。针对我们班大都是干部子弟、比较单纯而又有政治优越感的特点，李绵老师着力于正确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没有说教，没有压服，然而我们每一次都能从同他的个别谈话中受到启迪。

贺毅在班上不算调皮，从不招惹女孩子，甚至很少和她们说话，课余热衷于武侠小说。一天傍晚，累了一天的同学们都各自消遣去了。贺毅跷起二郎腿，坐在窑洞里的长条桌上拉二胡。正当他摇头晃脑得意之际，刘幼雪风风火火跑进来。她是来找她的美术作业的。遍寻不着，她急得直跺脚：“明明压在桌子上的。”问贺毅，贺毅说没看见，照样拉他的胡琴。等到幼雪把贺毅推下桌子，天呀，辛辛苦苦画好的列宁像，已经被贺毅坐得面目全非！幼雪哭喊着叫“赔”。被搅了兴头的贺毅哪里肯在女孩子面前服软，于是爆发了一场激战。一位老师“勒令”贺毅赔礼道歉，贺毅拧着脖子说：“谁叫她不放好，我的屁股又没有长眼睛！”李绵老师找到贺毅，从历史聊到武侠小说，海阔天空。

贺毅情绪稳定下来，慢慢想通了。既然过去有扶危济困的侠客，还有廉颇负荆请罪，那么，在革命队伍里有错不认，对女孩子耍威风，又算什么

好汉？李绵老师又找到刘幼雪和藹地对她说，你也别得理不让人，又哭又骂，谁受得了？一席话，说得两个人的火气都烟消云散。以后几十年了，他们一直是好朋友。这打不成交的缘分可以说是李绵老师给的。

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不论是从大后方来的，前方来的，还是在陕北土生土长的，都认为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在老师们的教育下，我们逐渐懂得了学习是革命的需要，只有抓紧时间，努力学习，才能弥补知识的欠缺。然而对于要求入党，却很少去想。因为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没什么可怀疑的。

那时入党是秘密的。1944年以后，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同学，脸上带着神秘而又掩饰不住的得意神情走向后沟。起初我们没有在意，后来沸沸扬扬听人说，他们是去过“组织生活”的。什么？他们能是党员，我们为什么不能？

最不服气的是贺毅。李绵老师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共产党有铁的纪律。你其他方面都不错，就是平时松松散散，老爱躺在被窝里看小说，这怎么行？很快，贺毅一扫懒散，简直像变了一个人。1945年组织调贺毅去联防司令部参训队。虽然他的父亲是将军，但他本人并不想选择军事作为职业。不过，那时的贺毅已经入了党，有了严格要求自己和组织纪律的观念。于是，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去报到了。

贺光辉在班上的年龄不大，可身强力壮，发起火来，大同学也怕三分。一次，一个大同学欺负小同学，光辉看不过去，直言了两句，大同学扬手就打，光辉躲闪过去，重重还了一拳，打得对方鼻青脸肿。事后，李绵老师对光辉说，要想入党，就必须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你打了人，虽说是打抱不平，但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注意动机和效果。从此光辉变了，不管什么情况也再不打架了。同学生孩子，他抢着抬担架；学校修篮球场，他光着膀子挖土推车，打大夯；修飞机场来回十几里路，累得腰酸背痛，晚上直哼哼，第二天一大早照样去，从不落空。学校成立秧歌队，本来光辉“不愿意和女娃子一起在台上扭达”，但还是服从了工作需要。几个寒暑假，光辉随秧歌队转遍了延安的机关学校，甚至深入到老乡家。光辉成了颇负盛名的延中秧歌队的主要演员。

班上开生活会，光辉给幼雪提意见：“政治上不开展”。这可捅了马蜂窝，幼雪委屈地哭个不停。李绵老师对光辉说：“你的用心是好的，想在政治上帮助她，可是方式不对，她接受不了，你的目的又怎么能达到呢？”一向和气的李绵老师，此时对幼雪正颜厉色：“就算光辉的话说重了，你也该想想，到底政治上是不是很努力，要求自己是不是很严格？你在班上最小，大家都让着你，可你也别太娇纵自己。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一点委屈也受不了，怎么能当党员？”一席话说得幼雪心服口服。

于是，他们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在支部指定的联系人——光辉的帮助下，幼雪各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毕业前入了党。

李绵老师的个别谈话使我们猛省：没有天生的共产党员，要靠自己提高觉悟，努力去争取。

从初二开始，我们班同学之间关系日渐亲密，学习成绩显著上升，班上的风气明显好转，这都是各位老师，尤其是李绵老师和党支部在政治上逐一启发，引导的结果。我们班在毕业时有90%的人入了党（尽管这里有当时即将离开延安奔赴各战场的特殊情况，更有许多是政治上并不成熟，虚岁

16 的年轻党员)。难怪我们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怀着对父兄般信任和尊重的感情谈起我们的老师。有的同学对李绵老师的感情，简直比对自己的父兄还要深。

如果李绵和所有教过我们的老师以及为我们的成长付出过心血的校领导、党总支、支部的同志们，能够明白我们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的用心，能够知道他们的努力，对于确定我们的政治、生活、为人准则等方面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一定会感到欣慰的。是的，师长们，你们的辛劳没有白费，至今我们仍以所受的“正统”的马列主义和革命的传统教育而自豪。

1991 年 5 月 刘幼雪

女，延中三班学生，1949 年进城后，长期从事音乐工作，1976 年后改任党政工作。

现任中央歌剧院党委书记。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90 年，1992 年被评为文化部优秀党务工作者。

贺毅

男，延中四班学生。1948 年入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事业，1955 年毕业回国，长期从事水电科学技术和领导工作。武警水电指挥部主任，正军级，武警少将。

贺光辉

男，延中三班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长期从事国家经济管理工作。

现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情系黄土地

李伦

1941 年 1 月，我随父母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经重庆撤回延安，入自然科学学院学习。

刚到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请我们一家人吃饭。我既紧张又高兴，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朱老总。毛主席身材高大，面容慈祥，穿着灰土布衣裤，膝盖上打了补丁。吃饭就在毛主席会客的窑洞里。窑洞中间放着一张制作粗糙的方桌，四周是长凳子。靠墙有一个“长沙发”，是从报废的卡车上拆下来的驾驶员坐椅，底下用木头支着，靠背用墙撑着。吃饭时，菜都是用搪瓷饭盒装的，饭盒上的搪瓷掉了不少，显得很破旧。我到延安后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毛主席在生活上十分朴素。

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企图把边区的党政军民困死、饿死。边区只有 100 多万人口，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粮食、物资极为匮乏，要养活党政军机关、院校和众多部队确实是困难重重。毛主席后来谈到这段生活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毛主席号召整个解放

区的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自然科学院的全体师生也投入到大生产的洪流中。

那会儿，我们只有十四五岁，算半劳力，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纺纱线。女孩子心细学得快，我们这些粗手笨脚的小伙子可犯愁了，望着那白茸茸的棉花卷直发呆。我们潜心模仿“师傅”的样子，转起了纺车。明明和他们的动作一样，可就是纺不好，手指捏紧了，线断了；放松了，线粗了，总是纺不匀。别人顺顺溜溜地把那空心棉卷纺成了均匀结实的白线，一天能纺三四两，而我呢，吱吱扭扭一天只能纺二三两，还累得腰酸背疼。

后来我也渐渐摸到了门道，掌握了要领，缕缕白线居然也从我手下纺出来了，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就这么着，我们这些十几岁的男娃都成了“纺织郎”。

《毛泽东选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我们纺完线交给延安织布厂织成布，再交给被服厂做成衣服。扣子是我们自然科学院实习工厂用铜铸成的。穿上用自己纺的线做的衣服，那舒服劲儿难以用语言表达。可惜的是，每人一年只发一套，没有换洗的，而且不结实。穿脏了，要等晴天到河边洗了，晒干，再穿上；扣子丢了，买不起，找条绳子往腰里一扎完事；衣服破了，找块旧布歪歪扭扭补上再穿。

那时在延安穿补丁衣服是很“时髦”的。有些人甚至新衣服也要找块布在膝盖和屁股处补上几块，既结实，又时兴。当时延安种的棉花有限，一个时期，棉衣和棉被里的棉花用羊毛代替。羊毛总往布外钻，弄得羊毛到处飞，甚至连饭菜里也有毛。

为了解决大家穿鞋问题，学校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外出拣破布。不知为啥单单选中了我，也许是因为咱纺线技术不高才被“另行分配”的吧。好在大家都有分工，有纺线的、纳鞋底的、做鞋帮的、种菜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拣就拣吧！于是我们每天吃完早饭，就背上筐儿，到各处的垃圾堆去拣破布。开始总觉得不好意思，但完成任务要紧，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那年月，谁都省吃俭用，布头自然不容易拣到。我们专找垃圾多的地方，哪里脏就去哪里，见到垃圾堆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用棍子挑、用手扒，拣到一块大点儿的破布特别高兴。为了捡得多，有时候一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回来后把布头拿到河沟里漂洗干净，在石头上、草地上晒干。每当背着“战利品”回来，想到大家鞋底上也有我一份劳动，心里美滋滋的，就越发爱上了拣破烂这一行。除完成本职工作外，我还抽空跟着学纳鞋底。

参加大生产，虽然累点苦点，但我们得到了锻炼，知道了吃饭穿衣来之不易，增强了劳动观念，体会了工人农民的艰辛，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同时也亲身感受到劳动创造世界，创造幸福的真理，更加体会到革命的艰苦和伟大。

那时候，我们年纪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干活冲，吃饭也冲。每天还没到开饭的时候，肚子里就打鼓。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3钱油、3钱盐、

1斤半小米。菜靠自己生产，数量很少，食堂只能做汤菜——一大锅水煮菜放些油盐，很少吃炒菜。小米饭泡汤菜，吃得也蛮香。有一段时间小米没有了，成天吃老百姓用来喂牲口的煮黑豆，难吃难咽，又不好消化。

旧式秤，1斤是16两，1两是10钱。

大生产以后，生活有了改善，一周可以吃一次馒头，一个月可以吃一次肉，春节可以吃到一顿大米饭，还能经常吃到炒菜。有些家在延安的同学，从家里带点羊油和牛骨髓油，很快就被大家“共产”了。羊油、牛油拌小米

饭，简直就是“会餐”。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我们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大家为我们的饭菜起了许多动听的名字；汤里放几根葱叫“青龙过海”；小米饭加胡萝卜丁叫“沙里淘金”；小米饭加白萝卜丁叫“金银饭”……当时我们大家最爱吃的，是当今最流行的“营养丰富、余味深长”的“小米锅巴”。不过那时的锅巴是地地道道、纯纯粹粹的小米饭下边那层黑乎乎的厚锅巴，每次吃过饭大家都希望分点锅巴拿回宿舍当“点心”。秋天到了，我们上山去采酸枣。那一颗颗红红的、圆圆的小果实，最招女孩子欢喜。山上的甘草根也是我们的主要零食。甘草根虽然有股味儿，但嚼来嚼去，细细品味，倒也甘甜。有时候我们还到收过庄稼的地里去拾人家遗落下来的黄豆，用茶缸子煮着吃。在一日三餐小米饭的年月里，这些不常吃的“野餐”也还是“味道好极了！”

我们的宿舍是窑洞，睡大通铺，被褥十分单薄。冬天窑洞里到处是风，大家就紧紧挤在一起睡，彼此取暖，有时半夜出去解手，等解手回来地方就挤没了，回来只好使劲挤进去，那才叫“亲密无间”呢。

冬天没条件洗澡，夏天只能在延河里泡泡，加上窑洞里潮湿，身上长虱子、生疥疮的很多。在延安，有人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干革命的人身上有虱子是常事。最麻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

我们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因为我们有美好的理想，有远大的目标，想着现在吃苦牺牲是为了将来过美好的生活。眼下大家都过着“共产主义”生活，上至主席、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马夫，大家平等互爱，同甘共苦，目标一致，毫无怨言。

我们一年能看一两次电影或话剧，每次都得步行十多里到大砭沟里的八路军大礼堂去看。电影也只有《列宁在 1918》、《列宁在十月》、《十三勇士》等几部前苏联影片。

虽然年年看，但也觉得很有意思，看完电影走回来要到半夜。后来，鲁艺成立了秧歌队，逢年过节，总要热闹一番。我和同学们都是鲁艺的热情观众，跟着秧歌队，走了一处又一处，看个没够。

当时唱歌是最主要的文化生活，延安可真算得上一座“歌咏城”。大路上，山沟里，窑洞中不时传出嘹亮的歌声；会前唱、饭前唱、几个人聚在一起唱。同志们来自四面八方，都会唱几句家乡的民歌、戏曲，有山西梆子、陕西秦腔、河南坠子、陕北民歌等，南北混杂，各有千秋，分外热闹。尤其是陕北“信天游”，那高亢、悠扬、扣人心弦的歌声，令我至今难忘。

当时，我们在露天上课。学生每人一个小板凳，老师一块小黑板。发的笔和纸根本不够用，我们练字都是拿根小树枝在地上画来画去。这种笔和纸是永远用不完的。

那时延安有不少苏联出版的书籍，很便宜，我们有时就用书的空白地方写字。蘸水笔没有笔杆，就找根直点儿的小棍代替。墨水是墨水粉兑的，时间长了就沉淀，用时再摇匀，冬天结成冰，化开才能用。晚上宿舍里只有一盏小麻油灯，规定只许用一个灯捻儿。我们七八个人，头对头地挤在一个小油灯下看书、写字。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同学们学习都很刻苦。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我们这些青少年汇集到这块黄土地上，就是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当时政治空气很浓，我们既学文化又学政治，对政治很感兴趣，尤其对国际国内形势特别关心，经常自发组织讨论。我们和大人一样，

每个时期都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学习规定的文件，同时，学校还系统地讲解“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特别是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懂得了一些革命理论，并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这一段对我教育极大，为我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我最爱读的是《中国革命近代史》、《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传》等书籍。革命的熏陶，使我渐渐懂得了唯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坚持武装斗争。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救中国，让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过上像当时苏联人民那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饥饿、幸福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这种思想使我萌生了入党的要求，迸发出学军事、上前方打日本鬼子的念头。

1944年，我如愿以偿，与另外两位同学一起转入抗大二大队学军事。1945年初为迎接大反攻，延安成立炮兵学校，我又被调到该校学习。三年解放战争我一直是在前方战斗部队里渡过的，亲身尝到了战斗胜利的喜悦。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是个军人。每当我回忆起自己的成长过程，我总是深切地怀念着延安黄土地上的学生生活。是她，为我奠定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她，始终激励我为中国的光明前途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李伦

男，曾用名李润修，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后转入延安抗大，炮兵学校学习。曾任总后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部长，后勤学院院长。现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参加过淮海战役，在解放战争中荣立一等功。

魂系梦绕的延安——记罗西北

赵仕杰

1986年为开发黄河北干流的水力资源，西北带领了几个专业干部，绕道去了一趟延安，拍了许多照片。

每次出去考察他总要拍照，除了工程上所需要拍摄的以外，对于一些生活、风景照，他一向是不大重视的。可这次却一反常态，回来以后为找不到在延安拍的胶卷，好些天耿耿于怀，一想起来就念叨：四十多年了重返延安，多么不容易，这些照片很珍贵……。

好在终于找到了。冲洗出来以后，他兴致勃勃地一张一张讲给我和女儿们听。看他的神情真像又回到了那个幸福而充满激情的年代。平常每当他和延安时代的老同学们相聚时，神态也是这样的，大家不论职位高低，仍然像孩子似的在一起嬉笑玩耍。只要他们聚会在一起，个个都“返老还童”了。这大概是因为少年时代的延安生活留给他们每一个人的，都是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吧！

1990年秋，我有幸与西北为开发黄河北干流的事，再次去延安。一提起去延安，他话就多了，兴致也特别好。我常常在想，延安为什么会使这么多离开她多年的儿女们至今魂系梦绕？这得从四五十年前去延安说起。

西北的童年是在外婆的身边渡过的。1928年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西北的爸爸罗亦农被叛徒出卖牺牲了，

留下1岁多的独子小西北，由外婆马淑平带回她们的家乡四川。为了避免国民党“斩草除根”，在成都上小学时他改姓周，叫周西伯。已经七八岁了他还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外婆早年居孀，做得一手好针线活，靠开个小裁缝店养家糊口。目不识丁的外婆能保住小西北的温饱已属不易，放学后由他在街上、茶馆里游荡。西北人长得又黑又瘦又小，不过念书还算聪明。他虽然经常逃学，跑到郊外偷地里的嫩葫豆吃，吃饱了枕着书包睡大觉……但成绩却一直在班上拔尖。西北的童年没有得到过正常家庭生活的温暖和父母兄妹的爱，他几乎是个野孩子。学校每学期入学时都要填表，在父母一栏中他总是不知道填写什么。他常常想，同学们都有爸爸妈妈，而自己怎么除了外婆以外什么人都没有呢？每当他问到外婆时，外婆总是神秘地对他说：“你还小，等长大点再告诉你。”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他。

1935年底，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岷江上游，成都有钱的人都怕“共产党”，纷纷逃往重庆。外婆十分镇静地对他说：“长征的队伍里都是你爸爸的朋友，他们和你爸爸一样都是好人。”

“那么我的爸爸妈妈呢？”他又提出了那个老问题。外婆沉痛地对他说：“你爸爸是个大共产党，被蒋介石杀头了，你妈妈在莫斯科学习时淹死在河里了……你长大要为父母报仇！”从那时起，他突然显得懂事多了。怪不得同学们一提起“共产党”就都以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开始盼望快点长大了，去找爸爸的朋友，也当个大共产党，为父亲报仇。

1937年党中央找到了他，并让外婆将他送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外婆用她一针一线挣来的钱给他缝制了新衣、新被褥。临行前，外婆在他对襟的小褂内用密密麻麻的针脚缝了个小袋，装了十几块钱，把他打扮一新，交给了正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伯伯。在武汉停留了几日后，周伯伯就送他上火车，交给一批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一同去延安了。外婆送他到火车站时，流着眼泪嘱咐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此时的西北，第一次一个人上路，够神气了，何况是去延安——他向往已久的爸爸的朋友们所在的地方。从此以后再也不是那个不知父母是谁的可怜孩子了，他将要和爸爸的朋友们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大共产党。

到延安时已是1938年初，11岁的西北对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鲁迅小学读书，遇见的第一件新鲜事，就是每次吃饭都排队，先唱吃饭歌：“我们吃的粮食是老百姓给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从那时起，西北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老百姓是最重要的，老百姓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件有趣的事是，孩子们集体住在窑洞里，个个剃光头，穿着不大合身的军服。起初他和一个叫陈英的孩子最要好，简直是无话不谈。有一天，另一个孩子突然提醒他，陈英是个女的，西北大吃一惊，怎么能和女孩子打得火热呢？真有点不好意思。他与陈英疏远了，但心中一直记着这个女孩子。时隔多年，他俩在我家相遇，提起过去的趣事，仍然忍俊不禁。

西北保留下来唯一的一张延安时代的照片：身着棉军装，裤腿和袖子都挽上去一大截，的确太不合身了。我问起外婆为他缝制的新衣呢？他说，新衣和新褥单都打草鞋穿了，到延安就是“革命军人”了，谁还愿意穿小孩的衣服？

我们一行尚未踏上延安的土地，西北就开始嚷嚷：“有没有羊杂碎吃？”同行的专家们都感到奇怪，羊杂碎有什么好吃，胆固醇一定很高吧，可是他却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讲起了羊杂碎的故事。1939年开展大生产运动，

纺1斤毛线给1元零花钱，孩子们拿到这1元后，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去市场上吃一碗热腾腾、辣呼呼的羊杂碎了。其味道鲜美远非如今的山珍海味可比。一路上吃了好几次羊杂碎，西北当然是吃得最有味的一个。他的这种感情，感染了不少同行者，大家开玩笑说，吃羊杂碎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谁怕辣，吃不下去，就是拒绝接受革命教育。

到达延安之后，先登宝塔山，在山顶上远眺山下，延安已不是当年的旧模样，她已变得接近现代化了。蜿蜒的延河水流量已经很小，下山后，西北沿着河边去寻找清凉山下的河滩和河滩上的那块大石头。因为当年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去那里洗澡，那时每人只有一套衣服，洗澡前先将衣服洗了晾在那块大石头上，洗完澡后就躺在河滩上晒太阳，一直等到衣服干了才穿着回去。谈到这里他无不骄傲地接着说：“我就是在这里学会游泳的，从大石头上跳，扎个猛子，来个‘狗刨式’就浮起来了，一直游到对岸。”联想起这些年来，他在人生的风浪中几经磨难，正是以这种扎个猛子下去再浮上来，游向彼岸的勇敢精神，经受住了这种严峻的考验。

1938年后，由于日本鬼子的狂轰滥炸，西北就读的边区中学已无法在延安城里上课，于是随同党政机关一起迁移到安塞的吊儿沟。蹚河时，大点的孩子背着小点的，强点的扶着弱的，12岁的西北尚无能力去背别人，他就抢着替他更小点的孩子背背包、杠板凳。那时每人一个小板凳用处可大了，无论上课、开大会都得带着。上课时在小板凳一坐，摘下脖子上挂的小黑板当桌子，在上面又写又画，开大会时，只要在小板凳上一坐定，队与队之间就开始唱欧。“××队来一个！”“再来一个要不要？”呼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西北是他所在队的指挥，十分活跃。我以前对他小时候在唱歌方面有如此高的“组织才能”表示过怀疑，近年来遇见过好几位他在延安时的同班同学，他们都谈到西北当年如何爱唱歌，如何擅长指挥。

我好奇地问过他们都唱些什么歌，他们说许多歌都是自己编的，歌唱生活和生产的，唱起来可带劲哩。大家都感到自己正在为创造新的生活而做着贡献。

“你们小时候有过夜行军吗？”西北回过头问我们，接着他又饶有兴趣地谈起了当年的夜行军：夜里面得正香，一阵哨声，孩子们立即起床，穿衣，打背包，集合……这一切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然后，开始行军了，爬山、过河……只要脚底下稍平坦些，他就可以紧挨着前面的人边走边睡。他又想起了另一件趣事。有一次他领头打了快要成熟的杏子吃，为此还被罚站，写检讨。延安中学的老师们培养他们从小爱集体，爱护公共财物，严守纪律。罗西北一直到老，只要是组织上的安排，工作需要，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分配，一向不知什么叫讨价还价。

在延安短暂的停留期间，我们还匆匆地参观了边区大礼堂、枣园、杨家岭。在杨家岭的一排窑洞前，西北显得特别留恋，拍了不少照片。原来他就是从这里和朱敏、娇娇、继飞四人一起离开延安去苏联的。

在去苏联的头两天，王若飞伯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

让警卫员找了一天，才把西北从自然科学院叫到他家，对他详细地讲了1926年至1928年，在西北的父亲罗亦农等革命先烈的领导下，党是如何组织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以及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广大的革命群众和仁人志士如何惨遭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的过程。

罗亦农在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不久，就被调到湖北工作，任长江局书

记。

1928年春因工作需要，他冒险回到上海，此时蒋介石反动派正以5万光洋的巨金悬赏捉拿罗亦农。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去法租界与山东来的同志联系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

为了营救他，上海的党组织布置工人纠察队做了许多的工作，蒋介石怕有变故，未经任何审讯，就将他枪杀了。

西北决心以后像父辈一样做一个伟大的共产党人，为迎接祖国的解放，为将祖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本领，贡献力量。他就是怀着这样拳拳报国之心踏上异国的土地的。

延安对他的抚养、教育，影响了他的终生，不论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孤独苦难的流浪生活，还是在东北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不论是对待学习还是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他都是以自己的实干精神，战胜重重困难，克服各种挫折，迎着激流前进。他至今如此眷恋延安，正是因为她像一个伟大的母亲哺育了他，赋予了他伟大的精神支柱——对事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正是如此，至今延安还使他魂系梦绕。

罗西北

男，边区中学三班学生。现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常务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水电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著有《河流规划与水电经济》、《技术政策研究》。曾获国家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技术政策研究》一书获著作一等奖。国务院定为在工程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抹不去的记忆

鲍克明

我是1944年8月1日由延安保育院小学毕业后升入延安中学的。在那里，我度过了黄金般的中学时代。在延河边上，在桥儿沟，从杨家岭到清凉山，从延安鲁艺的大教堂到我们的露天教室和窑洞；可亲可敬的老师；活泼可爱的伙伴……一生中有多少往事只是稍纵即逝，然而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却是那么真切，那么清晰，那么强烈！

闲下来，抹不去的记忆从心底涌起……

吱吱扭扭纺车响

又鲜又红蕃茄热

1944年的延安，生机勃勃。经过整风运动，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敌后各根据地更加发展扩大，政治气氛很好。延安刚刚走出1942年到1943年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延安中学也不例外，我们除了繁重的学习任务外，还要参加生产。

陕甘宁边区缺棉花、布匹，但是部队对战士的着装又有严整统一的要求——一色的灰军装、灰军帽、灰绑腿。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纺线线，还担负起织毛袜，纳军鞋，做军衣的任务。

窑洞里、院子中摆满了纺车，吱吱扭扭的响声和大家的说笑声、歌声融成一片。秋冬之交，我们一天要做2~4套军衣。我记得在延安保卫战前

夕，彭德怀将军视察富县、甘泉前线归来，发表演说，号召大家为部队打毛袜，支援前方。

延安中学坐落在桥儿沟的山坡上。桥儿沟里面有条小溪。

为了解决蔬菜的长期自给问题，学校开了菜园，菜是集体栽种的，菜熟了要交给伙房。另外，我们几乎每个人还有一小块“自留地”。我的小小自留地上种着 30 棵西红柿。

到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西红柿成熟，鲜红酸甜，真叫人喜欢。我把它们摘下来送给嘴馋的小同学，送给女同学，回家时还背上一书包带给父母。看到一棵棵小苗经过浇水、施肥、打杈、搭架结出的果实，那种经过辛勤劳动后收获的幸福感，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代替的。

领袖的气度

1942 年，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为了清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全党全军全民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好准备。

在整风运动后期，康生提出了“挽救失足者”的口号。他认为，在党、政、学、工中混有大量的国民党特务，要把这些反动分子清理出来。他的错误行为导致这场运动完全背离了整风的目的，伤害了大批忠诚于党的同志。

1943 年，我在保小时，也被选派去参加安塞真武洞的县委整风，做记录和整理材料工作。“逼、供、信”的整法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理解的迷惑和创伤。

毛主席发现问题以后，及时提出一定要对“抢救失足者”的错误进行纠正；对错整的同志进行甄别，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翻，冤假错案一律平反。那时，我正在延安中学读书，我的老师和同学也有受冤枉的。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我们在鲁艺礼堂召开了甄别大会。那些曾被打成“特务”的同志，摘掉了压在头上的沉重的帽子。他们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的委屈，感激党对他们的信任。我还记得在延安大学召开的大会上，毛主席站起身来对大家说：“我向大家表示道歉，我向大家敬个礼吧！如果大家原谅了，我就把手放下；大家不原谅，我就一直向大家敬礼。”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伟人的气度、有错必纠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尊敬。1943 年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的“左”的阴影也一扫而光了。这场运动使我在政治上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并使我受益终生，永远不能忘记。在以后土改、三查、五反、反右倾运动中，我都能注意对过火的整人的做法保持距离。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那么多老同志、老领导因莫须有的罪名挨整时，我心中愤愤不平，尽力去看望他们，对他们进行照顾。我依然深信我们的党有勇气、有能力纠正这种“左”的错误。

当年思想上的感悟和认识，指导着我的为人处事。我至今牢记：对同志要充满友爱和善意，对人不能随便怀疑。党内的是非和矛盾不能简单地用整人、压服的办法解决，更不能搞“逼、供、信，”对待复杂的事物不要轻易下结论，而要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

马兰草制的报纸

在延安，人人读报，蔚然成风。

当时的《解放日报》社位于清凉山，每天下午 4 点到 5 点，从中央到各基层单位都派出通讯员到清凉山下的一个石窟里去领报。有的通讯员还弄

上一辆旧自行车，“叮叮铃铃”地跑在小路上。五六点钟，领报的通讯员便带回泛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一时间，他们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一张对开的报纸，是由马兰草制成的纸印出来的。马兰草是我们端午节用来捆粽子的像韭菜叶一样的长长的草，它开着幽香的兰花，人们常用它打草绳和编草鞋。延安军民用马兰草造纸也算是在纸张奇缺情况下的一大发明。这种纸很厚，但不结实，一受潮就会折断，字迹也就模糊了。

晚自习时，老师组织我们读报。我们把读报看成非常重要的事，读报时我们还自动作笔记和摘抄。从报纸上，我们了解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学习党的政策和革命理论。记得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消息就是敌后根据地发展的消息，还有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我边区军民搞摩擦等情况。那时，除了读《解放日报》，我们还读《参考消息》，上面都是直接援引世界各大通讯社，包括日本《共同社》、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这些消息和信息使大家能够提高判断分析形势的能力，坚定和增强胜利的信念，成为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

这种马兰草制成的报纸，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它给我知识，也留给我一个几十年来都未曾改变的天天读报的习惯。现在，工作再忙，我每天也要看几种报纸。

我成了青年团员

革命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无比神圣的。从保小升到延中，我觉得我长大了，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的党的“七大”决定18岁以上方可入党。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学生都很着急，就组织了时事政治学习小组，努力学习政治和革命理论。1946年秋，我们开始在学校组建青年团。12月9日，毛泽东青年团正式成立，我作为第一批团员加入了组织。这批最早的团员共71名，全部是骨干分子，成为基本团员。建团后，苏红、张珍、王黎明和我创办了一种油印小报《团内生活》。我除征稿、编稿外，还承担了刻写蜡版的任务。1986年，王黎明同志在团中央的档案中查到了仅有的一期《团内生活》。

他惊喜地告诉我，并复制了一份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我。我看着当年自己刻印的小报，稚拙里透着成熟，心情可激动了。王黎明当时是团总支书记，他说，他还保存着1946年12月9日我入团那天的会议记录，那上面记着我的发言，其中有我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当团员不能白当，团员要起模范作用。”以后，一直到今天，我确实都是这样在要求着自己。

1947年3月，我直接参加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战斗。那时，延安中学大部分改建为第四野战医院，卢勤良副校长任医院院长。卢院长了解我，说我机灵，又能吃苦，就让我去当了通讯员，不久又成了通讯班长。同学们看着我骑着马，挎着枪，穿山过岭，往来送信，可羡慕啦！一次，我送信到医院的五所。我跑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非常冷。我那时才14岁，小脸冻得红红的。贾芝老师把我拉进他住的窑洞，他和李星华老师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问冷不冷？还拿了一些东西让我吃。我当时心里暖暖的，一路的风尘和疲劳都无影无踪了。

我又一次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难忘桥儿沟的山山水水

延安中学的我们，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成人的。露天上课，沟坡里劳动，每天都少不了爬山。当时布鞋缺少，我们穿一双硬硬的木板拖鞋。

这双木板拖鞋并未限制我们的活动，大家一个个仍像灵活的小山羊一样在蜿蜒的山路上奔来跑去。

艰苦的战斗岁月，政治思想上的早熟，并未磨灭少年的天性。学习劳动之余，大家都爱唱爱跳，爱玩爱笑。晚饭后，我们三五成群到江边或山沟去散步；在鲁艺看陈强、王昆、王大化、李波等大哥姐姐们排练《白毛女》、《兄妹开荒》；到召开过中央重要会议的天主教堂，去寻找那条古老的裂缝，看它又加深了多少。夏天，延河中到处是畅游的人，河边挤满了洗衣服的男男女女；冬月，我们在木板上钉上粗铁丝做成的“土冰鞋”，在延河的冰镜上追逐嬉戏。高原阳光，野外气息，山谷清泉……使我们健康成长。

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知识，给予我们力量，给予我们生命。

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也为我们注入生机和活力，注入朴实和纯洁，注入坚韧和顽强，使我们在以后的一生中享用无穷，使我们经受住种种的磨难和考验。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

我们这辈人是从延安的战争年代走过来，又在党的培养下，受到较全面的教育，掌握了现代化科学知识，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的。我在改革的第一线已4年了，在海南建省办特区的开创工作中，我深深感悟到：延安精神不可丢！

我是在延安奠定了人生观和世界观基础的。在延中，我曾和老师一道学习《整风文献》等著作，其中《反对自由主义》记忆犹新，至今我还能背诵，而且它竟成为我一生遵循的准则。

比如，多少年来，我一直坚持“有话当面讲，不背后乱说”的习惯。现在，价值观念变了，有的人不仅乱说，还要造谣诬陷，抵毁别人。这种自由主义是我们队伍的涣散剂。我们如果不能恢复过去的好作风，不建立诚恳的同志关系，将是很危险的。

延安还给了我坚定的革命信念，告诉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培养了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还教会了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和工作方法。这些都是我工作和生活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无论是战争，还是学习；无论是设计、研制，还是思考和实施改革的“系统工程”，都是延中培养的那种努力上进的精神，支持我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在改革开放中，我记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让人们都富裕起来，是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强大起来，跻身于世界先进的行列。我的这些觉悟都是和延安的教育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文明，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困难。它不同于过去物质匮乏的艰难困苦，也不同于战争的残酷考验。它要求我们面对全世界的挑战，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科技竞争、经济竞争以及政治上的较量。我们的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靠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大协作的精神，我们取得了原子弹爆破、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等许许多多出奇的成就。要攀登科学和现代化的高峰，我们需要一支忠于人民、报效祖国、忘我奉献、执著刻苦、团结协作、不畏艰险的新一代队伍。这支队伍的素质要求优良的革命传统和现代意识的有机结合。我们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有责任做出这种结合的典范，把老一辈手中的革命火炬传下去。中国社会主义强国的建成

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延安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的传统，作为一种精神财富要坚持传下去。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没有过去的奋斗和牺牲，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今天的青年为改革开放，为四化建设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又将为后人创建美好的未来。历史也不会是重复的，今天不可能是昨天的简单翻版。我们希望年轻的朋友，记住当年延安青少年那种与人民共命运，积极上进，严格律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金茂年黎子杨阳整理） 鲍克明

男，延安中学六班学生。山东掖县人，1932年生。1947年参加西北解放军。1946年秋入团，1948年7月入党。195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1953年入莫斯科航空学院发动机系学习，任留苏学生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59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实习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主任设计师、副所长，航天部三院副总工程师，院长，航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现任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中央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宇航协会副理事长，研究员。

人生最可贵是精神

张巨才

在40年的悠悠岁月中，我无论走到哪里，是苦还是乐，是喜还是忧，总忘不了延安，忘不了在我的心灵深处点燃起革命火种的延安中学。那夕阳辉映的古塔，浮光耀金的延河，小米饭、南瓜汤的清香，年轻战士雄壮的歌声，这一切都使我梦魂牵绕。1988年7月，我带着帮助延安钢厂扭亏增盈的任务，奔赴阔别四十多年的延安，终于又回到了这片炽热的土地。

延安钢厂位于延安城东40里，去那里正好经过桥儿沟。

那儿正是我曾经生活过、学习过的地方，又是我无数次梦里所见的地方。

在延安钢厂谈完工作，我专程来到桥儿沟。东面半山腰就是延安中学的旧址，现在只留下一排排破旧的窑洞。我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沿着崎岖的山路寻找我所在的九班宿舍和教室。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能容纳30多人的大窑洞，我弯着腰，钻进已经塌落的窑洞，一股熟悉的泥土味，沁人心脾。我捧起地上的黄土，闻了又闻，这里就是我们听课、自习、讨论问题的地方。走出窑洞，我爬上山顶四下瞭望。远处，黄土丘谷，连绵起伏；脚下，延河如练，飘然远去。我的思绪随着山顶上的风，沟底的水，随着弥漫的泥土芳香，回到当年的延安中学，回到了我们的九班……

我们延安中学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抗日前线来的小八路，有从文工团来的小演员，有来自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干部，也有像我这样来自国统区，刚刚参加革命的小战士，有革命烈士的遗孤，也有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的子女。延中的老师几乎全部是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过着供给制生活的革命战士，随时准备组织一声令下，奔赴前线或其他工作岗位。正因为如此，在延中不仅学文化

知识，而且把学政治、提高学生思想觉悟放在突出的地位。我们的政治老师严华同志当初给我们讲解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情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从她那里，我懂得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革命原理，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许多重要内容。新华社编辑吴冷西也常到学校里为我们讲形势，他从苏德战争讲到太平洋战争、抗日战争。经过延中的学习，我们这一群小八路的头脑由朴素的阶级感情、单纯的革命热情，逐步升华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延安中学实际上是培养青年干部的政治学校，是一座锻炼青少年的革命熔炉。

延安中学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吃的是小米、南瓜、土豆，穿的是陕甘宁边区生产的土布衣服。鞋子不够穿，春、夏、秋三季穿自己做的木板鞋（这种鞋类似现在洗澡穿的木拖鞋，即一块木板，前面钉上一截旧皮带）。上课、吃饭、上街，都穿这种鞋，走起路来“咣答、咣答”地响。我们住的都是土窑洞，有的学生宿舍还搭了二层铺。有一次我住的那孔窑洞上铺突然塌落下来，把睡在下铺的李鼎铭先生的孙子李雪峰压在了面。大家急忙抢救，李雪峰却自己钻了出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笑嘻嘻地说：“没事！”我们的学习用具也十分简陋。没有课本，就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没有墨水，就发一点染料，自己用水泡了当墨水用；没有笔，自己用木头削个笔杆，学校发给一个蘸水笔尖，绑起来写字；没有课桌，自己做块木板垫在双膝上作笔记。尽管这样，同学们还是生活得非常快活。正像陕北信天游中唱的：“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我留恋着延安中学的生活：在那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当年延安的土地是贫瘠的，物质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我们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人生最贵是精神”，在那里，我们的革命人生观得到确立，我们的品格得到塑造，我们的情操得到陶冶。在那里，一个个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打下了革命的印记，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延安中学的师生们都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这就是把日本鬼子从国土上赶出去，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从东北来的同志，时刻想着打回老家去；从国统区来的同志，盼望家乡的明天也像边区一样。在所有同志的心目中，不仅有延安的山，延安的水，而且有着全中国；不仅有眼前的艰苦生活，更有着祖国美好的明天。

记得有一次我走进地理老师陶克的窑洞。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幅用蘸水笔画的中国地图。地图上没有省界，却画了山川河流，并标了一些显眼的符号。我好奇地问：“陶老师，这地图是啥意思？”他兴致勃勃地走到地图前说：“我们中国这么大，大江大河多得很，这些江河哺育了人民，但也给人民带来很多灾难。将来我们一定要把江河治理好，变害为利。将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要修上大水库；这些地方，要修上水电站。”他边指边讲，讲得热情洋溢，充满自信。

我们延中九班的黑板报，是宣传抗日形势，讲革命道理的主要阵地。说是“黑板报”，其实并无黑板，只是把土墙铲平，用黄泥抹光，再刷上烟墨而成的简易黑板。学习委员惠庶昌，14岁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负责黑板报宣传，能画画，会写漂亮的美术字。他设计的报头“大家看”十分别致。此外，还有抗日漫画，短小精悍的文章，我们的黑板报真是生动活泼，令人瞩目。

同学们还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自己的责任。记得来自朝鲜的金海燕同学对我说：“我的祖国沦陷了，我不能在祖国读书，跟随爸爸来到延安，和你们一起学习、战斗。抗日使我们成了早熟的孩子，懂得了许多道理。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赶出朝鲤去！”的确，这位朝鲜女同学当时只有十几岁，是革命事业使我们都成熟起来，是革命理想把全体同学包括外籍同学凝聚在一起。

延安中学的生活令人怀念向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真诚，革命友谊，同志之间的情谊，无比深厚。在艰苦的岁月里，这金子般宝贵的真诚，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并培养了人们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延安中学，无论是普通的小战士，年轻的干部、革命烈士的后代还是高级首长的子女，都一律平等，一样吃苦，没有任何特殊。

同学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我们男同学不会拆洗被褥、棉衣，女同学就主动帮助，并且手把手教会。开荒种地则是男同学们“耀武扬威”的机会。男同学们猛打猛冲，尽力多完成任务，减少女同学的劳动量。那时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细粮。过“三八”节发给女同学每人一份大米。她们把大米全部拿出来和男同学的小米煮在一起。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二米饭”，女同学们开玩笑说：“男同学沾了我们的光，应该向全体女同学致谢！”

同学们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帮助别人，大家都以能够帮助别人为荣。有一位从前方来的女同学会做鞋子，她为同学们做了不少双鞋。有的女同学会织毛衣，于是由同学们捻毛线，她帮同学织毛衣。有位同学会拉胡琴，但没钱买胡琴。几个同学跑到山上，抓了条大蛇，剥下蛇皮，再用刀削个木筒和琴杆，自己制作了一把胡琴。于是闲暇时他便给同学们拉一段，增添了我们生活的欢乐气氛。

我们九班的班主任肖坤，在同学们的眼里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她的爱人在国统区工作，自己带着孩子来到延安。她关心每一名同学，和大家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

她多才多艺，很善于组织各种文体活动。有一次，她组织全班开了个篝火晚会，还邀请了其他老师和“鲁艺”的同志参加。大家面前摆上自己种的西红柿、土豆、南瓜，边吃边演文艺节目。我唱了《血泪仇》中的一段，虽然唱得不好，但老师和同学们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位来自东北的老师，用低沉浑厚的嗓音唱了《在松花江上》，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时，他声音颤抖，热泪夺眶而出。这时全场一片沉寂。我们特约的“鲁艺”的音乐家刘炽走出来，表演了一段精彩的口技，才使大家从悲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活跃了气氛，重新泛起欢歌笑语。

1946年10月的一天，老师通知我，组织决定调我到新华社工作。说心里话，我真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胜似亲人的老师和同学们。但为了革命工作，我离开了延中，离开了我的老师，我的同学，离开了那一排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土窑洞，走上了工作岗位。

40年后重回延安，重到桥儿沟，唤起了我对当年战斗岁月的无限怀恋，对老师、对同学、对战友们的无限情思。当我的思绪从往昔走向今天的现实，我在想：当年延安人的理想、品格、情操，当年延安中学那种丰富而又高尚的精神生活，真挚而又纯朴的同志情谊，今天的人们，今天的中学生们应如

何继承，如何保持和加以发扬呢？这也许是每个老党员，每个年轻的同志，都应当思索和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张巨才

现名张羽，延安中学九班学生。1944年由国民党统治区进入陕甘宁边区富县参加革命。1946年10月调新华社工作。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任教学工作。先后任鞍山钢铁公司计划处长、副经理；辽宁省计委副主任。现任鞍钢党委书记。1958年起有经济著述，在全国性刊物发表；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经济师。

但闻延河流水声声唤

欧阳代娜

我们这群当年延安时代的中学生，已先后进入了花甲之年，近半个世纪前的生活仍历历在目。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延河母亲的呼唤声，总在耳边响起。

“勇敢些，沉着些，我相信你是会考取的！”

1944年冬的一个傍晚，父亲托人捎信给我，说延安大学预科要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的学生中招生，用两年时间完成中学阶段的复习任务，然后转入延大本科。父亲鼓励我去考一考，并在信的末尾写上了一句颇有诗意的话语：“勇敢些，沉着些，我相信你会考取的！”

这个消息，叫我又惊喜又犹豫。延大自然科学院是我向往的地方，可是考试就在明天，我毫无准备啊！怎么办？去不去？

我问小伙伴们，大家七嘴八舌说开了。有人说：“去，反正是一次机会。”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去，一定去！”不到10分钟，我们这群十三四岁的小同学就把决定生活道路的大问题解决了。当时，要一起报考的还有吴群（世益）、云泊娟、何理文、孙静兰。有人提醒我们：“快去做些准备吧！”

“准备什么？明天就考试了。”

“那就今晚早点睡觉，明天好有精神头！”

第二天，我们去自然科学院报了名。一位姓刘的老师接待了我们，还进行了口试。

“你们几个小同学为什么要考理科的预科呢？”

“我们希望能学到建设新中国的本领！”

“你们几个是小学毕业生，人家都是中学毕业的，跟不上怎么办？”

“我们一定能跟上来！”

口试是简单而又严肃的。我们那时还无法描述未来的共和国的蓝图，但我们坚信胜利是会到来的；建设新中国的重任要由我们担当。我们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理科预科班。

口试之后，又作了笔试。共两张试卷：数学、自然、史地一张；语文一张。我打开试卷，想起了父亲的话：“勇敢些！沉着些！”于是我满怀信心地交上了答卷。

过了几天，延大来通知，我们五个人都考取了。大家为我们祝贺。我们打起背包，带上简单的学习与生活用具，到延安大学去报到。

愉快的学习生活

1944年时的延大预科班附设在延大行政学院内，这里没有宽敞的教学楼，连一间平房教室都没有，全部的教室与宿舍都是同学们用自己的双手挖出来的窑洞，全校最大的房子是修在半山腰上的一间大礼堂。这里没有操场，最宽大的平地，就是半山腰上伙房前供大家吃饭用的一小块空地。教室里没有桌子，每个人的膝盖就是自己的书桌；没有椅子，每人发一把小马扎，走到哪里都可以上课；夏日山风和我们做伴，它轻轻拂去我们头上的汗珠；隆冬雪花跟我们嬉戏，她顽皮地遮挡住我们的视线，一节课后，同学们都变成了“白雪老人”，配合着周围一色银装素裹、延绵不断的山峦，犹如一个神奇的童话仙境。

我们学校的设备十分简陋，可是，我们学校的生活却是最充实的：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担任校长和老师。周扬同志是我们的校长，江隆基、强晓初同志是副校长，张如心、林迪声同志是教务长。王哲时和于修同志是我们预科的正副主任。著名学者、教授于光远同志和何思敬同志给我们上课。执教的老师大多毕业于蒋管区名牌大学，他们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他们的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江天成老师的代数和物理讲得生动有趣，深入浅出，他是我们理科二班的班主任，他博学多才、思维敏捷，全班同学都十分敬佩他；几何和三角课教师王哲时同志不但会教书，还会开火车，他的课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解放后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荣孟源同志担任历史课；教化学的夏淑慧老师讲课清晰易懂，语言娓娓动听；

向明老师的热情生动、富有抑扬顿挫的语言把地理课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上英语课没有教材，我们用的教材，都是教我们英语课的许老师自己编写的。他编的教材生动有趣，至今我还能背下不少章段。记得有一课书的第一句是：

“We live in an ocean of air”（我们生活在空气的海洋里。）

他在课堂上总爱说：“Any questions？”（有什么问题吗？）

他的耐心与认真的教学态度至今还在影响着我。我喜欢语文课，芦白老师的文学欣赏课，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曾在课堂上放声嘲笑过《藤野先生》一文中清朝留学生的丑态；大家曾被莫泊桑的巧妙的情节安排所吸引，为人物的命运而哀叹。当时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十分清贫的，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十分富有的。我们身居偏僻闭塞的黄土高原，但我们的视野却十分开阔。

我们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了。每晚我们都利用晚上熄灯号吹响前的片刻教唱歌。

当时教唱的都是我国著名革命歌曲和苏联革命歌曲。

我们的歌声飞扬

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1945年在凯歌声中到来了。我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举行元旦联欢会。理科二班的同学，集合在宿舍窑洞前的一条狭长的坪台前，头顶青天，脚踩高原，四周延绵不断的群山峰峦像大海的波涛紧紧地拥抱着我们。这是多么壮观的礼堂！这里没有灯饰，没有彩旗，但满天飞舞的瑞雪，却给我们的兴致点缀得晶莹剔透，五彩缤纷。这里没有糖果，没有饮料，但戏嬉顽皮的雪花偶尔闯入我们的喉咙，使人感到分外甘甜！

四部合声的《国际歌》，以她特有的魅力震撼人心。熟悉的旋律，此时此刻更是有深沉的含义。“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我们不是在对别人做“救世主”式的召唤，而是用自己的心发出庄严的誓言。因为我们自己能曾经历过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这不但是理想，更是我们切身的实践，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矢志不渝的实践，我们唱得自豪，唱得痛快！在歌声中，我们重温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历经磨难挫折，屡遭困顿惘惑，但始终不改追求光明的心。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在悲壮高昂的音符中我们高声抒发出自己的信念：“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们深感到这句歌词的分量，深感到历史的重担已落到我们的身上。大家在心里默默地宣誓：要用自己一生的奋斗来实践这庄严的许诺。近 50 年来的经历，证明了我们大家是言行一致地恪守了这个誓言的。

“我们的歌声飞扬，作光荣号召！”是的，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是以歌声作武器，唤起千百万人民同仇敌忾的勇气与决心。

狂欢之夜，愤怒之夜，忧忡之夜

1945 年 8 月的来临，国际风云变幻，历史到了最伟大的转折关头。

在苏德战争结束 3 个月后，苏联红军按照雅尔塔协定的精神于 8 月 5 日对日军空战，并出兵进攻占据我国东北 14 年之久的日本关东军。中国的抗日战争迅速进入到最后的反攻阶段。国际上一连串的重大事件，令人目不暇接，人们的思维活动进入到一个最活跃的时期。

8 月 6 日，延大全体同学在大礼堂听张如心老师的形势报告，会场十分活跃，提问的小纸条源源不断地传向主席台，大家最关心的是“苏联参战后，日本关东军会不会负隅顽抗？”“中国的抗日战争什么时候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人们预计这场战争还会打一年半载的，但谁也没有料到日本政府于 8 月 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以她自己特有的方式展示其不可违逆的必然规律。

日本投降了！半夜，消息传来，全校立即沸腾起来，延安大学这座大山都活跃起来了！19 个班系像 19 条支流，一齐涌向食堂前的平地上。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学校对面的山上的机关干部也兴奋地欢呼起来，我们山脚下的市府交际处的同志也在呼口号。整个延安都沸腾了！同学们举着火把上街游行，有的同学甚至举着蒸馒头的笼屉作火把，以致第二天要改善伙食吃馒头时，竟因无蒸笼而改吃面条。8 年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这古老而多难的民族终于在近百年来第一次在列强侵略者的面前站立起来了。

但是，抗日胜利的欢呼声还未逝去，战争的阴影又袭上心头：国民党反动派要下山“摘桃子”，日本军队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内战的危机步步紧逼，威胁着渴望和平的人们。

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做《我们在抗日胜利中得到了什么？》一篇命题作文。全班同学慷慨陈词，表述了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内战的极大的愤慨。在课堂，在课外，在校内，在校外，人们到处都在议论着“战争”、“和平”这一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问题。我们已无法安静地在窑洞里学习了，同学们从白天争论到夜晚，又从夜晚讨论到天明，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少个彻夜难眠之夜！

紧接着是更为令人震惊的消息：“毛主席要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

“这怎么能行？”

“去重庆，太危险了！”

“蒋介石可是天字第一号的政治流氓啊，谁不知道他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阴谋家呀！”

“反正毛主席不能去。要谈，叫他蒋介石来嘛，我们保证以礼相待！”

“真没有想到，我们苦干3个月修的飞机场，却是要送毛主席去重庆呀！”

“那个美国特使赫尔利，他倒装得挺像的，中国人不再上他的当了。”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延安大学的夜晚，已失去往日的静谧。每个班组都在热烈而又不安的气氛中争论着一个共同的难题：“毛主席应不应该亲自去重庆？”焦虑、气愤、担忧，困扰着我们。

中央的决定很快下达了：“毛主席决定于8月28日赴重庆谈判！”大家从理论上弄懂了，但思想上仍不通；从组织上是服从了，但感情上却受不了。

8月28日的上午，我们延大高中部同学和延安军民在机场，欢送毛主席乘机去重庆谈判。

毛主席的飞机昂首直穿云层，飞去了。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我们的心也紧随着飞机远去了。

“到新解放区去！到前线去！”

1945年9月的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场的大街上，热闹非凡，人流如潮。人们在欢送一批又一批的战友奔赴新开辟的解放区，奔赴斗争的最前线。昨夜，我们还在同屋讨论国家大事，今天，战友们已整装上路了。告别的方式既简单又豪迈。大都只有一句话：“前方见！过两天我就跟上去！”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期望着新中国的早日到来。

在欢送奔赴前方的队伍中，我看见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她在一个月前还住在疗养院里），我赶忙上去告别：

“妈妈，您要多注意身体！”

母亲笑着说：“你们放心，有组织上关心，有同志们照顾，没问题。你们留在延安，要好好学习，听从组织安排。”

短短5分钟，我们话别后，母亲骑上牲口远去了，我也赶回了学校。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这些长期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人，很少考虑个人的需要与利益。大家想的是怎样才能为革命多做贡献，怎样为党多做工作。

我渴望上前线去，与同伴们并肩战斗。但是父亲接受了周恩来同志分配的任务，要去大后方蒋管区进行文艺统战工作。

因工作需要，我们留下来了，我在延大高中部继续学习。

1946年5月11日，我16岁了，组织上批准了我的入党要求。当时，虽然没有举行隆重的入党仪式，但在我心中已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一生都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

1946年5月16日，组织上调我去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工作。我二话没说，第二天，打起背包就去报到了。

我的中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延河流水日夜不停，喝延河水长大的儿女和母亲的心一脉相通，我们

会牢记母亲的期望与叮咛！

1991.8.10 欧阳代娜

女，延大中学部学生。鞍山十五中特级教师，曾被评为省市优秀班主任、优秀共产党员、模范教师、十佳教师、劳动模范、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获人民教师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著作有：中学语文教材《阅读》、《写作》、《作文》等。

那过去了的，终将变成亲切的回忆

——桥儿沟的欢乐易达美到润之先生那里去

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校场口发生了一次震惊国内外的事件——国民党特务、打手冲击了广场上的一个群众集会。他们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等好几位知名人士被打伤，而这个集会只不过是为了庆祝国共联合的政协会议的召开，是很正当的。小哥和我随妈妈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当时我14岁，对有些事还不很懂。不久，妈妈兴奋而神秘地问我：“我要到延安去，你去不去？去找润之先生。”我高兴得跳起来，不假思索地答道：“去！”——有什么好想的呢？既然延安是共产党的地方，毛润之先生在那里，那当然是好地方。

1946年早春一个晴朗的早上，我随妈妈搭乘一架军用飞机，离开了“蒋管区”的重庆，飞向延安。我哪坐过飞机呀，还是军用的。它颠簸得好厉害！不多久，我的新鲜、好奇劲就被不断地呕吐冲没了，我难受极了！这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面目慈祥，说话和气，略有点上年纪的人，递给了我几块水果糖，他安慰我说：“不要紧的，吃点糖吧！”我正为自己的窘相不好意思，旁边一个妇女对我妈妈说：“他是周恩来同志。”就在这一瞬间，我完全忘掉了难受，眼睛睁得老大，使劲地看着这位陌生而又熟悉的人。

妈妈欣喜地只是连声：“哦！哦！……”——

谁不知道周恩来呀，何况妈妈多年来在家中订有《新华日报》，她常引导哥哥们讨论时局，我经常旁听，对这个名字早已熟悉了。我加入革命队伍，竟然是和这位世人敬仰的人物如此富有戏剧性的相遇为开端，多么意想不到和令人庆幸！

两个多小时的航行，使我得以第一次俯视祖国的壮丽山河。飞机降落在春光明媚的延安机场。在前来机场迎接的人群中，我一下就看到了身材高大的“润之先生”——毛主席。抵达延安的第一天所经历的这一切，令我终生难忘。不久，我被安排到桥儿沟的延安中学学习。在这里，给我留下了一生中珍贵的一页。

一缸咸死人的挂面糊糊

我被编入最低年級的十三班。这个班在沟里头的山腰上，一排好几个窑洞。我的个子小，又来自重庆那样一个城市，使人对我产生“没吃过苦”的印象，所以老师和同学都很照顾我，特别是班上几位年龄稍长、比较老成的女同学。当时，小米是我们的主要口粮。初次吃这种东西，一口下去，感到它粗糙、发干，难以下咽。开始，我用一个儿童漱口杯当饭碗，就这样还

吃不完，到晚上，能不饿吗？可是我不敢说，忍着。一天晚自习过后，下着雨，我肚子又饿了，便早早上炕，缩在被窝里静听同窑洞几位女同学说笑。忽然，班上的两位大姐姐从外面进来，来到我的面前，有一位手里捧着一个中号的搪瓷缸，她把缸子递给我说：“吃吧，这是煮挂面。”我又高兴又难为情，爬起来，接过缸子把这珍贵的细粮往嘴里送。可是妈哟，咸死了！又因为缸子小，挂面已成了一碗齁咸的面坨坨。我老老实实一口一口地往下咽，因为这是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真诚关怀啊。45年来，每当谈到小米，我就想起当时的这件事，两位大姐姐的身影，更是历历在目。一年后，由于胡宗南的进攻，我们分散撤退，我再也没能和她们聚会，我甚至都想不起她们的名字来，这使我心里很不好受，深感对不起她们。今天，让我从心底呼唤一声：“大姐姐们，你们现在在哪里？请回答我！”

我在十三班处处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和照顾，与这个集体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不久之后的一天，班主任老师突然通知我说，我被调到高一个年级的九班了。我很不愿意，因为我已经爱上了十三班。可老师说必须服从决定。晚上，我便睡在九班窑洞里了。

虽然九班的同学多数都是哥哥姐姐，他们对我也都很热情，但是我刚入学时得到的关怀、友爱来自十三班，我已经习惯了十三班，我眷恋十三班的老师和同学。我躲在被窝里偷偷哭，边哭边琢磨。最后，我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才渐渐睡去。第二天，天还没大亮，我悄悄爬起来，抱着铺盖，回到了十三班。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钢笔尖留下的纪念

窑洞生活是别有滋味的，给我留下的情思和感受也是独特的。我们住在窑洞，上课在窑洞，革命长辈工作也在窑洞。多少个扭转乾坤的决策，多少篇经典著作产生在窑洞；多少震撼中外的消息在窑洞里编辑成文，又从窑洞印发出去，用电波传播出去。在桥儿沟东山、西山、前沟、后沟这一排排窑洞里，培养着革命的接班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人才，往往不是在宽敞明亮、设备完善的大厦里培育出来的。

在我们上课的窑洞里，老师面向洞口而立，课桌是长方形的，靠洞墙两侧排列两行，中间是走道。每桌坐4人，两人一边，共一条双人木凳，所以4人是相对而坐，两人面向老师和黑板，两人背向老师，需要看黑板的时候，便转过身去。学校发的是很粗糙的马兰纸、蘸水笔和自配的墨水。因为窑洞墙是土的，不写字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笔尖朝上、笔杆插进墙里，把墙当成了笔架。4人一桌，又是一个学习小组，男女混合编，自习的时候，有时探讨，也有时说笑，求学的气氛欢快而又凝重，至今令我神往。有一天自习，不记得又是什么滑稽的话题逗得大家直乐。我边笑边抬起右手去取插在土墙上的笔，没留神，墨水还没干的蘸水笔尖，戳进我的食指第二节，好疼哇！笔尖上的墨水渗进皮下，还留下了一个小蓝点。到今天，这蓝点仍然依稀可见。每当我瞥见它，脑海中就闪现出45年前的那个情景，教室里当时洋溢着盎然生气，就像气功场上的“气”，任凭风吹雨打，似乎仍在我周围弥漫不散。小小蓝点，我珍爱你！

把酱油和醋都吃光

初到班上的时候，我是班上第一阔佬。临来延安之前，爸爸给妈妈一块像小骨牌那么大小的金子，以备不时之需。为了购置生活用品和改善一下

生活，妈妈就到新市场的银行，请他们从那小块金子上削下一丁点儿，换成边区纸币。我来学校的时候，妈妈给了我一些钱。可是我用它做什么好呢？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可花钱的事情。时至 1946 年，在经过大生产运动之后，基本用品如牙膏、毛巾……都有了，衣服虽然一年四季只有夏冬各一套，但大家对物质生活是那样知足，那么不在意，每当领到任何一种补充用品、衣物，都总是那样满意。

我的这笔钱财对身边的同学是公开的。我们为怎样使用它而动脑筋。终于，不记得是哪个聪明丫头想出一个好主意：

大家到沟口外大路边那个小饭铺去吃白馍。多好的主意！多么诱人的白馍！下课后，我们便下山直奔那家饭铺。它和古装电影里穷乡僻壤的那种饭铺一样，一间简陋的小堂屋，三四张板缝裂开了的旧方桌，晃悠悠的木条凳，桌上摆着酱油、醋各一小壶。

老掌柜过来招呼我们，我们异口同声、神气地喊道：

“馍，就要馍！”“好咧，馍！”白格生生、热气腾腾一大盘馍放在了桌子中央。

好心肠的掌柜给我们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粗碗，一双筷子，还给每人碗里倒了白开水。每人拿起一个暄腾腾的大馍，香喷喷地吃起来。又有人建议：把酱油倒在馒头上，开水里也倒上酱油，再加醋，就成了高汤。于是，不一会儿，盘子空了，酱油和醋也倒光了。

大家吃得心满意足。谢了老掌柜，我们欢笑着回到了后沟。就这样，总算把我那笔财产花光了。

骁勇的滑泥健将

我们的“食堂”在沟底。没有“堂”，只是在伙房旁边开出了百十来米的一片土平地。从我们住的窑洞到伙房，是一条沿山腰蜿蜒而下的窄路。性急的人又从山上直对着下面饭场踩出了一条陡坡道。陕北的黄土地，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尘土飞扬的道路这时变得又粘又滑。女生多半胆小，一般都老老实实沿着那条曲里拐弯的“正道”去伙房。

我最怕下雨，一走一滑，越怕越滑，好像每一步都可能滚下山去。那是我到沟里以后第一次下雨，我穿一双布鞋，颤颤巍巍地沿“正道”往伙房蹭。拐过最后一道弯，眼前的景象使我呆立在那儿。我看见，就在直通下面伙房的那个陡坡道上面，好多男生一手高举陶泥烧的大饭钵，一手举着边区自制的铝饭勺，欢叫着，直着身子顺陡坡道像滑雪那样呼啸而下，直达伙房。那虽然滑溜但毕竟发粘的、既不很直又不很平而且很窄的陡坡，那脚踏布鞋直冲而下的身影，构成了一幅多么壮观、精彩而又令人咋舌的景象！到现在为止，吉尼斯世界纪录也好，体坛奇观也好，我认为，我们桥儿沟骁勇的滑泥健将都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创造的也是一种世界纪录，透出一股英姿勃发的朝气。

假小子现象

小时候有次在画报上看到，外国一个电影女明星为了哗众取宠，吸引人们的注意，把自己的脑袋变成一个闪着蓝色亮光的秃头。在我的观念里，除这位标新立异的明星外，只有男人和尼姑的光头是合乎情理的。可是，我却在桥儿沟的延安中学看到了好几个既非外国明星，又非中国尼姑的光头女孩！无论她们走在哪里，既没有人嘲笑，也没有人诧异，人们都认可了这个现象，给她们冠以“假小子”的爱称。是因为长得“男味”？不，她们漂亮：

白皙的皮肤，大眼睛，红嘴唇，青春健美的体型。只是不要头发，一推到底！有一次，我憋不住，怯生生地问其中一位：“你干嘛要推光头？”她不以为然地回答：“省事，凉快。”“噢！……”我恍然大悟。她言之有理。——解放区的女孩子不爱美吗？不，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只不过那时候更尚实际，因为摆在人们面前的课题，是用血和火去开创明天。于是，假小子现象便成为延安独特风气中的又一种独特现象。

45年过去了，从桥儿沟延安中学窑洞走出来的少男少女们，沿着各自的人生轨道，经历了酸甜苦辣不尽相同的命运。

去了的，把不屈的灵魂留在了人间；尚存的，继续着未了的神圣职责。我，也由一名延中的女娃学生，变成了一个“六十老太”。可是，请不要把我想象得老态龙钟的，因为我童心犹在，透过时间留下的光华，昔日桥儿沟的幕幕情景，欢乐也好，苦难也好，今天，都变成了亲切的回忆，牵动着们美好的情思，把未来衬托得更加鲜艳。 易达美

女，延中十三班学生，北京市三十五中外语教师兼教研组组长，高级教师。

失去的母亲和找到的母亲

舒炜

我们像飞鸟一样的自由，像烈火一样的自燃，像钢铁一样的坚强，像雄鹰一样的勇敢。

在队伍前面，有红旗迎风招展，她呼唤着我们向前，向前……

这是一首浸透了我们心灵和血肉的歌，也是一首在我们一生中永记不忘的歌。

47年过去了。可是当我们这30多名年逾花甲的延安中学的老校友们在今天唱起它的时候，却显得格外亲切，格外高亢，乃至刚唱几句，每个人的眼里都不约而同地涌出激动的泪花。

就是这首歌，把我带回延水河边和宝塔山下；就是这首歌，也把我带回那苦难的童年！

失去的和找到的……

1930年10月，我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的人家里。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只知道有祖母，而不知道父母。因此，每当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喊着“爸爸”、“妈妈”，张着双臂扑向爹妈怀抱的时候，总是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痛楚和失落感。是啊！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那么我为什么就没有爸爸、妈妈呢？不！我一定也有爸爸和妈妈。

可是，爸爸在何处？妈妈又在何方？

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奶奶：“唉，我的爸爸、妈妈呢？”奶奶惊愕地一把将我拉到巷子里面，抱着我痛哭起来，她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我一边给奶奶擦着眼泪，一边哀求着说：“唉，我不问了，我不问了，我再也不问了！”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1939年，我已经是一个9岁的小姑娘了。

“儿童节”那天，像往日一样，祖母带着我到街上走一走，转一转。可那天奶奶总是不露声色地东张西望。当她看到迎面走过来的一位妇女时，突然停住了脚步，露出惊喜的目光。

这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位妇女，她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身灰色的旗袍，年纪约四十开外，人显得有些削瘦，正急匆匆地向前走着。当她发现我们时，也一下子愣住了，接着大步跑了过来。奶奶也紧走了几步，猛地拉着她的手说：“可见到你了我已经找了好几年了，找得我好苦啊！”话还没有说完，奶奶的泪水已夺眶而出了。这位妇女警惕地向左右看了看，随即小声说道：“我也正在找你们啊！”说着又指了指我说：“这……？”奶奶看了看我说：“这是沪子（我的乳名）啊！”接着又对我说：“沪子，这是你干妈。

快，叫干妈！”看到奶奶和干妈会面时激动的情景，想起了别的小朋友叫“妈妈”时的神态，我不顾一切地大喊了一声“干妈”，并立即扑向了干妈的怀抱。可是，有谁能够想到，一个将近 10 岁的小姑娘，这还是生以来第一次喊了一声“妈！”

第二天，干妈又来看我们，还给我带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并一面抱着我，一面向祖母问了问几年来我们的生活情况。奶奶一面说着一面流泪，经干妈的劝慰，奶奶才破涕为笑，说：

“这回好了，总算找到你们了！”接着又对我说：“沪子，今后要多听干妈的话。”我一边答应一边点了点头，于是，干妈把我抱得更紧了。

这一天，我第一次看到奶奶脸上出现笑容，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母爱。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位慈母般的干妈叫帅光，也就是帅孟奇。

从此，每次干妈来，我都从内心里感受到温暖和喜悦。有一次，干妈突然问我：“沪子，你现在想干什么？”

“想上学。”我不假思索地说。每当我看到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欢欢喜喜地去上学或放学回家的时候，我总是向他们投以羡慕的目光，并常想：我什么时候也能上学呢？

“那么……再长大一些呢？”干妈又问。

“穿皮鞋。”我又不假思索地说。

没想到，这句话刚一出口，干妈却忍不住地笑了，跟着又流下了几滴眼泪。因为干妈知道家中贫苦，从我记事那天起，我总是穿着一双破旧的鞋，甚至不得不拣人家扔掉的鞋来穿，何曾穿过皮鞋呵！

记得是在这年的秋天，一天帅妈妈正在和奶奶谈话，忽然听到奶奶说：“沪子的生日就要到了，眼看着她就满 10 岁了。

为了她的前途，也为了能够继承她爸爸、妈妈的遗愿，你想个办法送她到那边去读书吧！”

“是啊！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怕她一走，您不就更……”帅妈妈似乎又有些犹豫。

“这你不要顾虑。再说，十多年的狂风恶浪我都闯过来了，只要沪子将来有出息，就是天大的困难我也能够顶住！”

“那好！您真是我们的好妈妈，更是沪子的好奶奶。那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快想办法，把沪子送到那边去上学！”干妈说着说着也激动起来。

这时，奶奶笑了，帅妈妈也笑了，我更是高兴地跳了起来。

“上学！”这是我朝思暮想的事。现在就要去上学了，我又怎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呢！那天夜里躺在床上，兴奋极了，久久不能入睡。我在想：到“那

边”上学，“那边”在哪里？离这里有多远？然而在兴奋之中，我又产生了一种迷惘：奶奶说，要我“继承爸爸、妈妈的遗愿”，我的爸爸、妈妈是谁？什么叫“遗愿”？他们的“遗愿”又是什么？有几次，深更半夜我真想推醒奶奶，问问爸爸、妈妈的事，但怕再引起奶奶的伤心，我还是咬咬牙忍住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帅妈妈兴冲冲地来到我们家里，她告诉奶奶说，她已经找到去“那边”的人了。“这个人是任弼时的堂弟，叫任作民，沪子可以叫他任伯伯。

一同去的有他的夫人，叫丁祝华，沪子就叫她华姑吧。还有他们 13 岁的儿子任湘、1 岁的女儿庆庆和 14 岁的侄女任岳，一共 6 个人。路上的一切都由任伯伯和了华姑负责，您就放心好了。”并说：“我也要到那边去，到了那边我会很好地照顾沪子，您老就放心吧！”

奶奶一边听着，一边不停地说着“好，好，好”。接着她就开始给我缝制衣服。任伯伯来接我的那天，奶奶不仅给我换了一身新棉衣，还另外给我准备了一小包袱衣服。

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奶奶都一直是很高兴的，可是当我走出门口兴高采烈地回头喊了声“挨哟，我一定常来看您！”的时候，奶奶却倏地回过头去，急急忙忙擦了把眼泪，又回过头来强忍住眼泪对我笑了笑。我猛地紧跑几步扑向奶奶的怀抱，一面哭着一面紧紧地抱住了奶奶。刚毅坚强的任伯伯，眼里也涌出了热泪。最后，还是奶奶轻轻地把我推开，让任伯伯把我领走了。

我跟着任伯伯、丁华姑、任岳姐姐、任湘哥哥和庆庆妹妹，从长沙经衡阳、重庆、成都、西安，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经历了风风雨雨，终于在 1940 年的春节前夕，安全地到达了帅妈妈说的“那边”——革命圣地延安。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来到延安的当天，就听说帅妈妈已先于我们到达了。于是我急不可待地要求任伯伯把我送到帅妈妈那里。

有一次，当我看到丁华姑抱着小庆庆又亲又逗时，我忽然又想到了我的妈妈。心想：我应该问一问帅妈妈：“我的爸爸到底是谁？我的妈妈是谁？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当我带着这个疑问找到帅妈妈时，帅妈妈把我抱在怀里，语重心长、声泪俱下地给我讲述了我父母的情况。全国解放后，又通过多方面的了解，才使我逐渐解开了长期存在自己心里的这个疑团。

我爸爸叫沈绍藩，1902 年 10 月 19 日，出生在湖南长沙县北山向家坝村。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后，投身革命。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沙县委秘书、“中国济难会”秘书长等职务。1930 年 7 月，他受党中央的委派，到武汉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为了掩护长江局机关工作，他在汉口张美之巷（现民生路）租了几间楼房，将我祖母刘静、我母亲舒亚先和不满 1 岁的我接到了汉口“坐机关”。为了掩人耳目，秘书处女工作人员帅孟奇装扮成我父亲的寡妇嫂子，和我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家庭”，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

同年 10 月 19 日下午 7 时，爸爸按约定的时间到一家客栈去与苏区来的同志接头，临走时还说了句“我 9 点钟一定回来”，就匆匆地走了。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路上，他被一个叫宋惠和的叛徒认了出来，当即被宪兵抓走了，并立即把他关进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连夜进行审讯。在严刑拷打下，他不仅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而且义正词严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就这样，连续审讯了两天两夜，敌人未得到任何口供。敌人见无计可施，就在第三天下午，把他杀害了！

帅妈妈和奶奶、妈妈一直未见爸爸回来，料到可能出事了。经组织决定，分头转移，帅妈妈和奶奶去上海找党组织，妈妈带着我回长沙。可是谁又能想到，妈妈刚到长沙不久，就被警察局盯上了，并三番五次地上门追问妈妈中共长江局的机关设在哪里？都有些什么人？妈妈一口咬定：“什么长江局、短江局？我不懂！”为此敌人又使用恐吓手段，声称要拘捕妈妈，要对她施以酷刑。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为了保卫党的机关的安全，就在10月28日的夜里，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轻轻地喊了一声：“帅大姐、婆母、沪子、同志们，你们可要多保重啊！”

然后用一把剃头刀割破了自己的喉管，悲愤地以死抗敌，献出了生命！
在温馨的母亲怀抱里

学校要开学了，这对我来说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啊！就在开学的前几天，任作民伯伯还带着任岳、任湘和我到枣园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依次问了问我们三个娃娃的情况，并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使我们感到很温暖，很亲切。

今天回想起来，他老人家那高大的身躯、慈祥的面容和亲切的话语，还都记忆犹新。

我们临走时，毛主席还从衣袋里掏出几元“边币”，分给我们三个娃娃每人两元。我们就是用这两元钱，每人买了一把吃饭用的铜勺和一些本子、铅笔。

开学后，任岳、任湘去了边区师范，我来到保育小学。学完小学的基本课程后，我考入延安自然科学学院补习班，很快就又转到了延安中学。

我们在延安中学主要是学习文化基础知识，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音乐、美术等课程。我们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教室，每逢晴好的天气，我们就坐在窑洞外面，用两个木椅架起黑板，在露天聆听老师讲课；

遇到阴雨天气，就只有在窑洞里上课了。没有电灯，晚上自习时，几个人就围着一盏麻油灯，或到窑洞外面就着月光进行学习。除几门主课有油印的课本外，主要靠自己记笔记。没有实验室和实验工具，我们就用弹弓打麻雀、下水捉青蛙，一边解剖，一边讲课。就这样，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一个人懈怠，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专心致志地在探索，在追求！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把窑洞里的小板床架得高高的，在床铺下面安放了纺车，每人都学会了纺纱线。当时，根据年龄大小在生产指标上也各有不同。记得我的指标是每天纺3两。我们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很快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技术，不仅每天都能超额完成任务，而且在质量上也不断有所提高。按照当时的规定，超额部分所得收入，70%上交，支援边区；30%归自己，作为零用钱。

我们还在窑洞外的空地上种植了西红柿和土豆，我们几乎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往那容易干旱的黄土岭上提水送粪。

有一天，我好不容易抢到一个粪桶，到茅坑里掏了一桶稀粪往地里施肥，由于粪桶很重，我不得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眼看着就到地里了，没想到脚一滑，突然跌倒了，粪水洒了我一身，一只草鞋也蹬坏了，粪桶滚出好远，急得我哭了起来。这时，那些同学都跑了过来，有的说：“快回去洗洗，休息吧。”有的说：“你今天的任务我们包了。”也有的说：“鞋子坏了没关系，今天晚上我给你打一双新的。”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当时我之所以那样伤

心，倒不是因为跌疼了身体，弄脏了衣服，而是可惜那桶粪水啊！

在提倡“学习与生产相结合”的同时，学校还提出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学习了政治理论，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就按班编组，分区划片，到老乡家去做社会调查。办识字班，办冬学，当“小先生”，帮助扫除文盲。特别是到寒假期间，这种活动就更多了。如果在调查中遇到老乡们提出问题，而我们一时又回答不了时，就把问题带回去，向老师请教，或集体讨论研究，或翻阅有关的书。总之，不弄清楚，绝不罢休！

有一天，当我们到一个老乡家里去做调查时，那家的老大爷一边叼着烟袋吸烟，一边给我们讲了很多八路军的好处。他说：“就在去年秋收的时候，眼看着种的包谷（玉米）就该收割了，可是谁能想到，全家几个劳力都‘打摆子’（疟疾），整天都发冷发热的，又怎么能去收庄稼呢？就在这时，不知怎么让部队知道了。好，一来来了一个排，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家的包谷收回来了，还把包谷秆子捆好、垛好。有的同志还自己拿出钱，给我们买药，把我们的病也给治好了。你们说，像这样的军队，到哪儿去找？不瞒你们说，过去那当兵的，我见过的多了，哪个不欺侮老百姓？可是共产党来了，八路军来了，咱们老百姓就像换了个天地一样，这才叫军民一家人啊！”

说到这里，老大爷在地上磕掉了烟袋里的烟灰，略微思索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有个问题，我左思右想的，就是想不通。

你们说，像这么好的共产党，这么好的军队，那蒋介石为什么还要跟共产党、八路军闹什么‘摩擦’？还要封锁咱们边区？你们说说，这究竟是为什么？”

“他坏呗。”这时，他的一个孩子插了一句。

“他坏，这我知道。可是他又为什么这样坏？我就想不通了。”老大爷又说。

我们当时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回到学校问老师。老师听了之后，并没有直接回答我们，而是意味深长地说：“是啊！蒋介石不光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如此，就拿‘西安事变’以后的事来说吧，张学良先生可以说是光明磊落，大义凛然，可是当他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时，蒋介石却把他关押起来，这又是为什么？我建议你们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再认真讨论讨论，肯定会有深刻的认识。”

就这样，经过学习讨论，我们认识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丧心病狂、无恶不作，正是由于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后来我们又去和那位老大爷探讨这个问题，老大爷也感到豁然开朗，一连说了几句：“想通了！想通了！！”

延安中学的校园里，充满着真诚、团结、友爱欢乐的气氛，人与人的关系是那么和谐、亲密，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已蔚然成风。记得有个“甜瓜宴”的故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那年夏天，我的裤子破了。心想：“这算什么，补一补就好了。”可是一补再补，一条单裤都快变成硬板儿夹裤了，夏天穿着，真是够热乎的。就在这时，我的朋友许文英（现名舒辉）看见了，就跑到延安新市场买了块细白布，给我做了条西装短裤，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给我量的尺寸，那裤子做的不肥不瘦，穿上可“帅”了，我心里真是美滋滋、热乎乎的。

当时，我想，文英姐既然对我这样好，咱也不能知恩不报啊！我在街

头看到卖甜瓜的，就买了几个特大的甜瓜兴冲冲地给她送去了。可是真没想到，她却生气了，我轻声地叫着文英姐，她依然气乎乎地说：“你以为我给你做件衣服，就是为了让给你给我买些吃的吗？”后来，其他同学也帮助劝解，她才消了气，说：“那好吧，大伙来吃吧。”于是，我们几个同学说笑着，把那几个甜瓜吃了。这就是被称作“甜瓜宴”的故事。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学，我们真是兴奋极了！大家唱呀、跳呀、喊呀、笑呀，欢声雷动，欣喜欲狂，简直就像“疯”了一样。

但是没过多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这个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家伙却从峨嵋山上下来，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了。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二局到延安中学选调一批学生做机要工作。当时我和许文英、朱荣英等10多名同学被入选，我们毅然参加了八路军。那时，我只有15岁。

我恋恋不舍地向帅妈妈辞行，帅妈妈陪着我到延水河边，一边散步，一边深情地对着我说：“军委二局是个很重要的部门。组织上调你去，是对你的信任，一定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最后她说：“沪子，我送你一首小诗，就作为我的临别赠言吧！”她随即念道：

十五有志去参军，继承父志干革命。

钻研技术勤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

我把这首诗抄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解放战争中，一直带在我的身边。它给了我无比的勇气和信心，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1948年，在我刚满18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为祖国为人民立过功，并多次受奖。

45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延安中学那一段生活，还总是那样魂牵梦绕、兴致勃勃，还总是那样让我心怀激荡，热血沸腾。舒炜

女，延中三班学生。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在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

1991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称号。曾在《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等书刊中发表文章。

青春无悔

苏红

1945年1月我从重庆抵达延安进延安中学时，尚未满16岁。这样的年纪，却已经历了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和生活中的曲折坎坷，心中藏着不少事情。例如，跟自己的妈妈一道生活时，一直遵嘱喊她“三姨”；去狱中给二姨夫送药品、食物时，他对难友们说：“这就是我的女儿。”（这位可亲可敬、1922年的共产党员，终于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等等，等等。在自己小小的头脑里，曾有过许多不清楚的问题，但在那样的形势下，也明白询问徒增大人的担心和为难，只好不开口了。可能正因为如此，自己当时多愁善感，性格内向，比较早熟。

到延安前，我在贵阳念完了初中二年级上学期。进延安中学后，因为入学考试成绩比较好，插入五班。之后班里经过调整，一部分地方干部出身的同学调走了，我和另外的同学并入六班，于是五班不复存在。但不管是五班还是六班，反正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大家朝夕相处，学习、劳动、谈心、开会、演出……过着单纯、活跃而又很有规律的集体生活。忙忙碌碌一天下来，夜幕降临，我们女生回到自己的窑洞里，钻进各自的被窝，并排躺在一个大通铺上，说说笑笑，然后进入甜美的梦乡。这一切对我多么新鲜啊！

不管物质生活怎样艰苦，我都只感到快乐。最令人感动的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互相关心、开诚相见，洋溢着同志式的民主、平等气氛。如果彼此有什么意见，绝不会憋在肚里不讲，总是通过谈心或生活检讨会当面指出。看法不一致的话，可以当面交锋，有时思想不通，争得面红耳赤，但事情过去了，大家仍是好同志。这样的人际关系令我羡慕不已。可自己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照此办理，所以受到过同学们友好的批评，说我也许是怕得罪人，不敢大胆进行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居然变得勇敢起来，甚至渐渐地背上了能坚持原则、对人坦率真诚的美名。这名声日后几乎伴随我一生，同时，也使我为此付出过代价，吃到过苦头。但这是自觉锻炼的结果，大概是本性难移了。就这样，在延安中学的民主精神熏陶之下，我的性格变得一天比一天开朗和坚强起来，这也算是一种脱胎换骨吧。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大部头的小说，到延安中学时，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已看过不少，其中自然包括许多进步作品——

在我的长辈和他们的朋友中，不乏进步知识分子，这对我都是有了一定影响的。书看多了，作文中不免会有所反映，于是往往引起语文老师的注意。我在五班时的语文老师林耶和他的夫人林贞，六班时的语文老师叶克和他的夫人黄海，就都是经过作文媒介，与我成为忘年交的。他们经常和我谈心，谈文学艺术，谈各自的生活道路，谈思想和事业。在他们面前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总是怀着亲切的感觉，敞开思想，讲心里话，从而得到他们很多帮助。有一次，在谈心的过程中，林耶老师突然严肃地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要成为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我表示，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崇高的，自己相距甚远，此事不可能很快摆上议事日程。这确是我的真心话。老师立即指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时代要求有志青年用实际行动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不应把今天该做的事，推向遥远的未来。林耶老师始终抓住这个话题不放，反复做思想工作，我则每次都恭敬地倾听他对我的过去和现在进行详尽分析，记住他给我指出的努力方向。

当他进一步了解到我的身世之后，就更加强调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政治觉悟。

他还通过自己的老战友，帮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生父（没有想到，父亲早就在山东根据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林耶夫妇奉命调往东北接受新的任务，他们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爱护，长久地留在了我的心中。像林耶老师这样从政治上关心同学，热情做思想工作的老师，在延安中学并不是个别的例子。经过大家耐心的启发、帮助和培养，我于1946年1月在延安的窑洞里宣誓加入了衷心爱戴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对自己影响深远的、生命中的重要一页。

1947年3月，蒋介石指挥胡宗南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

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延安变成一座空城，暂时让出去，以便揭露敌人假和谈真进犯的面目，并有利于主动而又灵活地消灭敌人。为此，延安中学一分为二，其中的一部分师生，包括我们六班在内，由卢勤良副校长率领，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了日后名扬西北战场的第四野战医院。卢勤良改任医院的院长，他以极大的凝聚力，成功地把我们师生和新来的医务人员团结在一起，投入了抢救伤病员的战斗生活。我们奋不顾身，一个战役又一个战役地抢救、抢运刚从战场下来的伤病员。我们的工作受到通令嘉奖，报纸上一篇接一篇的文章宣传了我们的献身精神。而这一切，其实也是延安中学对我们熏陶和培育的结果。特别是在内战爆发之前，学校及时地进行了抗击来犯敌人的政治形势教育和思想上、组织上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积极组织大家参加军事训练，如半夜紧急集合、打背包、急行军、实弹演习等等，这些后来都用上了。

就这样，一夜之间，大家都变成了军人。但在我们心目中，老师仍然是老师，学生在战争环境里产生思想问题，还得老师来帮助解决。例如，我自幼梦想从事医务工作，认为这次可以和许多女同学一样，分配去当护士，为受伤的指战员服务，做新时代的南丁格尔，却不料分配我在院部当政治干事。我不愿在机关工作，向领导提出要求下连队当护士，理由是入党时间不长，没有政治工作经验。卢勤良院长亲自来说服我，他指出：“比你入党早的同学自然不少，但另有任务去给他们承担。”

再说，你曾经担任过校学生会的工作，参加过学校青年团的建团工作，也当过党的支部书记。部队政治工作我们都没有经验，大家都得边干边学。至于当护士的愿望，本身并不坏，不过战争时期也只好从大局出发，服从工作需要了。”当时我有一种摆不上台面的自卑心理，这就是，在延安中学时，同学们总觉得我有些“洋”，连我随学校宣传队到外面去主演秧歌剧《女游击队员》，观众里也有人议论说我“洋”。我当时想，衣帽鞋袜都是公家发的，大家一个样；至于神态、谈吐、举止，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了。也许因为自己生长在上海，开始念书又进的是教会小学，后来长期在大城市受知识分子家庭熏陶所致。我自知距离劳动人民、距离工农兵化还遥远得很，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在部队里做好政治工作呢？果然不出所料，我兢兢业业刚起步不久，便由于工作方法的简单化，而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又恰巧碰上一小部分同学不习惯军队里的上下级关系，出现了一些极端民主化的苗子。自己在院部同时兼管全院的青年团工作，于是首当其冲，压力很大，情绪上产生了波动。就在这时，院部协理员、我的顶头上司李绵老师主动来帮助我了。他在纸上写了两句话，笑嘻嘻地递过来。我一看，他送给我的语录竟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不觉笑了起来。接下去他就不慌不忙地指出了我的缺点，并分析原因，教给我工作方法。李绵老师在延安中学曾担任过三班的班主任，是德高望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之一，在当时参军的老师中，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夜行军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他，不但不要别人照顾，反而身先士卒，不断地关心大家。在做政治思想工作时，他那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特点，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我跟李绵老师在医院合作共事，得益甚多。

在院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卢勤良院长即命我下连队任指导员，去第一线工作，继续接受锻炼。连队里大部分都是过去朝夕相处的老同学，我见他

们进步很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医疗、护理、卫生、行政、后勤、思想工作都干得井井有条，心里相当感动。

我正是在向他们学习并依靠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来做伤病员的思想工作的。首先和伤病员交朋友，思想上沟通了，才谈得上管理和教育。我在医院先后担任过两届医生训练队的政治指导员。第一届的学员大都是延安中学老同学；第二届则既有延安中学老同学，也有新解放区参军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护士岗位上锻炼出来，再经过专家培训，结业后成为有处方权、能动手术的医生。这些同志利用战役间的空隙，刻苦学习基础理论，边行军、边拿着骨头钻研解剖学；边学习、边实践很快都成了医务工作的骨干力量。

回想 1947 年 3 月，我们六班同学只差三个月即将毕业，就爆发了战争。它使我们放下一切，立即奔赴前方，全心全意地为解放战争服务。我们在战争年代里所度过的这三年生活，既是医院、又是学校——这是一座更大的学校，使我们从中学到了许多在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和人生经验。

由于经历了延安中学和解放战争的锻炼，有一个时期，人们说我“政治上、思想上比较强”。我自己飘飘然地似乎觉得此话也有一定道理。凡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评价，不能不感到脸红了。记得 1958 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正遇上我的一位读大学一年级的至亲被划成右派，开除了党籍，还开除了学籍。他很不服气，跑来对我说：“党动员我们提意见，我积极响应号召，提了几点意见，你说有什么错？”听他详述了你自己那几点意见之后，我吓了一跳，想帮他改变看法，可他始终认定自己是对的。于是我告诉他：“我讲不过你，但是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对此我是很理直气壮的，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兵力、武器、财源上看，敌人是那么强大，而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却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最雄辩的历史事实，没有这一切，就没有新中国。问题是，如何治国，如何使国家繁荣富强、兴旺发达，许多有志之士能够提得出积极的建议；而我呢，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却往往是满足于“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似乎根据自己在延安中学和野战医院的经验，只要做到这点就万事大吉了。这是多么可悲哀的事情啊！如今，历史早已为我与那位至亲的对话得出结论：他被平反了，他所提的意见是对的。两相对比，到底谁“政治上、思想上比较强”，不是很清楚了么？

不管怎样，感谢生活的机遇，使我当年能够到延安，进了延安中学，参加了解放战争，从而没有虚度年华，没有辜负时代对我们那一代青年的召唤，从这个意义讲，在我肯定是青春无悔的。

我深信，青出于蓝胜于蓝。年轻的朋友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新的时代必将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而他们之中，一定会涌现出大批新时代的人才，成为智勇双全的改革派，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做出自己的贡献。

苏红
女，延安中学六班学生。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野战医院从事政治工作时，被评小功和二等功各一，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和西北解放纪念章。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之后归国，在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俄罗斯苏联文学史》。离休前任《外国戏剧》杂志主编，副编审。先后翻译过苏联话剧剧本、电视剧本、短篇小说、特写等；写过一系列介绍苏联表演、导演艺术家以及其他有关外国戏剧艺术情况的文章。

遥远而温馨的回忆齐翔安

我正和外孙女玩组合玩具，接到了《当年延安中学生生活纪实编委会》的约稿信。中学的生活已那么遥远，可这封信却勾出我的一串串回忆，是那么清晰而亲切。

—

记得我是和我们保育院小学同班小伙伴一起在 1945 年 8 月升入延安中学的。那时要升学，别无选择，只有一所延安中学。那时的升学也不像现在那么严，过了一关又一关。

不用入学考试，我们这群孩子便高高兴兴、嘻嘻哈哈地升了学。说是上中学，真正上学的事回忆不出多少，倒是想起了许许多多别的有趣的事。想了半天我们念书的教室是什么样的？好像是在山坡上的一块较大的平地，坐在小板凳或石头上。就在那儿学的代数；上语文课好像是在男生的窑洞里，挤坐着听课。

我们住的窑洞在小山腰上，这个地方叫桥儿沟。桥儿沟的名气很大，因为山沟里有一座延安唯一的洋式天主教堂，也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在地。我们常一群一伙地下山看他们排演。

比如看王大化、李波、王昆、林白、王家乙这些延安名演员排演的秧歌剧和《白毛女》及其他戏剧，有时还看他们跳舞。那些歌曲，我们差不多都会哼哼，我们向人宣扬：“我们学校就在鲁艺那儿，那些演员我们都认识。”

在延安中学念的书大概不多，记得念过代数、语文、历史、地理几门课。可我们的教师中倒有不少有名的人，像李大钊同志的女儿、女婿，肖三的妹妹；有作家、有诗人，大多是双双对对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气质、学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班上算年纪小的，不是“风头”人物，当时班上的核心人物是年长的入党早的同学，像鲍子亮、李精诚、惠庶昌。我比较顽皮、学习轻松，无牵无挂，甚至有些浑浑沌沌的。有一次课堂上，肖老师向我提问，我故意把“狼狈不堪”念成“狼狈不甚”，把“草菅人命”念成“草管人命”，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们从大后方带来不少文艺书，这些书就成了我们图书馆的藏书，有《水浒传》、《红楼梦》、《家》、《春》、《秋》，有郭沫若的剧作，甚至还有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的。我们一群女孩子看得入迷，比谁看得多、看得快，故事情节谁记得清楚，也常议论宝钗好，还是黛玉好之类的傻话。其实当时谁也没有看懂。当时也感染上点“青春小病”，如幻想、虚荣、伤感之类。有些年龄大些的同学还谈起恋爱来。惠庶昌长得俊，写得一手好字，功课好又是党员，过新年时候就曾收到好几位女同学精心制作的贺年片。我在解放后上大学时，发现我虽然只读了一年多中学，我的文学基础知识并不比在国民党统治区正规高中毕业的同学逊色。这是与当时中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大量阅读课外书分不开的。老师就住在我们窑洞附近，他们没有什么上下班。我们常到他们那儿去玩。他们常给我们排秧歌剧、讲故事、猜谜语。到了寒假，我们学校就组织秧歌队到农村去巡回演出，演《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回娘家》。我只当过扭大秧歌的群众演员，也煞有介事地用洋火棍画眉、抹红脸蛋，腰里扎上一块绸布，体验一下演员的生活。我们同学中最出风头的是李骏、孙学甫，他们演主角。我们是群众演员，玩得也很开心，到了老乡家待遇也和主角一样，米酒油糕吃个够。延安中学新年晚会也搞得很红火，猜谜、跳舞；当时我猜谜还有两下子呢！在中学时代比我们在保育院小学时讲卫生。在保小，我们姐妹几个全身长满了疥疮；一到寒假，爸爸总要在一个空窑洞烧上柴火烤我们，

然后给我们满身涂上硫磺膏；还拎着我们的毛衣往火里面抖落虱子，噼啪直响。到了中学，我们常一块到延河边洗澡、洗衣服，没有什么换的衣服，就先把衣服洗好晾在草丛上，再戏水洗澡，尽了兴，衣服也就干了，再穿上回学校。灰军衣洗得泛白，腰上束上一条什么带子，也挺美的。有时自己动手做布带凉鞋、打毛袜。延安下大雨时，延河发出水怪可怕的。有时窑洞漏雨，我们抱着被子东躲西藏。最高兴的是过年过节改善伙食，能吃上一顿大米饭、白菜粉条炖肉，有时还有羊肉。平时改善是二米饭（大米、小米混合），炒土豆丝，有的高年级的男生一边吃一边还说：“我以后找老婆就找二米饭炒土豆丝（中等偏上的意思）。”周末，我们回家也是疯玩，看大人跳交谊舞，也常看评剧。当时我父亲参加编《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岳飞》。我们和评剧院的演员很熟，有时就在台上侧幕那儿看，剧情台词能背不少。从那时起我就爱看京剧，从中学到了不少的历史知识，还看过苏联话剧《前线》，果戈理写的《钦差大臣》。在看戏或在党校我的父母那儿的小花园里玩时，也常能碰见大首长。那时，觉得大首长也是普通人，不像现在把高级干部看得那么邪乎。

入中学不久，我大姐就被调到二局做电信收发报工作。她那时只 14 岁，她没有犹豫，父母也不阻拦，直到解放后她才到工农速成中学补上了中学的课程。调她时，我懂得了什么叫参加革命，什么叫服从分配。后来，国共谈判，父亲是中共代表团的成员。父亲去重庆后，我就关心起国共谈判的大事来，我们还参加了为欢迎马歇尔将军修机场的劳动；有的同学还参加排练《黄河大合唱》。悲壮的黄河大合唱，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和语文课。直到国共谈判破裂，父亲最后一批从南京撤回延安，他是昏迷着被抬下飞机的，当时他患了严重的哮喘病。后来时局就越发不平静了。我们在桥儿沟欢迎三五九旅从中原突围归来，战士们衣衫褴褛，满面灰尘，有的受了伤，仍坚持跟在队伍后面，看到这样一些顽强的战士，我们都感动得落了泪。我们也开始备战，练习射击，练习过独木桥，练匍匐前进，练远道背粮食。我是个比较胆小的女孩，回家向父母讲述过小桥多吓人，引得他们笑话我，后来便经常叫我“小桥，小桥”。我们还搞坚壁清野，挖洞埋东西，现在想那些东西真不值得藏，只不过是个些破桌子、烂木头、坛坛罐罐，但当时我们干起来还挺认真。

1946 年底，我们延安中学的同学在一个山沟里学习做护士，练习查体温，缠绷带、消毒、换药、叠敷料、铺消毒巾等，谁知这就是我们当护士的唯一的一次岗前训练。战争愈来愈迫近，有的同学已随父母或丈夫过了黄河。我们延安中学宣布改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老师成了我们的指导员、连长，从边区调来一些医生，我也成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那时我才 14 岁。战争环境严峻，父母也不能带子女在身边；我大姐已随二局转移，不知到了哪里，弟弟随保育院小学疏散了，我要随一野战军转战西北，我们真是各奔东西，谁都顾不了谁。记得最后一次回家向父母告别时，家里满地杂物废纸、一片狼藉，父母要随中央统战部一起过黄河，那天只有我母亲在家。

我们的衣物只是公家发的几身土布衣服，妈妈也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只给了我一个旧的小搪瓷碗和一个她从大后方带来的方格大围巾。这条珍贵的围巾，后来在行军中与老乡换馍吃了。与母亲分别时实在难舍，我们也都意识到不知何日才能见面，也不知自己要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后来我竟忍不

住哭了起来。母亲只是嘱咐我不要胆子太小，要坚强，要准备吃苦。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急忙含泪朝山下跑去。那时就是我自立的开始。在随军转战陕北的3年中，再没听到过家里人的消息。

有时想家，想起一家人睡在一间窑洞里的一块木板床上，被子不够盖，盖上大衣、棉絮，我们头对脚地挤在一起；还有，用炭火盆烤土豆，煮红枣，那是父母给我们的最好的零食；想想父母心肠也是够硬的，他们总是让我们自己闯、自己锻炼，从不婆婆妈妈的。那时母亲住在党校二部，我们晚上去看她，不管天多黑，路上还有狼群，她从不留我们住宿，非让我们哆哆嗦嗦地回到自己的住处。我现在很感激她，是她使我们练就了自立自强的性格。

三

战争是异常严酷的。那时，一天常常急行军百多里地，双脚打了泡也坚持不掉队，发高烧40℃也不哼哼。我当护士每天要看护许多伤员，就借老乡的大柴锅蒸敷料、器械，算是消了毒，每个卫生队只有几支注射器、体温计，药品也只有碘酒、酒精、高锰酸钾等几种简单的药。给伤员换药多半是用盐水棉球擦洗几遍而已；给伤员开饭，就用玉米秆当筷子，到老乡家找来各种各样的碗。伤员们能吃上煮面片就是最好的饭食了。

没有床铺，没有铺盖，一群伤员挤躺在铺了一层谷草的土炕上。记得一次清涧县的攻坚战役，我护理的伤员都伤势很重，14个伤员，3天就牺牲9个，都是我自己背来背去。

有的伤员昏迷着，耳朵旁流着脓水，绿头苍蝇不停地在伤员耳朵上下蛆，我坐在旁边一次又一次地把小蛆夹走，有的伤员屁股被炮弹削去一大半，大蛆就在伤口钻来钻去，我含着泪一次又一次用高锰酸钾水冲洗。夜里人手少，常常是我一个人值夜班。在寂静的夜中，不时听到昏迷的伤员喊叫“冲呀，杀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夜里牺牲的伤员也多，自己壮着胆量顶着上夜班。后来我也染上了伤寒病，发烧一个多月，头发都脱光了，老乡哭着给我送吃的，他们抬着我行军。司务长看我太虚弱，发给我两只鸡，我让人把鸡煮了一大锅汤与伙伴们一起吃了。行军中，我们还学习了一年医学课程，自己刻讲义，还挖坟找死人骨头，用纱布包上谷草当成肌肉与骨架绷在一起做解剖模型，常在半夜到大庙里偷着做尸体解剖。最后，我终于当了医士，可以带着听诊器分清肺炎、支气管炎；能够做取弹片的小手术了。我在医训队里功课学得比较扎实，为我在解放后读医科大学打下了基础。我们还常和被俘的国民党伤兵、军官辩论，讲“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一定会解放全中国。”他们说不过我，就说：“不管你们这群小八路多厉害，我们绝不会被你们洗脑筋的。”后来，我们还参加了沙家店战斗，转战陕北，毛主席离我们很近。我那时是毛泽东思想青年团员，当时伤兵多得带不走，指导员动员党、团员留下看护伤员，我们一个个用颤抖的声音报名，留了下来。我在火线提出了入党要求，1948年2月，组织上批准了我入党，那时我才16岁。后来我们东渡黄河，过河时，后面有敌人追击，挺惊险的。

打了歼灭刘戡一仗后，日子愈来愈好，我们又回到了黄河以西。我们南下陕南，途中曾到华清池去贵妃池去去洗澡，到骊山上吃石榴，到了西安才知道什么叫电灯、电话、楼上、楼下。

平生第一次看了电影，吃了糖炒栗子。那时我那么年轻，那么不知愁滋味，但我很自豪。在宏伟壮烈的解放战争中，有我当小护士的一份奉献，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憧憬。

后来回到北京找父母，我们有的同伴上了大学，有的同伴还辗转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我最好的同学、大姐姐，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王涛英，被美国飞机炸死在朝鲜战场，一想起她，就意识到我是幸存者。当我做了点贡献，取得些成绩时，我感到，比起她来，我做得太少了。当自己看到自己拥有了一切时，我觉得我比她索取得太多了。

四

这就是我的中学生活，我的青春之歌。

解放后，我亦有大喜、大悲，大福、大祸。因有了这段中学生活的根基，便能轻松坦然地度过，且泰然处之。我最景仰大事中的默默无闻、朴实无华，骤变中的荣辱不惊。

看着膝下的外孙女，我小时候没有她那么聪明美丽，更没有她那么多的精美玩具、华丽衣服。想到我远在美国的爱子，我没有他到美国读博士生的机遇，也没有他广博的数理知识。

但我还是为他们感到忧虑。儿子到纽约肯尼迪机场送我时，我那忧郁的眼神被他发觉了。在同他相处的两周里，我给他讲道理，和他辩论，可我说服不了他。我的孩子不是不好的孩子，他诚实、热情，事业心极强，读书很刻苦，他也毫不追求物质生活。他是中美联合招收的物理博士生，在美国待遇不差，但他生活的清苦，出乎我的意料，中午只吃烤土豆、生胡萝卜、发面饼。两周中，我为他补了好几件衣服。我一生最钟情的就是我的工作和我的儿子，我要下大力量培养下一代，希望他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在离开纽约时，我对他的未来毫无把握，心里若有所失。回到北京后我很快接到了他的这样一封信，他写道：“你刚走我就十分想念你，你的双眼望着我，充满了情爱，也有些疑虑。有时候是来不及和你充分地交谈，有时又怕我有不同意见，更伤感情……望妈妈理解。关于爱国，我有很多想法，很难表述……这次妈妈来，我确实收获不小。特别是从妈妈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信心，中国人爱在心里，表现在行动上。我的信心也增多了……”我看信时不禁落泪，我很清楚他是怕我不放心，为安慰我而写的。他将来是不是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最终还要时间来回答。也许我想得不对，他们这一代以至下一代，让人担心的是似乎缺乏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奉献之情。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酿成的苦果。我们为什么只管叫他们吃好穿暖，一切替他们代劳而舍不得让他们多吃一点苦，多有一点经受磨练的机会呢？什么样的教育算成功？什么样的教育算失败？人的一生怎么算苦？怎样算甜？我的这些回忆对当代的中学生真会有启迪吗？不得而知。不过我写的这些，包括细节都是真实的。这一切，永远不会因为我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衰退而消失。

1990年11月25日 齐翔安

女，延安中学九班学生。北京医学院毕业，长期从事医学教学科研与医院领导工作，现任北京宣武医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

一段家庭对话

李凡民

我国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通讯卫星成功后，电视中的广告节目经常出现火箭发射的画面。开始，我们一家人看得新奇，激动不已。后来，看多了，也就习以为常，甚至对文艺节目中经常插播这类画面的广告颇有微词，抱怨起来。只有我这个老头百看不厌。

时间一长，孩子们纳闷儿，奇怪老爷子怎么专爱看导弹卫星一类节目。一个星期天，他们竟然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啊，人老了，爱回忆往事，再者，两代人交流交流可能对缩小“代沟”还有点好处，于是有了我和家人下面这段对话。

“话得从头说起。”我说：“40年代初，我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中学部读书，立志要当一个建设新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

女儿打断我的话说：“延安有个抗大，没听说过有个科学院呀。再说，黄土高坡，土得掉渣儿，还能培养出科学家吗？”她表情半真半假，着实淘气。

老伴冲着女儿说：“别贫嘴啦！延安不仅有抗大，还有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院，可还真没听说有个自然科学学院呢！”

“别忙，叫我慢慢给你们讲嘛！”我打断她们的话，接着说：

“抗日战争时期，徐老，就是毛选中毛主席说的他那位徐特立老师，给党中央打了个报告，建议创办自然科学学院，为建设未来的新中国培养一批科学家、工程师。党中央认为这个建议高瞻远瞩，很有战略于是创办了自然科学学院，并任命徐老为校长。”

“那么，爸爸怎么一辈子当解放军，干政法，没搞科技工作呢？”儿媳问道。

“爸在解放战争初期为打老蒋当兵参了军，后来又渡江抗美援朝，回国后上大学，学的是导弹遥控专业，可不知怎么搞的，毕业后做了政法工作。”身任工程师的儿子颇为惋惜地说了这么几句。

我随口应道：“遥控技术除了控制导弹外，在许多科技领域都有用，公安领域也有用，所以爸毕业后分配在公安部科学研究所啦，以后又转做政法其他工作，这都是党的需要嘛。”

女儿说：“学非所用。”儿媳说：“毕竟遗憾！”

“是啊！学非所用，当然遗憾，特别看到许多同学学以致用，成长为优秀的科技人才时，羡慕的心情，你们是体会不到的啊！”我说到这里，老伴插进来说：“你们年轻，不知道，过去的学生是统一分配的，没有什么‘双向选择’，战争时期更是一切为了前线，你爸念到中学三年，还没毕业就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参军打仗啦！妈妈我才念到初二就报名参军抗美援朝啦。”

我说：“对喽，当年我们争着报名参军，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压根儿就没考虑个人得失。”

女儿笑着，打趣地说：“又摆老资格啦，别尽拿老皇历唬我们年轻人，爸是从小想当科学家，上大学又学导弹，可一辈子没导上弹，所以专门在电视上过导弹瘾吧。”一句俏皮话说得全家都笑了。

我也笑着说：“是啊！是啊，是有过瘾的意思，不过还有更深刻的理由和感情问题。”

你们想想看，当年，我们党在日寇侵华和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双重压力下，在物质条件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竟然成立自然科学学院，

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培养工程师和科学家。这种抗战必胜、中国必兴的伟人预见是多么英明啊！这是何等的胆识气魄呀！当时学校经常以这个建校宗旨教育我们，所以我们这群红小鬼、小八路，坚信革命必胜，个个奋发图强，立下大志要做建设新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那时我们虽然吃的是小米、瓜菜，缺油少肉，穿的是土布、草鞋，住的是土窑洞，晚自习只能点盏小麻油灯，但学习劲头可真大，除了学数理化，还学政治、军事，参加生产劳动。我们不但会种田、纺线、打草鞋、积肥，还学会制硝、制硫磺、配制黑色炸药、能自制土地雷。军训有投弹、射击，我在全校步枪打靶中曾经荣获第三名，登上了延安《解放日报》，当时高兴得我直蹦。那时，虽然物质生活清贫艰苦，但精神生活丰富多采，热火朝天，大伙都非常乐观愉快！特别是 1945 年‘8·15’日本无条件投降那阵，整个延安沸腾了，狂欢数日，全校师生员工欢天喜地，敲锣打鼓，连夜举行火炬游行。油画《延安的火炬》，画的就是这个场面，万民欢腾，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当时，全校师生认为建设民主富强新中国的时候到来了。狂欢之后，大伙学习的劲头更足啦！都想尽快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可是，抗战胜利不到一年，蒋介石就发动内战，进攻咱解放区，要消灭共产党，把中国推向黑暗的深渊。

1947 年初，国民党军队丧心病狂地进攻延安。在中国向何处去的紧急关头，全校师生响应党的召唤，请缨从戎，踊跃报名参军。多数同志被批准参军，我也在其中。参军光荣，参军者兴高采烈，未被批准的同学思想不通，经过非常艰难的说服工作他们才从命留校，继续深造。后来这批同学许多留学苏联，学成回国后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和骨干力量，咱们现在的总理李鹏和十几位省、部级干部，还有好多专家学者，科技骨干，都是当年自然科学学院附中（以后改为延安中学）的同学。我国的导弹卫星事业，核潜艇的研制建造，都有他们的劳动贡献。我羡慕他们，敬重他们，祝愿他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立新功！我个人虽然没能实现少年时代立志作个科学家、工程师的宏愿，但是我为党能培养这样一批人才而骄傲。也为我们这批在推翻蒋家王朝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在抗美援朝和政法工作中贡献了自己力量、流血流汗的同学而自豪。我深深感激党和人民把我们这批延河边的小八路锻造成为坚强的共产党人。现在虽然我们都已年老，但延安精神永存，党心永在，有生之年将为社会主义祖国继续贡献自己的一切。”

我越说越激动，话题也是越发严肃，老伴提醒我说：“你很少这样长篇大论地跟子女们谈话，不要倾盆大雨啦，电视剧《渴望》到点儿了。”她打开电视机，恰好《渴望》开播。子女们一再表示让我今后给他们多讲点过去的事情，他们觉得蛮有意思的。

1991 年 1 月 李凡民

男，延中六班学生。曾长期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在革命摇篮里成长

鲁小林

1938 年 5 月，我与父亲、哥哥离开成都，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坐汽

车到达延安。我父亲在四川做党的地下工作，这次是组织上调他到延安学习。

我和哥哥鲁大林，在延安鲁迅小学（后改名延安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读书。进校头一天，老师问我年龄，因为父亲常年在外为革命奔走，很少顾家，一时想不起我有多大，就指着一个高矮和我差不多的男同学，问：“你多大啦？”“7岁。”

父亲就给我报了同样的岁数。解放后，我哥哥回老家找到了家谱，才知道父亲给我少报了两岁。

1942年8月，保小毕业以后，我到了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先在初中部，后在半工半读班），不久又转入延安中学。这几所学校给予我的革命的启蒙教育，为我的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

长大了，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

国民党反动派，要建设共产主义鲁迅小学，有二三百个娃娃，绝大部分是前方干部、地下工作者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为了避免日寇飞机的轰炸，党中央决定要我们学校搬离延安城。娃娃们有的骑毛驴，有的坐驮子，小小年纪就踏上了战斗的道路。刚转移到安塞，延安就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炸死了还未来得及转移的一名小同学和一名工作人员。

从此，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对日寇的仇恨种子。

鲁迅小学搬到安塞县白家坪村以后，改名为延安保育院小学部。为什么要改校名呢？说来还有一段来历。当时听说，宋庆龄要办慈善事业，改名保育院小学部，可以纳入全国慈善机构，可以争取到国民党的钱、药和衣服。为了迎接国民党官员的视察，学校还给我们上统战课，教我们唱国民党党歌，画国民党党旗。我们这些娃娃，有不少是烈士子女，自己的父母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们能接受这些吗？教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我们就改成“杀民主义，无党所作……”；画国民党党旗，我们也画得乱七八糟。直闹得老师再也教不下去了，受到政治辅导员的批评。

为了准备应付国民党官员的视察，还要注意保密。为避免在蒋管区、敌占区的父母受到迫害，我们都改了姓名，改了年龄。我改名鲁小林，我哥哥改名鲁大林。

学校做了准备，但国民党官员并没有来。如果大驾光临，非闹出笑话不可。

“保小”的宿舍分成四个区，分别命名为“团结”、“勇敢”、“友爱”、“活泼”。

我在“友爱”区。那时候，大班同学住在山上，小班同学住在山下，都住的是窑洞。吃饭以前，我们都唱《吃饭歌》：“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当加倍地努力，服从纪律，努力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吃饭，要自己背粮，差不多一个月背一次，粮库在五里外的真武洞。先是大班同学去背，后来我长大了也去背粮。用一条裤子，把两条裤腿口扎紧，里面装上粮食，再扎紧裤腰，把两条裤腿分跨在两肩上，就像脖子后面骑着个人。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延河滩，就这样走啊，走……

哲学家何思敬的两个儿子和我们一起学习，大儿子叫何柏仁，小儿子叫何健文。有一天晚上，何柏仁起来到窑洞旁山坡上小便，忽然听到野狼的嚎叫，他急忙跑回窑洞，不小心碰在炕沿上，膝盖碰破了。第二天，他照样去背粮。由于刚发过山洪，延河上漂浮着牛粪、马粪，过河时他也没理睬，

结果膝盖伤口感染，得了破伤风。把他抬到边区医院后，抢救无效，他小小年纪就不幸离开了我们。

这件事发生以后，每当晚上临睡前，老师就在每个窑洞里放上尿桶，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何柏仁的父亲来到了学校，怀着沉痛的心情问同学们：

“我的孩子如果没有死，长大了以后能不能当共产党员？”大家齐声回答：“能！”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最热爱的是共产党，最痛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学校开过两次追悼会，也使我终生难忘。

有个王老汉，是陕北红军刘志丹部下的一名排长，在和白匪作战中头部和腿部受伤，膝关节留下伤残。他在“保小”，一年四季，赶着一头小毛驴驮水，保证不误做饭、烧水。春、夏、秋、冬，从早到晚，他都拖着伤残的腿，往返于延河边到白家坪之间。他辛辛苦苦，默默无闻地为我们同学驮水，冬天穿着破棉袄，西北风也没有阻挡住他的脚步。我们这群娃娃，对他非常敬爱。他病逝以后，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介绍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我们都流下热泪。

同班同学张仲华，出生在监狱里，他的母亲是烈士。这个八九岁的小同学，学习很好，但身体很差，因为他生下来就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病情发作时疼痛难忍，他的喊叫声真使我们不忍心听。他病重时，为了照顾他，让他单独住一个窑洞，由专人护理。可他，还是去世了，小小年纪，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他母亲和他的生命。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我们一边流着泪，一边用白色的野菊花和白纸做花圈。美术教员宋业峰还给他画了像，他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艰苦，但充满乐趣……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的是小米、红豆，或用发芽麦子磨的面，还有用黑豆磨的豆浆。当时，因为缺少粮食喂猪，很少吃肉。没有菜吃，就到地里挖灰灰菜、苦菜等野菜吃，嘴馋了就到山上摘酸枣吃。

有一件趣事使我至今难忘：在自然科学院，有个喂马的四川老头，人们叫他“老弟娃子”；他呢，也就管我们这些小同学叫“小弟娃子”。他爱马胜过自己，喂牲口特别精心。

当时，我们这些小鬼常常感到饿的不得了，嘴又馋得很，就去偷喂马的黑豆（炒熟的料豆）吃。“老弟娃子”发现了，抓住我们就用扫把“教育”我们一顿。偷吃喂马的料豆，真比偷他的口粮还叫他心疼呢！

有一天，一个刚从大后方来的同学心生一计，他口袋里经常装着一盒万金油，说是要给“老弟娃子”治眼病。先用万金油抹脑门、抹太阳穴，清凉凉的，抹得“老弟娃子”挺舒服；再用万金油抹眼角，这么……一抹，“老弟娃子”的眼睁不开了，直淌眼泪。就在这时，我们一哄而上，抢走了半麻袋黑豆。这下可把“老弟娃子”肺气炸了！

看他这样，我们大家商定以后不再偷黑豆吃了。可没想到“老弟娃子”也想出一条妙计，把黑豆掺上了马粪，从此再也没有人偷吃黑豆了。

后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活好多了。别看我们是“小土包子”、“小穷棒子”，一个个长得可结实呢，小脸蛋红扑扑的。

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充满了团结、友爱和乐趣。

学校开运动会，没有运动场，就等老乡们秋收以后，平整种庄稼的土地，当作运动场。没有木料，做不成单杠、双杠，我们就比赛百米、千米、跳高、跳远，还有三足竞走。我和哥哥的三足竞走，动作协调，配合默契，每次都得第一。还有跳跳马，一个人弯下腰当木马，一个人从他身上跨越过去。运动场上，总是响起一片欢乐的笑声。

我们还经常看电影。因为没有电影院，要在晚上沿着延河边“夜行军”，从白家坪走到真武洞去看电影。那时候，演的多半是苏联片：《夏伯阳》、《粮食》、《列宁在十月》。电影放映机是手摇发电，放的无声电影。有时有人解说，“这是夏伯阳”，“这是列宁、斯大林”。看完电影，时间很晚了。我们这个娃娃队伍，一个牵一个，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回到我们住的窑洞已经半夜了。

在延安中学学习时，鲁迅艺术文学院也住在桥儿沟。“鲁艺”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经常在一座破旧的天主教堂里排练和演出。我们下了课或自习以后，就跑去观看，跟着学。

那时“鲁艺”演出的主要剧目有：《白毛女》、《惯匪周子山》、《黄河大合唱》……，我们有的同学还当过配角呢。我虽然没有演过配角，可是跳过霸王鞭。至今回想起来，那种乐趣依然会使我返老还童。

我的志愿是长大后当一名工程师，建设新中国

我从小爱做工，对工人做的各种手艺最感兴趣，总想着长大了当一名工程师。

在“保小”的时候，我们这些娃娃爱弹珠子。我就从延河的河滩上拣来各种各样的花石子，磨呀磨，磨成溜圆的珠子。小同学看了非常喜爱，提出要和我“换工”，也就是他们粗磨，我来精磨。就这样干，竟把一块大石头磨出一道沟，手指头磨脱了皮，露出了肉，仍然磨个不停。老师见了不让我们玩珠子，一来会磨破了手；二来弹珠子总要跪在地上玩，会把棉裤磨出大窟窿。可是玩自己做的玩具最开心，有时就不大听老师的话了。

后来，在自然科学学院半工半读班学习的时候，学校办了一个实习工厂——机械厂。

当时教我们做工的李华楫老师，是大后方来的技术工人。我们这些小徒工，把社会上用过的铜钱回火，用人工摇轧机把铜钱轧成条，再用手摇冲床冲成军衣上用的扣子。我们还学会做医院用的镊子，就凭手里的锤子、钳子和锉，把锻过的铁做成镊子，然后再镀上铜和镍。那一枚枚扣子和一把把镊子亮晶晶的，是从我们这些小徒工的手里造出来的，这也是为支援抗战做出的一份贡献。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我们还学会了种地、纺线、搓麻绳、做鞋、拧毛线，织毛衣、缝棉衣。为了施好肥，我们用手捏粪球，放到犁沟沟里，谁也不嫌脏。学习苏联农学家米丘林园艺法，我们把土豆秧和西红柿秧嫁接起来，上面结西红柿，下面长土豆。这也算是一项科学小实验吧。看到同学们搓麻绳、纳鞋底又慢、又费劲，我就发明了搓麻绳机，用绞车把两股麻线合成一股；还发明了夹鞋底用的夹板，这比用手捏着鞋底来纳省劲得多。

在延安中学的时候，冬天取暖有了煤。我又在砌炉子上动了脑筋：怎么样才能燃烧得充分，没有烟，又没有煤气呢？我设计的炉子，炉口和炉底小，炉膛大，炉子下边的空间也大。这样，氧气供应充足，火苗在炉膛里旋转燃烧，温度高，没有烟。

我和哥哥偶然从一本杂志上看到滑翔机的模型，就照着画下来。把橡皮筋绞紧，当作发动机；用纸壳或削薄了的松木板做成机翼和机身。我站在山上把滑翔机放下去，飞得既平稳、又轻快。看热闹的娃娃们越聚越多，山上山下都站满了。大家跑到山下去拣，又跑回山上来放。如此反复，其乐无穷。

数学老师艾堤，从大后方带来一把小提琴。他非常喜爱这把提琴，他的名字或许与此相关。我盯着这优美的流线型的琴体，听着那令人心驰神往的琴声，忽然萌发了要自己造一把小提琴的念头。如果自己做一把胡琴，还比较好干，要造一把小提琴，又谈何容易！

我再三央求，才借到艾堤老师心爱的提琴，照着画好图样。我哥哥找到一块红松的枕木，把它锯成两半。我们把割草的镰刀磨成圆刨刀，一点一点地抠呀，挖呀，这可真要拿出“铁杵磨成针”的毅力呢！直到抠成两块提琴壳，再用胶把它粘起来。琴弦呢，就用羊肠子作低音弦，又拣来钢丝作高音弦。一把小提琴，总算做成了。

我们放弃了一切玩的时间，经过半年的辛勤劳动和精心雕琢，终于做出了这把小提琴。当我把这小提琴送到艾堤老师面前，请他试拉时，他惊喜地发现，这些“土包子”竟有如此大的能耐！这把土提琴的“音色”还蛮好哩！

在日本投降以后，我随学校去张家口前，将这把小提琴送给了我的姐姐。后来才知道，姐姐曾把这把小提琴送到边区大生产运动展览会上展出，并引起轰动。国民党占领延安以后，这把小提琴就不知下落了。如果现在还保留着，那该多好哇！

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会干，就去学；学会了，就去干。我上的虽然是初中部和半工半读班，却在实践中学工又学农，搞生产又搞科学实验，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实践观点和集体观点。

全国解放以后，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我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一名工程师。我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在科研、生产岗位，在工业战线，我把人民赋予我的知识运用于为人民造福的“四化”建设，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竭尽一片忠诚。

鲁小林

现名曾宪林，男，延中三班学生。曾任晋察冀边区军工局十五兵工厂机工部副主任。

1950年入华北大学工学院学习。

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斯大林机床与工具学院。回国后，历任大连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旅大市机械局副局长，机械工业部北京机床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机床局副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现任轻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中共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永不熄灭的火种

——记新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师彭士禄金茂年

彭士禄，一位瘦小精干的广东人，爽直乐观又沉默寡言、腼腆内向，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身上燃烧着一团火，这团火，是那样炽烈，那样熊熊不息！

星星火种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同志，1922年领导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并创办了农民讲习所。1927年在海陆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后来，彭湃同志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不幸于1929年被反动派逮捕，英勇就义。彭士禄的母亲蔡素屏在1928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后，即被反动派杀害。反动派要斩草除根，年仅4年的彭士禄也在敌人的搜捕中。他是烈士留下的一把根苗，是革命的星星火种。老百姓悄悄地把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了他。先后有20多位父母收养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给他增添了更多的母爱。在潘舜贞家时，他唤潘舜贞为姑妈。姑妈待他特别好。

当时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鹅肉，她叫彭士禄吃肉，却叫7岁的亲生女儿啃骨头。小士禄也很懂事，有了好吃的和小姐姐分着吃。1933年，由于叛徒的出卖，8岁的彭士禄与姑妈一起被捕，在狱中他又遇到另一位住在山顶的阿妈，他和两位妈妈一起坐牢。牢房的难友们知道他的身世以后，共同凑钱给衣服褴褛的小士禄做了一件红格子上衣、蓝格小布裤。女牢里有位大姐常给他讲红军的故事，讲红旗，她说红色意味着革命斗争的烈火，意味着人民群众赤诚的心。士禄穿上红格子衣服，铭记着红色，心中燃烧着不熄的火焰。当年，反动派的《南山剿匪记》和《广州民国日报》中刊登的“共匪彭湃之子被九师捕获”中的照片，就是彭士禄穿着这套难友们为他捐赠的衣服照的。

彭士禄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总是说：“我是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老百姓对我这个烈士遗孤好极了，他们自己没吃的，却让我吃饱。有的人为掩护我坐牢，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我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价才保护下来的呀！我对人民永远感到内疚，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待我的恩情。”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彭士禄燃烧自己，奉献自己的力量源泉。

这段历史还铸造了彭士禄最基本的性格：善良、正直、大公无私。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过“私”字这个概念。在延安中学时，发了津贴，他就买红枣大家一起吃；今天你吃我的，明天我吃你的。三十多年以后，他当了副部长，东西还常常被拿去“共产”，从鞋子、衣服、打火机到烟、酒、茶，谁需要谁就拿去。

难怪广东的侄女托人给他带月饼来，特别写明由他爱人收，不让他拆封，怕他又“共产”了。他总是关心别人。在四川，一位同志家庭生活困难，他送去了150元；在武汉，一位技术员的母亲去世了，他也让妻子送去100元；他出国回来，彩电票和美元让给司机去买；一位出色的技术工人患了心脏病，要见老领导彭部长，他得知后立即驱车百余里前去探望。

“干，就一定要干好！”

1940年周总理派副官龙飞虎将彭士禄接到重庆又转送到延安。刚到延安时，彭士禄不会讲普通话。青年干部学校参加下乡宣传，演话剧，导演让他扮演国民党兵，说只要他抱着枪从舞台一边跑向另一边就可以了。彭士禄当时却怎么也想不通：“我从小受国民党迫害，我怎么能演国民党兵呢？真

倒霉！”但转念一想，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需要我演，我就得演好！于是他认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也许因为他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一到延安，他就显得很成熟，性格内向，不大活泼，有些腼腆。和他先后到达延安的那一批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虽然也都穿上了灰军衣，个个成为一名小战士，却时而露出孩子的天真和稚气。他们无拘无束，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大都是中央首长家中的座上宾、小食客。这中间却很少见到有彭士禄，他独自一人留在学校里自己读书或劳动。周总理、叶帅、蔡妈妈、帅妈妈等许多领导同志都很关心他，经常叫他去玩，他却很少去；他不愿意给首长们增添麻烦，更不肯去分食他们仅有的一点营养品。有一次，邓发、贺龙同志在党校吃狗肉，专门派警卫员来叫他，他才跟着去了。

刚到延安中学读书时，彭士禄学习很吃力，因为他过去只读过两年书，上课都听不懂。但是他这个人有个倔脾气，不干则已，“干，就一定要干好！”他的数学基础差，没学过几何就要学三角，什么 \sin 、 \cos ，弄得他都糊涂了。他着急地问老师：“为什么叫 \sin 、 \cos ？”老师反问他：“你为什么叫彭士禄？”告诉他，三角公式要下功夫死记硬背。于是他刻苦努力，终于在期末考试时获得了“优秀”的评语。当年背的三角公式至今还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现在，他脑中储存、排列和推导出无数的数学公式，然而他说，基础是在延安中学打下的。

彭士禄有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理解以后再记忆，弄不懂决不囫圇吞枣。对一个问题，他常常举一反三，反复思考，反复演算，反复验证。

彭士禄所在延中二班的同学，大多是烈士子女、干部子女，也有“小八路”，年龄参差不齐，有的还不懂学习的重要，往往时间抓不紧。彭士禄担任第四组组长，第四组成了全校的模范小组。他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照检查自己。

彭士禄在小组会上说：“我们的父母亲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才换来这个学校，要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对得起党？”这番话打动了在座的每个同学。黄鲁流着眼泪说，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要大家看他的行动。林汉南决心改正不注意听讲的毛病。同学们还提出了“互相帮助、有问必答”的学习方法。大家在课下一起研究问题，解答疑难，做到把老师讲的每堂功课彻底消化。这样就解决了他们之间程度不齐的问题。同学们热情高涨，齐步前进。

第四组在全校是学习模范，劳动和团结也是模范。那时在劳动生产中一般同学纺毛线半天可纺二三两；彭士禄、黄鲁给纺车加上加速轮，半天就可以纺半斤线。彭士禄除了做纺车，还拢马尾巴做牙刷，自制牙膏等等。第四组同学互助好，男同学为女同学下山打水，女同学给男同学拆洗被子、补衣服。他们的三架纺车一齐转，一周就纺了8斤毛线。谁的衣服单薄就先给谁织毛衣穿。那一年，他们每人都穿上了毛衣，还戴上了毛手套、穿上毛袜子，暖暖和和地过了一冬。彭士禄开荒种地不怕吃苦，老实肯干，像一头老黄牛。细活他也样样在行，从打草鞋、做布鞋到织毛衣、绣花。他还自己动手制做了胡琴、三弦和小提琴。他说：“我不会跳舞，见了女同学就脸红，我当个吹鼓手吧！”因为学习、劳动样样突出，彭士禄和陈涌岷被选为模范学生。

彭士禄的第四组的事迹很快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在延安各

学校形成了一个学习的热潮。怪不得 40 年以后，曾在延安保育院学习过的一位同志遇到彭士禄时打趣地说：

“你就是彭士禄呀！你的大名我们早就知道了。当年你可把我们整苦了！”原来，40 年前延安保育院的同学年龄小，大都淘气，不知道好好学习，为此，老师叫他们学习《解放日报》上那篇通讯，还要求他们背诵，把他们搞得好生紧张。

“人不怕死，就死不了！”

1939 年，彭士禄才 14 岁，听说广东东江纵队打仗勇敢，他就和堂弟彭科悄悄从彭泽民先生家中逃出来，离开香港，到东江纵队当了一名战士。不久身体瘦弱的彭士禄患了疟疾。地下党多方寻找，才把身患重病的彭士禄接回香港，给他治病。

1940 年，彭士禄好不容易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又是先学习，他早就按捺不住心中那团火了。他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一心想工作，想革命，老让我学习干什么呀？”1942 年，由于战争的需要，从学校调一批人到中央医院当护士。彭士禄自告奋勇首先报了名。他立志要做一名好护士，然后做一名好医生，为战士服务，为革命服务。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同学都去当了护士。

彭士禄在内科、外科、妇科、传染科都学习和工作过。其中还有一件事让他很得意呢！他说，贾芝老师的大女儿，是他第一个抱到这世界上来的。四十多年以后，他向贾芝老师说：“我是第一个抱你的女儿的！”语气之中还似乎有一种自豪和神秘感。

而贾芝同志对这件有趣的事过去竟一无所知呢！在医院里，他每天给伤员病号端屎端尿，洗衣喂饭，不怕脏、不怕累，很快获得了模范护士的光荣称号。然而，他的身体也累垮了，经常吐血，经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结核。当时缺少医药，肺结核在那时被认定是不治之症。医生嘱咐他不能游泳；不能晒太阳，不能爬山。彭士禄的想法不同，他偏不信邪，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他不怕死！游泳照游，爬山照爬，太阳照晒，没想到两个月后病倒好了。他说：“人不怕死，就死不了，这是一条真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与他同时住院的一名战士患了气管炎，被误诊为肺结核。这位战士知道在当时这是不治之症，非常害怕，天天在那儿等死，瘦得皮包骨，眼看就不行了。一天，来了一位高明的医生，说他并不是肺病，而是气管炎，他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不久，病就好了。

可见心理作用很大，怕死没病也会吓死。

蔡畅和贺怡同志知道了彭士禄患病的消息，非常着急，先后赶到医院去看他，问他为什么不告诉她们？还问他当护士为什么不事先征求她们的意见？她们让他病好了就赶快回学校读书。

但他病好了后仍不肯回校，还留在医院干。最后是中央组织部下调令，调他到桥儿沟延安中学学习，才结束了他这一年半的护士生涯。到延安中学后，彭士禄又成了模范学生。1945 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七大党章规定党员要有候补期，由于彭士禄表现突出，破例免去预备期，1945 年 8 月 1 日，他一入党即为正式党员。

30 年后，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彭士禄，还是那种不怕死的性格。他一头扎到工地上，简直把命都豁上了。

他患有胃病，胃疼了二十多年，但从不看病，只顾工作，毫不顾及自己。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彭士禄病了，他胃疼得厉害，额头上渗出

豆大的汗珠，汗水湿透了全身。他被抬到工地医务所，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时处理就有生命危险。领导和同志们焦急万分，立即与北京联系。北京闻讯后，由海军首长派专机将海军总院外科骆主任和麻醉师送到工地。手术立即在工地现场进行，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手术时，医生还发现他的胃上还有一个已经穿孔而自身愈合的疤痕。

医生说：“彭士禄的忍耐力太强了！”他还是那句老话：“不怕死，就死不了！”特殊的性格锤炼了他的忍耐力，也铸造了其特殊的生命，他确实死不了。手术后第三天，海城发生强烈地震，他被同志们用担架抬着抢出来，送上飞机回到了北京。在海军医院住院仅仅一个月，他又开始了他那超负荷的工作。医生要他少吃多餐，一天4~5餐，他哪有时间，一上班就又仍然是三餐普通饭；也怪，他的身体接受了，适应了。

“怕困难，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嘛？”

彭士禄从小有一股敢于冒险的精神，只要对人民有利，他就肯去冒险。还是在他患肺病期间，医生给他的三条禁令中有一条是不准游泳。那年延河正发大水，一位老太婆的孩子冲到了河里，彭士禄听说后，凭借从小练就的一身好水性，他潜入深水中，几次潜水，终于捞出了孩子的尸体。老太婆非常感激他。彭士禄后来说：“我喜欢见义勇为，喜欢帮助弱者，我潜下水去就是捞不着心也安了。因为我尽了责任。这个风险值得冒，必须冒，我喜欢冒风险！”

“冒风险”也是彭士禄一个突出的性格特征。他常常说：

“干事业，哪有不遇到困难的？怕困难，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嘛？”

1958年，中苏关系紧张时，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核潜艇，我们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彭士禄同年回国就到核工业部工作。

1965年，周总理批准核潜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马，彭士禄作为总工程师亲自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他说：“不可能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没困难，不冒风险，还有什么创新呢？”为此，彭士禄得了一个雅号：“彭拍板”。在选用我国反应堆工作压力时，他不迷信成功国家的数据，凭自己多年的经验和周密的计算，把200个大气压降为140个大气压。他冒着风险拍板了，事实证明他对了，后来，那个国家也调整了自己的数据。模式堆最后一道安装工序发生公差，彭士禄领着“敢死队”奋战了七天七夜，直到最后一只元件盒入堆。然而有人谈堆色变，担心会发生爆炸。

面对全国2000多生产厂家和研究所研究制造的这些设备，谁敢承担这个风险呢？周总理再三嘱咐：“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这话语重千斤，责任与义务都不容推卸。彭士禄经过反复核算论证，又拍板了。在安装焊接出现问题，有人提议报废时，还是彭士禄拍板，不惜一切代价抢修，又是一个星期的不眠之夜。1970年8月，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满功率运行。1971年8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驶向大海。谁能知道在这6年的研制过程中，作为总工程师、总设计师的彭士禄拍了多少次板？承担了怎样的风险和责任？有人说，彭士禄天不怕、地不怕、胆子撑破天。是的，为了事业，他胆大包天，他从小默默地承受着与他的年龄、与他瘦弱的身体不相称的重任和磨难。

总是这样超负荷地运转，就是机器也报废了，何况一个血肉之躯，一

个常人？他为什么不声不响，从不诉苦呢？

难道他没有苦闷、思虑和怀疑吗？他爱喝酒，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莫非他在拍板的时候也有几分怯懦和犹豫？也许他也在寻找一种力量和支持呢？武松如果不是多喝了几碗酒，醉闯景阳岗，也未必能赤手空拳打死那只猛虎，苏联撤走了专家，中国一无技术设备，二无片纸资料，三无前人经验可循，士禄怎么就敢在这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屡屡拍板呢？那不可能是十拿九稳的拍板，他说有七分把握就拍板，那剩下的三分力量又从哪里来呢？我总觉得这似乎和酒有点什么奇妙的联系，这里的奥秘还有待于研究酒文化的人去揭开。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徐特立同志在延安革命教育工作中曾提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原则。延安中学的师生正是遵循这样的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培养了一代青年。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彭士禄一直把这三条作为他做人的准绳。

彭士禄有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妻子和一双儿女，妻子为他掌管着一切，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妻子心脏病严重，几次病危都悄悄住进医院，不肯打扰他。他忧心如焚，时刻惦念着爱妻，然而却无法陪伴和照料她，尽一个丈夫的责任，他照样得出差，照样要去工作，他认为那里更需要他。他无暇顾及这个家，他心中只有工作和事业。

在彭士禄搞核潜艇最紧张、也是最关键的日子里，他的 96 岁高龄的祖母——彭湃同志的母亲，为革命献出了 6 个儿子和媳妇，却被污蔑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弟弟彭洪被拉回海丰批斗几十次，“自杀”身亡；曾与他一起参加革命的堂弟彭科的首级被造反派悬挂在海丰县城楼上达 3 天之久。这消息太残酷了。彭士禄本人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三代人牺牲的代价换来的是什么？然而耻辱和冤屈没有压垮彭士禄，他没有吭一声，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他一天也没有离开他的事业，一时也没有忘记核潜艇。他曾几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但却只字未提自己家中的不幸。周总理和彭湃是好朋友，1924 年总理从法国回到广州，是彭湃到码头上去迎接的，还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总理住。总理和彭湃同志一起领导南昌起义，一起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彭湃牺牲时，总理悲痛万分，发出了告全国人民书。彭士禄一家再次遭到非难时，他却悄悄地瞒着总理，不忍让日理万机的总理为自己的家庭操心。总理从别人那里知道了情况，立即把他的祖母从海丰接到广州，保护了这位革命的老妈妈。在一次会议结束时，总理紧紧握住彭士禄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彭，记住，你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名换姓！”

彭士禄天不怕，地不怕，是一名铮铮铁汉，然而在荣誉面前，他却那样腼腆，那样羞涩，总是藏着、躲着。他经常忙碌在工地上或出差在外。参加国家科学大会时，稀里糊涂被叫去开会，他还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受奖者。后来，他又一次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从不追求名利，不考虑个人得失，然而荣誉却悄悄地公正地来到他的身边。

从 1939 年彭士禄跑到东江纵队参加革命开始，50 多年来他没向组织提出任何一点要求。别人住房越调越大，他却说自己家人口少，主动由 7 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什么时候长工资，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他一概不知，也不打听，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 1958 年回国定级至今他只调过一级，他绝不伸手。他说：“党给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

他给不少单位当顾问，但从不领取报酬，他说：“对国家有利，不比那几分钱更有价值？”

彭士禄火一样的精神，曾在那个真理被扭曲的年代，激发了核反应堆工地上 8000 多人心中的爱国热情。这支队伍中有“臭老九”、也有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有走资派、保皇派，也有造反派和逍遥派。大家统一到一个大目标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的“718”批示，于是奇迹发生了，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仅用了 6 年的时间，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了。

在外国人眼里这不能不是一个谜。其实谜底很简单，就是无数像彭士禄这样的科技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燃烧自己，奉献自己的结果。

核潜艇成功了，彭士禄跟着又投入了研究和创建核电站的工作，大亚湾和秦山都有他坚实的足迹。彭士禄已经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但他的脚步仍旧没有停下来，他仍然日夜奔波着、劳碌着。他说：“我父亲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驱者，开创了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纪元。我远不如我的父亲，我要学习他的精神，为中国核动力事业拚搏，甘当中国核潜艇、核电站的开山、铺路人，甘当老黄牛。”是的，他是属牛的，牛一样的性格，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汁，他与人无争，与世无求，默默地耕耘着，奉献着。

1991 年 7 月 5 日 彭士禄

男，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延中模范学生。1951 年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6 年毕业；后又入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原子能动力专业，1958 年毕业回国。曾任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船舶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造船工业部、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总负责人，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第二主任。现任核工业总公司顾问，秦山核电站联营公司董事长。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优秀总设计师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生活再苦心也甜

黄毅诚

边区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边区人们的精神是充实的。

每当我回忆起边区的那段生活经历，总是那样令人记忆犹新，往事历历在目。

1942 年、1943 年，抗日战争面临最严峻的形势，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处在了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用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

然而，就在那种环境之下，我们没有悲观。凭着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我们在延安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解决吃穿，支援前线，生活再苦心也甜。

没有大米，白面每月也只能吃上一顿，几乎所有的主食只有小米。于是，我们在同学中间发动搞民主选举，推选伙食委员管理伙食。大伙选得认真，当选者也开动脑筋，千方百计搞好伙食。有位姓许的同学当选伙食委员

后，干得比较出色，受到大家的赞扬。

他把仅够吃一顿的白面分成几份，白面里包上炒熟的小米，起了个文雅的名字叫做“银包金”。同学们一个月可以吃上好几次“银包金”，大家嚼得津津有味，人人赞不绝口。

菜的花样则更多。有一次，同学们看到菜谱上有一个汤叫“青龙过海”，谁也猜不透青龙指的是什么。等到开饭时，大家一看都乐了，原来汤里躺着一根大葱。通过民主管理，大家动脑筋，人人显身手，粗茶淡饭也有味，革命精神乐无穷。

在延安，我们的学习任务是很紧张的，但是大家一刻也没有忘记共同的革命目标，人人都争着多做贡献。同学们个个都学会了纺线，并且千方百计为多纺线、纺好线出谋划策。

下雨天，室外不能纺线，我们就动脑筋想办法，把睡觉的床升高 1 米，变成小阁楼，纺车放在床下面。床抬高了，我们为上床专门设计了一个小梯子，既简单又实用。下雨天我们也照样可以纺线了。为此，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天，有位姓杜的同学因为身体重踩断了梯子，卡在梯子晕了过去，大伙儿一下慌了手脚，乱成一团。

不一会儿，那位同学自己醒了过来，大家虚惊一场。

回首往事，我们从小离开家乡，生活在艰苦的环境里，可以说是不幸的。但是，我们生活在党中央身边，受到严格的革命教育、训练和考验，我们又感到由衷的幸福。多少年来，延安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们生活、战斗和工作，并在几代人中间继承、发扬和光大。我们的党遇到过多少次艰难险阻，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硬是靠小米加步枪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党中央、国务院正领导我们向第二步战略目标迈进，虽然我们面临不少困难，但也有很多有利条件，社会主义制度也还有许多优越性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应该发扬当年的延安精神，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黄毅诚

男，曾用名黄鲁，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1951 年赴苏联进修汽轮机设计与制造。回国后，参与并领导了我国第一台 2.5 万、10 万、20 万瓩汽轮机的设计制造。曾任厂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现任能源部部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动力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高级工程师。

在延安炼铁厂实习

戚元靖延中生活片断

1943 年秋，延安自然科学学院与延大合并。自然科学学院从延安南门外的杜甫川搬到延安以东十里的桥儿沟，我们预科班转并到延大中学部。我们二班的班主任是贾芝同志，他还兼教语文。我们搬到桥儿沟的头一个任务就是自己动手整修窑洞，拓宽小路，平整窑洞前面的场地。我们二班的男同学都集中住在后沟东山坡的五六眼窑洞里。和我住一个窑洞的还有杜钧、邵文炳、

李世滨等同学。为了加大窑洞内的活动面积，我们把床铺做成高架式的，用两根木椽架在窑洞的墙壁里，上面铺上木板。床板离地 2 米来高，这样，七八个人一个小组在窑洞里学习、开会、纺线、干活都能转得开。窑洞外面有一块小平地，我们把它扩整得很平，约有八九十平方米，天气好，我们就在这里上课、学习，纺线、劳动。

我们的文娱活动也是丰富多采的。一班的陈祖泽带头制作二胡和小提琴，而且越做越精细。不少喜好音乐的同学都动手做起来。我和几位同学也做了二胡，还把葫芦瓢破开，粘上一块木板，制作成土提琴。不久，各种小乐队也应运而生。

晚饭后，在桥儿沟到处可以听到悠扬的歌声和乐曲的演奏声。

我们还经常到沟前我们的邻居鲁艺去看他们排演的歌舞剧、秧歌剧。我们二班的几个同学，在谢绍明同学的倡议下还自己编了一个秧歌剧，题材是谢绍明提供的，是陕北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发生的一个故事。参加编剧的同学记得还有牛旭光、续磊、刘朝兰等。我们二班的一些同学排练和演出了这个秧歌剧。

在延安炼铁厂实习

1944 年夏，我和二班的几位同学被派送到自然科学院继续学习。我们编在化工系二班。这时，自然科学院已搬到北门外的大砭沟。同学们除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以外，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参加生产劳动和实习。有的制造酒精，有的烧木炭，有的打窑洞、建教室，有的开荒种地，有的打铁、制造简单的工具部件。我们大家都向往到延安炼铁厂去生产实习，只有少数同学才有机会轮到，我赶上了这个好机会。1945 年春季，我和化二班的几个同学一道被派到延安炼铁厂去实习，记得同期去实习的还有李鹏、黄毅诚、彭士禄等同学。到厂的头几天，炼铁厂的领导同志和工程师向我们介绍了工厂情况和炼铁生产过程。炼铁厂就在大砭沟的后沟里，是 1944 年建成投产的，任务是为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和民用工业提供铸造生铁。铁矿石是从 50 公里外的安塞和陇东地区靠毛驴队驮运来的，木炭是南泥湾的生产部队烧制的。原料场利用地势建在山坡高处的一块平整的场地上，高炉建在山下，基础座在岩石上，上部炉体用几根钢柱支撑，钢柱是用钢轨铆成的。

热风炉、鼓风机、蒸汽锅炉都是边区的机械厂自己制造、装配的。高炉每天的出铁量是 1 吨。沈鸿同志和徐驰同志主持总体设计和工程建设。在当时延安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能设计制造出正规化的、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的炼铁厂，也真是奇迹。

劳动实习期间，我们变换过几次岗位，主要任务是为技师打下手。在原料厂实习，毛驴队到了就帮助卸料，定时定量往高炉里加料。在出铁场实习就帮助传递工具，搬运铁块，清理出铁场。在延安铁厂的这次生产劳动，我们这些见习者都增长了知识，得到了锻炼。

戚元靖

男，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1951 年入苏联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学习，任列宁格勒中国留苏学生会主席，1956 年毕业回国。曾任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土建科工程师，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院长，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现任冶金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同学们称我“支书老大哥”

谢绍明口述刘青霞代笔一匹马，一支枪，一杆自来水笔

我出生在陕甘宁边区安定县西区枣树坪村。安定县紧邻革命圣地延安。我的父亲谢子长逝世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他，将安定县改称子长县。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占领了我的家乡，我们一家人被迫离乡背井。刚刚7岁那年，我便随父、兄参加了革命队伍。

继1927年清涧起义，1928年至1931年底，我父亲与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在西北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26军前身），父亲任总指挥。1933年底，中共驻北方局代表委派父亲为西北军事特派员，领导西北革命武装力量。1934年7月，陕北特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父亲兼总指挥，后又兼任红26军42师政委。

同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父亲率42师红3团和陕北游击队进行反“围剿”，不幸在清涧河口一战中负伤。但他全然不顾伤势的严重，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这时已经到了10月，党组织决定要他离开部队，转移到安定、安塞边界一带去养伤。就在这时，我来到他的身边，朝夕侍候他养伤。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和父亲相处最久、受到他的教诲最多的一段时间。

不幸，这竟成为我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最后的日子。他于1935年2月离开了我们。

父亲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我们全家。我们全家从1924年到1937年，先后有11人投身革命，9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人牺牲在战场和敌人的屠刀下。

我永远记得，为了给革命部队筹集一笔急需的经费——

50元大洋，父亲含泪把他自己的亲侄女顶帐嫁人。

我也忘不了，父亲养伤转移，路过安塞小界塬村，父亲当时已经连说话都感到很吃力了，他还十分关切地向贫农薛大伯问长问短。当他看到薛大伯家五六口人，炕上连一床被子也没有时，坚持要警卫员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留给薛大伯。警卫员为难地说：“你只有这床被子，留下了你盖什么？”

父亲指着他身上披的皮袄说：“我有这个就行了，被子留给娃娃们盖罢！……”

父亲养伤期间，刘志丹叔叔来看望父亲。我偎依在刘志丹叔叔身上。他一边抚摸我的头，一边问：“双玉（我的奶名），你长大了干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父亲便在一旁兴奋地说：“长大了跟你刘叔叔去扛枪当红军。”我情不自禁地说了声：“好！”我从7岁加入革命队伍起，就时刻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像父亲及其他红军指战员一样，有一匹好马，一支好枪，去打反动派。后来开始学文化，又多么盼望能有一杆好自来水笔。不幸的是，1936年，我敬爱的刘志丹叔叔东征抗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与国民党反动派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没有能够实现父亲要我跟刘志丹叔叔当红军的遗愿，当时，我是多么地痛苦和失望啊！

父亲和刘志丹叔叔的牺牲，更坚定了我扛枪当红军的意志。父亲的遗愿，我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实现了。在延安保育院小学上学时，我有了一杆自制木枪，除了学文化知识，还经常练操习武。1945年“8·15”日

本投降后，我奉命赴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担任热河省赤峰市一区区委书记。第二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赤峰，我们撤出后组成武装工作队，我被任命为武工队政委。这时我有了马，也有了枪，我骑马打枪同日、伪残余武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我也有了自来水笔。

像一块磁铁石

从延安保育院小学到延安的许多学校，都始终遵循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指示，注重学生自治，提倡自己管理自己。于是各学校便选拔一些学习成绩好，年龄较大，有过一些革命锻炼一定工作能力，在同学中有一定威信的学生当干部，或担任党团支部工作。1939年1月，我在保育院小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14岁。随后曾几任支部书记。

同学们和我的关系特别好。他们不称呼我的名字，而亲切地称我“支书老大哥”。

到延安中学以后，我也是担任班长、学生支部的支书，后又被选为学生会的主席。1939年我还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

1940年又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大会，荣获模范青年奖章。1944年又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学生，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再次受到表彰。

我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主要是党的教育培养，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们革命精神的激励，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在我自己，最基本的一条是热爱集体，热爱同学，把学校看成一个革命大家庭，把同学们看成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当年我们是同睡一个炕，同吃一锅饭，同学习，同劳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在保育院小学的时候，小同学多，老师和保育员少，照顾不过来，就组织我们“大带小”。我被分配带方荣波。方荣波是方志敏烈士的儿子。当时我14岁，他才7岁。一年365天，学习、吃饭、睡觉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小荣波都是我的尾巴，他总是跟着我。我不仅每天要帮他洗脸、洗脚，每天还要为他晒尿湿了的被褥。夜里我还常常要摸摸他的被子，若发现他的被子湿了，就把他抱到我的被窝里。有时还要给他洗衣服、补衣服，和他谈心。有一次，天气很冷，方荣波做了一个烧马粪的小火炉，带进教室取暖。接着有许多同学仿效，弄得教室里乌烟瘴气，影响了课堂秩序。我找方荣波谈心，记得当时话说得很简单，只问他：“你想想，如果是你的父亲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办呢？”小荣波想了一会儿说：

“父亲绝不会为了个人影响集体。”此后，小荣波再也没有把火炉带进教室。

1937年初，我在新文字干部学校学习时，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家、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老人担任我们的校长。徐老当时有个勤务员叫李贵仁，山西人，是红军东征时参加红军的一个红小鬼。他年龄小，也有尿床的毛病。徐老每天夜里要叫醒他撒尿，早晨还要给他晒尿湿了的被褥。一些勤杂活儿，徐老都自己顺手做了，给他腾出时间让他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常和他开玩笑，说贵仁真是“贵人”，有徐老这样一个好勤务员。当时徐老除了给我们讲课，还常给我们讲革命故事。他的言传身教，对我的成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新文字干部学校，以及以后的青干校、保育院小学、自然科学预科

班，一直到延安中学我们都拥有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卓越的教师队伍。他（她）们积极热情，始终一贯地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培养教育我们成才。

当时同学们的各门功课普遍都很好。当时我们的英语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许多同学可以进行简单会话，可以写短文、短信。

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学，经常抢着干重活、累活、脏活。

我能开荒，种瓜，种菜，砍梢条，搭菜架，挑大粪，背砖瓦石头……也能行棉衣、做棉鞋，捻毛线。我还是个纺棉线能手，一天能纺1斤头等棉线。有一件最难干的活就是施肥。

我们的厕所是在半山腰，挖一个长方坑，上面搭几块木板。这种厕所，冬天掏粪还方便一些，粪尿冻成了冰，可以铲成一块一块的搬上来。最困难的是夏天，站在木板上，挥舞铁锹，要把一人多深的粪坑中的粪弄上来可就麻烦了。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小心，掉进粪坑，弄得满身粪便。同学们用绳子把他拉上来，带他到延河去清洗，有的同学还取来自己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这件事倒给了我一个启发。以后挖粪，我们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学就干脆跳下粪坑去挖，反正有的是延河的水，挖完了就去河里洗。这大概是今天的同学们想不到的。

还有一次，快要收工了，还有一小块地未刨完，于是许多同学都自动来到这块地上，一个叫李和的同学，挥锄刨地，不小心砍破了我的头，血流不止。李和很紧张，老师和其他同学也都很担心，就地给我作了包扎以后，一定要送我回学校休息。记得老师一再劝我说，头部受伤，容易产生脑震荡，或引起破伤风。我当时想起了战士们的一句誓言：“轻伤不下火线。”便脱口而出，坚决不肯回学校，一直坚持到劳动结束。

看到李和紧张的神情，我还安慰李和说不要害怕，以后小心点就是了。以后，李和和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当时虽然生活艰苦，劳动任务也很繁重，但我们的学习丝毫也没有松懈。相反，因学习时间短，大家分秒必争，抓得很紧。同学们在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课，记笔记，自习时又都认真复习。个别人有问题个别帮助，大家有问题集体讨论，直到学懂为止。我们班干部在组织劳动时，特别注意给学习差的同学少安排一些活，让他们多有一点时间学习。

记得有一次正值期末考试复习，第二天考英语、化学。突然水井堵了，食堂要我们派人去挖井。我很为难，派谁去好呢？如果直接说让英语、化学好的同学去，会伤害另一些同学的自尊心。于是我采用了自愿报名的办法，结果全班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

而我在确定人选的时候，便有意地挑选了英语和化学成绩较好、且身强体壮的同学。

后来全班考试的成绩都很好。

当时学生干部们热爱同学，把同学看成是亲兄弟姐妹，而同学们也热爱学生干部，把学生干部视为大哥哥、大姐姐，十分尊敬他（她）们，自觉地服从他（她）们的一切指挥。当时每个学生干部，都像一块磁铁石一样，吸引着一大批同学。

去见林伯渠伯伯

1943年，阴谋家康生以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整风运动中发动了所谓

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投身革命的很多党员干部、青年、学生，指控为“叛徒”、“特务”、“内奸”，进行审查、批判、斗争、关押。制造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伤害了很多好同志，严重地破坏了整风运动。

延安中学的前身——自然科学学院预科班的“抢救”运动，曾波及到学生。记得最初被审查的是牛旭光同学。牛旭光原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经历了皖南事变，以后他又辗转来到延安。就因为这段历史，对他进行了审查。有的同学还真以为他是“叛徒”、“特务”，甚至要动手打他。当时我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兼班长。我们学生干部都认为，审查归审查，但绝对不能侮辱人格，及时制止了一些过火行为。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一向关心爱护培养我们的老师突然成了“特务”，这已经不可理解了，而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同学，他们有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有的是忠心继承父辈革命事业的干部子弟，怎么他（她）们也会成为“特务”呢？我反复思索，觉得情况不对头，有问题，应该去找中央汇报才是。

1944年元旦，中共西北局派人接我去汇报情况。记得我最先见到的是高岗和林伯渠伯伯。高岗当时是西北局书记，林伯渠是边区政府主席。一见面，我便伤心地向他们讲了我们学校的“抢救”情况。林伯伯一边听我谈情况，一边气愤地说：“假如这些娃娃们都成了特务，我们陕甘宁边区早就没有了！”两位伯伯招待我吃了饭，还留我住下来。

他们当晚又请了西北局秘书长贾托夫和宣传部长李卓然来，听我详细汇报了情况。他们又问了一些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憋闷在心头的很多话，像打开闸门的流水，尽情流淌出来。我汇报了两个多小时，又连夜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他们。

没过两天，西北局便派人到我们学校来，“抢救”运动很快被制止了。后来经过甄别，证明当时被“抢救”的老师和同学绝大部分是被冤枉了的。全校召开大会，为他们平反正名。并对勇敢地抵制“抢救”运动，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几位同学进行了表扬。

通过这次斗争，同学们经受了考验，革命意志更坚定，政治上更成熟，对党更热爱了，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许多同学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整风运动将要结束时，我们学生支部新发展了一批党员。

情深谊长

198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举办渭华起义60周年纪念活动，我应邀出席。1928年5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由刘志丹、唐澍和我父亲谢子长直接指挥许权中旅脱离国民党部队，配合渭南、华县一带的农民武装力量，举行了武装暴动。这就是所谓的渭华起义。

我们住在丈八沟陕西省委招待所。会议结束，我准备第二天即回北京。晚饭后我在院内散步，省委副秘书长李林森同志告诉我，李鹏同志也来到西安，也住在这个招待所。

我和李鹏同志是40年代延安中学的同学，又是1948年留苏的同学。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我们虽然分散就读于航空、动力、理工等各大学院，但我们始终是一个党支部，像延安时期一样经常集体活动，互相帮助。1948年至1950年，我任支部书记；在我回国后，由李鹏同志担任支部书记。

文革中，所谓的“48·21”苏修叛徒集团，就是指我们这批留苏同学。1948年，我们21位革命烈士和干部子女——

有我、李鹏、邹家华、罗西北、刘虎生等，由当时的东北局派往莫斯科攻读各种专业学科，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文革”期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硬要把我们打成“苏修叛徒集团”。我们21人，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折磨。但是却也更加考验和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加深了我们的友谊。

话题再拉回来说。当晚8点左右，我和李林森同志前往李鹏同志住处探望，本意是想打个招呼，告个别，哪知一聊起来便有说不完的话。他特别关心民情和国家的经济形势，很希望熟人或知心朋友多多介绍一些真实情况，多提一些建议。

在北京时，他也常常找我们一些能说真心话的老同学、老朋友去聊天谈心。当李鹏同志得知我次日就要返京时，一定要留我再住两天，同他一起走。我说机票都买了。他说，买了票可以退么！于是我退了机票，又在招待所多住了两天。白天他参加会议，晚上我们谈心、聊天，李鹏同志认真地听取了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两天后，我乘他的专机回到了北京。

李鹏同志对老同学、老朋友满怀着热情和信任，是他的情深谊长。同时这也是他从老一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作风和工作方法。陈云同志曾说：每个高中级干部都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经常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才能做到“真、快、广”。敬爱的周总理更是重视言传身教。周总理在世时，只要有机会就找我们一些烈士子女和当年的一些红小鬼谈心，聊天，通过这个渠道多了解一些民情、民意。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冬季的一次会见。那年周总理来沈阳视察。当时我和李鹏同志、邹家华同志、叶正大同志都在沈阳工作。李鹏同志在沈阳东北电业局任总工程师，邹家华同志在沈阳机床二厂任厂长，叶正大同志在沈阳飞机设计所，我在沈阳航空工厂任厂长。一天下午，周总理约我们几个到宾馆去会面并吃饭。饭菜很简单：一条鱼、一盘豆芽、一盘豆腐，主食是玉米面窝头和馒头，还有小米绿豆粥。

周总理见到我们十分高兴，开心地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喝延安时代的小米绿豆稀饭。”吃饭时，周总理和邓妈妈不时起座，一筷子一筷子把鱼夹给我们和我们的爱人及孩子。敬爱的总理一边给我夹鱼，一边亲切地问我：

“你这个陕北人现在会吃鱼了吗？”

我们看到总理的生活如此简朴，对总理更是由衷地感到钦佩，听我们几个人汇报了沈阳职工群众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情况后，总理说：“我们应该和群众同甘共苦，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总理还说，他在日本留学时，每天就吃点咸鱼和米饭。他感谢我们反映了一些真实的情况。

邓妈妈还叮嘱我们，以后出差到北京，一定要到他们家里去，向他们反映一些基层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这次总理还讲了许多话。

在讲到有些单位不顾群众疾苦，仍在大建楼堂馆所时，他很气愤地说：“像鞍山宾馆，这次是开馆，也是闭馆。北京的市政建筑公司大楼，必须没收。”我们告别时，总理还再次嘱咐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暂时的困难，要继续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这批当年延安的同学，留苏的同学，彼

此仍然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友谊。

1991年春节，我曾邀请一些同学们在我家里聚会。这是一种传统式的聚会，吃的还是延安饭。我煮了一大锅什锦豆粥，名称好听，实际上就是红豆、绿豆、黄豆、红枣、小米一锅煮稀饭。还有手抓羊肉一大锅。有的同学自带一两个传统小吃。同学们济济一堂。有叶正大、叶正明、贺光辉、刘虎生、曾宪林、肖永定、贺毅、罗西北、任湘、崔军、林汉雄、项苏云……邹家华、叶楚梅同志出差外地未到。李鹏同志不巧有活动脱不开身，朱琳同志特意打电话转达了李鹏同志对大家的问候，并派女儿李小琳代表出席。

大家互相关心，情同手足。1974年，我的爱人被诊断患有直肠癌，我带爱人从沈阳来北京治疗。李鹏、邹家华、贺毅、叶正大等同志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请专家会诊。

我爱人的病很快痊愈。1991年罗西北同志在西安开会期间突然患心肌梗塞，邹家华同志马上给陕西挂电话，请全力抢救，李鹏同志让爱人朱琳同志前往西安看望。当罗西北同志病情略有稳定后，又把他接回北京治疗。前几年，林汉雄同志的母亲涂俊明妈妈逝世，我们许多同学都去看望汉雄，为他分担悲痛。大家的心始终是息息相通的。

谢绍明

男，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曾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学生、劳动英雄、西北模范青年。1948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任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厂副厂长、总工程师。1954年又赴苏联进修，回国后任沈阳航空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后调北京，任八机部生产局局长、国家科委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中纪委驻国家科委纪检组组长。现任国家科委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艳红的青春旗——延安中学毛泽东青年团

王黎明

美国精良武器装备的蒋介石 30 万大军，在胡宗南指挥下云集在延安南大门一线，正是弩张待发的时刻；

被誉为保卫党中央近卫军的西北野战军的一部分，也正严阵以待，迎战敌人突然袭击延安。

在延安东郊桥儿沟的延安中学校园里，一个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先进的青年学生组织在时代的风暴中诞生了，同学们自己命名为：延安中学毛泽东青年团。

“我们的团，是毛泽东旗帜下的积极进步的青年组织，为团结一切思想进步的青年，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并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向毛泽东指引的方向迈进……为了完成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

这是我们的《团纲》中的首语，它旗帜鲜明，它表明了我们的青年团以“毛泽东”命名的重大意义和崇高远大的理想。

1946年12月9日，桥儿沟东山腰前岭拐渠作为校部会议室的大土窑洞里，正中悬挂着毛主席像，四周墙上贴满了团员们书写的各人的贺词、祝词、他们的心愿与感想，一派庄严、隆重、热烈的气氛。“12·9”的火炬，这时在我们立志要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青少年们心中熊

熊燃烧着。我们一致通过了团章，站在毛主席像前宣誓：

“我们毛泽东青年团团员，誓为毛泽东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我们……在团内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为团积极工作，把自己锻炼成为毛泽东旗帜下的坚强不屈的战士……若在行动上违反了我们的诺言，我们愿受团纪的一切处分。”

铿锵之声，飞出窑洞，好似严寒中的一声春雷，震撼着黄土高原的冬野。

我们这批宣誓的队列里，有继承父志的烈士遗孤，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他们是这支队伍中的前哨兵。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原延安大学校长江隆基，满腔热忱地祝贺毛泽东青年团的成立。他的一席讲话，将先辈们青年时代的革命生涯同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前进道路联系起来，构成了一幅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画卷。他说：“当我们这一辈还是青年的时候，就没有你们今天这样幸福。那时，马列主义理论还没有发展得像今天这样深入、普遍，又比较缺乏导师，所以虽有热情，有理想，也难以实现。我在学校时，曾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青年励进社。可是，我们一毕业，也就烟消云散。这说明没有正确的途径，就不会成功。你们今天比上一辈人幸福，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引，有党中央开辟的道路。”

毛泽东青年团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中国青年革命运动史上的又一个盛典，对解放区的青年运动，对全国的青年运动，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它将在挽救民族危机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当前，毛泽东青年团的神圣使命是：积极投身到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的战争准备工作中去……”

我们背负起这个神圣的历史使命前进……

在“不给胡匪军留下一粒粮、一寸布”的口号下，团员们首先积极投入了延安的坚壁清野工作。学校把教学用具、粮食等各种物资转移到后方或埋藏在山洞里。团员们不怕苦，不怕累，自动背运东西到安塞县吊儿沟和离学校不远的一些村庄，他们带动其他同学，迅速地完成了任务。鲍克明同志是六班年纪最小的团员，只有 14 岁。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也和大同学一样，背着一张课桌送到 20 里以外的捻庄隐藏。往返整整一夜，他累得满头大汗。同学们赞扬说：“鲍克明背东西，顶一个大人。”后来他参加了第四野战医院后，主动要求当通讯员，也总是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情况艰险，都勇敢负责地完成了任务。

这时，军事训练替代了往日的数理化课程。打靶、射击、投手榴弹，轻装演习等等，成为每个同学的必修课程。团员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以身作则。六班 17 岁的团员李凡民在打靶比赛中名列榜首。女团员杜芳枝也打中 9 环。十二班团支部书记韩秉义和同学们一到驻地，就利用间隙时间带动同学架起单杠，锻炼身体。六班每天晚饭后，大都进行练习瞄准、刺杀、投弹等活动。

我们毛泽东青年团员，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里发挥了自已应有的作用。

1947 年 3 月，学校改建为战时第四后方医院，全校三分之二的团员，报名参加了医院，踊跃为前线服务。3 月 15 日，成立了医院团总支，也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团组织。苏红同志在医院担任团总支书记有两年多之久。团员王涛英最后英勇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

十三班的团员高耶夫，50 年代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工作，救死扶伤，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到了 80 年代，他年过五旬，还毅然到云南边疆老山前

线野战医院工作，又一次受到部队官兵的热烈赞扬，报刊、电台、电视台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团员中干部子弟很多，但他们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以著名的白衣战士李兰丁为典范。15岁的小团员齐翔安，是著名学者齐燕铭的女儿，体弱多病，有时发着高烧还坚持在重病房工作，给重伤员喂饭、换药；有时还背着重伤员上厕所。后来她患了伤寒、回归热，她宁肯躺在担架上随军转移，待病愈后护理伤员，也不肯到后方去休养。为了提高医疗技术，她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在行军中，她和另一位女团员李骏，每人拿着一块死人骨头，边走边互相问答，熟记解剖学的名称。休息时，她们用树枝在地上画着、写着做练习。每次考试她们都名列前茅。

在最初试建青年团和正式建团以后，我们始终强调团员必须响应党的号召，在各方面发挥模范作用，密切联系群众，保证学校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团员们都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我们一直注意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巩固团的组织。延中青年团员们实现了自己入团的誓言，为团组织争得了荣誉，同时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提高了团的战斗力，我们真正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和可靠的后备军。

努力学习是青年团员的首要任务。团员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文化与时事政策的学习，而且要带动同学们一起努力学习。

例如六班有一个同学平日比较调皮，不爱学习，团小组就分配团员李夫星帮助他。

他们经常一起生活谈心，打消了他只埋怨别人帮助不够的想法，后又指出他的毛病，并为他指出了改正的方法。经过两个月的耐心帮助，他做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他说：“我今后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愿意加入青年团。”

后来他积极参加学习，进步很快。他到西北第四野战医院去做护理工作，工作积极负责，并且当了护理班长。这时他参加了青年团。二十班同学呼延福，入团后不仅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而且经常和同学在一起研究，相互帮助，使他们的小组成为全班的模范学习小组，带动了全班。在加强战备教育，突出时事政治学习中，团员们个个情绪振奋，踊跃发言。原来有些不看报纸，不爱参加政治学习的同学，在团员们的影响下，也天天看报，关心政治大事了。

建团过程中，我们始终很重视团员的思想教育，把它放在首位。开始主要抓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与团员应起模范作用的教育。后来又抓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抓了时事政策学习，坚定战争必胜信心的教育，还抓了行军中的纪律教育。先后请冯文彬、范长江、卢勤良、贾芝等同志作报告，这些报告受到大家欢迎。女同学还请了三五九旅参加过中原突围的女干部汪志平同志，讲他们是怎样突围的，特别是她自己是怎样闯过渡河、爬山、同敌人打遭遇战等一个个难关的动人事迹。在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中，团总支召开了女生座谈会。女团员们从抗议美军暴行联系到妇女的解放问题。美军可以任意蹂躏中国妇女而逍遥法外；相比之下，她们感到边区妇女是受尊重的，切身体会到妇女的权利受到保护的幸福。但就全世界说，妇女的解放仍然是一个长久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座谈会不仅对女同学，对全体同学都是一堂深刻的政治课。

在团内，我们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一些歪风邪气。例如有的团员在行军中，发脾气，打人，甚至强拉了老乡的毛驴，骂老乡，影响很坏。团支部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对个别情节严重的还给了警告处分。

团员在战时宣传中十分活跃。延中宣传队演员四十多人，其中不少人是团员。宣传队演出的主要节目有《战斗舞》、《石头开花》和《女游击队员》。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在延安、安塞演出数十场，观众达1万多人。他们的演出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那年，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等专业文艺团体都到外地演出，延中秧歌队，一时间成为延安最活跃的秧歌队了。

根据上级号召，团员们所到之处还经常向群众宣传时事政策，帮助当地群众识字和生产，并进行农村调查，开展群众工作。例如，学校住在安塞吊儿沟时，政治课老师贾芝与语文课老师宁汉戈合作带领同学们下乡，教农村儿童识字，调查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的事迹，宣传时事政策。在这些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的仍然是团员们。他们刚到农村时，老乡有顾虑，不乐意让娃娃们学识字，一些同学见此情况有些灰心丧气。但团员郭韬等同学并不气馁，而是设法接近老乡，帮助他们干活，后来人熟了，老乡终于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欢迎同学们到他们家里来。参加识字的娃娃，从两三个增加到二十多个，甚至大人也要求办夜校了。一个多月之后，这些娃娃们都能认识200~300字了，群众非常高兴。

二十六班的五个团员由于经常帮助同学，团结同学，与群众关系密切，威信提高，在选班学生会时，五个团员全被选为委员，形成了全班的领导核心。在他们的带动下，五天的生产突击，收获棉花22斤，达到全校生产的最高纪录。

为了推动团的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加强时事政策和政治理论的学习，在团成立大会后，很快就创办了油印的、不定期的团刊《团内生活》，每期印几十份。1946年12月23日出版第一期，到1947年11月，共出了13期。它是团员们自由论述、民主讨论的园地，也是团总支与团员和群众联系的纽带。团刊由苏红、王黎明、张珍、鲍克明等同志负责编印。

当时全解放区从中央青委到基层团组织主办的团刊共9种，《团内生活》是其中之一。

这个团刊内容包括批评团内的缺点错误，表扬各种先进模范行动，政治学习讨论，对指导、推动团的工作和提高团员的觉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请贾芝老师在《团内生活》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谈进步》，对团员们提出三点建议：一、做事要切实际；二、要富有朝气；三、要与工农兵相结合。这篇文章受到了团员们的欢迎。

团刚成立时，强调“巩固自己，建立团的威信”。但因怕团员的质量低了影响团的威信，对积极分子要求过高，加上当时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人员变动频繁，对发展团员的工作一度有些忽略。从成立到1947年3月15日，3个月才发展了12名团员。新班和地干班100多个同学，连一个团员也没有。团总支发现这个情况以后，立刻发布通知，强调应重视发展团员，克服关门主义。同时，高鸿文同志专程去安塞县吊儿沟，帮助新班和地干班发展团员。从此，各班都抓紧了发展工作，使团的队伍不断壮大。从3月到7月发展新团员二十多名，新班和地干班也建立了团支部。到7月，学校和医院的团员已达到122名，团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7年7月初，学校和医院都转移到子洲县马蹄沟一带，院、校两个团总支总结了成立7个月的工作，由我写出了一份书面总结，经贾芝、康勃老师修改后，苏红等同志刻印出来分发各支部，并报中央青委，同时在党团

员大会上作了报告。从此，青年团的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不断壮大的道路。

延中青年团，作为建团的学校试点，不只为解放区学校建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干部。1949年，延属分区就有三个团县委书记是延中的团员和建团工作者。苏红、鲍克明、王升学、张三保等同志，先后在学校、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和陕北区团委、团中央从事建团工作，对建团做出了贡献。

转瞬之间，45年过去了。当年的这批青年团员和建团工作者，现在多数已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了。有的已经离休，有的还战斗在祖国四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各级领导干部。例如：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海南省常务副省长鲍克明，核工业部三局局长王升学，原《外国戏剧》主编苏红，原法律出版社党委副书记韩秉义，陕西省渭南地区行署副专员刘凤鸣，人民文学出版社纪委书记张三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凡民，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李骏，北京宣武医院党委书记齐翔安同志等等。

延中一年多的建团工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美好的记忆，这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1947年冬到1948年春，我曾在米脂县印斗区六乡土改工作组任组长，在工作中认真执行政策，未发生大的差错，把土改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进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边区《群众日报》在1948年5月报道过该乡的工作。可以说，这与我当年在青年团和学生会工作中的锻炼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在校的学习和开始做领导工作的锻炼，一个19岁的青年学生担任一个乡的土改组织工作，恐怕是很难胜任的。

1991年6月19日 王黎明

男，曾用名王利民，延中十二班学生，延中党总支干事，青年团总支书记。解放后在轻工业部北京家用电器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顾问。高级经济师。

我也有个金色花季

曾宪波校园里的欢乐

不久前，我看了电视剧《十六岁花季》，心情难以平静。

每个人都有个美好的金色花季，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度过的。如今我已是65岁的老人了，可是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还是那样地激动，仿佛又回到了那难忘的峥嵘岁月……

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妄图灭亡中国。全国有志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真理。1938年6月，父亲带我和二弟宪林去延安。虽说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对去往延安还是封锁很严的。我们路经陕西南部的汉中时，差点出了事。那是因我在成都“生活书店”买了一本《陕北集影》，我很喜欢它，就悄悄地放在箱子里。汽车过汉中检查站时，被宪兵查了出来，他们问我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这是孩子在书摊上买的。”并且同意把它烧掉。幸好父亲在国民党

军队里做地下工作，带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护照，才放我们过去。到了西安，特务就更多了，要去八路军办事处办手续，得化妆躲过特务的跟踪。有很多青年从办事处出来就失踪了。我们很紧张，一直等到八路军有去延安的军车，直到上了车我们才松了口气。

到了延安，父亲被分到抗大一大队。我姐姐是一年前到延安的，在抗大三大队。这回他们父女俩成了同学。我和弟弟被分到鲁迅小学读书，从此我们就离开家，开始过独立的生活。

当时我 12 岁，弟弟才 9 岁。

鲁迅小学位于延安城内的鼓楼南大街。在校生多是抗战将士的子弟、革命烈士的子女及大后方地下工作者的后代。

1938 年夏的一天，有几位苏联医生坐飞机来到延安给中央首长治病，回去时，顺便带几位同学去苏联学习。我们知道后吵着也要去，于是，校长吴燕生带我们到凤凰山去找毛主席。在石窑外面的一个小平房里，毛主席接见了我们，还拿出一桶前方的同志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金鸡饼干招待我们。

我们一面吃上面粘着闪闪发亮的白砂糖的饼干，一面嚷着也要去苏联学习。毛主席不慌不忙地慢吞吞地说：“这次飞机太小，坐不了几个人，以后有机会都送你们去苏联。”1953 年，我终于实现了留苏的愿望，在鲍曼工业学院攻读自动控制仪器专业，学制是五年半。1957 年，毛主席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接见留苏同学时，我真想到毛主席身边说：“您许下的诺言兑现了。”可惜这次不巧我去晚了，站在大礼堂的后面，怎么也挤不过去。

1938 年秋季的一天，一架日本侦察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以后又来了几次，为了安全，鲁迅小学同学每天都要到南门外的河滩去躲飞机。后来，边区政府决定，让我们学校搬往安塞县吊儿沟。在离开延安前，学校已改名为边区中学附属小学。10 月间，学校租了些大车，全校师生就出发了。第一站是安塞县城，第二天我们正在吃早饭准备出发，忽然听见大批飞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这是日本鬼子在轰炸延安，因安塞距延安只有 50 华里，扔过了炸弹的飞机就从我们头顶上空飞过。我们都趴在地上不敢动，幼小的心灵里燃烧起仇恨日本鬼子的怒火。

转年 2 月，学校又搬到了白家坪，并改名为延安保育院小学部。那时我已 14 岁，就因为个子小，被编入儿童团，不能去少先队。每天出操时，看见少先队每人背一支木枪出操，练刺杀，真神气，而我只是空手跟小班同学跑圈圈。一直盼到了“四·四”儿童节（以前儿童节是 4 月 4 日）前夕，我才被批准加入少先队，并被选为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庆祝儿童节大会。去延安要走 75 华里的路，我们每人骑一匹毛驴，在黄土高原的土路上扬起一大片尘土，身上斜背着一支小木枪，那油漆得发亮的木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沿途的老乡都走出窑洞来看，以为是八路军骑兵队过来了呢，好不威风！

在延安庆祝儿童节时，日本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我们听到警报后，迅速钻进防空洞。这些防空洞是在住人的窑洞里面又挖了只有一人可通行的地道，一直穿过山头到另一面住人的窑洞，而且是洞洞相连。在洞里听不到爆炸声，只感到耳边有呼呼的风声。

警报解除后，我们出来，只见遍地弹坑，除了炸死一头毛驴外，未伤一人，倒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优质钢的炸弹皮。我们把弹皮捡起来，交给老

师，集中送到茶坊兵工厂造枪炮，以牙还牙，打击日本强盗。

在战争年代里，少先队是半军事化的组织。每天有军事训练，还要站岗、放哨、查路条，晚上还有紧急集合、夜行军。有一天晚上，我发现队长们都不见了，他们回来后就催我们快些睡觉，我猜今晚准有紧急集合。于是，我悄悄地准备好，只脱了上衣，没脱裤子就睡下了，我想一定会争个第一。果然，半夜里我们被哨声惊醒，黑暗中我迅速穿好衣服就下了炕，可不知谁把我的鞋穿走了，好半天我才摸到了一双，等跑到集合点之后，差点没落个倒数第一，真倒霉！集合后大队长轻声说：“敌人已向我校摸来，距我校只有5里路，我们马上向北转移。”说完就开始急行军。走了大约3里路，就向回转。

这次夜行军我穿了别的同学的一双大鞋，踢里踏拉的，虽说只有3里路，可把我累坏了。

我们的体育课也和战争联系起来。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贾玉洁老师把同学分为白军、红军，在黄土坡上用黄土圪塔作战，练习冲锋、伏击、包抄、退却、包围和歼灭。

凡被土圪塔击中的，用粉笔画一个圈，表示“牺牲”，应退出战斗。

然而有些同学不守规则，被击中多次也不退出战斗。战斗结束后，两军没有办法评判胜负。

每天傍晚，我们最有兴趣的游戏是骑马打仗。由一人做“马头”，向后伸出两手，在他左后方和右后方各有一人做“马背”，一只手与做“马头”的手相握，另一只手放在“马头”的肩上，这就是一匹“马”。作战的战士坐在“马头”后两个人的手臂上，脚踩他们相握的手上，交战时，只要骑在“马”上的人将对方摔倒在地，就为胜利。我与几个小同学还发明了一种“跳跳马”，由二人组成，前面一人两手向后，后面一人握住前面那人的两只手，战士就蹲在两人之间，当看中攻击对象时就迅速跑过去。两人的“马”比三人的“马”跑得快，一旦追上对方就纵身一跳，抱着对方，这时对方很难摆脱，很容易成为胜利者。这种游戏锻炼了我们的机智、勇敢，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情趣。

1939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来“保小”参观时，给全校师生拍了张合影，我们穿的是重庆运来的短袖衫和短裤。尽管不太合身，但比土布衣要漂亮多了。我们是在篮球场边的土坡上照的像，我在第五排正中，弟弟在我的左下方，这是我在“保小”唯一的一张珍贵的照片。

1940年底我快15岁了，从“保小”毕业后，升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1943年10月，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合并到桥儿沟新成立的延大中学部，后来改名延安中学，从那时起，我便在延安中学学习了。

最初的实践

1941年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当时缺粮少菜，顿顿是煮干白菜帮。一次，我从老乡家弄到一块豆腐，便想办法做起臭豆腐。因为我小时候在老家见别人做过，我就如法炮制，把豆腐切成块放在饭盆里，在宿舍窑洞的墙上挖个洞，把饭盆放进去，外面贴一张纸，密封起来发酵。五天后取出放盐时，苍蝇闻到臭味成群飞来，好几个同学赶忙帮我轰苍蝇，可怎么也轰不走。这些苍蝇，像日本飞机一样俯冲下蛋，结果做好的臭豆腐，仍然有蛆。这样好的东西真舍不得扔掉，我们只好到伙房用油炒一下，消毒，开饭时拿出来，大家一抢而光，都说好吃极了。可我们知道内情的，吃起来总有点那个。

但说实在的，比干白菜帮确实好吃多了。

1942年，毛主席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我们的生活才一天天地好起来。那时，我们每年有3个月的生产劳动时间，上山开荒，种土豆、荞麦、谷子和蔬菜，在学校还纺线，纳鞋底，做布鞋，打草鞋，自己动手解决我们的吃穿问题。

在纺棉线时，分棉条，收棉线都要计量登记，可又没有钱去买秤。我就运用课堂学到的杠杆原理，动手做了一杆秤。

在分配纺车时，大家都要大车轮的，因为大车轮的纺线效率高。分给我的是一个小轮的。于是我就开始琢磨，原来是小纺车的车轮与锭子之间传送比太小，只要在其间加一级变速就能解决问题。班长知道后很高兴，要我在墙报上写文章，把变速轮的计算数据及制造方法写出来，还要我把秤的制作方法也写出来。从此小车轮纺车比大的更受欢迎，因为小的重量轻，每天搬进、搬出要省力得多。

为了安排同学们的实习，自然科学院决定开办实习工厂。

由曾在国民党兵工厂做过工的技术工人担任师傅。没有厂房，我们就在与学校相邻的一条小山沟的山坡上挖窑洞。先从山沟高处往下挖，将黄土填到沟里，使窑面倾斜约100度，当窑洞前有了一块平地之后，就开始掏洞，顶部呈拱形，两边的墙是垂直的，洞的深度约为洞宽的1.5倍，太深光线太暗，太浅使用面积太小。窑洞挖成后，再安上门窗。我们把工具、设备搬进去，实习工厂就开工了。我是第一批去实习工厂的五名同学之一。先学钳工基本技能：锉、锯、镗、钻、磨。然后就做医用的镊子、天平和军装上用的铜扣。这些产品的收入，用来作为发展小工厂的资金。

我们学校的物质条件虽然很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课余，学校组织了各种活动，有歌咏组、京剧组、舞蹈组和器乐组。我参加器乐组，学会了拉二胡和吹口琴。

那时，每星期六都组织舞会，我参加了乐队，大家推选我当乐队指挥。组织乐队，就要找乐曲、找乐器，而学生会只有一把二胡、一只笛子和口琴，乐器太少了。我想再做一把三弦。我没有英文字典，学英文老去借别人的，因此想多做一把三弦，拿到市场去卖点钱，买本字典。于是就动手做起来，可困难的是蒙皮没法解决。以前我做胡琴，还可以弄到蛇皮或用青蛙皮代替，而三弦鼓面较大，要用蟒皮，延安可没办法弄到，我就把两层牛皮纸用胶粘起来，效果也挺好。学生会的刘兆伦听说后，两把三弦都要去了。我说我本想卖掉一把三弦买本英文字典，他就把他的一本破旧字典给了我。这本字典，我一直用到1953年我去苏联学习。

我们学校工读班新来了一位老师，叫艾堤，他有一把小提琴，拉起来音色美极了。

我又萌生了做一把小提琴的念头。

于是，找来一块松木，又到铁匠铺打了一把圆刨刀，我和弟弟合作，两人轮换着刨起来。要把2厘米厚的木板刨成薄而均匀的曲面，确实不容易；而提琴的周边、是用蒸笼铺买来的柳木片，经热水泡软后弯成需要的尺寸。我在刨提琴把上的螺丝转时，正是班主任武可久给我班上大代数，我便在桌子下面偷偷地刨，当下课铃响时，提琴把也刨完了。不料最后一刀猛一用力，刀子滑向了左手掌，划进去1厘米深，至今还留下个伤疤。

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学校很注重培养实用人才，学习中理论与生产

实践密切结合。

每年有 3 个月的实习，这样既学到了本领，也锻炼了思想。我们到炼铁厂实习时，由总工程师徐驰给我们讲冶炼灰生铁的原理，然后就去当工人顶班，配料、上料、烧热风，累得我们腰酸腿疼，这才体会到钢铁工人的辛苦。我们到茶坊兵工厂实习炸药的生产过程，由化工总工程师钱志道讲解，在硫酸车间顶班，去体会危险工种的滋味。我们到拦河水坝工地去实习，又懂得了不少力学知识，也了解到建筑工人的辛劳。

在建筑工地上，需要昼夜值班，可又没有钟表，交接班时间很难掌握。一般是白天看太阳高度，晚上看三星位置（猎户星座），这样很不准确。我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日晷。先在瓶塞中穿进一根磁化了的缝衣针，放入一盛水的碗中，成为一个简易指南针，找好正南正北方向。然后在窑洞门前的土堆上削出一个平面，画一半圆及刻度，再按一定角度插入一根铁丝，日晷做成了。上下交班，就有了较准确的时间。

1945 年 8 月，经过八年抗战，日寇终于无条件投降了。我也度过了少年时代。一天，干部科长王甲刚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延安美军观察组（美国军队在延安设立的一个与八路军联系的外交机构）去接收气象台。我当时很不乐意，因为我对学机械很有兴趣，舍不得放弃。但他说这是为了保障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的安全，是一项政治任务。虽然，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个人志愿要服从革命需要的道理我是懂得的。就这样，我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走上了工作岗位。

以上谈及的往事，转眼间已过去 50 多年了，现在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我的金色的花季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危难岁月的磨练，这对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起了决定作用。看到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我是多么的羡慕啊！

年轻的朋友们，我打心眼里期待着你们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能珍惜你们的环境和条件，加倍努力，充实自己，踏着先辈的足迹前进，奔向美好的未来！

曾宪波

男，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1958 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自动化专业。

曾任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党组书记。中国宇航学会、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气象学会副秘书长、名誉理事。高级工程师。

从山沟沟走上大舞台

何枫

1991 年初夏，我从白云黄鹤之乡，回到阔别多年的首都。

在我国第一座音乐圣堂——北京音乐厅，举办了独唱音乐会，向首都听众献上我心中的歌。

“高楼万丈平地起，蟠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从小喝延河水长大的我，把对人民领袖和陕北乡亲深挚的爱，倾注在我的歌声里。这歌声，环绕着宝塔山，追逐着延河水，在飞旋，在升腾。它把我的心，也

把听众的心，又带到那彻夜灯明的枣园窑洞，带到烽火弥漫的黄土高原……

我从山沟沟走上大舞台，能够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在声乐艺术上取得一点成就，特别要感谢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歌唱家和恩师们的亲授。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延安那片圣地热土，使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革命艺术的熏陶。

我的父亲周文是著名的左联作家。父母都喜爱音乐，常在家里和朋友们一起唱抗日歌曲和苏联歌曲。那跳荡的音符，激扬的旋律，时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飞旋回响，使我从小就迷上了音乐。

我8岁时，有一次被成都地下党领导的一个演剧队借去，参加演出。我自己把《流亡三部曲》改编成载歌载舞的节目，和我妹妹在成都青年宫演出。我们那稚嫩的歌声，纯真的感情，使同台演员和台下观众都深受感动。

1940年初，经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安排，9岁的我随父母从白色恐怖的成都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途中，一块去延安的这支知识分子队伍中，只有我和妹妹年龄最小，走不动路，他们就把我们姐妹俩捆在大马车的行李上，以防我们掉队。父亲一边走一边给我们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边区到底是个什么样，我一点也感受不到。我只相信父母要去的地方，一定是天下最好的地方。我那颗幼小的心灵，向往着那最光明、最幸福的地方。

春节前，我们终于胜利到达延安。幸福的时刻来到了！党中央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我随父亲来到中央大礼堂，坐在中间一条长凳上。过了不大一会儿，一位身材高大、笑容可掬的人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这时，全场观众起立，热烈鼓掌。我也拚命地拍着小手，并问父亲：“他是谁？”父亲说：“毛主席！”毛主席就坐在我后边一排，和我父亲并排坐在一起，他谈笑风生。当父亲向毛主席介绍：“这是我女儿。”之后，毛主席亲切地拉着我的小手，问我几岁了，到延安过得惯不过。我用地道的成都话回答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后还笑着叫我“小四川”。

春节过后，在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副部长的关怀和安排下，把我和妹妹、还有烈士的女儿沈宗沪（现名舒炜），一同送到安塞保育院小学部读书。

到“保小”不久，在一次晚会上，我和妹妹又一起同台表演了《流亡三部曲》。全校师生深受感动，台上台下竟泣不成声。当时的娃娃同学，现在大都已步入老年，但此情此景，仍记忆犹新。

“保小”的文化生活是很活跃的。这里组建了合唱队，我一直是合唱队员，也当过合唱团团长，还常指挥同学们唱《吃饭歌》。从“保小”毕业后，到自然科学学院学习，我还是合唱队员。我深知我已和唱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几个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中学，我们就住在离城10里的桥儿沟。我这时既学政治、文化，又纺线、种菜，还是个活跃的文艺骨干。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普及种棉花的知识和技术，我和同学易曙光合演了秧歌剧《种棉花》。我扮演的是接受科学思想快、掌握了种棉花技术的小姑子，易曙光则扮演不懂得种棉花知识、结果一无收成的嫂子。结果小姑子向嫂子传授了种棉花的技术，嫂子决心大干一场。

由于延中与鲁迅艺术文学院同在桥儿沟的一条山沟里，所以我们天天能听见鲁艺的学生在山沟里练声、唱歌。每当此时，我的心常常为他们的歌声所吸引。下了课或上完晚自习以后，我和同学就跑到山下，来到鲁艺那座

破旧的教堂里，满有兴味地观看大哥哥、大姐姐们排戏、唱歌。《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黄河大合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播下了革命文艺的种子。李波、王大化……特别是音乐家吕骥、李焕之，都是我从事声乐艺术最早的启蒙老师。最使我引以为荣的是，音乐家渐渐发现我有一副好嗓子，就让我与易曙光等几个延中同学参加鲁艺的《黄河大合唱》，为中外记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演出。

1945年，年仅15岁的我，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参加了山西太岳军区文工团，成为一名革命文艺战士。小小年纪，我就相继在《白毛女》、《刘胡兰》、《王秀鸾》等大型歌剧中担当主角。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用歌声给浴血奋战的指战员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人们亲切称我为“战地百灵”。

有一次演出《白毛女》，著名作家赵树理对我的演唱倍加赞扬，他还亲自为我和演员们打鼓伴奏。全国解放以后，赵树理同志还特意打听我的下落说：“演喜儿的那个小鬼到哪儿去了？她的歌声真叫人太难忘了！”

还有一次，我的独唱音乐会刚刚结束，一位老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赞叹道：“真没想到啊！几十年后你的艺术青春依然常在！当年的白毛女，今天唱起了莫扎特、勃拉姆斯和舒伯特的名曲。你的进步真大呀！”这位老同志，就是当年在太岳军区文工团和我一起演出《白毛女》时，扮演大春的谢振川同志，后来他在河南大学任艺术系主任。“大春”和“喜儿”阔别30多年，意外相逢，真是令人难忘的一幕喜剧！

4年前的仲夏时节，在保小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中，我重游圣地，校友相逢，我们又仿佛回到了火红的青春时代。在延安各界联欢晚会上，我一连独唱了6支歌曲，把一片深情献给用乳汁哺育了我的伟大的母亲！

（王恂整理） 何 枫

女，曾用名何文康。延中四班学生。曾任武汉歌舞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现为中国音协武汉市分会顾问，1989年获武汉市音协授予的荣誉证书。

成长在抗战的大时代

黄 克 田汉汀

1938年8月初，延安的骄阳照着两个来自抗日战争大后方武汉和陕西泾阳的少年，他们两个身穿旧的中学生服装，背着背包，越过延河清清的流水，来到凤凰山下一座古书院旧址。这两个少年就是我们俩——黄克和田汉汀。

在这个书院的一个小庙房里，接待我们的是刘宪曾老师，他戴着近视眼镜，年约五十来岁，他仔细地看了我们两个所持的介绍信，经过测验将我们编入第一队。

刘老师领着我们进入古庙般的大厅前殿，厅里阴暗、潮湿，谷草地铺上已整齐地叠放着二十多床被褥。刘老师说：

“同学们大多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占领区的失学青少年。”

我们把行李放在铺满谷草的地面上，我的铺位靠着粗壮房柱的石座边，石座上渗着小水珠。白天，我们就坐在地铺上的铺盖卷上上课、自习、做作业。这样的大宿舍有三个，住了 100 多名学生。

“嘟！嘟……” 哨音，是每天起床的号令，我们揉揉惺忪的眼睛，迅速穿好衣服，直奔院子北墙边几口大缸，舀水洗脸、漱口。之后，列队出城在延河边做早操、跑步，约 40 分钟后返校上课。队伍在街道行走，唱着《边区中学的校歌》：

边区的青年们，携起手来！
我们健壮地成长在抗战的大时代，
我们团结、紧张、勇敢、活泼地、
携起手来！
我们学习、学习，
为了解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国！
为了建设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边区的青年们，携起手来！

这个时期，延安的太阳总是在昂扬的歌声中冉冉升起。延安成为独一无二的歌的世界。我们在歌声里开始一天的沸腾生活。

《海燕》——我们国文课的第一篇课文。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刘宪曾老师教我们学这篇高尔基的著名散文诗是希望青年们像海燕般勇敢热情地欢迎革命浪潮的到来。刘老师讲得非常生动，他将海燕的形象印上我们纯洁的心扉，使我们树立起海燕的意识，海燕的风格，海燕的性情，时刻准备着像“黑色的闪电”一样去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暴风雨中，去翱翔，去搏击。

我们身处政治斗争最高形式的时代，正确的政治信仰，将是我们一生的基石，中学时代更是信仰与理想的奠基时期。

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 1 年零 1 个月。国内外对这场战争的进程和前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在我们这群青少年里，也产生许多天真的想法，尤其是家乡沦陷的同学们求胜心切。为引导我们正确地认识战争，担任政治课的蔡子伟校长选讲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主要章节。他讲得深入浅出，举一反三。他着重说明我方的优越条件是“正义性”和“得道多助”，但国力不足，欲速则不达，必须持久战。他还说：“将来我们还要扩大发展游击战，不但在山区打，还要在河湖港汊组织民众打游击。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毕业之后，可以到江河平原去作战，到南方去作战。”

蔡子伟校长是一位久经锻炼的 20 年代末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在政治课上生动地介绍了许多革命烈士的高风亮节与光荣事迹，他说烈士们视死如归，“杀头如同风吹帽”，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

我们深感荣幸的是，亲身聆听过老一辈革命家及蜚声中外的名流学者

的教诲，如徐特立讲授《统一战线》课，著名哲学家柯柏年讲授哲学和社会发展史，吴玉章同志讲授《教师的光荣责任》等等。

二

我们上课不到两个月，便接到边区政府通知，日本鬼子的飞机将要轰炸延安。机关、学校、工厂要疏散。我们学校要迁移到延安以北120多华里的安塞县吊儿沟。

搬迁的三天后，日本飞机对延安进行了狂轰滥炸，学校被炸成一片瓦砾。我队同学，共产党员曹锋，也为保护学校财产光荣牺牲了。

我们在吊儿沟过着艰苦、紧张和愉快的学习生活。转眼间，春节即将到来，学期终结，寒假来临。学校决定组织一个下乡宣传队，宣传抗日救国的伟大意义，动员农民支援抗日前线。我们俩被选上，参加了宣传队，心中十分高兴。

宣传队员共三十多名，队长是军事教官张孝德，他是一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艺术指导是美术教员王曼恬，还有国文教员杨典，数学教员刘健等。这些教员都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来到延安的大学生。他们身上那股革命热情，比课堂上的讲课更使我们受教育。宣传队在出发前的一周内排出了二十多个大小节目：有庆丰收大秧歌，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京剧清唱、机器人报告时事、男声小合唱、小舞蹈，还有小话剧、歌剧《参军去》、《送郎上前线》等。

我们宣传队从吊儿沟出发，沿着延河前进。沿途遇到小村演一场，大村镇演两场，抵达县城演三场，休整一天。

隆冬腊月季节，我们每到一地，就把一个村庄轰动得热火朝天，大人、娃娃涌出村口，老村长为我们“号房子”，将我们分到各户农民家里。贫农会会长组织农民帮助我们搭舞台，常常是用几根木椽、几块木板，搭成一个小木台，再挂上小幕布。另外用四个大碗每碗放上四五根棉线粗捻，倒满清油，挂在四周的柱子上，点燃后，就是平台上的照明灯了。

在暮色苍茫中，秧歌队敲锣打鼓，沿村街走向晚会会场。

由二十人组成的队伍，男女角色配成一对一双地互跳互舞。舞蹈把各家各户的人们引到会场的戏台前面，台上的油灯亮了，晚会宣布开始。

“欢天喜地迎新春，宣传队来到张家村。张家村来实在好，丰收之后乐陶陶。哎咳一呀咳，丰收之后乐陶陶！”节目一个接一个，其中有一个《老乡送公粮》是杨典教员和炊事员老柳合作演出的小戏。杨典教员饰送公粮的白胡子老汉，他表演逼真，扬鞭打着毛驴送公粮，途中与一个送公粮的青年邂逅。这个青年的扮演者就是我们的炊事员老柳同志，他唱道：

“一根扁担，软溜溜的溜呀哈哼！软溜、软溜地溜呀哈哼！我担起公粮要去延安。

一路上，杨柳青、花儿红，吱吱吱吱沙啦啦！送上公粮，支援八路军！”老柳是一个目不识丁的陕北人，但他拥有黄土高原人的艺术细胞，不仅有着一副清亮歌喉，而且还有见景生情、出口成章的才能。他利用农村流行的民歌《走绛州》曲调，填进新词，他的演唱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春节期间，各户农民邀请我们分别到他们家里去吃年夜饭。

乡亲们的盛情款待消除了我们思乡之情。在小官驿村，一位抗日军人家属强老伯邀请我俩去他家欢度春节。我们进门行礼，脱鞋上炕，盘腿坐下。

“你们家在哪哒？”强老伯满脸笑容地问我俩。

“远啦，我们一个在四川东部，一个在关中泾阳。”

“你们出门多时了，想念大（爸）和妈吗？”

我们说：“想是想呀！可是，不打走日本鬼子，回不了家呀！”

强老伯说：“是这个理，日本鬼子打不走，哪个家也不能团圆。我的儿子也在八路军里当干部，如今在山西前线打日本，我们也想念他哩。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今打日本是大事，回家是小事。今天你们俩来家过年，是稀客，咱们就是一家团圆。”

强老伯一席话，触动了我们的心。我们瞧着他那慈祥的面容，仿佛看到了远方的亲人。

大妈把菜饭摆上炕桌，每人面前放了一碗黄澄澄的汤，香醇扑鼻。我们不解地问老伯伯：“这是什么汤？”

“这不是汤，”强老伯笑眯眯地说：“是咱们陕北有名的黄米酒。是我老伴儿亲手做的，酒劲不大，能暖身子，驱寒气。”

端起酒碗，我俩先向强老伯和大妈拜年并祝贺全家健康。

一碗米酒将我们和强老伯一家融为一体，窑洞里充满着和睦亲密的家庭气氛，我俩享受着父母般的慈爱。

三

1939年9月，我们第一队毕业了。战争催促我们加速获得革命知识，早日成熟，走向工作岗位。仅仅一年，美好的中学生活便告终。在这个大熔炉的一年里，我们中间有不少的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临走时有留恋，有兴奋，但，也有……

7月间，我们正准备毕业考试，有一天田汉汀拿着一封信和一个小手绢，信上没有写收信人名字。他那神秘的样子使我诧异。我在校一年里从未收到过信件和礼物，我问这是从何处送来的？

“是一位女同学交给我的。我以为她是写给我的，拆开一看，原来是写给黄克的。”田汉汀诡秘地微笑着。

我头脑发懵，心怦怦跳动，打开信封取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黄克同志：想和你谈一谈可否？希望答复。×队××”这位女同学是×队的优秀学生，她积极参加宣传队、歌咏队的活动，与我来往较多。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手绢上绣着一朵小红花，刺绣虽然稚气十足，却能表达出她的一片诚心。我怎么办，进退两难，没了主意。我俩商量了几种办法，都觉得不妥当，最后决定听听刘宪曾老师的意见。我们称他为“慈祥的老妈妈”，妈妈总是为儿子解脱困境的圣主。

刘老师笑着说：“这种事情已发生几件，青少年到一定年龄对异性开始产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无须惊奇。它很稚嫩、纯真，但也不够成熟，带有盲目性或幻想性。

中学时期是人生奠基阶段，努力积累知识，不应分心，尤其现在是战争时期，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加紧学习是第一，但是，遇到这种事情要冷静对待，不要令对方伤心，应做好解释工作。”

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应找她谈谈。”

刘老师说：“讲清楚道理就行了，别粗鲁地责备她。”

第二天傍晚，我约她到教室里，室内光线较暗，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色。她小声说：“我想问问你，毕业后到哪里工作。”

我说：“到农村去当教师。你呢？”

“我们可能还要学习一年，到时候再说吧。”她说：“我妈妈给我一块白布头，我绣上一朵小花，手工不好，送给你，请别笑话。”

我说：“很感谢，希望你努力学习。打鬼子的方法有多种，在后方生产、工作也是一样，干什么都是为了抗日嘛。”

“今后我们互相帮助，做个好同学。”她说。

“在毕业考试之前，我们很忙，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别再写信了，惹得人好奇、紧张……”我说。

她笑了，说：“是呵！是呵！再见吧。咱们是同学，以后我还会找你的！”

总共谈了 10 分钟，事情基本解决了，又好像没有完全结束。我们是很好的战友，毕业后各自奔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五十多年之后，我们又重逢在北京，都说延安中学时代的友情好像明月一样纯洁，有些幼稚，又不太幼稚。

1991 年 7 月 2 日 黄克

男，边中一队学生。曾任国家旅游局办公室主任、国际旅行总社办公室主任、总社党组成员。1980 年、1990 年两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田汉汀

男，边中一队学生，曾任中共北京市委财贸部副部长、北京市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难忘的青少年时代

朱宏到延安去

1959 年，毛主席接见美国历史学家杜博伊斯夫妇和女作家斯特朗时，曾指着我的伯父朱伯深说：“这个人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修十三陵水库时，刘少奇打趣地对我姑妈朱仲丽说：“要刨你家的祖坟了，你反不反对？”我们朱家是在明朝覆灭、遭满门抄斩的危急时刻，更名改姓逃到湖南宁乡县周氏家族中避难的。辛亥革命以后，由祖父那一代才改回本姓，也是由祖父这位著名的教育家开始，我们家三代人陆续参加革命，多达数十人。

1931 年底，我侨生于印度尼西亚，生活十分优裕。但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大姐回国了。1939 年，母亲被父亲遗弃，她肩负着祖孙三代的生活，以乞讨为生。大伯和姑父王稼祥商量把我们姐弟送到延安去。那时，大弟 6 岁，我 8 岁，大姐 9 岁。临走时，祖母给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吊上一个小红口袋，口袋里面放了一尊小佛像。最令祖母不放心的是她的长孙朱忠洪，她特别嘱咐大家要多多关照忠洪。祖母重男轻女，从小就把我们姐妹四个称为“四床脚”，而把两兄弟说成“两枕头”。我们随一位姓贾的叔叔一块上路，还请了一个挑夫，一头挑着我们的衣物，另一头挑着走不动路的洪弟。第一站是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那是中国共产党人去边区前的集合地，我们到那里还开了一个百余人的茶话会。我们这群孩子成立了“小鬼队”，队长是彭士禄，他是彭湃烈士的长子。我们开始过集体生活，天天唱革命歌曲：“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保家乡、杀敌人……”

很快，我们又从桂林出发了。不过，这次不再步行，而是坐汽车了。

过嘉陵江时，我们一群男女孩子们挤在船舱里，翻起身来，还得喊：“一、二”大家同时动作。有时年纪小的尿了床，我们衣服湿了，还不知道是谁尿的呢！

我们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之后，住在一个山坡上，竹篱笆把住地四周围起来，竹筒做成的水管引来清泉水。山下是一个国民党的学校，校园中的柚子树清晰可见。大人不让我们随便外出。如果见到穿黄铜扣黑大衣、戴墨镜的不速之客，就要赶快散开。我们小鬼队的生活挺不错，每天快快活活地做游戏。嘴里念着：“一大林、二大林……四大林（斯大林）”这时都各自争着指自己的鼻子；而一念到“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便争着指对方。我们还演节目，唱革命歌曲，渐渐成熟起来了。一天，我们睡在地板上，国民党的狗腿子来查房，把大一点的孩子叫醒问：“到延安去做什么？”“找爸爸，找妈妈！”我们的父母哪里在延安，我们要找的父母是共产党，是毛主席和革命前辈呵！

到了最后一个关卡，我们被国民党包围在一个草坪上，四周的机关枪都对着我们这些无辜的孩子。我们中间许多孩子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都是革命的后代。护送我们的同志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要开枪，就把我们打死，千万不要把孩子们打死呀！”就是这一次，为我们押车的副官李涛同志被扣留了，据说后来是经周恩来副主席交涉，他才被释放回延安的。我们随身带的枪支都给换成了旧的、坏的；从家乡带的土特产、被褥衣物则被洗劫一空。然而，我们还是突破了这一关。汽车再次起程，经过数月的跋涉，当驶过一座破旧不堪的木桥时，我们终于看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我们欢腾起来，唱着：“呵！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我们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享受着真正的自由，呼吸都变得清爽畅快了，那种心情，真是难以用笔墨描绘。

这时，已经是 1940 年的冬天。我们头一次走过结了冰的延河，河中央比两边稍凸，这也令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孩子大开眼界。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所在地，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姑姑朱仲丽和姑夫王稼祥。我在家时时就常听到祖母夸姑母：“我的八妹子赛过儿子，比儿子还能干！”那时，我们流着鼻涕，拖着单布鞋，两手空空，又可怜、又狼狈。姑姑拉过弟弟来说：“洪洪，喊我一声‘妈’！”弟弟出生的喜讯，还是姑妈第一个告诉祖母的，今天喊她一声“妈”也是天生的缘分。从此，洪洪有了养母、养父。才比他大两岁的我又是高兴，又是羡慕。我只好跑到“小桃林”里去寻找父母，见到一对对男女游人，就跑着绕到他们前面，回头看看他们的面孔，结果总是失望。我的父母还在国统区呢！

延安中学的日日夜夜

我是 1944 年秋进入延安中学的。我们与一些烈士子弟、高干子女一起被编入九班、十班。这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方志敏烈士的长子方英敢在井沿上走，边走边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屎！”他因那股调皮劲，常常被罚面对墙坐。刘志丹烈士的女儿刘力贞，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演起了太平天国的洪萱娇：“待我登高一望……”一边道白一边上了桌子。有一次，我们组织学习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的模范事迹，顽皮的孩子们仅仅老实了两个星期。

延安中学实行的是供给制生活。冬天有棉衣、棉裤、棉鞋或毡鞋；夏天发 2 尺半长的灰军装，一双单布鞋。有的女同学为了美，把军衣改得很合

体。我在那时学会了用毛线织袜子，还曾给姑妈纳了一双鞋底，然后她自己用线勾成了一双凉鞋。我们的军装是用“黑格兰”草根把本色布染成了褐色的。夏天，延河就是天然的洗澡池，女同学在上游洗，拐一个弯男同学在下游洗。衣服只有一套，下河前脱下来找块麻石板在上面搓，用灰菜当肥皂，洗净后晒在河边的草丛上，然后潜到水里去玩捉迷藏，等衣服干了再上岸穿上回学校。那时，我们学习用的是马兰草做的纸；牙粉是稻壳灰配点咸盐；

还自制了丰足牌火柴。在陕北，冬天的西北风一吹，脸和手都会破裂，我们就用羊油擦脸。

我们住的窑洞是大同学们挖的，窑内有专放油灯的墙洞，有取暖用的炕炉，还有一条沟沟儿，上面盖上瓦，那就是烟筒。开始，我和罗瑞卿同志的长女罗玉华睡在一个土炕上。每到星期天，我们就结伴回王家坪。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学校，路过飞机场时，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吓得我放开脚步只顾奔跑，越跑越快，好像身后总有人跟着似的，一回到学校就上炕蒙头大睡。

当年我们是在露天食堂吃饭，用小罐子装饭菜，有的用土钵子，少数人用搪瓷碗。

一般都是吃小米饭，小米饭像沙子一样，我们南方人实在不习惯，只好拌着辣椒面吃。

有时可以吃到“金银饭”，是用大、小米合蒸的。喝的是“青龙过海汤”——菜汤上面漂着油珠和葱丝；“海底捞鱼”——菜汤底下有点土豆片；此外还有“列宁饼干”——小米锅巴。我们的生活虽然如此艰苦，但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白天紧张地上课学习，晚上我们还集中在窑洞里读报。读报的人凑在小油灯下，其他人都坐在黑暗中，大家非常关心政治和时事，没有一个打瞌睡的。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报纸上有连载的《洋铁桶的故事》、《孔二小姐去美国结婚》、《乌鸦告状》等故事。

第二次行军

1946年夏天，经过在延安中学的长时间的锻炼和学习，我已经15岁了。我们姐弟三人开始了第二次行军。那时，姑妈随姑夫去了苏联。我们由中央组织部的李鉴同志负责。

在出发前，李鉴夫妇还为我们准备了肉松，组织上分配给我们一条毛驴。大家都背着行李步行，我们虽然年纪小，又怎么好意思骑牲口呀？10岁的洪弟，也跟大家一道翻山越岭。队里走在前边的同志，常在路旁的土坡上写些鼓励的话，如：

“加油！洪洪，前面就到站了！”等等。刚走到了第一站四十里铺，我们的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因为没有经验，穿的是新发的草鞋。以后每天走90里路，每天都到一些新地方，也都遇到一些新鲜有趣的事。要过黄河了，黄河的水黄得像泥汤一样，驮行李的牲口一动不动地站在渡河的木船上。调皮的洪弟将一个旧铝水壶抛向黄河的急流中，口里还喊着：“留作纪念吧！”有一天，我们过十里河，干涸的河床上全都是石头子，连小毛驴都无法插蹄，何况人走呢？我们的脚板硌得很疼，我们多么希望走平坦的黄土路啊！但是，为了早日到达目的地，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到了张家口，算是一大站。队伍开始休整。行军途中，每天清晨天不亮或到晚上天黑时，领队的人用小油灯照路，后面的人摸着，叫着，跟着走。

张家口有了电灯了。延安的小土包子洪弟，见到了电灯很奇怪，他把螺丝口灯泡拧来拧去，嘴里喃喃地说：“命令你关，命令你开……”突然，他被电击了，一时面色苍白，倒在那里。幸而他反应快，使足力气狠命一甩，灯泡甩在地上，人得救了。罗玉华说：“我姑姑就是在洗澡后，用湿手去开灯，触电身亡的。”这些常识对于从山沟里出来的人，都是陌生的。

我们姐弟三人被编入“东北干部队第五大队”，和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师生坐在一辆大车上继续向东北进军。

途经××省的黎明寨，我们住进蒙古包，蒙古包外边的墙上贴着一块块牛粪，是晒干了当柴烧的。蒙古包内沿着墙脚是一个接一个的地铺，中央有一个铁制的三角架，架上有口铁锅，锅里煮着鲜牛奶。我们吃一口炒小米，喝一口鲜奶，这就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了。

经过热河省时，已是九、十月了，天气渐渐冷起来。可是一路上仍然可以看见赤身裸体的孩子们。大道两旁的深沟里还有冻死的女婴。铁轮牛车在沙漠里行走，还不如人徒步走得快呢！一天只能走30里地，只要见到有水的地方就要停车，大家下来烧些开水喝，吃点东西，然后再上路。土豆是我们的主要口粮，我因胃酸过多，只好饿吐子或吃几口干炒面充饥。

换了胶轮马车，就快到多伦了，正逢八月十五中秋节。突然从队伍前方传来八路军连长“停车”的命令，四十多辆马车，马上停了下来。我们的前面是一片稀稀落落的谷子地，地里还种了不少大烟。根据连长的经验判断，这里是国民党的土匪窝。他们在居高临下的树林里有一个岗哨，发现了我们，随即向天空鸣枪。紧接着我们八路军的一个战士便冲了上去，敌人不投降，且将手中的步枪在石头上摔成两截，最后被我们俘虏了。

山下屯里的土匪一时乱做一团。在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没有牲口就难逃命了。他们的马拴在住房窗下，有的来不及逃就被抓住了；有的马被打死，两人骑了一匹马逃生。

屯里还圈着许多从老乡那里抢来的牛、羊、猪等。连长果断地决定：“今晚的宿营地，就是土匪窝了。”大家只好服从命令，但心中忐忑不安，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醒来后听说我们的左边、右边、后边都有国民党的“人海部队”。事实证明连长的决定是对的，如果敌人发现我们车上都是些女人和孩子，机关枪和大炮也是伪装的，那不糟啦！十月天了，我们在山头上宿营，天老爷下起雪来，脚下流着融化了的雪水，大家相互依坐着过夜。

过河后我们进入了一条深沟，在两旁山坡上的丛林里埋伏着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

他们低声喊着：“快！快走！”队伍鸦雀无声地在快速前进。如果敌人在山腰发现了我们，我们将无处躲藏，会全部被消灭在深沟里。

天已黑了下來，伸手不見五指。我們壓陣的尾車從另一條道繞到最前面，突然轟隆一聲，真是天翻地覆，人喊馬叫，車、馬、人、物全翻在數丈深的山谷里。我受傷最重，已不省人事。我被抬到大路上，躺在路邊，一陣冷風吹過，我蘇醒過來，頓時感到有些疼，我哭起來了。“咔咔！”遠外傳來土匪的槍聲，帶隊的同志厲聲命令道：“不許哭！”

有情況……”我滿口鮮血，左門牙也掉了一塊；左下肢有處蚕豆大的傷口，鮮血直往外涌；踝關節上還被木車筐扎傷了。我聽到命令，強忍疼痛，咬牙止住哭聲。戰友們用衣服幫我包扎住傷口。翻車時，馬從洪弟的身上越過去，他一滾坐在溝里了，兩隻腳埋在泥土里；還算幸運，沒有要了他的

命。随后，又把我们重伤员抬到别的车上。

到了金棚湾，将剩下的一半马匹交给了当地政府（在途中有一半马匹被土匪用它们熟悉的口哨叫回去了），车夫们都不敢要这些马，因为每匹马的臀部都有土匪打的钢印，怕土匪找麻烦。

我和大姐只差一岁，平日常吵嘴。我的腿受了伤，走不了路，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别人跑了，我只好独自一人留在车上听天由命。姐姐说什么也不离开我，躲在车旁陪伴我。土匪不仅要东西，更重要的是要共产党人。听说一位女同志因为解手掉队后，下落不明，很可能是被土匪抓走了。

这次行军历时四个多月，终于到达目的地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市。我们先后进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设的外国语学校读书。1947年我还参加了东北一个地区的土改，在土改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我在战火纷飞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成长起来，今天成了一名中医师，这都要归功于党的培养，老师们的教导。我忘不了延安，更忘不了延安中学。

（金茂年整理） 朱宏

女，曾用名朱忠芳。延中九班学生，中国中医研究院主治医师，擅长用中药治疗白血病等疑难杂症，被列入《中国科技工作者名录》《疑难杂症名医辞典》以及《开拓者》（袁宝华题第14集，第378页）。著有《家庭中医百科全书》。

育人的乐园

鱼进也

远望桥儿沟，山上五谷庄稼，山下林荫溪流，山坡上窑洞层层叠叠，真是天然的山涧林园。食堂、泉井、球场点缀其间，井然有序，幽美协调。歌声、琅琅读书声、欢声笑语在沟坡上下回荡；一色灰制服的少男少女们活跃在这片黄土坡上，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育人的乐园延安中学。

溪边晒太阳

战时的延中生活十分艰苦，但艰苦能够培养人的情操，磨练人的意志。我们这些同学虽说都是娃娃，但生活一切自理，独立生活能力很强。星期天自由安排，读书、写作、打球、游泳、滑冰、劳动、爬山、野游……说是休息，实际很忙。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

1945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约了几位同学，有刘玉凯、韩秉义、高耶夫、李精林等，去桥儿沟的后沟野游、洗澡。饭后，我们沿着小溪逆流而上，大家谈天说地，自由自在，嘻嘻哈哈，好不快活呀！夏日的延安，确实是很美的，阳光灿烂，野花遍野，山景如画。我们走到一个水潭处停下来，潭水又清又深。我们脱掉衣服，跳下水，游起来，有的还打水仗玩。游得累了，都爬上岸来搓身上的污垢。过后又洗起衣服来，有的同学拢来灰条草往衣服最脏处擦，有的同学拣块圆形的石头捶打衣服。洗好了，拧干了，就晾在石头上，晒在野草上，我们则坐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晒太阳，一个个像只猴子蹲在石头上，但都是不长毛的猴子，光着赤条条的身子。大家都说这

叫晒鳖盖，我们每人只有一套衣服，只能光着身子等衣服晒干。晒得受不了了，就跳进深潭里去游一会儿，游累了再爬上来晒太阳。有时肚子饿得咕咕叫，不管衣服干不干，穿上就往回走。回到学校，衣服也干了。当时晒鳖盖，勾起我们很多议论，有的同学说：“小日本鬼子太坏了，把中国的衣服都抢走运回日本去了，逼得我们这样晒鳖盖。”

激起我们强烈的民族仇恨。有的说，国民党反动派也够坏的，围困边区，妄想困死我们，同样激起我们强烈的阶级恨。一位同学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日本鬼子最可恨！

害得我们钻山洞。

国民党不是好东西！

害得我们晒鳖盖。

灰条草：一种含碱的野草，还可当菜吃。

亲密的战友

世界上没有比革命战友更亲密的。我们延中的师生来自五湖四海，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无比亲密，无比团结，犹如兄弟姐妹，又胜过兄弟姐妹。革命的理想，事业的追求，把我们连结在一起，融为一体了。我们同欢乐，共患难，同学习，共战斗。如果哪位同学病了，不论是男是女，大家都会自觉地、主动地帮他打饭、送水、送药、补习功课。在生产劳动中，总是大同学帮助小同学，男同学帮助女同学，但在补衣、纺线、织袜等方面，又是女同学帮助男同学。这种革命友谊在解放战争年代更是充分地表现出来。

1947年初，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和平协议。胡宗南率军20多万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侵占延安后又向绥德扑去。

延安的党政军机关，于3月前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延安中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野战医院开赴前线。4月的一天，我们行至子长县西面，上级命令立即转向安塞吴旗一带，并于当天日落前越过安定城西沟岔。我们距安定城有30多里，晚饭来不及吃了，同学们把半生不熟的小米饭装在缸子里，边跑边吃。这时，我的肚子疼起来了，越跑越疼得厉害。王黎明同学把我的枪拿去背上，后来又把背包也拿去背上。我还是疼得跑不动，简直要趴倒在地上了。太阳不知什么时候钻进西山去了，天黑了，已看到敌人在放火烧安定城了，城外山上山下都有民兵在警戒。我看到王黎明同学也跑不动了，就想：要死我一个人死吧！一个拼几个也划得来。我对王黎明说：“你们先走吧，先突围过去。我是个团员，身上还有两颗手榴弹，一个是敌人的，一个是我的。”但黎明同学不听，位着我一股劲地跑，要我忍住疼一块突围过去。我们跑呀跑呀，终于越过安定城，钻进深沟，翻过山去，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这就是延中同学的精神风貌，是真正坚强的革命战友。

5月间，羊马河战役后，我们转战在安塞吴旗一带。白天敌人飞机炸、机枪射，我们就夜行军。羊肠山道，难以行走，阴雨连绵，道险路滑，炮火连天，情况危急。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同学，从国统区转来延中学习没有多久，她走不了陕北的山路，在一天的夜行军中，滑倒了还扭伤了脚骨，腿脚肿得很粗，她还硬说不疼，走不成还要坚持自己走，给她找了根棍拄上，她还是摔倒在地，站也站不起来了。怎么办呢？

我们几位男同学毫不犹豫，背着她继续行军，逢山过山，逢河过河，我们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在背她的同学中，我是比较小的。有一次，我实在背不动了，摇摇晃晃，差点儿被压倒在地上。即使是这样，我们大家还

是争着背，因为她是同学，是女同学、女战友。远志同学当时很难为情，看到我们累得不行了，便让我们赶快把她放下。我们不听她的，背起她一股劲向前走，还鼓励她勇敢些，忍住疼、战胜疼痛。就这样，一连几天背着她行军。以后，我们请老乡号了头毛驴，让她骑上，一村一村地转送，最后把她送到中央机关的队伍中去了。革命胜利后，我们到北京开会时去看望远志同学，谈到这段战时的经历时，倍感亲切。这是我们延安中学的光荣。 鱼进也

男，曾用名鱼锦彦。延中十一班学生。延大毕业后从事新闻、监察工作。现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并任《徐特立在延安》一书编委。

艰苦，却很幸福

聂承勇

1941年冬，陕甘宁边区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包围之下，各方面都是非常困难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比起现在来，那真是天壤之别。可是对于我这个从苦难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到了延安，能在延安学习、劳动、生活，真好像来到了天堂一般。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一桩桩、一幕幕的往事，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闪过，于是随笔录下几段趣事，铭记几段心曲。

第一堂英语课

上课没教室，没桌子，没凳子。我们是在窑洞前的平地上支上一块黑板，用碎砖当凳子，用自己捡来的小木板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当桌子。就这样，认真地听老师讲课，记笔记。

我现在还记得上第一堂英语课的情景。教英语的是王刚老师，他中等个子，比较瘦，留着分头，头发又黑又亮，长得很精神，穿着也比较整齐，潇洒地走上课堂。班长肖贵臣喊了声：“起立！”同学们唰地一下全站了起来。王刚老师马上说了句英语：“Good morning comrades! Sit down please.”（同志们，早晨好！请坐下。）“Open your books, Lesson one.....”（打开你们的书，翻到第一课.....）王刚老师一上课就全用英语讲课，我们这些“土包子”都听傻了，莫名其妙地抬起头呆在那里。同学们和我都感到英文课很新鲜，也非常有兴趣。可是，那时没有课本，我们的课本是王刚老师自己编写的，是他不辞辛苦地把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印机印出来的。马兰纸很粗糙，印起来很费劲。尽管如此，英语课本印得仍然非常清楚。我记得第一课第一个单词是：mother（母亲），第二个单词是 father（父亲）。

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外语，觉得很好玩，下课后，男女同学间就互相开玩笑来。

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见了女同学就让她们叫：“father”，女同学也不客气，就让男同学叫她们“mother”。有一次王敏清看见了我，从我背后将我的手臂向后一扭，说：“蛮子，你快喊 father，否则你就别想走开。”我也不示弱，说：“你先叫 mother，我再叫也不迟。”这样僵持了几分钟。这时，

班主任高时同志看见了，便批评了王敏清，说他不应该欺侮女同学。我乘机赶快溜掉了。

从此以后，我对外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盼着上英语课。可是，没过多久，不知是什么原因，英语课停了。到解放前夕，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开始学习俄语，才了却我的心愿。我毕业后，在航空工业部干了一辈子俄文翻译，为我国的航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摘酸枣

我记得，1943年的秋季，我们全校师生又上山去挖土豆。

在上山的路上，我们几个女同学一边玩，一边摘酸枣吃。

我只顾摘酸枣没有留神，脚一滑，就叽哩咕噜地滚到山坡下去了，在快到山沟底下时，被一株较大的酸枣树挡住了，差一点没摔死，好险呀！当时，刘美生、夏雯几个女同学都吓坏了，惊呼：“不好了！蛮子滚到山坡下去了，快来救人呀！”

所有听到喊声的老师和同学都来了。他们把准备背粮食的绳子扔给我，让我牢牢地捏紧绳子，大家一起使劲，把我从山坡下吊了上来。班主任高时同志马上走到我身边：“摔坏了没有？伤没伤着骨头？还能走路吗？”我当时非常感动，这么多老师和同学都来关心我。我说：“谢谢大家，我没有事。只是胳膊和腿被酸枣刺划破了。”高时老师马上问我：“痛不痛？还能去挖土豆吗？”我坚定地说：“不痛！能去。”

在挖土豆时，我比以往干得更起劲，挖的土豆更多。尽管我满身血痕，可干起活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痛和累。

夕阳西下，我们收工回去时，每个同学的口袋里都装满了酸枣。学校丰收了，个人也丰收了。山上的野百合比较少，我们一看见红艳艳的花，就跑过去把它连根带茎一起挖出来，把百合上的土拍一拍，放进嘴里就吃。

回到学校以后，我姐姐看见我，心疼地说：“你看你，怎么不留神，要摔个好歹怎么办？我们只有姐妹两人了，你以后可不要调皮了，要多加小心才是。赶快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好，补一补。”

我姐姐是延中二班学生，她比我大5岁，我们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她就像慈母一样关心我，照顾我。她在班上和学校，还是关心和照顾小同学的模范。我从心底里感激我的姐姐。遗憾的是她过早地去世了，死时才三十多岁。

乐天派

我从小是一个可怜的孤儿，衣食无着落，几乎饿死。是共产党把我从水深火热的国统区湖南长沙救了出来，送到延安的。我在延安就如同在天堂一样幸福。在这里，我不仅吃穿有了保证，还上了学，读完了小学，又上中学。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学好了本领，长大了去打败日本鬼子，建立一个富强的、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和侵略的新中国。在学校这个大集体里，大家团结一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老师和校领导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我们的成长，我有什么理由不高兴，不快乐呢？所以，同学们叫我“乐天派”。

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她叫夏雯，个子不高，人瘦瘦的。一到星期天，窑洞里常常只剩下我们俩，她非常羡慕我这个乐天派，而她却有着驱不散的愁和苦。她是东北人，家乡被日本鬼子侵占了，她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日寇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因而，一旦没有人时，她就想家，一想家

就肯定要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啊……。”边唱边哭。不论是谁，听了她的歌声，都不禁要潸然泪下。我一听她这凄惨的歌声，也情不自禁地陪着她哭起来，还陪着她唱。我很同情她，我知道失去了爹娘，无家可归是什么滋味。有时，我也安慰她、劝劝她，跟她一同出去玩，以解除她心头的愁闷。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这一切好像就在眼前。夏雯和我现在仍然是很要好的老朋友。

节假日期间，有许多同学都回到父母身边。父母在部队的，就接回部队去了；父母在西北局工作的，就回西北局去了；有的被中央组织部接走了。剩下我，就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当秘书长的罗迈同志那里去玩。罗迈伯伯是我父亲聂复明烈士的老战友，他亲口对我说过，我父亲救过他的命，使他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我父亲是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抓去，英勇就义的。罗迈伯伯对我这个孤儿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从各方面关怀和照顾我，并谆谆教导我，要好好学习，掌握各种知识，多学些本领，继承先父的革命遗志，打败日本鬼子，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 聂承勇

女，延中三班学生。北京曙光电机厂科技情报员兼翻译、副译审，译著有《苏联红军步兵操典》、《旋转变压器及自整角机》等。

我们六班

高诺夫一

1944年夏我小学毕业，我们全班被保送到延安中学，编为六班。同学们感到无比的高兴。踏进中学的门，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最突出的感觉是自由了；除上课之外，不再像小学时管理那样严格。但是在开始一个时期，班上的秩序也真够乱的，吵架、打架时有发生。也有人迟到早退，随便说话，顶撞老师。晚上熄灯后还说话……表现好的同学往往受到讽刺、挖苦。要办成一件事困难很多。比如出墙报，一般号召没人写稿，便硬性摊派；不能全刊登时，有的同学又骂大街。又比如读报，组长指定某个同学读，他不读，反过来质问组长：“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叫我读呢？”组长只好说：

“那就轮流读吧！”又有人不同意，说有的人读的声音小，听不到，或者听不懂。

闹得小组长也没办法。

有一次潘同和老师给我们讲数学，是复习小学的课程。班上一些同学公开起哄，大喊大叫：“我们学过了，要求教代数！”

潘同老师说：“不行！按照学校规定，必须复习小学的课程。”

同学们吵个不停，简直乱得像一窝蜂。一连好几天，课程无法进行。潘老师耐心地给大家解释也无济于事。潘老师说：

“你们这样闹下去哪行呢？这样吧，我出一个题，大家能答上来，就讲新课，答不上来就继续复习。”同学们一听，高兴地异口同声说：“行！”大多数同学很自信，心想算术题难不倒我们。潘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什么是定理？”几个字，然后把粉笔头一丢，拍了拍手走下讲台。这时教室里鸦雀无

声，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儿，潘老师走上讲台问：“怎么样？能答上来吗？”没有人回答。又过了几分钟，有几个同学小声地说：“算了，复习吧！”潘老师笑了笑说：“怎么样？是不是答不出来？那就继续复习小学的算术。”从此以后，同学们只好安下心来复习算术。

两个月以后开始讲新课。讲代数时，潘老师要求每个题除用代数计算外，还必须再用算术计算一遍。有不少同学只会用代数计算，却不会用算术算。潘老师对大家说：“你们该明白了吧！算术是数学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打不好，将来学高等数学也会遇到困难。学了代数就把算术忘了，那怎么行？”一席话说得同学们心服口服。

二

星期六晚上是最不好过的。那时延安没有电影院，没有戏院，就连今天最普通的收音机也没有。有家的同学回家了，个别会跳舞的同学去鲁艺或边区医院跳舞。剩下的同学便感到孤独无聊。于是，有人就不断想出调皮的新花招。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去舞会逛了一圈，返回宿舍的途中，发现我们学校第二大灶的一只母狗在一间破房子里下了一窝小崽，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念头：“弄一只小狗煮着吃，改善一下生活。”经过一番研究，大家推选足智多谋的王银生去狗窝里抓狗。王银生答应了，他真不愧为智多星，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见他猫着腰，慢慢地向狗窝接近，我们埋伏在四周担任警戒、瞭望和掩护。王银生快接近狗窝时，向破房子投去一块小石子，没有动静，证明母狗不在窝里，王银生三步并作两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破房。在黑暗中，听到小狗吱吱地叫，他低头一看，有六七只小狗抱作一团，说时迟，那时快，他抓了两只塞到棉衣里面，翻身出了破房子。

我们四面埋伏的人不约而同地跑了过去。这个问：“抓住没有？”那个问：“几个？有多大？”王银生气喘吁吁地说：“两个！别问了，回去再说。”我们大家非常高兴，好像打了胜仗一样，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我们大家一齐来到王银生住的宿舍。他把小狗从怀里掏出来放到地上，一只是黑的，一只是花的，垂着尾巴，摇摇摆摆地向前走，嘴里发出吱吱的叫声。大家说太好玩了，有的说不要杀了，我们把它喂起来。王银生说：“那不行！要让学校知道了，追查下来那还了得；赶快动手吧！”大家一想也对，不能叫外人知道，便让王银生和我杀狗，还派了两个人在门外放流动哨，有人来就吹口哨；派刘育法去另外一个宿舍给那个宿舍的人讲《水浒》和《三国》，借以牵制住他们。

王银生找了一根绳子，套在小狗脖子上，我们两个死劲拽，小狗不动了，我们以为死了，可是绳子一松，小狗又站起来了，在地上走来走去。我的心软了，说：“算了吧！”

别勒了，还是把它们养起来吧！”王银生说：“不行！一不做，二不休！重来！”又把绳子套在狗脖子上，我们两人握住绳子的两头，两人脚对脚，身子向后，使尽全身力气，又让一个人用镰刀猛击狗头，这才把狗勒死。我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而王银生毫无倦意，活像一个熟练的屠夫，用绳子拴着狗腿，吊在床头上，很快地将两只狗的皮剥下，内脏送到山沟里挖坑埋掉，狗皮留着做胡琴用。狗肉放在一个铜脸盆里，上边再扣上一个脸盆，架

在木炭火上煮。又派了一个人去伙房想办法弄了一把盐。不一会儿，肉煮熟了，我们把派出去讲故事和放瞭望哨的同学撤回来，大家围坐一圈，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由于警戒已撤，突然间，涂首奎闯进屋来，把我们吓了一跳，他说：“哈哈！好香啊！你们做什么吃？哪来的肉？”

……”我叫他坐下吃吧，要他不向任何人说。小狗肉又香又嫩，好吃极了，小骨头都能咬动，最后我们把汤也喝光了。

三

进入 1945 年以后，班上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班上建立了党支部，真正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堡垒，班级领导的核心。

党组织在当时还是秘密的，没有在群众中公开，但谁是党员，同学们心里都有数。

因为每个党员不但学习刻苦用功，而且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吃苦耐劳，处处作同学们的表率，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我和一些同学，对党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只看到那些党员同志个人表现很好，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但对为什么要入党，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还不甚了解。

1944 年 8 月的一天，我和李波同学返回保小，看望母校的老师。雪原老师对我俩讲：“现在你们已升中学了，年龄也都大了，各方面要严格要求自己，可以考虑入党的问题了。入了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可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这一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以后，我经常找党员同志谈心，请他们帮助我。有时还找一些有关党的知识的书看，看的最多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越看兴趣越浓，全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量。支部根据班上的现状，做了通盘部署，给党员和积极分子分配了任务，要在最短时间改变六班的落后面貌。我和李波同学于 1945 年 7 月 6 日入党，和我俩同一天入党的还有十二班的高世文同学。入党仪式由学校党总支主持。大概由于会议庄严，气氛严肃，心情过于紧张的缘故吧，主持人叫举起右手宣誓，高世文同志却把左手举了起来；主持人说：“错了！”高世文马上把左手放下。主持人说：“举起右手！”高世文又把左手举起，大家想笑又不敢笑；就这样一连几次，他都是举起左手，最后还是主持人走过来用手把高世文的左手按下去，把右手抬起来。宣誓时也是结结巴巴，可见当时是多么的紧张！这以后要求入党的人更多了，班上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向上的气氛。

四

李星华老师教我们班语文，她是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的女儿。有一天全班同学要求她讲李大钊的革命故事，她答应了。她说：“那是 18 年前的事了。1927 年 4 月，父亲每天总是早出晚归，忙着工作，有时候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把有字的纸投到火炉里烧了，我在旁边看，觉得奇怪，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局势越来越严重，许多人劝父亲暂时离开北京，母亲也劝过他几次，但他都拒绝了。可怕的一天终于来到了。4 月 6 日清晨，母亲带着妹妹去儿童娱乐场散步。父亲在屋里写字，突然枪声大作，乱喊乱叫冲进来一批匪徒，手里端着枪，嘴里嚷着‘不要放走一个！’不由分说把父亲五花大绑拖走了，我也被带走了……”同学们听到这里肺都要气炸了，这是什么世道，怎么能随便抓人？！星华老师接着说：“那时候有什么理可讲？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

代。敌人把我带到警察厅，母亲和妹妹也被他们抓来了，把我们关在女拘留所。十几天过去了。有一天，一个警察突然叫我们的名字，说要提审。在法庭上见到了父亲，他仍然是那样的安详，身穿一件旧棉袍，没戴眼镜。父亲脸上表现得安定、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就是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对法官说：

“这是我的妻子、女儿，一切与她们无关。”想不到这是我们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4月28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几个字，立刻感到眼前像蒙上了一层云雾，倒在床上了，母亲也一连昏过去三次……”星华老师泣不成声，全班同学都在流泪。过了一阵，她又慢慢地说：

“母亲醒过来，要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一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我失去慈祥的父亲，革命队伍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对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这一笔血债必须加倍偿还！我们现在只有努力学习，将来上前方多杀几个敌人，为李大钊同志报仇。

李星华那时刚生了一个女孩，上课没有人照看，走时把孩子用绳子拴在床头。老鼠把孩子的脸、耳朵、鼻子都啃了，直到星华老师回来才轰走老鼠，孩子还在哇哇地哭。

1947年战争爆发撤离延安时，带不走孩子，便把她送给老乡抚养，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才把这个女孩子接到北京，至今她脸上还留着伤疤。

五

1945年春天，天旱少雨，边区政府发出防旱备荒的号召。

学校组织全校师生上山开荒。每天，我们起得很早，不吃饭便上山挖地，到上午10点左右回校吃饭，饭后又上山，至下午3点钟左右收工吃饭。由于粮食紧缺，一天只吃两顿饭，里面还放了许多野菜。

学校对岸的山坡上有一些荒地，除了种西红柿外，还种了水萝卜、圆葱、包心菜、南瓜和甜高粱等。并分工由专人负责管理，按时除草、松土、施肥、浇水，等成熟了统一分给大家吃。

1946年秋天，王震旅长和王首道政委率领三五九旅从湘、鄂、粤突围回到延安，有一部分人住在我们学校。一年以前，我们全体师生曾在桥儿沟街上列队欢送他们，今天又在桥儿沟欢迎他们。

有一个连住在我们班旁边，这个连伤亡很大，只剩下7个人了，然而我们看到每个战士仍是那样威武雄壮，令人敬佩和羡慕。大家一致同意把班上生产的包心菜、南瓜、圆葱全都送给他们吃。我们很多同学每天晚上都去找他们玩，请他们给我们讲战斗故事。

一位副连长说：“战斗打的多了。”他的声音很低，而且有点颤抖，我们大家的心情一下紧张起来了，其他战士都低下了头，整个屋子里的空气好像都凝固了。

他继续说：“仗几乎天天打，要打日本鬼子，又要打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十分残酷，伤亡很大，我们这个连100多人，只剩下我们7个人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头也更低了。我发觉他在流泪。他声音沙哑地接着说：“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他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伤，哭出了声。那几个战士也都在流泪。我们几个同学心如刀绞，个个都流泪了。

有一个排长接着说：“在一次战斗中，敌人的手榴弹扔到王胡子（王震旅长）的脚下，警卫员手疾眼快地把王胡子推下土坎，他把手榴弹捡起来又

扔向敌人。又有一次也是敌人的一个手榴弹扔到王胡子身旁，旅长还未发现，警卫员离得较远，那个警卫员眼见手榴弹已在冒烟，他一个箭步冲上去，趴在手榴弹上，轰隆一声巨响，警卫员牺牲了，王震旅长抱起警卫员流着泪说：‘好孩子，好孩子，你死得好惨啊！……’

“突围中粮食异常困难，王震几次动员大家把他的马杀了给大家吃，但是同志们怎么忍心呢？马杀了王旅长骑什么呢？”

最后为了保存战斗力，还是把马杀了。王震旅长一连几个月没有理发，满脸胡子，战士干脆不叫他旅长，叫他‘王胡子’。这就是王震的绰号的来源。到延安时他还是满脸胡子，给毛主席汇报完工作，毛主席催他快回去理个发，把胡子刮一刮和爱人团聚去！”

通过和三五九旅战士的接触，我们受到很大教育。战士们是那样可爱，我和我们许多同学都多么希望也能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1946年夏天，学校放麦收假。六班和八班抽调12人组成一个生产队，由我和许忠翁带队去富县羊泉镇给老百姓割麦、除草，挣一点工资解决日常生活用品，同时在劳动中向群众学习生产知识，培养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那时的困难，今天的青年是无法想象的自来水笔多数同学没有，只能用铅笔和蘸水笔，有的同学用子弹壳做蘸水笔，倒也别有特色。把一枚步枪子弹的炸药倒掉，然后把弹丸的铅用火烧化了也倒掉，插上笔尖，就是一支蘸水笔，不用笔时，把笔尖插进弹壳，又成了一枚逼真的子弹，令人看了又称赞又羡慕。

全班在20多天的假期生产中，共收入边币899000元，解决了大家的生活用品问题，同学们都非常高兴。

不少同学还利用课余时间纺线挣钱。从合作社领棉花来，纺成线再交回合作社，纺1斤棉花可以挣1~2万元（边币）。

记得有一次我用纺线挣来的钱买了4尺白布，缝了两条裤衩，还买了1个烧饼吃，真是高兴极了。

六

1946年10月，张家口失守以后，延安的形势日趋紧张，各机关、学校、部队展开了紧张的备战活动，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已不能进行。学校成立了自卫军连，高鸿文是部队来的，担任连长。每班一个排，我是六班的排长。每天进行队列训练，练行军，练打背包，还进行实弹射击、站岗放哨等一系列军事训练。刚开始时，许多同学连立正、稍息、向左向右转都做不好，闹出许多笑话。不过同学们的情绪很高，恨不得马上就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针对敌人可能对延安实行空降，还特别进行了打空降兵的训练。

据说伞兵着陆时有几秒钟的昏迷，要求每个人准备一根木棒，利用这个短暂时刻，迅速置敌人于死地。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敌人大举进攻时，延安准备放弃，人员、物资须全部进行疏散，而且到处埋上地雷，让敌人寸步难行。学校开始坚壁清野，男同学把桌椅板凳及其他家具转移到农村或者埋藏到山洞里。女同学则给前方将士织毛袜、手套。

12月初，学校开始制造石雷，成立了炼磺、炼硝、铁末、炭火剂、石壳6个组。我和霍绍兴、陈小笙负责炼磺。炼磺就是将含有杂质的硫磺升华提纯，供做炸药。我们从刘万家沟玻璃厂要来两个坩锅，砌了一个炉子，把硫磺放在坩锅里，用木炭火烧，硫磺变成蒸汽，通过一个管道到另一个容器冷

凝，便成了纯净的硫磺。

有一天晚上，学校抽调部分党员骨干到延安市工业局办公室，听兵工厂来的技术人员讲解如何造地雷。他说，制造爆炸性的武器，一要胆大，二要心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马虎一点就会发生大事故。他说炸药的种类很多，有的灵敏度极高，比如硝化甘油就是一种烈性炸药，一张纸触碰它即可引起爆炸。

第一批石雷做出来，要进行试验了。那天全校师生都来参观，操场周围山坡上人山人海。石雷放置在一个土坑里，拉线上拴了一根长长的麻绳子，用力将绳子一拉，轰隆一声，石头开了花，飞向四方，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成功啦！成功啦！”制造石雷的每个人，脸上都现出胜利的微笑。学校撤出延安时，杜吉宏、毛久德等同志负责在学校周围的道路上、屋门口、厨房、水井等处理设了大量石雷，直到敌人先头部队进入延安市区时，他们才最后撤离学校。

1947年3月战争爆发，延安中学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副校长卢勤良率领，组成第四后方医院，我们六班全体到了医院。我担任二所政治指导员。有的担任司务长，有的担任上士，有的担任通讯员，大部分人是护士。我们六班就这样结束了中学生活，进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40多年过去了，六班作为一个群体已不存在，但大部分成员还健在，很多人在党政军各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一些同学出国留学，成为各种专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现在，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已成为年逾花甲的老人了。

1991年5月 高诺夫

男，延中六班学生。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1962年获少校军衔。

从戚元靖帮我学英语谈起

牛旭光耐心帮我学英语

1942年6月，我考入延大中学部。

学校那时在延安城北依山傍水的王家坪附近，半山上到处都是窑洞。我来报考时，中学部主任林迪生问我学过什么，随即出了一个作文题和几道数学题，让我坐在他的窑洞里那张小书桌前笔答。经过考式，我被编入一年级乙班学习。下半年升为二年级乙班。

班主任刘一民是教生物的，他见我年纪比较大，又在前方工作过，就让我当班长。我中途入学，英语已讲到开明课本第32课。因为没有课本，英语教员王刚便把开明英语课本改印成油印讲义发给大家。我也领到一份。

第一堂英语课是朗读“Today is Sunday”，可是我连ABC也不认识。正发愁跟不上的时候，一个14岁的小同学挺身而出，说：“我来教你！”这就是与我同寝室的戚元靖。

开明：上海开明书店。

戚元靖是湖北人，从小在保小学习，普遍话说得很流利。

中学部宿舍住得很挤，每个窑洞都是两层床铺，既是寝室又是自习室。

窗边一张书桌，谁都可以使用。每人一个小木凳，上课时带到教室里坐。教室是一个比较大的窑洞，窑掌是黑板和讲桌，旁边通向防空洞。每天早晨天麻麻亮，戚元靖就约我到教室里读英语。窑洞内光线暗淡，我们就站在窗前朗读。他先教我念 26 个字母，我因为晋西北口音很重，发音不准。他耐心地反复纠正我的发音，直到把每个字母念准确。为了便于记忆，他同时教我拼音，领着我朗读课文。班里学习英语的气氛很浓，每天早晨，大家都到山上朗读英语。傍晚，我和戚元靖到延河边漫步时，他也抓紧时间教我。这样苦学苦练了两三个月，我的英语终于考了 60 分。我很感激他。

我们崇敬鲁迅先生

戚元靖不仅教我英语，而且还介绍我阅读文艺著作，特别是看鲁迅先生的著作。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从保小升上来的，很多同学从小酷爱文学。戚元靖，还有肖晨、续磊、刘朝兰、刘萍等，常常是读起书来手不释卷。这年冬天，教员们每天下午参加整风学习，下午不上课，同学们便三五成群地到延大图书馆借书。大家最喜欢看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作家和苏联以及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那时在新华书店能够买到苏联小说《铁流》、《毁灭》、《新时代的曙光》和高尔基的著作。戚元靖对鲁迅的《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等作品，常逐句逐段地欣赏，喜欢分析推敲文中的含义。由于他的推荐，引起我对鲁迅先生著作的爱好和对鲁迅先生的崇敬。

我们常常在一起边读边交谈。有一次读《狂人日记》，戚元靖说，鲁迅先生不是写一般的狂人，而是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束缚的控诉。他的理解很深。他不仅仅注意文学欣赏，而且通过对文章的分析，来看文中表现的革命思想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他对鲁迅先生的文章总是赞不绝口，谈得津津有味。

1942 年 10 月 19 日是鲁迅先生逝世 6 周年的日子，戚元靖告诉我延安各界要举行纪念会。

本来中学生是不参加的，但我和戚元靖都爱读鲁迅先生的著作，崇敬先生，就很想去参加纪念会。我们以为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延大到中央党校只隔一条延河，我们就涉水而过。可是到党校时，才知道会场改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我们急急忙忙步行五六里路到了杨家岭，步入会场，大会已开始了，礼堂里人已满座。我俩就挤坐在最后一排长凳上。大会主席是著名作家丁玲同志，她是我们同学蒋祖林的母亲。当主席宣布自由讲演时，一个高个子 30 多岁的人走上讲台，他就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他讲，他从东北到上海，写东北人民抗日的故事。鲁迅为他写的《八月的乡村》写过序，他在上海旁听过鲁迅的课，并亲聆过先生教诲。他说，鲁迅精神有十二条，他就是继承和发扬了鲁迅先生这十二条精神的。他对有人说他不配做鲁迅的学生很不满，还对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同志给他的行政警告提出抗议。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争论，很多人站了起来。

从发言中听出他对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不满。天黑时，我和戚元靖离开会场返回学校。途中，戚元靖告诉我，前半年延安机关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说王实味提出太阳里有黑点，延安也有阴暗面，他就是要揭露阴暗面的。他的《野百合花》受到重庆国民党特务报刊的赏识，借此攻击边区。我从那时就觉得戚元靖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四十年后再相聚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荏苒间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在延安的日日夜夜，怀念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尤其是给我帮助最大的戚元靖同学，很想见到他们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1985年国庆节上午，北京的天格外晴朗。我们部分当年延安中学的同学应邀到社会科学院宿舍江明家中聚会，参加聚会的有戚元靖、黄毅诚、彭士禄、李伦、邵文炳、江明、于立修、蔡孟芬、续磊、刘朝兰、许文琴、马继元和韩陆夫妇等。大家欢聚一堂，畅谈今昔，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心情万分激动。李伦（即李润修）是李克农的儿子，当时的总后交通部长，他带来许多与延安有关的彩色照片给大家欣赏。续磊和刘朝兰走进来时，喘呼呼地说：“我爬上楼来，心激动得要跳出来啦！我们走到一起，好像回到四十年前，感到年轻了！”他们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大家边谈边回忆四十年前在延安的日日夜夜。坐在我旁边的彭士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我问他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是否他搞的时，他谦逊地说：“我只起了个螺丝钉的作用。”其实，听说美国报纸称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呢。饮酒时，彭士禄举起酒杯说：“我们不论官大官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要为永远不当官老爷干杯！”这时，我想起延安时期，戚元靖曾告诉我，彭士禄从保小毕业以后就主动申请到中央医院当护士，给病人端水倒尿盆。工作两年多，中央组织部要他再入校深造，他才回到延安中学我们班的。这时，戚元靖对彭士禄取笑说：“你当了官不让别人当官，是不是？”大家都笑了。彭士禄说：“别看你官大，我也不求你！”接着又对黄毅诚说：“你们计委有权，我也不求你！”戚元靖说：“私事不求，公事要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充满热烈欢乐的气氛。

我们这些同学在艰苦条件下结成的友谊，真挚诚恳，永远常青。

1991年2月1日 牛旭光

男，曾用名牛荫东。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延中教导处干事。四川省建筑工程学校副校长。

女奴·中学生·延安

——老师教我写作文常英

宽敞明亮的窑洞教室里，同学们凝视着黑板前的王云风教员，静静地等候着他宣布作文题。

可是，出乎意料，王教员没有在黑板上书写作文题，而是说：“今天写作文是自由命题，同学们自己给自己出个题目来写。”

顿时，教室里响起一片嗡嗡低语。同学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往常都是由教员出题目，内容大多是《开荒的一天》、《秋收的一天》、《五四青年节有感》之类，今天怎么改变了常规呢？

“同学们！”王教员笑微微地用他那浓重的晋北口音说：

“今后写作文也多以自己命题方法进行。”接着，王教员解释说：“作文主要是练习文字，培养表达能力；不仅如此，而且要使大家通过学习写作，得到一种文学艺术的熏陶。譬如，我们上音乐课首先要学会识乐谱，而更重要的是用歌声激发人们的革命豪情。作文课除了培养人们剖析社会的观察能

力和形象思维能力，也在培育一种激情。”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王教员的讲述，心里急切地希望王教员再详细地讲一讲自由命题的方法和内容。

王教员又讲了一些对我非常陌生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等有关写作的知识。

最后他说：“自己命题就是要写自己最熟悉和曾经感动你的人和事。”

“可以写学校以外的事情吗？”坐在后排的一个同学提出了我心里正在嘀咕的问题。

“不分校内校外。”王教员回答说。

下课后，我搜肠刮肚寻找曾经感动过我和事。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我在保育小学毕业后，从70里以外的安塞白家坪，背着行李步行到边区师范就学的那天。我选择了《我考入边师的第一天》这个题目。我在打腹稿，并反复推敲，但直到下课也没感到满意。

傍晚，我和王桂英、杨铁秀从山腰窑洞宿舍走到河边，坐在河心的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因为女生们经常在这块岩石边洗衣洗发，常常是欢歌笑语响成一片，所以同学们戏称它为“仙女岛”。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为男同学不能涉足的“禁地”。今天，我们坐在这儿认真地讨论起如何自己命题写作文的事来。

王桂英说：“人生中快乐的事情最难忘记，我就写从山东老家到达延安的那一天。”

我的作文题目是《当我第一眼望见宝塔山的时候》。”说着，她深情地眺望了一眼耸立在碧空中的宝塔。杨铁秀不屑地说：“看见宝塔有什么稀罕？”“那是因为你生长在延安。”我反驳铁秀说。“我们在国统区受尽了苦难，为求自由才投奔延安。当时一见宝塔就像看见了妈妈，那个高兴劲儿，你是想象不出来的。桂英，你这个题目很好，我也想写这个题目。”

王桂英说，“如果不是那个婆家表哥同情我，给我指出到延安来的生路，恐怕我早跳进黄河喂了鱼鳖。”

桂英接着讲述了黄河决堤时她家的不幸遭遇。这是我第一次听她叙述自己的身世。

大概是由于我们平时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或许是因为沐浴在亲密温暖的同志友爱情谊中，而淡化了以往的苦难的缘故，我们之间从没有这样倾诉过自己的苦难。

桂英的诉说，触发起我的许多回忆。“过去的黑暗生活要能当作文写，那可写的就多啦！”我喃喃地说。

这时，我看见王云凤教员正在河岸边散步，便大声地招呼着：“王教员！王教员！”

请过来一下。”

王教员转过身来，看见我们，风趣地说：“这个‘仙女岛’我是上不得的哟！”我们又一次邀请他过来，说有重要问题要问他。“那我也是‘仙女’啰！”他说着跳过水中的碎石，坐到岩石上来。“什么重要问题呀？”“作文题目。”桂英答道。

“怎么，还没有选定？”王教员关心地问。“我们来延安以前的生活能写吗？”我插问。“当然行。只要是你们亲身感受的事，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都能写成文章。”“我的童年比高尔基的《童年》里那种苦难还要深得多呢！”

“好啊！你也写一部中国的《人间三部曲》。”王教员鼓励我说。“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你先把这篇作文写好。”王教员又补充一句，就告辞了。

延安的夜景是美妙的，而星期六的夜晚更加美好。延安大学礼堂里传出了悠扬舞曲，很多同学在河边唱歌、谈笑，到处洋溢着浓厚的青春气息。

往日，我不是飞旋在舞场，便是观看戏剧。可是，今宵我却站在窑洞的窗口眺望南方的夜空，一时陷入在延安几年间少有的沉痛的回忆中……

大饥荒蔓延的关中平原，赤地千里，饥殍遍野；漫天大雪中我和哥哥沿门乞讨；冰冷的破房子里，昏暗的小油灯旁，母亲苍白的面容；漆黑的夜，雷鸣电闪，大雨倾注，我藏在破庙的泥塑神像后面，躲避人贩子的搜寻……这一桩桩苦难的童年往事，此刻全都涌现在我的眼前。母亲临终时的话又响在我的耳边：“孩子，你是苦蔓蔓儿上结的苦瓜呵！”

一年冬天，母亲去世了。当天下午，邻居陈伯伯把我领到薛子南家。这是一个开医院的大户。陈伯伯对女主人说：

“我把娃子带来了。”说着，看了看我可怜的样子，叹了口气走了。

一切都是陌生的。我很害怕，孤伶伶地站在主人家的墙角里，心里扑通扑通直跳。

我想哭，但又不敢。那女主人板着脸问我几岁了，我说：“9岁了。”当时我真想变成一只小老鼠钻进洞里，也想变成一只小鸟飞出这座樊笼。

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面黄肌瘦的女孩，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女主人指着女孩说：“她叫大铃铃，你以后就叫小铃铃吧！”说完，就让我随大铃铃带着小少爷到院子里去了。

刚一出房门，大铃铃就拉着我的手低声说：“小铃铃，在薛家可不比在自己家，做事情要小心，吃饭、走路都要快，做事情别马虎。要是孩子打了你，你可别还手，不然要遭主人毒打的。”说着，她泪如泉涌，我也要哭了。大铃铃怕我哭，就拉着我去院落游游转转。这家院子可真大呀！有花园、假山，还有鱼池呢！过了一会，一个大男孩子摇着铃，叮叮当当响了一阵，说是开饭了。大铃铃忙抱起孩子跑到厨房，喂小少爷吃饭。我站在一旁缩手缩脚地看着，不知该干什么。等主人和孩子吃完了饭，我和大铃铃才吃剩下的饭菜。饭又凉又脏，看了都恶心，我忍着，差一点没吐出来。吃了饭，我便按吩咐去洗碗、扫地，以后又提着壶到水房去打水。灶屋的老伯伯看见我去打水，他怕我烫了手就帮助我打，还对身旁的小伙计说：“这女娃身体倒结实，也灵巧，说不定过几年也会像大铃铃一样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走出水房，我心里想，这年月活一天算一天，这条命真不知什么时候丢在哪里。

突然，从厨房里传出叫骂声：“死丫头，不给你点厉害是不行的，看你做事情慢腾腾的。”我三步并成两步进了厨房，看见大铃铃头上流着血，正跪在地上哭着。我心里恨恨的，想在女主人面前说大铃铃做什么事都是跑着去做，但又不敢说，胸中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天快黑了，大铃铃还跪在地上，她那瘦骨嶙峋的身体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折磨。我再也忍不住了，就跑进女主人房里，跪在地上向女主人磕头。女主人哼了一声：“这个死丫头倒还会来事。”她一边骂着，一边冲厨房说道：“死丫头，这次就算饶了你。”我赶忙扶起大铃铃走到院子里。

大铃铃告诉我，我们住在太平间里。我问：“太平间在哪里？”“在医院后门。”我们向太平间走去。我看见一口白棺材放在房里，边上有几个人

在哭。我问：“这是哪里？”大铃铃说：“这就是医院放死人的地方，也叫太平间。”我听完吓了一跳。难道就让我们同死人住在一起吗？大铃铃无力地说：

“我已经在这里睡两年了。”我说：“你怕不怕？”“怕有什么法子。”她无可奈何地回答。天完全黑了，她点起了小油灯。四周墙是黑洞洞的，阴森可怕，我身上直打颤，两腿发软，紧紧地偎依着大铃铃。大铃铃告诉我：“有的死尸未装棺材更可怕呢！”

那死尸半睁着眼，两只脚光着露在盖布外面，真是吓死人啦！”我说：“咱们到花园石板上睡吧！”她说：“傻妹妹，夏天还可以，冬天怎么行？要冻死的。”

几个哭尸的人陆续走了，太平间里除了棺材，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定了定神，打来点水帮大铃铃洗去头上的污血。

那一夜，我躺在大铃铃床板旁边的一块小木板上，盖着一床补钉叠补钉的小被子，迷迷糊糊睡着了。

天刚刚亮，大铃铃就推醒我，她说她咳了半夜还吐了血。

她交代了我要做的事：先倒尿盆、痰盂，扫过地再擦桌子、凳子，然后是打开水和洗脸水。她又一次嘱咐我做事要小心，推主人房门时要轻。

我麻利地将一件件事都做好。看来主人还满意，声音平和地问我：“大铃铃呢？”“她病了，咳嗽，夜里还吐了血。”我说完，主人没说什么，就让我走了。过了一个多月，大铃铃便被送到华县郭村去侍候女主人的地主父亲。

自从大铃铃走后，我担起了两人干的家务活。我比大铃铃小好几岁，常因为哄不好小少爷遭打骂。晚上一个人睡在太平间更是可怕，我总是用被子蒙着头，身子紧贴着墙。

遇到刮风下雨，风吹得盖尸布唰唰响，我被吓得浑身出冷汗……

这鬼一般的生活，使我先后患了气管炎、肺结核和斑疹伤寒。我曾好几次想去跳井，中途都被薛子南的侄儿和灶房老伯拦住了。

这天夜里我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第二天是星期天，早饭后我便爬上窑洞顶的高山坡，在那里开始动笔写我的作文。

笔未动，泪先流，该写哪一段呢？我搔首沉思，无意中摸到了右颊发底下的伤疤。

顿时，这伤疤触动了我的思绪，我奋笔疾书了。

太阳早已坠到西安城的背后去了，街道上人还是很拥挤，路灯已经亮了。在热闹的街道上，乞丐们不厌其烦地喊着讨东西吃。等我给主人买了食物回来时，看见他们有的人已经躺在道旁睡着了。虽然他们还在饥饿寒冷中，但如果能睡一觉，也是他们的幸福了。

我回到家里，立刻给主人生炉子，但心里却在想着：为什么社会这样不公平呢？我自己难道也要像这样一辈子受苦吗？

清凉的晚风吹着，我感到秋天的美好，我想这时那郊外的田野里，庄稼已经成熟，泛着金黄的波浪，等待人去收割了……想着想着，不小心把主人的炉子底给弄坏了。

“炉子生好了没有？”我突然听到喊声，知道是主人在叫，我却不敢回答。主人没听见回话，从屋里出来，看见炉子没生着，炉底也坏了，她摘下钢卡就向我的头戳来，只一下，就把我戳得头破血流。随后，还强迫我跪在院子里的洗衣板上。

四周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我跪着，望着那灰黑的天空，等待月亮快升起。一会，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来了！我想起了我的妈妈。“你若不死，我是不会来受这罪的。”我的眼泪不断地往下流淌。

一会，天空渐渐布满了黑云，月亮也躲了起来。天好像也和我这个可怜的孩子作难似的，不知从哪里竟吹来一阵细雨，以后雨又慢慢下大了，竟打得我全身湿透。我禁不住大声哭喊起来，这才惊动了主人。她从屋里面恶声恶气地说：

“去睡吧，以后做事要小心点！”

我不敢做声地回去睡了——我的睡处仍是医院的那间停置死人的房子。这天刚有一个病死的人放在那里。我头痛，翻来覆去睡不着，幼小的心，想着这可怕的房子，吓得我不知怎么才好。

屋外，秋天的夜风不住地刮着，吹进房里来，雨一阵比一阵大了。那躺着尸首的薄板棺材没有放稳，被风吹得摇动。

我怕得更不敢睡了，又用被子紧紧蒙住了头。

一想起这一夜的情景，我的心里就升起一团永不熄灭的复仇的火焰。

在极端悲愤中，我写完了这篇命题为《火焰》的作文。

第二周的国文课上，王云凤教员对我的作文备加称赞，他说：“这是我们班在本学期里写得最好的一篇作文。”他悲愤地朗读起我的作文来。同学们有的低头沉默，有的潸然泪下。

我满眼泪水，凝视着王教员身后的黑板，仿佛看到4年前我跪在夜幕下院子里的孤单身影紧紧贴在那块乌黑的板面上。

美好的中学生活即将结束之际，我因患感冒引发肺结核，住进了延安学生疗养院。

住疗养院期间，正是阅读课外书籍的良好时机。我读了《童年》后，拿出我写的那篇《火焰》重读了几遍。在一种倾诉苦难的心情下萌发了发表的欲望。我将它投寄给《解放日报》，并附上给编辑同志的一封信，简单叙述我的身世和希望。

稿和信寄出的第10天，1945年2月25日下午，几个护士姑娘拿了一份报纸急急忙忙走进病房，高兴地对我说：“常英，你写的文章《火焰》发表了。”“真的？”我欢欣难抑，倏地起身从护士手中拿过报纸。我反复读着文章前的“编者按”：

“我们收到常英同志的来信和稿件很受感动。常英同志的学习是有成绩的，学习写作也很有希望，我们稍加修改就在这里发表了……”

一个月后，我收到报社编辑部转来的一封读者来信，它又一次使我沉浸在温暖的同志情谊中：

常英同志：

《火焰——幼年生活回忆片断》，是一篇短小精悍、饱含着青春的生命力和真挚情感的文章。我读后，眼前仿佛看见一个面目凶狠的魔鬼在鞭笞一位天真和纯洁的孩子，耳朵里也好似听到被磨难者的微弱的呻吟声……我的感情完全被操纵了，使我情不自禁地燃起了对黑暗势力的憎恨和对你的无限同情。

“丫头”，这名词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是被人们所唾弃和鄙视的，在地位上是被人们当做牛马和奴隶一样看待，过着受虐待和辱骂的悲惨生活。然而，你那股不可抑止的燃烧着的“向压迫人和奴役人的野兽复仇的火焰”和那勇

敢坚韧的意志又是多么令人敬佩啊！

勇敢的你终于击碎了套在你身上的枷锁，跳出了旧社会的深渊，投向像太阳一样温暖的共产党的怀抱里来了，受着党慈爱的抚育，因而使你从目不识丁变成像今天这样的文化程度，这不能不使人感到你的聪明智慧和努力。但是我们绝不能忘掉，如果没有爱护青年、培育青年的共产党，那一切劳苦群众的智慧和才能是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的！

四五年地狱般的生活，使你年幼柔弱的身体遭受到摧残和折磨，以致招来了侵蚀你的肌体的“支气管炎”和“肺病”，病魔经常纠缠着你，但这种伤痕会加深你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也更加鼓起你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幼年时代，我也受过旧社会给予我的苦难，有过数年的学徒生活，经常受主人的斥责和非难。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使我很快走进劳动者自己的阵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现在我在抗大作党的教育工作。

我们的命运存在共同性——在旧社会被鄙视，得不到自由；而在新社会中却愉快地生活着、斗争着。

写到这里，才想起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同志写这样的信是有点太冒昧了，但我还是把我内心里想说的话写给你。不敬的地方，请予指教。

望你在病中善自调养，早日恢复健康！

敬祝

快乐！

子长县抗大三分队

周起然

1945年3月8日写于灯下

《火焰》的发表和党报编辑同志热诚的关怀与希望，以及一位素不相识的同志的来信，使我的心情多日不能平静。我在兴奋、激动与欣慰中思考着我的未来。 常英

女，延中六班学生。曾任陕西省纺织工业总公司财务处处长。现为省会计学会副会长、顾问，荣获财政部、纺织部颁发的从事财会工作30年荣誉证书。

我获得讲演第一名

——五四青年节讲演会回忆田又生

想不到，已经20岁出头的我，一个只上过两年小学的我，一个当过八路军军区干部的我，一个从豫西死里逃生的我，竟会在1946年4月下旬走进延安中学，成为一名中学生，和那些当时只有十二三、十四五岁的弟弟妹妹们一道读书上课。

“哟！田又生？”班主任老师看了我的介绍信，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我：“姓田地的田，又一次获得生命的‘又生’，我说得对吗？”

我点了点头。

“恐怕你的名字也还有一个故事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能告诉老

师吗？”看来这位老师对我的名字挺感兴趣。

“可以，只是我的故事说来话长，恐怕耽误老师的时间……”我抱歉地说。

“好的，回头再讲。”老师先忙别的工作去了。

转眼到了“五四”青年节。一天，老师对我说：“小田，五四青年节学校要举行讲演比赛，咱们班准备让你代表班级演讲，你看可以吗？”

“我？”我感到吃惊地反问：“我怎么行呢？没上过几天学，文化水平低，再说来到学校才几天，有什么可讲的呢？还是……”我向老师推辞着。

老师笑了笑说道：“我知道，你还是很可以的，你就讲讲你在豫西是如何从虎口中脱险的吧！最近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准备发动内战，你讲讲，对咱们这些生长在革命根据地的同学们认识国民党反动派是很有好处的。”既然老师要我讲从豫西敌占区脱险投奔延安的经历，我就没有理由推辞了。

5月4日，讲演大会开始了。我又激动又紧张。当大会主席宣布说：“现在由刚从豫西抗日根据地回来的十七班的新同学田又生讲演。”台下便响起热烈的掌声。我随着掌声走上了讲台。我看了看台下的同学们，便讲起了我投奔延安的经过……

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们只有一次。”但是，在我的半生中，却有过三次生命。而后两次新的生命，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拯救与培养。所以党组织把我的名字“康荣福”改为了“田又生”。

1925年，我出生在巩县大平北庄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

父亲康邛山，在孝义兵工厂当工人，我和母亲、弟、妹五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我8岁起，就远离家乡，给地主家当了长工。我12岁那年，日寇轰炸，兵工厂被迫南迁，有家小的不能南迁，随之失业。我父亲遂靠下煤窑或给人家修枪、修锁、配钥匙维持生活。旧社会富户私人都有枪支，国民党拿我父亲当替罪羊，以给人修枪为由，将我父亲判处无期徒刑。母亲养活不了全家，弟弟不久便病饿而死，母亲也自卖自身走了，撇下我兄妹二人。我在康店地主康方中家当长工，妹妹举目无亲，生活无着，12岁那年在瓜庵里用裤带上吊自杀了。我15岁那年被解雇。那时河南是“水、旱、蝗、汤”，灾难重重，到处是饿殍载道，民不聊生。人吃人的有，全家自杀的有。我饿得头晕眼花，瘦得皮包骨头，只有坐以待毙了。

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爱国将领赵寿山领导的国民党38军来到巩县。我的同村人向38军地下党组织反映了我的情况，党组织对我很同情，让我到教导队学习。在这里学习的人，多是因白色恐怖在国统区无法存身的地下党的干部，而我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从此，我生活有了着落，还跟着老同志学习了革命的道理。

1944年春，蒋介石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赵寿山军长调去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又派亲信张耀明到38军当军长，负责清共。我们党组织迅速撤退隐蔽，我也回到了家乡。

不久日军进攻豫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37天失城38座，大片国土给日本鬼子占了。这时，我父亲乘乱的机会逃出了监狱。父子团聚，又联系上了地下党员刘天若，我们以联防自卫的名义把群众武装组织起来。我和父亲生起炉火修枪造刀，为迎接我军的到来做准备。

那年9月，皮定钧司令员、徐子荣政委率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来

到豫西。支队首长让我父亲继续修造武器，让我到豫西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到了学校后，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不仅学习军事、学政治，而且懂得了怎样做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

干校学习结束以后，组织上分配我到巩县二区当武委会主任。赵敏是我们的区委书记。她是个女同志，虽只有 20 来岁，但工作很有魄力。她长得秀丽端庄，性情爽快。在武装斗争中她胆大心细，明快果敢，所以在涉村一带很有威望。我比她只小 1 岁，但处处显得幼稚。我很注意向她学习，她的一言一行对我影响都很大。特别是她那坚强的意志，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1945 年 8 月上旬，抗日战争进入了大反攻阶段，朱总司令下令日军向我缴械，不投降的坚决消灭之。我们豫西根据地军民也频频出击，还另组建了一支陇海支队，准备出师郑州，解放陇海沿线。我也被派往巩县县城附近，为解放巩县县城做准备。这时，躲在大后方的蒋介石中央军倾巢出动，杀气腾腾地向我解放区扑来。那些投降日寇卖国求荣的汉奸走狗们，摇身一变都成了蒋介石的人。过去他们依靠日军，联合伪军打我们，现在又依靠中央军，联合即将投降的日军还是打我们，而且来势更凶猛，更残酷。巩县的反动势力也起来了。豫西解放区的平原、丘陵先被占领，土豪劣绅们以 10 倍的仇恨向我军反攻倒算，到处捕杀抗日军民积极分子。

9 月 2 日那天晚上，我住在小关附近的竹林村。第二天黎明，听到敌人的枪声，我便向小关转移。敌人分两路紧追不舍。我刚进小关村，敌人也随即赶到，把小关团团包围了。我走进小巷，进入一农户家里想躲避一时。我一上屋棚，只见上边已躲藏了几个人，看样子其中也有我们的同志。我想，敌人明明在追我，我把敌人引到这里，对同志和群众的安全不利，我便跑出来。刚到巷口，几个敌兵扑上来把我逮捕了。敌人抓到我以后，马上撤围收兵。当天晚上，这个汉奸队实行严刑审讯，问我涉村区干队有多少人和枪，我呛他们说：“人多得很，机枪大炮都有！”敌人看我不服，便把我的两臂绑在一根木杠子上，再用另一根杠子压住腿弯处，杠子两端站人。

每多站上一个人时，他们就逼问一句：“说不说？”我咬紧牙关，一句话也不说。

当两边杠子上站满 6 个人时，我一下子疼得昏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被投进了国民党巩县监狱。

巩县监狱，每个牢房大约两间半房，共 25 平方米左右，房内又安装一个木笼，笼外留有 4 尺走廊，放着一张床，是狱卒值班睡觉的地方。犯人住的面积不多于 20 平方米。一个木笼里塞四五十人，连身都转不过来。我们自行分为两班，轮班站、坐，这一班站累了再换那一班站，名曰“换岗”。按规定每个犯人一天 4 两麦子（16 两一斤），监狱中层层克扣，实际只能吃到三小两左右。我入狱后便注意观察，辨认我们党的同志，又从新来的难友中了解外边的情况。经过认真的观察了解，我认识了支队司令部特务连的马廷瑞。与他同时被捕的有洛阳地下党负责人郭显坤。马廷瑞被捕后，首先不考虑个人安危，而是想着如何保护地方党的同志。当敌人审问时，他抢先回答：“我是八路军。”郭显坤暗吃一惊：“敌人还没有逼供，你怎么就招认了？”颇有点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鬼子，偏偏喜欢这样的硬汉子。当日本鬼子指着郭显坤问：“他是什么人？”马廷瑞同志紧接着回答：“这是我找来带路的老乡。”

这时，郭显坤才恍然大悟，原来马廷瑞是为掩护他才挺身而出的。郭

显坤脱险了，马廷瑞被投入巩县监狱。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管巩县监狱，马廷瑞乘新旧交接之机，推翻前供，说自己是生意人被日军当八路军抓进监狱的。我们两个相互了解后，便设法做难友的思想工作，以唱歌、唱豫剧来鼓舞难友们的斗志。监狱当局克扣犯人口粮，经过斗争，敌人答应把粮食如数发给个人，让个人用砂锅轮流做饭吃。发下来的粮食是原粮。这样推磨、做饭还可以轮流到室外活动，便于我们串联。从陆续进来的难友中得知，皮、徐首长已率部队南下，敌人回来后到处捕杀我抗日有功军民。各村几乎都有被杀的人，村村有人带孝，处处有哭声。敌人残杀革命者的手段非常残忍。剖腹、剜眼、穿鼻、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我军在巩县、登封抗日根据地留下的许多伤员，除少数能走的逃出外，其他全被杀死。连偃师县参加过辛亥革命、双目失明的王三江老人也不能幸免。

参加过北伐战争的河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司令张之朴也被敌人杀害，他的夫人谷效颜和三个孩子也一同关进巩县监狱。谷妈妈失去丈夫，携儿带女坐牢，仍不放松做党的工作。

她在女牢利用她儿子志杰年幼来往方便的有利条件，让志杰了解男牢情况向她汇报，并关心着同志们在狱中的斗争情况。不久，敌人又对我进行一次审讯，企图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从我嘴里套取点什么。他们用一个被软化的犯人陪我一同受审。国民党县党部秘书先来了几句开场白：“你们都是小青年、土八路，估计你们也不会是共产党员，所以关于共产党内的事情我就不问了，就要你们谈谈是如何参加八路军的，是被迫的，受骗的，还是自愿的？”那个被软化的犯人讲了她如何年幼无知，如何参加八路军等等。她讲后，县党部秘书转而问我：“你呢？”我说：“我是自愿参加的。”县党部秘书把桌子一拍喝道：“时至今日，你还这样顽固！”我反问：“抗战打日本还能不自愿吗？”县党部秘书无话可说，恼羞成怒，大叫：“来人，把他押回去！”我头都没回，就自己走回牢房了。

10月30日，地主魏公茂派联保处的中队长赵昆山等人到巩县监狱来提我了。这次提出的有喂庄农会民兵队长张松茂和我两个人。魏公茂怕我跑，特意交代赵昆山给我上“血线”，即用铁丝将锁骨或脚后筋穿起来。赵昆山办此残忍之事，也有些顾虑，说：“那样干，血糊淋拉的，他再死活不走怎么办？再说，那么个小孩子，就凭我这枪法，还有我带的这些人和枪，不用绑，料他也跑不了。”最后方决定用绳绑，绳是到县城现买的新麻绳。他们先将张松茂五花大绑，然后用绳子的另一头绑我。我一看他们的绑法，就知道要杀我们了。因为绑身不绑手是捆死囚的绑法，按旧社会传统规矩，死囚留着双手好向生意人要吃要穿。

巩县杀人都是在城西不远的桑树园。一路上，我心里准备好了就义前要呼的口号。

时至寒秋初冬，赵昆山已披上羊皮大衣，我还赤脚穿一身单衣，又被打得破烂不堪，冻得我浑身直打颤。但我咬紧牙关，挺起胸膛，心想死要死得有骨气。敌人押着我们一直往西，向孝义方向走去，桑树园过了，敌人仍没有行动，我便问牵绳子的保丁王改性：“要到哪里去？”王随口答：“到坞罗。”我心中有数，知道这是魏公茂要杀我，并借此镇压广大群众。当时，对于死我并不在乎，对于生我也不抱多大希望。但我只有一个想法：绝不能让敌人任意摆布，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与企图得逞！因此，我就以腿被打坏了为理由，慢慢地和他们磨蹭。一群保丁押着我们，走到东黑石关村，天已

经黑了。

这时，赵昆山大烟瘾发作，便交代手下人说：“我去吃点东西，你们先慢慢走着。”我想，他一躺到烟炕上至少要一两个小时。当走到益家窝时，我问：

“今晚住哪里？”保丁们说：“住芝田。”我一听，心里更清楚了。芝田是芝罗乡乡公所的所在地，肯定今晚把我们秘密关在芝田，第二天在坞罗村开会杀我们。而益家窝离芝田也只有6里路了，我必须在这6里路上做文章，若到芝田被关起来就不好办了。

想到这里，我对他们说：“你们队长还没来。

走快了，他赶不上会骂你们的。”他们认为我说的是理，便坐下来休息。等到赵昆山赶来，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摸黑前进，我走得更慢，他们催我，我说：“天老冷，腿冻麻了。”

赵昆山为了赶路，只好将他的黑羊皮大衣给我披上，我利用黑色大衣盖着白色麻绳的机会，将手背到肩后将绳头解开，绳子暂且缚在身上。过沟时，敌人怕我们跳沟自杀，先由敌兵在沟边站上岗，然后再让我们过。过了沟，赵昆山突然下令：

“检查一下绳子！”我精神紧张起来，心想，若发现我把绳子解开，一切全完了。

幸亏检查的人只隔着大衣摸摸那个绳疙瘩说：“没事。”便又前进，我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来。这时，我把绳子偷偷解掉，掂在手里，因为另一端还拴着张松茂，丢掉绳子会被敌人发觉。很快到了芝田北边，要进北门，敌人以为大功告成，前面的人径直进寨，我走到北门跟前向东的拐弯路口时，突然把绳子和大衣一扔，拔腿就跑。敌兵急叫：

“跑了!!!”赵昆山也喊：“打！打！”敌人枪响时，我已跑出50多步，走进寨门里的敌人听到枪声急忙掉回头来，前后敌人互相碰撞，有的掉到寨壕内，大喊大叫。

这时，赵昆山怕打着自己人，又下令不叫打了，接着四下搜索，茫茫黑夜，他们哪里寻找？他们也会想我决不会在附近等死，所以胡乱找一阵也就不找了。

我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两腿忽然麻木不听使唤了，倒在路旁。经过反复揉搓，两条腿渐渐有了知觉。敌人因找不到我，便在向坞罗走的路上将张松茂枪杀了。

敌人走后，我决定先到老井沟我姑母家去。我不敢走正路，便爬坡越岭地向老井沟方向摸去。山上锋利的碎石把脚划开了一道口子，圪针、蒺藜、石子搅和着血水深深扎在烂肉里，疼得钻心难忍。没办法，我只好把破裤子撕下半截，包住烂脚走路。谁知一层破布很快又磨掉了，脚疼的问题没解决，反而赤身露体，冻得我更难受了。我咬着牙一步挨一步，一直走到后半夜，才挨到我姑母家的破窑洞前。我压低声音叫门，姑母耳聋听不见，表兄嫂以为鬼魂显灵不敢答应，我叫的多了，表嫂说：“荣福呀，你死了，还来吓俺干啥？”我恳求说：“表嫂，我真的没死呀，你快给我开门吧！”又反复解释了好大一会，她才慢慢地点上灯。两口子还找了两根棍子，准备打鬼。开门后，我再三说明，他们才把我放进窑里。

姑母见到我悲喜交加：想哭不敢出声，只是呜呜啜泣。我们商量下步如何办？最后决定让我先在她家窑洞里藏一天，天明后姑母以到涉村赶集为

名，到北庄我家通知近门伯叔兄弟们共同想办法。我父亲被魏公茂抓去做人质，因为就要杀我了，对他也就看管不严，他利用机会和我同一天逃回了家中。

亲人们商量，让我父子晚上到青龙山的青龙沟去躲避，先带 3 天吃食，然后再给送。

这时，得知魏公茂为了杀我，特安排了一台大戏，从 10 月 29 日开始唱 3 天，第二天将我从县城押回芝田，到第三天将我拉到坞罗。杀我的方法更为稀奇，他准备了一口锅、一担油，并让狗腿子魏运和磨好一把快刀，到时候支起油锅，在杀前先割下我的肉放锅内炸。

敌人扬言说：

“非叫康荣福吃他自己的肉不可！”意思是：富人的肉长不到穷人身上，穷人应该吃自己身上的肉，也就是我不该带领群众分他的地，减他的息。

晚上，亲人们都来了，给我送来了不知从谁身上脱下来的破棉袄。我父子背上行李卷、砂锅、玉米糝，还带上镰刀，到青龙沟一个石山洞中住下了。

这青龙沟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只有农民放牛、割草、杀梢时才来这里。近来敌人闹得人家宅不安、鸡犬不宁，农民无心生产，所以山中空无一人。住到第三天，干粮吃完，还不见亲友们来送。等到 11 月 4 日，无奈中我父亲到 5 里之外的一户农民家中要吃的。房东大娘对我父亲非常亲热，哭着说：“您父子为给大家办事，受此大难，过去听说荣福不在了，我哭过多少回呀！咳！我多想见见荣福呀！”她给父亲准备了吃的东西，并约定第二天寒食节晚上我们到她家里吃饺子。第二天晚上，我和父亲走到她家不远的地方，仍不见灯光，我们顿感疑惑。父亲先悄悄地进了她家，一问情况，原来敌人已发现我在姑母家藏过，当即将所有山口封锁，到处捉拿我父子二人，敌兵岗哨就在不远地方。大娘把事先烙好的糠饼递给我父亲，要我们快走。我和父亲又跑到另一个秘密山洞中躲了一天。农历十月二日夜里，我们又跑到盘龙尖我本家姐姐家中。姐夫把我们安置在村外一个偏僻的山洞里。姐夫回家不久，村里响起了枪声，敌人又跟踪追来。我和父亲急忙钻进山林，从盘龙尖往东跑。盘龙尖山峦起伏，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父子俩时而爬坡，时而攀登悬崖，一不小心抓得不紧或一脚踩空就会摔下去。走到半夜，我父亲饿得实在走不动，我只好对父亲说：“爹，您看眼前这势头，无论怎么样，咱们都得走下去。”

您老肚子实在空得慌，就把破棉袄里的套子掏出来充充饥吧！咱要在天亮前翻过五指岭，逃出巩县县境。”父亲咬咬牙，往嘴里塞了几把破套子，含着眼泪说：“走，孩子，咱们就是爬也要爬出去。”就这样，我父子俩互相搀扶着，一夜之间不知翻了多少山头，爬了多少悬崖绝壁，终于在天亮之前进入了密县地界，到密县郭洞煤矿当了矿工，暂时隐蔽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决定到延安去找党组织。矿工们早已知道我是八路军，纷纷伸出友谊之手，你一毛，他两毛地凑了一点路费，不少矿工拿不出钱来，就回家拿了些馍馍、窝窝头让我做干粮。我告别了父亲和矿工兄弟，从密县出发了。

我和几个到陕西逃荒的人一起上路，饿了啃几口干馍，渴了喝几口冷水，遇有机会还向人家讨要点吃的。在人家的廊檐下，门洞里，或是野外的草垛旁露宿。寒冬腊月，冷风刺骨，风雪交加，我们几个背靠背挤在一起。为了多赶路，总是晚宿早起。我的右腿在敌人审讯时压坏致残，长时间走路，

腿肿得有碗口来粗，但又不能向同路人暴露真情，只有咬紧牙关，坚持走下来。

因为挤不上火车，我就从密县一直步行到陕西黄龙山逃荒在那里的姨母家。我谎称要去在延安逃荒的姑母家，要她设法把我送过封锁线。她派她的侄儿送我。通过杨家沟封锁线时，被蒋军哨兵发现，她侄儿谎称我是附近老财家的小长工，过了年送我上工的。

蒋军哨兵看我衣着破烂，年纪又小，便信以为真，放我们走了。过了封锁线，我才把我的身分告诉了表兄。

我先到了南泥湾，向当地同志讲了我的遭遇。同志们对我非常亲切，热情接待，还用马把我送到延安。

经过审查，我被送到延安中学学习。我太幸福了，是党救了我，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党教育了我，又给了我智慧和力量！

也许是我的出生入死的斗争经历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这次讲演我竟然得了全校第一名！

但是，我没有想到延安中学的学生生活刚开了个头，在我全身心沉浸在学习中的时候，国民党 38 军 55 师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在孔从周将军的率领下在河南巩县起义了。

中共中央西北局派我迅速赶赴河南巩县一带接应孔从周将军和起义部队。由于任务的特殊，我就又不声不响地与敬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不辞而别了。他们使我领会到，延安精神将是我今后在血与火的斗争征途中战胜一切困难和险阻的法宝！

我回头看看桥儿沟罗家坪那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再望望那巍巍的宝塔山，我感到恋恋不舍……

再见了，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再见了，可爱的母校——延安中学！

再见了，革命圣地——延安！

1990 年 12 月 1 日 田又生

男，曾用名康荣福。延中十四班学生。河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 671 处副书记、副主任、顾问。荣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和西北解放纪念章。

永恒的怀念

刘力贞

我生于黄土高原，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土窑洞中度过的。对于土窑洞，我至今还有着特殊的眷恋。然而几十年来，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延安中学那孔小土窑洞和在那里生活的伙伴们。冬天，尽管西北风呼呼地吹，飞沙走石，黄尘漫天，可在小窑里却什么也听不见；夏天，尽管烈日炎炎，甚至连头皮都会烤出油来，可是我们的小土窑里，凉丝丝的，一点儿暑气也没有。小窑洞，黑乎乎，窄长窄长的，从外面乍一进去，什么也看不见，眼前漆黑一片。慢慢地眼睛适应了，窑内的一切便显露出来。窑掌是一条通铺，我们 5 个小

伙伴就睡在这条通铺上，一人占据1尺多宽的地方。好在我们身量都未长足，人也不胖，睡起来并不算挤，冬天还很暖和。铺旁是一个大土台子，上面放着我们的餐具，每人两个黑釉粗瓷小盆、一双筷子，一把小勺，还有缸子、牙刷和牙粉袋。台子下面，七零八落地摆着我们自制的凉鞋，这种凉鞋的底子是从穿破的旧鞋上取下来的，上面钉上几条布条子，便成了一双颇为时髦的凉鞋啦。我们谁也没有箱子，衣服就塞在枕头内作为枕瓢用。书包挂在墙上，墙上还有一个巴掌大小的小洞，里面放盏煤油灯，下面墙根上放着几个大伙听课用的小板凳。没有桌子，膝盖就是我们的桌子。在这个小窑洞中，我们度过了3年充满友情、快乐、温馨的生活。

1944年一个初春的上午，我到校部报到后，被人领到这孔小窑洞前。我在门口刚喊了一声：“有人吗？”立刻从里面跑出一个比我略高点的、乐呵呵的圆脸姑娘。她笑着招呼我：

“刘力贞，你才来？”接着忙不迭地帮我从肩上卸行李。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她说：“我早就知道你啦，还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不用人介绍我就认出你啦！”她拉着我走进窑洞里。

开始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她说：“别踩着我的被子！”过了一会儿，我低头仔细一看，地上铺着一床粗布被子，原来她正在缝被子呢。我于是也蹲下来帮她缝被子。我们一边缝着，一边聊着，她对我说：“我叫王涛英，原来在鲁艺当公务员，后来人家看我小，爱学习，就送我上了延中。我不像你从小念书，将来咱们在一个班上，还要你多帮助。”接着又说：

“我知道，你是烈士的女儿，跟你在一个班我太高兴啦。”我说：“看你本不像本地人。”她说：“我是河南人，母亲早死啦，父亲和大伯一家逃难到陕北。”我脱口而出：“原来是河南担。”

她笑着说：“对啦，就是河南担。父亲一条扁担，一头挑行李，一头挑着我，把我挑到陕北来的。”

哨子响了，原来吃饭时间到了。涛英带着我下山吃饭。我们的灶房就在校部下面的石崖下。没有食堂，大家就在灶房外面的空地上用餐。开饭时，从灶房抬出一大桶小米干饭，一小桶菜。大家排队舀饭、分菜。吃饭时，涛英告诉我：“你的小缸吃饭不方便，像我们用小盆好使，一次就能盛够饭菜，不必费事舀第二次。男同学用罐子吃饭，他们肚子大，吃得多。”

这时我才发现饭场上的男同学每人脖子上都吊着个黑瓷罐，左手托着罐底，右手拿着勺子从罐子里一口一口舀着吃。吃完饭，涛英说：“你爱吃锅巴吗？咱们也去厨房要点。”说着，她一把拉着我进了厨房。只见锅台周围挤满了同学。炊事员一边从锅底铲锅巴，一边给大家分。你一块、我一块，香喷喷的锅巴味儿直往我鼻子里钻。涛英喊着：“别自顾自，还有我们呢！”一个男同学掰了一块给她，她又分了一些给我。涛英一边吃看锅巴，一边指着做米饭的大锅说：“你看这锅多大，一顿要做上百斤的米。你再看那铲子实际就是一把铁锹。告诉你吧，星期天炊事员要休息，咱们还要帮厨做饭呢，”我说：

“我不会做怎么办？”她爽快地说：“别操心，到时你只拣你能做的事，反正人多着呢，大家互帮互让点。”

天黑了，我同涛英都睡不着。初春的天气，还有些寒意，加之窑里的通铺上就我们俩，冷清的。涛英说：“咱们靠近点暖和，要不咱们合被窝，更暖和。”我因跟她还有些生，不好意思，但她不由分说已钻到我的被窝里

了。她说：“你是独独一个，我也是个，咱们就像亲姐妹一样。同学、同学，同床同学，不就是姐妹？”我说：“是同窗好友，不是同床。”她说：“就是同床。咱们窑里要住五个女同学，咱们都是同床同学。”月光从窗底的破洞里照进窑里，一缕青光洒满窑洞。我久久不能入睡。

“力贞，力贞！”是涛英叫我。我急忙跑出小窑，只见她站在一个大木桶前，手里拿着一条扁担，说：“今天咱俩抬洗脸水。”“哟，这么大的桶，咱们怎么抬得动？”她说：“放心，只放少半桶水就够了。”于是，我们抬起大木桶，还没走两步，我们就争执起来。原来，涛英总是把桶放在她那边，让我抬个空扁担头。我说让我抬个空担头，这样我不干，太难看了。

她说：“你个子小，又没干过这种重活，不要勉强。”我执意不肯，于是我们在山坡上就这样争来让去，一直走到山下。我们从厨房取了半桶热水往山上抬。山路很陡，一摇一晃，尽管涛英让着我，竭力把桶靠近她那边，但我的腿还是不由地打哆嗦。

教室坐落在我们小土窑的对面，是一孔大土窑，冬天冷，夏天热，一般是下雪下雨天，我们才到窑里上课。没有课桌，课本就放在膝盖上，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我们的课本都是学校教员自编的，并且刻成讲义发给大家。我们的课程除一般文化课外，还讲一些基本革命理论，结合形势，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我们经常是在院子里上课，有时，一阵风来，常常把讲义刮得满院飞舞。我们复习功课，全靠自己的笔记与作业。那时，同学们对作业抓得很紧。下午一下课，赶紧把作业做完。一则做完功课可以放心去玩，再则晚自习没有桌子，一个窑洞只一个小燃油灯，大家一块做功课也不方便。涛英没有上过小学，学习难免吃力。但她非常用功、好学、谦虚。她经常借我们的笔记、作业，学习怎么解题，甚至连怎么写字她也要学。其实我们的字写得都不好，因为边区学校不注重练字，我们的字都是“自由体”，没有规矩。

在学校我们也参加生产自救：捻毛线，给前线战士织毛袜，种谷，种菜，荒年时挖野菜。我们班还在对面山坡上开了一小块荒地。一天下午，涛英叫我们去劳动。路上我们跳着，蹦着，唱着歌。突然有一只大癞蛤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别的女同学吓得乱跑，唯有我不怕。我捉住了癞蛤蟆，把它翻转过来肚皮朝上，用小木棍敲打，敲着敲着它的肚子胀起来了。我玩得好开心，却忘了劳动，迟到了。过了几天，班里开生活会，涛英给我提意见，说我劳动不认真，玩蛤蟆。我很生涛英的气，为什么在下面不说，偏偏跑到会上出我的洋相？我不理她，她却笑呵呵地说：“你自己错了，还不让别人批评，你要求进步，就这样怕批评？”我说：“当时你为什么不叫叫我，制止我？”她说：“你还犟嘴。那时你劲头那么高，我能说动你？”我说：“你没说，怎么知道说不动？你进步，也别拿别人垫背。”我一扭头，不理她了。为这事我很不高兴，可是，我怎么也顶不住她热情相待。她说：“你脾气好大呀！”

得啦，我今后在帮助人时注意方式就是了。”我也有些回心转意，就说：“以后我不会因贪玩再误事了。”

我父亲为革命牺牲，我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早就想加入共产党。但是党在什么地方，谁是党员，我却不知道。那时党是不公开的，我怎么找到党呢？想来想去，我有了一个主意。我们的班主任王教员各方面都好，她一定是个党员。于是我写了一篇作文《我想加入共产党》交给了王教员。王教员

看了我的作文后，找我谈话。她说，你的志向很好，应该找支部谈谈。你可以先找你们班上的鲍志亮，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一天，王涛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力贞，你要求入党太好了。我是预备党员，咱们支部书记是鲍志亮，过几天他要找你谈话，向你提一些问题，如：你为什么要入党？如果党接收了你，你怎么办？如果党不接收你，你又怎么办？”

我没有思想准备，让她问懵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到底她是我的好朋友，她教了我怎么回答。后来她又说：“班上党员对你印象很好，你学习好，又团结同学。不过今后干什么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应任性。”后来，每隔一段时间，涛英就同我谈一次话。

她对我反倒比我的入党介绍人还抓得紧。我入党宣誓那天，她分外激动，几次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拥抱我。

我们小窑洞还有几个同学，像朱忠勤、朱忠芳。她们是姐妹俩，湖南人。她们姐弟三人是随姑姑到边区来的。她们的姑姑是老革命，姑夫是王稼祥。朱忠勋和我同龄，一双大眼睛，白白胖胖。她学习好，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朱忠芳比我小，高挑个儿，尖下巴，也生着一双大毛毛眼。她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针线。同学们玩的时候，她手里总是拿着针线活。她做的布鞋前面还有一块带花的绒头，可漂亮啦！另一个同学是杜芳枝。

我与她第一次见面是在开学前的考场上。

提起杜芳枝，在我们延中可算得上是个美人。中等个子，满月脸，长长的睫毛，丹凤眼，同学们把她比作牡丹花。有一次学校选女电影演员，女同学们叽叽喳喳，都想吸引导演的视线。可导演们似乎毫不动心。这时，杜芳枝气喘吁吁地来晚了，导演们的视线一下集中到她身上，异口同声地说：“多漂亮的小姑娘！”于是敲定，选她去拍电影。

后来，知道是江青要拍《吴满有》，要一个女孩扮演吴的女儿。再后来又听说江青患了肺结核，一年四季在柳树店泡病号，电影也告吹了。

芳枝比我小，很文静，一双眼睛总在笑。她与我一见如故，形影不离。我说什么她都信。有一次我哄她玩，她也当真。面对她的天真，我心软了，再不拿她开心，逗着玩了。杜芳枝外柔内刚，有一股嫉恶如仇的倔犟劲头。她要是知道谁干了不地道的事，就再也不搭理他，哪怕是自己的亲友。

1944年延安发生了旱灾，学校发动学生上山打草，挖野菜。野草喂猪，野菜送到灶房做菜吃。炊事员给我们做成苦菜面丸子，青龙过海汤，味道挺好，吃罢饭还觉得余香未绝。

那时我们食欲旺盛，整天想吃，可除一日三餐小米饭外，什么吃的也没有。于是，我们便到野地找野果子吃。什么羊奶奶、蒿挂挂、酸枣、甘草根都是我们的美味食品。

有时，我们也能凑儿毛钱上街买烧饼、饅饅吃。大伙儿特馋，但谁也不吃独食，一旦搞到一点吃的东西，总是大家分着吃，这样才有味道。有一次，我和妈妈到王家坪去看毛主席，毛主席把周副主席从重庆带给他的香蕉、苹果、桔子给我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好香呀，我把它们放在口袋里，一会儿拿出来闻闻，但总舍不得吃，最后还是拿回学校与同学们分享了。还有一次遇到父亲的警卫员，他一见我，就想起父亲，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后来，他给了我一个他爱人制作的万花筒玩，还给我买了两个夹肉馍。我都带回学校与同学们共享。

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全校都沸腾起来。学校组织了秧歌队，我

到姑姑家借服装，她把做新媳妇时穿的衣服都借给我们了。杜芳枝穿了身粉红色衣服，配着她桃花瓣似的圆脸，美极了。她的秧歌扭得比谁都好看，碎小的小步，两手一前一后地轻轻摆动，端庄轻盈。我对涛英说：“你怎么没有芳枝扭得好看？”涛英说：“我怎么比得上她，人家是文工团员！”我问芳枝怎么没说过？芳枝回答：“那有哈好说的，我12岁进文工团，把念书都误了。”

1946年4月一个大风天，是星期六，我没回家。同班一个女同学邀我和涛英到曼秋教员住处去吃葱油饼。我们来到曼教员窑里，曼教员很沉重地告诉我们，还吃什么葱油饼，出大事了。原来叶挺将军乘坐的飞机失事了，飞机上所有的人都遇了难。这对我们真像五雷轰顶。党为了营救叶挺将军，花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与国民党谈判，刚刚救出，又遇难了，怎么不叫人难过！不久，在延安东关广场为“四八”遇难烈士开了追悼会，我们延中的学生也去了。当遗体下葬时，叶挺将军的三儿子叶华明哭着要爸爸、要妈妈。见此情形，周围的人无不落泪。我们几个都哭成了泪人。涛英干脆嚎啕起来。

芳枝默默饮泣，那泪就像串珠般直往下流。我毕生只有两次这么伤心，一次是埋葬我父亲，一次就是这次安葬叶挺将军、王若飞、秦邦宪等死难烈士。

1947年，胡宗南匪军大举进攻延安。边区政府决定把延中的一部分改编为野战医院。

3月27日，我们延安中学的师生由桥儿沟撤出。天没亮，行军哨子响了。我们迅速穿好衣服，打起背包下了山，急匆匆吃了饭就出发了。我这个人自小有个毛病，吃饭不能急，不能凉，一急一凉，一准肚子疼。

我一走，一边忍着肚子的绞痛，头上直冒汗。涛英看见了，立刻抢着帮我背背包。

我说不要紧，走热了就过来了。她关心地说，要不歇会儿。我说：“没用，挺挺就过去了。”我屏住气，慢慢地走着。太阳愈来愈高了，天渐渐暖了。我的肚子疼也渐渐轻了，消失了。到了吊儿沟，我和涛英、芳枝仍住在一个窑洞里，我们这时已不只是同学，而是解放军野战医院的工作人员，是同事了。杜芳枝和王涛英一个分到所里当文书，一个分到护理部当护士，我分到院部当文书。当时，护士有夜餐饭，是面条。一天早上，涛英兴冲冲地端了一缸子面条给我，说是给我留的，让我赶快吃，别让人家看见有意见。

我再三推辞，说我胃不好，怕凉不能吃凉面条。面我硬是没吃，但涛英的情，我是深深地领了。她处处像姐姐似的为我着想，惦念着我。当她分到所里，我们不在一起住时，她总是托人捎话给我，要我注意身体。有空还跑来看我，帮我洗衣服。杜芳枝也分到所里，她看我把缸子丢了，就纺线卖钱，给我买了个缸子。我没有帽子，她把自己的外裤拆了，做顶帽子给我。共同的生活、学习，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光阴荏苒，如今的我已是60开外的人了，回首往事，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朱忠勤在南方工作；朱仲芳在北京，成为治疗血液病的专家。而涛英、芳枝却已成为故人。涛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那是1951年，涛英不顾已怀身孕，随志愿军去了朝鲜。她把自己的鲜血与生命献给了朝鲜人民，她的遗体也安葬在异国的土地上。1986年，我带着思念之情又来到桥儿沟，看到我们曾经住过的那孔可爱的小窑洞时，我无限感慨。涛英、芳枝的身影、面庞又出现在我眼前。呵，物在人去！人虽然不能像物一样长久存在，但我们

的友情，我对她们的怀念，却是永恒不变的。 刘力贞

女，1929年11月生，陕西省志丹县人。从1937年起在延安上小学、中学、延安大学新闻班。1954年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先后在西安医学院、陕西省中医研究所任教，做生理研究工作。1975年任西安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后任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1979年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治疗研究，是副主任医师。著有《关于罗布麻的医用研究》、《针麻预测》等论文，与人合作翻译了英文《免疫学常识问答》一书。

母女同学

师秋朗

在黄土高原一处平坦的田野上，搭起了一座简陋的戏台。

原来这里正在演出话剧《新女性》：年老的女工卧病在床，当童工的女儿依偎在母亲身旁，而她无力养活母亲，又无钱给母亲治病，一筹莫展。这时，工友姐妹们对她们伸出了友爱的双手，给了她们无私的帮助，显示了团结的力量。

尽管这出戏用现在的眼光看艺术水平并不很高，但它却牵动着台下所有观众的心，大家都为女工的命运担忧。他们屏息静气，聚精会神地观看。我没有想到《新女性》竟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引起观众如此强烈的共鸣。

这便是1939年地处陕西关中旬邑县马家壁的鲁迅师范学校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演出节目之一。台上的母女，就是我的母亲和我扮演的。

我母亲本是乡村女教师，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教师联合会，也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后来本村鲁师毕业的师兆祥回家探亲，在回鲁师时带了我们母女二人，巧妙地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到了鲁师。母亲时年34岁，我才14岁，我们母女此后便成了同学。

刚到鲁师时，女同学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内有相对两铺大炕，原来的女同学都挤在一铺较小的炕上，大炕空着。

我们来了后，就睡在大炕的一头。同学们很活跃，又都很热情，一有空就和我们攀谈，问这问那。同她们交谈的是母亲，我常常是一言不发，同学们想逗我说话，还欢迎我唱歌，我都张不开口。她们就自己唱，唱完了又欢迎我唱。其实我会唱很多歌，也有革命歌曲，如《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就是我在家里时偷偷学会的。但我羞于见生人，更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从前每逢出门，不是母亲拉着我的手，就是我拉着母亲的衣角。

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狠狠地说我是“封建残余”。母亲笑了，向我重复了这四个字。

“封建残余”这四个字，对我刺激很大。我很羡慕她们，热情、开朗、无忧无虑，可是我都做不来。在家里的时候，我哭着闹着要到边区去，几乎要偷跑；母亲一半是对我不放心，一半是为了寻找我那离家已14年的父亲，才下决心同我一起来边区。我在想，如果我那时真的离开母亲偷跑出来，我

将怎样生活？简直不可想象。我暗暗下决心向老同学学习。

过了不几天，我和母亲都编在第五期（班）学习。因为母亲当过教师，便被全班同学选为学习班长。我会识简谱，也会写美术字，这些小小的“才能”，也很快被同学发现了，于是选我为文娱干事。我的任务，除了指挥全班唱歌，还负责编壁报。音乐教师荆津那时怀了孕，有时不能上课，就由我把要教的新歌在她面前唱两遍，再到班上去数；壁报也是准时编出，每期都要更换新报头。这些工作我做得很认真。

尽管班上同学为壁报投搞很踊跃，不缺稿源，但我还是常常将母亲的军：“你是学习班长，写篇稿子吧！”说实在的，母亲是学员，可是却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

她是班主任刘若曾老师的得力助手。上完课，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母亲很忙，再加上她的笔头并不快，所以她往往要向我求饶，或者告诉我哪个同学学习好，让我去采访她们。将军的结果，往往是我去完成任务。

我和母亲都编入第5期后，组织上把我们母女安排在离这个班最近的一位老乡家里，独居一个小屋。夜里我还要钻进母亲的被窝，摸摸她的乳头。这种生活，一直到后来我们母女又在在一个小学教书时，还是如此。当时，蔡畅妈妈总爱和我开玩笑：“唉呀，这位教员晚上还要摸着妈妈的奶子睡觉呢！”

我从小爱挑食。当时的伙食主要是大馒头、黄豆芽熬豆腐。我就不爱吃黄豆芽和豆腐，大馒头作为主食，我也不习惯——在家里常吃的主食是面条。母亲看我吃不好饭，便每天给我买一个烧饼。那时定量供应灯油，母亲就把灯油省下来，用它跟老乡换个鸡蛋煎了给我吃。母亲没有积蓄，离家时变卖了东西得的钱，除了路费，所剩无几。这些钱既要照顾我的生活，还要尽可能节省，以备急需。所有这些，我的教员和同学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只看到我日渐活泼，工作认真，却没有注意到在我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佑护着我，那便是伟大的母爱。我常常在想：要是没有母亲在身边，而是我独自出来参加革命，岂不是要饿死？！当然，真到那时，我也会适应环境的。

在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常年卧病在床，我母亲实际上是那十多口之家的内当家，在村里又是受人尊敬的教师，所以她习惯于管人，自己说了算。这种作风，时常表现在做学习班长这个工作中。我作为她的同学，很看不惯。那时每星期六都要按组开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和母亲在一个组里，我就批评她“家长作风”。同学们听后都笑了，那意思是：“瞧这个丫头，批评她妈哩！”而我却严肃认真的。母亲听了笑笑，表示接受意见。

在学习上，由于全班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听课的重点也不同。文化课对我们部分同学来说，可以不听。但教务长马小云讲授的《社会发展史》，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每次都去听。当年的同学，至今回忆起这一课程，仍然津津乐道，一致认为马小云老师讲得好。而我自己，也感到这个课程很新鲜，还经常在课堂上提点问题。教员对能提问题的同学很有好感，认为肯动脑子，学习主动。实际上我对许多内容并不真正理解，还是死记的多，只是在以后才逐渐理解消化的。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深感这一课程为我们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我自信比母亲快。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定义等等，我虽不甚理解，但记得很熟。母亲毕竟为无数繁杂的事情所搅

扰，记忆力不如我。有时睡到炕上要问我：“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她对奴隶社会生产力的特征却理解得很透，用不着去记。我想如果像现在学校的考试方式，我的考分一定会超过母亲的。

母亲很快入党了，我却还不知道党是怎么回事。那时党组织不公开，发展党员是支部对表现好的同志个别做工作后吸收的。母亲入党的事，她从未在我面前泄露半点，我也丝毫没有觉察。虽经两三个月的锻炼，我已不拉着母亲的衣角走路了，但因同在一个班，同住一个屋，几乎是形影不离。当我有一两个小时见不到母亲时，我便安慰着自己：她是班长，自然有她的事。其实，那是他们在过组织生活。他们开会时，一个个秘密转告，然后到一个倒塌了的破房子里，或到沟底某处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小组会或支部会。

而开会的时间是不能拖长的，否则，就会被人发现而暴露了这些党员的身分。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有个党组织，我以为到了边区就都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了入党的事。这个问题一提出，便使我坠入了五里雾中。我不明白，我已经是“共产党”了，怎么还要我入党？这个党又是干什么的？我怎么看不见她？指导员耐心地启发我，我只是给他一个不吭气。

但我在心里却暗暗下了决心，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我绝不入党。

指导员撬不开我的口，只好作罢。但他交代了要保密，这一点我还能坚决做到，即使在母亲面前，我也只字未提。

我入党是4年以后的事了。我曾问过母亲：“你那入党志愿书、入党动机一栏是怎样填写的？”母亲说填的是“为妇女解放”。我心里暗暗有一种骄傲情绪——别看你入党早，你的觉悟没有我高，我的“入党动机”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当然事后我又发觉自己这种情绪错了：第一，依靠共产党求得妇女解放并不错；第二，相隔4年，不可同日而语，母亲的觉悟也在提高。

离马家堡2里地有个职田镇，该镇为国民党所辖，星期日鲁师的同学常到镇上买点文具和日用品。到了1939年五六月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磨擦日甚一日。先是在傍晚对从职田镇回来的同学打黑枪，接着夜间在马家堡周围滋扰，我们全校手无寸铁的师生受到极大威胁。于是，我们被迫过起了游击生活，常常夜间紧急集合。每当这时我们的生活班长范云轩，总要把独居老乡家里的我们母女先唤醒，使我们没有落后过一次。我们先是到沟底躲一夜，白天回到原地上课。后来就被迫不断转移，夜里下沟，白天换个村子。

一般是在破庙里暂歇，村边的大树下上课。转移时黑板是由男同学背着，而壁报总在我的挎包里，每到一地，便细壁报挂出来。不管如何行动，按时编报是不会耽误的。有时伙食供应不上，我们便到老乡为了饲养牲畜而种的首蓿地里，采摘首蓿芽煮了充饥。这时，我那每天一个烧饼的“特殊待遇”早就没有了。

鲁师的学制是半年。到了7月，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边区去办学校，只剩下部分工作人员和很少的同学，这些人奉命返回延安。而我和母亲也是留下来和学校一起行动的。

为了这次长途行军，母亲用仅有的几个银元买了一头毛驴，驮着行李，也为她代步。

我们第一天只走了四五十里。一夜醒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脚也落

不得地，只能勉强走路。

三天过后，我们就一点也不觉得累了。我们这时才把每日行程增加到六七十里。我年纪小，比母亲走得快，而母亲要是没有那头毛驴，肯定受不了。我们在路上颠簸了7天，最后一天竟行程110里。这天我们同大队一起出发，却与早出发两小时的先遣队一同到达，还参加了为后来者烧水的劳动。这时我觉得战胜了行军的困难，心中别提多高兴了。

我和母亲经历了艰难的跋涉，终于重返延安。随后，母亲被分配到安塞完小当教员，我同一批年龄小的同学到边区中学继续学习。刚去不久，学校又改名“边区师范”。我们母女同学的生活虽然结束了，但这段美好有趣的生活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1991年3月17日 师秋朗

女，生于1924年9月。鲁迅师范学校第5期学生。从事过多种工作。离休前任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长期研究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建立了“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

著有《现代圣人徐特立》。帮助她父亲完成著名的《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一书，并主编出版《心向延安》，其中由她撰写的《生命的转折》一篇与该书中的《母女同学》是姊妹篇。

第二次生命

李一波

在延安，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延安，对我来说，真是太可爱了，令我终生留恋。其中一件小事，更是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回想起来，就抑制不住激动、兴奋的心情。我15岁那年生了一场重病，是延安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45年9月，中秋节的前几天，我下课后，急忙去厕所。

当我上完厕所往教室跑的时候，在下山的路上摔倒了，怎么也站不起来了。我的两条腿不疼，就是不能站、不能走，完全瘫软了。同学们跑来，连背带拖把我扶回宿舍。

那天夜里，我过了一生中最害怕、最难熬的一夜。同学们累了一天之后，个个像小熊一样，躺下就睡死了。在静悄悄的黑夜里，我的耳朵枕在用服装成的小枕头上，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好像深山峡谷中敲打石头的回声。这沉重的咚咚声，使我害怕，使我感到孤单无援，好像会有一只老狼跑过来吃我似的。我刚刚合上双眼，就“看见”有几个可怕的怪物。我吓得不敢再睡了，可又不好意思把同学们叫醒来，只好盼着天快快亮。

天亮了，我就安全啦！

第二天，我妹妹一克找四班的同学给我送来十多个槟子——红香果。要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这一群饿狼，一会儿就把它吃光了。而现在，我一闻到红香果的香味，就想呕吐，连一点点食欲都没有，只好瞪着眼睛看着这些红得发紫、紫上又挂着白霜的小红果子发呆。记得在秋收季节里，大家上山去摘酸枣吃，一边摘，一边吃，一边还往口袋里装，回来后，分给大家

共享。几颗小小的红酸枣，甚至一两颗青黄色的小酸枣，就可以使我们吃水果的欲望得到满足。今天，真该我倒霉了，吃不成，闻不得，仅仅只能是看看而已！

几天过去了，我病得更严重。班主任李绵老师着急了，同班长王鹤仁、生活干事王振先同学商量，组织四班所有的男劳力，抬我去医院治病。从桥儿沟到中央医院有几十里路，要过河，要爬山，还不能休息。这样，需要一个班的人力才行。

参加护送我的同学有王鹤仁、牛荫西、马瑞珍、呼世连、王振先、李林森、李明德、贺光辉、杨廷藩、王京平、唐永忠、林汉雄等 12 人。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男同学自制的土担架上，被送往边区医院。在担架上，我醒一会，昏睡一会。我是多么不想离开学校，不想离开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我真担心我这次一走，真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我头脑清醒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自己直流眼泪。在似睡非睡的时候，听到有人在急急地喘息，轻轻地交谈。记得那天太阳特别的毒，我睁不开眼睛，不知是谁，给我头上盖了一条毛巾，把我的脸和眼睛都盖了起来。我们是早上出发的，到了医院，好像天就快黑了。同学们刚刚在土窑洞前放下我，医生就来了，他确诊我患了萎黄症，需要输血急救。他顾不上查血型，挑了几个同学就抽血去了。当时，王振先、王京平、李林森、唐永忠等好几位同学都献了血。李林森的血与我的血型不同，还没用上。40 余年后，林森风趣地回忆说，他们抽血后，在返回学校的路上还说：“我们每人抽了半缸子血，快有 500cc 了，连一个鸡蛋都没吃上，只喝了碗盐开水。”现在王振先因患脑血管病已痴呆了，可他还记得，给我献血后，回到学校喝了一碗凉水，好几天都在拉肚子。是的，他们为了挽救同学的生命，丝毫没有想到自己，更想不到什么报酬，完全是心甘情愿的无私奉献。这种革命情谊令我终生难忘。

同学们充满青春活力的鲜血输入我的血管以后，我活过来了。病友们说我的脸色由青黄变成了土黄。以后，我一天天好起来，也能吃小米稀饭和面片汤了。医生向我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吃一点猪肝菠菜汤。可是在当时的延安，要弄一碗猪肝菠菜汤，谈何容易。后来，有位阿姨和一位叔叔还是送来一碗这样高级的营养救命汤给我吃了。又过了好长时间，我能下地扶着床边走路了。不过开始时，走几步就要趴在床边休息一会儿。

此时生命对我来说，不只是有一丝希望了，而是已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把握啦。我每天由愁眉苦脸变得有了欢笑声。同病房的女友安娜，鼓励我要有信心，有决心。我就每天坚持下床，学习怎么站得稳一些，怎么迈步走路……并且每天都稍微增加一点活动量。

后来我又有了进步，能安心在床上看小说了。我出院后，在延安城南一位阿姨家里，休养了整整一个月。

1945 年快要结束了，我再也住不下去了，决定返回学校。

这一天，我吃了早饭就动身，走了一天，快黄昏了，离桥儿沟还有一小段路，实在累得走不动了，正好遇上一辆空马车回桥儿沟，我厚着脸皮说服了赶马车的老百姓，带我回到桥儿沟。天黑了，我才走到四班住的那条小山坡的石台阶下。今天，我上这一条不算长也不算高的小山坡石台阶路，竟然休息了好几次。如果在平时，每天我至少要来去三趟，连走带蹦地，一口气就爬上去了。看来，我实在是太虚弱了。

我突然出现在四班的女生宿舍里，好像飞来一个外星人似的，他们高

兴地把我围了起来，我也高兴得合不上嘴。此时此刻，他们和我一样，都十分激动，十分兴奋，十分亲切。

我的这条命，有医院的功劳，也有他们的功劳，是他们付出了代价换回来的。

走了一天路的我，真饿坏了。不知是谁的瓷罐子里还剩了一些小米干饭，他们给我倒进去一些热热的开水，我饿狼似地大口大口地吃了好香的一顿晚餐！

45年过去了。我常常回想起这些往事。在我的血管里流进了同学们的新鲜血液，我的生命是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友谊和关怀爱护中捡回来的。李一波是我，但她并不属于我，而是属于母校，属于老师和同学们，归根结底是属于党的。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这一直是我努力工作、勤奋学习和热爱生活的动力。老师和同学们奉献给我的是无价之宝。我对延安中学，对我的老师和同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不是父母胜似父母，不是兄弟姐妹，胜似兄弟姐妹。尽管岁月沧桑，人亦老矣，然而常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依然是他们当年的模样。他们给予我的那种无私的、纯洁的、深厚的爱，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底。愿这种爱生生不息，洒满人间。

李一波

女，现名史一波。延中四班学生。外交部驻外大使馆二秘。

同窗情

刘凯

她，离开我们已经七八个年头了。她是个普通人，和同时代其他许多同学一样，出学校随军而后转业地方，先是文工团员，后来从事医务工作。她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生活着；

最后又无声无息的结束了一生。她的死也是平淡无奇的。为了给患脑血栓、半身不遂的丈夫寻找一种治病的中草药，从西安到一个县的路上翻了车。在她合上眼睛的时候，没有哭，没有笑，也没有留下什么话。这不过是尽了当她当医生和妻子的责任。

靖康，姓何，老家西康，生在上海亭子间，长在边区窑洞里。她的爸爸周文，30年代是鲁迅的门生。鲁迅在杂文中称他是“有为的青年”。他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长期奋战在文艺战线上。1935年，他随党中央长征到陕北。他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面向工农兵的报刊《大众报》的创始人。创刊伊始，毛泽东主席亲笔给他写信鼓励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靖康在父亲的熏陶培养下，从小养成活泼、热情而又坚强的性格。她喜欢歌唱和文艺，对工作总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对人对事真挚、诚恳而又严谨。

40年代初，有一次举行联欢演唱会。两个穿戴一样，长相俊秀的小女孩手拉手唱起了《东北流亡进行曲》。当她们唱道“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时，原来欢乐的气氛骤变，她们自己哭了，阿姨、教员哭了，小同学们也跟着哭了。事后，人们知道她们是姐妹俩，姐姐叫何文康，妹妹叫何靖康。

我们见了她都叫她们“会唱歌的小姑娘”。

我和何靖康“真正”认识是1946年在延安中学的时候。

那年，我们先后插班考入延中十三班。我们都是新生，又都来自晋绥，父辈们也是熟交，因此，无形中就比别的同学更亲近些。说也凑巧，在窑洞教室里，我们又被分配在一张课桌上，自习课我们的座位是面对面。我们还有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看报纸。

《解放日报》副刊上的人物通讯、诗歌和《边区群众》文艺副刊《万花山》里的小花朵，是我们每期必读的。我们都有一个小本子，总是把自己感兴趣的文章摘抄下来，还常常互相传阅。同学之间的友谊、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

在班上，她是个普通女学生，但也有不普通处。她和别的女同学打扮不同。学校是实行供给制的，男女同学发同样的灰色土粗布衣服。女生为了有别于男生，在穿戴上有三项“改革”：一是用一根针把帽子别在后脑勺的头发上；二是腰里扎一条细毛绳；三是春末秋初和整个夏天，把袖子挽在小胳膊以上。这在当时，是极为时兴的，它的确较好地表现了女性美。但何靖康却不讲究这些，她和男同学一样，不是剃成光头，就是留个小平头；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她老穿一件又肥又大的夹衣。到冬天，腰里也和男生一样，扎一根麻绳，不是图好看，只为取暖和每天出早操方便。每次出操，她也总是跟在男同学后面，跑在女同学前面。因此，男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假小子”。农村姑娘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

在同学中最早认出她是女生的只有我。我和她坐近时，发现她的眼睛很有神，小巧的嘴巴很会讲话、唱歌，腮边一对小酒窝也隐约可见。有一次，我一时心血来潮，不假思索地对她说：“你那两只眼睛像天上的两颗小星星。”她瞪了我一眼，很快脸上泛起了很少见的红晕，还抿着嘴微笑了一下。

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人们通常说的“嫣然一笑”，样子是很动人的。

在学习、生活上我们总是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当时没有毛笔，没有纸张，作文、数学练习本是用领来的粗白纸，自己裁，自己钉的。两个月发一支铅笔和一个蘸水笔尖。

没有笔杆，我们就把蘸水笔尖绑在铅笔上，先用铅笔在数学本上作数学练习，写完后再用蘸水笔在上面写作文。我们用的墨水是用学校发给的蓝灰色颜料，找只旧瓶子自己用水冲调而成的。每次我找来空墨水瓶，首先给她。有时，多领一支铅笔，也先给她用。

她也不亏待我，每次都帮我钉练习本。

学校的生活自然很艰苦。平时，顿顿都是小米干饭加萝卜、白菜，每星期吃一次二米饭（大米加小米），每月才吃一次白面馒头和有豆腐、肉块的菜，这叫“改善生活”。

每次“改善生活”，都要有学生帮灶。我差不多每“灶”必“帮”。

但凡轮到我掌勺，必然要给她多打一些菜。有时，我们也自己想法“改善生活”。

家在延安的同学，星期天拿一点白面来，加上自己种的南瓜，用脸盆煮点南瓜面片吃。

何靖康是大伙信得过的公正人，她被推举出来掌勺，轮到给我盛饭，她也会有意在锅底挂稠一些。

因为我和她接触多，关系超过其他一些同学，有人就说我们是在谈恋爱。有的居然在墙上写稿，旁敲侧击，加枝添叶地进行讽刺。我们一露回，他们就会侧目而视，嬉皮笑脸。

这其实是我们生平遭受到的头一次不白之冤。我们只不过接触多一些，谁也没有想别的什么事。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句“亲呀、爱呀”的话，没有写过一个学习以外的字。有时还和其他女同学翻手比劲、摔跤比赛，可和她，连手都没有碰一下。尽管如此，同学间的真诚友谊并没有因此变质。

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上山打柴，要求男女搭配，便于帮助。出发前，我有意把她和别的两个男同学分在一起：但一到山上，别人把她甩在后面，她只有跟在我们一组后面。

在两个捣蛋同学的唆使下，和我分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一个一个溜走了，在一个小沟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草丛里常常有老鼠、松鼠和蛇出没，平时泼辣的她，这时也和别的女同学一样地胆怯起来了。因此，她老跟在我后面，亦步亦趋。我不得不有意在前面开路，砍一部分，给她留一部分。时间快到了，任务还没完成。临走时，我还把我打的柴给她分一些。

这是我打柴最少的一次，回来也晚了点。大家准备吃饭了，我们才在众目睽睽下急急忙忙赶回来。

还有一次，我们到柳树店白求恩和平医院去参观，要过延河。平时，女同学和男同学一样，都是脱掉鞋袜自己蹚水。

这回，何靖康没有脱鞋袜，要人背她，而且指定要我背她。下到水里，她在我耳边悄声说：她身上不好，不能动冷水，让其他同学背，怕他们使坏，把她撂在河里。于是我只好“忍辱负重”，并放慢放稳脚步，以防失足落水。这样，大家过河好一阵，我才上岸。

越来越多的非议，使我们原本纯朴的友谊变得复杂了，我们不得不有意回避，免得扩大事态。课桌分开了，自习也不再是面对面，甚至见面不抬头，不说话，路上碰上绕着走。有她的地方我不去，我去的地方她不来。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躲避，反使我们的心的贴得更近了。过去公开的互相帮助，变成隐蔽式的“地下”活动。不论办什么事，她不在场，我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提不起劲来。她也是，学习没有过去那么用功，有空就见她躺在宿舍里，懒洋洋的，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有时，她投过来一种探问性的目光。如果我说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她就会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们每年只发一双单鞋。我跑路多了，穿得费，不到年底，鞋底就穿透了。入冬了，我只好换穿一双别人织的麻鞋，里面套一双袜子。穿这种有头无尾的鞋，使我的脚后跟冻裂了几道口子，污垢老茧长了一大层。何靖康看了，便把自己的一件毛衣拆了，织成毛背心，用两只袖子织了一双又长又厚的毛袜，塞在我枕头下。学校每两年发一套棉衣。第一年还好，到了第二年，我的棉裤屁股上就开了个大洞，但又找不到布块可补。只好任它去了。为了不让别人笑话，每次吃饭，我都走在最后面。她也看在眼里了。一天下午上自习，我掏口袋发现一顶旧布帽子，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正要大叫“失物招领”时，她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我一脚，我才恍然大悟。下自习时发现我的练习本内有一枚针、几根线。

晚上，同学们休息了，我在煤油灯下，把裤子的洞补好。第二天出早操，她一眼就看见了。这一天，她似乎格外高兴。

我对她也是比别人例外。解放战争开始后，学校转移到离延安 40 里的

吊儿沟。同学们只带了随身的衣被、用具，多余的都留在学校了。几天后，我和几个同学奉命返回学校处理善后事宜。同学们托我们把值钱的东西带回来，其余的能卖就卖，没人买的就送当地老乡算了。何靖康的嘱托也在内，我当然一一记在心里。回来后我都一一办了。她的旧裤子、单衣、木箱都卖了，有一块旧毯子和一件旧棉衣，考虑到冬天她还用得着，我就给她背了回去。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飞机第二次轰炸延安后，我军后方的部队纷纷调驻延安。这时，三五八旅来到延中招收文工团员。何靖康毅然报了名，并很快被录取。等我知道了，事情已无可挽回。我找她谈过一次话，问她：“为什么不留在学校，也不和大家商量就要走？”她回答得很干脆：“战争已经打起来了，看样子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书是念不成了，迟早得走，迟走不如早走。”我说：“学校会有安排，我们在一起听学校安排不好吗？”她说：“那又何必呢？我能当文工团员，也会护理伤员，到前方去不是更好吗？”我追问：“到底为什么？”我担心是我影响了她。她沉思了半晌，压低声音说：

“原因吗，还有，还有……”“还有什么？”我连连追问了几次，她始终没说，噙着泪花走开了。 刘凯

男，曾用名刘玉凯。甘肃日报记者，首任主任编辑，现为甘肃《金星》杂志顾问。

我少年时代的挚友

李立

延安的桥儿沟，是一个颇有点名气的地方。1937年，这里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以后边区医院、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延安中学都先后在这里驻过。

桥儿沟有一条比较像样的街道，街上有几家饭店、杂货店、日用小商品店。特别是清晨，老乡们挑着卖菜的小担子沿街摆摊，还真有点热闹气氛。街道往南是一大片河滩，河滩里大都种上了庄稼、蔬菜等。我们延中也有些地在这里。

1945年防旱备荒时，学校在这里种了不少南瓜和别的蔬菜。

仗着我们学校人多，课余时间我们按班次排成长蛇队，把所有的白水桶、各种盆子，凡能盛水的东西全部“动员”起来，站在河边的同学掏满水，再一个个传递到地里浇灌蔬菜。因此，我们学校的菜地长得非常茂盛。延河流到桥儿沟成横向的S形，从北流到对面南山坡底下。到桥儿沟河滩就更宽阔了。河滩上大小石头很多，水面稍窄点的地方水很深，呈现出深绿色；河面宽的地方水浅，露出一块块较大的石头来。河底全是大小石头，河水清澈见底。远远望去，整个桥儿沟简直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那时，我和同班同学杜芳枝很要好，在课余时间我们总到河边来玩。下课后，我们常常在一起跳绳、踢毽子、跳房子，有时也玩自制的扑克，去河边拣花石头，打水漂，或是聊天。延河边确是个很好很美的地方，那里宽

敞、宁静，还有哗哗的河水声伴奏。

我们聊天的内容可丰富啦，有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有听到的笑话和故事。

好友杜芳枝比我小 1 岁，她属猴，我属羊。入学前她在部队文工团工作，由于年龄小，组织上送她来延中学习。女生里我们两人最小，我虽比她大 1 岁，但也许因为她工作过，显得比我老练；又因为她性格内向，看上去她倒像是比我长 1 岁。晚上，我们班十几个女同学睡在一个大炕上，我们两人紧挨着，天冷时常常合成一个被窝。白天，除了上课时间，我们两人也大都在一起，这样很自然地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刚入学时，我们班住的窑洞最高，去饭场（厨房旁边一块平地，便是我们吃饭的地方）要走挺远的路。

先是很陡的坡路，再拐两个大弯，又经过一段凹进山沟很深的岩面路。

我和芳枝吃完饭后常常坐在路上那个岩石窟里聊天。所聊的内容，除了所见所闻，还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芳枝喜欢文学，而我却想拿手术刀，做一名外科医生。说到未来，我们都预感到自己将是建设祖国的主人，将来一定有大事要等着我们做。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也模糊地知道一些，比如新社会将走全民富裕的道路等等。

有时我们也谈到各自的家庭情况和自己的经历。我的家比较简单，父亲从 20 年代后期就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一直是一个军人。长征时他是红军大学的军事教官。抗战时期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前方工作。1937 年，我随父亲在前方住过半年。

一直值得我骄傲的是，在这半年里培养了我骑马的兴趣和骑马的初步本领。我给芳枝讲述过好多我骑马的故事和骑马的本领。芳枝的父亲原是一名陕北的红军战士，后因患肺结核回家养病，性格逐渐变得非常古怪，致使一家人，特别是她母亲吃尽了苦头。

为了这原因，我陪着芳枝不知流过多少泪！

芳枝本人因小时患了耳疾，无力医治，双耳膜受损伤，听力很差。为此更加深了我对她的同情。芳枝是陕北米脂县人，长得浓眉大眼，文质彬彬。陕北人说“米脂婆姨绥德汉”，她简直呈一个名副其实的“米脂婆姨”。她的学习成绩不错，又善歌舞，在延中的秧歌队里她是一名出色的演员。

记得 1946 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芳枝回家返校后，很神秘地把我叫到桥儿沟的延河边，告诉我说，她的二姐批评她不该这么小就有了男朋友，说有人看见她常常在桥儿沟河滩上同一个男同学在一起，关系还很密切。我们俩都很纳闷，搞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又过了些天，芳枝回家时，她二姐又把那位男同学的模样描述了一番，我们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错把我当成了男学生了。多么大的误会呀！我们俩在河滩上说会儿笑会儿，直笑得死去活来。又到了星期天，芳枝回家去向二姐作了解释，二姐还是半信半疑，以为芳枝不说实话呢。

这件事想起来真好笑。我从七八岁在保小起，就一直推光头，到延中后头发也没有留起来。加上我这个人人生性淘气，胆子也大，同学们因此送给我一个绰号——假小子。

我连吃饭都不用正规的碗或是缸子，而是端一个小瓦盆，后来，又换了一个比小瓦盆还要大两倍的瓦罐子，用一根绳子拴住两个耳子，挂在脖子上，配上一把长把子小勺舀饭。

这样倒是非常方便，吃饭还不妨碍看书，干别的事也行。可芳枝总说我用那么大的罐子吃饭不雅观，又不讲卫生。可当时我不大懂得说不讲卫生是指什么。用大罐子吃饭还有一个方便，就是因为我们吃过饭后，常常还要帮厨房搬运些菜蔬之类的东西，有时是抬土豆、搬南瓜，或搬煤块等。搬这些东西时饭罐子挂在脖子上，两只手拿什么都可以。

遇到这种时候我该得意了，我告诉芳枝说，这回还是我讲卫生吧？她也不争辩，只给我做个鬼脸，一笑了之。

1946年秋季，我奉命调到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机要科工作，芳枝仍留校。我走后不久，学校组织了宣传队，她参加了校宣传队，演出了不少的秧歌剧。1947年，自卫战争开始后，靠近我们年级的几个班都转到野战医院去工作了。芳枝因为耳朵不好，不能去医院工作，就转到晋绥边区贺龙中学学习。1947年7月，我们机关东渡黄河，驻山西临县碛口镇时，我打听到贺龙中学的校址，16岁的我便一个人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路找到“贺龙中学”，去看望了芳枝。相隔四五个月后的一天，我因事外出，在返回机关的途中巧遇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我站在路旁观看，突然从队伍里看见了芳枝。

顿时，我喜出望外，一把把她从队伍里拽了出来。我们在大街上抱着直转圈圈，搞得路人都不知是怎么回事。从这次相见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进北京后我们机关住在香山，我估计她会在北京，于是每次来市区，我的口袋里总要装着事先写好我住址的纸条，以防见面时如来不及说话，她便可以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去找我。两年多之后，我终于找到了她，也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我们分别几年后，她同延中的王民生同学结了婚。

王民生是个军人，在海军的航空部队里担任领航主任，他总是在沿海地区工作，芳枝虽然后来毕业于天津大学纺织系，但因王民生所在地区总没有一个像样的纺织厂，以致使她一直所学非所用。

1978年，不知什么原因诱发了她的耳病，不久她便患了脑膜炎，没能治愈，不幸过早地去世了，终年才46岁。芳枝临终前，我一直守候在她的身边，直至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参加了处理芳枝后事的全过程，也算了却了同她从小友好一场的心愿。

1990年10月8日 李立

女，曾用名李蜀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

北平来的“娃娃老师”

阮若琳

桥儿沟延安中学——我的母校。它对我进行着革命的启蒙教育，它让我懂得了生活的真正含义，它指引我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我将永远、永远记着这一切。

1943年的冬天，我从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出发，经灵寿、崞岗、崞县、兴县，走过封锁线，渡过黄河，又经神木、佳县、米脂、绥德、清涧、延川、

延长，一步步踏入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走了3个月，行程2500里，我终于看到了那清澈的延河水，巍峨的宝塔山，还有从抗战开始就分别的爸爸。我激动，我兴奋！但我更在思考，思考我将怎样开始新的生活。很快，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延安中学去读书。

读书，我不发怵。因为我虽然只有14岁，可是我已经在北师大女附中读到了初中三年级，应付延安中学的文化课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要说学政治，学劳动，我可惨了。比我大的续磊姐姐（续范亭将军的女儿），还有谢绍明大哥哥（谢子长烈士的儿子），他们在政治上都比我懂得多，而我临上路时，晋察冀边区的刘仁叔叔送给我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我还没有读懂呢。论劳动，我更差劲了，真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纺线、做棉衣都要从头学起，连纺线搓棉花卷儿也搓不匀呢！从山下抬水上山，也要大同学把重头放在自己肩上，给我轻的一头。这时我才明白，自己虽然多念过几本书，但既不懂政治，又不会劳动，也不会料理生活，我是多么无用啊！我必须在延安中学认真地学，补上我所欠缺的一课。

1944年冬天，边区开展扫盲运动，又推行陶端予教学法和小先生制，发动有文化的干部、学生下乡扫盲，教冬学。我当时真不知道下乡去该怎么干，但是我很想下去，学习我所不懂的、最欠缺的东西。

学校批准了我的请求。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到三边、陇东一带，我和一个叫陶萍的女同学一起到离延安90里地的甘泉县工作。陶萍比我大1岁，她是从大后方重庆来延安读书的，她的父母都在白区工作。学校为我俩雇了一条毛驴驮行李，我们跟在毛驴后面，说说笑笑到了崂山，休息了一阵又赶到甘泉，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被安排到县委住下。

住了两天，我被分到城关镇区政府，开始了我第一次的社会实践。

区长姓贺，是陕北闹红时的老革命，管文教的助理姓康。

他们见到延安来了洋学生，待我如上宾，一个劲儿地说：“看这娃，小小年纪离娘别爷，跑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恹惶的。”

他们给我安排了一间小房，房里有一铺炕，叫我先住下。区政府的生活很安定，一日三餐，品种有小米饭、腌酸菜、红辣椒、炒豆腐。甘泉的豆腐是出名的好呢！有时还有白面条拌辣子吃。我很知足。

我到底该先干什么呢？区上叫我先办个民兵识字班。一到夜晚吃过饭，在一铺大炕上，很多人来上课识字。我每周还在街上办个黑板报，宣传识字扫盲，讲卫生，支援前方抗日的道理。逢到赶集庙会，还要宣传洗脸讲卫生，给妇女讲生娃娃不要坐在灰上，不要信巫神的鬼话，要听医生的等知识。那些婆姨听了我讲的话，一个个笑弯了腰，说：“这灰女子，一点点大，还懂得生娃娃哩！”

过了一段时间，区里又聘我到完小代课，给一、二年级教语文、算术。完小的校长叫雪莱，是从外地到边区的知识分子。他很信任我，对我说：“你在初中学的那些文化，是够教这些娃娃了！”陕北的娃娃红朴朴的脸，一副憨厚相。一班50多个娃娃，只有一个特别笨。一加三等于几，怎么教都听不懂。把我都急哭了。这个娃的父亲反过来嘱咐我说：“娃笨，老师不要着急，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吧！”娃娃们的家长都是好心人，每天早上都让孩子们给我带来糕、馍、果子。他们都叫我“娃娃老师”，叫得我在一个区都出了名，都说甘泉镇上来了个“北平娃”。

我在城关镇都跑熟了，注意到妇女和女娃娃们是扫盲的难点。妇女出

不了门，没办法认字；女娃娃们要帮家里烧火做饭，背小娃娃，家里不让她们上学。可这些娃在边区的新风气熏陶下，非常想认字。每天上午，我就在我房东家的炕上，教她们识字。她们背上娃娃来，我用在完小代课得的津贴，买些红枣、土豆，放在火盆里烤，大娃娃识字，小娃娃吃枣、吃土豆，我们就这样又办了个娃娃识字班。

婆姨们就更难了。她们出不了门，我便每天下午送字上门。缸上写个“缸”字，柴上写个“柴”字，桌上写个“桌”字，一天教一两个字，几个月下来，她们认了上百个日常用字，也认得钞票上的数码了。

有一次，我在镇上不小心惹了一个祸。吃饭之后，我想烧好炕再走，免得回来冷冰冰的。我把柴草点着塞到炕洞里，就到成人夜校去上课了。谁知柴禾烧得太旺，把炕席、被子都烤着了。等我回来一看，满屋浓烟，吓得我惊叫起来。房东一家赶紧帮我泼水灭火，可棉被已经烧穿了几个大洞。大冷天，我没被子盖了，怎么办呢？可不一会儿工夫，我那些学生知道了，拿着棉花、碎布来帮我补被子。虽然被子补得五颜六色，可我深深地感到了乡亲们的一片心意。这一夜我睡得暖和极了！

1945年5月，学校要我们回去。我和陶萍又见面了，准备一同回延安去。在区政府，我们洗头、洗衣服时，发现头发上长满了一串串白色的虮子，毛衣上的每个洞里都有一个黑色的虱子。我们俩用篦子梳，用滚水烫，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小东西也带回学校去呀？

收拾完东西，告别了乡亲，我们又赶上毛驴回延安。我的学生们排上队，眼泪汪汪地送我，一个劲儿地问：“几时回呀？几时回呀？”我也泪眼模糊，不敢再回头望他们，真的，谁知几时能回呀！

回学校总结这一段下乡的收获，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中国的农村，我也交了许多农民朋友，懂得了什么叫为群众服务，怎么联系群众，学习他们勤劳纯朴的美德。我认识到，只有一步步地扎扎实实地工作，才能改变旧中国留下的创伤，改变农村的愚昧落后局面。这点认识使我终生受用无穷。后来在土地改革、合作化等一系列农民运动中，我紧紧掌握这一条，永远不改初衷。

山不转水转，世界是那么大，又是那么小。1971年，我又调回到陕西工作。1974年我响应周总理改变延安面貌的号召，带工作团下乡到延安。走到黄龙县，县委书记来接我们，自称是我的学生，一直记着我这个“娃娃老师”。后来，我到延安柳林区麻庄蹲点，顺便来到了我曾教冬学的甘泉县，碰到了好几个我的学生。他们都比我年龄大，有的当了供销社主任，有的在县上工作。他们都还记得我，可是我已经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了。我还到了房东赵大娘家，她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被打伤致死，老伴和两个儿子也都相继去世了，只剩下一个哑巴小儿子，靠编织手艺维持生活。哑巴还记得我，他比比划划，说我当年梳着两个小辫，在南屋里教课。赵大娘家的境遇，使我再一次看到陕北人民对解放祖国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延安中学——我的母校，是你给了我第一次社会实践的机会。近50年的革命生涯，尽管道路坎坷曲折，但我永远记得革命群众给予我的力量，它使我能沿着正确方向走到今天。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我相信这永远是一条培养人才的正确道路。发扬延安的革命传统，就会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这也应

当是一条不应忘却的真理吧！ 阮若琳

女，曾用名袁若琳、钟新、钟艺。延中三班学生。曾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一级编审。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全委委员。拍摄有《丝绸之路》、《红楼梦》等多部电视片，著作有《十人论集》、《电视评论文集》。

下乡教冬学

赵正才

时间一晃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然而留在我脑海里的关于延安中学生生活的印象仍然是很清晰的。那是1938年10月，我同雷鸣远、郝俊贤三个人，从陕西华县咸林中学偷偷地出走，艰难跋涉多天，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终于来到了延安。

当时，我们血气方刚，正是处于编织美梦的年龄，很想学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杀敌救亡的本领，然后奔赴抗日前线。但由于我们只有十四五六岁，没能进抗日军政大学，而入了陕甘宁边区中学。到延安边区中学学习还不满两个月，学校就分配我们下乡教冬学，这我们可真没有想到。

离开这个革命的熔炉下乡教冬学，开始我们有些想不通：

自己才上几天课，怎么能教别人？后来边区教育厅的同志给我们作了报告，校长蔡子伟、教导主任刘宪曾同志也作了动员，重要性、要求、注意事项等等讲了一大堆。我这才明白原来教与学、学与用不能截然分开，边区中学要学生下乡办冬学，实际上是一门重要的社会实践课程，何况这也是抗日救国的需要，同时是我们第一次独立工作，意义是很大的。于是，我怀着跃跃欲试的心情接受了任务。这年下乡教冬学，边区中学大约去了20多人，分到附近好几个县。我和雷鸣远、郝俊贤一起被分到了甘泉县。我们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就动身了。

甘泉县政府分配我们到离县城最远，与志丹县搭界的一区去。翌日，我们又背起背包上路了。这是沿洛河上行的乡村大道，但越走行人越少。我们人生地不熟，只能一边问一边走。天虽然不算太冷，但背包在身，一出汗就很不舒服。我们三个人中要数雷鸣远年龄最大，16周岁，路上他不时帮我们俩拿东西，问路也多由他出面。陕北乡村路程，究竟有多远只是一个大概。问第一个老乡说还有10多里，第二个老乡又说还有20多里。

老乡说不远了，翻过崞岭山就到，实际走起来两三个钟头才见到村庄。离开甘泉县城时，我们带了些干粮，走起路来特别爱饿，没过中午就吃光了。大约走了六七十里，我们摸黑到了二区三家坪。这时，我们真是又累又饿，已经精疲力尽了。可是吃哪儿，住哪儿，心里一点谱也没有。我们走到村边亮灯的一家老乡家里，打问村长的住址。

老乡见是背背包的工作同志，便热情地邀我们进窑上炕吃饭。

一股暖流顿时流入我的身心，感动得我们不知说什么好。这顿猪肉熬酸菜就黄米干饭，我们吃得特别香。真的，我一辈子吃过不少宴席，却总不如这一顿家常便饭印象深。

饭后，老乡找村长安排我们住宿。第二天一早上路，除了说感谢的话，还按规定给老乡开了饭条，他们可以到乡政府算帐。但老乡却毫不介意地说：“吃顿饭要什么条子，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们吃的，我们没得吃的也得给你们找吃的！”说完就把我们开的饭条揉成团丢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表达了老区人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政府工作人员的鱼水之情，使我们亲身感受到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这也使我初步明白了一切要依靠人民群众的道理。终于，我们走到了一区政府所在地——桥夫峪。区上同志热情欢迎我们，并介绍了情况。我被分到紧挨着志丹县的一乡府君店村，他俩被分到三乡颜家坪和史家湾村。我与他们俩相隔有30多里。

我从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参加了游击队，转战几千里，后又参加过解放大西北的不少战斗，走了无法计算的路，有不少难以遗忘的征途。但这一次近百里的旅程，却是我终生难忘的。

府君店只有十几户人家，处于洛河左岸，依山傍水，山上林木茂密，一条小溪流过村前，汇入洛河。这里是革命老区，经过土地革命，群众生活有了改善，生产也有了发展。但识字的人极少，能提笔的几乎找不到。群众要求识字，党和政府大力支持。我进村时，一孔大窑洞和简单的教学、生活用具已经为我准备妥贴。十八九个从八九岁到二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报名上学，我这个教员一到就开学了。

我没当过教员，但从七岁起上学一直是教员教，照葫芦画瓢，教识字，讲读音、笔画和意思；领着念念、写写，一天下来能教七八个字，有时也教十多个字。除了识字，我还给他们讲打日本救中国的道理，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政策。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我教得也很起劲。办冬学因陋就简，课本不够就手抄，纸笔不够就在黑板、石板上写，或在地上画。白天学，晚上也学。春节快到了，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和喜条，往年写春联要到外村请人，今年就由我来执笔，一家写完又一家，整整忙了两天，村里人皆大欢喜。一位老人说：“有你在，我们就不作难了。过去实在找不到人写春联，就用小碗拓圈贴上，不识字真把人难苦了。”贴春联也成了鼓励人们识字的良机。冬学办了3个多月，一般学生能识到六七百字，最多的约识1000字，同时，他们也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老乡们都很高兴。

自从村里有了冬学，除了学生，男女老幼都不时到学校里来看看、听听、说说。一到晚上，学校里格外热闹，唱民歌，讲故事，说东道西，十分红火。我工作和生活都在这一孔窑洞里，学校热闹，我这个教员也引人注目。有的老人对我问长问短，不少老乡对我关心备至。最有趣的是对我的称呼，当时群众称我为同志，而学生尊称我为“先生”，年龄大的老乡又叫我“先生娃娃”。我看他们喊得亲切，也就应得自然。当时我刚过14周岁没几个月，确实是个小“娃娃”呀！

然而，办冬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村里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科学知识，普遍迷信鬼神。按上级布置，我担负起了宣传没有鬼神，不应迷信的任务。可是讲了几回，有的老人摇头，一些青年则偷偷地笑。过了几天，和我做伴睡觉的两个青年借口有事回家了，有人又向我讲这孔窑洞曾有女人上吊，闹过鬼，要小心。一天晚上，天晴夜静，月明如昼。

我刚迷糊过去，忽然，窑洞墙壁刷刷往下落土的声音把我惊醒了。睁眼一瞅，一个梳短发的脑袋在窗户上来回晃动，我顿时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但稍微冷静点后我就安慰自己，准是村里年轻人逗我，看我是否真不怕鬼，

过不了这一关，就不能再宣传了。

我忙下炕摸到砍柴的斧头，大喊一声开门追去。我听到脚步声急速远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我关门上炕，可是我一夜都没有睡踏实。翌日，有人说：“你胆大，不怕鬼！”当天，两个作伴的学生又回来睡觉了。我庆幸我熬过了这一关，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还有一回，一家老乡请了一位老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墓地。这位阴阳先生不满意学校宣传破除迷信，认为是砸他的饭碗，断他的财路，他也不把我这“先生娃娃”放在眼里。

于是用黄表写了一张条子：

“孔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先生此语何解？”叫人捎给我，我虽上过私塾，也念过几天四书，但一时记不起《中庸》上有这句话。但初生牛犊不怕虎，自恃真理在手，当然不甘示弱。于是我就用刚学来的一点马列主义常识，回敬他一张字条：“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话你懂不懂？”老阴阳先生不懂新名词，对村里人说，这“先生娃娃”还真有点学问哩！

我是第一次独立工作和生活，免不了有时想家、想熟人。

我和雷鸣远、郝俊贤约定，每月聚会一次，说说各自的感受和心里话，彼此支持鼓励。

春节期间，我们聚到郝俊贤那里。房东大嫂特意安排我们三人单独吃顿饭，炒了半盆香喷喷的鸡蛋给我们吃，还给我们准备了酒。三乡乡政府的同志专门来看我们，和我们一起过年。这期间，我最难忘怀的还是府君店的乡亲。他们对我这个小小年纪、文化知识不多的“先生娃娃”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刚去时，自己做饭吃，没过几天，学生家长刘大妈便约我上她家吃饭，天天把我当贵客待；村里谁家做了好吃的，总是再三邀我去。春节期间，村里这家请我吃年糕，那家邀我尝油馍，一片真情。这多方面的照顾使我第一次离家在外边过春节，也十分愉快。我深深感受到党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为人民办好事，群众总是衷心拥护的。我这个教冬学的“先生娃娃”，也是革命群众的学生。

第二年3月下旬，春耕即将开始，冬学结束了。我们三人依依惜别乡亲，踏上归途，返回了这时已经搬到安塞县吊儿沟的边区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先生”又重新当学生了。

府君店这个群众大课堂，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1947年4月，当我重返府君店时，有人知道了我就是当年的“先生娃娃”，真是喜出望外，一时纷纷奔走相告。我住的窑洞里挤满了人，年纪大的老乡和长大了的学生都问我认不认得他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乡亲们尽最大可能热情地接待我，从国事问到家事，从敌情、战事谈到工作和生活。事过9年后的重逢，加深了我的记忆和情感。在我有生之年，但愿再回府君店一趟。如今我的两个小战友都已成为故人了，然而，沧桑人海翻变，难忘战友情深，对我们一起生活、学习和我当“先生娃娃”的往事，我是永难忘记的。

赵正才

男，边师学生。陕甘宁边区乙等劳动模范。曾任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上校（1962年）。立三等功两次。北京市人大代表。

办冬学记

江峰

1938年10月，学校分配我去崖窑河村办冬学。迎接我的是村长，一见面他就称呼我“教员”。当时，我真不敢相信他是在唤我。

我8岁入延安保育小学，后来升入延安中学，我几乎天天都在向关心我、教育我的叔叔阿姨们呼唤这个崇高的名称——教员。我是那么尊敬和爱戴我们的教员！可是今天一位身背大枪、头扎毛巾的年轻村长却向我唤着这个尊称，真使我感到羞涩、惊喜和激动。

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声。要知道，我还仅仅是一名中学生啊！

这位村长年近30岁，高高的个儿，一双机灵的眼睛，说起话干脆爽朗，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来到区政府，背起我的行李，带着我向崖窑河村走去。

沿途，每当遇到村里人，他都乐呵呵地介绍说：“这是从延安给咱村派来的教员。”他把“教员”、“延安”两个词讲得特别响亮，那话音、神情里流露出喜悦与骄傲。

我和村长沿缓缓溪流走在乡间小道上。初冬时节的中午，阳光和煦，滢滢水面波光粼粼。山谷两侧坡地里收割后尚未归仓的糜谷、玉米垛像壮实的秦川金牛散卧在田野里，道旁枯黄的草丛里不时地飞起羽毛斑斓的野雉……啊，这是多么迷人的景色！往常，我置身于这样美丽的环境中，我的歌声早已飞出山谷，飞向蓝天了；而现在，走在我身旁的是一位陌生的男子，何况我已是一名教员了。我只好默然地走着，偶尔回答村长的一些问话。

经过约两个小时，我们进了河边小村庄。村长领我进了一座黑漆小楼门。刚进院子，他便大声喊道：“教员来啦！”话音刚落，从正面两孔窑洞里先后出来两个孩子、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位老奶奶。他们面带笑容地来迎我。只听那个中年男子说：“快进屋，走累了吧？”接着他向偏屋小房喊道：“老二家，咱们的教员来啦！”“咱们”二字说得很重，我感到很亲切，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偏屋小房的蓝底印花门帘掀起，一位俊俏美貌的少妇快步走了出来。她身段苗条，穿一身青布薄棉袄裤；鹅蛋脸儿，白里透红；乌黑浓发在脑后盘成圆髻；她朝我一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她轻声说了一句：“你来啦！”便从村长手中接过我的行李，转向我说：“进屋去，咱俩住在一起。”

这个只有18户农家的崖窑河村，位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南面，属关中分区淳耀县五区二乡，距延安800华里，毗邻国民党统治区淳化县境，紧连反动派封锁边区的铁丝网碉堡线和壕沟。这里经常遭受武力侵犯。组织上能分配我到这样艰苦而危险的地区来办冬学，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淳耀县：今陕西省淳化县和耀县，当时合并为一个县。

校舍设在村子中间山腰打谷场上的一孔大土窑洞里，场边有三个哥特式屋顶般的麦垛。窑洞原是人们劳动歇息、平日放置农具和雨天存放农作物的地方。听说在我来之前，各家各户便将自家的条凳搬来，排放在窑里。他们还在窑掌上挂起一块黑板，窑洞就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教室了。村长向我介绍说：“一天晚上，我在村民会上刚宣布了乡政府同意今年在咱们村再办冬学的事，第二天各家各户就送来了凳子。我们一天工夫就把这孔窑洞整理好了。前两年的冬学也是在这里办的。”

“你们办过冬学？”

“办过。”他笑嘻嘻地说，“我如今这点文化水，就是念了两年冬学得到的，要不还是个睁眼瞎子。以前区上和乡上发来的通知、指示，得到别村请人看，记公粮帐在墙上画道道儿。”

“你如今能认多少字？”

“这倒没有细算过，只是看起边区《解放日报》来，拦路虎没有几个了。”他笑笑，接着说：“还得学呀，革命胜利以后，这点文化水儿是不够用的。”

“你们村文盲还有多少？”

“还有不少，尤其是妇女。前两年来的都是男教员，咱这里封建思想还很重，今年你来了，妇女们进冬学的就多起来了。”

听了村长的叙述，我被乡亲们的办学热情和他们对我寄予的厚望所感动。

开学那天，到校学生有 20 多名。几天后，增加到 40 多名，其中青年妇女占 60%。上午是儿童上课，下午妇女上课，晚上男子上课。教材是董纯才同志编的《冬学识字课本》、《政治常识》、《农业常识》和《卫生常识》。

在晴朗的天气里，吃过午饭，妇女们收拾完锅碗盆筷，就赶忙来到学校。她们散坐在窑前打谷场边，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用树枝代笔，平地当纸，练习书写。风雪天气，她们带来柴禾在窑洞里燃起火堆，围坐在四周念字或朗读课文。她们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拿着针线活。她们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之强，使我感到惊讶；她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在政治上翻身、生活上温饱后对文化知识的强烈追求，更感人至深。

她们的聪明天赋像喷涌出来的地下泉水，洗刷着被旧世界封锢而造成的愚昧。

24 岁的妇女主任春花，她有着女议员般的口才，政治家的逻辑思维和军事指挥员般的组织才能。有一天，我参加了救国公粮自报评议的全村各户家长大会。有一户富农认为大家评议不公，给他家评的公粮数太多了。春花说：“老爹，什么是多，什么是少，要算这个帐，不要站在家门口算，要站在延安宝塔山上算。你看看前方八路军一天牺牲多少人，咱们军队一天流的血、流的汗与你这几石救国公粮比较比较，你就清楚了。”

言简意赅，寥寥数语，使那富农低下头来。接着她补充说：“老爹，过春节时，我从县上给你带个缴纳公粮模范奖状回来，贴在你家大门上。”那富农听罢，扬起头，欣喜地笑了。

当时我真为春花这种循循善诱的才能感到惊讶而又自愧不如。平时她能把难度很大的妇女工作做得生动活泼，把她们分别组织到各种支援前线的生产组里。

一天下午，我正在河边洗衣服，她从区上开会回来，还没有回家，便到河边找我。

她从挎包里取出一张旧的《解放日报》说：“教员，我又遇到‘拦路虎’，求你来啦。”“什么虎？”我以为她又带回来宣传材料，今晚要在全村会上宣讲，其中有不清楚的地方。我擦干手接过报纸一看，原来是刊有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解放日报》。

“我路上边走，边读，里面有两句话不懂。”春花指着《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说。

“哪两句不懂？”

“啥叫‘泰山’，啥叫‘鸿毛’？”

“泰山是山东的一座高大的山；鸿毛是大雁的羽毛，轻飘飘的。”

“那么这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意思是不是说：人都要死的，有的人死得有价值，死得光荣；

有的人死得不值得，死得像一只蚂蚁？”

“说得对！”我一边高兴地回答，一面注视着这位才能超群的妇女主任。她微黑透红的面庞，那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流露出她对知识的渴望。我由衷地钦佩她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就像海绵吸水一样的迅速而透彻。

离开延安，离开生气勃勃的校园，来到这黄土地山岭环抱的深谷里的幽静小村，我和可敬可爱的人们一起，生活是充实的，心情是愉快的，没有感到寂寞、孤独，我已成为崖窑河村社会生活的一个活跃的细胞了。村长、民兵排长、锄奸主任、妇女主任都常来和我研究商讨农业生产计划、征粮、参军、民兵组织以及冬学、卫生活动等事情，甚至民间纠纷、婆媳矛盾和对国民党顽固军逃亡士兵的盘查、接待，都成为我份内的职责了。一个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我，居然受到了这样的信任，我感到责任重大，我认真地尽力做好每一项工作。

转眼间 3 个月过去了。冬学工作要结束了，我将返回学校恢复我的学生生活。乡亲们听说我就要走了，男女老少连日前来我的住处送别。年轻妇女的再三挽留，老大娘依恋不舍的眼泪，孩子们惜别的目光和那些硬汉子们致谢的一言半语，像一股股暖流，注入我生命的肌体。

这天清晨，我告别簇拥在村口送别的人们，背着背包，踏着积雪，爬上山坡。停步回首，我向红日下的崖窑河村望去，她像是千山万壑中一颗光洁的明珠，璀璨美丽。

江峰

女，曾用名吴兰萍。延中三班学生。曾任四川省建安机械厂工会主席。

一个有意义的寒假

郭韬

1946 年，我 15 岁，在延安中学十四班读书。这年末，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一举占领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纵观全局，从战略高度和战争的全面胜利考虑，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延安中学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敌人进犯延安前夕，随中央各机关先行疏散。延安中学的十四班和十五班在延河对面的罗家坪，我们两个班于 1946 年 11 月离校，行军到离延安 100 里外的安塞县吊儿沟。到那里上课没多久，就放寒假了。

寒假前，校领导和学校毛泽东青年团支部，号召寒假不回家的同学组织起来到农村做群众工作。我当时是青年团员，在各种活动中都是积极分子，很自然地响应了号召，放弃了回家过年探望父母的打算。

当时留校的同学不多，因为十五班全体同学于寒假前已经到第四后方医院参加支前工作去了。这时在吊儿沟只有十四班和新招收的十九班。寒假留校的同学不足 20 人，加上老师大约 30 人左右。我们分成五六个小组，每组 2—3 人。我和贾兰新同学在一个小组。

老师则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参加各组的的活动，主要是组织指导，帮助同学们研究问题，总结经验。这次下农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向群众进行识字教育和时事形势教育，尤其强调向群众学习，在工作实践中学习。

我和贾兰新同学被分到张家川。这是一个十六七户人家的中等村子，比较穷。老乡们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没有一所学校，全村没有一个上过正规学校的人，娃娃们大都没有上学，妇女更没有一个识字的。

我们去的头两天，碰到的最大困难，一是联系不到群众，大人们都在忙自己手中的农活或家务事，看到我们是小孩，根本不想理睬我们。娃娃们不认识，也不敢接近我们；二是老乡和我们都觉得没有多少话好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常常是问一句答一句，有的甚至说：“解不下。”之后，就不再说什么了。我们也是问了头一句，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老乡想说什么，需要谈些什么。有一次，一位同学看到一位妇女，便想进屋跟她拉拉话，这位妇女见同学进来了，反而上炕睡下了，闭上眼睛，脸上显出不耐烦的样子，话都不想说了。

解不下：陕北话，即不了解，不懂得。

困难逼迫我们动脑筋想办法。一是从自己身上找弱点和不足，总结经验；二是找其他小组的同学交流情况，看别人有什么好办法；三是找老师请教。办法终于找到了——要想了解群众，首先要到群众中去。我们到群众中去后，看到老乡干什么，我们就和老乡一起干。还是那位上炕睡觉的妇女，这次我们去时，她正在推磨，我们就帮她一块推磨。推了一会儿，她就高兴地同我们又说又笑，走时还热情地要我们留下吃馍馍。一次，贾兰新看见几位妇女坐在阳窗里一边做针线活，一边拉话，她就过去同她们聊了起来，越聊越热火，贾兰新见时机已到，就先问她们：“认不认票子（纸币）？”并从口袋里掏出四张票子，教她们认。妇女们兴趣一下子来了，都凑上来看，有一位说：“嗨！我们就是认票子的颜色哩！”由此，又扯到认字上。还有一次，我帮一位老人脱棒子粒。

我们一边干活，一边拉话。我问他们：“认识不认识字？”他们都说：“不认识。”我说：那你们赶集卖粮食怎么认票子？”他们说：“看票子的颜色和大小。”我说：“那可不保险。”老人说：“没办法，没有人教。”我说：“我教你。”老人同意了。他们还拿出几张不同颜色的票子，不一会儿就都认识了，还要求我们继续教他们识字。

其次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有些青年和小娃娃提出：“你们教的字记不住，给我写在手上，行吗？”回到学校后，我们就钉了几个识字本，写上教他们认识的那些字。第二天便送了去。他们拿到后非常高兴，一再说：“可好了，再不要往手上写了。”没有拿到小本子的，也伸出小手来向我要，一会儿，带来的几本全都发光了。这样，不到一星期，困难的局面打开了，群众识字的积极性渐渐地高涨起来了，我们的劲头也随之大起来。

开展工作的局面打开后，我们逐步了解了群众的疾苦和困难。由此，我们内心深处产生了为群众做些什么的想法。回到学校以后，同学们都主动为第二天的工作忙碌开了。

有的找废纸，钉成小本子，并写上老乡们的名字。有的往本子上写些适合农村群众学习的内容和单字，根据不同年龄的对象，写上不同的字句。如给一个17岁青年的本子上写了：“收米三斗五升，付洋一万二千元”；给一个妇女的本子上写了：“一千元、三千元”；给几个小娃娃的本子上写了：“我

帮妈妈看娃娃。我帮妈妈提水。我去放羊。”等等。

还有的同学在看报，准备第二天给老乡们读报、讲时事。

下到农村后，我们都把群众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我们为能给群众做些事而高兴。

我们还帮老乡打官司、打柴、请医生治病等等。这样，人们学习的积极性高起来了。张家川先后参加学习的成人、娃娃有二十五六个。一个月的时间，最多的认了上百个生字。

当这次群众工作快结束时，我们同群众已经是难舍难分了。那些诚实活泼的娃娃们，紧紧地拉着我们的皮带，拉着我们的手，我们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什么事都跟我们说。一个月前的那种羞怯，见了生人不敢讲话的窘态，一点也没有了。当我们要走时，他们还拉拉扯扯非要我们到他们家去吃饭不可。有些妇女对我们也是依依不舍。一再叮嘱：

“你们还要常来串门啊！”“有鞋袜拿来我帮你们做。”老乡们对我们的热情关怀，使我们很受感动，很受教育。

这个寒假过得非常有意义，同学们增长了不少的知识和才干。

郭韬

男，延中十四班学生。原化学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

我们在吊儿沟的时候

关相生

在地图上你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从延安沿着延河向北，走 50 里便是安塞县，从安塞再向北翻山越岭 50 里，有一条小沟，便是吊儿沟。土地革命前，这里原是一个大地主的庄园，有十几孔窑洞。现在，这里就成了我们边区中学的新校址。当时中学部分四个队，有 200 多同学，附小比中学部人还多。由于窑洞少而师生多，后又将一年级二、三两队 100 余名师生搬到了吊儿沟东边约五里的茨儿沟。附属的保育小学搬往吊儿沟以西 30 余里的真武洞。从此，中学部与小学部分开，就再未在一起了。

边中的师生来自全国各地，不少同学是革命烈士和高干的子女；还有海外华侨、朝鲜同学。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学校给同学每月发 1 元津贴，2 角学习费，吃饭、穿衣全由公家负担。这对于我们多数穷学生来讲，条件已经是很优厚的了，我们十分满意。学校除简单的炊具和日用家具外，每个学生仅有一个木板凳，一块上课时做课桌用的小木板。

从延安搬到吊儿沟，也算是一次小长征，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搬家是在有组织、有秩序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的。一队的同学年龄较大，每人负责背保小的一个小同学；二、三、四队的同学因为年龄较小，每人负责照管保小一位年龄较大些的同学一同行军。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在日寇飞机轰炸下，除了一队同学曹峰不幸被炸死在延安外，全校同学都安全到达了吊儿沟，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为扫除文盲，边区政府教育厅决定在全边区举办教冬学运动，并从边中抽调了一部分同学下乡任冬学教师。我当时 18 岁，荣幸地被抽调，派我

到靖边县镇罗区二乡郝家渠子教冬学。临离校之前，学校召开了动员大会，杀猪宰羊，欢送我们。由于当时经济困难，粮食不够吃，我们仅吃了个半饱，但谁都毫无怨言，背着自己的行装离开了母校。

经过 4 天的长途行军，我才到达边区最北边与伊克昭盟大沙漠连接的靖边县。在那里一共教了 4 个月冬学。

1939 年 3 月，我们结束了教冬学的工作之后返回学校，我所在的二队和三队这时住在灰儿沟。经过一段冬学教育工作的实践，我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和学习的重要。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经济上封锁我们，停止给边区发经费，因而生活异常困难，几乎没有粮食吃。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到底，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边区人民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也响应号召，停课生产，全体师生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开荒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每个人都是拼命地干活。经过四五十天的艰苦努力，几十个山头数百垧荒山变成了良田，播种了谷子、糜子、土豆等农作物和蔬菜。

垧：三亩为一垧。

那时，我们每天上山开荒，午饭都是由管后勤的同学做好送上山吃。

各人自带搪瓷饭碗或茶缸，由值日生按班分菜；

饭前先集合队伍，由队长讲生产情况，表扬好人好事，讲应注意的事项。有时也读报或唱歌。我们经常唱的是这样一些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太行山上》、《游击队歌》、《延安颂》等等，往往反复轮唱，歌声嘹亮，响彻山谷。

值班队长哨音一响，大家都按班次各围成一圈，每班 10 人左右，集合吃饭。那时菜很少，多数时候吃的是自己挖的野菜；因为菜少，便自然形成一个好规矩：值班的挟一次菜，大家都跟着挟一次，值班的不动，大家也自觉地不动，以免在每晚的班小会上挨批评。

我这时 15 岁，劳动消耗体力很大，吃饭时不免狼吞虎咽，结果患了胃病，在草铺上躺了一个多月，简直疼痛难忍。因当时医药缺乏，只能靠自己控制饮食，喝小米稀饭调养。难以忘怀的是，和我同队、同班的一位同学，患有与我同样的病，后来竟变成了严重的胃溃疡，终因医药条件太差，不幸身亡了。

开荒播种完毕，便开始抓紧学习。但为了保证学习，先要吃饭，而粮食要从很远地方运来，所以除由少数同志组织专业运输队以外，大家还要去参加运粮。我们从数十里外将粮食搬回学校时，没有口袋装粮食，大家就将自己的衣裤脱下，用绳子扎成袋子。

没柴烧，自己上山砍柴。就这样，一个个困难都被克服了。大家学习的劲头很足，尽管生活很艰苦，但精神非常愉快，唯一的希望就是学到本领，到前线去参加战斗，争取抗战早日胜利。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学习以后，地里的庄稼需要锄草了。全校师生又把学习暂停下来，投入锄草劳动，以保证秋收。

陕北民谣说：“锄草如绣花。”这和开荒种地大挖大砍不同。大家头顶烈日，耐心细致地除杂草，并要保护好庄稼苗，使庄稼得以茁壮成长。

夏日正是庄稼成长的好时光，学校抓紧这一个月宝贵的时间正式上课。繁重的生产劳动，挤掉了我们宝贵的学习时间，所以在这一个月里，同学们都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力争满足自己求知的愿望。可惜时间过得太快了，

满山金灿灿的谷穗随风摇曳，土豆破土而出，西红柿果实累累，南瓜个个肥大，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秋收终于到来了。全校又停课参加秋收劳动。丰收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粮食堆积如山，蔬菜装满了地窖，伙食由此大为改善，真正是做到丰衣足食了。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后来，为响应边区政府教育厅抽调同学下乡办冬学的号召，我和十几位同学一起被派往延安县，到盘龙区政府所在地史家崖地小学，又当了3个月的小学教师。

1991年4月20日 关相生

1938年8月入边区中学第二队学习，后编入边师第一队，1940年8月毕业留校，直到1944年并入延安中学，任教导处教务干事。1945年1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参谋，总政保卫部秘书，干事，陶铸秘书，后任华南分局、广东省委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罗定县委书记，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等职。现任广东省顾委秘书长。

温暖，靠自己双手创造

易曙光

每当我走进妇女儿童服装店，就会被那些式样新颖、花色鲜艳的儿童服装所吸引，情不自禁地要为孙女们买一套时兴的儿童服装，把她们打扮得更漂亮。看到她们穿上新衣裙蹦蹦跳跳，脸上笑成一朵花时，我眼前似乎又看见了40多年前在延安中学读书时，一群身穿五颜六色补丁衣服的同学。

花棉衣

眼看冬天来临，准备棉衣成了我们全校的大事。3年才发一套的“棉衣”里，那代替棉花的羊毛毡早已不翼而飞；纱布似的“棉衣套”经过两冬的磨损，只剩下缺领少袖、大洞小孔的破布片。怎么办？学校领导号召大家克服困难，缝缝补补，再过一冬。

我们四班同学，这时打开了各自小得可怜的包袱，找出了一些还可以勉强穿的破旧衣裤，交到班上为全班同学缝补棉衣。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主要落在女同学身上。当然，男同学也都各尽所能，各显其才。

大伙你一句，我一句，提出自己所想到的缝补办法。争吵声，欢笑声，响彻了附近的几个窑洞。真是奇迹啊！经过几天的努力，全班同学都穿上了拼拼补补、五颜六色的“花棉衣”。我们蹦呀，跳呀，笑呀，你看那高兴劲儿，仿佛全世界再没有比我们穿的棉衣更温暖、更漂亮的了，再没有比我们更幸福的人了。因为它是我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无私的互助精神，经过日夜突击缝制而成的。我们又可以胜利地度过严冬了。

我们的班主任高时同志，两眼含着泪，双手环抱在胸前，无限深情地检阅了全班这支“花棉衣”队伍。他高兴地连连说：“好！好！好！”学校领导表扬了我们四班，让我们全班同学都穿上“新棉衣”，请各班都来参观，号召全校同学自力更生，互助友爱，解决过冬棉衣问题。我们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缝棉衣》的小品剧，在全校演出呢。

织毛衣

陕北虽然缺少棉花，但历来是个养羊的地方。那时候，边区没有毛纺

厂，每人发2斤羊毛，自己动手纺毛线、织毛衣。

这羊毛是从羊身上剪下来的，还带着不少乱草棍、羊粪蛋和黄尿迹，没拿到手里，就会闻到一股冲鼻子的膻臭味。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谁见过这种羊毛？更不知道怎样把这种又臭又脏的羊毛变成毛衣。大家全傻了，真想哭。

可是，过冬就靠它，哭也得想办法。不知是谁想出个主意，延安那光秃秃的山上可有的是野酸枣树，枝干上长满了刺，把它砍下来敲打羊毛，草棍、粪蛋不就会脱落下来了吗？

真是个好办法！

于是大家上山去砍酸枣树枝。嘿！上面还有不少黑红色的小酸枣，虽然已经干瘪了，只有皮没有肉，但吃起来还是酸甜适口。我们既砍了树枝，又吃到了酸枣，真是一举两得。

回来后，我们把羊毛摊在窑洞门口，大家用酸枣枝翻来覆去地敲打，果然把粪蛋都打下来了，原来一撮一撮的硬毛，经过敲打也变得较松散了。我们又用柳树枝弯成一张张小弓，将打得较松散的羊毛一点一点地弹。经过二次加工，羊毛里的土沙子清除干净了，羊毛变成了细绒绒。我们再细心地把羊毛卷成毛卷，就可以用纺车纺毛线了。你听，纺车嗡嗡地转呀，转呀，一条条毛线拉出来了。

可是，毛线还有臭味，怎么办？我们就到伙房去“偷”炉灰。炉灰中有碱性，用它冲水沉淀后，漂洗毛线，不仅没有臭味了，还变得白生生的漂亮！

没有织毛衣的针，我们就用树枝削。你看，人手一副针，上下翻动地织，女同学织，男同学也学着织。除了上课，就是不停地织。女同学爱美，用织毛衣剩下的线又织手套、织袜子，花样还真不少。手套的式样是大套口的，可以套到衣服袖子上，免得冷风吹进去。这种式样，在现在的商店里我还没见过。

毛线有限，毛衣虽薄，但还能顶住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

因为，它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用原始的土工具，用一颗颗战胜一切困难的火热的心织出来的。

我的一件毛衣和一副手套，伴随我挺进东北，参加土改，最后送给了当时刚刚解放、比我们生活更苦的老乡了。

种棉花

陕北黄土高原，很少种棉花。乡亲们没有种棉花的经验，不懂得棉花在各个季节的生长管理知识，一年下来只能亩产十几斤籽棉。为了普及种棉知识，提高棉花产量，解决边区军民穿衣这个大问题的，贾芝老师编了一个短小精悍的秧歌剧《种棉花》，利用春节期间到各村演出，并决定以我们四班为主，成立了秧歌队。

这个秧歌剧虽然剧情很简单，但密切配合当时的大生产运动，演起来也很吸引人。

剧情是这样的：春节期间，小姑子桂花因种棉花获得好收成，喜气洋洋回娘家，路上却遇见垂头丧气的嫂子，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她不会种棉花，没有收成。在一问一答中，小姑子把种棉花的知识和好处讲给嫂子听，嫂子听得都入迷了，又重新鼓起勇气，决心在第二年大干一场。

小姑子由何文康扮演；嫂子呢，偏叫我来演。我本来是个生性活泼的

乐天派，非叫我演个愁眉苦脸的中年婆姨，实在怕演不好。寒假期间天气又冷，窑洞门口北风呼啸，我们在排演中都冻得直流清鼻涕。汪道洋和王敏清拉着自制的土胡琴，常把两只手放到嘴上哈哈气，暖和暖和。我们年纪都小，不知苦，一边排演，一边嘻嘻哈哈逗乐。

春节临近，我们在彩排时请了贾芝老师和高时班主任临场指导，他们看后还评价不错呢！

大年初一一大早，我们秧歌队直奔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先给毛主席拜年。大家那个兴奋劲儿就别提了，去见毛主席该有多么幸福！那天还真不简单，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都来了。在中央大礼堂门口的广场上摆了两张方桌，上面堆满了大红枣和花生，是特意慰问我们秧歌队的。

第一次给中央首长拜年演出，我生怕演砸了锅，心总是突突地跳。锣鼓一响，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上场。首长们看我们演出时那专注的目光，给了我们莫大的勇气，使我们忘了害怕，也忘了刺骨的寒风。我们唱啊，扭呀，身上出了汗，越演越顺、越美。首长们不时地发出掌声、笑声，更使我们全身充满了劲儿。演出结束后，首长与我们一一握手。桌上的大红枣和花生，当然毫无保留地全部装进了我们的口袋。

第二天，我们又到文化沟等地演出。只要锣鼓一响，当地的老乡和机关干部就都来看我们这一群小鬼的表演。贾芝老师编的这个秧歌剧还真受欢迎，老乡们从剧中学到了生产知识，也给春节带来了欢乐。我们既见到了毛主席，又为建设边区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所以，红枣吃起来特别的甜。

易曙光
女，延中三班学生。曾任安徽省人事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现为安徽省政协常委。

羊毛变毛衣的喜悦

王敏清

1943年冬，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当时，我们这批在延安中学学习的学生，都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尽管物质条件很差，学校还得千方百计解决学生们的吃、穿、住问题。就拿穿衣来讲，夏季怎么也好凑合，最多是在土布单衣上多打几个补丁；光着脚丫子穿“拥军”鞋。

可严冬即将来临，如何解决学生们的穿衣问题呢？校领导和老师们急得团团转。

一天，同学们听到一个好消息：每人发3斤羊毛。大家蹦着跳着奔走相告，个个喜笑颜开。但当那刚从绵羊身上剪下的羊毛领到手后，同学们都发了愁，怎样才能把羊毛穿到身上呢？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老师们早就安排好了：组织大同学帮助小同学的班组，并有“行家”进行指导。于是不分男女大小，大家一起动手，热热闹闹地开始了纺毛线和编织毛衣的活动。

我们首先对羊毛进行挑选，去掉其中的污物与杂质。这可是个又臭又脏的活，但想到马上就有毛衣穿了，喜悦的心情反而使大家谁也没在意这些，

干得挺起劲。接着，是把羊毛洗净，并用手撕松。然后，再用短粗木棍作捻砣，将羊毛捻成单股毛线。那时每人手中拎着一个不停旋转的捻砣，还真有点意思呢！若遇上几个相好的朋友在一起，边聊天、边捻线，更别有一番情趣。最后再将单股毛线合成三段，便制成了可编织的毛线。

当同学们看到自己双手纺成的毛线时，个个喜出望外，有的把毛线贴在脸上亲了又亲；有的开玩笑说：

“这是××公司的产品。”还有的说：“100元一斤我也不卖。”

编织毛衣开始后，对我们这些连拿竹针都不会的同学来讲，真是够为难的。万事开头难嘛！可难，也得干。织错了便拆掉重织，再错了，再拆。就这样，一件件毛衣眼看即将织成，同学们还没等完工，便迫不及待地穿到身上，蹿前跑后着相互比试。毛衣，只有白色，谈不上什么鲜艳不鲜艳；而且针线有粗有细，更无从去讲究样式如何，但同学们非常满意。因为这毕竟是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不仅可以立即穿上它御寒，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宝贵精神，增强了在艰苦条件下生活的能力。

我穿上第一次亲手编织的毛衣，真是暖在身上，美在心里。这毛衣，我穿了一冬又一冬，破了就补补，不能再补了，就拆掉改织背心、毛袜穿。那些心灵手巧的女生，为了时髦，还在衣边上织几行上下针。这几道简单的条纹，使她们穿上毛衣后更加神气起来。

现在回忆起来，这件事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商店里应时服装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比我们那时编织的毛衣不知要漂亮多少倍。然而，如果没有当年这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就不会战胜困难，丰衣足食，也不会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无从谈起。我们是从艰苦的环境中摔打出来的，深深懂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可贵。到什么时候，这个光荣的传统也不能丢；否则，就失了我们民族的气节和精髓。

1991年5月28日 王敏清

男，延中三班学生。长期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曾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主任医师。

金盆湾的炭火

罗维明

我是延安中学七班学生。1946年秋，学校为了解决冬季取暖问题，决定抽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和职工去金盆湾烧木炭，我是参加者之一。这次共去近200人，我们班去了10个人。

那时，学校一个冬天需要的木炭大约近20万斤，标准是一个宿舍（窑洞）一天3斤木炭，一个教室一天10斤木炭。

一个班一天需要木炭50—60斤，一个月需要1600多斤，这样，一个冬天按5个月算下来，一班学生就需要木炭八九千斤。全校的班次多，教室多，还有老师的宿舍，具体数字我是无法说清的。

对于去金盆湾烧木炭，同学们都非常积极，一致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

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约八九月份，我们就离校进山了。我记得有的同学发言时说，烧木炭有什么可怕，树木是死的，听我们指挥，日本鬼子那么凶恶还不是照样被我们消灭……那时在延安的学生是绝对听党、听毛主席话的，只要组织上一号召，明知有困难，甚至对生命都会有危险，大家还争着去干。我当时接受这个任务，也只有一个心眼，只要党需要，祖国需要，为人民服务的事，我都愿意参加，不考虑个人得失，绝不后退。

我们去的那个山比较大，山上的树林稠密，大树很多。因为是秋天，树叶变了色，绿的、红的、黄的连成一片，远远望去，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这种景色中，砍伐树木，我们不觉累，心情也很愉快，效率很高。大树被锯倒后，用斧头砍去树枝，我们再把它锯成与烧炭窑一样高的木材，然后，从山上运下来，送到窑口周围。木头粗大，要用多人抬运，因山高坡陡，有沟有坑，下坡时一不小心就会被木头压倒或掉入沟里，我就曾受过伤。木头运到窑口，在师傅的指导下，我们把木头一根一根运到窑内，再一根接一根紧密立起来。一切就绪就在窑口点起火来，火点好再把窑口严密封闭。这窑木炭烧没烧好，一是看烟筒出来的烟，二是看烧的时间。烧好一窑木炭大约3—4天时间。

认为烧好了就把烟筒口严密封闭，再过1—2天，就可以开窑口了。还要注意不能把烟筒口打开，打开了容易起火。

木炭烧好后，就该出炭了。这道工序是最艰巨的。因为窑内的温度非常高，要拿着工具进窑往外挖木炭，进窑的人把衣服脱掉，只穿个背心和裤衩，汗水还直流。出炭时，弄不好就会起火，所以要准备随时扑灭火势。就这样，经过40多天的奋战，我们烧好了近20万斤木炭，解决了全校一个冬天的取暖问题，受到了校领导的表扬。

我们在金盆湾是住在一个深山沟里。村庄都很小，住得很分散，大部分人都分住在老百姓家中，也有搭棚子住的。食堂是临时搭的棚子，在野外露天吃饭。生活很艰苦，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我们班住在两户老百姓家里。有些人睡在老乡的土炕上，有些人临时搭了木板床，我们和老乡家关系搞得很好。

据老乡说，山沟里夜间经常有豹子、狼来院里抓猪、鸡吃。我们每人准备了一根木棍放到自己床边，还准备了几根粗木头，晚上顶在门上，防止豹、狼冲进屋里。一天晚上睡到半夜，房主人说，来豹子了！我们很快起来拿上木棍到门口，先听到有动物走动的声音，不一会，又听见鸡叫声。我们个个兴奋异常，都想尝尝痛打豹子的滋味。房主说：不行，外面太黑看不见，容易被豹子咬伤。过了些时，听不见动静了。天亮后才知道，鸡没有被吃掉，是因为房主把鸡窝门堵得很牢固，豹子没能进门。这件事虽小，却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成为山沟里的新闻，我们谈论了好多天。

这虽然是烧木炭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条件的艰苦和在这艰苦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乐观精神。

40多年过去了。那金盆湾的炭火啊，至今还在我的面前燃烧，还在我的心中燃烧……

罗维明

男，延中六班学生。沈阳军区后勤部师职干部。1962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争演老黄牛

金德崇报名

1946年春上，延中三班号召同学们报名参加秧歌队。

我想咱这号人，卖力气的活应该当仁不让，搞文艺活动的事，还是靠边稍息的好，于是就没有理睬。不料，第二天，肖贵臣正颜厉色地反复问我：“金德崇，你怎么没有报名？你为什么不报名？”

“你报名了吗？”我反问他。

他说：“我当然报了。”

噢！这倒的确出乎我的意外，黑不溜秋的肖贵臣，腰板和胳膊、腿要多硬有多硬，让他去挖二分地还可以，要去扭秧歌，还不让人笑掉了大牙？！于是我挖苦道：“哟！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文艺积极分子，你去演王二小，还是演马家老爹？”

“你甭给我来这一套。咱不能演，还不能跑龙套，还不能搞后勤？快说，你为什么不报名？全班就你一个人没报名了！”

“哎！这不正好么，你们都去演秧歌，我留下来看家。”

“看家？！你想得倒美，留谁看家也不能留你看家呀！”

我辩驳道：“我一不会扭，二不会唱，看家不是正合适么！”

“你不会扭？！这你骗得了谁，哪回起哄串秧子少了你啦？！”

你说不会唱？咱班还有谁的嗓门比你高？！这回你非得给我参加不可！”

妈呀！要是老肖说了“非得”，即便你使牛劲也挣不过他。

于是我求饶道：“那不是瞎起哄么！咱可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场子，还是让些那艺术细胞多的人去扭吧！再说也臊得慌！”

“哟！今儿个你脸皮倒薄了，你不是说，光天化日之下的‘吊膀子’是艺术需要么！”

还嫌什么臊得慌？！”

——唉！这个老肖，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上面这个话，是去年闹秧歌之后的事了。当时，有人去参加秧歌队，我们这帮调皮鬼就背后讥讽人家：“某某去‘骚情’去了！”贺光辉和马秀珍演《夫妻识字》，有人就说人家“吊膀子”。事后马秀珍一来我们班，我们就起哄嚷嚷：“马秀珍寻老汉来了！”马秀珍倒落落大方，回一声“再喊，我就撕你们的嘴！”光辉可不依不饶，抡着个拳头追打喊得最凶的人，十五六的娃娃开这种玩笑总不是回事，何况还打击了大伙参加秧歌队的积极性。为了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班主任和党小组做了细致的工作。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我在发言中把表演中的“眉来眼去”用了个俗语，说成了“光天化日之下的‘吊膀子’是艺术的需要！”惹得哄堂大笑，也落下了一句话把儿。今天又让老肖提起这回事来了。

老肖说：“去年，我还真当你的认识有所提高了哩，原来说是说、做是做。今年你还想溜！快说，你参加不参加？这可是政治任务。”

“什么？政治任务？！”因为我们都知道，政治任务是一种最神圣、最崇高的使命，只有不折不扣地彻底完成。我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可别上场子！”

虽说是已经报名参加了秧歌队，但心眼里总还揣着一个“小九九”——过去说人家是去出风头、“骚情”，今儿个自己咋好去上场子哩？！最好还是找个别的差事干干，别出头露面的。当我一听说要成立后勤组时，就拼命去争取。心想，我既当过伙食委员，也干过生活干事，争个后勤还是有优越条件的，这样我就可以不参加演出了。不料报名的人很多，说是让谁担任后勤，再临时指派。

后来乐器组又招人，干这个也可以避免上场子，竞争也很厉害，我们去了三个人，很快我就被淘汰下来。后来听说，王敏清除了会拉二胡之外，还能吹笛子，是个多面手，我当然竞争不过他。没办法，只好乖乖地去扭大秧歌。

争演老黄牛

又过了几天，听说寒土坡老师编了个秧歌剧，叫《变工去》。要挑三个演员，除了演小俩口以外，还要一个装牛的。

老师们担心这个角色不好派，就先给我们班的人透个风。我一听，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料全班人都报名争演老黄牛，谁也不让谁。这个说：“我腿粗胳膊壮，本来耕地时我就是拉套的。”那个说：“我会扎牛头，糊上纸，再披条黄毯子，就像条牛了。”真是各显其能。

寒老师见大伙争得这么热闹，便顺水推舟说：“既然一条牛不够你们争的，那么还要一个赶牛耕地的人，谁来表演一下耕地？”这下可都傻眼了，谁也不吭气。倒不是都不会扶犁耕地，而是一表演“耕地的”就得去演娃他爹了。于是你推我让的，谁也不肯演。寒老师激将道：“算了，算了！在你们班连个耕地的人都挑不出来，我到别的班挑去！净想找便宜事。要真想抢着演‘老黄牛’，就得再给我推荐一个身强力壮会耕地的演员，否则你们就什么也捞不着！”说着就走了。寒老师心中有数，把挑选赶牛人的任务推给这帮争当老黄牛的娃娃，肯定比他挑选得更充分、更合适。可是，我们又推荐谁去扮演这个“赶牛的”娃他爹哩？！

推荐演员

谁也不愿意去当赶牛的娃他爹，甚至连推荐演娃他爹的人也没有了。这时，比较稳健的班长牛荫西发话了：“这样吧，在别的节目里已经担任了角色的人，或参加了乐队的人就别再争了，咱们在剩下的人里头，选上两个身强力壮的、争当老黄牛最凶的人，一齐推荐给寒老师。谁装牛，谁演赶牛的，让寒老师去决定。你们看怎么样？”这个建议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最终还是获得了大伙的支持。

扒拉来扒拉去，所谓争着当牛最凶的人，就剩下了肖贵臣、林汉雄和我三个人。我和林汉雄都反对肖贵臣当“老黄牛”的候选人。我们变着法儿数落肖贵臣不够资格：“看你那个麻秆腿、细长腰，尖嘴猴腮的瘦猴样，哪里像条牛？”有人见三个人当中有两人一齐攻击肖贵臣，就说：“那好，就让他们两人去吧！”可肖贵臣又不干，他说：“我的腿长、胳膊长，不信，你们谁来比试比试！要让你们去装牛，把条牛演得还不如个小毛驴大，都快像只羊了！”话音刚落，便引得哄堂大笑。

三个人争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最后，鬼点子多的李林森喊道：“算了，不争了，明儿个建议寒老师去改剧本，请他写三个牛在舞台上蹦跶，让他们三个都去当牛！”

“不然，再添上一头猪，让娃他爹赶上牛，让娃他妈吆上猪！”

“同意！睡觉！不许说话了！”

“谁再争，明儿个就选他去当娃他爹！”

一场争论到此突然结束。

挑角色

第二天，寒老师笑嘻嘻地把我们三人都拽了去，哑着嗓子对我们说：“我早就知道，你们三个谁也跑不了，就凭你们争着当‘老黄牛’的那股劲头，不论你们哪一个，都能把我要的这个角色演好！”

“怎么，不论哪一个？”我小心翼翼地听着、想着。

寒老师一开夜车就哑嗓子，昨晚他准是又干了个通宵，嗓子里几乎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告诉你们，我写的这个角色，就是赶牛的娃他爹，比真的老黄牛还‘老黄牛’。

他必须具备老黄牛的气质，傻不愣登的，只知道卖力气干活，也不会说话，但他有头脑，懂是非，肯学习，听人劝，有错就改。

现在你们说，你们要当哪个老黄牛？”我们相互看了看，我立马亮出王牌：“肖贵臣倒像你所说的那个‘老黄牛’，而且他有腰疼病，还拉肚子，可不能让他演你那条真的老黄牛！”

“你呢？”

“我？！我学习你说的那位赶牛的‘老黄牛’，演你那条耕地的真黄牛！”我极力把这两个“真”的、“假”的老黄牛表述清楚。

寒老师会心地笑了笑，没等他们两人表态就说：“我没工夫跟你们泡蘑菇，都给我背台词去！到时候我想提溜哪个就提溜哪个！看看你们是真想学老黄牛，还是净说漂亮话。明天早上对台词，谁也别想溜！！”——寒老师这一关可真难过，你真的假的都给他堵住了，还下了戒严令！

对台词

看了看寒老师留给我们的剧本，倒也十分简练，尤其是娃他爹的台词，总共也没几句，随着剧情的发展，张口就来。

假如装做背不下来，是说不过去的；而且娃他爹那股二不愣登的样子，跃然纸上，也适合我们这号人的口味，我甚至喜欢上了他。可是……

对台词时，除了我们三个娃他爹的候选人之外，还有两个候选的娃他妈——李骏和项苏云，都是小九班的同学，全校闻名的娃娃演员，一个比一个能。她们拿腔作调的，就是某些句子的抑扬顿挫不够协调。林汉雄和项苏云对台词时，“嘟嘟嘟，嘟嘟嘟”，竹筒爆豆子似的，把台词一字不落地往出崩。弄得项苏云语气上、语调上都接不上茬。

“甚——么呀！”项苏云惊呼道：“你是和我对话，还是向我扫射机关枪？”我暗地里发笑。

寒老师没吭气，然后让我和李骏对台词。我当然没有再使林汉雄那挺“机关枪”，而是在该紧接的地方装得结结巴巴的，在应该惊叹感慨的句子却又放了平射炮。

“金德崇！你什么时候学结巴的？还在那里装洋蒜，装得都不像！”寒老师总结道：“就凭肖贵臣那股认真劲，够资格演娃他爹，也够资格演老黄牛；你们两个，不够资格演娃他爹，更没资格演老黄牛！”“现在这样，你们俩的任务是帮助肖贵臣对台词，纠正他的毛病，什么时候帮肖贵臣过了关，什么时候算完；过不了关，找你们俩算账！也许到时候还可以让你们装一装‘老

黄牛’，否则你们别想！”

当导演

为了促成肖贵臣扮演这个角色过关，也为了争取那条“牛”，我们俩不得不缠住肖贵臣一起和他琢磨，最后非得要他自觉满意才算通过。

当寒老师来验收时，肖贵臣表演得还不那么对味，寒老师就让我们再把某一句台词学给肖贵臣听，他总是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对对对，那样子才够味！”一场戏排下来，寒老师说道：“你们看，直到现在你们才把真本事拿出来。我早就说了，不论你们哪一个，只要认真，谁都能演好！这个角色实际上是你们三个人集体塑造的。

现在决定：金德崇演娃他爹 A 角，林汉雄演 B 角，肖贵臣演牛！”

“啊？！为什么？”我惊讶道，“还是让我来演牛吧！”林汉雄也在争辩。寒老师说：“汉雄的湖北口音重了一点，个子又小，不论是演娃他爹，还是装牛，都担任 B 角好了！”“同意，就这么定了！”他们两个都吆喝起来。而我，我却是抢“牛”不着，倒落了个“娃他爹”！……

学当老黄牛

在以后的排演中，寒老师一再要求我们体会肖贵臣要当“老黄牛”的那种真实精神，“他是不带半点杂念的。那个娃他爹，首先就是这样一个实打实的老黄牛。你们必须把握住这一点才能把他演好。”他还说：“娃他爹那股一时磨不过来的拗劲，憨劲，鲁莽劲，和你们这帮捣蛋鬼差不多，不用装得太做作了。要放得开，充分发挥你们自己的优势！要做到真和实，你们自己就必须先变成一条老黄牛！”

这以后，我想了很多很多，肖贵臣为什么能争到演“老黄牛”哩？这绝不是偶然的。

他是我们三班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不论什么重活累活，不论什么艰巨的任务，他总是一马当先，即便是些生活小事，如打趟水，扫个院子，他也总比别人干得多。再譬如搬家分铺位的时候，逢到炎热的夏天，他把铺盖卷往窑岔里一塞：“我要守在‘白不老’（白长生的外号）身边，晚上好捅他起来撒尿，不然，咱们的‘海军大将’就要‘画地图’了！”而十冬腊月里，明明窑门口风大没遮掩，他却说：“我喜欢通风，空气新鲜，我来把大门！”简直不容分说，似乎唯有他才能睡在那里。他做的很多事都让人感动。

正因为这些，我们不能不对他从心里敬佩三分！

也是打这以后，我暗暗地漂上了肖贵臣，什么送水、送饭、打道具、背辘重的活，什么打前站、当收拢队的差事，我都跟着去干，抢着去干。也是在干的过程中，我开始感到一个人假如能帮别人做点事，假如能为集体卖点力气，他的存在才有点意思，也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也是在干的过程中，我才真正体会到“樱桃好吃树难栽，小米饭好吃荒要开！”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一个“干”字上，而且要实实在在地干！就像老乡说的：“开荒种地可是个实在活，来不得半点虚假，你多挖一镢头，秋里就多打两颗粮；你少挖半锹深，它就一粒也不收！”这些道理以及他们本人，哪个不是顶顶老实巴交的哩！因此，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也越发高大起来。

为了把娃他爹演得像，为了把这出戏演得好，我又怎能不豁出去呢！

当然，我也学到了另一招，当和别人争着去干上面的那些活时，我会不客气地说：“对不起，请让一让，给咱创造点机会，让咱也体会体会当老黄牛的滋味，不然，我演不好娃他爹这个老黄牛式的人物呢！”有时还吆喝

一声：“噢！让路让路，老黄牛来了，谁有拿不动的东西，快让老黄牛给你们驮上！”然后把那些年小体弱同学的背包夺下来，拼命地往我背上加包袱。接着，抽一声鞭子：“噢！哒啾！！”我们就溜烟地冲到前面去了。

学到真本事

记得在杨家岭演出时，有当地的老乡，也有中央的负责同志观看。演出结束后，一个军人模样的同志就近捡了几支谷茬来找演《掏谷茬》的演员，一时没有找到，就问身边的贺光辉：“你给我说说，这几支谷茬中，哪一支里面有虫虫，哪一支里没有虫虫？”光辉看了一眼，指着说：“这一支里有虫虫，那一支里也有，其他的都没有虫虫。”

“为啥？”

“因为一、……二、……三、……”光辉回答得头头是道。

然后，他问这位军人：“你叫啥？”

“陈赓。”

光辉的眼睛一亮，这可是鼎鼎大名的陈赓将军呀！他是真不懂，还是故意考考我？光辉追问道：“你信不信？”

“打开看！”待他们一一解开！果不其然，就是光辉指的那两支里面有虫虫。陈赓同志高兴地笑道：“不错，看来你们都学到了真本事！”

是的，我们都学到了点真本事。不过，对我自己来说，在参加秧歌队的这段生活里，我尤其学到了要老老实实地当老黄牛的精神。关于这一点，我觉得终生受益匪浅！而且要继续学下去！

最大的喜悦

在1946年延安城的春节活动中，延中秧歌队简直出尽了风头！这家请、那家迎，报纸上的报道也是一篇连一篇。不过，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到延安县政府演出的那一天。

这是我们头一次到远郊区乡里演出，队员们个个都铆足了劲，30多里的路程一大早就赶到了，原计划上下午各演一场，结果在这两场的间隙，秧歌队肢解成几个剧组：有被迎到另一个打谷场上去演的；有被拉到窑门前院子里去演的；也有到临近的自然村去给抗属演的，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崖畔上窑顶上统统挤满了人，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演了一遍又一遍，谁也数不清总共演了多少场。

不仅场上演，场下还展开了宣传和热烈的讨论：“棉花咋个打杈？”“谷茬里的虫虫咋办？”“变工究竟划算不划算？”……

李骏被几个年轻婆姨围住：“快给我们再说说，妮是咋地个劝说妮家那一口子去参加变工队的？”李骏扳着指头，一条一条地教她们说：参加变工是如何如何的好。可是婆姨们还是不放：“瞧人家婆姨多会说话！”“俺们家那口子跟妮们家那口子差不离，憨的来和条牛一样，妮能不能去给他说说哒？”

“行，走，咱们去说去！”

“喂！别走，”其他的婆姨拦住不放：“把他们都给拉了来，给我们一齐再学一学！”

“再给我们演一遍！”于是，李骏拉上我和肖贵臣，又去给她们和他们演了一遍。

老乡们高兴透了。他们说：“今儿个这秧歌看得实惠，闹得红火，扩大了变工队，还学了个科、科、科学种田！”他们一个个把我们拉到家里去，

端出了白面馍、黄米糕、粉蒸肉、羊杂碎、大红枣……热情地让着我们：“吃，好生吃！吃了再演！”我们也没客气，就甭提这顿饭吃得多么香了。

一个老汉拍着我的肩膀说：“娃，演得不赖！”娃，他叫我娃啦！多么亲切的称呼呀！他说“演得不赖”，这是多么真诚、多么实在的夸奖！我们被乡亲们认可了，我们及格了！我心里美滋滋的，获得了最大的喜悦和满足！
金德崇

男，延中三班学生。毕业于莫斯科石油学院，曾任石油部地质勘探研究院机械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一段意外的经历

刘幼雪

1943年初夏，爸爸把我送到自然科学学院补习班。他所以不顾我的老师贺绿汀的劝阻，坚持要我离开鲁艺的原因是：鲁艺已经由整风转为审干，整天开会。我一个小孩子没人管。爸爸说：与其这样，不如到中学去学点文化。钢琴嘛，以后再弹。那时的科学院补习班似乎还是一个平静的港湾，没有受到“审干”风雨的侵袭。

谁知到自然科学学院没多久，“抢救失足者”的浪潮也席卷了整个学校，课是上不成了。大一点的同学集中编到整风班，剩下的，除了吃饭就是四处游荡。有时开大会，我们也去凑热闹。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群情激愤，而我们这些在主席台眼皮底下席地而坐的小不点儿，竟然忍不住打瞌睡。经常是，会议主持者不得不大喝一声：“前边这一排，出去！”于是我们来了精神，飞快地冲出会场。久而久之，我们知道了：延安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什么三青团、复兴社、CC分子……

有的坦白交代了，有的还在狡猾抵赖。现在就是要把坏家伙统统揪出来。当时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参加全院的斗争大会了。

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或者正在津津有味地嚼着偷来的马料——炒黑豆；或者正在聚精会神地趴在地上弹珠子；或者正提心吊胆在老乡的西瓜地里……只要一听说斗争死不交代的特务分子，就会一窝蜂地从四面八方飞奔到礼堂。

喊口号最积极的，叫“捆起来”最响亮的，前前后后最忙活的，就是我们这些“审干”的等外品。狗特务，想来破坏边区，还死不认帐，怎么不叫人生气？要不是大人拦着，早就拳打脚踢，让他受个够了，谁叫他不老实？

以后，自然科学学院补习班成了延大中学部，搬了家。可是“抢救运动”还在继续。

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同学，不管是从大后方来的，前方回来的，都查出了问题。居然混进了这么多坏人，不“抢救”还行？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交代了问题，立即就可以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帮助那些“失足者”。顽抗到底的，只好送到保安处去了。当时，只有我们为数不多的人，这在外桃源逍遥自在。可是好景不长，大概是1944年初的某一天，忽然有人把我找去。昏暗的窑洞里坐着的都是平时要好的伙伴，此时神情严肃，

要我“交代问题”。真是疯了，要我交代，我有什么问题？有人说：

“你没问题，为什么用《复兴小学课本》？”天哪，上哪儿去讲理？所有蒋管区的小学生都统一用这种课本，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管我怎么辩解，怎么抗争，都没有用。

总是那两句话：

好好想想，是坦白还是顽抗？

一连几天，同学们轮流帮助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我日夜冥思苦想，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我请求，我哀告，最后有人透了底：“组织掌握了确凿证据，就看你的态度了。”这真是晴天霹雳！组织这个概念，对我无比神圣，具有无上权威。是组织把我从“育才学校”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送到延安，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是组织把我送到爸爸身边，帮我们父女团聚的；是组织考虑我年龄太小，怕我营养不良，在鲁艺让我破格吃小灶的……我随时都能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组织的话，不容有一丝一毫的置疑。现在，既然组织掌握了材料，说我有问题，那我一定有问题。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哦，对了，1941年初在重庆，“育才”开过音乐会之后，有几个三青团的人带着糖果、饼干来找过我，要我离开“育才”，说他们可以送我去美国。以后又找过我几趟，意姐（后来知道她是“育才”地下党的负责人）不让我再见他们，特地派几个同学“保护”，生怕我被绑架。是不是这些家伙替我加入了三青团，我不知道，而组织上却掌握了？对！一定是这样！

“到延安什么任务？”人家一定讲过，只是大概给我吃过药，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如果没有任务，算什么彻底坦白？怎么办？

妈妈很早去世，爸爸到延安后又结了婚。对，就说这是我的任务。和爸爸吵架，搅得他不得安生！

这么交代以后，我整天提心吊胆，怕人追问。可是居然没有人再理我，而且不久就允许我回家了。外公一见面就问：

你怎么成了三青团？我说不清道不白，急得直哭。

从前，我是班上有名的瞌睡虫，上课的时候，经常趴在老师的讲桌跟前睡觉，可是那些日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好容易睡着了，也会突然惊醒过来：我是特务，这是真的，不是做梦。可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恶梦啊！我失去了欢笑，十一二岁的孩子，尝够了熬煎、迷惘、焦虑、痛苦的滋味。

没多久，那些帮助我的，在延安土生土长的同学，也都纷纷被“抢救”了。

过了些日子，有两个“叔叔”来到学校，说是保安处的，找了好多人谈话。一天也把我找了去，要我讲清楚是怎么参加三青团的。我害怕极了。

“叔叔”很和气，笑嘻嘻地，可一句接一句：

“你填了表吗？”

“什么时候给你吃的药？”

“帮你填表的人到延安来了，你知道吗？”

“你41年到延安，你爸爸42年结婚。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往延安给你交代任务？”

我吓傻了，前言不搭后语，一个劲地说：“我不想顽抗，我要坦白。”

早就在眼睛里打转儿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又不敢大哭，只是不住地抽泣。

“叔叔”说：“别哭了。”

我们看过你弹钢琴，现在你就唱个歌吧！”

唱多少都可以，只要别再问我！

过了几天，全校召开大会。我头一次听说“平反”这两个字。保安处的“叔叔”在会上念了一长串名单，里边有我。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散会以后找“叔叔”问：“怎么我又不是三青团了，不是说组织掌握了材料吗？”“叔叔”摸着我的头说：“我们才代表组织。”

以后听说，延大初中部的主任挨了批评，因为他违反中央的禁令，擅自在中学生中“抢救失足者”，又听说毛主席在边府大礼堂向受委屈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将近 50 年过去了，当年的痛苦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可是这不到一个月的经历却永远留在记忆里。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实事求是；懂得了为什么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懂得了党会自己纠正所犯的错误。

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我能够在所谓“反右倾”、“揪走资派”、“抓 516”以及 1989 年的风波中保持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应该说和我自己这一段亲身经历有关。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坏事变好事”吧。

1990 年国庆前夕

边区中学回忆片段

谭克智

1939 年春，我离开了家，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不久，我就到边区中学学习。

由于日本鬼子轰炸延安，边区政府教育厅搬到了安塞县真武洞。这时，边区中学也搬到了吊儿沟。

吊儿沟这个地方，是一个地主庄园。它建在四面环山的一个山梁梁上，有两座院子，齐齐正正的十几个窑洞，还有几间房子。附近有一个山泉，常年蓄着清澈的泉水。这个村的附近，还有七八个村庄，从前多是地主家的佃户。陕北“闹红”时，地主被赶走了。

在吊儿沟的一段学习生活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夜行军。

夜行军

在那抗日战争严峻的日子，国民党不是一心一意打日本救中国，共同抗日，而是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断地闹磨擦，企图有一天消灭陕北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学校的生活也比较紧张。校长蔡子伟在上政治课和上军事课的时候，常常讲到反动派不让我们活下去，加紧了对边区的包围，他们要来打，我们也不能不加防范。因此，学校加强了军事训练。这时，平常不十分忙的军事教官张致德，也格外地忙起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紧急集合，组织夜行军。同学们思想上都比较紧张，经常留神变化。一天晚上，

我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哨子一快一慢地吹响了，还没有等我打好背包，快速的哨子又响了，接着便是不断头的哨音连续地吹，这说明队伍已经集合了。这时大部分同学已经离开了宿舍，到院子里报数了。我一想，从大门出去要绕一个弯，已经来不及了，便从窗口上跳到院子里。当我跳下地时，才发现自己光着脚没有穿鞋。这时，只听军事教官喊：“入列！”我慌忙加入队伍。天是那样的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村子里的狗不停地“汪、汪、汪”叫，鸡架上的鸡，也“咯、咯、咯”地乱叫起来。微风吹动，树梢发出“沙、沙、沙”的响声，同学们个个精神紧张。又一声刺耳的哨子声，军事教官宣布今晚夜行军的路线：“从学校出发，经过前村，翻过张家山，进到东沟门，爬上青龙岭，然后返回。大概有30多里路。希望同学们遵守纪律，服从指挥，不要喧哗，不要掉队！”讲完了，他命令出发。我毫无办法，只好光着脚丫子行军了。因为天黑，谁也没有看见我没穿鞋。我有心要报告，讲自己没穿鞋，但一来怕同学笑话我，二来怕影响班上的成绩。因为夜行军、紧急集合要比赛，看哪个班最好。我咬了一下牙，走！它能怎么样，无非是打泡、扎刺、流血，总要不了命。队伍在前进了，我排在后边，只能看见一列长长的黑影在行进。这时，前面传来了话：“往后传，脚步放轻。”可是前边一个同学传来的话却变成了“绝不放枪”。我也莫名其妙：同学们都没有带枪，怎么放枪？但我也来不及问他，照传：“绝不放枪。”开始走的路上，还算侥幸，因为是黄土地，觉得绵软舒服。不知道走到什么河滩之后，可倒霉了，料浆石、顽石，在脚下垫得人实在够受。好容易走过这一段，又走在一条长坡上。这里没有路，只是有时从梢子林穿过，一会有枣刺，一会有蒺藜。走过这一段，起码有几个酸枣刺扎进了脚板，有时我得赶快拔一下，如果行军速度过快，也只好去他的了！夜行军总算走完了。当回到院子里，天还没有亮，只听教官讲：“夜行军的纪律是好的，同学们的精神是饱满的。这说明同学们的思想是过硬的。如果有了战争，是能够经受考验的。”说到这里，他稍稍地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就是传口令，有的同学没有传对，怎么能把‘脚步放轻’传成了‘绝不放枪’呢！”

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不要笑！解散！”谢天谢地，我总算得到了“解放”。

教冬学

陕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文化也极其落后，群众大部分是文盲。为了改变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边区政府要求大办冬学，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

1939年冬，学校接受了这个任务，要抽一部分同学下乡教冬学，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学校动员以后，我们七八个同学被分配到延安县。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延安县的教育科长唐扶同志。他说：“农村许多青壮年听说今年要办冬学，都高兴极了。希望你们能早日到农村，搞掉他们的文盲帽子。任务是光荣的，但是工作中也会有困难。”谈话之后，我们背上了铺盖，就奔赴延安西面的一个农村。没几天，学生就陆续到校了。一共有20多名18岁到20多岁的小伙子。虽然他们都是老实憨厚，但对当时只有14周岁的我，却是一种威胁。

我心想，能管住这些学生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自己要拿出一个大人的样子。开课了，学的是新编《千字文》，一天要学十个字。写字没有本

子也没有毛笔，只能用木棒在木头做的沙盘内写。学生们不愿做睁眼瞎，学习非常努力，常常是读书到半夜。老师是轮流在学生家吃饭，今天在张家，明天在李家。老师来了，学生家总得想办法给吃些好的，有黄米捞饭，也有羊肉饸饹和陕北腌酸白菜。到了 1940 年清明节前，我们完成了教学任务，回到了学校新迁的校址柳树店。冬学是我走向社会的开始，使我了解了陕北一些风土人情。回到学校，我们总结了这次工作，交流了经验。有一个同学讲，因为他爱和同学开玩笑，一天几个学生把他压在地上，解了他的裤子，要摸他的“小牛牛”，可把他吓坏了。另一个同学讲，许多学生不来上课，得一家一户去叫，有一次途中他差点掉在冰窟窿里淹死。还有一个同学讲道，他教冬学差点给人家当了儿子，也差点当了上门汉。原来，这个村里有一个寡妇，身边只有一个十六七的姑娘，长得聪明伶俐。她妈妈看上了这个同学，要认他做干儿子，他也就满口答应了，想不到她要把她的女儿许给他，还要他每天给她女儿教几个生字，这叫他为难了。他说，教几个字可以，婚姻大事以后再说。当他教完冬学要返校时，那个寡妇和女儿竟然找到乡政府要把他留下。寡妇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乡长说：“这是个好娃，他答应给我做儿子，你就把他留下吧！”弄得乡长也没办法，只好说：“这是上边通知要他们回去的。我们可以给上边打报告，请他回来。”就这样，他才回到了学校。总之，这些 15 岁的小先生、20 来岁的大学生，闹了不少的笑话。

忆王佑同学

1940 年春，教冬学的同学都陆续返校。大家见了面都畅谈前后几个月的生活和碰到的许多有趣的事情。可是唯独王佑同学没有回来。不几天，一个噩耗传来，说王佑同学被土匪杀害了。这是多么惊人的消息，多么不幸的消息！噩耗传来，全校都震动了。谁能想到他死得这样惨。

王佑同学是和我一道进边中的，又曾与我一道搬家，合伙盖一床被子。从那以后，我们便分别被派去教冬学，再也没有见面了。从消息中知道，他是在一个漆黑的晚上，被环县的土匪头子马老五抓走的。敌人知道王佑同学是边区派来的，要他交代是不是共产党，要他投降。王佑同学坚定不移，破口大骂：“老子死不投降，你们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坏蛋是没有好下场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恼羞成怒，用一根铁丝穿在他的胸骨上，把他绑到马上，活活地拖死了。当人们发现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血肉模糊，体无完肤了。

王佑同学是山西静乐县人，他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当时，他才只有 15 岁，比我大一两岁。他长得五官端正，额宽颧方，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嘴唇上时常流露出笑容。他憨厚，正直、诚实、腼腆、内向，经常有些羞羞答答的样子，真像一个白面书生。

因此，有些同学总想在他面前挑逗，占他的便宜，开他的玩笑。他总是脸一红，憨厚地一笑说：“胡说些甚！”他为人勤劳，勇敢，热爱公共事业，常常把宿舍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开荒中，他不甘落后，总要比别人多开一点。学习也特别用心，他的课堂笔记总是记得整整齐齐。这样一个同学离开了我们，怎不令人痛心？！

据了解，在我离开学校之后，学校为他的光荣牺牲举行了追悼会。党中央、边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发来了唁函，送了挽联。毛主席还写了纪念王佑同学光荣牺牲的短文。

边区政府副主席王杰云、教育厅长周扬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高度

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我当时被调到别处去了，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感到万分遗憾。王佑同学的死，使我感到人生的命运是多么的不可揣摩，也感到革命随时都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王佑同学的死，也使我悟到一个道理：敌人是不会甘心灭亡的，阶级斗争总是会发生的，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千万不可书生气十足。 谭克智

男，边中二队学生。曾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记。著有《山峰红花》、《汉水东流》等剧本。

奇特的婚礼·南瓜宴·山泉

张燕林奇特的婚礼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延安中学举行过一次婚礼，给我的印象最深，这就是教导处干事邓镇和谢莹同志的婚礼。

1944年8月，我到延中以后，每天晚饭后自由活动时间，经常看到一男一女在教导处窑洞门口，一起纺线，有说有笑，毫不避嫌。原来这一对就是邓老师和他的未婚妻谢莹。

他们恋爱多年，年岁都不小了，组织上以特殊情况批准他俩结婚。

邓老师长着一副典型的广东人脸型，他是著名工人领袖邓发的弟弟。

他们俩不给组织添麻烦，也不向哥哥伸手求援，用业余时间纺线得来的收入筹办自己的婚事。

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在半山腰一块小三角平地上挂了一盏汽灯，摆了8张桌子和许多凳子，桌上放了红枣、花生、瓜子和核桃。全校师生不管哪个班，认识不认识，都来凑热闹，表示祝贺。人已经来了不少，但婚礼还没有正式开始，好像在等什么。

不一会，一个身穿皮夹克的中年人进入会场，他就是邓发同志。后面还跟了不少人。

婚礼开始了，首先请邓发同志讲话。他一口广东话：“首先我要声明两点：第一，我不是什么首长，我是以哥哥身分来参加邓镇和谢莹的婚礼；第二，晚来了一步，让大家久等了，非常抱歉。因为我们坐的大卡车在桥儿沟拐弯处陷进了泥坑。多谢延中的同学帮助推车。”马上有几个陕北人叫嚷着：“那要感谢你，是你让我们第一次坐上了汽车……”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到处充满着笑声。

邓发同志沉思了一下，继续说：“对于你们的婚礼，我首先表示祝贺！希望你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把革命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你们也清楚，对于你们现在结婚，我一直反对。因为现在正在打仗，革命尚未成功，应集中精力，努力工作与学习。

总而言之，现在还不是建设小家庭的时候。

你们年岁是不小了，但再等几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这一席话使参加婚礼的师生感到莫名其妙，一方面跑来祝贺，另一方面又不同意现在结婚。邓镇老师一点也不生气，微笑着聆听老大哥诚恳教导。他心里清楚，哥哥是

最疼他了，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不会逢场作戏。

邓发同志还专门带来一架留声机，放着各种唱片，其中有一张是“百代公司”录制的洋人大笑，逗得这些陕北“土包子”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笑得那样天真、粗犷。邓发同志挥着手，让大家跳舞，他也带头跳起来。

一切都淹没在真诚的笑声、乐曲声中。

南瓜宴

为了解决个人“零食”问题，几乎每个同学都开了一小片荒地，那是大家的“自留地”。大家喜欢吃什么就种什么，如西红柿、黄瓜、萝卜等。想当年，桥儿沟山脚下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由于大家精耕细作，肥水充足，长势特别好。连桥儿沟的老乡们也常来取经，见人就夸：“延中娃，呱呱叫。”

金秋时节，到处果实累累，丰收在望。同学们三三两两相邀，蹲在菜地里互相品尝劳动果实：这个甜，那个香……

桥儿沟的山坡上是一片红色胶土层。由于存不住雨水，种什么都长不好。但非常奇怪，种出的南瓜却又大又甜。同学们就因地制宜，发挥它的优势，种了一大片新华农场改良型南瓜。农历八月十五，正是南瓜丰收的时节，那桔红、紫红、橙色的南瓜爬满山坡。

秋高气爽，月明星稀，同学们准备开“南瓜宴”欢度中秋。有的上山拣柴，有的找石头架锅。所谓锅，就是洗脸的铜盆。什么调料也没有，要能搞到一小撮盐就万幸了。

同学们头上顶着明月，围着热气腾腾的大铜盆，又说又笑，一边吃一边评论。有的说明年一定多种南瓜；有的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定把家乡的南瓜移种到桥儿沟来；有的望着明月，干脆唱起了“信天游”，调子是陕北调，但词是自己顺口编的。谁也听不懂，也许是用“宇宙语”唱的吧？这种别具风格的南瓜宴，让我们忘掉一切，好像自己成了宇宙的一部分，宇宙也溶化在自己心中。真是天人合一，快乐自在。

有人说这是穷开心，有人说这是人间神仙会。

1945年，抗日胜利后，延中同学奔赴全国各地，都带上南瓜、西红柿种子，让延安精神遍地开花，永放光芒。

山泉

延安中学坐落在桥儿沟的东坡上，窑洞摆成了一条长蛇阵。

为了减少师生往返奔波，全校分成两个食堂就餐。后灶食堂得天独厚，山崖下有一股清澈的泉水，甘甜无比。同学们饮用全靠它，生喝从不会生病，比现在的自来水不知要清洁多少倍。

不知是哪位老师傅，把炉灶巧妙地盘在山根下，和泉水紧紧挨在一起。几个锅台就在泉水出口处。伙房大师傅只要一根树枝或几片树叶就能灵活自如地把水引向各个锅中。

在不需要时，只要把树枝或树叶一拔，像开关一样，使水空流，简直方便极了。

延中的同学们整天生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露天上课，高原阳光，山谷清泉，每天上山下山的爬山运动……就是这些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哺育着他们健康成长。我们一方面是党和人民的忠实儿女；另一方面又是大自然的子孙。黄土地、延河水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这些延安红小鬼，在他们身心中注进了纯洁、朴实和真诚的素质，使他们在以后的征途上经得住各种风风雨雨的磨练和考验。

张燕林

男，延中六班学生。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曾任中国驻原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现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商务参赞，高级工程师。

王震求情拔马尾

王育生

194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在延安中学门前的树上，拴着三匹高大漂亮的枣红马。几个大班的同学正愁找不到胡琴弦，看见枣红马，他们眼睛一亮，有了！这么长的马尾拔下来不是正好吗？他们不由分说就干了起来。等高耶夫和几个小班的同学围过来，他们已经满载而归了。小同学想要马尾又不敢去拔，就在地上捡一些人家掉下的，你争我抢了一番。

这时正巧一位老师经过这里。他看到马尾被拔秃了，又看见几个小同学手里正好拿着马尾，便不问青红皂白就训起他们来：“你们几个是怎么搞的？把人家的马尾巴拔成了这样？

简直是强盗行为！”

高耶夫胆怯地说：“老师，不是我们拔的，是他们……”

“你还嘴硬！错了还不承认错误？！拔人家的马尾，这不是强盗行为这是什么？！”没等高耶夫说完，老师又训道。

老师刚走，王震旅长带着两个警卫员从山坡上走下来了。

看到几个小学生很委屈的样子，他笑哈哈地走到高耶夫跟前问道：

“哎，老六（高排行为六），你们这是怎么啦？都哭丧着脸？！”

高耶夫带着哭腔回答说：“他们拔了马尾跑了，我们拾马尾，老师来了说我们是强盗行为。”

王震旅长亲切地说：“拔几根马尾，这不算是强盗行为。

好了，好了，你不要哭，一会我去找你们老师说，这不是强盗行为！哎，老六，你们拔马尾做什么？”

高耶夫说：“我们排文艺节目找不到弓弦，想用马尾做！”

王震旅长高兴地说：“排节目是好事，应该支持。来！我给你们拔！”

当他看到自己的坐骑马尾已经被拔光了时，就笑着逗小同学们说：“好家伙！我的马尾给你们剃成了光头！”

说着话，他已走到了警卫员的坐骑跟前，想拔一些马尾给孩子们。不料这马根本不认他这个生人，还不等他动手，就将身子转到一边去了，一根马尾也不让他动。没办法，他就对警卫员说：“小鬼，你给他们拔点吧！”

警卫员心里不乐意，脸上不高兴，嘴噘得老高，咕哝地说：“马尾好不容易才长这么长，你骑的的马的尾巴都被他们拔光了，还要拔我骑的那匹马的尾巴？这马的尾巴都被拔秃了，多难看！首长也真是的。”警卫员嘴不停地咕哝着，站在那里就是不动。

王震旅长又微笑着求情道：“小鬼，我知道拔马尾你很心痛，也很生气。可是你看这些小家伙，马尾没拔着，还挨了老师一顿训，你说心里有多委屈！他们拔马尾是为了排节目，排节目是革命的需要，你爱护马匹也是革命的需

要，都是革命的需要。咱们就分担一些小家伙的委屈，马尾拔秃了，咱们就骑秃尾马，这有什么难看的！这也是革命的需要！你就给他们拔一点吧！卖我个人情怎么样？拔吧，拔吧，就拔一点点。”他说着顺手在警卫员肩上拍了拍，硬是把他推到了马跟前。

高耶夫和小同学们看着手里的马尾，想着演出时的欢乐，一个个又高兴地哭了。

桔皮之“争”

刘彤矢

40 多年过去了，但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地保留这样一件事。那是我读延安中学的时候，大约是 1944 年 12 月，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归来，带回一些桔子，分给了中央各领导同志，但他们舍不得吃，都留给了孩子们。所以，在延安中学上学的几位领导的孩子和由领导照顾的烈士子女们，星期天回到家，都分到了一点儿桔子。这些同学自己也舍不得吃，又把它们带到了学校，想让同学们都品尝一下。

可是，人多桔子少，别说每人一个，就是每人一瓣也分不过来呀。只好是在场的同学每人吃一瓣；后来的人只能分到一块桔子皮，闻闻香味。最后，连桔子皮也供不应求了，只好不断分割，从鸡蛋那么大，分成指甲盖大小的几块，再分成豆子大的几块。……尽管如此，也还不够分配。于是，终于爆发了“桔子皮争夺战”。你“抢”，他“夺”，而且“抢”得那样“认真”，“夺”得那样“专注”，……那嬉戏欢乐的喧闹，那热烈而充满孩子气的争夺，使我至今难忘。

当激烈的“争夺战”稍事平息之后，又来了两个同学。他们的鼻子还真灵，一进门就喊：“好香啊，你们吃什么呢？”杜吉昌同学为了逗他俩，故意抿嘴做出吃的样子；他俩越急，吉昌同学就越是不张嘴。于是，两个小家伙上去就掰吉昌的嘴，直到把嘴掰开才“休战”。当他们看到吉昌嘴里吐出的东西时，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咳，是块桔子皮，我们当是什么好吃的呢！”可是他俩说出这样的“大话”以后，又犹豫起来。两人小声嘀咕了几句，就悄悄地来求杜吉昌：“喂，好同学，能不能咬给我们一点儿尝尝？”他们那乞求的眼光和声调，把同学们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桔子，对于当时在延中学习的青少年来说是罕见的，当然也是非常珍贵的。然而我们的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学校就是我的家，同学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命运是共同的，我们的苦乐也是共同的。所以越是珍品，越不能独吞，而要大家来分享，这已成了我们的习惯。即使是几颗酸枣、几粒木瓜豆，或发生了像“桔皮争夺战”这样的“争执”，我们的心中也总是牵挂着大家。

刘彤矢

女，曾用名刘佩兰。延中三班学生，党总支干部。国务院直属机关局级干部。曾著《圣地幼苗》一书。

“洋”学生做鞋子

刘力学

我们在延安中学时，享受供给制待遇，吃的、穿的、用的，全都由学校供给。但因边区经济困难，有时会遇上衣服、鞋子发不下来的情况。我们同学有的是烈士子女，有的父母上了前线，家里靠不上，穿着上就发生困难了。

1946年夏天，我们班同学朱忠勋、朱忠芳姐妹俩见我穿的鞋子破了，就要给我做鞋子穿。她们把我拉到她们跟前，很认真地给我量了量脚的大小，就给我做起鞋子来了。

我不知她们从哪里找来了破布，打成褙子做鞋底，又弄来黑洋布做鞋面。鞋子做成了，她们又把我拉到跟前，让我穿在脚上试试，还挺合适的。我高兴地穿着她俩给我做的鞋子，一溜烟地跑了，竟连一句感谢的话或客气的话都没有说。当时，我就没有产生一点感激之情，把她们给我做鞋穿看得就好像学校给我发双鞋一样地平常，好像就该是这样似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朱忠勋、朱忠芳给我做鞋子穿这件事，越来越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每每回想起来，就越来越理解了它的分量和价值。我们大家当年在一起学习，一起接受革命教育，过着无忧无虑的半军事化的低级共产主义生活，老师犹如父母，同学就是兄弟姐妹，吃的一锅饭，穿的一样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我们彼此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怀有共同的理想，都知道学习之后，将来要上前方打敌人，还要成为建设新中国的科学家。我们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朱忠勋、朱忠芳不是边区土生土长的女孩子，她们是从印尼归国，又到延安来接受革命教育，准备将来参加革命的洋学生；而且，她们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王稼祥的亲戚，她们曾生活在优越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里，但却从不自恃特殊，傲视一般同学，而是自视和我们一样平常。她俩见到我的鞋子破了，很自然地就俨然以大姐姐的姿态（其实，她们只是个子长得高一点）给我做鞋子穿。由于我们有共同理想、共同事业，便形成了这种亲密无间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在朱忠勋、朱忠芳给我做鞋子穿的时候，我也把我叔父上前方时留给我的一双新发的鞋子送给了我们班的大同学鲍克亮。

1950年10月，我们部队执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使命，开赴朝鲜参战。在途经沈阳时，我又遇见了朱忠勋、朱忠芳两姐妹。我们在亲热之余，显得有些拘束。她们当时正在中国医科大学上学。我那时穿着一身崭新、整洁的军装，脚蹬皮靴，站在她们面前，我跟她们一般高，不再是小弟弟了。

此刻我突然想到了她们还是小姑娘时奇迹般地给我做鞋子穿的事，然而，我仍然没有能对她们说出一句感谢的话或者是客气的话。朱氏二姐妹面部露出微笑，显得那么美丽端庄，温文尔雅，根本不在乎我说不说感激的话。后来，她们都成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高级医务人才，为祖国的医学、卫生事业不断做出贡献。

我回忆起少年时代的朋友，为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我自己也感到无限的快慰！

刘力学

男，1930年生。延中九班学生。曾任陕西省委保密委员会副主任、保密办公室主任。

一件红缎子小袄——血染的遗愿

刘彤矢

我在延安中学上学时，一直穿着一件红缎子小袄，在那艰苦的条件下，我为什么能有这件缎子袄呢？这里包藏着一个既甜蜜又辛酸的故事。

1939年冬天，我因连续4年被冻坏了双颊和鼻子，而住进了拐峁陆军医院。在这里遇到了赵达大姐。赵大姐是在1938年10月一次飞机轰炸中受伤的，我和她住一个病房。

因为缺医少药，她的伤势日渐恶化，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她的膝关节烂了个洞，经常往外流血、流脓。医生建议锯掉她的右腿，她每次都哭得吃不下饭。那时她年约三十三四岁，我才13岁，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她，只有陪着她哭，再就是帮助拿便盆、打水、洗脚或洗衣服。接触的时间长了，她慢慢喜欢我了。

她了解到我的身世后，告诉我她有个比我小半岁的儿子，是烈士的遗腹子，丢在敌占区。一看到我，她便想起自己的儿子。那时我的打扮真像个男孩子，理个小平头，圆圆的脸，穿一身粗布棉军装，袖口和裤腿卷上去半截，露在外面四块白，腰间扎着一条毛线带带。

赵达大姐的手特别巧，躺在床上，她还用破布把我露在外面的白袖口、白裤脚包起来缝住，并且常督促我拆下来洗洗。经过一个冬天，我俩已经很熟了。她慢慢向我讲述了她的经历。

她是河北省玉田县虹桥镇人，1906年12月出生。1922年，她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期间，曾参加了邓颖超同志领导的女权同盟直隶支部，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女青年。1924年，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不仅在天津的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还在寒假回乡时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发动农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

1925年夏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的早期党员江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等人来到玉田，利用暑期小学教师讲习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建立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不久，江浩等人又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但当时玉田县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只能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主要在小学教师中开展增资斗争和在农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赵达大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26年寒假时回到玉田，参加了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发动群众打倒军阀的活动的。在斗争中，她与江浩同志的独子、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的江震寰相爱，不久便结为夫妻。

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后，奉系军阀对革命势力进行残酷镇压。1927年4月18日，赵达大姐的丈夫江震寰同志被奉系军阀杀害。1926年11月他被捕时，赵达大姐已有身孕。

不久，她转移到河北省玉田乡下，躲过了敌人的通缉和搜捕，同时生下了江震寰烈士的遗腹子宏烈。从此，她一边抚育孩子，一边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一时期的玉田，已建立了中共玉田中心县委，领导玉田、遵化、蓟县、丰润和迁安五县的工作。赵达大姐的母亲和弟弟都是支持革命的，她的家便成了县委活动的地方和交通站。她除了负责中心县委和上级联络接待外，还承担刻写蜡板、油印文件和传单的工作。印刷工具和纸张等，都是她自己花钱买的。中共北方区委、区农委、天津地委、顺直省委等领导机关派来的同志，一般都是到她家与县委接头，并常住在她家里。在她家里，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王荷波同志曾召开过县委会议，传达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赵达大姐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家里的钱拿出来交给同志们使用。1927年10月暴动失败后，一些突围的同志来到她家时，她曾给他们换了衣服，带上路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有的同志是由她亲自送出去的。

1928年，玉田又恢复了党组织。当她得知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并不得再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指示后，毅然辞去了玉田女师校长的职务，回到乡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夏天，她参加了玉田第二次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这次暴动又失败了，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她与党失去了联系。她弟弟这时已不再支持革命，她只好离开娘家，搬到婆家刘家桥。1933年，再次恢复了党组织，赵大姐的婆家刘家桥又成了县工委的活动点和联络点（这时县委尚未恢复）。不久，她与河北省委的一位同志结了婚，一起经蓟县到北平。

北平的环境十分艰苦，他们常常因失业而生活无着。由于叛徒的出卖，她的丈夫被捕入狱。赵达大姐怀着身孕，要为生活而奔波，又要到监狱去看望同志们。1936年，她丈夫出狱，他们无法在北平立足了，两人便决定带着小女儿到陕北。考虑到今后生死未卜，临走前，他们把宏烈寄养在香山慈幼院。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年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孩子从此杳无音讯。她日夜思念着儿子。自从认识我以后，她把对自己儿子的一片爱心全都给了我。

赵达大姐是1937年夏天到延安的，不幸于1938年10月被日寇的飞机炸伤了右腿，在医院住了将近两年。

记得1940年春天，每当晴天的时候，很多伤病员都出去晒太阳，窑洞里只剩她一个人。她脸色苍白、消瘦。一连几天，我总在想：怎么能让她也见见阳光呢？一天中午，我先把床板扛到院子里，再把凳子搬出去，把床板架上，铺上被子。大姐问我：“你不睡觉，折腾什么呢？”我说：“晒被子。”

当一切准备好后，我才回到窑洞里和她商量说：“大姐，你也出去晒晒太阳，也许体质好了，你的腿就能好，不会锯掉了。”

她听我这一说，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流，说：“我有近一年半没有下地了，怎么能出得去呢？”我说：“你左腿不是很好吗？”

我扶着你，只要你一条腿先站在地下，我就能背你出去。”我才13岁，背一个大人，实在是够吃力的。我连背带拖地往外挪动，她怕把好腿摔坏，一面嚷，一面使劲抓住我的肩膀，扭我、骂我，叫我把她放下来。我咬紧牙关不吭气，把她硬拖到了窑门口。一看到在门外半山坡上晒太阳的同志，我就大喊：“快来帮忙！”于是，来了几个男伤员，七手八脚地帮着把她抬出来，

放在床板上。我打开她腿上的绷带，又向护士要块消毒纱布盖在她的烂腿上，晒她的腿。大约两小时后，大家才又把她拖回去。第二天出来，我又给她找了顶破草帽，给她遮脸。从此，只要天气好，我就拖她出去晒太阳。两周之后，她的伤口开始收敛，脓也少了，腿终于保住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从此，她对我更是亲热，又给我做了两双红粗布的袜底。

当我要出院返回抗大工作时，她拿出亲手缝的一件红缎子袄给我穿到身上，并告诉了我这块红缎子那不平凡的经历——

它原来是赵达大姐和江震寰烈士结婚时所用的一床被面。江震寰同志牺牲后，她不忍心再盖这床被子，就把被面拆了下来。在以后的艰苦岁月中，每当同志们生活发生了困难或要营救被捕的同志时，赵达大姐就把这红被面和一些首饰送进当铺，等地下党的经费送到时再赎回来。虽然这样几进几出当铺，赵达大姐却总不忍心卖掉它。1934年7月，大姐生女儿时，还把红被面当出去，买回5斤玉米面坐月子。直到在延安又添孩子时，被子不够了，才又把它缝成被子。这一回，大姐又把它拆了下来。她细心地把被面洗净，撕掉被头脏污了的地方，用白绷带滚边，一针一线地为我做成了这件漂亮的小红缎袄。

记得当时她一边亲手给我穿在身上，一边叮咛我说：“做大了点，因为你还要长呢！我还给你留一个‘对方’，等你长大了，结婚后有了孩子，再做个小被子吧！”

我默默地点点头，泪珠却成串地滚落下来……这烈士盖过的被面，这曾沾有赵达大姐鲜血的被面，像一团火，包裹着我，一直燃烧在我的胸中。当时，我曾在心中喊道：“我的好大姐，我的好妈妈，我决不辜负你的希望！”

赵大姐住的是一孔西窑，到了冬天，阳光照射时间短；有时因木炭少窑洞里没火，她那受伤的腿不易保暖。我虽然不会做针线活，还是拆了一件破军衣，在红军战士艾平大姐的帮助下，给她做了一双灰粗布棉鞋。尽管做得粗针大线，可赵大姐说，穿上我做的鞋，她总觉得热乎乎的。她也给我做了顶漂亮的白布八角帽，我戴上它可神气啦！在那艰苦的年代，她有什么好吃的，总要留着等我去了才吃。记得她用瓦罐罐在木炭火上炖的牛肉，也等我去吃。自从赵达大姐负伤后，几年来从没有见过她的女儿蓟子。在她的身体逐渐恢复后的一个星期天，刘向三同志带来了一个没留头发、像个男孩子的小女孩。赵大姐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刘向三说：

“这是蓟子呀！”她这才认出原来就是她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

赵大姐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这小鬼，对自己却很不在意。

她全身受了13处伤，又做了接腿的大手术，加之肺部有病，身体十分虚弱，但她从不向组织提出特殊要求。1944年的夏天，她大腿根部一块伤疤又发了炎。她说，药很困难，不用去找医生。不久，伤口溃烂化脓，伤口中慢慢地露出一个黑尖的东西，原来是一块没取出的弹片！它上尖下大出不来，不小心碰一下就痛得钻心。她只好把裤腿一直卷到大腿根。就是这样，赵大姐仍坚持不去求医，每天自己夹住弹片尖摇晃几下，有时滴点红药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她终于把弹片拽了出来。

赵大姐是我学习的榜样，至今，我的性格和思想仍有许多地方深受她的影响。标志着我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的，是她给我做的那件红缎袄。1942年我到延大中学部学习，冬天，我都穿着这件红缎袄，直到1946年我调离延安中学到医专工作，以及战争中撤离延安去打游击，我仍穿着它。这件红

缎袄伴随了我的大半生，鼓舞和影响了我的一生。

遗憾的是，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与赵大姐失去了联系。

1983年，一个偶然的机，使我碰到了蓟子妹妹。40多年没见面了，她竟然还能认出我来！从她那里得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赵大姐便接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宏烈的信。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已经到了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军。然而，宏烈和他妈妈见面则是建国后的事了。

我还得知，敬爱的赵大姐已不幸于1974年元旦病故。赵大姐的晚年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听说“文革”中，她曾多次被“造反派”揪斗。我不禁想到，她那条没有膝盖、不会弯曲的腿，怎么能经得住推搡毒打……我不寒而栗！她死后，听说沈阳市的许多老同志、青年人都参加了她的葬仪，那场面是十分感人的。

听到这一切，我的泪水不禁滚滚而下，悲痛欲裂的心，一下又飞向那延河边，飞向那使我获得又一次母爱的窑洞。不久，我见到了大姐的儿子宏烈和宏烈的长女。我用颤抖的双手捧出一块红色毛哔叽衣料，作为送给姑娘的结婚礼物，也作为我对赵大姐的一片心意。同时，我还满怀深情地向他们讲述了我的小红袄的故事。

从鞋谈起

李夫星

鞋，人从开始学走路起就离不开它。现在人人都有鞋穿，而且随着季节的变化、场合的不同，以及男女老幼爱好各异，还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适宜的种类和喜爱的式样。

可是1944年在延安的时候，脚上要有一双鞋也是不容易的。那时的延安中学是一所供给制的学校，师生们的吃穿都是人民供给的。一天三餐小米饭，土豆南瓜菜。穿的是粗布衣，有的人冬天还穿空心棉袄（没有衬衣，光身穿棉袄）。鞋子更是不够穿，不少人都是用破衣服撕成布条打“草鞋”穿。

我不会打草鞋，为了保证冬天有鞋穿，整个夏天只得穿双木板鞋。走起路来木板鞋碰击着地面，提脚时木板鞋又拍打着脚板，发出有节律而清脆的响声。人们有趣地叫它“呱哒板”。别看它不好看，穿起来也不舒服，但它可以使我顺利地度过整个夏天和初秋。

延安中学坐落在桥儿沟东侧的半山坡上。食堂在沟底，上下是崎岖陡峭的石台阶路，少说也有四、五个石台阶。我们不论刮风下雨，每天吃饭必须上下六次。穿上“呱哒板”上上下下，开始还真有点害怕，走不好就会滑倒；时间一久，也就习以为常，清脆的呱哒声时时伴随着我，也真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

1945年8月的一个傍晚，我散步到桥儿沟口鲁迅艺术文学院旁边。突然听到有人呼喊：“日本投降了！”这喊声像震撼九霄的风雷，振奋了亿万人民的心弦。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年累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的就是这一天。我们千秋青史将要以璀璨辉煌的金字记下这一天。这伟大的胜利，朝思暮想的胜利，怎能不使人心花怒放？怎能不使人欢腾跳跃？这

时，延安中学的游行队伍也从后沟涌出来了。我早已高兴得忘记了一切，也顾不得脚上还穿着呱哒板，顺手接过一个没点燃的火把，跑着跳着汇入了海潮般的人流。

霎时间，桥儿沟锣鼓喧天，火光通明，腰鼓队热闹非凡，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向延安城进发了。随着拥挤的人群，我的木板鞋呱哒呱哒地响个不停，我借着前后火把的亮光，跌跌撞撞地跟着人群向前走着。

远远望去，游行队伍像一条巨大的火龙，黑夜里十分壮观。先沿着弯弯曲曲的崖边，后又经过延安飞机场，十几里路，不知不觉就过了延河，到了新市场口。前边的队伍已经不动了，后边的人不断地往上拥。人越来越多，还有许多市民、机关干部从旁边加入游行队伍。人们挤得水泄不通。锣鼓声、欢呼声汇成一片。我身不由己地随着人流在涌动着。突然我的右脚别了一下，一阵剧痛。我本能地“啊”了一声，急忙抽脚，一只呱哒板已不知去向。我顾不得脚痛，急着想找回那只呱哒板，可是已经不可能了，人挤得连腰都弯不下去。

这时有人高喊：“大家让一让，空出个场子，还要演节目。”

但任凭他怎么喊也没有用，其实谁也让不动。这时，只见一个青年人急中生智，转圈抡起了手中的火把，“呼”的一声画了一个火红的圆圈，人群“哗”地向四周后退了。

中间立刻出现了一个空场地。这时，我惊奇地发现我的那只呱哒板正在场中。我不顾一切，像一只受惊的小兔一样，飞快地冲了进去，拿上了那只鞋又跑回了人群。我的这颗心才逐渐平静下来。紧接着锣鼓声、口号声、歌声、掌声和笑声，使我沉醉于幸福的欢乐之中，忘记了一切。

庆祝游行结束了。要往回走时，我一动脚顿时觉得右脚痛得钻心，脚腕子肿得像个大大馒头。队伍中的火把大都燃尽熄灭了。这时才发现天好黑呀！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伸手不见五指。游行队伍散开了，三五成群地向回走。我又点燃了手中的火把，让一个同学举着，火把的前前后后立刻聚集了好多人，同学们出于友爱，有的要扶我，有的要背我，我都谢绝了。我穿着呱哒板，一步一拐，但我相信，跟随着同志们的脚步，凭借着胜利的火光，我们一定会走到胜利的明天。

1947年3月，蒋介石纠集了23万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命令延安中学组建第四随军医院。我就参军当了一名护士，从此跟随部队转战南北。

那时，我们经常行军转移，而且多半在夜间。行军走路离不开鞋。一次行军，我只有脚上穿的唯一的一双鞋了，而且有只鞋尖已有个破洞，大脚趾都露出来了，可是，夜间行军全靠它，因此我非常注意爱惜它。

一天让我去送信，路是沿着一条河走，这条河在南北两山之间。小河像一个淘气的孩子，一会儿流向北山脚，一会儿又流向南山根，一拐一弯地向东流去。小路不断地穿过小河，河水不深不浅刚齐腿肚。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河水冰凉。我脱下鞋蹚水过了河，淋淋脚上的水滴又穿上了鞋。可是走不多远又要过河，刚蹚过水的脚是会把鞋弄湿的。我怕鞋湿绳断鞋帮离开鞋底，只得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提鞋，光着脚一会儿蹚水，一会儿上岸。刚出水的脚经北风一吹，没想到冻得很快裂开口子，疼痛难忍，血也从裂口中慢慢地渗出来，可是还要过河……。我的脚一次又一次地蹚过冰凉的河水，北风不停地刮着，脚上的裂口一次比一次更多，渗出的血滴凝固了又溶不

开……。

这时，我多想再有一双鞋呀！……想着想着，我觉着我似乎真的穿上了一双不怕水、不怕风的鞋，脚不再裂口渗血了。可是当我静静神，发觉我手里仍旧牢牢地提着那双破旧的军鞋，光着两只裂着无数小口的脚，北风还在无情地刮着，冰冷的河水还在没完没了地纠缠着我。但我没有犹豫，也没有迟疑，我相信只要我永远跟随革命的队伍走，这双脚一定能走到胜利的那一天！

随着解放全中国，我在解放战争中，从大西北走到大西南，又从大西南到了中央所在地北京，走过了许多的路。我穿过布鞋、棉鞋、解放鞋、雨鞋，也穿上了油光锃亮的皮鞋。

我的脚感到温暖舒适，心里也感到满足。我为什么会敝帚自珍呢？我不能不想到我在延安中学所受的革命教育。我们的那些教师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还是出国留过学的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了舒适的生活，不远千里来到这贫瘠的陕北穷山沟，投身革命，过着艰苦的生活，给我们教授文化科学知识和革命道理。他们为了什么？为了打日本救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他们的教学像春天的雨露撒入了我们的心田，使幸福的种子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现在鞋的种类简直多得无法计数，式样也美不胜收。但都没有能在我的心中留下印记。唯有我那双呱哒板鞋，使我永远难以忘怀。它引我想起许多往事，苦难和走向胜利的步伐。尤其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延中老师们的谆谆教诲……

李夫星

男，延中六班学生。首任解放军 309 医院结核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千里悲歌黑茶山

——追忆“四·八”烈士追悼会朱宏

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为了将重庆谈判的情况及时、详细地向党中央汇报，飞回延安。同机的还有老教育家黄齐生爷孙俩、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及女儿扬眉。

1946年4月8日，这架满载着中共要人的飞机撞在晋绥境内的黑茶山上。美制的铝合金飞机被撞成了一堆废片，飞机上的人无一生还，他们粉身碎骨，惨不忍睹。派去救援的苏联医生阿洛夫带着警卫人员，骑着马，沿着出事的黑茶山间寻找，收集了部分尸骨和尸体的碎片。通过科学的检验，他将每人的遗骸归成一堆，用延安糊窗户用的麻纸，一包一包地包好，再分别放在担架上，覆盖着党旗，送往延安机场。

19日清晨，追悼会在延安机场举行，延安人民都沉浸在深深的悲痛和哀悼之中。一座用土白布、白纸和松枝扎成的灵堂，在机场旁边显得格外肃穆、庄严。灵堂上的横幅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虽死犹荣”。据说毛主席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已是悲痛万分；为了爱护他的身体，中央决定不让他参加追悼会，他也只好照办了。

在临时搭的木架灵堂上安放王若飞等同志的棺木。哀乐声中，将一

包包遗骨分别放入棺木里。这就是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黄齐生几位英烈的遗骸啊！在灵台上守灵的有刘少奇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和烈士家属。

哀乐的指挥者是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唱挽歌的是我们延安中学的学生。当时我才十四五岁，还是中央管弦乐队的一名队员呢！我们就地坐在黄土地上，是会场台下的最前面一排。灵堂里的活动我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唱着挽歌：

含着悲痛的眼泪，唱着人民的挽歌，为了人民的幸福，您们付出了生命！

安息吧！人民的英雄！

您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万恶的法西斯、反动派一定要消灭！

和平、民主的三大决定一定要实现！

我们一定继承您们的遗志，到处展开新民主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安息吧！人民的英雄！

您们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接着是领导人致悼词，秦邦宪同志的遗孀代表同机遇难的 10 多位同志的家属讲了话。

葬礼在离会场不远的机场的另一端举行，那里挖好了十几个土坑。当下土埋葬时，首长先铲了几锹土。这时，叶挺同志的女儿叶剑眉痛不欲生地扑向土坑，她见黄土盖上了亲人，诀别就在眼前，一声撕人心肺的哭喊使在场的每个人落下泪来。这次事件中她一家遇难的就有四位，刚刚出狱的双亲，与父母同住监狱的小弟弟叶阿九和急于想早日见到亲人的妹妹扬眉。剑眉姑娘是从急于见到父母的渴望和欢乐中一下子跌入这巨大悲痛的深渊，小小的年纪，她怎么能承受得住呢？

叶扬眉在她和父母同机遇难前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延安杨家岭礼堂里，大人们在跳舞，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玩耍，在木板地上“滑冰”。听说爸爸、妈妈和小弟都已出狱，要来延安见毛主席，扬眉按捺不住渴望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和急切的心情，连康克清妈妈的劝阻都不听了。康妈妈说：“你很快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别去啦！”她手持 1 尺多长的手电（在延安还是稀有之物）时开、时闭；一会暗、一会明；嘴里嚷着：“我要去！我要去接嘛！”不管谁怎么说、怎么劝，都无济于事，非去不可。谁知，这么不幸啊！父母弟弟连同扬眉本人及 16 岁即是共产党人的小保姆五人竟全部遇难，这怎不叫生着的剑眉悲痛欲绝呢？

1946 年 6 月底，我离开延安去东北，路经黑茶山时，我和大姐几个人特地去看了那架飞机的残骸，是在一间不太大的房子里堆满着的铝合金废片。据说，那天是因为雾气浓重才撞在石山上。而且知道起飞时天气就不太好，那为什么还要起飞呢？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乘坐的飞机没有采取安全的防范措施呢？幸而周恩来副主席因飞机太挤，包位有限，没有乘坐，否则损失就更大了。美国死了 4 名驾驶员，埋在同一地方有十字架的坟墓里。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损失太大了，无法弥补。全延安、全边区的人民都在深切地哀悼，两周内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当时我想，我们就苦于没有自制的飞机，没有自己的驾驶员。我的悲痛、疑惑和仇恨久久难以平息。一枚

镶有遇难英烈照片和毛主席题词“虽死犹荣”的小小纪念章，40多年来一直珍藏在我的身边。

（金茂年整理）

（作者简介在《难忘的青少年时代》一文后）

怀念林汉南同志

江明一个革命家庭

林汉南同志是湖北人。他的父亲张浩同志，是第三国际中共代表、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一二九师政委、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在延安病故，埋葬在延安杨家岭对面的山上。延安当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各机关、学校、工厂成千上万人排长队到山上送葬默哀。我们延大中学部的全体师生参加了送葬仪式。我看见将棺材放入墓穴后，毛主席首先铲土掩埋，然后是其他中央负责同志铲土埋。张浩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为革命，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浩同志1916年与涂俊明同志结婚。涂俊明同志是湖北黄冈人，也是1924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26年入党，在武汉、上海从事妇女工作多年的革命工作者。1932年被捕，她坐了3年监狱，坚贞不屈。1935年出狱后继续为革命奔波。

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央组织部托儿所所长等职。建国后，是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

1988年于北京病故，终年91岁。

林汉南同志生于1926年，排行老二，他哥哥林肖侠同志，曾任锦州、哈尔滨市委书记、《红旗》杂志社秘书长。他的弟弟林汉雄同志，曾是我们保小和延中的同学，1948年我们一起到苏联学习，他在莫斯科莫洛托夫动力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回国后曾任建设部部长。

在相处的日子里

林汉南同志是1938年到延安保小学习，第二年我到保小后结识了他。他天真活泼，爱看小说和英雄人物传记，立下雄心壮志，要作一番事业。1941年—1945年，我们是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初中、延安中学、延安大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学习、生活、劳动战斗多年，相处得很好，成了好朋友。我们是1943年末到了延大中学部的。他为人聪明、机灵、正派、善良也很直爽。他学习很刻苦努力，成绩优良，一向关心人帮助人。他还喜欢打篮球、翻杠子。他的生活很充实，还经常参加种菜、打扫卫生的劳动。在“人人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他积极参加纺线等活动，他纺出的线是一等品，超额完成了原定任务。

1944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月他与牛旭光、吴兰萍等一起到关中马兰办了8个月冬学。他是队长，他总是关心和帮助别人，自己却很能吃苦。因为教学效果好，学生、家长都满意，乡里人称他为“娃娃老师”。

日本投降的前夕，我和林汉南等人还到劳山锄了一个来月地。他积极苦干，不怕苦，不怕累，赶回来时晒得面孔很黑。

林汉南同我们班上的王球玉同学很好，两人作风都很正派。传说俩人

约好胜利后到北京结婚。那时说到北京，就意味着全国解放。他坚信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欢天喜地庆光复

1945年，我和林汉南在延大预理科学习。8月8日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不久，日本投降的喜讯传到了校园，全校师生沸腾起来了。数百人汇集在操场上，点起了火把、火堆，扭起秧歌，敲锣打鼓热烈庆贺日寇投降的伟大胜利。很多人高兴得从火堆上空跳过来跳过去。我和林汉南跳过多次，最后一次两人相撞掉入火堆，立即爬出来，伤不重。我们继续扭出校园，一直扭到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场庆贺。延安各界成千上万群众，都从四面八方涌来。鲁艺的学生也从10里路外的桥儿沟扭着秧歌赶来了。人山人海，汇集在南关的广场上欢庆胜利，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沸腾起来的延安，灯火辉煌，到处在扭秧歌，到处是锣鼓声。由于过于兴奋，卖水果的也不要钱。直到深夜，我们才扭着秧歌回来，很晚才入睡。

赴东北工作经过

抗战胜利以后，同班的林汉南、谢绍明和我，自愿报名到东北去工作。我们于8月下旬到党校二部集中编队，参加学习。一共一千来干部编了四个大队，大队下分中队、小队。

我、林汉南、谢绍明、林肖侠等编到一大一中一小队。我和林汉南的哥哥林肖侠编到一个小队。我们这支队伍总称干部团，林枫、张秀山是政委，黄永胜是司令员，他带一个团护送，林枫在山西兴县等我们。

我们于9月2日，从延安步行出发，每小队有二个牲口驮行李，每人的行李不能超过15斤。每天行军70—80里，后增到100来里。经宋家川，乘小木船划过黄河。经岢岚、五寨到神池。从神池走到铁路桥下，正是深夜，部队埋伏在桥附近，大队人马静悄悄，安全地通过了封锁线。然后继续急行军。走到天亮，忽然下起了雨，越下越大，路上满是泥泞，衣服也湿透了，很冷，很疲劳，真想住下休息。可是传下命令来要继续前进，防止敌人追来。我们咬紧牙冒雨前进。第二天依然是雨天，又是冒雨行军。因为过分疲劳，也有人掉队。我们经过雁门关，走到应县南面20来里处，发现了敌人，部队架起了机枪担负了警戒任务。我们走进小石口，爬了几十里大山，到砂河已很晚了。过了一夜继续走，经大营到灵丘。灵丘是老根据地，休息了一天后，才又继续前进。敌人盘踞在广灵、蔚县。经过这一带时，我们晚上轮流放哨。到了张家口郊区，不许进城，住在一个镇子上。离开时，我们改乘敞篷车，火车开出60里路，铁路不通了，又下车步行到宣化住了一夜。敌人盘踞在延庆，我们是在延庆北面20里的路上通过的。赶走到古北口附近，接受了苏军关卡的严格盘问，苏军怕国民党知道后造谣，让我们乘闷子通过关卡。火车开过关卡行走了一会，不通了，下车步行到承德附近，苏军关卡也不许我们走大道入城，也是怕国民党知道了造谣。天黑了，我们翻了十几里的山路，从小道进入市内，很晚了，走得相当疲劳。大家都埋怨苏联人太死板。

我和林汉南等同志自从延安步行出发，中途没有骑过牲口，经过一个来月的艰苦行军，行程几千里，胜利到达承德，很是高兴。林汉南同志在长途步行中，表现得很坚强，不怕苦，不怕累，从无一句怨言。

我们是10月上旬到达承德的。承德、东北这时由苏军驻守，国民党军队没有到那儿。

到了承德后，奉中央指示，留一批人在热河省工作。指挥部决定除东北人外，每一个大队留一个中队，我们中队被留下了。我们小队的林汉南等同志留到承德工作，我和谢绍明、马青年等分配到赤峰工作。

1946年5月，林汉南等赴东北工作，途经赤峰，他到县政府找到了我，建议一起去东北工作，我同意了，但办手续拖延了时间，他们来不及等我就先走了。

我于是同其他十几名干部从赤峰步行出发，一路也没有追上他，到了哈尔滨，竟没有能打听到他的消息。

后来听说林汉南同志任东北工业局组织科长。1947年7月14日，任克、刘子毅等同志乘火车途中在林口站与土匪遭遇。当时任克是负责人，他号召下车消灭土匪。任克、林汉南带头下车向土匪冲去，但土匪在暗处隐藏，他们在明处，不幸被土匪击中，壮烈牺牲。刘子毅没有下车，在车里坚持战斗，直到援兵到来打退了土匪。

我听到林汉南牺牲的消息，非常悲痛。我万没有想到，在赤峰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多少年来，他那诚实、善良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很想念他，我常常想到他。

安息吧，汉南！我们永远在怀念你！ 江明

男，曾用名周实生。延大中学部一班学生。1948年赴苏学习，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农学院经济系。回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

怀念刘子毅

李纳

我和刘子毅的关系，与其说是师生，还不如说是朋友。想到他的死，悲愤压痛我的心。他是烈士的遗孤，没有死于敌我厮杀的战场，而死于江青等设置的酷刑。其“罪名”，仅为他的继母是贺子珍的妹妹。

我和刘子毅相识于1943年末，那时。我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调到延安中学教语文，并兼班主任。说实话，教语文已够我吃力的了，当班主任，更使我如荷重负，终日喘不上气来。孩子们大约在14至16岁之间，其中有几个大的，年龄与我相仿，刘子毅便是一个。

大部分学生是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弟，正是爱吵闹的年龄，他们之间，忽好忽吵，有时我还没起来便打上门来，互诉对方的不是。排解纠纷这类事，弄得我束手无策。刘子毅年长，我从心里依靠他为我排忧解难。当然，也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他。

我们的语文课没有教科书，靠自己选编。教课不久，我便发现学生们不喜欢枯燥的课文，倒喜欢唐诗；每讲唐诗，孩子们便争先恐后地奔入教室，有的带上小木凳，没有木凳便用砖头当座，膝上放块木板，木板上铺着马兰纸的小本，准备记录。

我选的多是唐代诗人忧国忧民、关心民间疾苦之作。孩子们对“朱门

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的现实，既陌生又愤懑。求知欲鼓舞他们偏要寻根究底。所以当从那些专注的、打着问号的目光间穿出教室时，身后自然地跟着一群孩子，叽叽呱呱，问长问短。我的窑洞距教室很近，转过山坡便是，孩子们常到我的住处。刘子毅来得较勤，他对课文的理解深于其他同学，同学们的提问，有时他比我解释得更确切。

刘子毅到我的窑洞来很随便，在无拘无束的闲谈中，我知道他父亲牺牲于上海，他就在流浪汉队伍中长大，当过童工，挨过资本家的鞭子。抗日战争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寻找到他，将他送来延安。他对继母很尊敬，他告诉我，继母当年在红军中可称得一名美人。母亲死后，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因为父亲对党的忠诚和行动的果敢，却打动那位少女的心，坚决与父亲结为伴侣。所以在继母半身瘫痪时，总是他背着上山下山。

他讲的许多故事，常常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劝他写成作文，他每次都写，也写得很快，可惜读来索然无味，不但别字连篇，上海土话更使人揣摩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所以要改，真也无从下笔。想教他怎样写，遗憾的是我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相视叹息而已。

万万想不到我们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有一天，一个同学来告他的状，我听后特别生气，立时将他找来。他一进门，便感到气氛不对，于是昂起头，有点突出的眼睛，射出倨傲的光芒：“班主任，你找我？”

我的态度肯定生硬，话说得也不会好听，所以他还没有听完我的“训斥”，便爆发了愤怒的吼声：“你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克里空’的汇报！”

克里空：前苏联作品《前线》中一个说假话的人物。

他的脸涨得通红，一副桀骜不驯的派头，就像当年对待压迫他的“老阔”一样。我顿时全身战慄，伴随屈辱的是眼泪，他见我居然哭了，起初一愣，顷刻之间，惊愕变成嘲笑：

“班主任，你也太小资产情调了，这点小事也值得哭！”

我二话没说，一头冲出窑洞去找校长，我的全部意念都是：“不干了！不干了！”

校长宽慰我一番，当然，他不会让我走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师生们各奔东西，我徒步到东北。这时候，蒋介石集团气焰嚣张，发誓要消灭共产党。敌强我弱，敌人步步紧逼，我所在机关被迫撤到佳木斯。国民党委派土匪为“反共救国军”，日夜骚扰，夜不能脱履。一个中午，刘子毅奇迹般出现在我面前。阳光的威力和劳累深深刻在他脸上，我还来不及问话，只见他性急地从身上掏出一只钹牌手枪交给我，说：“这次我和林汉南同志执行任务，火车开到牡丹江附近，忽与土匪遭遇，土匪包围了火车，我们猛冲出车厢，消灭了土匪，但不幸汉南牺牲了。这是我从土匪头身上缴来的枪，你留下防身吧。”

我无言对答，将枪紧紧抓住，抚摸……我不明白，当时我想从枪上寻找什么。

他告诉我，到东北之后，他便做公安工作，并向我倾诉了一段段神出鬼没的经历，豪情壮志，溢于言表。我庆幸他少年时的苦没有白吃，那些苦头终于变成财富了。

全国解放，我们没有直接来往，但从他的同事口中，仍然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文革”期间，我和老伴先后身陷囹圄，母亲只得到上海去找妹妹。

当时的首都处于空前浩劫之中，抄家、破“四旧”极为时髦。母亲深恐我的一部未完的文稿被毁，便将其随身携往上海。不料被上海的红卫兵搜获，一口咬定是档案，将我母亲扣留。我妹妹和妹夫焦急万分，走投无路，毕竟妹夫蒋祖林有见识，于绝望中豁然开朗，想起同学刘子毅。

子毅这时正在上海火车站做保卫工作，日子也很不好过了，但得讯，仍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四处奔走斡旋，使母亲得以脱险；我的文稿也避免了“灭顶之灾”。严冬过去，它终于重见天日，与读者见面。

我对子毅一直怀着感激与思念之情，极想探视在水火煎熬中的他，但终因自己的处境也与他相似，得不到那份自由。

直到1968年他蒙冤惨逝，仍未谋一面。想起来，不仅遗憾，尤觉凄楚。

1991年5月 李 纳

女，原名李淑源，1920年生于云南路南县。1940年奔赴延安，先后在中国女子大学、鲁艺文学系学习。1943年任延安中学语文教员。后在《东北日报》、《东北画报》任编辑、记者。解放后，1954年调作家协会任驻会作家。1958年，调安徽文联，从事专业创作。落户于安徽宣城，兼任支书。开始写作于1946年，作品有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

曾出版短篇小说《煤》、《明净的水》、长篇小说《刺绣药的花》、《李纳小说选》。

《刺绣药的花》获人民文学首届长篇奖。《煤》被译成苏、英、东欧等文字。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辛勤的园丁

——致一位年轻朋友的信 杜鹏程

志清同志：

我在祝贺你新年愉快的同时，还向你表示敬意。1956年辞我而去了，但是这一年你给我的几封信，都没有回复。你的信中一再问到我的经历以及我如何学……一句话，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很多青年来信问到这问题，我都不敢答复。我只是文艺界一个平庸的新学徒，懂得的东西很少。而且就是给你写封长信也未必有用处。反正生活是严峻的，它会教人学会一切。

可是最近由于一些事情的偶然触动，又加上我始终没给你复信的歉疚之感，于是想从我微不足道的经历中，抽出一个片断和你谈谈。如果你能把你的学校生活和我平凡的片断经历比较一下，不仅会使你我心灵靠近而且会增加友谊。

志清同志：前几天，我从远方的建筑工地回来，匆匆地在西安街上走着。边走边观察市面的建筑物和来往行人的面孔。猛然一副随时都可能掠过笑影的教师的面孔，从我眼前闪过去。多么熟悉啊！他是谁？我在记忆中搜寻着，但是越是努力寻觅越是没有结果。心里像是缺欠点什么，又像丢失了什么重要东西——这种滋味大概你也体验过——虽然我想不起来他是谁，可是这副面孔却使我想起那教导过我，熏陶过我，最初把党的语言和时代的声音铸入我心里去的许许多多老师。

我让回忆带到似乎是久远的过去了……

我的少年时光里固然不乏困苦的日子，但也有美好、离奇而荒唐的日子！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也是我进入革命队伍不久，我进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师范学校里。……我记得有一天，背上背包，进入了一个村庄，到处找师范学校的大门，正好碰见师范学校的一位教员。他把我带到一个破庙里，推开庙里那间又黑又小的房子，指着一个人向我介绍：“这是咱们的校长！”

校长的衣袖和裤子都很破，穿双草鞋，面孔是慈祥而亲切的。只有从那络腮胡子和闪着坚定明哲光亮的眼睛里，你才可以察觉到他不仅是个苦口婆心的教师，而且是个经受过大的生活波涛的人。总之，这面孔使人想起马克思的挂像来。

那位教员看看庙里泥塑的神像不见了，问：“校长啊！你把你神圣的邻居赶走了？”

校长说：“大概是老乡赶走它，要在这里办小学！”

校长注视了我一阵，问了我简单的经历，把我带到村边一家老乡家的小草棚子里。

这棚子大概是过去放柴草和农器家具的地方。他说：“你住在这里。明天举行入学考试！”他走出房子又折转回来说：“你怕不怕艰苦生活？这里相当好，还谈不上什么艰苦。”他抚摸我的背，笑了笑，走开了。

草棚里有几个同学，有的以膝盖当桌子在整理笔记，有的抱本很厚的理论书在看，有的忙着在写信。院子里有位老态龙钟的老太太在喂猪，还有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窝小鸡在悠闲地散步，而且满不在乎地走到我们住的小棚子里来。我用脚把散步的鸡哄出去，便倒在地上铺的草上。同学们有的端来水，有的帮我整理铺位，有的向我介绍学校情况，有的谈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青年的神圣责任……

在师范学校上课的头一天，有人把黑板放在山坡上，同学们一人搬块石头坐在地上。

我们仅有的学习工具就是手里的本本和蘸水笔。这时光，左边打麦场里老乡们正在碾庄稼，右边一个大门口坐看抱孩子的妇女和正在纺线的老太太。远处有歌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大概是“陕北公学”的同学背上背包出发了。听说他们要渡过黄河，到抗日前线去。我们的同学，有的东张西望，有的听着歌声。突然，校长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总是朴素和蔼而亲切的。看到他，不由得使人想起母亲！

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说：“这是老校长！”为什么叫“老校长”？他并不“老”呀！

大概是亲切的意思吧！

老校长看看黑板下边没有粉笔，就用黄土块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便讲了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而且说，学校现在还不能大量印讲义，希望我们上课的时候用心做笔记……我满肚子心思，满脑子幻想，情绪不安，老校长说的话根本听不进去。你想，现在要培养我去做什么小学教员！这是什么年月嘛！日本人大举进攻，华北遍地烽火，到处是枪声。整个中国都沸腾了。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到处都响彻着激励人心的歌声：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年！

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

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

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

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爱国主义感情在怎样燃烧啊！谁的血液不在血管里沸腾着和加速地奔流呢？可是现在我们却坐在这里……够恼火的！……不过仔细想起来，在这狂风暴雨的年头，个人的爱好、志愿、兴趣显得多么无足轻重！

你本想当文学家，可是做了军事指挥员；你本想做考古学家，把一个世纪的时光当作转瞬即逝的幻影，傲然蔑视现实事物，可是你却变成慷慨就义的烈士……

……老校长很会教书。不仅他的热情的语言在吸引学生，而且他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也能增强教学效果。可是他在讲着，我却沉浸在回想中……一年多以前，由于时代的冲激和孩子似的稚气，我怀着壮志想学一点军事知识到华北去参加神出鬼没的战争。至于战争的残酷，斗争的激烈，生活的艰苦，我都把它涂上一层幻想的色彩。因而参加革命后就到了延安对近的抗日军政大学。接着又被分配到这个学校的一个军事队里。这个队设在一个又破又大的村庄里。同学们有的住在老乡家里，有的住在村周围的破窑洞和破庙里。我们把那破村庄的道路和巷道路都重新修过，又都起了名字：“列宁路”、“斯大林路”、“抗战场”、“延安路”、“救亡路”。凡能写字的墙，都写上了抗战救国的大标语。同学们有的是刚从英国或美国留学回来的，有的是从平津的各个学校来的，有的是从太原兵工厂来的，有的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指挥员。大家都那么激情和朝气蓬勃，仿佛除了祖国的命运和崇高的理想外，人生再没有值得献身的东西。从早到晚歌声不断。有的人一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直流热泪。大伙白天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等，晚上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或者做军事演习。我的个子小，而且缩头缩脑像个刚从地主家出来的放羊孩子，同学们都说：“小同志！你能在敌人后方去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成千上万的群众吗？”我无法回答，可是心里充满了委屈。后来学校当局又把我分到政治队。政治队全体同学没有上课，都正在山坡上打窑洞。白天打窑洞，夜晚露宿，有时还要披着寒风站岗放哨。我在家里是饥一顿饱一顿，饿肚子的时候也有，而这里是常常吃小米饭。我是够幸运了。可是我越来越瘦，放哨时候摸着冰冷的步枪，望着异乡的星空，热切地回想着家乡的破烂村庄和袅袅的炊烟以及亲人的音容。过了几天，上级又决定把许多年纪小的同学，一律搬到这座师范学校里来学习……

“鲁迅先生的名著《狂人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是：‘救救孩子！’同志们就是要挑起这教育下一代的责任……我们要深切的了解，我们对这伟大的时代所负的责任……”老校长用这几句话结束了他两个小时的讲话。我吃了一惊，一看笔记本连一个字也没记下。你说荒唐不荒唐！

我慢慢地爱上这个学校了。虽然它没正式宿舍，没教室，更别谈什么食堂了。说艰苦也算艰苦。比如开饭时，炊事员把饭抬到村子的大巷道里，我们就挤到巷道里去吃饭。

常常是正在吃饭，老乡的大车或牛群、羊群过来了，我们连忙把菜盆和饭碗端起来，一阵灰尘揭过后，又蹲下来吃饭。下雨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老乡的屋檐下吃饭。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农家子弟，能时时呼吸农村的空气，更加使我们茁壮和欢乐。一天，我们吃完饭，老校长出现在一

个土台上。同志们都聚集来。老校长脸晒得挺黑，络腮胡子长得更长了。他这形象使我们想起刚从艰苦的战场或者从敌人监狱出来的革命战士。他说：“同志们！革命事业急速而蓬勃的发展，需要大批干部。学校要扩大，我们必须造房子。同学们会说：要造房子拿钱来！没有钱，这不奇怪吗？不奇怪，革命事业就是白手起家的。同时，我要告诉同学们，学校不但没有钱，而且学校连一把挖窑洞的镢头都拿不出来。我们所有的就是革命的意志、革命的热情和一双能劳动的手。”同学们一下子就被鼓舞起来了。不错，我们还年轻、幼稚，但是我们却认定了道路。我们要和被从社会最下层呼唤起来的数万万奴隶去洗刷几千年来遗留的痛苦与不幸。至于现在要挖一些窑洞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我们数名同学从老乡家里借来镢头和锹，把土崖劈开，挖那一个挨着一个的窑洞。有一天我和许多同学正在挖窑洞，老校长和五六位教员来了。老校长问：“你们怎么把土全挖出来了？”同志们满头是汗，互相莫名其妙地望着。老校长说：“这右边要留炕！这左边大概要留一米高、半米宽的土台，当作上自习的桌子啊！”说罢，他们和其他几位教员就替换了我们，拿起镢头就开挖起来了！

而我们各自看着自己满是血泡的双手，不好意思说疼痛和疲劳。你看老校长在抡起镢头挖土，这对他来说并不是轻松的事哩。他在外国留学回来，又蹲了多年监狱，现在又和青年们一道过这艰苦的日子。有时他直起腰，擦擦头上的汗，又回头看我们，仿佛在说：“我们是贫穷的，但我们不是无能的！”

很快，我们住进新窑洞，在窑洞中当作桌子的土台上铺上麻纸，大家围在豆灯下，上自习，讨论学习中的疑难，消化着老师们给予我们的知识。

生活是那样清贫而充满生气。清晨或傍晚，“歌颂青春”的歌声乘着疾风顺我们住的山上传到远方。

我们用少年的宽阔胸膛呼吸着这大时代的空气！

志清同志：如果我现在能到这地方，我会流连忘返。因为这里有我少年时代的雄心和梦想，情思和激情，因为这里的小草上的露珠也许就是我们少年人当年流的汗珠。

时代大变动着，仿佛人的细腻感觉和内心的动荡被生活的急流遮盖住了。不，大时代的生活气压在每个人身上，很敏锐地反映出来。有一天，一件事情震动了同学们。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有位同学先是莫名其妙地趴在行李上哭泣，后来，毅然地打起包袱要回家。他哭丧着脸说：“革命！我何必讨这份苦吃？”同学们劝他说：“不要失望，革命快胜利了！”他问：“哪天胜利？”他决心脱离革命，于是变得那么冰冷、无情。这件事直气得我们哭起来。但是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少年人，使我们领略到：有的人是有好几副面孔的。后来，老校长又找他谈了半夜，我们挤在门口听。老校长说：“你要在半路和我们分手吗？”

你会后悔的。”他说：“我不会后悔！”老校长说：“这么说你是决心把你对革命事业的感情一刀两断了？”他说：“革命不革命与我没有相干！”老校长的脸色，那么勇毅和凛然，他用力地摆了一下头说：“可以走！”

我不知道老校长以后在那些欢呼革命胜利的人群中看见了这个人没有，但是我在以后的岁月中，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人：

在革命事业稍微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先是苦闷不满，继而便是神志昏迷，接着便去找寻没有风雨又没有危险的安乐窝了。及至时局顺利，大家

欢呼胜利的时候，这些人又以经历过艰苦斗争而向人夸耀。

一个冬天，我们毕业了。回想我们学习的过程，就情不自禁地感激给我们教社会科学、教数学、教语文、教游击战术以及教其他课程的许多老师。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知识武装了我们的思想，用自然科学知识开拓了我们的智慧，用业务知识提高了我们的能力。

一句话，他们在我们这些少年人心里激起了崇高的情操和革命热情。照实说，当时我们是从这许多受党的嘱托来教导我们的人的身上想象我们党的形象的；而且根据这种想象的形象思索着我们应该如何做人！

毕业后临分配工作时，许多教员都和我们握别，频频叮咛我们：“准备迎接更大的困难！”“为劳动人民服务！”

老校长用无限深情的眼睛，把我们每个人的面孔都看了一遍，没有说什么。

我们背着超过自己体重的背包和讲义，背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和教师们辛勤的教导，出发了。一个夜晚，我们经过革命圣地延安城。虽然这个城市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飞机轰炸后，全城成了一片瓦砾，可是我们这帮年轻人，像不远万里来膜拜圣地的人似的，默默地向这个城市致敬以后，第一次踏上了生活的路程，去肩负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经过 3 年多，我从农村工作岗位上回到了延安一个学校里。这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而且蒋介石用 40 万大军封锁陕甘宁边区，生活空前困难。延安的气氛和几年前有些不同。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有些不同。青年人再没有那种随便什么事就会使他们冲动的情形了，也很少见那一提起国破家亡就流眼泪的人了。坚毅，坚毅，天地之间充满着一种不屈的坚毅。我碰见几年前和我们一道参加革命的少年，现在不仅大伙都变成 20 岁上下的年轻人，而且都做了几年实际工作。有的人身上被子弹穿了几个洞，伤口刚长好。……我到学校的那天上午，喝了一顿稀饭，下午又喝了一顿稀饭，晚上肚子饿得直叫。同志们说，现在能吃一顿小米干饭就很高兴，能吃到一顿馒头就算过年。饥饿威胁着人，但是你听不见叫苦声和埋怨，仿佛这些生活的艰难对大家就是习以为常的。有时候到了吃饭时间，做总务工作的同志宣布：粮食还没弄来，今天减少一顿饭。大家听了也不在乎，还是去埋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去探讨古代史实，去研究古典文学，去学习各种外国文学……

我到学校十来天以后，星期日全校师生跑了好几十里路，翻了几座大山，到深山里去收割庄稼。收割庄稼的男女同学，那么朴实内行，全像他们祖祖辈辈一样都是劳动的人。我割了一阵谷子，觉得气力不足，就躺在谷地里休息。我旁边有几位年老的教师还不停地割谷子。他们，有的人在英美或日本留学回来后，又参加了多年革命工作；有的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但是收割庄稼比青年人还行。在这些人中间，我意外地看见了当年师范学校的“老校长”。原来他也是我们这学校的负责同志之一。这几年他一直在教育工作岗位上。那亲切的长着络腮胡子的面孔上的慈祥眼睛，依然如昔，只是眼角的皱纹增加了。收割庄稼回来，他引我爬上山坡，到了他住的小窑洞里。这个小窑洞后边支个木板床，床边有一张小桌子，他的很多外文书籍都堆在地上。他问我在乡下工作的情形，我想向他说，这几年我在农村做过文书、小学教员和冬学教员，有时候成年累月背上行李从一个村转到另一个村子，给农民教文化。当然，除了工作以外，还要进行生产：捻毛线、种庄稼。但是我看着“老校长”这永远任劳任怨工作着的人，看着这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

白发与日俱增而奋不顾身劳动的人，一种惭愧的心情袭击着我。教师，教师是用自己的心血灌溉孩子的心灵的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哺育着我们事业的继承者的人，同时他们又像伟大的艺术家似的，塑造人类幼苗的性格……而我算得了什么教师？几年来又做了些什么工作？于是我悄然无声地望着他。

“老校长”说：“可以看出来，经过几年实际工作，你变了。你将永远会记得你在这几年工作中受到的锻炼。也许你现在还不能充分地察觉到。”

很长时期，我在这个学校学习，也常到“老校长”的房子里去，坐在他的床上念英语课本。他像一切学者一样，爱书如命，而且总在深夜弯着腰在阅读。看书看得久了，他就走到门口，望着山下成百上千的青年人在体育场活动。而且有机会总是苦口婆心地向我讲到我们党艰苦奋斗的历程，多少革命战士在法庭、在战场上，在各种岗位上鞠躬尽瘁和英勇牺牲的事例。

我把英语课本放在一边，思索着，向往着……

现在听说“老校长”在某个大学做领导工作，后来又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总觉得自己为党做的工作太少”。而且我从看见过他的口中知道，他依然像当年那么艰苦朴素。

志清同志：我接到他那简短的信，通夜不能成眠，我在想着那些为了我们青年们成长而忘我工作的人。

现在“老校长”所在的大学的许多同学也许能从“老校长”口里听到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这是一种幸福。但是，从“老校长”口里听不到有关他自己的任何事情。

志清同志：人在激动的时候，很难思路清晰，因而请你原谅我的啰嗦，原谅我让你和我一起去追忆我少年时光的踪迹。

1957年元旦 杜鹏程

男，鲁迅师范学生。1946年在西北野战军当随军记者，1954年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十二大代表，陕西省文联、作协、对外友协副主席。1991年病逝。先后出版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剧本《宿舍》、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小说《年轻的朋友》和《杜鹏程小说选》、《杜鹏程散文选》等。

他的传记被国际上收入多种名人录中。著名作家。

附录：杜鹏程致林迪生的信

林老师：

我在北京接到你从医院发的信。你住了医院，什么病？叫人不安。

我到北京，是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周扬、丁玲同志传达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情况，我和同志们来听报告。

你要我去兰州，可是我接到信时，已是2月10日（西北作家协会把信转到此处已过半月后），学校大概已经上课了。

只要有会，我总想去兰州看你。

敬请你向兰大那在新疆帮我抄过稿子的同学问好。对帮助过我的人，我常以感激的心情想起他们。

林老师：孙炳先是鲁师第一班的同学，他在兰州军区干部管理部作组织科长。他写信给我，常说到你，你可以给他去个电话，要他去看你。

当你秉承党的意志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子，如今，我们都30多岁了，但是我们像你当年所期望的一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让生命多发挥出一些力量。

你的学生鹏程

2月11日

我的头一堂课

于敏

1943年秋冬之际，延河之滨兴起了秧歌运动，同时又创作出秧歌戏。“向劳动英雄们看齐”的歌声优美而昂扬，响遍陕北的群山之间。这是延安文艺界“整风”之后的重大成果。

鲁迅艺术文学学院的各系——戏、音、文、美；各团——实验剧团、音乐工作团的师生们打起背包，深入农村，学习、搜集、整理民间文艺，真正做到了“土洋结合”“推陈出新”，为时代和群众的需要服务。我原在实验剧团工作，也在戏剧系教一点课。我学无根底，只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已。

秧歌运动一来，我既不会唱，也不会跳，称王的猴子不免露出本相。这时鲁艺已成为延安大学的一部分。总支书记宋侃夫要我到延大中学部教课，我欣然同意。1944年春，我到任了。

延大中学部是延安中学的前身。贾芝同志已经先我而至。

我担任第一班的班主任，兼教语文。我衡量一下自己，长处是读过不少中国、外国的文学书，但是漫无系统，说长处其实很勉强。作为中国语文教师，短处可就很明显了。

为教书必须读书，读和教看似一致，实则不然。我在戏剧系教文学欣赏课，常常是准备几天，讲两三个小时就光了。把自己懂得的讲得人家也懂，而且引起人家的兴趣，可是门大学问。

据中学部主任向我介绍，这个第一班已经是中学三年级，大多是干部子弟，其中也有些高干子弟，年龄在17岁到19岁之间，男女合班。他们的纪律性较好，但是眼光颇高，要求也高。显然讲不好压不住台，也下不了台。此时无情胜有情，真的要唱“逼上梁山”了。学生们都很可爱，聪明而活泼，有的也已读了不少书。看来他们的接受能力很好。

那些明亮的黑眼珠自然向我投来好奇、疑问、不信任的眼光。经过几次较量，师生关系渐渐融洽了。我一直很怀念他们，可惜除了毛雪华，任岳等数人之外，少年英俊的姿影依稀尚在眼前，姓名则茫茫然所记无多了。据闻他们大多数都上了大学，或出国深造，如今已经是各方面的栋梁之材了。

“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此语不虚也。

当时没有课本，也没有现成的教材。只能“现蒸热卖”，由教师自选教材，交油印科刻钢板、油印，然后分发给学生们。

头一课我讲什么呢？这煞费脑筋。好比一次战役头一仗，只可打胜，

不可打败。败了，不但影响学生的情绪，也会动摇自己。那正是抗日战争最吃紧的年头，也是蒋帮 30 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蠢蠢欲动的年头。比较起来，教学条件还算不错。像鲁艺这种“高级学府”，上课多半在露天，每人一张木凳，膝盖则是自己的课桌。当然也都没有现成的教材。中学各年级则都有课堂。当然是窑洞，光线不好，但是不受日晒雨淋、风雪严寒之苦。又有长木板凳和长木板桌，又有鲁艺的图书馆可资利用，幸福得很呐。不知当今的中学生——

他们有完备的教科书，有光线充足、桌椅完备的教室，有较齐全的教学用具，以至于电化教育设施——见了，会作何感。

我思索再三。他们都是革命家的后代，有的则是先烈的后代。所以，一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激发他们向上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眼光高，要求高，这须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他们的文化水平确实高些，知识面也宽些，不精彩的文章难于使他们心折。另一方面则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倾向。谁在少年时代不是脖子挺得老高，两眼朝着老天呢？所以，二要适应他们的高眼光，把他们引向实际，因为他们在语言文字方面并未受过严格的训练。“雕虫小技”么？这小技不认真、刻苦地下点功夫，都是不能登堂的，更不能入室从特定的意义上讲，他们的“门第”确实很高，虽然一贫如洗——无产阶级嘛，可又富甲天下——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者，其精神不但涵盖全中国，也涵盖全人类嘛。所以三思，好吧，我就请一位头号人物来为我撑腰，为我“打场子”。

我选了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我想一定可以适应我以上的三种考虑。文章太长，但是我决定全部刻印，发下去让他们先自己阅读。我只想着重讲鲁迅和柔石的一段，以那首著名的诗篇“……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为中心。

我站在 80 只明亮的眼睛面前了。

没有悬念。站在几十个学生面前讲课，在我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但是我并没有受过师资训练，也没专门研究过中国语文。我少年时代是学英语的，这对我大有好处。对于汉语的字词分类和句法结构，我都可以触类旁通。我一向不赞成灌注式的教学，但怎样才是启发式的教学我也不甚了了。反正是赶鸭子上架罢了。我让学生分段朗读课文，然后我给以提示和讲解。对于左翼文学运动，对于鲁迅的生平和著作，我都略有所知。讲解这样的课文，我自然可以胜任。至于具体怎样讲的，已经全然忘却。不能忘却的只有《为了忘却的纪念》。我是用全部心血，全部感情来讲的。从我站在黑板前面的地位望下去，学生们很安静，显出全神贯注的模样。看来他们也用全部心血、全部感情接受了字里行间所蕴涵的爱和恨——对于朋友、战友的火热的爱、无微不至的体贴，共同理想的光辉；对于敌人的刻骨的恨，无边的轻蔑，而这一切都出之于浑厚的、质朴无华的、十分精练而独具一格的语言文学。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字字看来皆是情，字字看来皆珠玑啊。《为了忘却的纪念》帮助我稳定了人心，打开了场面。

但愿当今的中学生、大学生都以此文为必读的课文，人人心中都印上这永不能忘记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于敏

男，曾任延安新中华报记者，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研究科长、副团长，戏剧系教员。此后任延安中学教员、教导副主任。后又任山东大学讲师。全国解放前后，专事文艺创作及评论工作。1978 年任中国电影家协会

书记处书记，1988年改任顾问。创作有电影剧本《桥》、《赵一曼》等多部，长篇《第一个回合》、《千里从军行》等三部。

有论文集《探索》及其他论文多篇。短篇小说及散文数十篇。译文有《演员的工作》、《巴浦洛夫》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我在延安中学的日子里

贾芝

我到延安以后受到的第一个深刻教育，就是工作应服从组织分配。1943年末，鲁艺整风临结束阶段，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延大中学部工作，任教导员。在延中工作期间我也一直把服从分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注意培养年轻战友要有一个观念——“时刻准备着”。在战争环境下，革命队伍需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无疑是具有头等重梦的意义；对于个人来说，也应当有这样的自觉的献身精神。鲁艺领导同志找我谈话以后，虽然那时我一心要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有从事文艺创作的计划，我却丝毫不曾犹豫，当天下午就搬到后山沟的中学部去了。接待我的是后来在晋西北牺牲了的支部书记王玉珍同志，部主任是王志匀同志。王玉珍和教员王刚、曹达两位同志，一起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带来三班学生，于是中学部就成立了。我除了作为教导员，继续聘请教员，排课程，同时兼任三班班主任，教语文课。

第一次走上课堂

我是第一次走进课堂教书，一点教书的经验也没有。那时也没有一套中学课本，都由教员自己编教材。我是从旧大学“西北联大”毕业又到新型大学抗大、鲁艺文学系学习过。

两种学校的对比，差别异常鲜明，深有体会。这些青少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烈士遗孤、干部子弟和边区群众子弟，今天学习，明天就随时要到工作岗位上去，我考虑语文教学首先要注意世界观教育的思想内容，再就是培养文学能力，因此重视选一些文学作品为范本。既从报刊上选材，也注意有一定比例的白话文和文言文。例如从《解放日报》上选了朱德的《我的母亲》，反映苏德战争的苏联潘菲洛夫的《目击记》；讲过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药》。文言文选了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较为浅显易懂的《少年中国说》，从《古文观止》中选了《邹忌讽齐王纳谏》，要青年们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爱听谄媚的话而要有齐王的觉悟，能广听群众的意见；我还讲了我自己小时也学过的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讽刺国王还不如一个小孩子敢讲真话。记得还讲过刘基的《卖柑者言》，要敢于揭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败现象。仅举数例，大致可以看到我当时的语文课教学。当时我也是一个初入社会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那时也学习写作和翻译文学作品，但在我批改同学的作文的时候则全然是一个生手，改动同学们那些天真稚气的作文，在我也很费踌躇，每每反复斟酌，才敢下笔。

我第一次走上讲台，不免有生疏之感，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边干边学，渐渐熟悉起来。

不久，延师和中学部合并，改称延安中学（后一度改名行知中学）。这

时，我仍在教育处工作，担任教职员支部书记，跟着又做了一段新来校长霍仲年先生的秘书，管全校的事务。

从自然科学学院和延师来的部分教师在审干中有冤假错案，由我做了较长时间的甄别工作，总书记王鼎勋主持召开了全校平反大会。从此我便解脱了班主任和语文教员的工作而改教政治课了。

党中央在农村、工厂、学校重建青年团的试点工作，延安中学是学校的建团试点。

我作为总支委员，负责建团试点工作，因此更加和同学们朝夕相处。遗憾的是，在战争生活的艰苦条件下，我未能坚持写日记，有一部分笔记也在战争烽火中临转移时进行坚壁清野，丢掉了。幸存有一个小小的日记本，里面断断续续记了我在延中教学、建团直到解放战争中的大转移和上前线的部分行踪。最后竟连墨水也没有了，就用铅笔写，现在有的地方也已字迹模糊，不易辨认，还掉了最后几页。今天回忆往事，它也就成为至为珍贵的一点史料了。

日本“八·一五”投降，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不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撕毁协议，急急忙忙摘桃子，而且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于是抗日烟云刚散，又爆发了一场人民解放战争。

这里摘抄几段日记，可以从中看到从桥儿沟撤退前的教学活动。

1946年8月19日

今天礼拜一，赶编后天的政治课提纲，讲边区的几个政策。此外就忙于领导学习党章了。

假期译的爱伦堡的小说，已中途搁起。

时间是以礼拜计算的，过得十分可怕。

上午，一架飞机又来侦察，也是轰炸延安后第二次来飞机了。内战正在全面展开。

8月26日

各机关刈草的第三天。学校从今天起刈草，我是随六班去；贾萌因患风湿病不能劳动。

21个人分为三组，分组出发。我跟霍绍兴组，和他们一道刈草，倒也有机会认识每一个人了。上午，到后沟往西第一个山沟进去很深，进沟时，看见石崖上有老鹰的窝，悬在没有人能去的石砭下。到了沟尽头，颇为荒凉。刈了四种草：

野黑豆，狗尾巴，谷莠子和芦草。天阴着，不热。霍绍兴和×××到山顶上去了，所以他们最后才回来。蒋文义是很沉着的，低头只顾寻草，一直在割。陈小笙也拿着一把镰刀在谷地或什么地方到处跑。王必干年纪最小，但很要强。张珍是女同学，活泼能干，也要多背。回来时，大家抢着多背。

下午热了起来，走得比上午远一倍，去的是从后沟尽头往西的一条沟。可惜是人家刈过了的地方，很不好找草。先走过一些有芦草的地方，嫌不好，但走了很远时，草并不见得比先前的好。芦草还都是杂在山坡上的草里。霍和×××又走得很远，上了山，但割来的芦草也并不多。碰到一片野黑豆，缠的艾很多，颇不好办。最后总算割了不少。

晚上，和三个小组长开了会。各组尚无问题，只是有根的草要当天铡根。决定明天留三个人在家里铡草根。

8月27日

大家都喊找不到草，因为我们割在医校后边，近处草少了，非走很远不可。早饭后，我又跟韩陆组过河南去割草。秋天了，河水很凉。过河后进了一条沟，沟底一片水和草，踩得草鞋全湿了。野黑豆很多，可惜杂草太多，特别是马莲很多，没办法用；只割了刚进沟的两边草较旺和干净一些的地方。苦于无处找草，乱跑，从无路的陡山坡攀登，山上早已有人去了。上山后，在山洼里找到一片谷莩子，大家才拔了一阵。韩陆和两个同学在下面摘黑豆。

李凡民是最小的一个，但很精灵，而且有信心，他总是走在前头。王大福则有些怨这怨那。王丽珠是女同学，很诚实地总在低头拔，不说什么。

下午，我又跟罗维明组，他的这一组和霍组一道，这回人多了，有十几个。仍走在昨天下午那条沟里，只是刚进沟处往北走的一条拐沟里。山高，一片芦草，十几个人都上去了。我和李绵在底下割。道上刘旷给了我一把镰，十分畅快；

没有镰刀十分苦。

芦草很高，深进去，有野葡萄、苦艾和其他乱草纠缠在一起；镰起处，草根下尽是很厚的终年积下的干草，——这是从没有人理过的处所。

天近黑回来，显然都累了。

8月28日

上午、下午都是跟罗维明组割草。上午翻了一架大山头，在山顶上谷地里割谷莩子，只留下我和两个小女同学——刘延令和刘迎香。她们都是极老实的、话都不会多讲的农村女孩子，只顾努力完成任务。另外的大部分同学走下山沟去。我们先回来，已是中午。

下午出发晚了些，太阳藏在云里，凉快起来。一群群走在山沟里的男女同学，虽然不知往哪里走好，只是往后一直走；因为附近的草都被搜索净尽。许多山沟和路上，都有人遗下草，说明有人去过，甚至去过多次了。我们无目的地走了比平常远一倍时还不知去哪里好。最后分开来，我们四五个人进了一条山沟，想不到沟底里毛芦草长得一片一片的，银白的穗子飘在草上面，进去草和人一样高。我于是占了一片割起来。罗维明到山坡上割其他地方的草去了。刘迎香因没有镰刀，到谷地里拔莩子。鲍克明小鬼和刘延令在看不见的另一块芦草地里割芦草，有时又在旁边的田里拔谷莩子。

我割倒了一大片，割得十分顺利。有的地方芦草上缠满了野黑豆，又长着许多黄菊花、紫鸡冠等等。天快黑了。割下的草多得没法背完，只好背了一大捆，剩下的他们背了些，又把够一个人背的扔在那里。

回来，十分疲劳。

10月9日

下了一个礼拜雨，昨天下午晴了，今天又下起来，是所谓秋雨连绵，山沟里满是雾和雨。今天又是中秋节。又是一年过去了，十分可叹。

从上礼拜六到今天，4天内什么也未做，完全学习党章，读了4天的材料并记笔记（只有昨天下午开了一个支部会），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的的思想方法论，从活的生活里求创造，十分可贵。它是人类智慧的丰富表现，是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的利器。

晚上，雨声淅淅沥沥不停，同学们分成两处开灯谜晚会。

西山地干班也在唱道情。王微、化龙（即赵正）、李绵、曹达来，大家一起吃酒、吃红枣、吃西瓜，闲谈。他们走后，外面雨声仍在不息地淅淅沥

沥，西山响起了芦管和铙钹，仍在唱道情。

这几天的日记里，完全可以看到我们那时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师生关系亲密融洽；虽然生活艰苦，却都是泰然处之而又有多种的乐趣。这几则日记里也留下了当年一些男女同学、几位教师和战友们的面影；从教学来说，我也深切地体会到，教学自然首先该是要在课堂里的言教，但确也是身教重于言教。我也只能就是以此自勉。

吊儿沟的教学

——从生活实践到理性知识贾芝

这年的11月，在得到敌人可能空袭延安的通知后，紧急动员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已成为首要任务。延中的建制也已军事化了。

一天夜里，突然通知，有消息说敌人可能于第二天空袭延安，总支书记王鼎勋半夜亲自来敲门叫我，说准备出发转移。实际上头几天已经做了转移的准备，我把养的两三只鸡也一起宰了，一切背不了的东西都处理了。我们部分教员和一些年龄较小的同学与老弱病残先走，连夜行军进沟翻山，第二天转移到了预定的目的地安塞吊儿沟。

我们到了吊儿沟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同学自己动手修建校舍。男同学修理窑洞，割柳条编窗户；女同学搓麻绳、打草帘子。第一天就修了十一孔窑洞，打了五挂半草帘子，同时组织学习、出墙报并分头到附近做居民工作；很快就把一处有前后院的小院落和附近的窑洞修整好，各班随即开课了。

我所住的一个小屋，没有窗户，我自己也在门右边的墙上挖了一个小窗户，用几根木棍钉了窗格，糊上白纸，于是亮光从小窗户射进来，正好照亮了屋角我的一张小书桌。

刚从大后方来不久的王兴林同志见我有了这么一个小窗户，到我们小屋里观察了一番；因为那时我和星华身边带着两个孩子，除各自教课外，每天还要烧火做饭，屋子里烟熏火燎，炕上地下到处都很乱。他笑着说：“唯独你的亮光下的小书桌上整整齐齐。”我在那里备课、选教材，此外还在小桌上放着一本来之不易的法文小说《冰岛渔夫》，我在业余对B388A照黎烈文的译文读了这本名著。在到吊儿沟前后，我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十分愤慨，在临走前写了一首《内战阴谋家》，并引用了惠特曼的话：“人民蔑视帝王的凶暴”（发表于《解放日报》）。12月25日，也就是修了小窗户的这天，当晚在这个小书桌上还涂了三首短诗。这也就是我的业余写作了。这些仅有的一点课余活动，把我与世界更多地联系起来。

我们在吊儿沟过了一个冬天。留在桥儿沟的同学是第二年（1947）春天敌人进占延安前，才全部撤退到吊儿沟来的。

我虽负责建团试点工作，但青年团的成立大会是冬天在桥儿沟开的，我没有能够回去参加。这期间，吊儿沟的教学也是很有特点的。

我教政治课，第一，这时除了时事教育在当时是重要的课程内容之一，主要是就地取材。我带同学们到附近农村作调查，了解农村当前的生活状况，乡政府领导生产和支前活动，陕北的历史变化，特别调查、搜集刘志丹领导

打游击同反动民团作战的革命故事。比如著名的在李家塔寨子的一仗，打得非常激烈，终于击败了反动民团。我请了一位亲身参加过打游击的刘指导员到学校里来作报告，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大窑洞里讲当年陕北打游击的动人经历。那个大窑洞从此成了全校上大课的教室。这也就是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学方法。教语文课兼班主任的宁汉戈同志，看到下乡调查这个办法好，就同我联合起来，我们一起策划组织同学下乡作调查。同学们搜集了刘志丹领导打游击的革命故事及其他社会调查内容，在我就是讲政治课的内容；在他的语文课，作文也就都有内容可写了。我们还共同出墙报，很吸引读者。

第二，由于延安中学具有干部学校的性质，学生随时要听候调动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去，无论将来干什么，首先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既要培养同学们有献身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又应培养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习惯于深入人民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要力戒产生像我从前上旧大学时代，一上学成了知识分子就越来越同工农群众距离拉远，以至格格不入的那种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所以在革命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我主张一边进行课堂教学，一边要走出学校与群众交谈。过去在延安也早有“娃娃先生”办冬学的优良传统。所以那年冬天，我们带同学到农村去教冬学，并且参加乡政府的会议，参加群众的节日活动，过年给群众写春联，等等。只要一到群众中去，对边区的生产、生活、群众支援战争的活动、陕北的历史等等，就会了如指掌，获得很多新鲜的知识。同学们初与群众接触，也有从彼此生疏到交朋友的深刻体会。

吊儿沟这段教学，基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和与群众相结合这两把钥匙。有人总结说我们是“说”、“学”、“做”三合一，是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的学习方法，这话不错。

确实具有这些特点，而且始终贯彻了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这段教学也曾引起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注意，曾派人来了解我们的一套教学做法，还看了墙报，很表称赞，在当时是政治、语文课教学改革的一个典型。

关于吊儿沟时期的教冬学、年节给群众写春联等活动，这里再摘几则日记如下：

1月17日

腊月二十六日，雪天。

寒假后参加乡村工作，今天是第三次出发到乡村里去。第一次去的是庙岩，第二次是延属的梢嘴子沟，今天仍去庙岩。

这两天来，同学已在这里开始教四个娃娃识字，一个杨姓的女孩子，一个贺家的女孩子，和姓米的两个弟兄。（略去对这几个孩子及识字情况的介绍）

先是去到杨家。炕上坐着母亲和父亲。母亲在补棉裤，父亲在缝破了的鞋底。母亲骂女儿不该一边识字一边笑。父亲总在带着一副笑容。我们只谈了寒暄的话，教完他们的女儿和米家的两个孩子，便去到贺家。

贺家的男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坐在炕上数钱票；米得智也坐在这里，手里在挑毛袜，有时递给贺，叫他看挑得对不对。闲谈中我问了他们五月初五以内老乡们出门不？外人能不能来？他们说可以来。

说起识字的问题，米得智讲了一个他小时和一个同伴砍薛生华的树的故事。他叹气说，人家现在和他不同了！（那个同伴现在是蟠龙的区干部）他说，现在心思就在他的不知该怎么过的问题上：过年后揽工呢？还是自己

租地种？等等。他说，目前和杨家（庙岩最富的一家，不是学识字的那个杨家）讲好，过了年后变杨家的牛工，但昨天杨家又不愿意干了。他说：“有钱的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一会儿，说曹操曹操就到，那个杨家却来了。瘦高个，微有髭须，他是杨家的老二。当我背后席同学和贺家婆姨、娃娃拉话说笑的当儿，娃娃问起杨家老二他的两个女孩子念不念书时，他瞪了一眼，说：“念不成！因为一个是聋子，啥也听不清；一个是‘结巴子’，口不伶俐。”当他进来时，贺正对我谈着安塔一个地主怎样怎样；话才开头，杨一进门他再也没往下谈了。我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便没有再追问，留待以后再探听。

到窑里来的还有一个总患扁桃腺发炎的胡家一个青年，20多岁，只有一个母亲。他说过年正月二十七他就要娶婆姨，而他去年问婆姨时花了十二石小米和麦子的财礼，连最近又要的一石八斗，一共十三石八了。明年春天婆姨过门后就没有吃的了。

最后来了一个张村长。他是从白家河来。看见人不少，我们谈起时事来，米得智要求我把报上的消息讲一讲。关于横山解放的情形，他知道得很清楚。贺数出我们已经解放了九个大村镇，杨说是“开”了九个大村镇，他家在那里买得有几十垧地。

看来识字课本很不合用，太深了。开头不如从最容易的日常用的字如水、火、山、牛、羊、人等单字教起；如果旁边画个红绿画，就更好。

晚上参加去张家村等的那个组的汇报会。每次总是听到些新的事情。

1月27日

雪已晴。同十八班同学到茨儿沟给老乡写对联。由于昨晚听到十四班汇报，说老乡们不愿意你给他写新对联而要写旧的，颇觉是一件伤脑筋的事。道上我就谋虑怎样对付这个工作。要有迁就，但必须增加些新的，用旧的也得选其中较好的，或略加修改。总之，要使他们乐意接受一些新的教育，扫除一些毒素。

果然，四儿沟的老乡好像和七八里地以外的老乡商量过似的。当我进入一家抗属家里，刚坐在炕上准备写对联时，20岁的年轻主人就提出他们要写旧的，不要写新的，并且匆匆忙忙要去找一个旧本子来。母亲在旁边也嚷着叫儿子到什么人家里去寻对本去。

我说：“好，你寻去！”我表示旧的里边也有好的；反正神位之类我是决定给他们写了，只希图在对联横额中夹一些新的进去便好了。主人不幸没有找回旧对本来，因为对本的主人嫌麻烦，干脆说找不着。我想这下可该写新的了。但主人却背出一副来要我照写。

该对联是：

门对青山水长流

荣华富贵不断头

头一句确系他家门前的自然风光，虽然山并不青；后一联就很有些糊涂的宿命论观点了。我说：“横联写个‘民主幸福’好不好？”他没有反对，说：“好。”窗上的对联，我先征求他的意见写什么，他不能背出第二副来，便说随我写什么。

我就翻开冬学识字课本来对他说：“我给你写一副新的你看好不好？”是这样一副：

丰衣足食春光好

女织男耕喜气多

他听了我的解释，觉得说的是吉利话，就连声说“好。”

为难的是给财神爷写对联，我一时不知该写什么，他也背不出来。我于是自己编了一副写在纸上征求他的意见，对联是：

劳动生财全家福

勤俭起家光景新

他说：“一半靠人，好，好，好！”我很惊异这个青年的理解力；他的脑子里全是神是一家之主，而“一半靠人”这个“人”的力量他是没有理由不承认的了。

李××已经来看过几次了，我觉察出他是来看给这家写的是什么。他一字不识，但是他一面问年轻的主人给土地神写了没有？“抬头见喜”写了没有？等等，一面有的似乎他也认识，拿起来辨认说：“‘出门见喜’也写了，灶君神位也写了。”等等。农民们对他们每年都贴些什么对联、斗方早已看熟了，他们不认识每一个字，但能看出大样来，知道几个字……他又问主人门对联写的是什么？主人说写的旧的，是他背出来的。

李××放心地把红纸拿来了。怪！他也背给我一副，叫我照写，那对联似乎是：

大地山河千古秀

××日月万年春

我装了一个糊涂，我说：“你说的我解不下，你把意思给我讲讲，我就知道字该怎么写了。”他说：“深哩！”他也解不下是啥意思。主人替他想了半天也解不下那对联是什么意思，他也没法翻译给我听。我说：“你不懂是什么意思怎能知道它好不好呢？”“好，旧的好。”他坚持说。我说：“旧的里边有好的，但有的不好。你门上贴的对联你总该知道上面是什么意思，过路的人看了也能晓得是什么意思才好。”主人接过来说：“不懂意思要把字写错了不好。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谁知它是好是坏哩。”这一下李××孤立起来了，脸上显出迟疑之色。我心里把一副对联修改了一下，缩成7个字（他只要7个字！）写在纸上念给他听，问他好不好，对联是：

学习文化腹藏玉

发展生产土生金

因为他的儿子也在学识字了，这对他家的情况还算适当。

特别是有黄金之类的意思，全是吉利话，虽然不是旧的而他又背不出一副旧的来，他同意了，主人在旁边也说“好。”这就加强了他愿意放弃写旧的意念。

这一课我总算上完了，是旧的加了些新的！

两家的对联写完，天已暗了下来。

1月24日

古历初四日。同学们分头到老百姓家拜年，我与邓润音及一个同学到后茨儿沟。走过茨儿沟，在湾沟里走了相当久，有时在雪上，有时在冰上。

到胡家，正好……（下略）

2月1日

今天和同学张斌文、×××，到苟家川参加乡政府的村长会议，离吊儿沟10里路。

原说是谈土地、春耕问题，结果是谈去年没有结束的粮草工作、给军队送菜、肉以及正月里禁赌等问题。（下略）

也是仅举数例，从中可以看到当年我和同学们下乡作调查，学习为人民服务 and 就地取材进行教学的一些情况。这同正规制中学有一套规定的教材并且要求有升大学的基础科学文化知识自然很不相同，我们只能是从战争环境的实际出发，培养献身革命的青少年们；这种教学，即使是对今天的青少年教育，也未尝没有可供借鉴和吸取经验的地方。

战争中边行军边教学 1947年3月，在胡宗南反动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前5天，3月8日，边区政府命令延安中学改建为第四后方医院。

由五个班的师生建成为医院的五个分所，分布在吊儿沟附近的几个村庄接收伤员。

班主任宁汉戈、赵正、苏子休等任所长，同学们有作指导员的，有做管理员的，有当护士长的，大部分同学做护士。以女同学居多。岗位不同，职无高下，一律服从分配，积极投身革命战争。这可说是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效果最生动的一次表现和严峻的考验。留校的一部分师生不久也从吊儿沟开始了行军大转移。在行军转移中我是负责老弱病残的。

3月23日离开张川，在敌情紧张下翻山涉水，日夜难安，绕了有整一个月之久，到了志丹县侯家河。这期间，在安塞涧峪岔住时，边区政府由教育厅高云屏来信通知要老弱病残、妇女一律就地疏散。鉴于已有的经验，母亲们都不同意离开队伍，因为外地人口音不同，装扮也与当地不同，不易在群众中藏身。由于做母亲的不便留下，有一天在走到一座高山上路过拓家洼时，我们只好把1岁多的女儿伟林送给了拓家洼的老乡，跟在我们身后的晓林，一见把她的妹妹送了人，大哭了一场。在行军转移中，每逢住下来，照常上课。

在侯家河的一个多月，不仅上课，还进行生产，开荒种菜。这时，在青花砭、羊马河、蟠龙连续三大战役给了敌人以迎头痛击之后，5月14日在安塞真武洞开了祝捷大会，前去参加祝捷大会的寒十波和安琪同志，回来还和我们一家挤在一个老乡家里的小炕上过夜，闲谈了很久，形势是让人振奋的。

5月14日，我由苟家川转移到医院五所的新地点古庄库，医院李政委要我到附近的中庄做俘虏工作。已经集中在中庄那个山沟里的一部分解放伤员，共30多人。只有我和一个管理员两个人工作。管理员每天外出采购粮食、菜蔬。我因刚去路不熟，当晚在半山拐向另一个窑洞去看伤员，拐弯时不慎一脚踏空，滚下山沟跌在一眼窑前，腰受了伤，遂与解放伤员日夜躺在一个炕上。医生来看过我的腰伤之后，拿出一瓶红汞药水，但还犹豫有些舍不得用的样子，那时有红药水也很不容易，我说：“别给我搽，留下给伤员用吧！”我的主要任务是了解俘虏伤员的情况，向他们讲明政策，凡愿意回家的可以发路费。除了一个自称是在宝鸡被抓兵来的，一再强调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之外，没有一个提出要回家的。不久，有19名解放伤员要归部队，部队派人来接他们，我还给王震同志写了一封信。其余伤员后来转到宁汉戈的古庄库五所。有一天月夜，我也参加了由宁汉戈所长主持的全所欢迎伤病员娱乐晚会。

6月6日，在敌人以安塞为目标妄图聚歼党中央指挥部的时候，我又随学校从侯家河东撤，当晚得讯，敌人正向我们方向走。这时，应东进？还是应西撤？途中遇到的人意见不同，举棋难定。由于敌人分几路齐头并进，主攻方向又不断变化。在毛主席的战略指挥下诱敌深入，把敌人装在口袋里打，

学校从吊儿沟北撤，后又一时西撤，一时又自动东撤，每天七十八里，也总是离敌人很近。有时夜间还看到对面山上敌人的篝火。为防敌机轰炸，我们白天休息，夜里行军，有时夜里休息也往往只能是和衣而眠，一有情况，翻身而起就出发。那时我们只带着晓林，她和王刚同志的女儿小艾，行军时两人驮在一头毛驴上的两个筐子里，一人在一边，她们两人还聊天。夜里一有敌情，叫晓林一声，她从老乡炕上爬起来就跟我们出发，一声也不哭。就这样经过十几天的急行军，又到了马蹄沟附近的霍家渠。在霍家渠又住了一个多月，照常上课。这种在战地又行军，又上课、生产的学校，历史上也少了吧？所以老乡也说它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学校”。

7月间，学校撤到葭县的高家畔，准备过黄河到晋西北。

这时，中央领导同志也在葭县。敌人要进攻绥、米、葭、吴，我方则要把敌人吸引到无定河以东消灭。

7月31日这天，边区政府忽然通知我去榆林前线，准备打下榆林后接管学校。当天下午我和地理教员张思俊、理化教员王兴林二同志一起出发，天黑到了马蹄沟。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部队开往前线的状况：大队人马，前前后后，威武壮观。我的背包仅只是一条薄被、一件破灰棉袄，另有一个挎包，手里拄着一根枣木棍子——这对我走夜路，上山下山，是最重要的向导。第二天看到了无定河，两岸平川，林木葱葱，风景如画，而这正是有名的古战场。头天下午，无定河上的桥被炸毁了，我们摆渡过河，沿河上去一百四五十里就是榆林。

我经历了炮火连天的战地生涯，参加了为时8天的榆林战役。敌人包围葭县的突围中，我参加下乡动员粮食，还曾经在一个山坡人家门前，一边端着碗在赶吃一餐晚饭，一边看对面山顶上敌人从南往北的单列长队走过；听到有炮声的地方，正是沙家店战役在交火。这都与教学无关，这里就长话短说了。

我们没有打开榆林，我即随军南下。在葭县突围后，一天夜里我们路过一个山腰，正是胜利后的沙家店战场。部队向宜川进发，中途我一个人在葭县过黄河，手中还拿着那根枣木棍，到晋绥去寻找学校。

1991年8月18日 贾芝

男，1938年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经济系，同年去延安。曾在鲁艺学习和工作。1943年，任延大中学部教导员、教师、三班班主任。1948年任延安大学文艺系副主任。解放后，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和领导工作，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秘书长、副主席、首席顾问。1981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民间文学论集》、《新园集》、《贾芝序文集》及其他论文多篇。译有小说《米特利亚·珂珂尔》、散文诗《深夜》等三种。主编《解放区文学书系》民间文学编、说唱文学编及其他书刊十多种。1980年参加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现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主席。1952年获广西柳州土改“甲等功臣”奖，1984年获芬兰《卡勒瓦拉》银质奖章。研究员。

两件小事

何礼口述郑延记录

1944年10月，我正在参加“边区文教群英会”的时候，国民党要来个议员团，到陕甘宁边区调查，看陕甘宁边区是否实行民主政治？他们是来挑毛病的。那天，我到边区大礼堂开会，周恩来副主席作报告，他说：“对待他们的来访，我们总的方针是：‘争取过来，宣传出去。’”吃午饭时，有人通知我到胡乔木同志那里去，那时乔木同志是中宣部副部长。吃完饭后，我立刻去到乔木同志那里，问他找我有何任务？乔木同志说：“你坐下来慢慢谈。”我坐在炕上，他在地上走来走去。他说：“这次来的代表团里有个王云五，他是搞科学管理法的，是搞正规化的。延安中学是为抗日和民主建设而学文化，不同于国民党的正规化中学。现在，延安中学的校长霍仲年是本地人，你去做副校长。”我说，我知道王云五这个人。乔木同志说：“要按周副主席提出的方针办。”我说：“好！”

我什么时候去？”他说：“吃过晚饭就去，延安中学有人带牲口来接你。”乔木同志最后还殷切嘱咐我：“延安中学干部子弟多，各方干部都有，出一点事，一周之内，上到中央、西北局，下至延属地委、延安县，满城风雨都知道了，所以应注意：不要出事！”

延安中学干部子弟约占2B3。干部子弟每人每月供给3斤肉，有人主张干部子弟和群众子弟分开吃饭，这很不好。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一位同志举行婚礼时，我见到了周恩来同志。我向恩来同志汇报了这个问题。恩来同志说：“无论如何使不得，不能让他们分开吃。将来谁学得好，谁学得不好，还不清楚呢？”他还举了斯大林的例子。斯大林的儿子在初中念书时，一个外国记者知道了，特别去采访了他。记者走后，斯大林对学校同意记者采访他的儿子很不以为然，遂把学校的领导请了来说：“××同志，你做得不对。我儿子的存在是作为一个公民而独立存在，并不依靠我的存在而存在。将来他是什么资质，要由他自己的努力来决定。”我回到学校，把周恩来同志这番话讲了，霍校长听了也高兴极了。于是我们把总务处长田子玉找来，告诉他：肉照样领，干部子弟和群众子弟一起吃，按班级分桌，并要通过总支对干部子弟进行教育。群众子弟对学校这样做很满意。于是，师生皆大喜欢。

1945年春天，延安中学出了一件事，淹死了一个学生。学生的家长告学校的状，告到毛主席那里。事情是这样的，3月间，延河的冰刚化一点，天气还是挺冷的。延安中学的干部子弟每周六下午都回去与爸爸妈妈一起过夜，星期日下午回校。那个星期天，有三个学生一起相跟回校，其中一个山西的干部子弟，不大会游泳，可他胆子大，他一个人顺着河往下游，快游到延中的时候，碰上了石头岩，水流得急，一下就不行了。另外两个孩子吓坏了，急忙乱叫，但周围没有人。

这时，天快黑了，一个孩子守在河边喊救命；另一个孩子跑回学校去报告。总务处两个会水的同志赶到河边去救人。赶到那里时，已看不见人影了。我们又组织了打捞队，连夜打捞，还急速向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汇报，并通知了学生在党校学习的父亲。田子玉熟悉地形，在延河下游浅水处筑了三道防线。第二天，又找来两个水性好的老乡，请他们帮忙打捞。老乡喝了烧酒，扎猛子下去摸一阵，上来再下去，直到近午11点才摸到了。水流急，人被夹到石缝中了。把尸体打捞上来以后，霍校长说：“埋葬要按照山西的风俗，要隆重一些，准备新衣服和棺木，还要布置追悼会。”下午两点钟，学生的父亲来了，神情非常悲伤。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一起回

校的两位同学和打捞的人也向他介绍了情况，大家心情都很沉痛。下午4点多开了追悼会，霍校长主祭，党总支书记王鼎新念祭文，奠了酒，烧了香。林老的秘书陈昭同志也来参加了追悼会。会后把死者葬在西山一个向阳坡上。

事情办完后，天已黑了。我们留学生的父亲吃饭，他不吃，我们派人用马护送他回党校。他走后，陈昭同志对我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是个损失，但也只能这样办了。”他这时才递给了我一封信。一看信封是党校二部给毛主席的信，原来是孩子的父亲给毛主席写的信，信的大意是：孩子死得太冤枉，这使他心中非常悲痛。这个孩子成长实不容易，他在山西打游击时，把孩子带在身边，他到党校来学习，又带他到延安，让孩子到延安中学学习。没有想到延安中学不负责任；像这样的党员校长，应撤职严办……。

信的口气很重，看来对学校意见很大。毛主席在信纸上面批了这样几个字：“延河死人，此乃常事，请林老处理。”下面签名是毛泽东。我看了一方面心中很沉重；另一方面也很感动。陈昭同志说：“林老说给你看看这封信和毛主席的批示，就不要给别人看了。”事后我回想一下，自己的责任不大。我们学校凡新生入校，注册之后，都要带他看看学校周围环境。到延河游泳，也是要求由老师带领。延河死人的事，我们也常常谈到。尽管如此，事发以后，我们在全校展开了讨论，这样死于不谨慎，是没有价值的，要大家从中吸取教训。

（金茂年摘编） 何 礼

男，生于1912年1月29日，原籍四川郫县，出生于云南宁安。1937年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系毕业。从“一二·九”学生救亡活动起长期从事青年工作。曾在延安任中央青委干部科科长。1944年9月任延安中学副校长。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曾任东北局社会部一处科长、哈尔滨大学副校长、哈尔滨道里区区委书记。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1963—1984年，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后任顾问。著有《一二·九运动史要》。

我们女教师们……

史尼

半个世纪过去了，《延安颂》豪迈响亮的歌声却时刻荡漾在我的心际，依然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悦耳赏心，那样的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我，当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九·一八”后流浪到北平，“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随着“红旗漫卷西风”的光辉历程，从延河走到鸭绿江，又从运河跨过长江……

7年的延安生活中，给我深刻影响的一页是延安中学4年多的教师生活；在那里，我生养了一儿一女，同时教育着一代延安人民的子女。这段生活，冶炼了我一颗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丹心，也得到了“桃李满天下”的最大的欣慰。

1941年9月，我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二班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延安中学的前身边区师范。当时教员中许多是学识渊博、教龄长的同志，有教育

学教员李奇同志，到延安前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历史教员周慈民，学有专长；美术教员钟灵，粉笔一勾一画，即呈生龙活虎；地理教员鲍侠影，早年是“乡村教育社”的积极实践者。这是一支来自五湖四海又饱经革命烽火锻炼的教师队伍。

年仅 22 岁、初入教育队伍的我，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着。

李奇老师指点我说：“要慢慢改变自己的学生腔。教师语言的特点是一字一板，抑扬顿挫，有节奏感。不能只顾自己嘴巴讲，必须观察学生的神态，与他们的心相通。”短短的话语那么亲切，那么一次开学典礼会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柳湜赞颂道：“这里集中了全国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英。”

是的，这支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尽心尽责地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为党的教育事业日夜耕耘。

使我终生难忘的另外一件事，是徐特立在土窑里同我们座谈时讲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及“诲人不倦”、“因材施教”的平凡而精辟的教育理论。他还高瞻远瞩地说：“在这黄土窑洞里，你们是在为建设新中国培育栋梁啊！”最后还风趣地说：“我徐特立也没想到当年我的学生毛润之，今天成为毛主席，还说我永远是他的老师。”一席话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1941 年暑期后，教务处公布教学计划，强调“正规化”。

当时建立政权仅只 5 年的边区政府，虽然重视教材编审工作，已出版农民识字课本、小学课本，但还不可能在短期内赶出中专、高中教材，我们只能一次次地到那仅有两个窑洞、藏书不及 300 册的图书室。沙里淘金般地查找资料，编写教材，并且自己刻蜡板印刷。没有地球仪和地理挂图，地理教员鲍侠影自己动手描绘出一张张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绘图的马兰纸粗糙又不结实，她苦心一层层裱上报纸，上下课夹在腋下，回到自己窑洞高高地放在墙上钉的木架上，唯恐弄坏了。数学教员曼秋、潘同和用麦秆做立体几何图形，捡旧纸壳做三角形。我们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就地取材，做些简易教具，力求直观地具体地教学生掌握知识。

40 多年之后的今天，当年的延安中学的学生们，通过他们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的实践，证实了那段教学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经验是可取的。

那时的工作和生活，真可谓苦中有乐。

我们教员宿舍窑洞约 14 平方米，一张办公桌、两个长凳架上几块木板的床，一张独凳。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盏小麻油灯——在一个小木架上放的一个土陶小碗，中间放上棉花芯，浸在半碗麻油里，另一端搭在碗边上燃着亮光，每天定量半碗麻油，还没有现在的蜡烛亮。我们就在这小麻油灯下，编写讲义、备课、改作业、制教具、读书学习、纺线线。还有那支“特制”的钢笔——削一根与筷子粗细的小木棍，用线将钢笔尖缠在木棍上制成的蘸水钢笔。我们就是这样培育着革命的下一代。

我刚到延安中学时，女教员中只有两个人有小孩。记得李奇老师一次下课回到自己宿舍，打开窑门哈哈大笑说：“你们瞧！我的小珠像水塘中的泥鳅啦！”原来她那仅 4 个月的小女儿屎尿滚了一身，小脸蛋上都是屎。她即刻放下讲稿，去为女儿擦洗。

小孩一年年多了，当妈妈的女教员担子也重了，必须干的第一件事是在自己窑门侧挖一个小窑似的小洞，给孩子修个小灶便于烧水，煮吃的。女教员们在起床铃响前一小时起床，洗尿布，包裹孩子，给小孩子穿戴，又不

能误了上课。白天课外活动时，别人打篮球或下棋，女教员或提筐筐到大灶伙房煤灰堆里捡煤渣，或提着土瓦罐到山下小河提水，就像机器人一样不停地忙碌着。总务处安排：有会走动小孩的，三家或四家配给一个小鬼（小勤务员），哪位上课，小鬼就看着哪位的孩子，遇上两位或三位同时上课，就把两三个小孩拉到一处看着、守着，吆喝着：“莫跑！要跌下山坡啊！”至于6个月以下的小孩，小床是他们的天地，爬不出，跑不了，哭几声，尿几泡没关系。即便是年轻的妈妈在自己窑里备课、改作业时，也无暇围着孩子转，逗孩子玩。条件促成了训练孩子好习惯，4小时喂一次奶或饭，尿湿了换尿布。哭嘛，“锻炼肺活量”，随它去吧。

“哦...哦...”叫几声当成歌给孩子听听。有时妈妈聚精会神地备课，孩子哭一阵累了，又呼呼睡着了。那小小鼾声似乎动摇不了妈妈专心致志的心。

生活条件苦，工作担子重，几个女教员生小孩后孩子没奶吃，她们就买只山羊。早上挤了奶喂点草，用根长绳子牵到窑顶的山上拴住。担心羊跑了，有时匆匆去看一下。

天黑了，再把羊牵回来。羊儿咩咩叫，孩子哈哈笑，妈妈又给挤奶啦！

每天上课、备课、开会、喂小孩、洗尿布、捡煤渣、挤羊奶.....忙完了，晚上八九点钟后把孩子包裹好放在小床里，妈妈又坐在纺车前，“嗡嗡、嗡嗡、嗡嗡.....”的纺线声成为婴儿听惯了的催眠曲。

我于1942年至1945年在延安中学生养了一儿一女，加入了妈妈的行列，承担着又教书又当妈妈，又捡煤渣又放羊的生活，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作风和刚强的意志。

“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组织部调我首批返回东北。8月25日，我把3岁的女儿送到延安保育院，走出窑门下山坡时，听到孩子的哭声，无暇再看一眼。9月1日下午，又把一岁半的儿子送到延安李家渠一家农民家里，为让养母了解孩子的生活习惯，我陪儿子住了一宿。9月2日天破晓，我即随东北的干部大队离开了延安。丢下了自己的儿女，没有惜别的眼泪，我只知为了胜利的明天跟党走。 史尼

女，原名张淑容。1919年生于辽宁省西丰县。“九·一八”后到北平，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到延安，1939年入党。

曾在延安女大学习。在延安中学任教师兼教导员4年多。“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赴东北，在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任编辑。1949年底南下进川，曾任地区文教局长、地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教育研究室主任、教育学院院长等职。

我和我的学生们

曼秋

1941年8月底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媚。在往延安小砭沟边区师范去的土路上，一辆马车拉着行李，十来个男女青年有坐车的，有步行的，边说边笑地往前走。这是边区师范派专车接我们这一批新教员的。其中有李

经纶、煌颖、余明、史尼、林萍和我。

史尼是位爱开玩笑的女同志，她坐在行李车上面笑着说：

“咱们都是成双成对的，只有曼秋是个光棍汉。”逗得大家都笑了。

那年我虚岁才 20 岁。

我们行走没有多久，就来到了边师。只见在山坡上随着山势弯弯曲曲地连绵着一排排土窑洞。窑洞前的波斯菊、熟季花正在盛开，为我们的住地增添了色彩。

校领导和老教员们迎接我们之后，便各自进入自己的窑洞。我的小窑洞只有两米多宽，3 米多深，窗前一张桌子，靠后墙一张单人木板床是用两条长凳支起来的。另有两三个凳子。所有这些家具都没有上漆，但在当时已是对教员生活上的优惠待遇了。我们对此也是很满意的。

我是 1939 年 3 月到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在赴延安前我是高中程度，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中断学习来到延安，先后曾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那时能入延大学习是再理想不过的事。可现在要分配我当中学教员，能胜任吗？我同几个同学曾一起找校领导，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愿去工作，愿意继续学习。”但没有得到同意，我的心凉了半截。

原来教育厅是为照顾我右腿摔伤骨折过而留我在延师教书的。从此，我就进入了教员的行列。

开课后，日渐熟悉，各方面都得到大家的关心与尊重，我也就安下心来。我上了一段课之后，学生反映还不错。可我唯恐同学和教职员因为我年岁小而瞧不起我，我尽量处处事事表现得老成持重些，也一直不愿讲出真实年龄。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一个同学见到我的履历表后问我：“曼教员，您才 20 岁呀？”我含糊地回答：“20 多岁了。”红着脸笑笑。

在边师、延中，我先后轮替教过算术、代数、几何。手头能找到的几何课本，只够一个学年用的，而几何课中定理与定理之间的衔接性又非常强，必须有前面学过的定理，才能求证出下一个定理和命题。要将平面几何前后的几个组成部分都讲到，就不得不压缩内容。既不能有漏洞，又不要简化，这对于我这个初次教课又没有编写过讲义的青年教员来说，确实是个难题。我只能翻翻仅有的几本书，在记忆中拚命搜索、回忆，尽力达到上述要求。

在编写教材中，遇到不同情况和水平的班级，不得不因人而异地增减内容，修改教材的分量和难度。

例如 1945 年春入学的新生很多，一年级就分为八、九、十、十一 4 个班。分班原则是根据成绩来的，成绩最好的是九班。我负责九、十两个班。

九班的学生大部分是正式五年制小学毕业生，他们的入学考试成绩都属于优秀。对这样的学生如果仍然从加减乘除教起，似乎没有必要。如果不讲吧，又不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这个教材怎么编？！我根据自己学习的经验体会，在教加减乘除时，从内容上提高一步。如：加减法，我就教循环小数的加减法，这样既符合大纲精神，又增加了新的学习内容，还使学生加深了对循环小数的理解。

这一问题解决了，又遇到新的问题。同一班的学生也有三种情况。像九班就是这种情况：一是干部子弟。他们多数是保育院小学、抗属子弟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的。这些学生年龄小，文化程度较齐，较好；二是来自工作岗位的警卫员、通信员、勤务员、保姆和干部等，这些学生年龄大，文化程度较低、较差；三是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是边区各县小学毕业生，他们的情

况居上述二者之间。

这些情况给教学带来困难。于是，我尽量到学生中进行个别辅导。针对他们的难点多方启发诱导。有时同学也找我提问题，我是不轻易回答应怎样做，而是诱导他们多动脑筋，多思考，开拓思路，做到自己求得正确答案。

当初，我对当教员缺乏信心，怯堂。

教育家徐特立针对年轻教员的怯堂心理，讲自身体会说：

“当教员并不难，最重要的是备好课，相信自己，到课堂上大胆讲述。这样是会受学生欢迎的。”通过教学实践，我逐渐增强了信心，还真爱上了这一行。

事隔几十年，前不久原延中九班学生李骏来我家，谈起当年延安中学生活时，她说：“在延安中学学习时，数学基础打得牢。虽然由于战争没有继续读高中，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我直接进入药学院学习，能够将高等数学微积分攻下来，还是与那时的数学基础分不开的。”

1947年春，我和我的学生们，从延安东郊景色如画的桥儿沟启程，在美制蒋机的狂轰滥炸下，在延安南线的清晰枪炮声中，轻装前进，走进了神圣而光荣的保卫延安的战斗行列。

这是一条奇特的青春之路。我带领我的学生走着；走在烽火燃烧的延河两岸；走在血染的黄土高原；我和我的学生们肩并肩地走…… 曼秋

男，现名王颖之。延中数学教员。曾任兰州军区总医院副政委，驻兰州铁路局军事代表处副政委。在报刊上发表论文数篇。

杜谈老师

李一克

刚走到影院门口，电灯骤然关闭，在一片漆黑中好不容易找到了座位，银幕上就推出了片名：《翠岗红旗》。小孙女扯了扯我的衣襟，轻声地讲：“奶奶，这是以前的老片子，你已经看过了，干吗还要看呢？”我说：“影片生动、逼真、感人。”她噘着小嘴嘟囔着：“老看，有什么意思？”“越看越有意思。你还不知道，这是我们延安中学杜谈老师的杰作。”她不做声了，认真地看着。我却由影片想到老师、同学，想到延安中学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岁月……

1945年7月，我和同学们迈入延安中学的大门。迎接我们的是两位男老师。他们二位都是中等身材，一位穿着整齐，精神抖擞；一位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们满面笑容地迎接着我们。那个挺精神的老师介绍说：“这就是你们的班主任杜谈老师。他从上海来，原来在左联和周扬同志一起工作。”周扬是很有名气的人物，要不介绍，谁会想到身边这位杜老师来历还很不简单呢！仔细看他，文质彬彬，说话和声细语，白净的圆脸盘上有一双笑眼，倒真是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只是胡子不刮，衣着不整，显得有点老气横秋。

杜老师一边热情地接过我们的背包，一边说：“你们告别了保育院小学，进入中学，又长大了，要学会管理自己。”接着他给我们分配住房，直

到——安顿好我们后才离去。

我们毕竟还是未脱稚气的孩子，杜老师刚离去，一位同学便别出心裁地叫着：“杜老师——杜谈。”然后恶作剧地做了一个怪样儿，“呸！”吐了一口痰——“吐痰”。于是杜老师——杜谈——吐痰就被连在了一起，“吐痰”成了杜老师的绰号。杜老师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可他总是宽宏大量，容忍一切。一天下课时，杜老师刚迈出门坎，一位同学就朝他身后吐痰，喊着：“吐痰。”全班多数同学看了很生气，为老师打抱不平，指责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老师？”杜老师却回过头来憨厚地一笑，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对于同学欺侮同学的事，他却是严肃对待。一次，两位同学发生磨擦，一位同学挖苦嘲讽地说：“你神气什么？谁不知道你是保小有名的调皮学生……”杜老师听到后批评了他，指出应该好好帮助有缺点的同学，绝不能恶语伤人，并启发同学要自尊、自爱、自强不息。杜老师以他的言行使我们懂得了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爱心，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共同进步。

我们住在桥儿沟山上的一排排窑洞里，食堂在山下，每天下课后，我们总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土路下山吃饭。一次，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山上的土路泥泞不堪，大家什么雨具都没有。吃饭的时间到了，男孩子脱了鞋，挽起裤腿，有的穿着自制的木拖板，一边说笑，一边像坐滑梯一样滑下山。我们女孩子可真有点发愁，有的怕弄个满身泥水；有的宁愿饿一顿，也不想下山吃饭；有的女同学月经来潮，怕秋雨淋湿着凉生病。这时，杜老师来到女生宿舍，转了一圈，一声没吭走了。过了一阵，只见他头戴草帽，一手提着瓦罐，一手拄着树棍回来了，挽起的裤腿下露出沾满泥巴的赤脚，浑身衣服湿淋淋的还在往地上滴水。他一进门就满面笑容地说：

“快吃饭，趁热吃吧！”女同学正饿得肚子里咕咕叫，说了声：

“谢谢你”杜老师。”就不客气地打开瓦罐，盛出热腾腾的小米饭、南瓜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杜老师看着她们吃得那么香甜，笑吟吟的。但当她们看到杜老师满身泥水，气喘吁吁的样子，都停止了咀嚼，两眼流出了热泪。

杜老师教语文，讲得很认真，让我们领会每一课的政治意义与写作特点。在一盏小小的麻油灯下，他批改作业常至深夜，在每本作文本上都写下评语，对我们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深深的爱。李一克

女，现名史一克。延中十二班学生，国务院直属机关处级干部，中国第二届档案学会理事。

一堂未讲完的课

李光朱

我总认为世界就数中国好，中国就数延安好。延安中学是我毕生眷恋难忘的地方。

正是从那里出发，使我沿着知识和人生崎岖的山路，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阳春三月的一个上午我们那孔用土窑洞做的教室，显得那样暖和、那样明亮。上课铃已经响了，大家正安静地等寒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寒十波

老师平素讲话和上课，总是谈笑风生，喜怒哀乐和抑扬顿挫也很分明。今天要讲的课文的内容，是一个河南贫苦农民给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的儿子写的一封信。寒老师今天站在讲台上以后，显得有些沉默和忧愁。呆了片刻，他环视了一下教室，才开始既低柔又严肃地朗诵课文。当他读到因天灾人祸，致使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的悲楚情景时，声音越来越低，而且开始有些嘶哑起来，教室里呈现出一种不平常的肃静。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竟声泪俱下；同学们也都个个在揩鼻涕眼泪，直至他泣不成声时，同学们也都跟着哭开了。最后他勉强地说：“今天讲不下去了，你们自己看一看，明天再讲。”说完他就低着头，轻步走出了教室。教室里仍然是那样安静，只听见低沉的擤鼻涕声、咳嗽声和沙沙的翻书声。

当我把课文看完后，不禁脑子里也不停地想起国民党的军队把我们家洗劫一空后，我母亲带着我哥哥、我妹妹和我投靠亲友时的悲惨情景。想到1942年秋天，一批批的难民从河南逃到我们学校周围农村的情景。

我也想到了杜甫的名诗《石壕吏》。在学完这一课后，寒老师给我们出了《记一件悲痛的事》的作文题。我写的是《我父亲逝世后》。写的方法是，将我认为那封信中好的结构，好的词汇，用来把我在我父亲逝世后的各种悲楚感受，思谋着组织起来，然后写在草纸上，再边看边修改，直到觉得再没有可修改的了，就誊到作文本上。经寒老师批改后，作为范文在班上选讲。此后，我写作文，写文稿，以及写工作总结、报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和方法进行的。写作逐渐熟练起来。不久，组织上就决定调我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保卫延安的解放战争还未打响，我自愿报名参加了战地采访队；战争一打起来之后，我又自愿参加了第一野战军，成为一名随军记者。

1948年，我又成为一名火线入党的共产党员。 李光朱
男，现名李光。延中十二班学生。陕西省榆林地区林业局顾问。

延安中学的风风雨雨

苏子休更改校名

1946年5月，我被分配到延安中学。9月底，全校师生在桥儿沟的球场上召开了更改校名的大会。会议开始由李敷仁先生作报告。李先生是原西安中学校长，知名的民主人士，是陕西省生活教育社的领导人，也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的“信徒”，曾在西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后来国民党特务给他的信中装上一颗子弹，扬言要枪杀他。后来他终于在咸阳遭到特务暗杀未死。中共西安地下党护送他通过封锁线，来到了延安。李先生怀着无比幸运和喜悦的心情，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经过。另外还讲了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的重要意义。

李先生作完报告后，校领导宣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命令：“为了纪念陶行知先生，决定从1946年10月起将延安中学改名行知中学。”我来到延安后，参加了陶行知先生的追悼大会，毛主席为之题词：“人民教育家”。随后还在延安交际处召开了一次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研讨会。在会有同志建议将延安中学改名行知中学来纪念陶行知先生。这个提议很快就实现了。

我与全校师生长时间地鼓掌，表示热烈欢迎。

保卫延安

蒋介石军队在华东、东北等战场节节失利，为了作垂死的挣扎，妄图攻占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从西北战场调动了胡宗南的大批军队，向我陕、甘、宁边区进攻。

党中央决定动员党、政、军、民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10月中旬，在延安中心广场召开了一次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彭德怀司令员作动员报告，延安各界代表数千人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和延安中学部分师生也参加了大会。彭德怀司令员身材魁梧，身着灰布军装，严肃认真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很信任我，确定我为保卫延安的司令员。若敌人胆敢侵犯陕、甘、宁边区，我们有信心把敌人干净、彻底、全部歼灭，直到取得解放战争全面胜利。”这次动员大会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对边区全体人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延安中学参加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后，校领导召集了紧急会议，对全体师生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树立战备思想；二、坚持上午半天上课学习，下午排练节目，外出宣传，动员群众。秧歌剧是延安中学的一个优势，在延安很有点声誉。秧歌剧的形式，装上保卫延安的新内容，能起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三、加强反空降训练。全校师生，除了参加宣传队的以外，几乎全体师生都参加了反空降训练。校领导指定曹达老师负责反空降训练。延安中学离飞机场很近，是敌人空降的目标。反空降的任务，延安中学的担子很重，而又没像样的反空降武器。当时最好武器就是手榴弹，也只有少数人才有，绝大多数人是手执一根木棒，要求在敌人立足未稳，短时间的头晕中，急忙上前去给敌人以当头一棍，然后缴获武器，俘虏敌人；四、做好疏散准备。延安中学当时有 1000 多名师生，疏散工作是一个艰巨任务。主要由总支书王鼎勋和总务处长魏金发二人负责。这年 10 月以后，虽然半天上课，实际上大部分力量都投入了战备工作，为保卫延安而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支援前线

蒋介石调集胡宗南 30 多万军队开始向边区进攻，边区政府紧急通知学校限 3 天以内疏散到指定地点。我们学校指定的地点是安塞吊儿沟和茨儿沟，学校也早已到指定地点做好了准备。在这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校领导通知教务处、总务处、罗家坪分校以及各教学班紧急集合，打好行装，准备连夜出发到吊儿沟。这天晚饭后，每人发两个馒头当干粮，全体师生由小路向吊儿沟前进。男女同学都背上整齐的背包，一个接一个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翻过了一座一座的黄土高坡。冬季陕北高原上的午夜，月亮特别明，星星特别多，气温特别低，这时行军的每个同学途中都特别困。尽管地上结的冰很多、很滑，我们仍然一面行军走路，一面打盹、睡觉。

当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行军能睡觉的奥妙之处。

我们疏散到吊儿沟以后，低年级班次，继续在老乡窑洞的炕上学习。高年级的学生纺毛线，打毛袜，支援前线。同时，校领导指定我和另外一位女老师带领 40 余位罗家坪分校大一点的男、女同学，去延长县离黄河边不远的拓家川西北军区后方医院工作。该院徐院长该待了我们。他是一位老红军，态度非常和蔼亲切。安排我们住下后，就组织男女同学学习护理知识，请医生和护士长给同学们上课。我暂时留下，协助医院做同学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大约学习了一个月以后，医院需用人，1947 年 1 月底，同学就到病

房上岗，护理和治疗伤病员。这批同学，有初中文化基础，年龄较轻，业务技术学习进步较快，不长的时间就都成了医院的骨干。曾在拓家川医院工作的同学，如刘刚同志，后来成了医学专家，全国解放后，担任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一分为二

1946 年底，胡宗南军队进攻边区后，怕我军引敌深入，受到全歼，一时止足不前。

1947 年 1 月，延安疏散出去的一部分单位，有的又返回了延安。我校除初中一年级较小的同学留在吊儿沟外，二年级以上的同学也返回桥儿沟。我们也从拓家川医院调回到桥儿沟，准备春节后各班继续开学上课。

1947 年 3 月初，蒋介石、胡宗南孤注一掷，又集中了 30 万军队，疯狂向延安进攻，对延安城区狂轰滥炸。延安各机关、学校再次紧急疏散。全校师生都疏散到了吊儿沟。这次疏散到吊儿沟后，不几天学校就接到边区政府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行知中学改为西北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并任命原副校长卢勤良同志为院长。”延安中央医院派来了医生、护士长、司药，并配备了医疗器械和药品。3 月 12 日在吊儿沟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全院共编为五个所、一个院部、每个所和院部各配了几匹骡马，运输药品、器械、粮食、油盐等物。全校的老师和一部分学生骨干分别担任所长、指导员、管理员、司务长、院部干部等工作。大部分男、女学生经过培训后担任护士工作。我先是三所所长，指导员是原来做过关向应同志警卫员的同学任友亮。护士长是十二班学生高仲芳。本来十二班学生任远志愿意留在我所受培训当护士，但组织上要派她去苏联学习，调离了医院，随她父亲任弼时同志在毛主席身边转战陕北，直到我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任远志才随党中央、毛主席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去苏联学习。

3 月 12 日这天，学校就一分为二：大部分师生参加了西北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工作；另一部分年纪小一点的同学和新由延安保小分来的同学由马济川校长带领东渡黄河，在山西临县，以后又转移到隰县上课。1948 年我军收复延安后，学校又回到了延安。全国解放后，陕西省政府决定将延安的行知中学仍改名陕西省延安中学。

苏子休

男，延中教员，十二班班主任。曾任成都军区后勤部生产管理局副局长。现为正师职顾问。

编外教员——吴灏

丁淑元

1947 年春，敌人进犯延安，行知中学从安塞向志丹方向转移。途中增加了一位来客，他就是延安桥儿沟医专的教导主任——吴灏同志。他是因病不能跟原单位一起行动，才被安排跟我们同路走的。

开始，我们还有些顾虑。吴灏同志是病号，我们工作又那样紧张，不会也无力照顾病人咋办？当时学校许多工作都是以班为单位进行的，驻地零散，各班生活必须自理，只能分散安排。而学生在这段时间里也多半与家长

失掉了联系，全部依靠组织，依靠学校，具体也就落实到依靠班，依靠教员的工作上了。记得当时我们带的是个合并班，学生人数多，我们连班主任在内，一共是4个教员，不仅要考虑班上的教学问题，生产劳动问题，还要负责学生的食宿、健康以及在驻地及转移中的生命安全问题。这时的学生都是从保小升上来的十多岁的少年（年龄大的都到第四野战医院去了），教员肩上的担子就显得格外沉重。吴灏看出了我们的顾虑，他说：

“我很好，一切可以自理，就当我是你们新增加的一个编外教员好了，请完全放心！”此后我们也真的没对他进行过任何照顾，他也很自然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我和吴灏同志在此之前就认识，那是在1946年春季的重庆，当时组织上以十八集团军家属复员的名义送一批同志去延安，其中就有吴灏夫妇和他们的一个八九岁的男孩。

我们是拿着蒋介石签署的护照上路的，但是他们却暗中设置障碍，企图制造事端，并说：“你们路上如丢失了人，我们可不负责任。”他们多次甚至公然端着枪搜查我们每一个人。在宝鸡和咸阳，我们还无端遭到了半个多月的扣压。弄得我们只能集体住宿，集中吃饭，甚至连上厕所也是几个人在一起，否则丢失任何人都会给敌人制造事端的机会，给组织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与困难。这种情况对于成年人来说比较好办，可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尤其是一个男孩，不让他乱说、乱跑，却是个难题。吴灏同志却采取了一个看似笨拙、可非常实际的办法：每当汽车一停下来，他就用低低的声音连续不断地讲故事，不知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的故事，孩子被全身心地吸引住了，一动不动地依附在大人身边。看到这个场面，同志们也都放心了。当时他留给大家的印象是：机敏、沉着，话不多，却总在关键时刻能提醒同志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因此也都认为他比较成熟、办法多，加上他又长我们几岁，于是都亲切地唤他“吴大哥”。

吴大哥来到班上之后，队伍常有转移。行进中的纪律是好的，尤其是在后期。但在开始时并不都是这样。我们带领的是一群十多岁的少年，有时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你觉得情况紧急，他却认为新鲜有趣，尤其是个别精力旺盛又有点散漫的男孩子，你为保障安全制定的行军纪律，他却觉得是扣在头上的紧箍咒。有一次在已经听到敌人枪声的急行军中，有两个男同学却离开大路站到一个山岭上去观风景去了，幸亏被收后营的教员发现，才没有发生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吴大哥又一次发挥了他善于给孩子们讲故事的特长，配合队上的正常思想政治工作，他悄悄地对学生们进行过多次启发诱导的谈话，他讲的不全是故事，也讲一些生活、生理卫生方面的常识，却总能触景生情、信手拈来，讲得生动有趣。他专爱找那些精力过剩、有点散漫的孩子去讲，可听的人却愈来愈多。我们时不时地看到他身后跟着一群孩子，他边说边走，而孩子们生怕漏掉了哪句话，紧紧地跟着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发出笑声。他讲的话总是积极的，热情的，对未来充满信心。听的人感觉受到鼓舞，得到激励。

我们每当转移到一个地方，一般是第二天休整，第三天上课。当时主要是上语文、数学课（行进中其他课不好开），对于生理卫生，我们原来没有准备开。但不论在行进中还是在驻地，都是集中住在老乡的窑洞里，生活不便，加上普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容易患病并引起大面积的传染，而当时医药条件困难，在行进中转移病号尤其困难。这时吴大哥提出了他要给学生

上生理卫生课的建议。这当然是好事，但他是病号，搞不好病加重了咋办？还有，他虽然对生物科学、医学都懂得很多，但途中既无教材、课本，又无任何图表、教具准备，他本人又是一口苏南官话，在下面聊天可以，要正式上课，陕北年龄小的学生能听得懂吗？效果会怎样？但他坚持要讲，于是决定让他试试看。

我专门去听了他的课，事实与估计相反，同学们不仅能听懂他的苏南官话，而且一个个张着嘴，仰着头，合着他讲课的拍节在不停的笑着，笑得那样纯真、自然，课堂秩序既集中又活跃。他讲了些什么内容呢？原来他是从学生们的生活实例出发，不仅讲清楚了这一生活具体问题，而且把它放到整个系统中去讲述，使学生不仅了解个别具体问题，而且了解了这个问题的整体以及与整体有关的其他问题。讲得生动有趣，听来亲切感人，内容却很有深度。比如他以偶然打牙祭讲起，肉吃多了，消化不良，引导到讲人体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各部分的机构、功能，直到讲清消化系统的全部，讲清应该怎样运用自己各部分机能来保护消化系统的健康。他还从消化不良、窑洞空气污浊讲起，引导到讲清呼吸系统的机构、功能、疾病以及如何运用自身机能提高呼吸道的抗病与预防能力等，把一套套科学理论，深入浅出地讲解给学生们听。

为什么他的教学效果能这样好？首先他学科知识渊博，理论基础好，讲起来才能由点到面，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他原在金陵大学学生物学，以后又专门在东吴大学学解剖学，他的一套解剖刀一直带在身边。其次，他之所以能做到理论结合实际，是因为他真正理解学生，与学生生活在一起，不仅了解他们的生理实际，还了解他们的心理实际，他所讲的正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所以能完全合乎拍节。第三，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过去，他在组织安排下，曾在昆明配合黄炎培先生办职业学校，他既是办学人，主管领导，又是教师，同时还兼做打铃的工友，身兼三职。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他具有我们党长期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的高度自觉、高度责任心。他是外单位来养病的，开始人家还不欢迎他讲课，这他都不管，他只做他认为应该做的。

吴大哥平时总是精神抖擞，英气勃勃的。有次我们问他：

“你怎么老是这样精力充沛，老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你是病号嘛！”他说：“病号咋样？病来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那就睡上他几天，不吐了，爬起来还不是一样！”我们说：“你这个精神劲儿，很难能有人跟你相比！”他说：“我算什么，差得远着呢！”

我怎能与××同志相比！可××同志却说他能与周副主席相比！”

敌人进犯延安之后，不可一世，可随即在青化砭、洋马河、蟠龙吃了三次败仗，疯狂地以10倍于我军的兵力，抬着四路纵队的大方块深入边区。学校在接到通知后紧急突围。傍晚离开志丹县，在敌人的夹缝中穿插行进。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走了一百五六十里路，一日之内，两次接近敌人，这对于我们这支毫无装备的十几岁的学生娃与老弱妇孺部队，的确是一次严肃的考验。此后是每当出发前，先后左右四面侦察一遍，侦察清楚了，赶快走上一段。就这样，绕道靖边、横山，走了半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这期间，吴大哥以带病的身躯，提着他的解剖刀，自动地陪同排头一起走在队伍的前面，来抵制那种在十分紧急情况下的要“休息、休息”的干扰，这种干扰不仅来自学生，甚至来自像××（孙伟）那样的干部。前头部队不停地前进，

队伍拉的很长，后面再喊休息，也是停止不下来的。吴大哥又用他沉着、机敏、实实在在的办法战胜了危急。队伍安全地到达马蹄沟。

吴大哥默默地离开我们回原单位去了，以后再没有见着他，几年前听说他已在重庆去世了。

这段往事已经过去了 40 多年，但吴大哥当年的风貌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眼前，我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在吴大哥身上到底有什么闪光的东西能使人在一次邂逅相遇中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呢？

这里没有什么英雄业绩，他也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许他给人留下的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的形象。他博学多识、循循善诱，教学有方，称他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是够格的。

但他又有不同于一般优秀教师的地方，他是病号，但不以病号自居；一个最有权利要求别人帮助的人却做了许多帮助别人的事。他是我们班的客人，但没有做客思想；他自称是“编外教员”，但做了许多编内的事，承担了不少编内教员应当承担的责任。众所周知，当年的教员是没有报酬的，更没有如今所谓的“奖金”，这种不计报酬，不论分内分外、客人主人，尽其所能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什么精神？是只有具备了共产主义觉悟的人才有的革命精神！因此，吴灏同志在这段时间里给我们留下的首先是他的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其次才是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的鲜明形象。 丁淑元

女，延中教员。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现任《陕西师大校史》主编。

发表有《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商品生产者本性的理论探索》等理论文章。

超龄中学生

——地干班生活片段齐心

到地干班任教前后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自小拦羊放牛，只念过两年多小学。

1935 年，我 15 岁时就参加了革命。1944 年 6 月我被调在边区保育小学任党支部书记。一天，安塞县委书记李旺淮同志陪延属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景膺同志一起到保小来，要我去延中地干班接任贺平山同志兼任的教导员。并说，当时学生思想很乱，有的不安心，有的想转学，地干班似乎很难办下去。

听了李景膺书记的介绍后，我心里的确有些担心。前几任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有经验，而我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怎么敢去办学校？战争年代，组织上的决定要无条件服从。我心想，不管有多少困难，我都不能辜负党组织的希望，一定要完成好这项艰巨的任务。何况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合并到延安中学后，经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本人经过整风学习和大生产运动，也得了锻炼和提高。可以说，这次是精神饱满而又愉快地上任的。

学校的生活、学习、劳动及工作地干班，是延属地委主办的训练区、

乡干部的训练班，学员有区上的乡长、乡文书，还有农村的积极分子、青年学生等。前者主要是提高文化，后者是培养他们做区、乡干部。记得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警卫员高世文，任弼时同志的警卫员都来地干班学习过。还有些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家属也来入学；例如大家习惯称鱼大姐的鱼建国，年龄较大，还是小脚女人，只识少数字，但她毕业后担任了保育院院长。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小鬼，叫袁先义，她到延安后曾在中央党校医务所当护士，但没文化，她也来学习了，毕业后分到边区保安处工作。

延属地委主办的这个干部培训班，附设在延安中学。学生的调进、分配、教学计划和教职员的调配，均由延属地委组织部和宣传部负责。我所经历的，共办了两期，每期学制为两年。第一期于1943年春季招生，1944年底结业，共50余名学生，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两班。第二期是1945年春招生，1946年结业，学生170余名，按照文化程度分为第三、四、五、六班。他们水平最高的相当于高小毕业，最低的是稍识几个字或文盲。

经过两年的学习，要求最高的达到初中毕业程度，最低应达到消灭文盲，识字达1500—2000个。

在地干班工作期间，我大胆地进行了教学改革。我长期做青年工作，并且具有农村工作的特长，我牢记毛泽东同志“向群众学习”、“当个小学生”的教导，甘当一个小学生，不懂就学，边学边干。用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的方法，从地干班学生实际出发，向校内教员学习，向同学们学习，听取前教导员和支委会的意见，多次召开同学座谈会，虚心听取各种意见。经过分析研究，我了解到了大部分学员不安心学习的真正原因。根据同学们的意见和特点，即：年龄大，文化低，社会实际经验丰富，理解力强等，我决定减少课程，把不必要的边区地理、读报指导等课取消，主要学语文、算术，并增添政治课，改变过去一天上几种课的办法，一天只上一门课，而加强课后的具体辅导，做到当天学的当天会。这样，课程少而又集中学，容易记，学会忘不了，学习效果好，大家都满意。

在解决课程安排之后，如何来提高教学质量又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采用了小学生制和互学互教的办法。在调查中我发现庄银忠学习方法好，进步快，他创造了分合识字法，将学个别字和几个字或一句话结合起来学和记，苦学苦练，在50天内学会500个生字。

我及时把庄银忠好的方法和苦学精神向同学们介绍和推广，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结果用50天时间每人都学会了200多个生字，有的同学还学会四五百生字。

这样，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从根本上解决了不安心学习的现象，使乙班成为地干班学习最好的一个班。

我到地干班后增添了政治课，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解决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人生观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民事业学文化，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政治课的内容，主要是宣读和讲解毛泽东同志若干简短而重要著作如《反对自由主义》、《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及报刊上有关时事政策性的好文章。还采用了启发式和讨论的方法，这样，使同学们容易领会精神实质。

此外，在学习政治课时，要求把理论同学员们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

发现好的典型进行推广，对学习差的和后进同学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如我们了解到乔××同学，因他哥去世，平日又有散漫习惯，不安心学习，指定组长帮助他，我在学习和生活上也特别关心他。在一次秋收回来路上，他突然病了。我将手指甲掐住他足三里穴位，止住了吐泻，并组织同学用担架把他抬回学校。他很受感动，决心努力学习，在10天内学会了400个生字。大家看到他的转变，都说：

“乔××进步了，咱们不进步还行？”过去不安心学习想转校的一个同学也说：“现在在学校能学到东西，叫我去党校我也不去了。”

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同学们的觉悟，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有一段，班里经常有丢失东西的现象，但总找不到是谁干的，因此便产生互相怀疑和不信任的现象。一次上课间，有同学发现强××同学查看的字典是别人的，便向我作了报告。我根据线索反复调查，最后又耐心地同强××同学多次交谈，教育他认识拿别人的东西是自私和不道德的，如将来在工作中偷群众的东西，那怎么领导群众和教育群众呢？

他终于认识了错误，不仅退还了字典，还将过去拿同学的十多本书和其他东西都交还原主，决心改邪归正，很快成了班上的好学生。

地干班的同学在学习之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我们开办了农场、菜园，成立了运输队，还从事喂猪、养羊、纺棉纱等生产劳动。

地干班学生多数来自农村，有较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能，在劳动中都能起模范带头作用。生产劳动时间相对集中，学习时间也较集中。男同学主要进行农业生产，女同学主要参加纺棉劳动。

1944年秋收，我率领地干班同学去距学校50华里的农场——南二十里铺后沟的红四村。接受任务之后，我与同学们都背上行李和秋收农具步行前往。开始大家情绪很高，边走边说边笑，但走到山沟内，便上气不接下气，行李也感到很沉重，衣服全被汗湿透了。但谁也没有叫苦，很快到达红四村。

学校的农场位于红四村的山坡上，共种地约200余亩。我们一共30余人，要求一个月完成任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同学们几个人住在群众让出的窑洞里，天不明便上山割秋，吃早饭时每人都要背回来一大捆糜谷，力气大的同学可背到150多斤。中午不回来，由几位女同学做饭，午饭就在山上吃；

饭后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再继续干，天黑时才下山。同样，每人背一捆庄稼。由于劳动力组织得好，同学们劳动热情高，仅用20多天，提前完成了秋收任务。同时我们还帮助红四村农民秋收，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给当地农民演出了《两亲家打架》和《二进宫》。我们当时自己带了胡琴、梅笛、管子、梆子等，向农民借了锣鼓和服装，没有板鼓就用搪瓷缸子和筷子代替。

《二进宫》演起来有声有色十分逼真，特别是一个同学扮演李娘娘、徐延昭、杨波兵部侍郎三个角色，还用一只鞋代替了向阳霍板和小皇帝，引得农民群众哄然大笑，受到热烈欢迎。群众宰了一只羊送来，表示对我们的感谢和慰劳。

除组织集体劳动外，我们还号召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在学校周围山沟里种点大葱、南瓜、豆角、西红柿和其他蔬菜，改善个人生活。1945年，在木炭沟种地好几百亩，还有学校的运输队，并养了牛、驴、羊等等，可以说真正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家庭。通过劳动，既学会种地技能，又锻炼了身体，

磨练了思想，使所学的知识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教育工作者，要为人师表，凡要求同学们做的，首先自己要带头做到。我是农民出身，又长期在农村工作，所以对农村和农民干部比较熟悉，因而在生活上和思想感情上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要求同学们努力学习，自己也首先努力学习。我文化程度低，读书看报遇上生字，就要查字典，但我不懂注音字母和拼音，秋收时，每天晚上我请懂注音字母的同学教我。这使同学们很受感动，认为齐教导员有不懂的地方能虚心向同学学习，我们更应虚心地向他互相学习。劳动也同样，不能只是作一般性号召，也要自己带头做。有一次动员同学们割野草，全班开了动员会后，同学们下山去吃饭和领工具，没等同学们上山，我先上山去拔野草。同学们看了说，齐教导员已经用手拔起草来了，我们赶快去，结果超额完成任务。那次秋收劳动中我也一直和同学一起劳动。一个劳动不好的同学说：“教导员真能行，我在他旁边也不敢落后了。”

在言传身教的教学中，一定要尊重民意，不能自己一人随意决定问题或改变大家的决定。如秋收最后一天下午，支部和同学民主决定要背两次糜子，把山地里的糜子背完。有的同学要求一次背完，我说：“背两次是民主决定的。要一次背完，会损害身体，我不能改变民主决定，要改还得经过大家才行。”在执行决定上也要带好头。

延安时期的物质生活是困难的，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采。记得当时为了提高同学的学习情绪，活跃文娱生活，我和支部把同学中会唱、会拉的同学都组织起来，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清唱表演；有的唱陕北民歌小调，有的唱革命歌曲，有的唱陕北道情，有的还会唱眉户、秦腔戏等等。1944年10月召开边区文教大会时，我们还专门为代表表演了学校的节目，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当时学校俱乐部主任是钟灵同志，他编了一个破除封建迷信的剧本，剧中的巫神角色，挑中了地干班的安塞人高海明，他起初不愿表演，怕装巫神不好看，也怕丢人，还怕耽误学习。我和支部反复考虑，认为他能行，因为他对巫神骗人的把戏比较了解，他也会摇巫神用的山山刀。

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说明装演巫神是为了破除迷信，也是革命工作，耽误了课回来再补。他高兴地接受了任务，经过反复苦练，演出很逼真，很成功。代表们都拍手叫好。

参加边区劳模大会 1944年冬，延安中学为了表彰我在地干班教学和生产劳动中的模范事迹，推选我为模范工作者，并推选我代表延安中学出席了延属分区和边区第二届劳模大会。地干班的成绩，是包括我在内的全体教员、同学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我的表彰也是对延属地委和延安中学的表彰。荣誉应属于延属地委和延安中学。

大会是在延安城南原延安大学大礼堂举行的。劳模代表们住在原延安大学旧址山坡上的窑洞里。在开会期间，因地干班工作紧迫，我有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步行10华里回地干班处理工作，第二天清晨又回到会场，参加会议有关活动。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了开幕词，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作了《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的运动》总结。大会还听了从抗日前线回延安的彭德怀、陈毅、刘伯承等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使我和代表们万分激动高兴的是，1945年1月10日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重要报告。

当时在延安，领导同志作报告或讲话都是站着的。毛主席作报告也是站着讲，有时也走动讲，讲得很通俗，很生动，讲话中不断地抽着香烟。他在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劳模们的创造精神，指出劳模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即“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毛主席谆谆教导说：“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骄傲。

你们被大家尊重，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毛主席这个重要教导我是牢记在脑海里，后来在工作中还处处注意发挥“三个作用”，谦虚谨慎，力戒骄傲。

毛主席的报告中着重讲了经济工作，要求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他特别强调我们处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我们的思想要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这些话对我教育和启发很大。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一直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任何工作首先要注意调查研究，从实际环境出发，这样才能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齐心

男，原名齐俊林，延中地干班班主任，党总支委员。曾任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顾问。主编《新民主主义时期陕西大事记述》并获优秀科研学术成果奖。

夜行遇险记黎虹

那是 1947 年 6 月上旬的一个夜晚，终生难忘的夜晚啊！

天，黑透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黑得有点怕人，仿佛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我带领一支 12 个人的病号队伍，在陕北靖边县以东的山沟里行进着。一边走，我一边心里在打鼓，孙主任临行前交代任务的情景不断地在脑海中浮现……

“现在情况很紧张，敌人离我们很近。今天夜里一定要闯过危险区。你带领病号下午 5 时动身，比大队提前两小时出发。”一脸络腮胡子的教导主任孙伟，用指挥员的语气向我下达任务。接着，他拿过军用地图，向我说明了行军路线：“我们现在住在畔沟村，今晚的目的地是梁坪，正东方向，离这里 60 多里地。中间经过羊圈、大水沟、石湾。”最后问我：

“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像个战士那样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感到自己的声音似乎与往常不大一样，也许是意识到肩上担子的重量，也许是精神有点紧张。我知道，我要对 11 位小同学的安全负责啊！

其实我当时也只有 16 岁。在延安中学，我并不是干部，只是个普通的学生。可孙主任那天为什么偏偏要我来当“负责人”呢？我想，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和非党员就是不一样，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吃苦在前，享乐在后”。3 月 16 日，也就是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的前 3 天，我随延安中学最后一批师生撤离延安。从此，每次行军，我们党员不是打前站，就是在最后收容病号；党员除了背自己的背包、米袋等等以外，还要帮助小同学和病号背东西；全校仅有的 20 多支枪和几十颗手榴弹，大部分也发给身体较好的党员，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这样，叫我负责带领病号先走，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下午5点，我们从畔沟村出发。刚走出村口，雨就停了。

乌云渐渐散去，太阳露出了笑脸。尽管同学们连续几天在雨中行军，又有病痛在身，疲惫不堪，步履艰难，但是，一看到阳光，大伙儿都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有说有笑，歌声不断。

只有这时，你才能从笑声和歌声中分辨出，谁是男同学，谁是女同学。因为在这次转移之前，学校要求所有女同学同男同学一样，都剃成光头，以防万一头部受伤时便于包扎和抢救，所以，平时不出声，你就很难认出她们是“假小子”。

只有这时，你才能从笑声和歌声中感受到，孩子们的心灵是多么天真、纯洁、可爱！

他们沐浴在金色的晚霞中，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只知道人间充满了欢乐和友爱，忘记了苦难甚至死亡的威胁。

我，也许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笑不起来，唱不出声。我在回忆，在思考，孙主任为什么说今天夜里一定要“闯过危险区”？这就是说，我们是处在“危险区”内，而且今天夜里就可能发生“危险”。什么危险呢？孙主任没有说明。也许，他当时也不知道。

事隔多年之后，我才彻底弄清楚，那天夜里，形势的确非常严峻，非常危险，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从延安撤退之后，短短一个多月工夫，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消灭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近两万人，这使蒋介石非常恼火。

特别是5月24日，周恩来副主席在真武洞祝捷大会上庄严宣布：“党中央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这对蒋介石真如五雷轰顶。占领延安，他得意忘形，一心想把我党中央和毛主席赶出陕北，赶过黄河，从而宣布我党在政治上破产，在军事上成为“流寇”。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党中央、毛主席岿然不动，硬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留在陕北不走。于是，他恼羞成怒，命令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带领四个半旅，于6月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王家湾发动突然袭击。后来才知道，延安中学当时离王家湾并不太远。一有敌情，我们自然也跟着行动起来。400多名师生，从6月6日起开始转移，一连3天，夜晚行军，白天睡觉，于6月9日到达畔沟村。按原定路线，我们那天要向东走，可是哪知道，敌军四个半旅正从东、西、南三面压过来，我们向东走，正好是自投罗网。多危险呀！

太阳落山了。渐渐地，黑夜降下了帷幕。自然，笑声没有了，歌声也没有了。按规定，夜行军连大声说话也不准。四周静悄悄，除了脚步声，几乎什么声音也没有。乌云先把月亮遮住，接着又把一个个星星吞没了。它好像一只怪物，向大地撒下了魔网，把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片刻间，我仿佛看见黄土高原上那一座座山包包，如同一个个坟丘似的，在眼前忽隐忽现。啊，我一生当中好像还从未见过黑夜是这样可怕，这样叫人毛骨悚然。我预感到，危险就在眼前，敌人就像凶恶的野兽匍匐在黑暗中，张着大嘴等着我们。可我们还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危险来自何方，敌人藏在哪里。我边走边想：万一，不，不是万一，而是很有可能，遇到险情怎么办？遇到敌人怎么办？

果然，险情发生了。当我们快要到达大理河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妙：河对岸的山上出现一团团火光，有时还隐隐传来一阵阵嘈杂的人声和犬吠

声。这是怎么回事？是自己人？是敌人？我们立刻停止前进。大家围坐在一起分析情况。

我从 10 岁起就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深深懂得遇事要和群众商量，要依靠集体的智慧。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我们有 12 个“臭皮匠”，应该凑成 4 个“诸葛亮”呀。经过小声而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对面山上的火光不可能是自己人，很可能是敌人的营地，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不往前走，又往哪儿去呢？谁也拿不定主意。有的提议回头找队伍，有的主张先找老乡探明情况再说。我们一边商议，一边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正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个人影从后面向我们跑来。这是什么人？难道真是敌人么？我像战场上的指挥员那样，当机立断地命令：“分散隐蔽，快！”

同学们迅速散开，藏在各个角落，紧盯着这个人影的晃动。眼看这个黑影快要跑到跟前，我才认出原来是二十班的同学小王。真是虚惊一场！

我们压低声音呼唤着“小王！”纷纷围上去问他有什么情况。他气喘吁吁地说：“情况……不好。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怎么回事？别着急，你慢慢说。”我安慰着他，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小王冷静下来，慢慢说道：“大队刚出村，就听到枪声，游击队来报告，说敌人已从东面插过来，不能再往东走。这样，大队改变了行军路线，向北面的横山方向转移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明天就在刘家河宿营。校部要我追上你们，嗨，你们走得快呀。我一口气跑了 20 多里，都不见你们的人影。你们要赶紧掉头，朝西北方向走，快快赶上队伍。”

小王讲的情况，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可是，在这样漆黑的夜晚，东西南三面都是敌人，西北方又是山峦起伏，道路崎岖，我们这些病号怎样才能赶上队伍呢？大伙儿默不做声，感到茫然。我内心虽然也很紧张，但一想到肩上的重任，想到孙主任临行前的嘱咐——“遇有紧急情况要沉着冷静，依靠群众”，想到自己在战争环境中长大，经历过日本鬼子的扫荡，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受到的锻炼毕竟比在延安和平生活中成长的孩子要多一些，因此，我很快镇静下来，提出应变措施。我说：“情况紧急，不能在这里久留，只有按校部指示摸索前进。为了不出意外，大家在行进中绝对不要讲话，不要发出声音；队伍不要拉得太长，尽量走得集中一些；遇到险路，大家要互相照应，互相帮助；我走在前面，小王走在最后，如果发现前面有什么情况，就用耳语向后传，千万不要惊慌。”大伙儿纷纷点头，表示同意。就这样，我们掉转方向，顺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山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西北方向走去。

陕北的初夏，夜晚很凉。我们身上的衣服都很单薄，除了一身单衣或一身“夹衣”（我们称之为“两用衣”，冬天装上棉絮当棉衣，春天扒了棉絮当夹衣），很少有穿毛衣或绒衣的。到了后半夜，露水浸湿了衣服，更冷得直打哆嗦。我真担心这些生病的同学又冷又饿，病情加重，难以坚持。不出所料，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问题发生了：张玉宝同学因患中耳炎，体温很高，疼痛难忍。他说：“我实在疼的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别管我了，我休息一会儿自己慢慢走。”天哪，这怎么行！？加上小王，我们这 13 个人，虽然来自天南海北，但却是一个友爱的集体，尤其在患难之中，更是命运与共，心心相连，哪能把小张一个人丢在荒山野岭呢！不行，绝对不行！可他

实在走不动了，又怎么办呢？难啊，难啊，难得大伙都愁眉苦脸。

我把小王拉到一边，小声和他商量：一是把小张送到附近老乡家，等我们找到队伍再来接他；一是到村子里找一副担架，轮流抬他走。小王赞成我的意见。可是，怎么说，小张也不肯留在老乡家，表示爬也要爬着找队伍。没办法，只好要小王带着大家就地休息，我一个人去附近找村子，设法弄副担架来。

天，渐渐亮了起来。抬头一看，月亮挂在空中，乌云被风赶跑了。月光如水，轻轻地、温柔地沐浴着大地，使我的心情也开朗起来。什么危险呀，困难呀，统统是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乌云难遮月，这话真不假。

夜行军，我早已习惯了，可我从来都是和队伍走在一起的，现在却一个人走夜路，而且是走在荒无人烟的山梁上。山野是那样的寂静，静得使人感到害怕。我倒不是怕敌人，而是……多少有点怕“鬼”。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鬼的故事，晚上一个人走路好像总有个影子跟着。此时此刻，我又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那个影子好像老是在跟着我，怎么赶也赶不掉。我只有嘲笑自己：“你呀，难道还讲迷信么？亏你还是个共产党员！”我一边走，一边在激励自己：前进！前进！我不能大声唱歌，可我在心里唱起歌来：“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山沟沟里找到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刚进村，就听到一阵狗吠声，接着有条狗向我猛扑过来，把我吓了一跳。我一面捡起石块打狗，一面飞快地跑到一个窑洞门前去敲门。敲了两家都无人答应，敲第三家的时候，听到里面有点动静。我在门外小声说：“老乡，你们不要怕，我是延安中学的学生。我们有个同学病倒了，就在附近山上，想请你们帮帮忙。”我站了一会儿，门没有开；

我又说了一遍，门吱呀一声开了。在朦胧的月光下，我看清开门的是一位老大娘。

她上下打量我一番，然后要我进屋去。

窑洞里黑洞洞的。她没有点灯。幸亏月光从窗外照进来，才使我不被酸菜缸拌倒，跟着她走到炕边。隐隐约约地，我看见炕角上有两个人蜷缩在一起，一个像是青年妇女，一个像是小孩。她们大概是害怕坏人吧。为了打消她们的顾虑，我进一步讲清来意，说明我们这十几个同学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又都是病号，现在和队伍失散了，路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实在没办法才找到这里。老大娘被我的话说动心了，炕角上那两个人也坐了起来。大娘说：“小同志，不瞒你说，这里经常有胡儿子（指国民党胡宗南军队）来，我老汉和小子都支援前线去了，留下我们婆姨娃娃真有点怕哩。”接着，她说：“村里担架队走了，咱家还有一条小毛驴，是留着拉碾子用的，要是有急用，你们就拉走吧。”我连声说：“谢谢大娘！”

谢谢了！”临走时，她又说：“我家男人不在，不能去送你们，兵荒马乱的，路上要多加小心。你们都是些娃娃，又有病，还要行军，真叫人心疼啊。牲口用完，你们就留下，也不必还了。”

听了大娘情真意切的一席话，我感动得眼圈湿润了，低着头久久说不出话来。陕北人民的心，正如毛主席所形容的，像“真金子”一样，在我眼前闪烁着灿烂的光辉。我含着眼泪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大娘，我代表同学们谢谢你老人家！”

我牵着毛驴匆匆往回赶。我知道，同学们在山上焦急地等着我呢。见

到我拉回一条小毛驴，喘，大伙儿都高兴的了不得，似乎一切都有了希望，什么病痛呀、寒冷呀、饥饿呀，好像统统消失了。我们把小张扶上驴，又继续赶路了。

月明星稀，寒风习习，队伍沿着一条山脊急急往前走。为了不迷失方向，我们走一段就看看北斗星，生怕走偏了。可是，山势的走向并非那样规则，山间小路更是蜿蜒曲折，忽东忽西，有时连路都没有。约摸又走了两三个小时，沿途竟没有路过一个村子，更不知目的地刘家河还有多远。越往前走，我心里越嘀咕，要是走错方向，钻进敌人的圈子，那可就糟啦！实际上，我们是在敌人的手指缝里穿行，只不过陕北地形好，千山万壑，便于隐蔽。尽管如此，在敌军几万人马的围追堵截之下，一不小心就有落入罗网的危险。有的同学建议，还是设法找老乡问问情况吧，不要再贸然往前走了。

于是，我们边走边找村子。

路，越来越陡。人，越来越乏。夜行人都知道，天亮之前是最难熬的。这时候，人困驴乏，队伍稀稀落落，速度越来越慢，不少人一边走一边打瞌睡。又有个女同学走不动了，她抓着驴尾巴连走带拉地向前移动。小张见此情景，主动下来让她骑。我见小张疼痛稍有缓解，就让重病号轮流骑。

翻过一架山，远远看到前面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奇怪，已经快到黎明时分了，怎么村子里还亮着灯呢？不管怎样，我们决定朝灯光走去。

东方现出鱼肚白，路基本上可以看清了。我牵着毛驴在前面走。刚走近村头，忽然从前面四五十米外冒出两个人影，端着枪对我喊：“什么人？”一下把我问懵了，不知怎么回答。

如果说是延安中学的，又怕碰上敌人，那可不得了。我只好不吭声，沉默，沉默，在沉默中思考对策。接着，对方又喊了一声：“过来一个人！”我想，如果真是敌人，恐怕不由分说，便扑上来了，也许是自己人吧？情况如此紧急，容不得半点迟疑，必须马上作出决断。我想：过去就过去，反正豁上了。我从腰里抽出一颗手榴弹，打开后盖，把导火线上的环子套在小拇指上，慢慢地向前走去。当我走到离人影十几米的时候，已经可以看清他们是穿着灰军装的八路军。啊，一块石头落地了！我那种高兴劲儿，实在是难以形容。我恨不能飞奔前去，一头扑入自家人的怀抱，大叫一声：“同志！”可我激动得迈不开步子，发不出声音。这时，对方好像又发现了什么，声音更加严厉，要我把手榴弹放下。我只好放下手榴弹走到他们跟前。谁知道他们还是用刺刀对着我，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延安中学的学生，他们不信，问我有什么凭证。我让他们看看别在兜袋下边的“行知中学”校徽（为纪念陶行知先生，延安中学从1946年起改名为“行知中学”），他们看后仍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上下打量，左看右看，最后他们才直截了当地问：“你为什么穿黄军装？”啊，这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以为我是国民党兵，因为国民党兵穿的是黄军装。我马上向他们解释：从1946年7月解放战争开始，我就随队伍从淮南撤退到山东，又从山东走到延安，山东的新四军都穿黄军装。我的这番话，终于解开了他们心中的疑团。接着，我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再仔细看看，国民党军队都穿细布衣服，我这是老粗布呀！”两个战士一个拉着我的手，一个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同志呀！难为你啦！”“你们辛苦了！”

他们留下一人在原地站岗，另一个人领着我们走进一间比较宽敞的窑洞。窑洞分里外间，我们在外间等候，领我们的人走进里间报告。我从里屋

传出的“嘀嗒”的发报声判断，这大概是指挥部。不一会，里间走出一位干部模样的30多岁的男同志，他态度非常热情，先问了问情况，然后说：

“你们这十几个孩子大都是病号，这样闯来闯去是很危险的。”

这里是前沿指挥所，对面就是敌人。刘家河在正西方向，不能再往北走了。”说到这里，我又惊又喜，庆幸找到这里。我问他，往刘家河怎么走，会不会再走错方向。他想了想说：

“敌情复杂，你们不能再自己乱闯了。这样吧，我派一位支前的老乡护送你们。他是当地人，路很熟悉。”听说要派人给我们带路，同学们乐坏了，连声说：“感谢！感谢！感谢八路军同志！”可他说：“不要感谢我们，没有陕北老乡，我们就像瞎子，还是感谢他们吧！”

不一会，带路的老乡来了，要我们马上跟他走。我说，我们还从20多里外的村子借来一条小毛驴，不知如何归还才好。真是无巧不成书，给我们带路的老乡就是那个村子的人，正好送到目的地以后再请他把毛驴还给那位大娘。

队伍又出发了。一夜行军，整整12小时，足足60里，再走两小时就到刘家河和校部会合。我们如同浪迹天涯的孩子，终于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朝霞，染红了半边天。她像熊熊燃烧的火焰，像迎风飞舞的红旗，鼓舞着、激励着我们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奋力向前、向前！

黎虹

男，曾用名李问洋。1946年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延安，在延安中学十二班学习。

1947年调中共中央机关，长期从事研究工作。1964年后，历任中共中央机关调研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处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副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1984年起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

北斗七星高

安琪

1946年，我和大后方一批知识青年刚到延安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边区自卫战争也就开始了。

1947年的春天，胡宗南向边区大举进攻之时，延安各机关学校早已先后撤出。我们延安中学的师生也转移到延安北面的山沟里，继续学习。不久，我们这个学校就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的第四野战医院，参加了保卫延安、保卫边区的战斗。

医院那时的医药条件要多困难有多困难，连消炎用的磺胺、止痛用的鸦片酊，也是希罕的东西；给伤员截肢，用的竟是老百姓的菜刀和木匠的锯子。但是全院上下的工作人员对伤病员可是尽心竭力。特别是护士们就是延安中学的学生，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给伤病员喂水喂饭，倒屎倒尿，洗脓洗血……对伤病员比对待自己亲人还亲。

伤病员也把咱工作人员当成兄弟姐妹，伤口疼得汗把衣服都湿透了，还给咱讲他们活捉敌人旅长的故事呢！那时候，生活虽然很艰苦，精神上却

很愉快，全军上下一条心，一股劲，就是有信心打胜仗。但大家都有一件大事压在心头，这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哪里？因为，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冷风，说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离开边区，过了黄河。

人们虽半信半疑，并且自己安慰自己：毛主席和党中央走了也好，只要他们安全，咱边区就有希望，全中国也有希望，但心里毕竟不踏实。

1947年5月，我们医院住在延安以北大约100里地的一条山沟里，接收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的伤病员，大部分已陆续归队，工作也就不那么忙了。一天，我们院部的女同志正在对越来越多的头虱进行一次歼灭战——推光头，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是野战军当天要在真武洞开祝捷大会。我们便邀约了几个同志，经领导批准，前去参加。

为了避免空袭，祝捷大会将在夜里举行。但我们不等太阳偏西就出发了。一来是心里急。自从撤出延安，好久没开过大会了；二来从我们医院驻地到真武洞还有30里地要走呢！出了山沟，就是平川，真武洞就在这条川里，从真武洞离延安骑毛驴恰好是一天路程，骑马半天可到。川里大路上，转运伤员的担架队刚过去，输送军粮的毛驴队又络绎而来。毛驴还没过完，又出现了一批国民党俘虏，由我们战士押着向北转移。最后是三个俘虏军官骑着马，为首一人，年约五十上下，面色灰黄，精神沮丧。他就是胡宗南的“四大金刚”之一，国民党一三五旅旅长李昆冈。其余二人，一是他的副旅长，一是他的参谋长。那参谋长骑在马上正读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

我们站在大路上正看得高兴，突然窜来一架敌机。边区军民对敌机早已见惯不惊。

“倒运孙子！又来胡骚情！喔——

喔！吁——吁！得儿——求！”老乡边骂边招呼着毛驴。说时迟，那时快，敌机已到了头顶上，人们已迅速散开，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嘎嘎嘎——”美国机枪在半空中扫射，但川里已寂无一人。我们恰好和三个俘虏军官隐蔽在同一个小树林里，只听见他们也正在骂国民党的飞机。李昆冈以四川口音说：“你这个时候跑来捞屁！”参谋长的湖北口音：“可恶！可恶！”副旅长没吭气，但精神紧张。30年后，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赦名单上，看到李昆冈的名字。

敌机一过，我们又马上赶路，在暮色苍茫中，到达真武洞。这里本来是一个大集镇，现在却是关门闭户，一无所有。

只有前来参加祝捷大会的队伍。从延安北九沟十八岔里一下涌现出来成千上万的野战军，秩序井然地进入会场。一面面战旗像落日的余辉。这些三战三捷的英雄好汉们，个个全似铜雕铁铸。

真武洞外的河滩是一个天然的大会场。河滩上临时搭了一个主席台，台上拉起了一幅“西北野战军祝捷大会”的大横标。台下满满地坐了一河滩队伍，当真武洞完全沉浸在黑夜里时，台上便升起了一盏盏明晃晃的汽灯。一位野战军首长来到台前宣布开会了。

他的话不多，却传递出一个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周副主席来了！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参加这个祝捷大会啦！台下的掌声简直要把整个主席台抬起来。我们这些“散兵游勇”，站在队伍最后面，生怕看不见，听不清，直想往前钻。但一看纪律严明的野战部队，一行行，一排排，怀抱枪支，端坐不动，我们也就不敢乱跑，只有拚命伸长脖子，踮起足跟。唉，人为什么要眨眼？这会儿要能不眨眼该多好啊！

只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往汽灯下一站，成千上万的指战员掌声雷动，兴高采烈，就像久别的儿女见了亲人一般。一个洪亮亲切的声音开了腔，周副主席简明扼要地讲了近几个月来全国的大好形势，表扬了西北野战军的辉煌战绩，然后就特别提高声音，并将双手高高举过头顶，用力前后挥动说：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最重要的——消息。毛主席和党中央——都还在——陕甘宁！咱们的三战三捷——

就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毛主席和党中央——都很安全。大家都放心吧！毛主席和党中央——还要指挥我们——继续打胜仗，还要——指挥我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平静的延河好像涌起了千丈波涛，那是整个会场的沸腾的情绪；晴朗的夜空突然大雨滂沱，那是指战员们激动的眼泪；真武洞河滩刮起了一场飓风，那是整个西北野战军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惊天动地的誓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这个闹得天翻地覆的真武洞，离延安还不到 40 公里，但是龟缩在延安城里的敌人竟然毫不知晓！

时过夜半，月出东山，祝捷大会胜利结束。当我们踏着月色和露水走在返回驻地的路上，新华社的电波正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蒋介石、胡宗南听到这一消息时，该作何感想呢？不是说毛泽东早已被赶过了黄河，陕北已经没有共军了么？原来他们就在延安附近呀！——我们一路谈着，一路笑着，迎着壮丽的北斗星向驻地走去。

祝捷大会以后，恼羞成怒的胡宗南便出动了大批部队两路包抄真武洞。这时，中央机关早已安全转移，只剩下少数后勤单位未来得及撤出，落在了敌人包围圈里，我们医院就在其中。医院本是学校改编的，干部多是“墨水瓶”（贺龙同志对我们教师的戏称），护士多是十四五岁的娃娃，伤病员缺胳膊短腿，还有就是拖儿带女的家属。但在野战军掩护之下，我们冒着大雨，日夜兼程，终于在两路敌人合围以前，从相距不到 10 里的空隙中突出重围，到了安全地带。一清点人数，伤病员一个不少，医护人员也一个不少，婆姨娃娃也一个不少，但却少了一个饲养员老惠。老惠不但年过半百，还赶着医院 30 头猪呢！3 天过去了，5 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老惠还没有消息，大家以为老汉和猪都落在敌人手中了。正在难过之际，突然，老惠回来了！而且，猪也赶来了！30 头猪，一头不少，只是一个个瘦得像猎狗似的，跑起来风快。大家眼泪都笑出来了。胡宗南呀，胡宗南，你的机械化部队连咱的猪也赶不上呀！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都已如烟似雾，但这段往事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而且它永远给我以力量，给我以信心，给我以希望。

安琪

女，曾用名傅英。满族。延中教员。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主要从事唐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主持编纂《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并著有《书法奇观》等。

从延河走过来的……

——甜甜的回忆李骏口述王桂苡执笔

我和你们一样，有过金色的童年时代，美好幸福的青年时代。与你们不同的是：这美好的时光是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度过的。

我有过幻想，有过梦。但，决不是当药学工程师的梦。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但，每当看到飞机，或听到它的声音，或坐上它外出时，我都羡慕得要死。那迷人的绿色的梦，又回到我的记忆中。

在我的脑海中，总有一片绿洲，总有一片蓝天。而在这蓝天下，绿洲上又总有许多美丽的银燕在飞旋。那就是我的甜甜的梦——当一名女飞行员的梦。

然而，生活并不能完完全全地随人所愿。理想的东西，未必都能实现。但，它在生活中，在记忆里，却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一章。

延河边的“梦”

我是 1943 年初从绥德师范附属小学到当年人人都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的。

那年我 11 岁，在以教育家徐特立为院长的自然科学学院就读。那时条件很差，白天上课是大教室，长板凳，听大课，晚自习时，四五个人围着一盏麻油灯念书。那不到 1 尺高的小油灯底座，有的是用泥巴做成的，高级点的是用黑紫色的烧瓷做的。我们为了让油灯照亮的范围大点，把自己的漱口杯、吃饭碗，有时把大脸盆扣过来，将油灯的底座垫高些。灯碗呢？那就更好说了：吃饭的小瓷碗，打破的、缺口的陕北黑色土瓷碗，只要能放点麻油，弄点棉花就行。更多的时候是从自己的棉袄、棉裤的破洞洞中，抽出些棉花，搓成捻捻，放在麻油里，点上就亮起来。好像那时候，什么事都难不住我们。

那摇曳的不到 2 寸高的小火苗，在我们的眼前跳动着。有时稍往前一挤，不是烧了头发，就是燎了眉毛。油灯虽小，却能照亮我们的书，照亮书上的字，同样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点燃了我们理想的火种。在小小的麻油灯下，我们有时畅谈理想，各自诉说着自己的心愿：有人想当火车司机；

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教师；而我想当个飞行员，想得如醉如痴。

油灯虽小，却能照亮窑洞之外的世界。我们这一代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论命运把我们抛向何方，凭着这麻油灯、延河水、宝塔山，就能找到自己的朋友、战友和兄弟，就能回忆起那令人难忘的日子……

夏季，我最爱捉蜻蜓，捉住个蜻蜓，真是爱不释手。我用根小线线绑住它的肚子，把它放在眼前，看呀，看呀，看它的翅膀是怎么动的；看它的脑袋是怎么晃的。看得入了迷，自己的胳膊也就不知不觉地上下动了起来，两手不由自主地扇了起来，好像我已经驾着飞机上了蓝天。把眼睛一闭：蓝天、绿洲、银燕、山川、河流还有那举世闻名的巍巍宝塔，尽收眼底。梦，甜甜的梦，幸福的梦……“扑棱！”我手里的小蜻蜓飞走了。

只有这美好的梦，甜甜的梦，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1946 年底，胡宗南要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时，延安中学还叫行知中学。学校组织起了一个宣传队，我这个生来就爱唱歌的人，成了宣传队的当然队员。

山坡的平地上，操场上，教室里，都有忙于排练节目的人群。往日学习的宁静，朗朗的读书声，都被打破了；往日的欢笑、嬉闹被紧张的排练

代替了。

短时间的排练后，就上了街头。

当年《解放日报》文艺新闻栏报道：“战旗呼啦啦飘，‘战斗舞’开始了。行知中学宣传队连日来在本市桥儿沟、柳树店、边府、西北局、七星铺、枣园等处公演。该队已赴安塞真武洞、吊儿沟、宋家川、李家渠等地公演。节目中有挖战壕、送子弹、运手榴弹、刺枪、歌唱八路军等五场歌舞组成的‘战斗舞’。当他们演到高唱：‘战斗的旗呼啦啦飘，子弹嘣啦啦地响……’这一场面时，成千观众在各自不同的面容上泛起激情。

该队的时事组亦配合秧歌，把目前时局动态，蒋美所订的卖国条约，美军在华暴行，解放军、民兵在自卫战中的光辉战绩，向老百姓进行宣传。”

那时提起行知中学宣传队，没有不翘大拇指的！这里当然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因为我不但是宣传队的队员，而且还是主要演员呢！别看我个小，黑不溜湫，我扮演《兄妹开荒》中的妹妹、《拴不住》中的小媳妇，穿着大红袄，花花裤，演得棒着哪！人人都夸我演得好。有人说我将来准是个好演员，还有人说我将来准是个歌唱家。听到这些夸奖，我心里美滋滋的。我也就开始做起歌唱家的梦来。

宣传队就是要鼓动群众，教育群众起来参军参战，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保卫毛主席。这是宗旨。在宣传、鼓动群众的同时，当然先受鼓动、先受教育的是我们自己。

它首先使我看到了教室之外的天地，学到了课本之外的知识，这就叫生活，这就叫锻炼，这就叫成长。我从中懂得了一个道理：过去是为求解放、争自由，全民团结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为保卫胜利果实，全民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想：既然我爱唱歌，老师又叫我唱，我就应当把自己美妙的歌声奉献给人民。

“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明天为国出力……将来是中华的主人。”这歌声表达了我们对解放全中国的信心，也表达我们对未来中国命运的使命感。

就这样，学习文化我没耽误，宣传工作也干得不错。更多的大道理，我们都不讲，也不会讲。那时，我们都知道我们身边的大人干的事都是好事，是好事就应该跟着学，跟着干。那时的头脑挺简单，只知道一个心眼打老蒋，根本没想到个人的得失啊，风头啊。就觉得念书、宣传、参加生产劳动都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就该如此。当战争越来越残酷，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医疗卫生救护人员极缺的情况下，延安中学组建为战时医院，我也随着老师与同学们加入了战斗的行列。

当飞行员，当歌唱家的甜甜的梦，全都未能实现，但那美好的多梦时节，却总叫人留恋，令人回味。

战斗中学习

我被分配到了手术队。

一听说我是手术队的，啊！好多伙伴都很羡慕，我也感到挺自豪的，走起路来小胸脯一挺，脑袋瓜一摆，满神气哩，好像比当飞行员还美。当时，实实在在地说，我什么也不会，对此行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可我硬是在手术队里干下来了。

在手术队里，我的年岁最小，我负责手术器械消毒工作。

那个年代，可不像如今，白大褂一穿，消毒设备俱全。那时，要消毒

了，我跑去和老乡借个大锅，用3块石头支个灶。有柴就烧柴，没有柴就烧羊粪、牛粪，借用老乡的风箱来吹火。

更多的则是自己的嘴巴当鼓风机。火不着，我就蹲在地上对着灶吹。有时吹得两腮生疼生疼的，急得满头大汗。黑手在脸上抹一抹，甭提啦，那脸要多花有多花。

当时各种条件都差，尤其是用水，就更困难。时间长了不洗澡，不洗头，虱子可就得势啦。我这个不大不小的脑袋就成了虱子的世界。没办法，只好剃个光头，对虱子们来了个彻底的“歼灭战”。好好的头发剃掉了，变成个假小子。我真有点难过，再让我演“兄妹开荒”咋办呀？我的脸本来就黑，这回可好，都管我叫黑李逵。

我把帽子紧紧扣在头上。遇上刮风时，我就使劲往下戴戴，遇上爱逗我的男同志时，我一手捂着帽子，一手干事。就这样，有的同志专爱出我的洋相，往往乘我不备，一手抓去我的帽子。你们想想：用手术刀刮的头发，那头该多光、多亮啊！急得我抱着脑袋到处躲，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真有点难为情呢。

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没有正规医院，更没有像样的手术室。手术器械很少，也很简陋。每次都是随消毒随使用；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娃干这工作，也够难的。

干活苦、累我都不怕，急行军走夜路，我也不怕。这全得感谢我妈妈从小对我的锻炼。她一直把我当男孩子养，我也因此练就了一副刚烈的男子气。

有一次，我拿着镊子从战士的伤口处一夹就把子弹头拉出来了，血弄得我两手都是，我一点也不怕。有时闲下来，也为战士们唱首歌；坐下来听他们讲打仗的事，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干医这行就得见血、见伤、见病、见死，我常常听军医这样对我说。我也常常暗暗对自己这样说。我就是在边学边干的实践中增长知识，增大胆量的。

我们毕竟还是延安中学的学生，在参加战斗的同时，我们还有学习的任务。而我们的学习，是同战争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用来学解剖学的唯一的一副人骨架，是从乱坟中捡来的。为了让我们能尽快掌握最基础的知识，行军时，把骨架的各部位分散到每一个人手里，边走边拿着认骨头的各部位，记特征。到驻地时，把骨头用绳串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骨架，再学习认识人骨总体。当时就是靠这种想象中的记忆来训练每一个成员的。

白天行军拿着骨头走还行，夜间就有些怕。女孩子胆小，好像是天性。我开始见到这些时，也有点胆怯。手里拿个死人骨，吓得闭眼往后退，尽量和战友们靠近些，这样才觉得安全些，可骨头是不能不拿的。手里拿着块骨头，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尤其是夜里行军，心里越紧张，手越哆嗦，越哆嗦就越觉得死骨头在动，真可怕！人往往是自己吓唬自己，越想越多，由骨头想到人的骨架，想到人，想到因重伤死亡的各种姿势的人，是够怕人的。怕，也得行军，也得拿块骨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学习。一会儿传过一小块腿骨，一会儿传过一块头骨，真叫人毛骨悚然。这种夜行军中的学习、记忆真难熬。

光说我不怕，我胆子大，那容易。可真要到个身临其境，真叫人吓破胆呢！

有一回，真把我吓坏了，那是为一位战友做截肢。

军医在手术。我在送手术器械，见到少量的血，我不怕。

当我见到用手术刀将战友的腿绕圈一转，厚厚的肉立马分成两段，血淋淋的时，我真不敢再睁眼看……

“小家伙，拿去埋了！”军医给我下了命令。

妈呀，这可怎么办？拿吧，一个活生生的战士的一条腿，还淌着血。我……只见厚厚的一大圈肉向外翻翻着，鲜红鲜红的血向外流着。半截腿，我怎么拿呢？我又怎么敢拿呢？腿还是热乎乎的，还保留着战友的体温呢！

我的心在抖，我浑身的细胞好像一下子全都动起来了。此时的紧张，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

当时，我不敢正眼看军医，更不敢看那半截腿，我站在原地没挪窝。

“小家伙！拿去埋了！”又听到军医的叫声。这叫声比刚才还大。这是不可抗拒的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们的纪律。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我的双手颤抖着，拎着那被截下来的裹着手术巾、用手术钳夹着还在淌血的腿，我的腿在抖，我的心在跳，好像要从嘴巴里跳出来啦！但是，我咬咬牙，壮壮胆，两手使劲拎起那半截腿，向野地走去。这时一个男生走过，见我战兢兢的样子，川大哥对小妹的口吻说：“哎，不就是把腿埋了？来，放在我的铁锹上，我替你埋。

女生天生的长不大！”他说着，把铁锹伸过来。我怯生生地把半截腿放在上边。刚转身要走，我想起来了，那裹着腿的手术巾、钳子还没拿下来哩！我硬着头皮转回身来，大着胆子说：“放下，别埋！还有东西没拿下来哩！”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去，伸手就把带着鲜血的粘粘糊糊的手术巾、钳子解下来，卷了卷，拿在手里，大步走向临时搭起的手术室，干我的消毒工作去了。

从这以后，什么流血，什么胆怯全都没有了。我的胆子真比过去大多了，好像人也长大了许多。

为了战争的需要，为了明天的胜利。教员除了给我们讲普通医学常识外，还要进行实物的见习，让我们见见真格的。

有一个战友因伤势过重牺牲了。我们医训队把他抬到了一座破庙里，教员想让我们进行一次解剖学的实习，这样会有利于我们今后的护理、治疗工作。

晚上，一个人提着马灯，我端着器械，偷偷地跟着教员来到庙里。凭良心说，我们也不忍心在自己的战友身上做解剖，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子弟兵，我们的战友呀！真有点下不得手。但，这又是现实，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是战争的需要。

当我们将要结束解剖时，有人发现庙门叫轻伤的战士给堵住了。不言而喻，这将意味着什么！我可真害怕了，万一要是他们动起手来，这可都是打仗不要命的人，为同志杀红了眼的人。他们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虽然是夜晚，看不见他们的脸，我能想象得出，他们急眼了。

一个战士用嘶哑的声音说：“你们好狠心呀！我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他死了，为了胜利他死了，没想到回到自己家里，还要挨你们几刀。残忍，太残忍！你们的心太冷酷了……”

我们绝不能让你们这样做。”

“对，不能！决不能！”一些战士应和着。

教员见到这种场面，也慌了。话一时也讲不清楚，也确实不好再作什么解释；讲是需要讲的，讲长远利益嘛，但此时此刻，毕竟是点燃着一把感情的怒火……

我端着器械，闪到暗处。我想，如果万一发生意外，我要保护这仅有的医疗器械。

但我心里也捏着一把汗。真出事这可是自家人互相厮打，那场面……那结果……我不敢再往下想。

幸好，伤员中的一位团长赶来了，他首先对伤员们讲：我们这位战友死得光荣！他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死后又为我们活着的战友做出贡献，我说他光荣，他伟大！

我们应以有这样的战友而骄傲、自豪，我们应该向他致敬！如果哪天我牺牲了，我也向他学习，为后死的战友做出贡献……

话虽不多，却掷地有声。

说完，他转过脸，走到那位战友身边大声告慰战友说：好兄弟你安息吧！我忘不了你，战友们忘不了你，人民忘不了你！明天我们选块干燥的向阳的地方把你安葬。等打完仗，胜利了，我们再来接你……

说罢，他，整了整他那带着火药味的军装，摘下军帽，向那位战友慢慢地举起了右手，一个立正后默默地低下了头，停了很久。一个军礼，一个多么不寻常的军礼啊！

我在暗处，透过人们的缝隙，看到团长身后的战友们纷纷立正，整衣，脱帽，低头向那位战友致敬。

刚才还是一阵急风暴雨、剑拔弩张之势，现在却是如此的安静。这安静中充满了多少人间的深情厚意啊！

他回过头来用商量的口吻对我们说：“今后就别这样做了吧！”教员点头表示同意。

“这事要是先说说就好了。没事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他转身走了，战士们也相跟上走了。

我看到他用右手在脸上擦了一下。我想，他准是掉泪了，为了我们的战士。

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我们也回了营地。

有人说我们的战士是冷酷的人，冷酷的心。他们只知道使枪弄棒，冲锋打仗。这不对，这么讲是不公平的。他们的感情是丰富的，他们的思想是纯朴的，他们的爱也是最真挚和无私的。当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一无私，二无怨，只知默默地奉献。这种精神是多么伟大啊！

后来我一直想，当人们给凯旋的英雄们授勋章的时刻，切不要把这位战友遗忘了。

一家人

由于战争的需要，我们又行军转移到三边（陕甘宁边区的西北角）。

三边地区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那地方到处都是沙漠，又特别缺水。那里的老乡都吃奶子饭，就是用羊奶煮的小米粥。

老乡家的放羊娃上山放羊一去就是一天，中午饭就在野地里吃。他们用粗的白色羊毛线织成的口袋盛上一碗小米干饭，扣上一个黑瓷碗。等吃饭时，就用黑瓷碗盛上小米干饭，拽过母羊挤些奶水一泡，就是一顿饭。

当时，我们吃的是荞麦面面条，这是当地的上等饭。这种饭是婆姨们

用双柄刀剁的。

荞麦面不像白面那样有韧性，它只能擀厚些，在开水锅里一煮，捞出来放在碗里，再浇上羊汤，放上辣子就行了。说是羊肉汤，其实只有一点羊肉星星就煮一大锅汤，实际上是只见汤不见羊肉。这在那时就是相当好的饭，因为老乡家只有干活出大力的男人才能吃上这样的饭，婆姨娃娃们只能喝点这个米粒不碰那个米粒的能照见人影的稀粥。

我觉得房东娃怪可怜的，就把我的饭拿回去跟他换奶子饭吃。她妈看到了，把那碗荞麦面面条留下半碗给干活的男人吃，剩半碗给孩子吃。就这半碗面条，娃娃吃得好香，真像过年一样，嘴巴咂得挺响，喜得两眼眯成一条缝，笑得脸儿都像开了花儿。

因为我年岁小，个子小，脚巴丫也小。当时发的鞋我穿着太大，只好从两旁扎个孔，用个带带一穿，两头一系，五个脚趾头顶不着鞋尖，脚后跟也碰不到鞋跟，真像穿了一条小船。

房东大娘要交军鞋。做双鞋要布料，要费时间。那时鞋不光鞋底要一针一针纳得密密麻麻，就连鞋帮也要密密纳上，一双鞋的重量足有1斤！做这样的鞋是够费劲的。

我当时领了一双军鞋还没穿，我看到房东家实在太困难，我脚上的鞋又没有穿坏，就对大娘说：“大娘，把我这鞋给你，你就用它交了军鞋吧。”

她说：“好，给我吧，我用得上。”她收下了。我挺高兴，心想，我也学会为老乡排忧解难了。

过了几天，我收拾屋时，发现在炕角里有一个黑巴巴的布包。我打开一看，是一双不纳帮的带袷的黑色女鞋。我一下子明白了，怪不得大娘那么痛快地收下我的鞋呢？

我把脚丫拍打拍打，穿上试试。嘿，可钉可铆，甭提多合适啦！真比我那全帮纳的憨军鞋要好看得多。穿上它，那么跟脚，那么舒服，走路都觉得轻快、利索。它成了我是女孩的标志啦。

我跑出屋，找到大娘，在她身前身后转圈走，抬脚让她看，我高兴得合不拢嘴。见我这样，大娘也笑了。

同队的人见我穿上这双鞋，都拿我开心。“黑李逵啥时变成女娃娃啦！”“穿上这么漂亮的鞋，真像个大姑娘啦……”

“这鞋不该穿，留着当新娘的时候穿。”七嘴八舌说得我脸都红了。

“快别说了。我娃本来就长得俊。看你们个个那憨样子，谁也配不上我娃娃，对吧？”大娘说着把我拉到她的怀里搂着，逗得大家又哄笑起来。

那场面，那笑声，那张张笑脸，好像就在耳边，就在眼前。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那么叫人回味。

这片土地养育了人民，人民养育了军队。军队用鲜血与生命保卫了这块土地，保卫了这里的人民。这种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深情，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

它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当飞行员的理想未能实现；当歌唱家的想法也未成功。但是，几十年来，我默默为祖国奉献着，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歇。

在药学界，我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一员。在荣誉面前，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来自麻油灯下。从延河走过来的我，虽然没有成为飞行员腾空而飞，但我在药学事业上的拚搏、腾飞，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我、育我的黄土地、

宝塔山、延河水。 李骏

女，延中九班学生。中国药学会专职副秘书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第一届理事。高级工程师，论文代表作《时空与健康》。曾荣获“功臣奖章”一枚。

我和伤病员情同手足

高耶夫

1947年5月，我们延安中学12班在贾芝老师的带领下，全体开到第四后方医院，从此走上革命战场。我和赵国华被分配到安塞县的三所，医院里几乎都是延安中学的师生，因此并不陌生。

第一次接触伤病员，听到他们的呻吟，看到鲜血淋漓的残肢断臂，我的手不断地颤抖，不敢正视，更不敢触动，不知该怎么才好，也不知怎样为他们解除痛苦。早来的同学带领我们工作。几天以后，我也像他们一样成了伤病员的贴心人，给他们清洗伤口，喂水喂饭，洗头洗脚、剪指甲；帮他们翻身，解大小便；还为他们洗血衣。一有空我们就听他们讲英勇杀敌的壮烈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是英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他们服务，我们感到自豪，我们的灵魂也得到了升华与净化，变得更加纯真无瑕。

要拿棍打我的刘排长

有一个排长，叫刘财旺，炮弹炸伤了腿骨，一片长长的夹板，从足跟顶到腋窝下，全身用绷带缠着，右手也裹着纱布，不能翻身，不能坐，吃饭喝水都要人喂。他伤口还在发炎，发着高烧，有时还说胡话。他每次解大便，往往要三四个人帮忙，一人抬腿，一人抱腰，一人塞便盆，还要担心弄疼了他会发火。

一天中午，我一个人值班，刘排长要解大便，怎么办呢？

他抽出裤带，扣成一个大皮圈，一头套在他的腋下，一头套上我的脖子。我双脚叉开站在他身体两侧，我们手臂相挽，我用力拉他，并使劲把头向后挺，他的身体离开了地铺，全身直挺挺的，只有足跟着地。一个轻伤员把瓦盆放在他身下，他大便困难。终于，我俩都支撑不住了，他受伤的手臂一松，我脖子无力承担他全身的重量，他跌落在地，我也被拉倒趴在他的身上，他身下的瓦盆压了个稀碎，屎尿糊了一身。这下可惹了大祸。他歪着脖子喊：“我的老祖宗，你要整死老子不是？”我竟顺着他的话答道：“我的亲老子，实在是没劲了。”

边说，边请轻伤员帮他翻身，我给他清洗身子，并抽出脏床单，换了干麦秸。我要拿着脏床单出门去洗，就听见他嚷着要一根棍子，我慌忙从柴堆上抽了一根树枝，递给了他，问他要干什么？旁边人推我快走，我不忍离开，找来止痛药看着他服下，又替他擦去了脸上的汗水。这时，他没好气地说：

“你还不滚开，等着老子揍你不是？”我才恍然大悟，他要棍子，是为了要打我……下午，我为他铺洗净了的床单，发现这个铮铮硬汉用毛巾捂着眼，不停地抽泣。我问他：“伤口又疼了吗？”他摇了摇头，竟至放声大哭

起来，说：“小兄弟，刚才是我的不对，我伤口疼，脾气躁，不该给你发火……”

不久，医院接受了随军西征的任务，轻伤员归队，重伤员后送。刘财旺已上了担架，但他就是不让抬走。等我来到他身边，他拉着我的手，淌着泪说：“小兄弟，我脾气不好……”说着，从枕下抽出一条新军裤说：“我一时起不了床，裤子你拿去先穿吧！”那时，快6月了，我们夏装还没发到，我的棉衣棉裤上破了许多口子，我常常从破处扯点棉花给伤员擦大便，弄得棉衣不成棉衣，夹衣不像夹衣，到处露着棉花，老乡的狗以为我是叫花子，撵在后面叫。刘财旺的好意我理解，我对他说：“刘排长，你的腿很快就会治好，你还要去打冲锋、拼刺刀。我们的单衣马上就会领到的。况且这棉衣里有棉花套子，还能给伤员擦大使用，称得上它是件宝衣哩！”刘排长满是泪痕的脸这时绽开了笑容，他最后一个离开了医院。

坚毅的梁指导员

陕北农村很贫困，加上战火频繁，使伤病员的供应很困难。一些重伤员营养跟不上，伤口愈合很慢。一位姓梁的指导员，肩背部两处炸伤，一条胳膊、半个胸肿得像气吹起来一样。当时药品有限，连磺胺也供不上，眼看着他发高烧，一天天在消瘦。军医让他的通讯员去买只鸡为他补身子，通讯员连着几天没买回来，因为给多少钱老乡都不卖，急得通讯员直掉泪。

指导员半个胸愈来愈肿，在靠近裤带处发现一片紫红，疼得手不能摸。主治军医给他切开，脓如泉涌，“咔达”一声，一块炸弹片落入换药碗中。通讯员扶着他直掉泪，我端着换药碗的双手也不停地抖动。医生往他肩部的伤口注入的盐水，从腰部的刀口流了出来，开始全是脓，后来是脓血相混，以后便全是血水，倒了四五碗。从此，梁指导员烧退了，肿也渐渐消了。梁指导员真不愧是一条山东汉子，体温刚退，他便有说有笑，讲不完的抗日除奸故事，吸引着伤病员和我们工作人员。

青年团要求我们想方设法为伤病员解除痛苦。我下了夜班就同梁指导员的通讯员一起去买鸡，还是到他去了几次的那个村子。我俩好话说尽，人家就是不卖。大娘要做饭了，见缸里没水很着急，我赶忙就去为她挑水。那时我个子太小，挑不动水桶，两次从山坡下抬上来两桶水，感动了老人，老大爷这时捉了一只正下蛋的母鸡给我。通讯员给了他一块银元，他不收，说他是拥军。忽然，我发现一个青年妇女在一旁落泪。老人说：“媳妇坐月子，娘家抱来只芦花鸡，舍不得杀，留着下蛋，现在给你们了。”看着老人千层纳补的衣服，我俩商量脱一件衣服给他。老人又执意不收，说两个小八路小看他了。

原来他当年是徐海东部下的红军呢！我说：“你老人家不收钱是拥军，我们送您衣服是爱民……”趁老人大笑起来，我把衣服塞到他的怀里，光着脊梁就跑了。

我在担架上的日日夜夜

战局瞬息万变。一天，医院奉命转移，担任指导员的郑松庆等三人提前于半夜出发。

早晨天刚亮，情况发生了变化，命令我去追回他们。刚下夜班，我没吃没喝拔腿就跑。

正午飘过来一片乌云，一阵黄风过后，深山里下起雷雨来。我仍然一步不停地跑着，汗水、雨水湿透的衣服，紧紧裹在我身上。雨过天晴，风还很大，一会儿就吹干了衣服，可吹干的衣服，不一会儿就又被汗水浸透。就

这样湿了干，干了又湿，我终于在一家院落的角落里找到了正在避雨的三个人。我向他们传达了上级通报的军情和新的转移方向，便匆匆按原路返回。

回来已是半夜，我躺在床上像瘫了一样。师仲姚同学给我端来一碗剩饭，我一阵恶心，路上吃的干粮全吐出来了。半夜里，我突然全身发冷，下巴不停地颤抖，牙齿“得，得，得”地磕响；一会儿又全身燥热，好像腹腔中着了火，真想把肚皮扒开。师仲姚说他一个人带领伤员，要我自己顾自己。

实际上，我已经顾不了自己，只能由几位同学帮我打行李，背行李。所领导摸着我的头说：“小家伙烧得烫人，病得不轻呀！”

最后，只剩下少数几个同学和轻伤员了，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带我走。几个轻伤员抱我下了炕，背我出门，上了担架，担架是他们用绑腿捆的。轻伤员抬着我出发了，他们说：“我们这么多人，就是轮着背，也要把你带走，决不能把你丢给敌人。”

病中的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力，任同志们抬着我，后来又坐上了一头小毛驴，摇摇晃晃地前进在黄土高原上。一天，我看见刚刚取出弹片的梁指导员，由人搀扶着斜弯着腰，艰难地和大伙走在一起，我好不忍心！可我不明白，我是怎么坐到了梁指导员的小毛驴上。我一直在发高烧，别人说我有时糊涂，有时哭闹，还反抗和叫骂。我自己却都不知道，我只觉得我很清醒，清楚地记得我身边发生的事，而且至今似乎记忆犹新。

我总是从驴背上滑下来，后来不知谁在鞍子前后竖了两块板，用一副绑腿把我捆在鞍子上，我再也掉不下来了，但是脑袋却像不倒翁一样地来回摇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又睡到了担架上了，不是轻伤员和同学抬，而是由民工抬的。

熟悉的声音听不到了，我是和一大批重伤员一起被转移后送到沙家店。担架在路边休息，我突然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声音，循声望去，是贺司令——贺老总！只见他两脚泥巴，裤管挽在膝下，左手提着两只鞋，右手指向前方，放声喊道：“领粮的部队向那边走；交过粮的群众赶快离开；伤病员喝完水就走，担架不要在这里休息！大白天，飞机过来不得了……”我推开嘴边的水碗，兴奋地对民工说：“你看，那就是贺龙，贺司令！”民工放下碗，几步就挤到贺司令身边，拉着他的衣服说：“那面一个同志叫你。”贺司令随他来到我面前，弯下腰亲切地问：“小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喊我有啥子话说？”我受宠若惊，嗫嚅无语。他发现我别在挂包上的校徽说：“你是延中的学生？”我点了点头。他说：“延中的娃儿我都认识，你们变成了医院，干得很好，都是好样的……”我顿时觉得病好了许多。我记得我笑了，笑得很美。他又问：“你是受伤还是生病？”我答：“生病。”他摸了摸我的头说：“唉呀！好家伙，你烧得很呀！喝水了没有？”他对民工说：“给他喂水，他发烧要多饮水。”又转向身边一个军人问：“西瓜还有吗？拿给这个小鬼吃。”一个战士说：“就剩一点了，是给首长留的。”

贺司令起身说：“留着干什么？我有水喝就行了，快去拿来，给这个小鬼吃。”一块大西瓜捧在我手上，我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贺司令说：“莫掉泪，快吃，吃下去，病就会好。”他蹲下来，扶着我抖动的手，把西瓜送到我嘴边。我咬了一口，他笑了，笑得那样慈祥：“莫掉泪，娃儿，能吃病就能好，吃得多，好得快。”他回身对民工说：“喝好水就走，这里人多，目标大，莫在这里休息……”记得他还说过，部队要打大仗，送伤员到后方去。不久，传来了沙家店战役胜利的消息。

病情直转向好，我开始知道骑毛驴、睡担架不是滋味。骑一天毛驴，双脚肿，两胯酸疼，站不定、走不动。以为睡担架会好一些，哪知，半天用不了，绳索在颈部、腰部靠拢，屁股、肩背、头不断地从空隙里向下漏，好像整个身子横置在几条绳索之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我人小，个子瘦，民工们抬着我毫不费力，如同游戏一般，他们喊着“一、二、一”在大路上跑，我像弹跳一样，在担架上起落。每次我们最后出发，最先到达。

说来凑巧，有一天发现抬我的民工中有一个是我表哥，他竟没有认出我来。大概我病得不像样子了。晚上，我们投宿在牯牛沟村，离我家只有十几里路。表哥没有信守诺言，把我生病的消息告诉了我家里。第二天早上，妈妈便盘腿坐在我的炕头上。我的手搭在妈妈膝头上，妈妈抚着我的手，不时转过脸去，用衣襟擦拭双眼，她不让我看到她掉泪。妈妈生我们兄弟6人，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身边只有四哥一人。他也在支前，乡里只给半天假，今天他陪母亲来看我。

妈妈要走了，她说还要来看我，说着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院门。妈妈噙着泪花走了。

她深知身患重病的儿子生死未卜，但她更知道我是属于革命集体的，就没有强留我住下。

在牯牛沟，原来打算让我在那里接受治疗，没想到第二天黄昏又上了担架。天下着大雨，民工们摸着黑，冒着雨，一步不停地走了不知多久，我又被安置在老乡的炕上，护士拿走了我的湿透的衣服，我赤身躺在老乡的羊毛毡上。

天不亮，我又被抬到佳县的枣树林里，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去。昨夜一场大雨，今日雨过天晴，但有经验的艄公知道此时的水情，非万不得已不可下水行舟。快到中午时，民工、护士来搀我上船，我忽然发现那护士是延中的刘志英同学，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穿衣服……”她问：“我的裤子你穿吗？”我答应了。她转身脱下一条长裤让我穿上。船的底层载着医院的物资，上面坐卧着伤病员，我在横架于船舷上的担架里躺着。船工喊：“那样不行，太危险，”可是船已经离岸了。船上一共横架着三副担架。

船工一身泥浆，一丝不挂，一阵紧张的号子，我们已颠簸在浪峰间，远山近树，飞一般地移动旋转，船工一阵吆喝，便在河东靠了岸。岸上又是一片枣树林，林子里奔出了山西的民工。有人问：“谁抬这个小八路？”我最先被背下来抬进枣树林，热情的晋西北人民早已备好了水和饭。

我生了一场病，在担架上辗转经过了3个分区：陇东分区（庆阳、华池、环县、曲子）、三边分区（定边、靖边、安边）、绥德分区（米脂、子洲、绥德、佳县）。一路上受到同学、伤病员和民工的热情帮助及首长的亲切关怀，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深厚的革命情谊。

“李老五”的笑话

1948年，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医院随军南下，改称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3月间，我们在离战场10里的塬头接收伤员。连日大雪封山，给战争隐蔽打伏击创造了条件，却给转运伤员造成了很多不便。白天，地皮解冻，一片泥泞，一步三滑，稍一不慎，滚下深沟就会粉身碎骨。我们只好拽着崖畔上的枯草、树根，小心翼翼地滑行。开饭的时候，挑着饭食、水桶，手里端着菜盆，更是提心吊胆。师仲姚与我年纪相仿，他挑着水和饭在前边走，我在后面端一脸盆菜，有时空手都跟不上他。有一次，我摔倒了，一盆

豆腐菜全扣在地上。他放下挑担，两手捧起上层的豆腐块，又跑回厨房端来一盆面疙瘩汤。

这时，盛开水的桶忽然自己倒了。原来那水桶有点漏，淌出的热水融化了冻结的冰面，稀泥流动，水桶倾倒了……水在当时是最困难的，是几个民工咬着牲口在塬畔下的深沟里驮的水，山路陡峭，都说不清是人牵牲口还是牲口拖人。驮回来的水，放置一天，便沉淀出一半泥，一半水。伤病员饮水按人数分，我们只能饮用伤员剩下的水。洗漱没有水，治疗用水也难以保证。我们倒了一桶水，愧不待言。忽然想到揽雪化水，浮头上的雪化水后，烧开了可以喝；

接近地面的雪，化水沉淀后可以给伤员洗血衣，洗绷带等等，这才解决了用水问题。

转运伤员的任务完成以后，医院到了秋林收容治疗，建立了一些制度，提出了各种管理要求。那时，我负责治疗室，曾闹了一个大笑话。

治疗室很简陋，桌面上只有碘酒、红汞、酒精、蛋白银、樟脑酒几种外用药。我们都是认瓶子，认颜色使用。主治军医怪我不写瓶签，我说：“写不了拉丁文。”他说：“写什么都行，并不要求都写拉丁文……”于是，我存心开个玩笑，按他的江西口音，把“樟脑酒”写成“张老九”；把“红汞”写成“分功”；而把“酒精”写成“九斤”，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自以为很得意。一天，我发现两个人在桌前翻弄药瓶，他们还自语道：“装了什么，能有九斤？”说罢，打开瓶盖闻了闻，笑了。又拿起“张老九”，闻过之后，两人又大笑起来。

没等他俩再去评价“分功”，我连推带喊，撵他俩出去。还说：

“我们忙得顾不上整理，你们没事乱翻什么？”两人还没被我推出门，就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卢勤良院长。他向我颌首示意，我知道坏事了，院长陪同来的肯定不是一般人。我提个水壶就溜出门外。晚上，全所开会，说有上级领导作形势报告，我们都挤到前面。谁承想到就是刚才那两位，我起身要躲开，其中一位拉着我说：“不要走！我们已经认识了。你不是‘张老九’办公室的吗？你们那里有没有李老五？”

另一位同志问：“‘分功’是什么？”我答：“红汞。”“为什么写‘分功’？”“主治军医是江西人，按他的口音写成了‘分功’、‘张老九’。”大伙一阵哈哈大笑。

接着开会了，院长介绍两位首长。一位是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后勤卫生部部长曾育生同志；一位是第一野战军后勤卫生部金来川同志。首长没有批评我，但从此我得了个“李老五”的绰号。

喜欢数学的周教导员

在桑柏，有一个教导员叫周广，他上唇根部被枪弹横穿致伤，一半鼻子被掀起来，嘴闭不拢，咀嚼疼痛，只能喝小米粥，面糊汤。他夜里伤口疼、牙疼，睡不着觉，便与我们一起巡逻；白天闷着头看书。我记得他有一册很厚的数学书，他常常捧着看，拿着树枝在树荫下写很长很长的算式。我们十分钦佩他的学习精神，我们不少同学还跟着他学呢！我们说他会成为数学家，他却幽默地说：“家不家倒没有想过，但是总不能一辈子打仗。”他又说：“形势发展很快，呆在医院里消磨日子，仗就叫别人打完了……”因为颌面伤有特殊的处理要求，医生让他转到河东去，他不肯。他说不管长成什么样，伤好就出院。他惦记着他的战士，惦记着打仗。

有一回，几日连阴天，粮食、柴禾都没有了。幸得一个晴天，我们便兵分两路出发。

大队强劳力去运柴和煤，留下几个女同志和换夜班的同志去背粮。周教导员也带了绳索、面袋站在队中。警卫员说服不了他，央求我一定不许他去。我说：“警卫员每次和我们一起背粮，你就不要去了。”他说：

“我的嘴伤刚好，吃得多，至少应背回够自己吃的粮……”其他伤病员也异口同声，要背回自己的口粮。这次背粮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背的粮食两周也吃不完。

奇怪的病号马半栓

在槐柏，有一个普通的病员马半栓，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十八九岁，河北人，是×旅×团杨团长的警卫员。他说他没有伤，也没有病，逢人便问：“你看到杨团长没有？山东口音，细高个，谁见谁亲……”当他得到否定的回答，他便转向另一个过往的伤病员再问，天天如此。

原来，他的团长被炸伤了腿，后送途中遭遇敌人。突围中，他为团长找水，与担架失散了。混杂的人流中，有人说团长在前面，他往前撵；有人说团长在后面，他又向后追。一天也没有找到，两天过去了，还不见团长。他哭了，哭得不吃不喝；他急了，急得神经错乱。有时，他守着重伤员问：“首长，你想吃些什么？你说，你说，你总不能不吃不喝。”同时，他递上为团长打来的满满一壶泉水。有时，他拉过身边的护士，认定是首长，向他请示工作，关照吃住。有时被他认定是战士、通讯员时，他就叮咛再三，百般爱护。他平时从不打人，可是西府战役后，每人发了一套缴获的敌人军装，谁穿在身上，必然要挨马半栓的打。

夜间，师仲姚和我共同看护他，我们用被将他盖在中间，我俩压住被头睡在两边。

即使这样，他也能够轻手轻脚穿衣下地。等我们发现了早已不见踪影。我们循着狗叫声去找，准能找到他。他从这家院落走到那家院落，为这个伤员掖被子，为那个伤员垫枕头，他说他正在查铺。有时在村头巷尾，池塘边，田野里，他在看地形，查哨。我们跟着他，保护他。

忽而，他喊：“卧倒！”忽而，他叫：“冲上去！”有时抱住你苦苦哀告：“首长，你该休息了……”护士中三个人对他有办法：贺光耀能抱住他，压倒他，他一点儿动不了；师仲姚跑得快，马半栓跑多远，多快，都能跟得上；韩陆与众不同，他平静地说：“半栓，首长在办公室，你胡跑什么？”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都会立即来到治疗室，腼腆地问：“首长，您有事叫我吗？”我常常被他问得没话说。一会儿，他便忘了我是“首长”，喊一声“有情况！”拉着我就跑。一个夜晚，他轻轻推醒我和师仲姚，神秘地说：“有任务。你俩吃点儿东西马上出发。”说着他将一块热腾腾的猪肝塞给我们。师仲姚一看半生不熟的猪肝说：“首长，你休息，我们现在出发，边走边吃。”就这样，马半栓在神志恍惚中度过了数十个日日夜夜。

在转战中，一天巧遇到另外一所的休养员，其中有马半栓的团长，他俯在团长的身上恸哭，又递上军用水壶请团长用水，并检讨自己警卫不力，要求团长处分他。团长要他回到身边，他忽然发现团长穿着敌军军装，不容分说地脱下团长的衣服，打开自己背的小包，像下命令一样对团长说：“这是你的衣服，换上！”随后，他向我们所有的同志告别，但不与穿敌军衣服的人握手。

我们动员了三套马车

一天半夜，我们接到指示：带领全体伤病员紧急转移。派来的担架有限，要我们去动员运输力量。我和高志亮两人加起来不到 30 岁，孤零零地下塬、翻沟、跳涧，深入新区农村。

事后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

我们挨门呼喊，狗在院墙内吠叫。跑了几条街，连门都叫不开。天快亮了，一个看上去挺机灵的汉子提着个大筐走出村外，在麦场上搂了一筐麦秸回来，在一个拐角处向我俩招手。我们不敢贸然上前。他又一次招手，并小声喊道：“小解放！过来对你说话。”我决定试一下，对高志亮说：“万一 是坏人，你不要管我，顺来路往回跑。”我过去后，那人问：

“动员粮还是要人？”我说：“担架、大车都行，送伤员。”“担架难，人少凑不起来，有一套车能拉好几个伤员。”他还指着一家说：“去叫他家的门，他家有牲口、有车，别的院子叫开门也没用。”他还说：“人好说，套起车来就有人。”我跑去敲门，果然是个富户，门前有栓马桩，两旁有狮形石兽，黑漆大门，门上有狮头卡晋、泡泡钉。

推不动，喊不应。我有点失去信心，那汉子又示意我砸门。我捡了块半截砖，一边大喊开门，一边使劲砸。门开了，一个干瘦老头探身出来，又点头又哈腰，口称：“小老总！”

慢待，慢待。”之后皮笑肉不笑地把我迎进厢房。未等我说明来意，就喊：“上茶！备饭！”

并双手递上一个水烟袋，说：“请用！请用！”我拍案而起，他说：“息怒，息怒，公事缓办。”我说明来意，他说：“理端，理端，庶民百姓理应照办，只是车轴用不成了，不然……”果然，他拿出一个两头细得眼看要断的车轴。我很失望，他说让我张罗好车，他出牲口。我临出大门时，他跟在后面说：

“一路平安，步步高升！”然后关上了大门。

我出来准备敲别家门时，又见那个搂麦秸的人，他说：

“老家伙骗你，他家车轴在神龛里。他家不出车，这村里你就要不下车。”忽然，他又说：“你俩太小了，怎么也不带个家伙？”他领着我到麦秸堆前猫着腰，扒出一个“家伙”，说是中央军逃跑时捡来的。当时我也不认识那是什么家伙，像手榴弹，没有拉火索，木柄长，铁头大，后来才知道是个枪榴弹。我拿着“家伙”又去喊门，很快门又开了，还是那个瘦老头，阴阳怪气地说：“一回生，二回熟，请进！请进！”一面轻蔑地说：“想必是小老总套好了车，来拉牲口？”趁他得意之时，我把手中的“家伙”墩在桌子上，厉声说：“少来这一套，快把你的好车轴拿出来，今天你不出车我不走。”说话间，我推出凳子攀上神龛。老家伙慌了手脚，扑上来说是他家祖宗神位，不容亵渎，又喊又拉。我一把拉开小门，眼见一根车轴在里边，随手拖出，放在地上。我质问老家伙：“这是什么？欺骗解放军，你还想活不想活？”这时，街上人多起来，高志亮也闯进院来，一边吆喝套车，一边拖住老家伙要一起带走。他家里的人慌了，答应套车。围观的群众也有说情的，又是那个搂麦秸的汉子，一边向我们挤眼发笑，一边说：“大军高抬贵手，我这里给你套车，千万饶了我们掌柜的……”我推着老家伙喝道：“走不走？要 不走，就出 5 套车……”那个搂麦秸的汉子从中调解，很快套了 3 辆车。10 点前后，我们乘大车登上归途，那搂麦秸的汉子说：“小解放，你真行，全

村只有 3 套车，全让你要来了。”但这些都是由于他的帮助，我很想知道他的身分，他却避而不谈，只是说：

“我们村里穷人多，咱们都是一条心……”他还说：“现在没法说，以后你能想得清。”但是，至今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也许是地下党员，也许是拥护革命的老百姓。

巧遇与撤退

1948 年 11 月，一个寒气逼人的夜晚，我们突然看见村外一队人影匆匆移动。警觉的双方同时喝问：“口令！”原来是自己人。“你们是哪个医院的？”我们的衣服最好辨认。“梁指导员！”我惊喜地呼喊扑了过去。“瘦猴！怎么是你呀？”梁指导员一把拉住我，离开行进的行列。“怎么你们还在这里接收伤员？部队都撤下来了，你们还不转移？”“这地方很可能会放弃！”我感到一阵紧张，队列里走出一个人问道：“什么人在讲话？”“报告首长，这里有咱们的医院，……”“怎么还没有撤？”听口音很熟，黑暗中还隐约看到他嘴唇有点向上翘，我喊了一声：“周教导员！”我忙去找来了苏所长和曹协理员，部队不停地在后撤，他们在路边低声谈话，说部队要在 10 点钟以前撤到洛河以北。周教导员说：“梁营长，归队吧！这里由我安排。”原来，梁指导员已升为营长，周教导员成了代理团长。周教导员很为难，放手不管，我们是无法带领近 500 名伤员转移的；留下来掩护撤退，他又没有作决定的权力。经过反复考虑，他还是根据特殊情况处理，留下一个排帮助伤员撤退，这个排由副连长带领。

轻伤员很快组成了几个分队，有几个当过排长的伤员自己主动担负起带队撤退的任务。重伤员全部被抬到学校门外集中。工作人员忙于为大家开饭，打扫房屋，归还借用物品和铺草。一切清理完毕，天还没有亮。我带领几个同志和民工到村外掩埋 7 具烈士遗体，到东方发白时才挖好两个坑，太慢了。这时，掩护我们的部队也在村外挖工事，我去借工具，没想到带队的副连长竟是蟠龙战役负伤，住在医院时让我递给他棍子要打我的刘财旺排长。那天夜晚竟有这么多的巧合，正是这些巧合促成我们撤退顺利进行，保证了医院的安全。刘连长与我一见如故，他带了一个班很快完成了任务，并且为每一位烈士墓竖立了牢固的标志。这时，部队派来苏营长带纵队后卫营的一个连队来接交阵地，他传达上级命令：“我军一切人员必须在 10 点钟以前撤离此地，12 点之前赶过大沟。”营长掏出怀表看了看说：“现在是 7 点。”刘连长走时一再对我说：“抓紧转移，时间很急！”

曹协理员拉我到村外，遥望大路，等待着担架和车辆。他说，刚才院部派骑兵来通知：“12 点以前必须全部撤退，轻重伤员必须全部带走，不能留在群众中。”还有 39 名重伤员等待运输，他急得团团转。他又庆幸地说：“多亏你来报告了情况，咱们提前行动，不然 500 名伤病员怎么撤退？！”我说：

“您别急，我们把烈士掩埋了，占用的房屋打扫了，韩陆正检查群众纪律。出去动员牲口、担架的同志一回来，39 名伤员就可以转移了。”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谈何容易？”

敌人仅在离我们几里处埋伏着，我们派出去的人在敌我之间的地区活动，万一出岔子，对伤员，对同志都是犯罪呀！”

说话间 3 辆马车来到面前，云连长、孟昌护士长、师仲姚、贺光耀、魏亚中等同志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我们如同久别重逢，拥抱在一起。除了大

车，还有四副担架，加上我们原来担药用的两副担架。担架只可以抬6个人，还有23人，3辆大车拉不走。所领导找村长想办法，村长说毫无办法。人、车都没有。冯营长掐着手指算；“还有一个半小时……”这时，村子里已经很乱，曹协理员要求大家集中在学校门口，不要到村里走动，免得发生意外。这时，院部送来5副担架，虽少，正在关键时刻。担架用完，剩下28名伤员躺着或坐在大车里，有的甚至是半悬空“挂”在大车上出发了。大家十分兴奋，冯营长看了看表，还不到9点。

突然，曹协理员问：“韩陆哪儿去了？”平时检查群众纪律至少有两个人，今天人少事多却只有他一人，不过一清早就开始检查，也该回来了。我立即出列喊道：“我去找他！”冯营长瞪了我一眼。冯营长转身对村长说：“现在部队少了一个同志，你带我挨家挨户找，找不到你要负责！”那村长吓得嗦嗦地发抖。冯营长命令：“医院迅速撤退，不能等！留下一人帮我辨认。”我留下了，心中想着“帮助辨认”的很可能是一具血淋淋的尸体，不然干吗要辨认呢？我又紧张又害怕。韩陆平时待我像大哥哥一样，我一定要找到他。冯营长提出要带上驳壳枪跟在村长后面，我看见那驳壳枪张开的机头，更是感到紧张。村子里，群众东一个，西一个，手里拿着铁锹、锄头，转来转去。如果没有冯营长他们，我很可能成为捕杀对象，我左顾右盼，生怕有人把我揪了去。走到村中央，韩陆跑来了，还有两名战士。原来他检查将毕时，有群众对他说庙里有一死去的伤员，他去看了，那神像背后横卧一具尸体。庙里没住伤员，哪里来的尸体呢？冯营长与我们到现场检查的结果，是一个俘虏兵的尸体，就让村长挖坑埋掉。前后不过花了半小时。我们要尾随医院走，冯营长不允许，说那是找当俘虏，还说我们两个人连村子也出不去。我们争辩了一阵，他派两名荷枪的战士把我们送出村外，一直送上大路。我们牢记营长的话：顺大路往北走，万万不能进村。一直走，不要跑，也不要休息。

大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俩愈走愈快，我有些跟不上韩陆了。他时不时地从后面推我一把，后来连推带训：“想当俘虏吗？像没吃饭一样！”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已开过饭了。我又饿又困，一点精神也没有了。韩陆带了一茶缸肉菜，给我倒了一半，我边走边吃，不知是肉的作用，还是革命的友情的激励，我又来劲了，大步走起来。走出五六里，路上停放了一副担架，三个战士在休息，原来抬担架的民工逃跑了，战士只好两个人轮流抬。韩陆看见就去帮抬担架。我跟在后面跑，但距离越来越大，跟不上了。我决心不休息，一定要撵上队伍，不当俘虏。

黄土路上只我一人，见不到人感到孤单，遇到人又怕是个坏蛋，心情矛盾极了。忽然，我见路边蹲着一个人，我刚要跑掉，他喊了几声。原来是一个轻伤员，他去解手，因受了伤脚越走越疼，当他看到鲜血浸透的绷带时，再也站不起来了。在这荒郊野外怎么办呢？我扶着他站起，他单脚跳出两三米，已满身大汗。我不顾他反对，背起他走出十几步，他硬从我肩上滑下来，叫我先走，给他留一个手榴弹。这怎么行呢？我把毛巾撕成三条，捆在他渗血的纱布外，又折了一根树枝给他当拐杖，搀扶着他上路，走出二三里时，后面来了一辆骡轿。我向车主求助遭到拒绝，好在路不宽，我们走在中间车过不去，我继续央求。一位文静的妇女掀开车帘问：

“几个人？”我一看，是在村里帮过我们的那位知识妇女，她还因此受到家中的反对。她显然认出了我，说：“坐上来吧！”

就两个人。”轿围里一个小孩探头出来，又回去悄悄告诉那妇女：“妈

妈，就是这个人，给我包了伤口，腿就不出血了。”那妇女探头出来说：“这里打仗，我是奔你们来的；部队撤走了，我去韩城我任教的学校住一段。”她又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我礼貌地回避了。到了岔路口，车要西行，我正不知怎么办，发现村外一大群人，韩陆、光耀等正招手向我跑来，大家七手八脚抬走了伤员。那妇女和我们对视良久，没有道别，一声响鞭，车动了，我站在岔路口目送她远去。

我回到集体中，战友们擂着我的胸膛，捶打着我的肩膀说：“就差你一个，等了很久了，以为你当了俘虏，没想到你还带了个伤员坐着车回来了。”师仲姚说：“你小子福气不小……”在这次转移中，许多同志都立了功，我也荣立二等功，因为我发现紧急情况报告，使院部提前行动六七个小时，避免了伤亡。而我的立功却得力于巧遇的梁指导员、周教导员、刘财旺排长，他们都在我们医院养过伤，这次奇迹似地帮助了我们。

在几乎掉队的情况下，又巧遇了那位农村知识妇女。一切都这样巧，巧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可能就叫善有善报，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们才圆满完成了撤退任务。

用体温计治好病的祝连山

解放西安，我们驻守在三原县西阳镇。我切除了鸡眼，为了照顾我少走动，班长分配我观察濒死伤员祝连山。

祝连山，四川人，我军某部班长，原系解放战士。他伤得很重，透过伤口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肠子。医生说准死无疑，早就为他买下了棺材。可他自己说，家乡很穷，他仇还没有报，一定要快快治好伤。他要打回老家去！当时，我们的体温计是用酒精浸泡消毒，放在嘴里还有酒精味。他把体温计含在嘴里，一会儿就要换，说是“没味”了。

我有些烦他，改为腋下测体温，他又要求给他一侧腋下夹一只，争取好得快一些。开始我多少有点嘲弄他的无知，后来想他留在人间已没多久了，同情他，怜悯他，满足了他的要求。口里含、腋下夹，只要他能得到安慰，就尽量顺着他。

扶眉战役打响了，医院奉命带领伤病员紧急向临潼转移。

为祝连山买的棺材里放了很多蔬菜，我的脚不能走，也躺在棺材里，在烈日炎炎下，任车轮滚滚，摇摇晃晃往前走。

说也奇怪，谁也没有想到，祝连山竟然没有死，经过几次手术，他的伤口一天天长好了。我们大家都说不出的高兴，祝连山更是把医院的每个同志当成救命恩人。

祝连山伤口恢复的时候，我正生病，患的是“回归热”，来势凶猛，一阵寒战之后，便是高烧，接着人就糊涂了。指导员孙学甫、护士长师仲姚、副班长刘进亮、二班长贺光耀等经常轮流看护我，但也都束手无策。祝连山更是寸步不离，他不停地取来井水，为我冷敷额头，并且执意要我仿效他，把两支体温计同时夹在两侧腋下，还要我嘴里衔一支。我讨厌酒精味儿，不愿含在嘴里，但他不依，而且不停地给我换，三番五次地蘸酒精。按他的经验，没有味就得换。他还说，夹得时间愈长，好得越快，半小时，一小时，他也不让我取出来。我不愿伤害他的热心，也只好顺着他，任他施展治疗。他幸亏不知道有肛门测温，否则也会给我用呢。由于病情的转化，六天后我体温下降，祝连山便大讲体温计退烧之神效，令我哭笑不得。五六天后，体温回升，他却又怪我不听他的话。从此，每次测体温，他再也不离开我，

坚持要给我用三支体温计。医师给我用了一支德国特效药“九一四”，体温下来，再没上去。祝连山比谁都得意，又一次大讲起体温计降温的神效来。

祝连山要出院了。他感激我用体温计治好了他的伤，救了他的命，我感激他用体温计降了我的体温，治好了我的病。

他拉着我的手，掉下了泪，我看着他的脸，也掉下了泪。他走了，我在床上向他挥手告别。他还一再叮嘱我：“体温计一支不行，两边都要夹；嘴里那支味淡了就换，时间越长越好...”

这已是 1949 年的事，没想到 1951 年深秋，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这对生死与共的战友又相逢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正护送伤员渡江，悄悄与舵手说话。不远处的大船上忽然有人喝问：“什么人讲话？”舵手害怕了，说连长要批评了。接着又是一阵追问，舵手才胆怯地说：“是与护送军医讲话。”那人喊道：“军医是不是姓高？问他认识不认识祝连山？”我喜出望外，猛然站起，大喊祝连山，他这时看见了我，一跃到了小艇上，小艇一阵摇摆，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上面讲的是，延安中学转变成医院后，我们师生与伤病员相处中的几个小故事。我本来并不喜欢医学，正是由于伤病员们为革命流血和献身的精神激励着我。我在战争的实践中刻苦攻读野战外科，最后于 1954 年秋在朝鲜战场考试结业，成为一名军医。我长时期为伤病员服务，与他们休戚与共。在解放战争中，在朝鲜战场上，以至在老山前线或在和平的日子里，我都与伤病员情同手足，和他们结下了永生难忘的革命友谊。

（金茂年记录整理） 高耶夫

男，延中十三班学生。原解放军 30 医院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曾参加西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前线的医疗工作。

80 年代，又参加了云南前线医疗工作。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出席志愿军后勤英模代表大会。获“人民功臣”、“军功章”等奖章 6 枚，荣誉证书一册。

绝不能让伤员落在敌人手里

薛振和

—

1947 年 3 月 19 日，胡宗南匪军侵占延安。我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之后，我们这些原来延安中学的学生从吊儿沟转移到志丹县古庄科收治伤员。我当时是护士，我和另一个护士冯育芳、军医马五甫三个人是一个医疗小组。

志丹县山区的村子都很小，每村只有一二十户人家。我们负责李渠、窑湾、新窑湾、蔡科峁四个村总共约三四十名伤员的医疗护理工作。

那时，伤员都分别住在老乡家里，吃住由老乡负责，日常生活提倡轻伤员照顾重伤员。我们每天到各村给伤员们检查伤口、换药、打针。初进村时，我们人生地不熟，各家都有狗，咬得我们往往进不了门。后来我们给老乡打扫院子，到沟里去担水，赶上牲口驮水，还给老乡看些小伤小病，渐渐

地熟悉了，以至亲如一家人，连村子里的狗也认得我们了，见了我们直摇尾巴。

一天，我们忽然收到所部来的鸡毛信，通知我们带行李回所部。我们立刻按指示向村政府交代安置了伤员，抄近路翻山越岭回到了所部。

一到所部，佟指导员向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敌人乘我主力在陇东、三边作战之机，南北夹攻，向我志丹县扑来，妄图消灭后方机关。我们现在要向东转移，赶在敌人到达青杨岔之前，通过青杨岔。

我们问：“伤员怎么办？”

佟指导员说：“能带走就带走，实在不能带走的就由当地政府负责隐蔽。你看你们那里的伤员怎样？”

我说：“我们和那里的群众关系很好，只要发动一下群众，动员好担架、毛驴，带走伤员是没有问题的。”

佟指导员和所长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刘银贵、马五甫和我 3 人组成一个小组，立刻回李渠转移那儿的伤员。佟指导员给了我们一张草图，标明医院的转移方向，以便我们赶不上队伍时，行动有方向。

我们为了尽快把伤员转运出来，还是抄近路，翻深沟、爬陡崖，到李渠已是午饭以后了。我们先向村长讲明了情况，村长立即召集老乡说明：由于敌情的变化，医院要向别处转移，伤员也要随同医院一块转移，请老乡们多帮助。大家听了之后，立刻紧张地准备起来，一个个忙得满头大汗。他们按分配，谁家的毛驴转运伤员，谁抬担架，谁赶毛驴，每人都在为转移伤员，各自忙碌着。四个自然村住的很分散，到了全体集合出发时，已是后半晌了。

第二天早晨要到达所部，但人心虽急，天却偏偏作对，没到林畔村，就下起雨来。

道路泥得不能走，驴脚打滑，人脚直溜。勉强走到林畔村，雨却越来越大了，不得不避避雨。老乡说：“这种天气，你们不但走不成，下不了山，就是下了山也过不了河。河里涨水，会把你们连人带牲口都冲走的。”没法子，我们只好先住下了，但是我们真是心急如焚，还好，半夜以后，雨渐渐地停了。天刚亮，我们就又起程。

二

当我们到达古庄科时，已是红日东升，人们开始做饭了。

村里这时冷冷清清的，我们打听了一下情况。才知道医院昨晚就转移了。我们没敢停脚，顺着老乡指的路上了窑脑，只见满山崖都是新踩的脚印，地好像新耕过的一般。

好在都是熟路，我们就顺着去镰刀湾的路走去。走到中午，人和牲口都饿了，我们就在路边的村子里做饭，喂牲口。吃了饭没敢休息，又上路了。

为了尽快赶上部队，我们马不停蹄地翻沟过河。当走到一架山时，天渐渐黑了下來。

军医马五甫带首毛驴队在前面走，我和刘银贵与民工互相换着抬担架。“风是雨的头”，陕北的天气，有乌云就有暴雨。一时间乌云满天，狂风大作，雷电交加，铜钱大的雨点下个不停。毛驴走得快，已经下山了，我们抬的担架怎么也赶不上。刹时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道路就更看不见了。我们五六个人抬的担架上躺着打蟠龙负伤的张炳才同志。

他左大腿骨折，用人字石膏固定着。石膏上到腋下，左下肢只露几个脚趾，右大腿也有三分之一用石膏固定着。全身能活动的地方很少。

狂风卷着暴雨在不停地下着，雷声轰鸣，水在地上流着。

我们再也无法向前走了，只好把担架移到山顶上，几个人蜷曲着身子，守候在伤员身边，忍受着暴风雨的冲洗。

张炳才同志看见大家没遮没挡地被雨淋成那个样子，就说：“咱们不能都守在山头上挨冻。你们能动的先走吧，到村子里去，把我留在山头；反正我是动不了，你们到明天再来接我。”

我们说：“那怎么行？怎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要冷大家都冷，决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

张炳才同志说：“咱们明天还要上路哩！如果弄得都病了，就都走不成了。我反正是动不了，我看还是你们先下山吧！我不害怕。”

老乡讲：“你是为了保卫陕甘宁而负伤的，我们怎能把你一个伤员留在山上？再说你又动不了，来个狼你也没办法。”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不休。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我说：“我看你们几个人找村子去吧！我和张炳才留在山上，有我在，保证伤员安全。”

又经过一番争议，决定刘银贵带三个老乡找村子去，我和张炳才留在山顶上。他们走之前，为了防止山水把我们冲走，就把担架抬到一棵小树下。他们借着闪电的光亮，摸着下山了。

随着电闪雷鸣，雨紧一阵缓一阵地下着，风也凑兴，不停地刮着。张炳才盖的被子因有坑凹而积水，我用抬担架的扁担从中间支了个高点，雨水顺着被子向四周流下去。

伤员是遮住了，但是我自己却没有地方躲，只好蹲在担架旁边，任凭风吹雨打。时间长了，全身都湿透了，寒风一吹，全身直打冷战，上下牙也不由自主磕个不停。我想，站起来伸伸腰也许好些，于是我站了起来。谁知山高风大，全身阵阵痉挛，身体像扭麻花一样扭转，自己想控制也控制不住，还得蹲下去，那样受风面较小。我这时又检查了张炳才的被角四周是否严实，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振和，你还是下山找村子去吧！”

我终归是走不动，就在这将就一夜吧。你穿单衣服，在这山顶上又是风又是雨的受不了。

我一个人在这儿行，咱们都是当兵的，怕啥？”

我听了我的话，心想再苦也不能把伤员一个人扔下。我说：

“不行！有我就有你，说啥我也和你在一起，再冷我也能受得了。”就这样，我们一起坚持着。

到了后半夜，雨渐渐地停了，但是新雨后，天气也格外冷。我们看到远处山村的灯光，我想，我们与其在山头上挨冻，不如找村子去。我对张炳才说了我的想法，并说：“我背着你，咱们奔有灯光的地方去，那儿可能就是咱们伤员住的地方，虽然远，总是可以走到的。”

张炳才说：“那怎么行！你怎能背得起我呢？况且，我自己除了两只手以外，别的地方一点也不能动。”

我说：“咱们试试，只要你的手搂住我的脖子，就好办了。”

他终于同意了。

就这样，我硬是把他直挺挺地扶了起来，背在背上。他搂住我，试了试，还可以。

我们走着走着，突然我感觉一脚踩空，“咚”的一声，掉下了土崖，我的头插到松软的泥土里了，可张炳才仍然趴在我的背上，我俩都是头朝下脚

朝上了。

张炳才用手扒土，让我的头露出来。我使劲转着头，把头从土里拔出来后，慢慢地从他的身下爬出来，扶正了他，让他靠在崖边站着。幸好，张炳才没受什么伤，我也仅仅是前额和嘴唇碰破了一点。张炳才说：“再不能向下走了，这一次还好，掉下来是土崖，再向下走就可能是石崖了，更危险了。”

于是我们决定向回走。我又背着他，顺崖边慢慢地向山顶上爬去。我们走走歇歇，终于找到了我们放担架的地方，在寒冷中静静地等待着天明。

拂晓来临，太阳在东方冒头。我们高兴极了。这时刘银贵也带着抬担架的乡亲们上山来了。我们抬着伤员向村里走去，进村后，乡亲们听说雷雨天我们在山上过了一夜，赶紧烧火，给我们烤干衣服和被褥。吃了饭，我们又上路了。

三

晚上到了镰刀湾，这是坐落在延川的一个镇子。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夜，次日天一亮就又走，到双山子吃过了饭，便顺着去青杨岔的大路，向东北方向走去。

正当我们在山顶上朝前走时，迎面碰见几个老乡。他们告诉我们前边有敌人，叫我们不要往东走了。我们顺着老乡指的方向看去，果然黄黄的一片在蠕动着（当时胡匪军穿的是黄军服）。我们肯定了那就是敌人，决定调转方向，改为朝后走并加快了步伐，尽最大努力摆脱敌人，决不能让伤员落在敌人手里。

事情偏不随人愿，当我们刚翻过几个山头后，刘银贵突然病了。他恶寒战栗又发高热，疟疾病犯了。怎么办？不走吧，我们还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走吧！他发烧 41℃，也确实困难。我扶着刘银贵在后边慢慢走，他全身热得像一团火，不住地颤抖，还是脚不停步地向前走。我看着他那艰难的样子，决定在山坡上坐下来休息片刻。刚坐下，他就身不由己地躺下了。躺了片刻，他站起身来说：“咱们走吧，前面还有伤员呢。”我们一边走，刘银贵一边在他的衣袋里摸着，终于找到了两颗吃剩下的奎宁，把它放在口里咽了下去……

我们走下山时，前边的伤员已经在路边的林子里休息了。

我们和村长谈了一下情况，估计这个村子距敌人有 20 多里路。为了伤员安全，村里派人到山下放哨，我们在村口瞭望。

我们还和村长查看了退路，让伤员和衣而睡，以备不测。幸好，这一晚没发生什么事。天没亮，乡亲们说已经给我们做好饭，村长还派了领路人。吃饭后太阳也出来了，我们这支伤员队伍又出发了。

这几天的经历，使我们感到陕北老区的人民真好！他们把窑洞让给我们住，拿出粮食给我们做饭，给伤病员拉毛驴、抬担架、带路、通知情况，真是无话不说，无事不做，使我们这支伤员队伍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畅行无阻。革命的胜利，与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四

就这样，我们和离我们不远的敌人周旋着，有时能听到枪炮声，有时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有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叫巡检寺的地方。我们正在做午饭，忽然看见后沟里有四五个身穿灰军装的骑马人飞驰而来，他们见我们 30 多个人在一个院子里吃饭，便冲我们而来，一齐下了马。为首的一位同志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我说：“我们是四后方医院的，带着 30 多名伤病员转移，途中遇上了敌人，现在正不知该上哪儿去呢？”

他说：“我们是总部的。敌人已经过去了。我们去追一后方医院，他们上吴旗方向去了。”

我们告诉他：“前两天我们还和一后方医院在一块住了一夜，后来他们走了，我们没赶上。”我们又问：“我们该怎么办？”他给我们写了一张纸条，叫我们先到乌龙堡去找叶参谋长，说他会告诉我们到哪儿去找四后方医院。我们让他们吃饭，他们说：“不了，还有急事呢！”于是他们又上马顺大路向西急驰而去。

我们吃完饭，转而向东走，大约经过两三天的路程，我们来到一个半山坡的村子。

那里有许多军人，还有哨兵。他们问我们是哪部分的，干什么的，到哪儿去。我们说，我们是四后方医院的，到乌龙堡找叶参谋长。他们又盘问我们怎样知道的，有什么证明没有？我便把那张纸条拿出来给他们看了，他们这才给我们安排了住处，说他们可以替我们先联系一下，后来又说叫我们明天去见叶参谋长。我想，这张纸条可真重要！

第二天，我、刘银贵、马五甫三个人被带到一个山窝的林子里，那里有一个由三孔窑洞组成的小院子，里面安静得很。带我们的同志给院里的一个军人说了几句话，那人进窑去，不多一会儿出来了，叫我们三个人进去。我们进到窑里，只见在一个临时用木板搭成的长桌旁边，站着一个人穿灰单服的人，他背后的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我们向他行了个军礼，说我们要找叶参谋长，并把那张纸条拿出来给他看了。他说，他就是叶参谋长，有什么事可以向他讲。我们向叶参谋长报告了我们的情况。叶参谋长让我们先在这儿住下，等联系好了，再回医院去。这时有电话来，他接完电话后拿了两个小红旗，走到地图前，插在一处，看来电话是报告军情的。我们见首长有事，便告辞了。他送我们到门口，我们一同向他行军礼告别。

我们被安置在乌龙堡前边山脚下小河旁的一个村子里，并在那儿过了端午节。端午节那天，叶参谋长还特意派人给伤员送来了一只羊，一些白布。我们在战争中还过了个丰盛的端午节。

在这儿停留期间，我们还看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是我们在延安时多次见到的，一见就认识。我们才知道这个小山窝，原来住的就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前些日子，敌人刚从这里经过呢！蒋胡匪军日夜寻找着我们的总部，我们的总部就在他们旁边，他们却有眼看不见。我们的总部，毛主席，党中央，有着陕北人民真心实意的保护，敌人只能是睁眼瞎。敌人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只能是四处碰壁，而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却了如指掌。

过了端午节，我们接到通知，叫我们到马蹄沟找西北联防司令部，找王司令员，那里会进一步准确地告诉我们医院所在地。因为我们从志丹县出发时送我们的毛驴和担架已经返回家乡去了，我们又重新动员毛驴和担架上路。

五

由于休息了许多日子，我们每个人都养足了劲儿，急于回部队的心也绷得更紧了。

担架和毛驴转运伤员的方法也改为一程一程向前送，再加上有的伤员的伤情因长途跋涉恶化了，要坐担架。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加快步伐，尽

早回到医院使伤员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

我们沿着大理河，顺着大路向前走，每天早起晚睡，最多一天走 120 里。伤员同志不论伤轻伤重，谁也没有说过什么怪话，大家一个心眼想早日摆脱敌人的包围，回到医院去。

现在一些人伤情重了，特别是刘国清和张排长，他们都伤在脚上，而且都有骨折，这么长时间骑毛驴，脚肿得老大，伤口直流脓。那时又没有抗菌素，疼得他们实在没法，喝点鸦片酊，但喝的稍多点，又吐的不行。伤员的痛苦，使我们心里着急，老乡也不忍心。为加快行程，我们轮换着抬上伤员飞也似地向前跑，空手的人还赶不上抬担架的。

经过 3 天的行军，我们到了马蹄沟，这儿是子洲县政府所在地，西北联防司令部也住在这儿。到了联防司令部，王维舟司令员看了我们的介绍信，用电话问好第四后方医院的确切位置在清水沟。我们又返回 5 里路，终于到医院了。

所里的佟宝山指导员、宁汉戈所长、杜亚非副所长和全所同志迎接了我们。他们向我们和全体伤员问候，并立刻把伤员安置到病房里去。我们向领导汇报了沿途情况。所里、院里对我们能在敌人包围下，把伤员带回来，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受到表扬，立了功，解放日报社戈壁舟还专程来访问。但是我们深深感到，没有陕北人民，没有各位领导给我们及时指明方向，我们要完成任务，也是不可能的，成绩应归功于党和人民。

薛振和
男，延中九班学生。陕西国棉十厂职工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梢林烽火

薛可

敌军“围剿”一天天加紧，我们游击队一步步向后山撤退，进入梢林。

茂密的梢林，灌木丛密密匝匝，亭亭玉立的少数白杨、白桦、野杏等夹杂其间。梢林后方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黑黢黢的，俨然一道雄伟峻峭的黑色屏障。这就是洛河源头，陕、甘交界的乔山主脉。

这里人烟稀少，村落分散，大小村庄都被敌军占据，我们只能隐身梢林。进入梢林的第一天晌午时分，发现敌情。一股敌军约二三百人，顺着山梁下来，边走边打枪，机枪声、步枪声响成一片。我们隐蔽向后撤进梢林深处。敌军翻过三个山头停下来，修筑临时工事，看形势，企图对我们施行长期封锁。傍晚时分，敌军下山进村，我们远远地听见村子里鸡飞狗叫，乱哄哄一片。村里老乡们纷纷跑上山来。

我们在梢林一直等到天黑，才摸下山来，在离敌军驻扎村约五六里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下。找到老乡，借了些玉米糝子，煮了一锅粥，一人一碗，狼吞虎咽地吃光了。在窑洞里，草堆旁、晒场上胡乱一躺，呼呼入睡。我刚布置完岗哨，还没进屋，老刘和我一叨咕，认为这里离敌人太近不保险，于是叫醒大家，赶快顺沟直上后山，到柏叶沟住下。

后半夜，又从柏叶沟转移到松树窑子。短短一夜，三次转移。

就在我们出村不久，敌军把村子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到黎明，又发起了冲锋，打个半天，才发现村子里空空如也，一个人影也没有。此时，我们已站在十几里远的梢林山头上“观阵”呢。

三个月前的早春三月，依然寒风凛冽。蒋介石反动派燃起内战烽火，敌机整天在延安市区上空盘旋，轰炸扫射，敌人这时已进入崂山至金盘湾一线，距延安不足百里。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所有机关、学校已先后转移，我们挨家挨户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埋东西，填水井，扶老携幼，赶牛抱鸡，疏散至延安四郊。

撤退、离别是痛苦的。依恋的热泪顺着双颊流淌，人们一步一回头地迈着艰难的步伐，告别了延安，告别了宝塔。

战前，我毕业于延安陕甘宁边区师范，分配到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工作。战火蔓延到延安的时候，延安市、区、乡各级党政干部以及民兵、市民、店员组编成延安游击支队。市长姚安吉任政委，公安局长唐世昌任支队长。在这支战斗队伍中，有我们同班的四个同学：卢嘉谋任二大队政委，高树梓任三大队政委，还有一位参加游击队的战斗采访活动的新闻记者汤洛，另一个就是我。

在这段烽火生涯里，每逢相遇，各叙近况，话题离不开战斗和对未来的憧憬。高树梓对我谈他们三队首战楼儿坪梁时的失利情景；卢嘉谋和我同在二大队，交谈更为频繁，常常研究战斗部署和对策。被游击队员们称作“消息灵通人士”的记者汤洛，每当会晤，他便向我透露报社来信中传达的中央负责同志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和解放区的战斗状况。战争对我们是一门新的课程，战场是一个新的课堂。

这 100 天里，虽然深夜袭击，拂晓伏击，但还未曾到战争最艰巨的阶段。如今，大军压境，形势更加严峻。

敌军顺着山梁，像篦子梳发一样，在灌木丛林中来往搜索，盲目地乱打枪、瞎喊叫。

我们被迫转移到后山大梢林的边沿地带。

延西地区所有村庄里都驻满敌军。我们前一天没敢出梢下山进村，在山坡上露营一宿，跳蚤真多，咬得我们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和卢嘉谋、何玉林坐在梢林边沿的土坎上，仰望满天星斗，眺望远山，忧心忡忡，揣测着可能发生的情况。

僧多粥少，早饭人人都没有吃饱。饭罢，我们沿着深沟向山梁爬行。沟里灌木稠密，难以钻行，我们就用手扒，使枪把砸，用刺刀砍，硬着头皮往里钻，手、脸、衣服全被划破了，早晨露水打湿衣服裤脚，浸入划破的伤口，针刺火燎般疼痛。

野鸡在近旁草丛中咕咕鸣叫，机灵地在我们面前来回跳动，伸手可及。我们饥肠辘辘，却不能开枪，怕暴露目标。机灵的小吴钻进草丛，在野鸡卧过的处方扒拉了几下，拣出两个野鸡蛋。他连蹦带跳地跑了过来，两手一砸，磕破蛋壳，放到嘴边，一仰脖子“咕噜”一声，两个鸟蛋下肚了。几个年少队员见这办法倒不错，纷纷钻进草丛搜寻野鸡蛋充饥。

我们上到山顶，太阳已老高。队员们有卧有坐地在阳坡上晒太阳。有人建议下棋，棋迷老王立即响应。他从林子里找了一根白蜡木棍，剥掉皮锯成小段，在石头上磨平磨光，写上车、马、炮，居然制成一副“象牙棋子”。他们在树下一坐，在地上画个棋盘，便对起阵来，还吸引来了一大堆“长脖

客”，吵吵嚷嚷，热闹非常。正处在忧思苦想中的队长被吵得心烦，大吼一声：“注意敌人！”棋迷们才渐渐散开。

晌午已过，派出梢林筹粮做饭的管理员和炊事员双手空空地回来了。两个人噘着嘴，一声不吭，倒在树下。不用问，今天又要饥饿终日了。忽然，不知谁在山坡上发现一棵野杏树，我们立刻蜂拥而去。杏子像纽扣那么大，只有少数才泛黄，多数还是绿的。那个“发现者”已经爬到树上，用力摇晃着树枝，杏子噼噼啦啦落下一地。大家叫着，笑着，抢着。

我拾起一把用衣襟擦擦就往嘴里放，又酸又苦又涩，吃得人直吸气，喉咙发烧，牙齿发软。

“唉！要是在家里多好呀！这时候，坐在炕上，媳妇早把粽子和炸油糕端上来了。”有个队员一句话，引出一顿“精神会餐”。这个说他家的稠酒做得香甜可口，那个说他家的碗砣蒸得光滑细嫩，又有一个说：“新麦收后，宰头羊，吃一顿新麦面馍馍炖羊肉，那才过瘾！”

端午节后第二天，村长担着一个挑子上山进入梢林寻到我们，说他挑的是枣园村乡亲们送给我们的端午节礼物。还说，村里老人们时常念叨着游击队：“过节了，咱们那些孩子们怕连粽子也见不着，要想办法把粽子、油糕送些去。”于是这家一碗，那家一盘，汇集了一担，还凑钱买了两条烟。谁知那几天敌情正紧，送东西的人寻了两天，没找到你们。村长说着，取出筐里的食品。大家一看，让人太伤心了，粽子发酸了，油糕长了白毛，眼巴巴地看着就是吃不成。只好将两条纸烟分开，一人几支。会抽的，不会抽的，每人嘴上都叼了一支“四美德”牌香烟。

端午节过后，敌军暂时停止了搜索。这天，我买了两只鸡，称了几斤白面，到后山的柳沟去探视疏散隐蔽在深山小沟群众家里的几个病号队员。

村子很小，村边山腰半崖上只有几孔土窑被树木掩映着，一片沉寂。两旁山坡上长满灌木丛，沟中间一条小溪潺潺地流过，山花烂漫，鸟语花香。这倒是个休养的好地方，不到跟前不会发现这里住有人家。几个病号住在窄小的窑洞里，除一盘土炕外，别无其他家具。炕南地下，放一只破瓷盘，不知是脸盆还是什么。

我走进窑门，只见一个病号躺在炕上，一个坐在炊边，身着棉絮败露的破袄，骨瘦如柴，面孔黑黄，两只眼睛大得吓人，没有一点光泽。他们一看见我，像分别多年的亲人重逢，亲热异常。我紧紧地握着他们枯瘦无力的手，心里不禁阵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

我代表支队向他们表示了思念和慰问之情。他们急切地询问队里的情况和各位战友的安危。当话题转到他们的病情和生活时，顿时，死一般寂静。良久，高佰从缓缓抬起头来。

他原是边中三队的学生，战前任中共中央所在地枣园乡政府文书。他说，撤出延安不多日子，区委书记姚锐身染伤寒，卧床不起，派他护理。驻地离延安不远，各方面条件还好。有毕光斗医生诊治，还能托人去高桥镇买药。没想到他把姚锐的病护理好之后，姚锐却投敌回城，他自己则传染上了伤寒。

毕光斗医生也投回延安了。他们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只能硬抗着、拖着，幸好老乡们好，常照顾他们。这些天，敌人围剿得紧，白天老乡把他们背到梢沟里，放下一块黑面饼和一罐水，晚上再把他们背回村。整天藏在山窑里，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他悲痛地说：“看样子，我是难以活着回延安

了。

你们回延安后，一定到我家看看，照顾一下我的老娘。”说着他哽咽起来，眼泪直流。我也无词对答，只有陪他流泪。

另一个病号王耀堂是上海一家纱厂的工人。他是抗战初期到延安的，这次病后和高佰从住在一起。开始他还处处照顾高佰从，后来自己也躺倒起不来了。但他比较乐观，谈到队里工作，他还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意见。

不知不觉，太阳快要落山了。我站起来向他们告辞，紧握两人发烫的手，只能低低地说一声“再见！”眼泪又无声地流下来。战争中的告别，很难说何时能够再见。

回到支队部，我向支队政委姚安吉汇报了高佰从和王耀堂的病情及困难处境。他即刻决定派原来枣园乡乡长杨成福前去专职护理。

敌情一天天吃紧，从保安（即志丹）下来一股敌人，据说是两个旅，从延安也下来两三个旅，连同延安、甘泉等地的驻军，总算起来敌人有八个半旅，对延安四周的游击区，摆开一个扫帚形阵势，横扫过来。昨晚我们二大队在后面曹玉休息了一会儿，今天一早上山，又进入大梢林隐蔽。中午，我躺在一棵树下，朦胧中听到一大队队员魏兴汗的声音。我坐起来，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这小子，哪去啦？”他一句话不说，灰溜溜地坐下。我发现他一脸惊慌，脸上还沾有泥巴。还没等大家细问，他就着急地讲起来：

“敌军逼近了，支队部全体人员临时编成几个小组，分散隐蔽，我和罗伯年、赵驴驹、甄士杰分在一块，藏在灌木丛里。敌人捉住些老百姓，一个个拷问游击队在哪儿？一个小姑娘被敌人拷得顶不住了，只好说：‘都在山上梢林里。’于是敌人便分成几股，漫山遍野地搜寻，还嗷嗷乱叫着。有几个人产生恐惧动摇情绪，提出迟早总是个死，不如把枪埋掉，等当俘虏，保全性命。大家都不同意，说：‘要死也得拼他两个！’敌人逼上来，离我只有几步远，看得清清楚楚的。我才下决心跑，敌人发现后又追，又叫，又开枪，我什么也顾不得，连跳几个崖，翻了三座山、四个沟，才找到了你们。”

听完这番话，我们都唏嘘、叹息。大家这时凑了些干粮、冷水，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支队部到底怎么样？每个人都忧心忡忡。

3天后，确切消息传来了。支队部和三大队那天被敌人冲散，周家福被俘虏，炊事员老李光荣牺牲，其他人已陆陆续续返回，现在已集合起来。6月30日，支队部召集各大队队长政委会议，研究决定：留下唐世昌支队长带10个人的武工队，原地坚持斗争，全支队突围转移。第二天傍晚开始行动，连夜急行军，突围出来，我们支队离开了延安西郊梢林地区。薛可

男，边师一队学生。曾任青海省省委委员，省科委主任。

行军、学医三记

王月梅一次急行军

1947年初，我从延安保育院小学毕业升入延安中学学习。入学不久，

蒋介石向延安发起进攻。由于战争的需要，延安大学和中学部一些年龄大的同学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上了前线；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同学，不能立即参加战斗，便由校长和老师带领着在陕北与敌人兜圈子，过上了边转移边学习的战斗生活。几个月的辗转行军生活，同学们感到十分疲劳。一天傍晚，我们来到绥德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校领导决定在这儿休整几天，我们班暂时住在一家老乡的库房里。库房的地上堆满麦秸和杂物。我们 10 多个男女同学和老师一起把麦秸平摊在地面上，打开背包就地和衣而卧。屋内因长期无人居住，阴暗潮湿，发出一股股霉味。蚊子嗡嗡乱飞，跳蚤也多。我们实在太累了，也管不了许多，躺下不多久，就打起呼噜来了。睡得正香甜的我们，突然被一阵“汪、汪、汪”的急促的狗叫声惊醒，同学们立即警惕地坐了起来。

凭经验，多半是有情况。我们再也睡不着了。不一会，王校长急匆匆地跑来通知各班，立刻做好出发准备。原来，敌人已向我们这个方向逼近，为了避开敌人，今晚必须急行军。同学们立即打起背包，静悄悄地又出发了。为了防止有人掉队，后面的同学抓住前面同学的背包带，每人右手拄着一根木棍，一个紧跟一个地沿着崎岖的小路迅速奔走。漆黑的夜晚，四周围什么也看不见，抬头只见天空点点繁星，在向我们眨眼。

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带着潮气的晚风，一次又一次地吹干了我们额头上的汗水。

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前进。起初大家精神还饱满，行进速度也很快；到了后半夜，只觉两腿发重，头脑昏沉沉，上下眼皮像涂了胶水一样往一块粘，想睁也睁不开，不由自主地打起盹来。忽然前面传来“唉哟”一声大叫，原来一位同学摔倒了。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醒了，后面的同学扶起摔倒的同学，继续前进。但一静下来，有人就又重入梦乡。老师见同学们一个个疲惫不堪，感到心疼，只好每隔半小时，休息 5 分钟。每当前面传来“休息”的命令时，我们都恨不得立即躺在地上美美地睡它一觉。

老师怕同学睡着了受寒生病，就挨个小声呼唤：“千万不要睡觉呀，同学们，打个盹就行了。”就这样，一个晚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好不容易盼到天亮。随着黎明的到来，睡意渐渐地被逐散，大家又精神起来。老师要求我们趁早晨天气凉爽，加速步伐，多赶些路程。不一会儿，我们走到一个盘山道上。

这时，驮着满满的物品的十多头小毛驴，从后面赶了上来，同我们相伴而行。忽然，飞机的嗡嗡声由远而近，随即两架敌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同学们立即在路边找地方隐蔽起来。这时，和我们并行的那些毛驴，被飞机的吼叫声吓得大声嘶鸣，乱蹦乱跳。敌机似乎发现了目标，猛然由高空俯冲下来，在离地面十多米的地方猛烈扫射，地上冒起一大溜烟尘，而后敌机又像蹿天猴似地飞上高空。运输队的驭手们，赶忙用力把牲口往附近树林中赶。毛驴却不听指挥，拼命地蹦，乱作一团。敌机走后，我们仍趴在地上不敢起来，生怕飞机再返回来。王校长面带难色地走了过来，高声向同学们讲道：“孩子们！”

我们辛辛苦苦走了一夜，是想把敌人甩掉，可是，方才得到可靠消息，敌人仍跟在我们后面，离这里只有 10 来里地。”停了一会儿，王校长接着说：“这些天来，大家连续行军，已经够累的了，但我们不能为躲敌机而耽搁了时间。你们都是革命的后代，父母把你们交给了学校，我们就要对你们负责。

我们宁可死在敌机的轰炸下，也绝不能当俘虏！”王校长扫视一遍大家，语气十分有力地说：“同学们勇敢一点，打起精神来！我们决定立即改变路线，加快速度，甩开敌人……”王校长的一席话犹如清醒剂一样，使我们顿时清醒起来，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大家一轱辘从地上爬起来，精神抖擞地继续向前走去……我们感到两腿格外轻快，一口气跑了好几十里地，终于脱离了危险区。

第一次走进病房的时候

1947年夏天，我们几十名男女同学和老师一起被分配到第四后方医院参加护理伤员工作。那时，我才只有13岁，和另外一位女同学分在同一个病房。记得我们第一天走进病房时，心里特别害怕，因为长这么大从来还没见到过这么多裹着头或包着躯干四肢的伤病员。有些重伤员处在昏迷状态中，还有的躺在床上不断地呻吟。炎热的夏天，太阳像火盆一样在我们头上烧烤，汗水不住地流，我们宁愿光看头站在门外晒太阳，也不敢走进病房里去。不知过了多久，听到屋内一位伤员呼唤我们：“小鬼！小鬼！你们怎么还不进屋呀？外边太热了。”我们好像没听到似的，也不敢吭声，仍然傻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不一会儿，另一个伤员发话了：“小朋友！进来吧！你们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参加工作多久了？你们有多大了？”这一系列的问话提出后，我们犹豫了一会，蹑手蹑脚地走到伤员们面前，头也不抬，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们刚由保小毕业到延安中学，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无法上学，只好跟着学校转移，一边行军一边上课……”听到我们是从延安来的时，几个轻伤员立刻坐了起来，亲切地对我们说：“我们原来也在延安工作，撤退后我们上了前线，为保卫延安在战斗中负了伤。”接着他们七嘴八舌，以赞誉的口吻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年纪虽小，资格却挺老的，是小小的老革命嘛！”

随后又问道：“你们的父母呢？为什么这么小就参加工作了？”

我们说：“爸爸妈妈都是革命干部，有的人父母牺牲了。我们自幼就在革命队伍中长大，上学后就离开了父母。”听了我们的回答，伤员们倍加亲切地抚摸着我们的小脑袋对我们说：

“原来你们都是革命的后代。咱们共同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解放全中国而战斗。我们养好伤后一定重返前线，早日消灭蒋匪帮，使你们早日回到父母身边……”他们接着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战斗的故事来，有的还详细谈了自己负伤的经过。渐渐地，我们觉得他们就像自己的父兄一样和蔼可亲，再也不觉得生疏害怕了。

由于我们年纪小，不能为伤员们做更多的事，只是给他们打打饭，端端便盆，为少数重伤员喂饭，有时还到附近小河边给伤员们洗衣服以及敷绷带等等。有时看到他们换下来的衣服和绷带上爬了许多虱子，我忍不住落下泪来。他们是为保卫祖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光荣负伤的，有不少同志落下终生残疾。想到这些，我们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满怀爱戴之情。我们更加乐意细心周到地为伤员们服务，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加倍努力学习医疗护理知识，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让伤员们能尽早恢复健康，重返前线。

当我们和一批批治愈的伤员握手告别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深为自己能对革命战争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而感到欣慰。

奇妙的治病法

行军途中最怕生病，一来是行动困难，二来是那时医疗条件很差，学

校医务室除备有红汞、碘酒、酒精等一点外用药之外，内服药只有阿斯匹林、甘草片、小苏打、抗菌素，就数磺胺最高级了，而且量也很少。因此，同学们常有两句口头禅：“头痛发烧，阿斯匹林一包。”“阿斯匹林托土散，又治咳嗽又治喘。”

记得我们行军到山西临县一个小村庄时，班里一位女同学突然病了，全身寒战，冷得上牙打下牙，我们给她盖上几床被都不管用。不久，她又开始发烧，体温高达 40 度以上，两只眼睛都烧得通红，然后就出大汗，全身无力。第二天又和正常人一样。医生诊断患的是疟疾，但没有药治疗，束手无策。同学们都为她着急。眼看这位同学一天天消瘦了，隔一天发一次病。俗话说：“有病乱投医。”同学们也为她到处询问治法。有一次碰到村里一位老大妈，她对我们说：“有一个土办法可以治‘打摆子’，你们不妨试一试。在初发病时，刚开始发冷，由两个人把病人架着满山跑，见到杨柳树就让病人抱住树干反复念叨：‘柳树呀柳树，我的打摆子病不再得了，给你得吧！’如此不停地奔跑，不断地念叨，直至病人出一身大汗感到不再发烧为止。回家后多盖几床被子，多喝一些水，睡上大半天，病就会好的。”我们听了之后，也半信半疑。后来一想，反正不费什么劲，又没有其他更好的治疗方法，不妨试试看。当时就由我和另一个女同学挽着病人的双臂，后面还跟着一个同学换班，在一个小山上来回跑了好几圈，两个多小时后，病人出了一身大汗，也确实不冷了。回到宿舍后，蒙头大睡。没想到，一觉醒来，病果然好了，直到现在没有再复发过。那位女同学今天还在北京工作，我们见了她时，还打趣地说：“是柳树给你治好了‘打摆子’，你应该好好感谢柳树才是呀！”

王月梅

女，延中十八班学生。后勤学院门诊部副主任医师。

战争转移中的延安中学

冯士休备战

1947 年春，战争即将爆发。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边区政府决定把延安中学一分为二，一部分改建为第四后方医院；

另一部分留校继续上课，但要撤出延安。3 月 13 日，我和会计刘涛在敌机轰炸下，带着预算报告去联防司令部交涉经费。

办妥了筹建医院的预算后，组织决定我留校主持事务处工作。

记得战争打响后不久，马文瑞同志曾在参议会礼堂作过一次动员报告。他说：“我们又要过战时的艰苦生活了。大腿就是我们的写字台。我们准备放弃延安，但从现在起，我们一定要解放大西北。”他还讲了我们的战略方针，给人很大的鼓舞。我们虽然暂时放弃了延安，但我们必胜无疑。

撤退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我和王鼎勋同志领着曹高世、毛久德、孟昌、杜吉宏等几个精壮的青年同学，把床板都送到桥儿沟后山的崖窑里，还有些车辆，挖地窖埋了。

最后在埋东西的地方都埋上用大手榴弹做的地雷。在埋地雷时，发生了一件奇异的爆炸事故。那是埋雷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杜吉宏拿放在筛子

里的地雷时，不小心把一个地雷的保险绳挂在筛子边上，引起了爆炸。筛子内放着 28 个地雷，保险绳都在筛子边上搭着，因此一连爆炸了好几个。我正在隔壁校长的窑洞里和总支书记王鼎勋研究最后撤退的问题，前窑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我心想，没听见飞机响，怎么会有炸弹声呢？正在迟疑中，过道里的灰尘一涌而来，我顿时明白了，是前窑放的地雷爆炸了。我一脚将窗子踹开，跳到院子里，忙问毛久德里面还有谁？他四面环顾了一下说都跑出来了。我不信，便进窑洞检查，只见窑洞内灰尘弥漫。我摸了半天，确实没有人在里面了。我出来又问谁受了伤？他们互相看了看，除杜吉宏大腿上擦了一点皮，没有出血，别人都好好的。怪哉！好几个地雷爆炸了竟然谁也没有受伤！毛久德满脸灰尘，眼斜着笑咪咪地说：“啊！炸弹的威力不过如此而已！”这句话打破了受惊后的沉闷空气，惹得大家苦笑起来。室内灰尘落下去以后，我们把窑洞打量了一下，七八尺宽、一丈多长的窑洞里，除了人以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炸毁了。地下放的包包菜被炸得粉碎，靠墙根立一把斧头，柄炸烂了。过道拐角的一口水缸，露出来的半截炸掉了。毛久德平日记帐用的桌子，桌腿多处受了伤。好几个地雷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爆炸，其他东西都无一幸免地炸毁了，可是四个人却无一受伤，这种现象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敌人进入延安的前两天，3 月 17 日晚上，我和王鼎勋去新市场沟同王朗超同志联系，看敌情如何？朗超同志告诉我们甘泉的电话已不通了，说明敌人已占了甘泉县。同时又告诉我们，延川县的文安驿也被敌机轰炸了。王鼎勋同志的家在文安驿附近的舍胡沟村，离文安驿只有 5 里路。我和王鼎勋怀着急迫的心情，急速往回走。王鼎勋一路念叨着他们家里的人喜欢赶集，说不定出了什么问题。我批评王鼎勋太迷信，但是他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仍在不停地念叨着。我们回到桥儿沟，一进门就看见炕上坐着王鼎勋村里的一个人，王鼎勋赶快问：“你来干什么？”那人说：“你父亲在文安驿被敌机炸死了。”这是一个意念的巧合。于是，王鼎勋连夜赶回去料理父亲的丧事。他这一去，被敌人的封锁线隔住出不来了，他就在当地打游击，好几个月未能归校。

王鼎勋同志去后，我们整夜奋战，完成了最后的坚壁清野任务。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撤离延安，向丰富川窑子沟方向转移。从此，我们踏上了转战陕北的漫漫征途。

大转移

1947 年 3 月 17 日夜，我们赶到窑子沟。前几天从延安撤出的部分教职员和学生仍停在这里。第二天，敌机在延安周围狂轰滥炸，窑子沟上空也有敌人飞机不停地打机关枪，乱扔炸弹，炸死了不少的羊，人们藏在窑洞内没有伤亡。窑子沟离延安较近，当天晚上，我们全校就又向安塞吊儿沟转移。

从窑子沟出发不久，要翻一架叫榆树峁子的大山。天气很不好，黑得展臂不见拳头，又是风雪交加，我们几百人没有一个手电筒，加之外地来的一些同志都不习惯走山路，所以接二连三地出问题。一开始一位女教员摔了一跤，还算幸运，没有受伤。接着是任远志同学从土崖上掉下去了，把一只脚窝得变了向，还是我即刻使劲一拉，使她的脚关节复了位，但她疼得直叫唤，不能走路，只好让别的同志搀扶着走。

从榆树峁子山上下来后，在一条深沟里往前走着，突然听前面说又有人摔到沟里了，身上背的碗和缸子摔得丁哩当啷直响。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费

了好大的劲，摸黑到沟底下把人拉上来。听声音是冯思臻，刚说了几句话，谁也没有发现下面还有个暗坎，一走他又掉了下去。我们又把他拉上来，多次询问他是否摔伤？也许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思臻一再说他好好的，没有摔伤。我一再提醒他刚摔伤有时不易觉察，叫他再仔细检查一下，他仍回答说：“全身都很好。”走了几里路后，思臻突然对我说他头上有个窟窿。

我正埋怨他：“你为什么早没发现？”他说他把脸上流的血当成雪化的水了。擦了几次火柴都被风吹灭了，只好摸着黑给他包扎了一下，继续往前走。好在天亮以后，他进了学校刚成立的医院。

学校的人都集中在吊儿沟。敌人进占延安后不断向四周扩散，我军集中兵力在青化砭打了一仗，消灭敌人一个多团，挫败了敌人的锐气，长了我们的威风。但因敌人的兵力过多，很难阻止他们前进。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让学校再往北撤。

这次转移就不像从延安向吊儿沟转移那样从容不迫了。

这次非常紧迫，几天之内就要完成北撤的一切准备工作。当时要求尽可能把能带的东西都带走，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出发前在吊儿沟还有许多准备工作。如：学校和医院的人员分配问题，谁去医院谁留学校；还有病号、身体不大好的女同志、小孩、年龄小的学生，如何安排他们顺利北撤等。

任远志同学在榆树峁子受伤后还未恢复；贾萌同志患脊椎结核腰展不起来，行动很困难；艾民同志产后还要人抬；有些同志行走有困难又不会骑牲口等等；还有事务处本身的准备工作，谁打前站，谁收后营，谁负责食宿，一群猪谁赶，一台显微镜谁背……总之，所有的事情都得一一安排妥当，使人人各行其职。

北撤开始，从吊儿沟出发，经过瓦窑堡、王家湾的涧峪岔。在涧峪岔住了一些时间，边区政府又通知我们西撤到安定县的麻柴沟住了几天。教育厅中教科长高云屏同志来信传达上级指示：让老弱病残、妇女一律就地安置。但麻柴沟距安定县城只不过几十里路，而且敌人已占了安定县城，就地安置让人很不放心。最后决定将准备就地安置的同志带到安定县川和安塞县中间的山区再安置。

从麻柴沟出发往安塞的化子坪走，需要从距安定县 5 里路的地方进沟。因为离敌人太近，人们的情绪特别紧张。我亲自收后营，刘允若等几位同学走路不行，我一人就背了三个背包，总算顺利地通过了危险地带，晚上摸黑走了几十里路，到了吴家湾。我们去后，群众以为是敌人来了，都跑了。

我们一进村一个人也找不到，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几个群众。他们知道是自家人时，才陆续回到村里来。在吴家湾住下以后，研究如何执行就地安置任务。要就地安置的同志不愿意留下来，因为口音不同，敌人来了很容易认出来，学校几位领导也感到放心不下。最后只安置了一个叫陈锐的女教员。这个村子是在一座很偏僻的高山上，比较安全一些，但第二次东移西村时怕不安全，又把陈锐同志带上了。当时只有贾芝和李星华同志把一个小女孩送给了杨家窑的农民抚养。那时医院在化子坪一带，有些人的安置需要和医院商量。在化子坪住了几天，在这里，把肖景等几位同志留给了医院。

从化子坪出发经子房坪到侯家湾，学校住在侯家河、狼牙岔一带。这里住的时间较长，大约有一个多月。学生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学校在这里也种了菜。那时学校经常和住在志丹县的马锡五同志联系。大约是 6 月初，

学校派王树华同志去联系，马锡五同志告诉说：“敌人准备西进，让学校往志丹方向转移。”学校几位领导研究后认为：敌人准备西进，我们也往西撤，这样将永远甩不开敌人。为了避开敌人的进攻方向，认为学校还是向东转移比较安全。但向西撤是马锡五代表边区政府的指示，我们往东去是违背命令的。经过再三考虑，一致的意见还是避开敌人，向东转移。

6月6日，学校从侯家河出发往东撤。在山上遇见边区医院往西撤的同志，他们向我们提出严肃责问：“你们往东走是不是不想要命？”我们耐心地解释向东撤的理由，他们只好说：

“那你们就试试吧！”下午，我们到子房坪和医院联系，李信政委和芦云克副院长讨论到天黑还定不了去向，我们又决定从子房坪翻山经过周家沟往东走。从周家沟出发，赶天亮过了银河。几天没有吃好饭，我实在饿得不行了，进到一个村子，看见一户人家蒸下不少大馒头，我们向他们乞求：“不管贵贱，让我们吃两个馒头。”主人说：“你们也是陕北人，我们这是给老人过五七蒸下的‘献贡’，你要是实在饿得不行，就吃吧！”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个，再也不不好意思吃了。后来又买了一升炒面，我和王玉亭、刘育法三人饱餐了一顿。当天晚上我们住宿在打儿窝和李家圪凸坡村。这时，我让王玉亭、刘育法前去安排住宿，我实在累得不行了，先在路边躺一会儿。结果一睡倒，就失去了知觉，赶到睁开眼，已是满天星星，爬起来赶快往宿营地跑，好在前面去的同志已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了。当天晚上吃了一顿黄米干饭，我把剩下的黄米饭满满地盛了一缸子，拿手帕包起来。估计有这么一缸子饭，明天就不会再挨饿了。睡到半夜，吴台亮送来信说：

“敌人正在向我们住的方向走来，让我们赶快离开！”于是，我们紧急集合出发。

从李家圪凸坡到卧牛城要翻一座40里的大山，走到天亮以后，听见敌人的机枪声和炮声，可见敌人离我们只隔一道山梁。群众听见枪声都往北面跑，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的情绪也紧张起来了。我在后面走是防止有人掉队。

前面有人给我传话，情况紧急，让我赶快到前面去。我赶到前面，大家批评我说：“说了多少次，让你不要背背包，背包让牲口驮上，你行动方便一些，你就是不听。情况如此紧张，你还背着背包在后面走，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我一面听取大家的批评，一面分析地形和我们的行动方向。我劝大家不要惊慌，我们可以不直接去卧牛城和青阳岔，先往西走，就可以把敌人避开。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就往偏西方向走。一下山是申家园子村，只见中央警卫团三支队的一个战士拉着马在村口站哨。我问情况如何？他说：“很紧张，你们行动要快一点。”说完话他就骑着马往申家园子沟里进去了。我们走了40里山路还没有吃饭，可是又找不到村干部，也找不到粮，只好用我们自己驮的粮做饭。

饭还没有熟，情况突然紧张起来，慌乱中吃了饭分两路走。一路从申家园子往东北走；另一路转向青阳岔走，这一路主要是运输队，因为山路不好走，只好到青阳岔下去再往东北方向走。但走这条路危险性很大，我们采取了非常措施，在文件驮子上备上火柴，牵马的人手里拿着斧头，一旦发现敌人，就把文件驮子上的绳子砍断，就地烧掉。

这个任务由王玉亭等几位同志负责执行。下午走到齐家园子谢怀德家，谢怀德的哥哥正在家，因情况紧急，他准备马上离家归队。我们也离开齐家园子向庙涧村方向走，赶晚上住到靖边县的庙涧村。这一天是非常紧张的一

天。为了弄清准确的情况，王黎明等几个同学在前面侦察，我也和他们一起侦察，这个时候最怕的是和敌人的侦察队相遇。

到晚上，刘允一和徐某（名字记不清了，他是高树勋部队起义的，是当时唯一打过仗的人）带着武器压后营。

半夜，从庙涧出发往小理河方向走，经过一处沙漠地，赶天亮到达柴家河村。一个老女人端个尿盆出来倒尿，一看见我们便惊呆了。她以为是敌人。待走到跟前，她才看清楚，高兴地说：“啊！你们是自己人。”在这个村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到刘家河村住宿。从刘家河半夜出发，天亮时又赶到小理河一座桥上，遇见一位当地的干部，他说：“榆林的敌人往这个方向压，要和石湾那面的敌人接头，使小理河川变为一个被夹击的地带。”晚上，我们赶到高镇住下，孙伟等几位同志提议：实在是累得不行了，要求第二天休息。我和大家商量，既然这里是一个可能被敌人夹击的地带，住在这里就有一定的危险性。再辛苦一天，就可以摆脱敌人的夹击。经过讨论决定：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离开这里好。

第二天，我们由高镇出发到了马蹄沟，见边区政府也住在这里，我们就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住下。由于这里条件不便，两天后学校又搬到霍家渠住。从侯家河出发，经过十天的急行军，紧张的生活总算是告一段落。

霍家渠是个比较偏僻的村子。在这里过了一个多月的平静日子，学生也上课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原来的商店、作坊、农产品等方面的收入都没有了，只剩下李太和带着徐金山、黄炳武等几位同志搞一点流动的小生意。但这远不能维持学校几百人的生活。

此后不久，我们村里来说：我唯一的女儿病重，拉肚子，让我很快回去。我在边区政府医务所要了一些磺胺一类的药，准备送回去。我和高玉印、樊玉贵、武生冒以及我们村来的那两位同志，一块走到杨家园子镇时，从永坪（距我家15里路）过来的人说，敌人把永坪占了，正在四面掳掠。

听了这消息后，我立刻决定不回去了，药让村里来的同志捎回去。几个同志一再说：“赶晚上就到家了，你回去看一下马上就离开。”又说：“敌人即使来了，群众也会掩护你，敌人不可能把你抓去。”我说：“学校工作需要我，战争环境万一出不来就误了大事，我不能为一个小孩子冒风险。”说完我就返回霍家渠。结果高玉印、樊玉贵、武生冒几位回去后，在敌人的封锁圈里出不来了，只好随地方干部一起打游击。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又返回学校。

7月份得知敌人准备进攻绥、米、佳、吴等地，于是学校撤到佳县的高家畔，准备过黄河到山西去。过河前，我和马济川校长要去木头峪开会，决定把学校所有物资提前运过黄河。木头峪会议是由教育厅高云屏同志主持，会上决定把子长中学并入行知中学。

木头峪会议以后，得知我军要把敌人引到无定河以东消灭。据此分析：敌人一旦过了无定河就会占领黄河的各个渡口。因此，我们感到既然已经决定过黄河，就不如早过黄河为好。于是派徐金山同志和佳县县政府联系，县上告诉徐金山乌龙铺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就意味着敌人已占领了乌龙铺。学校决定立刻组织人去联系船只，次日一早过黄河。船组织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来到黄河边。那两天黄河正发大水，从佳县县城往河边渡口走的路都被水淹了，人扳着石崖在水里摸着走。还算幸运，大家都安全到达渡口。可是到渡口一看，中央医院的伤兵摆了一河滩，这又如何是好？按说应该先

让伤员过河，但学校干部烈士子弟多，一旦出了事，也是大问题。怎么办？我们只好和医院的领导商量，没想到医院的同志立刻决定：既然是学校组织的船，就让学校先过。

我们马上组织人员上船。此时黄河真的在“咆哮”了……我是最后走的，我坐的那条船经过 28 个巨浪，在对岸渡口以下好远的地方，船靠不了岸，下面是齐胸深的水。艄公喊着：

“下船！还不下船等什么！”有的同志稍有迟疑，就挨艄公的骂：“巴老妮的！不下水还在老爷船上等死！”无奈，男男女女都跳下水里，蹚着水上岸。从此，我们最后一次告别了战争环境下的最紧张的一段生活。

山西临县的庙平村，是学校的转运站。从佳县运过来的东西都集中在这里。我们过了黄河后当晚赶到庙平，早过河的人给我们做了山西有名的莜面，“犒劳”我们。莜面蘸一点醋蒜吃起来特别香，可是，我们不知道莜面不能吃得饱，结果吃了后肚子胀得不行。第二天到白文镇住了两三天后，就搬到郝家坡。从此工作、学习都正常化了。到郝家坡后上级指示本来还要继续北撤到兴县去。打前站的王树华、秦建德都到五寨和神池两处了。由于陕北的仗打得好，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于是决定不再北撤了。

1947 年 8 月，学校到郝家坡，直到 1948 年的 1 月，学校又返回陕北的瓦窑堡。这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吃，天天喝黑豆稀饭。那时人们都感到肚子特别空，能找到一块糠窝窝填进肚里也是好的，可是，哪里去找呀？

我们估摸着瓦子街战斗一打响，就有希望回延安了。大约是 4 月 18 日，李景膺专员在瓦窑堡街上连跑带喊：“瓦子街战斗把敌人消灭了，我们胜利了！”瓦子街战斗一结束，估计延安的敌人就要南逃。所以，上级决定各单位立刻组织先头队伍往延安赶，准备收复延安。接到瓦子街战斗胜利的消息后不到两个小时，我就组织人员往延安进发。当我们到达延安，敌人早就跑光了。听群众说，敌人那时正在演戏，唱戏的未换装、未洗脸，就跑了。

在转政中，学校主要的东西没有丢，人员无一伤亡，回到延安印讲义用的纸和一些其他办公用品，还是战前的。我们把这些东西带上，经过战争中的转移，又把它们都带回来了。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进攻延安的意图宣告彻底失败，同时也拉开了解放大西北的序幕。全国解放胜利在望。

1988 年 11 月 28 日于西安 冯士休

男，边师三队学生，延中事条处主任。曾任国家农业部土地利用总局副局长，陕西省农业局局长，现为陕西省政协常委。1939 年两次被评为劳动模范，1944 年被评为延中先进工作者，近几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延安月色明清川江水寒

蒋文义

1951 年仲春，一天凌晨 3 点左右，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前方下来一列车伤病员，共 400 余人，由于清川江大桥被敌机炸断，要在万城车站下车，命令我连全部接收，全连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由于原有病区容纳不下，我们派出 6 名同志，分赴三个村庄，动员老乡腾房子、准备早饭。全连同志除

部分留下护理原有的伤病员外，其余的人与 100 余名新民县担架队员，都前往万城车站接收伤病员。

早晨 6 点半，伤病员专列到达万城车站。我们分头登上各节车厢，先动员伤病员下车，由女同志带领或搀扶，而后安排担架抬走重伤员，进入距车站 1 公里的山林中隐蔽，再分批从山林中转送到各个病区去。在最后清理车厢时，发现有 4 人死亡，是在列车行进中被敌机扫射中弹牺牲的。我们以沉痛的心情把他们抬出车站。正在这时，敌机又来骚扰，在上空转了两圈，对准空车皮扫射了一阵。全连同志虽然十分疲劳，但大家都为能安全迅速地接收这么一大批伤病员战友而感到无比振奋。到这时，我们连队七个区共收容了伤病员一千余人。

由于清川江大桥一时不能修复，各种物资运不上来，医药器材和给养十分困难。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我们不但给所有的伤病员安排了食宿，还使他们受到较好的护理和治疗。

我们这个伤病员收容连队，从连长、指导员到军医、护理员，100 多人中的骨干都是 20 岁以下的青少年。4 年前，我们都是在延安明月下，秉烛夜读的稚童。时代过早地将战争的重荷加在我们的双肩上，使我们中断了中学生活，走进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战场，像一群雏燕在暴风雨里搏击着。我们走出一排排黄土窑洞，离开宁静的校园，长久奔走在千山万壑，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经过转战陕北，不断抢救血泊中的战友，直至解放祖国的大西北。当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毛主席以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我们所熟悉的浓重的湘音越过千山万水，传到八百里秦川平原的时候，我们不禁欢歌狂舞，想象着明天能重返天真欢乐的校园，重新坐在肃静的课堂里学习。

不料，当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一道紧急命令，又要求我们再整戎装，踏上征途。

1950 年 10 月 15 日，我们离开果实累累的石榴之乡，走进一列闷罐式的军训车厢，放下背包，依次坐在铺着麦草的车厢的地板上。然后车门紧关，一声长笛，军列风驰电掣般地向东北方向疾驰而去。

我们曾经被战争召唤，为祖国的命运而出生入死；而今，我们又重被召唤，为争取世界和平的另一场战争贡献力量。也像当年一样，豪迈的历史使命感引导着我们，使我们为与祖国同龄的一个共和国的命运而战。崇高、神圣、光荣而又自豪的感情在激励着我们。

1950 年 12 月 5 日，我们跨过鸭绿江，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的行列。1951 年 1 月初，我们连奉命进驻万城车站附近，担任收容、转运伤病员的任务。

万城前方 45 公里，就是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首都平壤市；后面 15 公里，是滔滔清川江，它是连接前后方的咽喉，是向前方运送物资、弹药、军需给养、医疗器材，又向后方转运伤病员的一个交通要冲。因此也就成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狂轰滥炸的重点地区。

我们连队的处境极为困难。前方战斗激烈，伤病员不断转送下来，而清川江大桥又时常被轰炸，使伤病员的转送经常受阻，医疗器材、装备给养，也无法保障。滞留我连的伤病员不断增加，从开始一二百名很快增到了 1400 余名，持续时间也很长。

我们连队驻防万城火车站附近的风鹤里，这是一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

小村庄，只能收容 100 多名伤病员。伤病员的急剧增加，使小村庄很快就收容不下了。我们决定派军医马玉甫带领部分同志到距万城车站 1.5 公里的村庄，开辟另一个收容点，称为一区。原风鹤里收容点指定由军医霍玉祥负责，称为二区。另派女军医温明芳带领部分同志建立了三区。

三个区共可收容六七百名伤病员。随着战役大规模展开，伤病员愈来愈多，又先后建立了四区、五区、六区。

生活，像百米跨栏赛的跑道，困难像是那一个个的跨栏，要靠勇气与毅力才能跃过。

战争之路，有血有火，有创伤，有死亡；同时，在日常工作中，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困难，每时每刻，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有时它像影子般伴随着你，在战争道路上蠕动。纱布绷带用光了，把换下来的血纱布、旧绷带洗净消毒再用；用汽油桶煮沸消毒，因气压力不够，每次要蒸几小时；为避免暴露目标，招来敌机轰炸，白天不能冒大烟，夜间又不能漏光；无煤炭又无干柴，于是用山林中现砍的油松枝条当燃料；在室内消毒，烧火的同志两眼被熏得又红又肿；消毒酒精用光了，便用浓盐水和汽油代替；固定肢体的夹板用光了，就用木棍树枝当夹板；为治疗大面积的创伤，温明芳等同志还用手术截肢后的余端自制组织液；有的伤病员失水失血过多，需要输液，没有药用生理盐水，军医们用食盐自制盐水，注射输液。

前线，没有 8 小时工作制，而是 10 小时、16 小时、20 小时，甚至 24 小时的工作时间。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突破人的生理极限，使人失去自控能力。护士长张锦富同志一天晚上接收登记伤病员时，在伤员回答缓慢的间歇中，竟然依门站着睡着了。有一次，他去太平间在防空洞内给烈士裹尸时，竟跌倒在烈士身边昏昏入睡了。女护士郭淑媛同志，去山上打柴，返回时因背负过重，中途昏了过去，醒来后还硬是把柴全部背了回来。内科军医霍玉祥同志整天在病房给病号诊治，晚上写病历、查阅医书、解决疑难。当他困得实在睁不开眼睛时，就去病房转一圈，看看重病人，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甚至到清早。他熬红了眼，直到累得生病发烧，满脸通红。管理员郑志成同志负责全连后勤供应工作，夜晚去兵站领取、搬运食物和被服，白天砍柴、做饭、炒菜、送饭，没白天没黑夜地干，一个多月没有脱衣睡觉，支持不住了，打个盹接着干，他被公认为压不垮的硬汉子。不幸，他却患了伤寒病，发烧 39。这时，他仍然坚持工作，终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

女军医温明芳同志在写给国内妹妹的信上说：“如果一年内收不到我的信，就是我已经牺牲了，但暂时不要告诉妈妈，免得老人家伤心。”写这种“讣文”的信，又何止温明芳一人！

《时刻准备着》这支歌，我们从小学唱到延安中学。那时候，老师对我们讲：“你们时刻准备着建设新中国。”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时刻准备着”去医治战争的创伤。但是蒋介石又燃起内战凶火，蔓延到延安，我们时刻准备着响应党的召唤：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如今，我们“时刻准备着——牺牲”，将自己一切的一切交给三千里江山。

正如一位战友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是什么，将我的心紧紧地贴在五圣山的峰巅？

牡丹峰的悲凄和忿懑；

宝塔山的希冀和囑言。
是什么，将我的凝情紧紧地聚在三千里江山？
延河的情爱，犹如朝露尽染丛林青山，清川江壮歌，伴着炮声响彻烽火硝烟。

我站在碧波荡漾的清川江岸，好似雄立飞浪滔天的黄河崖畔；
我走进一座座农舍山屋，好似回到生我育我的黄土窑洞；
我站上四四八高地，好似立正在天安门前。
捍卫着共和国的尊严，守护着五星红旗的鲜艳！ 蒋文义
男，延中六班学生。曾任航天部 207 所政治部主任。工程师。

长眠在朝鲜土地上的延安女儿

——王涛英冯荣华 李凡民 王秀英 高耶夫 李 骏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郊区一个风景如画的山坡上，有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涛英这位延安人民的好女儿，我们延安中学的校友、志愿军野战医院的女军医，已经在这里长眠 40 年了。岁月如流，朝鲜人民每年祭奠她，祖国亲人一时一刻也没把她忘记。

涛英，1928 年 12 月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绍三村。在她不到一岁的时候，她的家乡闹灾荒，一家人随着逃难的人流，由父亲挑着她和弟弟，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历尽了艰辛，终于在陕西延安县的桥儿沟落下了脚。

涛英 6 岁的时候，母亲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失去母亲的家庭就像断了梁柱似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难熬了。父亲被迫卖掉了她的弟弟，离家谋生（后参加了八路军）。

临行前，他把小涛英送给了一个有钱人家。走时，父亲流着泪说：

“孩子，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妈。还是找个能吃饱肚子的地方去吧！”没料到，到了有钱人家里后，她受的气，吃的苦，比在家挨饿受冻还要难以忍受。有一次，涛英的大妈把她接回家来，看到她脸上，身上挨打留下的伤痕，再也不忍心把她送回火坑里去了。大妈带着她和自己的两个女儿吃糠咽菜都难以果腹。

延安解放，王涛英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幼儿园当保育员，那时她才 11 岁。后来又有一位革命同志家里照看小孩。由于她工作积极，学习努力，组织上送她到延安小学读书。

1945 年她便考进了延安中学，编入九班学习。

她在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了延安中学毛泽东青年团。

1946 年，18 岁的王涛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管是学习文化，还是生产劳动、打扫卫生，处处走在同学前头。同学们劳动了一天，疲劳得都不想动弹，她却从山下把一盆盆热水端在同学们面前，让她（他）们洗脸洗脚。她经常帮助小同学和男同学缝补和拆洗被褥，受到老师和班里的表扬。

1947 年初，由于战争的需要，边区政府下令将延安中学改编为西北人

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医院。王涛英同学也被分配到医院，做护士工作。她工作依然积极负责，做伤病员护理工作，不怕脏不怕累，学习医疗技术也进步很快。不久她便被提升为护士长。后来，医院成立了医生训练队，她被任命为医训队的副队长。医训队确是名副其实地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经过了一段医疗技术的学习，掌握了理论知识和实践技术，王涛英成为一位年轻的女军医了。

尽管战争环境生活艰苦，但同志们还是非常乐观。当时的口号是——一切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野战医院一边收转前方伤员，一边跟随野战军在前方转战抢救伤员。同时，医院还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利用战争的空隙排练歌舞节目，为战斗部队、为伤员、为当地的老百姓演出。涛英也参加了宣传队，并是一位活跃分子。她经常扮演剧中的重要角色，也经常扮演别人不愿扮演的老太婆。她扮演秧歌剧《兄妹开荒》里的妹妹，尤其受到欢迎。

艰苦的三年解放战争迎来了祖国的黎明。新中国成立后，王涛英和一位陕北籍的青年军人在野战医院驻地陕西临潼县华清池畔结了婚，建立了他们的幸福家庭。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开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带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一批批地跨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涛英所在的医院和她的丈夫都赴朝参战。她因即将临产而不得不临时留在国内。但王涛英急切地想参加战斗。产期刚满，她就把才生下两个月的女儿托付给在陕北绥德县的婆婆。就在她回婆家的时候，请去摄影师，为她的公公、婆婆拍下了他们一生中仅有的一张照片，为她爱人留下了珍贵的纪念。她还为当地的老百姓治病，至今那里的老乡还怀念她。孩子安排好以后，涛英立即向组织提出参加抗美援朝的申请。她说，战友们都在前方流血牺牲，我怎能呆在后方呢！？领导上看到她态度那样坚决，便批准了她的请求。

朝鲜战场战斗激烈，伤员多，医生少。王涛英和她的战友们每天都在争分夺秒地抢救伤员。由于条件差，有些伤员的伤口已经溃烂，甚至生了蛆；有的伤员全身数十处伤口；有的昏迷不醒；有的周身瘫痪，屎尿不能自理。她含着泪水，轻轻地把蛆一条条掏出来，她亲自接屎把尿。重伤员不能吃饭，她就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为了尽快地给伤员开刀治疗，她和战友们有时一天一夜不离开手术室。常常是敌机在头顶上扫射，炸弹在地面上爆炸，她们置生死于不顾，为伤员同志取出了无数的弹片和弹头。伤员多的时候，一天顾不上吃饭。

当时同志们的口头语是：“死了算，活着拼命干。”是的，在那种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随时随地有可能牺牲。因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张纸条或纸片，上面写着本人的姓名，是哪省哪县人，年龄、部队番号，以便万一牺牲后，能在墓前立一个小木牌。

在朝鲜前线，她的爱人问她：“苦不苦？想孩子不想？”她说：“这里虽然苦，也算不了什么！我当然爱我的女儿，但我看到朝鲜儿童遭到屠杀时，我觉得我要为保卫朝鲜儿童而战斗，也是为保卫我们自己祖国孩子的安全。越是想女儿，我越是要努力工作和战斗！”她还告诉丈夫，在她出国前路过北京时，大姐在北京第二医院给她联系了一个条件很好的工作，希望她留在北京工作。她笑了笑说：“我向大姐谢绝了。我决心和战友们朝鲜并肩战斗！”她在一封家信中写道：“为了下一代的幸福生活，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团聚，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王涛英同志入朝一年多，多次立功受奖。中国政府曾授予她一枚“人民功臣”奖章。

我们同学相聚时每当提起王涛英，都称她是我们延安中学的骄傲，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校友。

由于陕北生活条件很艰苦，涛英的女儿还不到1岁就不幸夭折了。丈夫怕她伤心，影响工作，一直没有把这噩耗告诉她。直到涛英同志牺牲以后，在整理她的日记时，才发现她当时早已知道了，但她也从来没有提及。然而，出于母亲的天性，她在多处的日记里抒发了对孩子的思念和悲痛。她常常背着爱人，背着同志偷偷地流泪。事后她爱人回忆，有一次曾看到涛英到河边痛哭，他以为她想家，想孩子。其实，那可能就是她发现爱人藏在枕头下面那封有噩耗的家信的时候。王涛英和爱人不在一个部队工作。1952年10月11日，她在给爱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这次到朝鲜来，是作了牺牲准备的！我如果牺牲了，您不要悲伤，希望能把我的尸体送回祖国！如果不幸您牺牲了，我会妥善地照顾您的一切，望您放心好了。”读着这封催人泪下的信，她的爱人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不测。他盼望的是早日胜利地回到祖国，有夫妻团聚的一天。说来也太奇怪了，在她五天前寄出的那最后一封信中，落款恰巧写的是“10月16日。”10月16日，是涛英爱人收到她那封信的第五天，也是最可怕的一天。就在这天夜晚，涛英所在的部队遭到敌机的轰炸。敌机疯狂地将几百颗炸弹投向事先测量好的目的地，将房屋和人一起翻上天空，在两三丈的高空悬垂、下落，将房屋和人全部摔毁。涛英就这样被掀到半空中，又落下来，她毫无伤痕地牺牲了。

轰炸发生以后，涛英的爱人和延中的几位同学一起赶到现场抢救伤员，大家喊着口号，在废墟中扒人、救人。两个小时后，他们才发现涛英不在了。队长冯志歧拉着她爱人，在山坡上兜圈子，说：“王医生在这……在这儿……在这儿……”边念叨，边找，边跑。20多分钟后，才把他领到涛英牺牲的地方。其实这仅用几分钟就可以走到了。队长是怕涛英的爱人承受不了这个打击，故意拖延时间的。她的爱人又激动又悲痛地跑到涛英面前，这时涛英的身上还热着。他赶忙去叫李凡民。李凡民赶到以后，一把推开他，说：“你离开这，王医生的事由我们负责！”几个人把涛英抬到她原来的住处。房子没有塌，床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土。她爱人为她抖落了浮土，把她放在床上。在这废墟中仅有的一间小屋中，涛英的爱人陪伴着他心爱的妻度过了最后的一夜。

第二天，延中的同学纷纷赶来了，还有人为涛英拍了遗像。也许是由于异常的悲痛，也许是因为战地无法保留遗物，涛英的爱人点燃了一把火烧尽了她的东西。在战场上，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死人，所以人们已经没有眼泪，很少再哭了。

第三天，刘力学来了，抱住涛英的爱人大哭。涛英的爱人好像才被摇醒，一阵哭声响起，再也停不住了。他想起涛英就流泪，对亲人的依恋，对烈士的怀念，对敌人的仇恨统统汇入奔腾的泪水中直泻而下。

涛英的爱人在她生前曾答应，如果她牺牲了，要妥善处理她的后事。他为她找了一个向阳的高坡，冯荣华找人用5寸厚的松木做了一副棺材。大家把暂时停放在防空洞中的涛英的尸体重新入殓，在棺木中撒下许多酒和药品，并放入她生前喜欢的衣物，将她掩埋了。

涛英牺牲时年仅23岁。为了尊重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愿

望，涛英没有回来，她和许多志愿军烈士一起埋葬在他们为之献身的国土上。

40年过去了，王涛英同志在战火中获得了永恒的青春。

她永远拥有23岁的青春年华！

她是延安人民的好女儿，是中国人民的好女儿，也是朝鲜人民的好女儿，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她的。 冯荣华

男，延中九班学生。曾任陕西省西安市冶金机电局劳资处处长。

王秀英

女，延中十二班学生。烈士王涛英的姐姐。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卫科科长，已故。

王涛英

温明芳口述王桂苡执笔

我有一张最珍贵的照片。虽然时间太久，照片已发黄模糊了，但我至今还如家珍似的珍藏着。

照片左边一个最好的位置是空着的，是给我的年少的同学、亲密的战友——王涛英留着的。

那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我们要回国时拍的。她本应该同我们一起回到祖国；她本应该同我们一起在朝鲜合影留念，可是她却不在。我们中间不能没有她的位置，这个空着的位子将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

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涛英的音容笑貌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她那么年轻，仅仅23岁。

39年前。

1952年10月16日。

朝鲜平壤一带的大地上，整整下了一天半的鹅毛大雪。

雪，把树，把山，把房屋，把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白色。寒风刮起，刺骨的寒冷，寒气真是逼人。

这天夜晚，我们轻伤院的医护人员正在开党的小组会。

忽然，窗外一道闪光。那闪光耀眼得刺人。我们还没来得及思考是什么光时，就听到震耳欲聋的飞机吼叫声擦着山顶而过。轰隆隆的爆炸声四起。党的小组会中断了，同志们不约而同地跑到门外，看究竟是哪里遭到轰炸。

我一看山那边火光四起，如同白天一样，那儿正是汽车团和内科医院的所在地。

这时，总院部打来电话说，内科院被敌机轰炸，伤亡情况不明，请快速准备接纳伤员。

我们立刻忙碌起来，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

可我的心老是安放不下来，总是发毛。我的同学、战友——涛英就在内科院。她怎么样？她该不会……我不敢再往下想。每个人都在关注着战友的伤亡情况。

当晚，没有送来伤员。后半夜我们还迷迷糊糊打个小盹儿。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脸没顾上洗，牙未来得及刷，请个假拔腿就往

隔山的内科院方向跑去。十五六里的山路被雪覆盖着，被炮弹炸的弹坑一个挨一个，我跟着战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连走带跑着，一下子摔倒在弹坑里。爬起来，连身上的雪都来不及拍掉又继续赶路。

“同志，王医生在哪儿？”

“同志，见到王医生了吗？”我逢人就问。

大家都在繁忙中，没有人停下来回答我的问话。

只见抬着的，背着的，扶着的伤员被医生、护士们送去接出，我在他们中间穿行着，打听看。

当我跑到涛英的住地时，一些老战友已先赶来了。

我忙向一位熟悉的战友问：“王医生在哪儿？”他一句话没说，只是用手指了指一间民房。

我转身大步向民房奔去，感到凶多吉少。

这儿有不少人，我熟悉的，不熟悉的，唯独没有见到涛英。我扒开人群，拼命挤进去。啊！我最怕的事发生了。我看到了她，她……她……静静地躺在一块木板上，一位军医已经给她盖上了白布单子。围着的人不说一句话。

我蹲下去，掀起白色的布单子，看看她。她安安详详，像平日睡着一样。嘴角还微微带点笑意。我摸摸她的手，已经冰凉。我握着她的手泣不成声地呼喊：“她没有死，她会醒来的，她一定会醒来……我俩还有好多知心话要说啊……涛英……”

同志们有的劝我宽心，有的抹泪。一位战友放声大哭起来。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在场的赵政委见到战士们悲痛大哭，怕影响士气就大声吼道：“哭什么！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战场！”这一吼把大家震住了。他接着说：“这是我们思想太麻痹。我们只能记取教训……”

赵政委又何尝不伤心呢？当年在国内解放战争中，他也是我们的领导，而在国内战争前，他是我们的老师。哪一位老师不疼爱自己的学生呢？！

我们忍住哭声，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又继续投入抢救伤员的紧张战斗。

事后我才知道，涛英冲出屋外抢救伤员时，被炸弹爆炸后的气浪掀起，又重重地摔在炸弹坑旁，造成内伤而牺牲。

当我整理她的遗物时，看到桌子上还打开着她的一本内科诊断学，旁边放着她的学习笔记本，抽屉里还有她留给爱人的几个红红的苹果……。

涛英的老家是河南内黄县。因家乡闹灾荒，一家四口四处流浪，逃荒，要饭。不久积劳成疾的母亲过世了。父亲为生活所迫，只好卖掉弟弟。她与父亲相依为命，逃到延安桥儿沟落脚。

她父亲参加了八路军。11岁的涛英开始自谋生活。

她当过保育员，也给人当过保姆、看孩子。白天看孩子，晚上学文化。她就是靠这种顽强的毅力，自学文化课而后进入延安中学的。入学不久，她加入了毛泽东青年团，18岁时光荣入党。她每干一样工作都受到表扬；每到一单位都得到好评。

凡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为人诚实厚道，称她是个好心人。

她不光心眼好，人也长得很美，高鼻子大眼睛、乌黑的头发配上那圆圆的总带笑意的脸，谁见了都喜欢。

我们这些比她小几岁的人，视她为大姐，并引以为荣。她视我们为小

妹，时时关心爱护我们。在这种相互关心与爱护中，有时还闹出一些小笑话。

我说过，她人长得很美，又正当青春年华，向她投来爱慕之光的人是很多的。我们这些小妹遇上“看不上眼”的人来找她，就会不约而同地回答：“她不在。”或找别的借口搪塞，每次她总对我们笑笑，从来不开气。

当我们知道她与韩某的关系时，我们视为“合格”，就为他们开放绿灯。只要他一来，我们会自动躲开，使他们有说话和接触的环境。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小妹妹成了她的义务“保镖”。

她是 1950 年在陕西临潼华清池畔与韩某结婚的，他们已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当美帝国主义侵朝战火燃到鸭绿江边时，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江去，在志愿军长长的行列中，就有她的爱人。

不久，涛英将刚来到世上不到两个月的孩子交到陕西的婆婆家，就风尘仆仆地奔赴朝鲜参战，来到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参战期间，她的孩子终因断奶过早，家乡的生活条件差，未满周岁就夭折了。

爱人怕她伤心，一直瞒着她。

后来，在整理她的日记时才发现，她早已知道女儿不在人世了。出于母亲的天性，她把这种母亲对女儿的思念和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抒发在日记的字里行间。她也曾背着爱人，背着战友，偷偷地流泪。她是一位母亲，然而她更是一位战士。

涛英牺牲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她的爱人失去了好妻子。她永远长眠在她战斗过、捍卫过的朝鲜土地上，连同她的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依稀的白发出现在我的双鬓，而这照片上的我们都依然年轻而俊美。涛英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是漂亮、洒脱、只有 23 岁的年轻人。她没有死，永远不会死！

温明芳

女，延中十九班学生。曾任陕西省政府卫生所副所长。

回忆马探雄同志

高耶夫

马探雄同志去了，去得谁也不曾想到。马探雄同志的追悼会开得极平常，却产生了不平常的反响。会上，第五分部干部处长受党委之托，宣布：党委决定追认马探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马探雄同志的追悼会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小山沟里召开的，他被安葬在一个半山坡上，一片青翠常绿的松林里。每年的春天，盛开的金达莱为他报春，伴随着他的长眠。

马探雄同志 1945 年入延安中学，是十七班的学生。追悼会上由我介绍了他的生平，然而，他的生平是那样的平常。

马探雄同志出生在一个陕北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不甘穷困，早年参加了革命，屡建战功，在一次对日作战中他腰部受伤，行动不便，遂转入骑兵。他有相当好的骑术，是一位出色的马上将军。后来由于腰伤复发，不胜

坐骑，才告别了战场。马探雄和他的弟弟从小生活在被指控为“匪属”的家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我认识马探雄同志是 1941 年秋，在安塞县白家坪。那时候我们同在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学习。

马探雄在小学部有个绰号叫“三马雄”。我不知道那绰号的确切来历，但知道它有力大无比的含义。有人说他手脚灵，腰板硬，在全校他数第三有劲，故称“三马雄”。

也有人说他与另两个姓马的同学同样力大无比，称雄于数百名同学之中，所以才称“三马雄”。“三马雄”在同学中仿佛像侠客义士一样，备受推崇和敬重。在我们班里，同学们说他既不训人，又不撒野，把那雄字去了，亲昵地称他为“马探”。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临终之前，不少新同志以为他的名字就叫马探。

马探雄年纪小，力气大，勤恳卖力。学期开始，抬桌子，杠板凳，他比谁都主动。

开荒种地，抬水浇菜、大扫除、美化校园等一切劳动他总是走在前面，拣重活、累活、脏活干，还常常主动帮助小同学和女同学。

他话不多，看起来似乎有些内向，有时十分幽默，话说出来逗得人笑出眼泪。他绝不咋咋呼呼，无论学什么干什么，总有一股钻劲。他学拉胡琴，一个人坐在那里揣摩，吱吱啦啦地过了几天，便拉出了调子。没见他向谁学，忽然，大家发现他会拉胡琴了。

升入延安中学时，他已是个人有水平的二胡手，是延安中学乐队的主力队员之一，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斗空隙，他的胡琴演奏或舞台伴奏，发挥了战斗鼓舞作用。

他好学，聪慧，要学的东西一看就明，一点就通。小学里，经老师略为指点，他学会了战鼓、军鼓、童子鼓几种鼓点，在数百名学生队伍里，他以鼓手排头。

马探雄的篮球也打得极好。他跑得快，投篮准，对方往往要以两个人防范，还不能制服他。在延安中学，后来在第四野战医院，他一直是篮球队主力队员，而他的球艺是从小用破布包裹的棉花团练出来的。那是多么不容易而有趣呀！

他特别喜欢军事体育活动。从游戏中的“骑马打仗”到学校组织的攻山头、投弹、夜行军等野外训练，他都热心参加，平时喜欢扎皮带、打裹腿，煞是一副军人风度。他摔跤、踢毽子也都是好手。他最大的长处是能容人，能让人，玩耍中从来不翻脸，不计较输赢，还曾连任几届学生会的体育委员。

马探雄同志为人忠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生活得十分俭朴，衣服鞋袜，补了穿，破了补，从不轻易购置衣物。他自己编草鞋，一年三个季度都穿草鞋，木板鞋。他的弟弟和别的小同学，费鞋袜、费衣服，他经常为他们清洗，缝缝补补。

他在班里备受尊敬，连续几个学期都被选为班长、副班长。那时老师强调学生自治，以正副班长为核心，组成五六个人的班务委员会，负责处理班级事务，组织班级的集体活动，调解同学间的纠纷。马探雄同志是主持公正的热心肠人。

1947 年初，延安中学受命改成陕甘宁边区第四后方医院（后名西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马探雄同志被分配担任护士。当时在护理治疗条件极

差的情况下，护士实际上就是侍候伤病员的卫生员，但他不挑也不拣，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从不拈轻怕重，而总是拣重担子挑，争着抢着为伤病员多做工作。蟠龙战役时，马探雄用一只破碗为一个重伤员接大便。

他用一只手堵住半边的缺口，不让稀大便流在床上，在场的伤病员十分感动。他工作特别认真，尤其能体谅伤病员。重伤员都喜欢叫他喂饭，他一勺一口，不多不少，不紧不慢，耐心地等待伤病员咀嚼吞咽，一点也不急躁，为了不烫着伤病员，他反复用嘴吹。伤病员们称他是好兄弟。

我军攻打榆林的时候，他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两天两夜没有合眼。饿了啃几口糠窝窝，渴了掏几口凉水喝，等伤员全都转走时，他自己却病倒了。有人说是因为饿的，有人说是因为累的。昏迷中他一再说：“细粮留给重伤病员……”

人们看见他给过往的伤病员发放干粮，数量有限，但有馒头、烧饼，允许自选。当他病倒时，发现他兜里装的是半块吃剩的糠窝窝和两个像鸡蛋大的熟土豆。

频繁的行军，不断的转移，有时和敌人赛跑，有时受敌人围追。马探雄同志除了自己的行装，还背着常用的急救用品，背包上还横置一支步枪。每当小同志、女同志余力耗尽的时候，他的背负愈加愈重。

沙家店战役期间，在异常紧急的情况下，他十分沉着。有一次，在与敌军相距四五里的小道上，他带着伤员撤退转移，最紧张的时候，他扔了自己的行李，背起一个忽然不能行走的伤员跟着担架迅速拐进一条偏僻的山沟里。深秋的陕北，夜里冷得人发抖，他守护着一片担架，伤员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有人把夹被披在他的身上，有人把干粮递在他手里……

第二天天刚亮，他爬上山头去张望，几经打问，弄清了他们所处的位置，明确了方向，他才在群众的协助下，按时将伤病员们送到了黄河渡口。

1948年秋，冯塬镇战役中，他护送30余副担架到后方去。途中，一位民工突然腹痛不能支撑，他挺身顶替，抬出去30多里。那时他只有十六七岁，却与一年四季劳动的庄稼人同样出力。

部队转移中情况十分紧急，他带领轻伤员先走。途中，一名跛着腿的伤员胡二娃忽然摔了一跤，伤口出血，疼得走不动了。他二话没说，撕开洗脸毛巾为他裹好伤口，顺手拉过他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架起就走。过了大沟，上到半坡，马探雄同志晕倒了。

他有气无力地对伤员说：“不要管我了，你们走吧！走出几步算几步，上了坡就好了……”几个伤员架起他，几乎就是拖着他，上了大坡。这时跟随担架的主治军医赶上来，经过检查，认为他是劳累加困倦和饥饿昏倒的。

检查他的粮袋，果然是空空的。顿时，几十条粮袋摆在他面前，有人给他喂水，有人给他喂干粮，主治军医给他注射了不少葡萄糖。他睁开眼睛时，奇怪地看着大家。这时，一直蹲在一旁的胡二娃忽然大哭起来，说道：“是我吃了他的干粮。”

他叫我吃饱肚子振作起来，跟上队伍。我不该吃了他的干粮，还让他背着我上坡……”

马探雄同志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因勤奋好学，掌握了不少护理知识和技巧，他后来被提升为护士长。

1949年秋，大规模的战斗基本结束。受西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的委托，医院承办了第二期医训队，马探雄同志也选去受训，为第四班班长。班

里有不少新同志、小同志。

冬季，他把火炕让给别人睡，他自己睡在过厅里的皮棉（即带籽的棉花）堆里。没有门，身上盖的薄被、不挡风，夜间他冷得发抖。棉花堆上不敢点灯，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是摸黑入睡，靠月光照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热情地组织文娱体育活动，并参加演出歌剧《刘胡兰》、《周石山》和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解放区的节目，在伤病员和驻地群众中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医训队归三分院，番号六连。这既是一个医疗单位，与其他连队一样收治伤病员，又是一个学习单位，利用一切时间组织学习，上课，训练。

为了同志们休息好、学习好，马探雄经常主动执勤，承担夜间巡逻放哨任务。他将大衣盖在战友的身上，他自己在雪地里跑步跺脚取暖。

在最危险的情况下，他主动承担伤员后送工作，带领护士们执行护送伤病员的艰巨任务。平壤北郊的西埔车站，是铁路线上挨炸最多、空中封锁最严的车站之一。有一段时间，他带了几个同志常驻那里，与师仲姚等同志共同承担伤病员上车下车等繁重杂乱的组织工作，指挥接待和就地隐蔽安置伤病员。

三次战役，我军迅猛向前推进。敌人疯狂轰炸我们后方补给线、兵站、医院和后送途中的伤病员，平壤市成了一片焦土。马探雄带领两个同志组成联络站住在平壤，接待过往伤病员，为他们指明北去医院的方向。每天成批成批的美机疯狂投弹扫射，轮番轰炸，他整天整夜在空袭警报中度过。有时他亲自带领伤病员在废墟中寻找道路，走出平壤市区。

朝鲜战场没有前后方之分，战斗空前激烈，生活异常艰苦。美帝国主义凶恶残忍，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使用了灭绝人性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医院里不分白天黑夜，军医护士，军人民工，志愿军朝鲜人，共同团结奋起，通力协作。

马探雄同志经常带领轻伤员、民工、战俘挖防空洞，砍柴，执行各种勤务。他凡事走在前面，获得了“人民功臣”的奖章。

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学习刻苦勤奋，在学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基本上可以单独工作。领导任命他为助理军医，授予他有限的处方权。

1952年，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确定医训队学习时间延长至5月，战争间隙再次集中训练。马探雄同志来自临床，工作中深感知识的欠缺，倍加勤奋地学习。半年多的紧张学习生活，他愈来愈消瘦了。但他的意志坚强，阅读、听讲、笔记、抄写，不放过一时一刻。他一再警告自己：这相对安定的学习环境，是战士们浴血奋战得来的，我要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学习更多的本领，抢救更多的伤病员。

马探雄同志是在战友们的劝说下才勉强住进医院的。他到病房时还带了学习的讲义和笔记。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当天晚间，他在病床上静静地合上了双眼，悄悄地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在清理他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他从1948年初，就有了对党的认识和追求：“党员是革命队伍的中坚……爸爸是党员，成了荣军，不能继续战斗，我一定要像他那样，为革命事业出力。”有些文字段落没有日期，但反映了他那时常想到组织问题：“党员的形象是崇高的。在我周围，凡是令人信服的好同志都是党员。”有一次他写道：“加入党组织，做一个党员，并不十

分难。但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为公不图私利，团结群众，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的好党员，却并不容易。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党员。我不图虚名，一定要做一个符合要求的好党员。”

马探雄同志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他也确实是不图虚名，一心为公的好同志、好党员。我们今天纪念他，特别要学习他无私无畏、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和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

当年作文六篇

延中举行开学典礼霍济正

18日延农中学在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到会的有全校700余人，他们欢欣鼓舞地迎接新的一学期的开始。

早饭后，各班排着整齐的行列向会场走去。

平常的天主堂内是寂静的、空虚的、充满了灰暗，今日却焕然一新。墙壁的四周，遍贴彩色标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团结朴实，紧张活泼”，“尊敬师长，爱护同学”，“实事求是，力辨真理”……在和蔼亲切的斯大林巨像下坐满了红光满面的青年男女。党内一片嘈杂之声，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墙角看画报、照片……坐在礼堂中央的三班同学在低着头阅读书报，这是他们最后一学期，时间对他们太宝贵了，似乎在这会前的几分钟也不能放过去。

一阵掌声过后，同学们都很自觉地肃然静听副校长的演说：“我们要文化政治并进，没有文化政治就不能提高，没有政治是空洞的文化……”继而由教职员代表曼秋讲话：“我代表全体教职员，保证尽心尽力帮助大家完成学习计划。”最后由学生代表讲话：“……我们不能白吃老百姓的小米子，他们费了多少的血汗才换取来的果实，只有我们在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多为他们做些事情，这才对得起他们。‘日子多着啦，一年还有365天呢？’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到那时不赶上时代的需要，是会被淘汰掉的。最后我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在雷一般的掌声中，结束了这个热烈的场面。霍济正

女，延中三班学生。曾任陕西省地矿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他们把时间看得非常宝贵王敏清

“别搞了吧，功课搞不完是小事，眼睛搞坏了可是一辈子的事啊！”一个同学对着另一个在黄昏时还趴在桌上用功的同学说着。那个同学回答着：“对！……”但始终还不离开书本，想把最后的一点功课搞完再休息。

他们是延中的三年级学生。每个同学由于认识到过去马马虎虎学习以致于没有学到更多的东西，今后就只有短短的一学期的学习时间，说不定毕业后就要去哪里工作。自己只有多学些东西将来才能为人民做些事情，因此把时间看得是非常宝贵的。

每次吃饭哨子已经吹过很久了，同学们仍然趴在学习桌上静静地做着自己的作业，似乎没有听见哨音一样，直至伙委着急地跳到当院大声地嚷着：“吃饭啦，吃饭啦，快下山啰！”

这时同学们才恋恋不舍地合上书本和笔记下山去吃饭。

晚饭后其他班的同学在院子里不是说笑，便是跑着，跳着，打闹着玩，只有三班的院子里是寂静的，不见一个同学在院子里耍闹。一次别班的同学来三班玩，一进门就见他们满围在学习桌的周围练写着大字，惊讶地说：“晚饭后你们都不休息？真用功！”他们回答：“字写得这样难看，现在还敢玩？将来出去字写得不像样那可成问题咧！……”

在这练大字的当儿，他们也是不让时间白白过去的，一个正磨墨的同学问我们“什么时候收复长春的？”“4月18日么……”另一个正写字的同学回答着。

像这样的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些时事问题，在他们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

在这样紧张的学习中，每个同学的功课都在飞跃地进步着。例如过去的作文在形式上就根本谈不到，在内容方面大半是既空洞又不实际，甚至在词句上都写不通的。例如一次×××同学写着：“明月，映暗了繁星，葵花也用着崇高的微笑放着芬芳的香味，我为这伟大的今天趁着晚间的太阳行走着。”而现在他们已能写有内容而文字清楚的通俗报告了。

五四青年活动的一角李路达

“我15岁了，还没有参加过青年节，今年我就要参加了。”

“五四”，学校发动了征文竞赛，我要好好地写一篇，也表示我是青年，参加了青年活动。”小刘这小鬼为了他可以算一个青年而高兴地说。霍济正也说：“我也要写一篇，想找牛荫西合写，我要努力地写，不管选取不选取。”

晚饭后，别班的同学都在院中打珠子，打扑克，玩得很热闹。三班的同学都趴在桌子上，或几个人一小组地商量着，写征文。牛荫西、霍济正和小刘，三个人躲在僻静的教室内商讨着写《延中三班》，很快的他们讨论好，分了工。好胜心强的小刘说：“咱们把提纲已有次序地列好了，工也分好了，下去每个人都要用心加油写，一定会被选取的。”赵润一个人写了一篇。他写完，自己先改了之后，便交给别的同学看，让别人给他提意见，他再重改。张立新看过之后，说他写的材料较零乱，什么东西都写上去了，没有很好地选择材料。他听了之后一想，高兴地笑咪咪地弯腰作了一个揖（作揖是开玩笑，意思是表示谢意）讲：“我本是发扬好的，结果把坏的也写上去了！”

全班大半是集体创作，共有6篇，4篇是集体写的。方法是分工合作。你写第一段，我写第二段，他写第三段，然后互相提意见，共同来修改，全班掀起了征文竞赛的战斗。

站在院子里，坐在屋子中，一堆堆的人，都在谈论着这次的征文。牛荫西骗人说：“黑小子（刘健的外号，因为她长得黑而健，像个男同志），你的征文选上了，还是甲等的，可把你高兴坏了吧！”他在骗着别人，他的心里却希望着自信着自己的被选上。

每个同学都带着一颗希望得选的心，等着那评判结果的消息传来。

一天的晚上，分会主任高兴地跳着、喊着从评委苏红那里回来，拿着班上的征稿和要誊清抄送到《解放报》去的稿纸。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问着，抢着看征稿，喊着：“共投了6篇，5篇就被选了，并且4篇集体创作都选了！”“到底是我们集体力量大！”“这也是我们积极参加竞赛的果实呀！”

李路达

女，延中三班学生。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机电部北京机械自动化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踩九曲

刘幼雪

正月十五快到了，为了迎接这胜利后第一个元宵节，桥镇乡政府应了老乡们的请求，积极地筹划着在那一天举行一个盛大的灯会。

灯和许多应用的东西都是老乡们自动捐的，刘金贵还捐出了他在沟东面的 2 亩余的一块大菜地作为场子用。

元宵节的晚上，平常不出门的老太婆，害羞的小媳妇，怕生的大闺女，花白胡须的老头子，粗壮的小伙子，机关里的“同志”，一个二个十个八个，抱着孩子的，拄着拐杖的，从四面八方都向灯光闪烁的广场涌来了。

灯会设在桥儿沟东面约半里许的广场上，地的四周都用高粱秆圈起来，里面也用高粱秆插成一条条 5 尺宽的路，拐来拐去一共有九道湾，因此叫“九曲黄河阵”。阵中耸立着一个 2 丈多高、5 尺多宽的五角星，在这上面和拦路的高粱秆上面都布满了各种彩色的小灯，共有 360 盏。灯壶是用洋芋、萝卜或白泥做的，里面有油和红头绳搓成的灯芯，底下有一圆木头垫住，木头周围糊着红绿各色的纸，木头旁边钻一直孔插在高粱秆上，构造虽然简单，却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随着锣鼓声，桥镇乡的秧歌队首先冲进了阵内，随后跟的是一群男女老少的人们，他们在“伞头”的领头下唱出了心里话：

“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喜盈盈，男管吃来女管穿，丰衣足食享太平！”

婆姨们在场内乘人不注意时偷取秆上的小灯（这里迷信的说法，女人不生娃，偷了十五晚上的灯就可以生，偷红生男，偷绿生女）。在秧歌队边唱边扭，未绕出场子时灯已大部分被偷走了。有的“同志”先惊奇是怎么一回事，后看见婆姨们拿着灯在那里害羞而得意地笑着，才恍然大悟似的笑起来了。来旺他妈对她旁边的人说：“桥儿沟八九年没有这样热闹了，这一次连我老婆子都来凑伙了。”

延安中学的后灶

林汉雄

延中后灶是在 1943 年的 11 月初成立的，当时王主任志匀同志对于同学们的伙食很关心，经常到伙房去与伙夫同志谈谈怎样做菜饭，怎样调剂花样，和炊事员建立了亲切的关系。不但他是这样，而且后灶的同学、伙委也经常和炊事员接近，给他们讲讲时局问题，教他们识字。从那时起，后灶的炊事员和同学之间就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自从和边师合并一直到现在，后灶生活始终比前灶要好，许多同学都奇怪地说：“前灶跟后灶供给标准一样，为什么后灶比前灶吃的好？”有的

同学说：“后灶的根子强，基础强。”

是的，这话也有部分道理，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对炊事员的教育问题。后灶的同学、伙委经常帮助炊事员学习，如：张开明来时不识字，而现在却能看《群众报》。在一定的時候发动同学们募捐慰劳炊事员同志，炊事员洗被子，女同学就抢着给做。

三班伙委赵润每吃过晚饭后，就到伙房去教炊事员识字，给炊事员念报，在念报中使炊事员懂得了国际国内的目前形势，炊事员的学习情绪提高了，每当赵润走过伙房时，他们就拉住他，叫他念报、教识字等。

后灶共有七八个炊事员（其中有两个是烧水、担水的，只有四五人做饭、做菜），他们要供给 200 多人的饭菜。炒菜手——吴波今年 29 岁，是去年刚从友军逃跑出来的，到延中时他就担水，后来有的炊事员被调到别的灶上去了，他便担任了炒菜工作，以后伙房的生产帐、仓库都归他管了。年时 12 月，炊事员同志大多数都病了，他自己也病了，但看见伙房人少，便带病起来炒菜，还干别的事情，不叫同学帮厨，怕耽误同学们的学习时间。

因后灶的教育比前灶强（大家说：“前灶炊事员经常和同学们吵架、骂架。”），所以后灶生活比前灶好。开学的那天，前后灶吃一样的东西，可是前灶一锅大米饭有三种花样：锅底上的饭是糊的，中间是稠的，上面是生的。菜有的淡得很，有的咸得不能进口。而后灶却吃得很舒服。可见后灶比前灶伙食好，主要不是基础好坏的关系，而是对炊事员的教育问题。

下雨的时候

党乐平

“哎！小心滑倒，滑倒可就滚下山去了！”我们手拉着手，有的还拄着木棍，小心翼翼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从山上向延河边的饭场走去。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路是红胶泥土，脚一踏下去，鞋袜全泡在泥浆里。我们一个踏着一个的脚印走着，有的地方还得歪歪斜斜地向前挪动。拐过一个小山岗，这是一处最陡的坡道，忽然看到路旁站着一个人：“啊！明主任，教导主任明焰！”他披着那件已经穿了几年的旧棉衣，正在把同学们一个一个地往下扶。雨水从他的帽檐、脸颊、衣襟上一串串地往下淌。看着他那瘦弱的身影，我们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感激、怜悯、敬爱……说不清楚。这时，落在我们身上的是冰冷的雨水，而注入心田的，却是一股暖流。

明主任经常召集同学们讲话。他声调高亢，有时甚至激昂。但既没有训斥，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一种心声的交流。即使严厉的批评，也能使人心悦诚服。记得有一次他批评有的同学拿别人生理上的缺陷开玩笑时，语重心长地说：

“同学们，你们想想，总不能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吧！”一句话启发了大家的良知，把同学们引向一个新的精神境界。从此以后，这样的玩笑再也没有了。因此，同学们遇到什么苦恼，心里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都愿意找他谈。如今，他站在冷飕飕的秋雨中，向每个同学伸出温暖的

手，我们的心情怎能平静呢？大家劝他回去，他非要等到最后一个同学走下山。

伴随着秋雨的，是秋风。风挟着雨迎面扑来，使人浑身打战。我们虽然都有一件厚实的“雨衣”——棉袄，这时也不足以御寒了。公家发的棉军装，有多种用途：冷了当穿的，坐在地下当垫的，晚上当盖的，下雨时就是挡雨的了。但对我们这一群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年轻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大家还是寻找各种话题逗趣。

走在我前面的女同学白雪，脚下一溜，几乎滑倒，不由得“哎哟”一声惊叫。后边的赵如彬轻声慢语地说：“呀！多危险，几乎把中国的一位‘女文学家’牺牲了！”

“看我们的‘理论家’把话说到哪里去了，你如果从这山上摔下去，全国都得开追悼会呢……”白雪也毫不相让地回敬了一句。话音未落，只见一位女同学身子一晃，尖叫一声：

“天呀！快！”引起一场大笑。

1948年的秋天，我们延大附中更名为行知中学，校址从东关的清凉山下搬到王家坪北边的山崖上。这里面临延河，坡陡路窄，窑洞就挖在这一面坡和几个小沟岔里，厨房设在山下的延河边。没有教室，没有桌凳，没有食堂，每次进餐，都得沿着弯曲的小道爬上爬下，遇到雨雪天，行走自然十分艰难。但一日两餐，我们是风雨无阻。

延安的秋雨，下起来没完没了。厨房很简陋，雨水从屋顶渗漏下来，滴到笼屉上，滴到饭锅里，但毕竟比露天要好一点。炊事员老黄是经过长征的老革命，他把一部分同学让进厨房，多数人只能躲在石崖下，或者干脆站在雨地里和着雨水就餐。

乌云在天空缓缓浮动，延水在脚下湍湍奔腾。石缝里，崖畔间，草木苍苍，山路上时有人影在晃动，三五成群，互相搀扶着。我站在雨中，看延安的山，延河的水，看着攀登在山路上的同伴，心里忽然想起绥拉菲摩维茨笔下的《铁流》，那褴褛、饥饿、疲惫的行列……“艰难困苦，百折不回”

——
这就是革命者的生涯吧！

“假如把我们学校的生活拍成电影，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咱们过黄河，上吕梁，战地的深夜转移，踏着1尺多厚的大雪行军，一直到回延安后掀起的学习热潮……”站在我身旁的同学，一个个触景生情，联想翩翩。

“在山西隰县的深山里，每天上山打柴、拾地软、挖小蒜，跑几十里路背粮……”

“记得吧，在背粮的路上，杨典老师讲福尔摩斯侦探案，大家听得忘了疲劳……”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兴致勃勃。这时，我们的棉衣早已被淋透了，雨水顺着发丝、脖子流进衣衫。

“喂！你们几个，还不快走，大雨又要来了！”已经爬上半山腰的同学喊道。我们抬头一看，果然从清凉山那边，一层厚厚的乌云又压了过来，天更阴沉了。我们腋下挟着小瓷盆，急急忙忙向山上爬去。 党乐平

男，现名卫群平，延大中学部学生。现任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主任，主任记者。

校园日记

赵生晖

1939年9月30日

“嘟嘟”的哨声，打破了夜的沉寂。

刹那间，月光下都是攒动的人影，很快我们就打好背包去吃饭。由于刚起床，口干，又是吃干饭，干上加干，只吃了平时的一半。

紧急集合出发。一支蛇形队伍在月下山间爬行着。我们班担任前卫兵，二、三班为尖兵排，相隔50米距离。

夜，静悄悄的，明亮亮的。

尖兵班连我共3个人。我们感到无限的愉快，时而无声行进，时而低声谈笑，煞是有趣。大队默默地蠕动着。月夜行军，和白天相比，真是另有一番情趣。此情此景，对我这个第一次行军的人，更是处处感到新鲜。

当空的月亮，西斜下沉，天色暗淡起来。忽然，东方出现曙光，渐渐地，火红的太阳向四面八方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约在早7时，我们到了边校。稍事休息，大队又继续前进，进入由此向南的延水大川。

这个川口离真武洞5里，离目的地保小驻地白家坪只有10里了。

大队在真武洞大休息，我们尖兵班走过真武庙2里多的地方，才发现与大队拉开距离太远，便停了下来。半小时后，大队继续前进。刚拐过山脚，就听见山坡上保小的小朋友喊着：“大队来了，去欢迎啊！”接着，几个小学生从山坡上跑了下来。

大队在学校门口停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感到胜利到达的喜悦。

院子里，有一个年级正在上课。我们走近参观，见一位女教员正在给孩子们讲授自然课，讲的是蜻蜓。她把蜻蜓和抗日联系起来，说：“蜻蜓捕蚊子，就像抗日军，蚊子就像是汉奸。”真是处处不忘抗日宣传，让小小学生也懂得抗日的大道理。

中午，吃了一顿香喷喷的小米干饭、猪肉菜，吃得有滋有味。

午饭后，我们与保小教员赛了一场篮球后，然后举行了两校联欢会。会上，一个年约十三四岁的小朋友致欢迎词，他的讲话真叫人惊讶，不但口齿清楚，发音洪亮，而且文词流畅。我们也有一个同学致了答谢词。

尔后山我校董纯才校长训话。

保小同学还为我们演出了一场话剧。虽说不上精彩，但表达出小朋友的热情。演出结束，天已近黄昏，保小又特意做了一顿饭，非让我们吃了再走；我们也不客气地接受了这份“礼物”。

晚饭后，整队起程返校。保小的小朋友们，列队大道两旁，欢送我们。队伍通过时，小朋友高举拳头，喊着口号：

“学习大哥哥们的吃苦精神！”“希望大哥哥们多给我们指教！”

“边师、保小永远联合起来！”口号声震动了山谷。我们也边走边喊：“学习小弟弟们的活泼战斗精神！”

离开延安保育小学，队伍蠕蠕地前进着。

天慢慢暗了下来，天色已模糊不清。又走了三四里，便原地休息。这时，月亮悄悄地从东山嘴上升了起来。倚着背包，合上眼，只觉得夜是这样的温柔、和暖。我们不知什么时候被夜陶醉，睡着了。

大约半个小时，大队又向前进。脚步紧跟脚步，绕过弯弯曲曲的道路、河流，好像永远也走不完、过不完。队伍静得没有一点声音，越走越瞌睡。

走了半夜，还有15里，路真长啊！休息了两次，月亮由东方移到当空。又过了两条川，才看见离学校一二里远山上的庙。啊！快到家了！

1940年8月4日

傍晚，国文教员王云畴在宿舍窑洞前的广场上把我叫去。

他说，我的习作《脱逃》第二稿修改得很好，并说了许多赞扬的话。同时他指出几个缺点：收尾不太好，对自然景物描写得不够。再就是字写得不好。开头虽好，但段落之间联系不严密。全面的评论，他将在下星期文艺小组会上讲怎样写作时再谈。

同学们听见王教员在高谈阔论，一个个从窑洞出来，围在我们身边。王教员先是谈我的习作，后来将话题转到写作的方法上：

优美秀丽的自然描写，要和现实环境结合，自然描写是建筑在现实基础上，我们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

要掌握立场。有的人以自己的立场写文章，但当中不是变为第二人称，就是变成第三人称。这是需要准确把握的。

要有创造性。即使写的不理想，也不要套人家的。

这时，有一个同志插问王教员对肖三的作品怎么看？王教员说：肖三是师范毕业，以后出国十余年，近年才回国。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不太熟悉，但他要介绍外国作品（尤其是苏联）相当的好。接着，又转到写作方面，他说：要抓紧中心一环，对于琐细的不要费力描写。

继而，他针对我们即将毕业去当乡村教师的情况说：乡村是写作取材最好的地方，只有丰富的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许多文豪就是这样成功的。

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王教员越讲越有劲，不时地用评论作品来阐述他的观点。他的文学修养真深啊，同学们无一不佩服。正听得入神时，熄灯铃响了，大家恋恋不舍地散去。

今天的收获太大了，也是对我的鼓励，毕业后，下到农村，一定要加紧写作。

1940年8月29日

边区师范成立一周年纪念暨第一队毕业典礼大会，今日举行。

上午，展览会开幕。展览厅内陈设着各种花卉、植物和昆虫标本，还有漫画、国文成绩和墙报等。清新雅致、整洁美观。门口还贴有征求校花的启事。

下午3点钟，我们毕业生与来校庆贺的各县的三科长一同会餐。

会餐后，大会开始。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前来祝贺的党中央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负责人：徐特立、吴玉章、罗迈、高岗、周扬和徐劲几位首长。

首先，由周扬厅长报告本校成立一年来的工作与今后的教育方针，董纯才校长作了补充。他希望各县三科长对分配到他们县的毕业同学，在工作上多加指导和帮助，在生活上主动解决他们物质生活的困难等。

接着各位首长讲话。首先是吴玉章讲话，他给我们作了原则上的指示。然后徐特立讲了他当年的教学经验。罗迈在讲话中，对我们毕业同学和各县

的三科长提出希望：在互相学习、互相勉励的原则下，积极办好教育事业。高岗以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身分讲话后，徐劲同志讲话。他建议选择落花生为边师的校花，因为落花生深入泥土中结果实，小学教师是深入农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延安国医研究会会长、著名中医梁金生讲话，希望我们下到农村，使用中医，宣传卫生，破除迷信。

留校同学和毕业生代表相继致词。

在校歌、毕业歌和欢送歌声中大会闭幕。

入夜，游艺晚会。首先由我们毕业生演出合唱，接着学校歌咏团表演。最后，由教职员和同学合演五幕话剧《古城怒吼》。时至午夜，尽欢而散。

我们毕业了！ 赵生晖

男，边师一队学生。中央党校教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主编《党的组织学》；参加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词典》。

窑洞——摇篮——延安中学日记摘抄

王恂

1944年9月至1945年底，我在延安中学三班学习、工作、劳动，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只有十六七岁。这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充满革命生机和青春活力的珍贵岁月。

当时我记了三本日记，这里摘抄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谨以我一颗赤诚的心，献给当代和未来的青年朋友们。

1944年

9月7日

吃过午饭，我离开杨家湾总政干部招待处，向母亲和妹妹告别，背起背包走上去延安中学的山路。我伴着欢唱的延河，迎着巍峨的宝塔山，走过杨家岭、王家坪、清凉山……

沿着山岭转向东去。一路上，山川焕彩，草木葱郁，在我面前展现出完全崭新的世界。

黄昏，我来到桥儿沟。这里就是延安中学所在地，我见到了霍校长和田树基同志，他们把我编到三班。当我来到三班同学住的窑洞时，眼前出现的是闪烁的油灯，转动的纺车，还有那一张张天真、纯朴的笑脸……

10月8日

今天全校出动，上山挖山药蛋。挖的挖，拣的拣，各有分工，干得满欢。我是负责拣的。我一边拣，一边想，凡事都要学，要加强劳动锻炼。于是，我和杜吉昌换着挖起来。没想到，人家都说我挖得浅，伤的洋芋（即山药蛋）多，真叫我灰心。

在山坡上吃过午饭，我又改变了想法。还是同学的意见对，不光要加强劳动锻炼，还要改进生产技术呢。我又使劲挖起来，比上午挖得深了，洋芋也伤的少了。手虽然磨破，我也不在乎。到完成任务，回到学校，我的精神更加振奋，心里更加痛快！

10月16日—18日

这三天，突击纺线。窑洞内外，纺车飞转，笑语喧哗。有的同学给大家讲起故事，真有趣！

“我纺的线，行吗？”我一边摇着纺车，抽着棉线，一边让同学们来给我检查质量。

“你纺得不太匀，有些地方粗，有些地方又像头发丝。”一位同学看得很仔细，说得很认真。

我下决心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只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11月6日

开过周会，大家张罗缝棉衣。这不是给自己缝，而是生产任务，缝好棉衣，支援前线。

同学们有的背来成捆的棉衣，有的去买针线，然后就在一起做起活儿来。我缝了一件，因为不会缝，棉花又太潮，每一针都很难扎进去，很难拔出来，所以缝得特别慢，也比别人艰难得多，针鼻儿把手指头顶了很多小眼儿。快缝完时，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交给张树才去缝。她一看，原来快缝完了，就帮我缝好两只袖子，又还给了我。我只好写上自己的名字，交了任务。这件事足以说明我没有坚持到底的恒心。

1945年

在这本日记的前两页上，教导员高时同志给我题写了两句名言：

唯有无报酬地为人类的生活而作寂寞的牺牲，乃是我们的天职。

卡尔·马克思

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的态度是根本不成的。

毛泽东

3月8日—15日

全校170多人，到东关修飞机场的跑道。这是延安机关、部队、学校的总动员，大突击。为了迎接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为了迎接时局的大转变和胜利的新曙光，每个义务劳动者都甘洒热汗，甘当基石！

冒着连绵的春雨，一上午就抬了33筐石头。忽然，发现脚底下起了一个泡，走路很困难。吃午饭时，被队长发觉。地理教员张仲纯同志很关心我，让我下午休息。他比母亲还体贴我，使我很受感动。吃过午饭，到救护队上了药，就一瘸一拐地回到学校。每走一步，疼在脚上，愧在心里。

几天来，我一直坚持参加修飞机场。13日，抬了27筐石头；14日，抬了33筐石子和28筐砂土；15日，抬了22筐砂土，又装了半天粘土……

5月24日

晚饭后，开欢送张仲纯教员的晚会。他教我们地理课，教我们画地图，今天就要奔向前方，在中国这张大地图上开辟红色的新解放区。他充满必胜的信心对我们说：“再见面时一定在新中国！”

张仲纯教员能写会画，多才多艺。他书写的毛主席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字体潇洒俊逸，犹如行云流水；

他画的八路军在行军路上小憩的素描，真实地描绘了人民子弟兵的生活风貌，再现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魄。他把这一纸书法和一幅素描送给我留念，我视为珍贵的礼物保存在身边。

5月28日

晚饭后，我和郑汝志等同学，来到了桃园，挖了许多苦菜。当我们挺

直发酸的腰，抬头向果树望去时，突然发现枝头结了不少小青桃、小青果，绿莹莹，圆溜溜，特别逗人喜爱。我顺手摘了一枚小青果子，又摘了两枚青桃儿，放到嘴里细细品尝，那味道虽然又酸又涩，却比苦菜好吃多了。

事后，我却悔恨自己，违犯了群众纪律。

7月11日—14日

在暑假里，为了自力更生，解决日用品问题，我和一些同学走了15里路，到高峁湾菜园参加生产。我们绑黄瓜架，搭西红柿架，锄菜畦子里的草，还打了13垛墙。菜园的负责同志夸奖我说：“这娃子的技术学得差不多，蔓绑得顺顺的。”

在菜园里干了3天活，累得腰酸胳膊疼，不知洒下多少热汗，挣了7500元（注：边币）。

回到学校，和同学们去新市场，买了些日用品。我花了4100元，买了一个罐子（注：

当时男同学的饭量大，用腌咸菜的罐子装饭菜）、一个蘸水笔尖、一把牙刷、一条肥皂；又花了3000元，买了甜面酱和一些吃的东西；余下的钱，还打算买书。血汗换来的钱真不容易，不应当浪费一分一文。

8月15日

中午，传来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日本无条件投降！

延安城万众狂欢，变成沸腾的海洋！

晚饭后，我们延中与鲁艺组成秧歌游行队伍，从桥儿沟涌向新市场。在我们这支壮丽的队伍前首，高高飘扬着国旗和共产党党旗，高举着“胜利万岁”的大字横幅，还有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等各位领袖的像。后面是锣鼓乐队、舞鼓队、秧歌队。两旁是举着宣传画牌的行列。画牌前后，是如同火龙一样壮观的火把队。这一支支火把，是同学们在狂喜之中把破棉被、破衣服拆了，裹在木棒上，再蘸上倒在大铁锅里的油，点燃起熊熊的火焰而成的。我也高举着火把，随着人流向前涌去。

行进到新市场，鞭炮齐鸣，火花飞舞。人如海潮，车似长龙。汽车车灯都大放光明，把黑夜照耀得如同白昼。我们的秧歌队活跃在街头，高呼着口号：

“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迅速成立联合政府！”

“制止内战危机！”

“中国共产党万岁！”

“斯大林同志万岁！”

“毛泽东同志万岁！”

深夜才回学校。啊！今天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天！也是我的历史上最光荣的一日！

9月3日

为了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边区政府决定放假3天。

上午，我们三班的师生，喜气洋洋地到新市场照相馆合影留念（注：这张相片，我至今还珍贵地保存着）。

9月4日

晚饭后，杨少林同志找我谈入党问题。这正是我日夜盼望的。

他问我：“你对要求入党抱什么态度？”

我说：“主要靠自己不断努力，不断进步。”

他说：“对了，这不是一般的事情。对于党员来说，政治生命第一，肉体生命第二。”

不但在形式上入党，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真正入党，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希望你发扬自己的优点，克服自己的缺点……”

这次谈话，激励我要再接再厉，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作风，做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1月1日

上晚自习的哨子已经吹响了。王建华轻轻走近我，低声叫我去开会。

参加这样庄严的会，我忽然觉得很不自在，但精神非常兴奋，心情非常严肃。

在我们三班最靠边的一个窑洞里，在这永生铭记的最光荣的日子里，新的政治生命诞生了！我和张利坚同时参加入党仪式，面对党旗，举手宣誓：

“从今天起，我愿为党的利益，为中华民族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誓死不被任何困难所屈服，不为任何威胁利诱而动摇，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均要服从党的组织，执行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而积极工作，虚心学习。如有违反上述的思想行为，愿受党纪制裁。此誓。”（注：这份油印的入党誓词，肖贵臣同志至今还珍贵地保存着。）

当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庄严宣誓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颗跳荡的心，我这一腔沸腾的热血，我这整个的青春和生命，完全和党融合在一起。

11月20日

这几天，参加桥镇乡的选举，我们帮助做宣传工作。

在寒夜的月光下，后街的老乡集合在一座店铺里，人声渐渐喧闹起来。小学校里的几个娃娃，正在唱着“千里雷声万里闪，惊天动地把喜讯传……”“工农子弟解放军……”

“小先生……”。大会在欢快而朴实的歌声中开始了。会议主席讲话以后，不论男女老少、干部群众，一个接一个，毫不间断地讲着对政府工作的意见，真正体现了我们边区的民主政治。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还没有发完言，主席决定明天晚上继续开。

过去，我总感到学学理论，写写笔记，总比到街店农家访问老乡有收获。这是教条主义，也是群众观点不明确、不坚定的表现。我好像听到这样的告诫：“不要做书蠹了，不要再趴在书本的狭隘的圈子里！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实际中去！把你所学的知识应用起来，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吧！”

12月27日

刚上几何课，王箭锡从李绵同志那里回来，叫我也去。原来又是意料不到的事。李绵同志说：“解放日报社调你和王箭锡去做译电工作，还培养记者，编辑，准备将来出去搞分社。”

你的意见怎么样？”

回想过去，组织上调我去工作，我没有坚决服从。党培养自己，又吃了老百姓这么多的小米，就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担负起党交给自己的担子，何况自己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呢！到报社工作也是我一贯的志愿，

我愉快地答应了。

满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我离开了朝夕相处、甘苦与共的教师和同学，离开了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大家庭，离开了哺育我健康成长、赋予我最宝贵的政治生命的延安中学，调到解放日报社。不久，组织上又调我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任播音员。

1946年

2月1日

今天是旧历除夕。清早，我和妈妈、妹妹正在包饺子，就听到隔壁的大云从山下跑回来说：“毛主席来了！”我和妹妹把饺子一撂，饭也顾不上吃，就一口气跑到山下的篮球场。只见一辆披着一路尘土的灰色小汽车停在那里，毛主席呢？却不见踪影。一打听，等在这里的同志们都说：“毛主席看望关向应政委的病去了。”大家不顾寒冷，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在耐心等待着。后来，妈妈也赶来了，她兴奋地说：“今天什么活儿也不做，就在这儿等一天也心甘情愿。”

等了一会儿，从远处的山坡上走下来四个人。大家都激动地嚷着：“毛主席来啦！”于是，一拥而上，都挤在小汽车的周围，人人脸上都露出幸福的笑容。小娃娃们高兴地跳着、叫着。毛主席一步一步越走越近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和蔼的目光，就像在寒冬里带给人们无限温暖的阳光。他像辨认久别的亲友那样，注视着每一个人的面孔；又像慈爱的母亲那样，关注着每一个欢蹦乱跳的娃娃们。这时，毛主席和我近在咫尺，他那脸上几道深深的皱纹和露在帽子下面的长长的头发，在我的心灵里激荡起一股难以名状的热流——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毛主席太操劳、太辛苦了！

人们都看呆了。仿佛面前只有毛主席，都忘了自己就和毛主席站在一起，谁也没想起和毛主席握手，谁都忘记了向毛主席拜年。事后回想起来，大家都后悔莫及！

灰色的制服，谦和的微笑，人民领袖的心总是和人民的心贴得最紧。当毛主席坐进小汽车时，还微笑着向我们招手；

汽车已经开动了，毛主席又回过头，透过后面的车窗向我们招手，微笑……

王恂

男，延中三班学生。中国建材报副编审，局级。曾任延安广播电台第一个男播音员。

从事党的新闻工作40余年。撰写的200余篇新闻、通讯、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发表于《人民日报》等37种报刊，有的作品编入《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万众瞩目清凉山》等书。

护士日记

陈宗风

(一)

4月5日 晴

昨夜接到院部命令，要我们全所急速赶到寺庄接受任务！

今天紧赶慢赶走了 90 里，累得我实在喘不过气，红着脸，人家叫我“圣人”。指导员几次让我把背包给他，或是驮在牲口上，我都不愿意，男同志能，我为啥不行哩？况且小白那孩子比我还小些，行军蹦呀跳的好像跟人赛跑。

刚把背包放在窑里，背还没有歇凉，小白就跳进来说：

“余香，伤员马上就来，咱连上 250 的任务。”我问她谁说的，她说所长。我故意说不信，她把嘴一噘：“屁！信不信由你！”

就听到哨子叫集合，爬起来就走，小白说：“不信哩嘛，走啥呀！”就在我脊梁上一拳头，像一条小鱼从我身边溜走啦！我一直撵到集合场。

事情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明白，马上准备，快，而且要好，伤员就来！

我们 6 个，分头借桌子、板凳、水缸、扫把……砌消毒灶的砌消毒灶，扫地的扫地。

在挂帐子的时候，可把罗明急坏了，一块砖头打烂成几截，还没有把钉子钉进去。急得他把砖头一丢，用手就一巴掌。我们都笑啦！他气汹汹地吼：

“笑个啥！”我们也就不笑，赶快给了他一块硬石头。可他自己哩，把手搓了很久，幸好没打破，要不是我们绷带室还没有布置好，他就第一个换药了。

钉子钉好，帐子一拉，成啦！两层，里头是洗手间。罗明就问：“砌灶的怎么样？还是咱们先成。”因为我们在比赛。

砌灶的两个听到了，一齐吼：“你们的活轻，我们的活重，要不信我们换了来。”我们正准备答话，连长提了个灯笼同主治医生进来，连长问搞好了没有，我们说快啦！

连长说：“一、二班把室内室外、院子房子都打扫好啦！号数也贴上了，地上干净得连舌头都舔不起灰。”小白说：“你把舌头伸出来看看。”连长笑了一下：“要不信，你自己去检查，人家铺也早已铺好了，可以接到 300。事务处也连夜磨粮，伙房开水也烧上了。指导员的彩棚也快扎好，文书正赶着贴标语，今夜伤员们一定来，你们弄成了就抓紧时间休息。”他说完就匆匆忙忙走了。

主治医生向我们报告：张星文一个人就捻了六七丈长的灯芯，兰羊正在他那夜班灯笼上编诗。他在什么上都写诗，派到三岔路口上等候伤员的那盏红灯笼，也写上诗，连开水桶也准备写上。小白说你念几句我们听听，主治医生说他不是诗人，不会念。我们说没啥，说两句大家听听，算个文化娱乐。

主治医生就记得三岔口接伤员的灯笼上的几句，是：

山抱水水抱山三盏红灯照路边担架、毛驴这里走前头两步是医院

主治医生一念完，小白说我们绷带室也写首诗吧！主治医生说：“大家不要‘诗’了，‘诗’来‘诗’去，把工作都‘诗’掉了。”他立即检查了水缸，帮我把自来水安上，一根 3 尺来长的橡皮带，一头插在水里，一头吊在外边，外边的一头有根铁丝压住，要洗手就用脚一蹬，那坠着石头的铁丝一跷起来，水就自来了。

等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鸡也快叫了。

可是伤员并没有来。

(二)

4月7日 晴

昨黑后半夜，眼皮直打架，睁不起来，耳朵是嗡嗡啦啦的，模模糊糊听到叫：碘酒、酒精、碘酒棉球、大酒棉球、纱布、绷带、镊子、脓盘……腿也站酸了，手也递得我抬不起来。闭着眼睛，像瞎子摸熟了走惯的路，照着摸就是了。夹着棉球，就像夹了块铁，夹起又掉了。夹子也像变成了一块钢，分也分不开，合也合不拢，听到“怎么的呀？快呀！”才又猛地一惊。

一下进来了个伤员，叫李永延（后来我们叫他络尔胡伤员），才把我惊醒了来。他是肱骨骨折，加上炸伤，医生给他洗伤口，我看有酒杯大，创缘四周还有些坏肉，给他剔除的时候，他自己偏着脑袋看着，还有说有笑：“真他妈的粗心，只顾往前冲，没有防到有个矮坎，一跤摔下去，凑巧一颗炮弹掉在离我不远，大头躲过了，还是挨了一小块破片，就是这。”他说着用头把伤口指了一下。刘医生开玩笑地说：“幸好你摔得快，要不成了红伤啦！”“可不，这一下医好啦！咱还可以摔他妈的六七十米。”

我听了，伸了一下舌头！

给他上好飞机夹板，他还边走边说笑：“让开！土飞机开啦！”

让开，土飞机开啦！”惹得我们只是哈哈大笑。他这种愉快的精神，像电一样，马上流遍了我全身，劲也就来了，疲乏、瞌睡都被他扫光了。

“这真是为人民立功的英雄！”我们都这样说。大家都感受了这力量，看小白罢：刚才只是个走了气的软皮球，这一下气足啦！蛮有劲地跑进跑出，收拾换下来的绷带，又把消过毒的家具送进来……

一天一夜共换了250个人的药。

(三)

4月9日 阴转晴

我们正在捻棉球，卷绷带，听到外面有人说：秦翠香哭了鼻子回房子去了。我同小白就去看她，正在炕上擦眼泪哩！

问她，她不说什么。小白催她说：“为啥嘛？”她说，哭一下才痛快。我一看外面有些男同志，我知道她不愿在很多人面前说，就硬把他们撵开。陈志云临走还说：“你们女人家屁大个事就喜欢哭鼻子！”小白一下就冲出去：“你胡说！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哭啦？”“那不是？那不是？”陈志云指着秦翠香，秦翠香站起来，把眼睛一抹：“谁哭啦？谁哭啦？你快走！”陈志云走后，秦翠香才说：“一个伤员，没有医生的吩咐他硬要吃流汁，我不给他打，讲理也不听。我急啦，吼了他两句，你们猜他说什么？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没有想到是那号人。”

小白催问她：“那伤员到底说啥？”我也等得急了，叫她快说，秦翠香才说：“他说我是把流汁给长得漂亮的吃，谁面相好给谁吃，你们看气人不气人？”我说怕是一个刚来的解放兵，要不哪有这样不懂道理的？我问那个伤员叫什么？秦翠香说叫黄俊。

不一会，听到外面有人叫秦翠香，问住在哪里？我出去一看，是伤员排长周文祥，拉着拐子一跳一走地来了！后面还跟了七八个伤员，内中就有黄俊。我问：“做啥呀？”他说：

“你不用管，找她有事。”我站在门口不让进去，他把拐子举起，问我让不让，我说不让，你们有事给我说。他把拐子举得更高了：“当真不让？”我说：“啊！”“好余香同志哩！”他放下拐子，笑嘻嘻地说：“咱们来赔不是，

道歉来啦！”

我一听，原来是这样！

一进来，几个伤员就推着黄俊朝秦翠香面前走：“你快道歉，你说嘛！”黄俊很不好意思地行了个军礼，我赶快瞟了小秦一眼，她脸也一红。就听到黄俊说：“秦翠香同志，刚才是我不对。瞎胡说，那完全是国民党作风，我解放不久，还……”

“解放几天你就调皮呀！三大纪律还没有唱一回，就捣蛋！”络缙胡伤员这样质问。

我一看院子的人都站满了，还有些进不来的，在门外伸着脖子。

周文祥捧着拐子叫大家不要嚷了，还是听黄俊说。黄俊就说：“我们班上开了会，批评了我，大家指教了我，开了我的心窍，真是不对，我说错话，我不对，我赔礼。”说完又行了个军礼。满院子一阵哄笑，掌声也就随着飞起。

小白在旁边跳着拍手，秦翠香自己倒不知怎么才好，只是低着头摸她衣服口袋上的一颗铜扣子。

我在她耳朵根上说：“你刚才不是说，你对他态度也不大好吗？”一句话提醒了她。

秦翠香也向大家检讨了自己的态度：

没有更耐心地向黄俊说明这是医院的制度、规矩，也向黄俊道了歉，并且向大家保证以后态度和蔼，大家也为她鼓了掌。

(四)

4月23日 阴

我真伤心，我真想哭，那个伤员夜里牺牲啦！

开了追悼会，献了花圈，读了祭文，所长、协理员亲自抬棺材，挖墓地……

然而，人要是不死多好呀！

那个伤员一抬来的时候，就昏迷过，我给他洗脸擦汗，转运途中的灰尘把他的眼睛眉毛缝在一起了。主治医生马上打强心针，叫我不要离开，数着他的脉搏，测量他的体温，轻轻地，小心的，我给他大约喂了有100cc开水。我像一个辛勤的园丁，是那样小心，那样谨慎，害怕碰掉了他一枝一叶。

约摸有半炷香，他那软弱的脉搏增快了，呼吸也清晰均匀了。我的心也随着他的心加强起来，跳动也更加快。看着他慢慢睁开眼睛，睁大了，我的眼睛也随之睁大了，他深深地吐了口气，我也长长地吐了口气。看着他活过来，我也活过来了。

心虽是两个，然而是在一块跳动啊！

他问：“这是哪里呀？还没有到医院吗？”

我说到了，叫他静静的，不要动，这就是医院。他像得了保险丹，嘴唇上马上掠过一丝轻快的微笑，像电一样一纵就过去了。“总算到了家。”他轻轻地说。我问他饿不饿，想吃点东西不，他摇了摇头；我问他渴不渴，想喝开水不？他点了点头。

喂过开水，我替他拂了蝇子，叫他安静点，不要乱翻动，他就很安静地躺着，像个很听话的孩子一样。

这还是刚抬来的时候啊！

第二天，医生说 he 失血过多，护士排的同志，马上都请求输血，我自

己更不用说，血又是O型，我作为竞争输血的理由提出，结果反而是我们胖胖的协理员输了血。他坚持他的理由是：同志们辛苦些，比他更累，他身体也不错。协理员输了200cc血，鲜红的血啊，从一个共产党员身上，输到一个为人民解放战争而流血的战士身上。

当天夜里，他的神志似乎比较清醒了点，他问：“我会好吗？”我说会的，一定会好。他说：“那就好了，我这一次的战斗计划还没有完成，只消灭了3个敌人，活捉了5个……”

“等你好了，身体结实了，”我就打断了他：“再回到前线，多捉俘虏，多杀敌人还不是一样？”我怕他费神，不想叫他讲话，哪晓得他还提高了嗓子说：“余香同志，你不懂，你不晓得，下一次是下一次的立功计划，这一次是这一次的……”

我赶快摆手叫他不要说话，但似乎那手是一个拨火棒，反而搅翻了火堆，更把他的嗓子提高了：“我这一次是在班上当众宣布计划的，我立功，我要完成计划，争取入党，你懂吗？你是党员吗？”他睁开眼睛问我。我说我还不够入党年龄，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我又告诉他不要再讲话了，怪费劲，但他的话像开了闸的水门，我没有办法关。他又继续说：“我的计划是要活捉10个，消灭10个，哎！这一下，真丢人，红口白牙说的话，没完成。”他瞪着眼睛望着我，一动都不动，……我怎么安慰他哩，这么大的雄心呀！突然，他问：“指导员哩？去，去，快去叫指导员来。”他直挥手，但轻轻举了一下，就放下了。“不行，我自己去。”就直爬起来，我赶忙把他按着，强迫他不准动，摸他的头发烧啦，有些烫手。我赶快用了块湿手巾搭在他前额上，这样平静了一会。

隔了不多久，他要我出去，要我叫个男同志来。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要小便。我说我去端盆子来就行，他不，他说：“你不另外叫个男同志来，我不小便都行。”我给他解释：

“你是病人，我是特别护理你，你要把我当成你家里的小妹妹，在服侍病了的大哥，都是自己的亲人。”他不再说什么，似乎也能勉强。他的尿量很少，颜色也很黄，尿完了，他觉得很疲乏，睡了一小会。

借这一小会，我读了两节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检查过他的脉搏、呼吸、体温。

天快亮以前，他醒了，我问他想吃点东西么？他点了点头，我给他冲了一个鸡蛋，搅了两勺白糖，吹冷一口喂一口，吹冷一口喂一口，可是他吃了两口又不吃了。只说了一句：

“余香同志，你真是我的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我不知怎么感谢你呵！”我说：既然是亲姊妹还感谢什么哩？我服侍你是理应该的，只要你好了，我也就好了。

他似乎笑了一笑，还想说什么但像是没力了，合上眼睛。

这中间医生来过两次……

然而，他一天之后还是死了。我真伤心，但哭有什么用哩？院长政委在灵前说得对：“只有加倍工作，赶快消灭胡马匪才是最好的纪念。”

我永远把这记在日记上，记在心上，更记在行动上。

(五)

5月8日 晴

今天我们所里欢送一批伤员出院。

天还没有大亮，人们就都起床了，把每一间病房打扫得比往常更干净，每个角落都收拾一遍，窗台都用布擦洗过。

像过新年，老乡的婆姨娃娃，穿红着绿收拾打扮都来看热闹，地方政府和一些老乡，来慰问的慰问，欢送的欢送，手巾，手帕，油炸麻花，鸡蛋，鞋子……放满一窑，有些是昨夜就送来的。

出院的伤员，穿得也很干净整齐，比入院的时候精神得多了。他们见这个也拉手，见那个也握手，每个人都很高兴。

人熟了，感情也就慢慢有了，临到分别，总不免有几句说长道短。

我同秦翠香问黄俊有啥意见，他又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人熟了，舍不得走，高兴的哩，是能到前方，杀那些过去欺负他、打骂他的人，能够真真给人民服务。他说：在国民党那边，只有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住得起医院、伤兵医院，当兵的能碰个医官老爷的门边，那也算祖宗三代有德。女护士，像你们这样的女护士，莫说看到，听也没有听人说。那真是官的世界。解放军牺牲了还有口棺材，开追悼会，落个光荣；

国民党不死也往死裹，有病的也不敢说有病，害怕送回老家。

哪有你们这样好？问冷、问疼、问热、问痒，比自己爹妈还好，我能当个解放军真好……

我们都称赞他在医院里学得有了进步，他说他能懂得一点道理，都是共产党救了他，给他的生命。要是以后打仗不勇敢，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们告诉他多多消灭敌人，来为人民立功。

快走了，锣鼓打得很热闹，“庆祝恢复健康！”“欢送英雄再上前线杀敌！”的口号声，彼此纠缠一片，把山都撼动了。

出院的伤员由周文祥带头，从人群中穿过。络尔胡伤员在最后，舞着他那已好了的右胳膊：“谢谢医院，谢谢老乡，咱们没啥好的报答，就是多杀敌人，咱这手好了，又可以摔他龟孙子六七十米！”随着就是风暴一般的掌声朝他欢呼。

突然，真是突然，一个老汉牵了个毛驴，从山上连走带滚似地往下跑来，嘴里不住地喊些什么，听不着。见他打手势，似乎叫站住，不要走。后来听清楚了，他的确是在叫等一等，不忙走！大家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刚才像暴涨的河水，现在开始平静下来，英雄们也等着老汉来。

老汉跑得气直喘，汗水把他的眉毛、胡子都粘住了，衣服都湿透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叫你们不要走，你们就是个走，叫等一等，你们就不等！我一冒山就看到队伍要走的样子，我把喉咙快喊哑了，你们都不停，差一根牛毛，要再迟一步，我这30里地就白跑了。”边说他边揩汗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老人家？”人丛中有人问。“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我也要慰劳咱队伍呀！你们慰过啦，就不等我啦嘛？”他很生气似的，觉得累了半天，大家还没明白他老人家的好心；又似乎怪大家没有等他来，就放队伍走了。

“哼！我那村子也是个怪事，他看我穷，就不报告我一声。

咱家穷，没有鸡蛋面食，我还有个烂毛驴呀！可以给咱队伍驮点行李呀！这毛驴是咱队伍从国民党那些强盗手中夺回来，送还我的。你们欺侮牲口不会说话，他本来就不会说话嘛！知恩不报不是人，我今天就来慰劳、报恩，我带路，比你们都熟，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来，快把伤员同志的行李驮上！”老汉一口气说完了，就招呼伤员，并亲自去拿行李。

大家一见，都被他这盛情感动了。我们赶忙劝他休息一会，喝点开水，给他烟抽，借这机会说明他那村长不是嫌他穷，是怕他老了走不动，所以才没有布告他。“本来嘛，解放军就是穷人的队伍，”他也懂得这个道理。可是这声明也惹老人家生气：“老啦？老啦？我人老心没有老呀！我老婆也懂个红黑好坏呀。”这时周文祥他们也折回来了，恭恭敬敬给老人家行了礼，感谢他。周文祥说：“保护老百姓的财物，就是解放军的责任，队伍就是老百姓的队伍。”末了，他请老人家自己骑上牲口回，说行李自己拿得动，也有牲口送。可是老汉非常固执，一定要送。没法，只好让他走一节。络儿胡问：

“干大，这牲口怕劲不大吧，驮不起行李。”老人家说：“哼！

百儿八十斤还行。”络儿胡说：“那你老人家骑上走几步，我们看看劲头，要不我们不要。”老汉把衣服一摔说：“我这大年纪还哄你？”一下就骑上去。络儿胡对周文祥使了个眼色，他说：“对，就这样，咱们走！”两个人过去就把老人家按在牲口上不让下来。

两旁看的人才晓得是络儿胡用的计策，大家轰然大笑。老汉急得说不行，两个人按着他说：“一样一样。”站在一旁的伤员上去，给他这个口袋塞上毛巾，那个塞肥皂、饼干、麻花……把他搭在牲口上的麻布口袋塞成鼓，老汉急得在牲口上大叫：“你们这是什么队伍呵！你们这算什么队伍呵！我活了六十几啦，天呀！世上就没有过你们这样队伍，过去只看到抢老百姓的，哪有硬把东西给人的……”老汉流着泪，声音都咽哑了，我看到很多婆姨拿出手巾在擦眼睛。

锣鼓又响起来了，人们喊着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是人民的救星！

陈宗凤

男，原名寒十坡。延中教员，班主任。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专业作家，其作品《护士日记》、《水》发表于《群众日报》，《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拍摄放映。

王涛英日记

1947年

5月25日 陕北志丹

在早饭后到达志丹较大的一个镇子。对我们来说，几天以来今天是最痛快的一天。

我们刚一到达此地，便结成一群往志丹陵走去。在行知中学学了两年多的同学在这次活动中可以看到是一点没白学。你看吧！每个行中的同学都比××的同学费了些脑子。

我们每个学生一进陵门，态度很严肃，并表示沉痛。我们从头到尾，把所有的首长题词都看了一遍，又很尊敬地和它分离了。首长的题词使我想起了很多事情。我最喜欢的是毛主席题的那几句生动感人的话。由不得我想起我最最好的朋友——

力贞。

力贞：今天我看到您父亲的陵园，很自然地想起了您，我希望您继续

您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将来能像他一样，成为人民的英雄。

6月17日 甘肃华池委远山振庄

从第四后方医院成立以来，已有3个多月了。今天把前方的三个所会集在一起，作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是许主任报告3个月来的治疗和护理工作。他对我们的批评还很真实，他说一般护士和医生团结不在一起。这点我们也常常议论，同时下决心克服。他还说，我们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是刚从学校中出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比老医院都好……

我们的卢院长，也是我们的校长。他讲了很多问题，我也很详细地记下了笔记，也不必在这里啰嗦了。重要的是，优点方面：我们大部分工作人员是非医务人员，同时还是刚踏出学校门的年轻娃娃，但能在最困难之下，背着自己的东西，带着伤员行军，甚至于把自己的东西丢掉，抬着伤员行军。在路途中，再怎么困难，做事务工作的同志总能找到饭吃，找到房子住。医生们也同样想办法给伤员换药、治疗。缺点方面：尤其是关于我们护士，没有长期做医务工作的打算，不愿学习医务，对医务工作有些轻视。

同时和医生关系相当不好，互相看不起等。最后，他说本院有些不称职的人做出了没有人情的事来……院长讲完很沉重地离开了“讲台”。

7月7日 陕西定边秦家湾

黄昏时，一群伤员纷纷来打我们事务人员。为什么呢？唉，真可怜！没有做过事务工作的同学，自己老是怕超过伙食，所以受到伤员的痛打。同班的高鸿、刘琪都被打了，我们怎么能不同情他们呢？更不应该的是为什么打我们不管事的炊事员呢？当然，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差，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我们工作上的客观困难，他们是不是知道呢？值得研究。这是少水无面怎样能使他们如意呢？我们从哪里给他们拿面呢？我们从哪里拿来像在延安时一般的清水呢？

本所有个别同志还非常同意伤员打我们的事务同志，我真奇怪！自己本部门工作做不成，难道对你还是一份光荣吗？

难道你没有责任帮助把工作做好吗？反而来这一套，还是十多年的老革命呢，白受革命的教育了。这个同志在所里不但这次做出这种事来，而且有许多许多的表现是不称职的。这位同志还是不够聪明，不然，怎么能把自己暴露呢？

7月15日 安边

今天已是动身的第二天了，在路途中碰到马鸿逵仅有的两架飞机，在安边附近空袭。

虽然它在上空旋来旋去的，并不时地传来轰炸声，但在我们脑海中已是司空见惯之事。

晚饭后，从西园子走到安边西门外，唉呀！真紧张呀。两旁坐着一堆一堆的穿灰黄色衣服的人。他们的视线都冲着我们。排成大队的工作人员脸红到脖子，在紧张的空气中走进了安边城。

望见城内的第一个市面，我们有个很好的印象。十字街头，市面连续不断，每个市面都很精致，街的两面墙壁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和各种通讯小报，货物又很华丽。商人一个个都有些延安的风味。算盘声，说话声，一直没有断过。我们很欣赏地从个个市面走过去，到处都是清香美味，不由得使我们回忆起延安了。

7月19日安边

俺村里有个谭老婆

一所附近有位很勤俭的老婆婆，虽然已是 50 岁的老人家，然而她一刻都在为伤员服务着。她帮 20 多个伤员洗衣服、补被子、补衣服、煮鸡蛋、熬米汤……她往往为了给伤员洗衣服耽误了自己吃饭，感动得伤员买下馍馍给她吃。她还很殷勤地说：“这算什么，你们为了我们离开了你们的家，流血打仗都可以，我做这点小事又算什么？只要你们不嫌，那就好嘛……”

一个很可怜的伤员，因伤太重伤口腐烂了，苍蝇在被子上下了很多小姐。每个青年妇女经过他身边时，都喊着“臭死人了！”大步跑走了。但谭老婆很痛快地拿伤员的被子到河里洗。一条长满蛆虫的被子，洗成了一条相当漂亮的白被单。

因而，大家都公认她是全村为军服务的唯一的一个好妈妈。

8月4日—5日

我也是有人同情的人

我最真诚的朋友——丽、芳，我们暂且离别了。

昨天下午我与丽在清水沟会面，那时芳还在医院养病。丽很难受地告诉我，妈妈写信要她过河。丽很诚心地征求我的意见，走好，还是不走好。我突然听到“走”字，几乎流下泪来，但我却忍住，答应她还是跟随着亲爱的妈妈。我和丽谈了一下午的话。

黄昏时，经本院把芳接回来了。虽然我知道，但因去所里有事不能马上去。芳、丽等得不忍了。这时已是该睡觉之际，我听到丽在叫我，仿佛有什么紧事。我忙说：“丽真，别叫了，丽真……”

芳很憔悴地睡在炕上，忽然坐起来了。我坐在她的跟前，丽又自然地坐在我跟前。

问了芳两句话，不由得我便落下泪，她俩也同样难受，在悲哀着。怎么不难过呢？我、丽、芳低头不语，我们要离开最知己的朋友，难道还不难受吗？

第二天，虽然我夜晚睡得很晚，但还是很早醒来了。丽也是很早就来了。她和我很亲切地坐在一起拉话，使我最难受的话是：“涛，我今天说不出的难受，我离开了你，谁再是我的靠山呢？我像离开了一切一般。涛，我很想咱俩一块过河，这是多么好呀！

涛英，你……”一群同学都回来了，丽当然不会再说了。我不由地低头不言，她同样如此。吃过早饭，我同丽一块下去，她去交工作去了。我便到芳枝那里。虽然和芳拉了一上午话，但总没有说出我最真心的话。一方面，由于芳的耳背不能低声向她讲话，同时又因傅教员和她住一个房子，讲话也不方便。可她很亲切地告诉我，×××对我俩的企图，故意骂我们，破坏我们，同时写信刺激我们……

告诉我，我走后她在四所经历的比较特殊的事情。我向她讲的就是要她时刻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听我的话，好好地和丽一同过河去，不要自己常害病还不愿脱离工作。

并且劝她不要计较四所个别人对她那种态度，叫她时刻听丽的话，病好了尽量不要参加宣传工作，因自己的身体不能经受刺激等。

我们动身前，为了芳枝在病中不便受到精神上的刺激，就没有和她告别。丽把我从清水沟送得很远，我看到丽难受得很，所以我尽量表现高兴，一直送到再不能送的时候，我简直再也忍不下去了，几乎哭出声来，丽也同

样更难受起来，我俩在泪珠下装着笑面分离了。

她俩走，我有三点感想：（一）欢迎。（二）难受。（三）记住。

欢迎。她俩走我很高兴、满意。因她们的身体都不大好，丽虽然不常病，但身体还是很弱；芳更可怜，三天两头就会生病，所以她们到安全的地方是适当的，一来为自己，二来为了革命的资本——身体。

难受。我在这几年中只交下她们两人，要分别怎么会不难受呢？尤其是丽，在小学就是最熟悉的。当然其中几年我俩是不大接近的，到中学后又到一起了。我们又在一班，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都搞得很好，甚至于一切日用品都不分你我。芳虽然在一起时间不长，但我俩一见面就能合得来，我俩在一个班从来没有闹过别扭，同时丽也很喜欢她，老实说她俩是我最真诚的朋友。分别时怎么不难受呢？我再有个谁吗？我时刻想念的丽、芳呀！

记住。我们是暂且分别，假若是永远分别，我是永远不会忘记我最真诚的朋友——丽真、芳枝。我该记住，她们对我的诚心帮助，记住。

9月

我从生以来，是很少享受过爸的爱。只是生过我的妈，把我抚养成人的妈最喜欢这粗笨的女儿。可怜的妈妈在1940年和爸爸与我做了最后的永别，我最喜爱的妈永远安息了，唉，妈……妈呀……

自妈去世，爸就成了无家可归的瓦匠，没有一定的地址做工，职业也不能肯定。今天在那儿做瓦，明天在那儿做泥，有时离我近，有时离我远。可怜的爸每礼拜抽时间看我一次。

爸的工资总拿一部分给我零用。1942年时，爸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址，在难民工厂烧瓦。这时，我在鲁艺帮别人带娃娃和学习。爸离我200多里路，可是爸一年总得来一两趟，并带着很多吃、用的东西。可怜无家可归的父女仅仅到饭店坐两三个钟头就够幸福了。

爸屡次见我时，首先摸摸我的头：“好孩子，你不要哭，有什么事告诉爸，你哭爸也不舒服……爸带你走好不好……”“我不去，我……”爸同样落着泪说：

“自你妈死了，爸每天不放心你，唉，孩子，咱真可怜！你爸太没本事了，不能叫你安安稳稳享受妈、爸的喜欢……”

现在，我与爸离这样远，但他比在延安还喜爱我。因为我渐渐地长大了，自己的事全部能由自己适当地处理，同时我也能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达到爸的目的，不落在别人的后边。在自卫战争中，我在随军医院工作，爸更觉得我是一个还有出息的孩子。当8月2日见到爸时，爸表示更放心，满意了，并奖励我。

爸今年已有45岁，因身体健康的缘故，看来仿佛35岁的样子。爸一贯对工人很热情，每天结束工作后，总得和工人拉好久闲话。工人们对他都没有什么意见，叫他王师傅。

爸觉得不太好，往往不愿答应，以后工人就叫爸“老王哥”。

我亲爱的爸爸不知在何时才能相见呀！我要对得起爸，好好工作，各方面都要向好的同志学习，时刻检讨自己，改进自己，做一个有用的青年是多么好呀！更要做一个战争考验成功的共产党员，那爸是多么满意呀。

1948年1月

我入了医务界

我是不够喜爱医务工作，我曾记得在我 14 岁时写过一篇作文“你最喜欢做什么工作，最不喜欢的又是什么？”的确，我最不喜欢的是医务工作。我现在为什么会踏进这大门呢？仿佛有些奇怪。的确，环境是很伟大的，它能把不管多么顽固的人都能征服过来，并使她懂得了这门工作的伟大。

我入医务界是有不少的波动，从波动里变过来。在三查后，才真正有了目的。假如不学这门的话，将来去做什么呢？

自己仅仅是中学文化程度，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打算，更没有一个特长。现在好在从事这门工作一年了，总比一足无踏的地方有些保险。现在终于钻研这门学问了，过去在医务方面太无足轻重了，去年就白白地荒废过去了。时间的前进是无法挽救的，只有现在钻研，才能挽回浪费了的时间。今年要好好学习一番，一年后还是现在这样就糟了，总要成为像样的医生，才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同志。 王涛英

女，延中九班学生。1945 年入延中学习，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1947 年 3 月参加西北第四野战医院护理工作，后提升为军医。1950 年随该院赴抗美援朝前线，参加战地医疗工作。1952 年 10 月 16 日光荣牺牲。生前多次立功受奖，被朝鲜人民政府评为“人民功臣”，授予“人民功臣”奖章。

后记

提倡延安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这也是我们编纂这本当年延安的青少年回忆录的初衷和根本目的。当年延安的青少年是今天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和栋梁；今天的青少年则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对青少年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今天以及未来的青少年们，不仅会从这部书中认识历史，认识我们把自己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伟大时代，而且会不断从中得到新的启迪。

当年延安中学的第一任团总支书记王黎明与苏红同志是最初的倡议者。中国青年出版社积极赞同，随后我们酝酿成立编委会，商定以今天的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并强调它的文学性、可读性，避免作为一般回忆文章的史料性写法。由于校友分散在全国各地，行业各异，征稿信只能发到一部分人手中，许多人又工作繁忙，有先行者，也有后来者，所以从征稿到成书，也并非易事。书名最后定为：《延河儿女》——

当年延安的中学生们

当年的延安中学是由 1943 年末在延安以东十里的桥儿沟成立延大中学部开始的，1944 年，边区师范学校与延大中学部合并，定名为延安中学。中间曾一度更名行知中学。

1946 年，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又爆发了人民解放战争，学校处于战备状态，随后撤离延安，迁到了安塞吊儿沟。1947 年 3 月，学校一分为二，大部分师生组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后方医院”，旋即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医院”。其余师生随校转战陕北，边行军边教

学。这部回忆录的作者们所写的主要是从桥儿沟到吊儿沟的校园生活和学校变医院之后的战地生活，以至建国初期参加抗美援朝。延中的前身包括成立延大中学部的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师生，边区师范学校和以前的边区中学以及更早的鲁迅师范学校，几个学校的师生都有应约参加了本回忆录的写作，这样就能更反映以徐特立教育思想为指导的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教育，和青少年们的战斗生活。

在近百篇的回忆中，我们力求保持作者各人不同的经历和个性。他们是以自己的行为，以血和泪，以对革命的赤诚写作成文的，其献身精神、革命情谊流于笔端。鉴于全书的整体性和可读性的要求以及全书字数的限制，我们在编纂中作了某些必要的删改和文字加工，在文字加工中力求尊重作者，有些则是经过作者的反复修改而成篇的，也有因不符合本书的要求而忍痛割爱的。

本书目录编排按内容大致分为六辑：忆延安、忆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摇篮中成长；校园生活；社会实践；辛勤的园丁；行军参战生活；当年的作文和日记。

这部回忆录得以出版，我们首先感谢众多的作者，是他们为广大读者，为青少年们，展现了一幅幅壮丽生动的历史画卷。许多同志还提供了他们所珍藏多年的年轻时代的照片，还有毛泽东同志题写的“光明在前”的墨迹。还要特别感谢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注和支持。邓颖超同志在病危临终前的清醒时刻，同意为本书题词。李鹏总理、马文瑞同志，都题了词，留下珍贵的纪念。

最后，我们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于再版时修正。

编者

1992年9月17日

